

LADINGMEI
20
世纪
XIAOSHUO

拉丁美洲
小说

赵德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LADINGMEIZHOUXIAOSHUO

LA DING MEI ZHOU XIAO SHU O

本课题的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本著作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ISBN 7-222-03669-5



9 787222 036697 >

ISBN 7-222-03669-5

定价: 38.00 元



拉丁美洲 小说

赵德明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58756

438848

新解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拉丁美洲小说/赵德明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3

ISBN 7-222-03669-5

I. 2... II. 赵... III. ①小说—简介—拉丁美洲—20 世纪②作家—简介—拉丁美洲—20 世纪
IV. I730.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0788 号

本书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资助出版

20 世纪拉丁美洲小说

赵德明 著

* * *

组 稿 刘存沛	开本 889 × 1194 1/32
责任编辑 刘存沛	印张 18.625
封面设计 西 里	字数 400 千
责任印制 刘伟能	印数 1—3000 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2-03669-5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概 论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嬗变	(1)
第一章 加乌乔小说	(29)
第一节 贝尼托·林奇的小说创作	(31)
第二节 吉拉尔德斯的小说创作	(33)
第二章 现代主义晚期的小说	(37)
第一节 恩里克·拉雷塔的创作	(40)
第二节 卡洛斯·雷伊莱斯的创作	(46)
第三章 地域主义小说	(50)
第一节 《堂娜芭芭拉》	(52)
第二节 《漩涡》	(57)
第三节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60)

第四章 墨西哥大革命题材小说 (69)

第一节 《底层的人们》 (73)

第二节 《元首的阴影》 (80)

第三节 《洪水迫在眉睫》 (85)

第五章 土著主义小说 (91)

第一节 《青铜的种族》 (93)

第二节 《养生地》 (97)

第三节 《广漠的世界》 (102)

第四节 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小说 (107)

第六章 先锋派小说 (112)

第一节 爱德华多·马列亚的作品 (115)

第二节 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的作品 (121)

第三节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作品 (124)

第四节 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作品 (132)

第五节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 (139)

第六节 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的作品 (151)

第七节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作品 (157)

第八节 加夫列尔·卡萨克西亚的作品 (162)

第七章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	(166)
第一节 《总统先生》	(170)
第二节 《玉米人》	(175)
第八章 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小说	(189)
第一节 关于《人间王国》	(192)
第二节 《消失的脚步》	(198)
第三节 《光明世纪》	(214)
第四节 《元首的方法》	(229)
第九章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	(241)
第一节 《玫瑰角的汉子》	(247)
第二节 《小径分岔的花园》	(249)
第三节 《阿莱夫》	(252)
第四节 《马可福音》	(254)
第五节 《第三者》	(258)
第六节 《南方》	(260)
附录：博尔赫斯小传	(264)
第十章 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小说	(296)
第一节 《地道》	(298)

第二节	《关于英雄与坟墓》	(307)
第十一章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小说	(338)
第一节	《造船厂》	(341)
第二节	《请听清风倾诉》	(352)
第十二章	胡安·鲁尔福的小说	(368)
第一节	《平原烈火》	(371)
第二节	《佩德罗·帕拉莫》	(374)
第十三章	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小说	(382)
第一节	《中奖彩票》	(385)
第二节	《跳房子》	(388)
第十四章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	(394)
第一节	几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	(400)
	《枯枝败叶》	(400)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410)
第二节	《百年孤独》	(418)
第三节	《百年孤独》之后的四部长篇小说	(427)
	一、《家长的没落》	(427)
	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433)

三、《霍乱时期的爱情》	(437)
四、《迷宫中的将军》	(445)
第十五章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	(451)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道路	(451)
第二节 《城市与狗》	(462)
第三节 《绿房子》	(468)
第四节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489)
第五节 《世界末日之战》	(495)
第十六章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	(504)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之路	(504)
第二节 《最明净的地区》	(506)
第三节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509)
第四节 《我们的土地》	(512)
第十七章 何塞·多诺索的小说	(525)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之路	(525)
第二节 《加冕礼》	(527)
第三节 《这个星期天》	(530)
第四节 《没有界限的地方》	(532)
第五节 《别墅》	(534)
第六节 《淫荡的夜鸟》	(538)

第十八章 第二代“新叙事文学”作家 (542)

一、曼努埃尔·普伊格 (542)

二、伊萨贝尔·阿连德 (546)

三、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553)

四、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 (557)

第十九章 走向 21 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 (562)

一、阿维尔·波塞 (563)

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 (568)

三、何塞·巴勃罗·菲因曼 (570)

四、门波·西亚尔迪内里 (572)

五、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575)

六、路易斯·塞布尔维达 (578)

七、保罗·科埃略 (580)

八、埃莱娜·坡尼亚多伏斯卡
..... (583)

结束语 (585)

参考书目 (589)

概论

20 世纪拉丁美洲 文学的嬗变

自从 1492 年哥伦布登上新大陆以来至今，拉丁美洲的历史已经走过了 508 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20 世纪是拉美优秀作家、作品大量出现、文学思想频繁更新的一百年。也是从向欧洲、美国学习转向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个一百年，尤其以 60 年代以后更为明显。这样就值得提出一些问题，诸如：一个在 19 世纪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出来的大陆，何以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文学居然发达起来，并且可以与世界文学接轨呢？属于拉丁语文化体系中的拉丁美洲文学如何首先在这同一体系内继承传统又与传统决裂、不断开拓进取的呢？在 20 世纪的一百年里，拉丁美洲文学曾经三次影响前宗主国西班牙文学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子教三娘”的现象呢？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当然都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以本文

试图勾勒出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嬗变的历史轨迹，以便在此基础上寻找可能存在于这一嬗变中的决定性因素，例如，作家个性与民族性的互动、文化养成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时代特点与作家文学观念形成的关系等等。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历史轨迹的走向吧。

在 1900 年至 1920 年的拉丁美洲文坛上，分别由现代主义诗歌、现实主义小说和墨西哥大革命小说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开始于 1882 年，进入 20 世纪以后残酷的现实迫使诗人们走出“象牙塔”，纷纷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言人。就连诗坛领袖鲁文·达里奥也放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写出了《生命与希望之歌》（1905），其中就有批评美国干涉他国政治的《致罗斯福》。总之，进入 20 世纪的现代主义的诗人们已经把注意力从遥远的古希腊和东方国家转向拉丁美洲的现实和印第安文化，转向“拉丁美洲自己的历史、现实和人民”。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墨西哥人，1871~1952）曾任墨西哥语言科学院院士、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墨西哥全国文化协会主席、国际笔会墨西哥分会主席等职务。他的主要诗作有：《序曲》（1903）、《抒怀》（1909）、《沉默者》（1909）、《隐蔽的小径》（1911）、《天鹅之死》（1915）、《残缺的诗篇》（1935）、《新纳尔西索及其他诗歌》（1952）等。他早期的作品具有感情真挚而深沉、语言朴实而凝练等特点，开始踏上与 19 世纪现代主义前辈诗人不同的道路。《沉默者》和《隐蔽的小径》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与前辈诗人分道扬镳的倾向。他的著名诗篇《扭断天鹅的脖子》成为 1910 年前后新一代青年诗人们开创新潮流的行动口号。何塞·桑托斯·乔卡诺（秘鲁人，

1875~1934)正是这一新潮流的代表人物之一。1906年,他的代表作《美洲魂》问世,立刻在拉丁美洲诗坛上引起强烈反响。鲁文·达里奥对他说:“你的诗歌是我们文化的代表,是我们现代西班牙美洲的灵魂。”《美洲魂》热情地讴歌了美洲的自然风光、英雄伟人和历史传说;但他不是简单地描写外部世界,也不是客观冷静地写实,而是给拉丁美洲注入了灵魂,注入了民族自豪感。这种感情中包括了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比如他在抨击美国鲸吞巴拿马运河的侵略行径时写道:“美国犹如一把铜镣铐,锁住了美洲的一只脚——巴拿马。”乔卡诺的诗学主张是:以社会现实作为创作源泉,反对绮丽文风;反对一味模仿法国,拉丁美洲应该有自己的美学标准。他在诗中唱道:“我是美洲的歌手,粗犷豪放,土生土长。我的琴声有灵魂,我的歌声有理想。”他的许多作品由于深入浅出和雅俗共赏,因而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阿根廷人,1874~1938)于1905年创作了《黄昏的花园》,标志着他告别了对华美辞藻的追求而转向了以抒情为主的风格。他在诗中写道:“黄昏用轻轻的画笔/点缀着我周围的宁静,/宝石嫩绿的色块/又抹上了一缕深红。/一轮圆月钻出了树丛/茂密的树叶使寂寞更浓,/一个蜘蛛用它的丝线/迷人地编织苍穹。/穹隆中蝙蝠纷飞/宛如中国的屏风;/石基上你苍白的膝盖/显出优雅的倦容,/一条河流在我们脚下/无声地流向幽冥。”(赵振江译)1909年他发表了自由诗《伤感的月历》,其中有神话传说,有数学、物理和医学知识;语言方面比喻奇特,幽默诙谐,还不时地玩一些文字游戏。这部作品在青年一代诗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波及到后来出现的极端主义派。1910年,卢贡内斯出版了诗集《百年颂》,主要描写

了阿根廷的城市、乡村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充分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独特风格。这部诗集连同《罗曼采集》（1928）

《祖先的诗篇》（1928）以及《里奥塞科的罗曼采》（1938）使得作者获得了阿根廷民族主义诗人的桂冠。这三位现代主义诗人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初的拉丁美洲作家在寻求文学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上，努力打破传统的障碍，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学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在自己的历史、自然和人民中发掘本民族的艺术瑰宝，从而找到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学表达方法。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小说起源于19世纪，是在法国文学大师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夏多布里昂和西班牙大作家佩雷斯·加尔多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阿尔贝托·布莱斯特·加纳（智利人，1830~1920）的《马丁·里瓦斯》（1862）和《移居者》（1904）；卡洛斯·玛丽亚·奥坎斯托（阿根廷人，1860~1949）的《赫罗米塔小姐》（1898）和《堂佩费克托》（1902）；托马斯·卡拉斯基利亚（哥伦比亚人，1858~1941）的《我故乡的果实》（1896）和《约隆博侯爵夫人》（1926）等。这些作品主要表现拉丁美洲各国独立以后初期的社会状况，比如，各个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甚至战争，社会中上层的生活情形；进入20世纪后，则着重描写矿工、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普遍受压迫和剥削的生活，同时也揭露政府官员专横跋扈、贪赃枉法、腐败无能的丑恶行径，还批评赌博、盗窃、卖淫现象的发生。20世纪初（1900~1920），影响较大的小说家有：费德里科·甘博亚（墨西哥人，1864~1939）代表作《圣女》（1903）叙述了一个美丽、纯朴的农村姑娘沦落为娼的故事。这部小说

的成就在于，它揭露了墨西哥的社会病毒，抨击了阶级压迫造成的丑恶现象，从而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关注。曼努埃尔·加尔维斯（阿根廷人，1882~1962）的重要作品有：《师范学校女教师》（1914）、《修道院的阴影》（1917）、《纳查·雷古莱斯》（1919）、《基罗加将军》（1932）等。他的作品包括了社会、历史和心理三种题材，以揭露阿根廷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社会生活场景中的阴暗面为主要目的，涉及到政治、教育、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在《师范学校女教师》里，女主人公揭露了省政府首脑的独裁统治，抨击了校长的家长作风，批评了该地区封闭、狭隘、落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和窒息。在《纳查·雷古莱斯》中，作者揭露了城市里的卖淫现象，对妓女的悲惨境遇抱着同情的态度，他通过男主人公蒙萨尔瓦特和妓女纳查之间的爱情，力图洗净这些被污染的灵魂，并且使她们脱离苦海：男主人公为挽救纳查而失去了金钱、地位、名誉和朋友，几经挫折之后二人终成眷属。显而易见，这是作者的理想安排。但在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纳查·雷古莱斯》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文学评论界纷纷赞扬该书的思想深刻和娴熟的艺术技巧。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阿根廷全国文学奖。1938 年，加尔维斯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孤独的人们》，作者抓住当时人们纷纷出国谋生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现实令人感到压抑和孤独人们便以为“欧洲是真正的天堂”，于是争先恐后地寻找出国的门路。加尔维斯塑造了一个典型代表：克拉拉瓦尔律师。这个人物无论社会生活还是家庭生活都不得意，因此感到孤独、苦闷和彷徨，希望能够到欧洲去找出路，可是苦于没有人可以帮忙，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恰好保守党发动了政变，

夺取了政权。不满现状的人们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便四处活动，争取弄个一官半职。但是，政变结果让人们大失所望。克拉拉瓦尔梦寐以求的外交官职务也落入了一个“暴发户”手中。全书在一片叫骂和叹息声中落下帷幕。另外一位成功地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家是智利的华金·爱德华兹·贝约（1887~1968），他的重要作品有：《城市贫民》、《埃斯梅拉多的摇篮》、《无用的人》等。这些作品着重描写城市底层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乞丐、妓女、贫民的生活。作者使用了非常辛辣的笔调，揭穿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假面具，一方面对贫民窟、妓院和赌场进行了细致和具体的描写，另外又深入发掘了这些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人们的心理活动。因此，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是社会题材和心理题材的成功结合。”贝约先后获得过智利全国文学奖、智利全国新闻奖；先后担任过智利全国语言学院院士和西班牙皇家学院通讯院士。上述三位小说家的成功作品虽然大多发表在1900年至1920年之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艺思潮的更新，他们后来的作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贝约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踏上了极端主义文学之路，50年代以后又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写作，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墨西哥大革命小说是指1910年11月20日墨西哥爆发了以农民武装起义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代表作家和作品是：阿苏埃拉的《底层的人们》，洛佩斯·依弗恩特斯的《土地》和《鹰与蛇》，阿古斯丁·亚涅斯的《洪水迫在眉睫》等。《底层的人们》主要叙述一支小游击队起义的原因、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其特点是作者亲自参加了这一大革命，因此作品亲切、生动、质朴，带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土地》讲述了农民起义领袖萨帕塔的一系列故

事；《鹰与蛇》讲述了农民起义军司令维亚的故事。这两部作品有意歌颂农民起义的壮举，以便在 1930 年新的斗争形式下，发扬 1910 年的革命精神。《洪水到来之际》发表于 1947 年，是作者亚涅斯对 1910 年这场大革命进行反思后的结果，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是如何对抗这一大革命的。书中用艺术的形式指出社会的死气、暮气和晦气是造成革命不彻底的主要原因。这不同时期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兴趣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家对于这一题材的发掘，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

占据 20 世纪 20 至 50 年代拉丁美洲文坛主导地位的是：先锋派诗歌、地域主义小说、土著文学和先锋派小说。

先锋派诗歌产生于 1920 年前后，主要原因是诗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怀疑，尤其是拉丁美洲动荡的社会生活使得诗人们对前途产生了迷惘的情绪，社会黑暗和丑恶现象使得他们感到愤怒和无奈；于是，他们摒弃了现代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转而用朴实无华的形式描绘现实和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其内容大多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是内心感受的真实抒发。阿根廷诗人巴尔多梅罗·费尔南德斯·莫雷诺（1886~1950）是这一朴实风格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注重抒发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感受，他说：“现在我看到诗歌忠实地沿着我在大地上的足迹行走：我所生活的那块国土、城市和村镇，爱情、家庭、儿女、民族，我的工作和假期，这一切大致反映在我的作品中。”他的主要作品有：讴歌爱情的《城市》、《阿根廷乡村》、《新的诗篇》等；讲述家庭生活的《儿子》、《继续》、《十行诗》、《十四行诗》等；

晚年，他大多感叹“人生苦短”，写了《朦胧》、《继续》、《我，医生》、《我，教授》等。有些拉丁美洲的评论家认为，莫雷罗这一派诗人是从现代主义向先锋派过渡的一代，真正与现代主义决裂的是维多夫罗和博尔赫斯为首的先锋派诗人。维多夫罗（1893~1948），智利著名诗人，早在1914年就明确提出，诗人应该在自己的诗歌艺术世界里“创造自己的现实”，既然“上帝”赋予诗人这样的禀赋，诗人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1916年，他在法国参加了先锋派诗人们举办的活动；1921年又在西班牙主办了先锋派的文学刊物《创造》。他主张：“作为诗人的天职，第一是创造，第二是创造，第三还是创造。”于是，评论界称他为“创造主义”诗人。1925年，他对“创造主义”做了更为详尽的阐释：“创造主义并非我强加于人的一种流派，它是普通的美学理论……我认为：只有创造才能产生激情；只有创造，才是我们时代的标志。”由于诗人具有神奇的创造力，“诗人能够发现相距最远的事物之间存在的隐蔽关系，能够发现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无形线索。诗人应该像弹奏琴弦那样拨动那些线索，使之引起共鸣……”他还主张：“不要模仿大自然的外在表现，而应该像大自然本身那样具有表现力。”他解释说：“当我写出‘鸟儿在彩虹上筑巢’时，我向你们展现了一个新景象，一个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却又非常想看到的事物……诗人应该讲述除他之外没有人能讲的事情。”维多夫罗将自己的诗学理论归纳为：把事物人格化；把艰深的东西写得简明；把抽象的具体化；把具体的抽象化。他坚持认为：意象是诗歌的基石，是联系不同事物的手段，是表现意境和神韵的关键；诗人只有通过鲜明、生动的意象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追求。所有这些诗

理论主张对拉美诗歌的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另外一位先锋派的代表是阿根廷著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1920年，他在西班牙参加了坎西诺斯·阿森斯为首的文学团体。这个组织在成立宣言中说：“我们的口号是‘极端’；在我们的信条中，可以一视同仁地容纳表现新的追求的一切倾向。”他们主张：最重要的抒情手段是比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连接词和多余的形容词；废除修饰成分、信仰、说教、景况叙述和矫揉造作的句子；将两个或者更多的意想融为一体，从而使诗句更加耐人寻味。评论界称他们为“极端主义派”。博尔赫斯虽然参加了这一派别并且于1921年返回阿根廷时又引进了自己的祖国，但是他很快就告别了“极端主义”，逐渐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追求。从1923年发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经过《面前的月亮》（1925）到《圣马丁札记》（1929），博尔赫斯大多表现令人思考的哲理，如：时间、空间、梦幻、死亡等题材；他还特别喜欢用宇宙及其神秘现象做诗歌的主题。他的作品中既有“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的辩证思想，又有彻底的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他认为，古往今来的诗歌都是重复同样的题材，因此诗歌永恒的本质只在于典型和纯粹的形式。与此同时，他又承认：“文学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任何作品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特别举出福楼拜的《萨朗波》为例，说明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两千年前迦太基人的内战史，但是作品本身却具有19世纪法国小说的典型性：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福楼拜那个时代和个人结合的产物。博尔赫斯自己的作品也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诗歌，无论是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素描，还是关于个人家庭历史的回忆，或者是对阿根廷历史和文化

的思考，都表现出作者执着的探索 and 追求。他善于将抒情和叙事、现在和未来、激情和理智融为一体。他特别喜欢钩沉索古：古代欧洲的爱尔兰、东方的阿拉伯、印度，在他看来都是充满幻想的神秘地方。他尤其热爱中国文化，阅读过 100 多种英译本的中国著作。他的作品中，例如《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在艺术技巧方面，他革新了西班牙语的传统，剔除冗长、啰嗦、言不及义的毛病，坚持使用明快、简洁、数字般准确的语言；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歌中有散文的成分，散文中充满了诗情，从而打破了严格的文体界限。博尔赫斯的渊博学识和充满智慧的深刻思想使他成为一代文学大师，成为“作家的作家”。

地域主义小说发轫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因集中描写某个专门地区的自然风光和乡间习俗而得名。这一派作家认为，自然界代表一种神奇的力量，地域特征决定了拉丁美洲人的性格，因此用较大力量描写自然风光、人与自然的矛盾和人们的风俗习惯。在艺术方面，他们十分注重作品的抒情性和语言的优美特点，尤其喜欢用诗歌的语言描写自然风光，但是并不忽视吸收人民群众的口语。这一派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委内瑞拉共和国前总统、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1884~1969）的《唐娜芭芭拉》（1929）；乌拉圭作家恩里克·阿莫林（1900~1960）的《同乡阿基拉尔》（1934）等。地域小说的贡献在于：从此开始，拉丁美洲小说带上了浓重的本土色彩，这样就为摆脱欧洲小说的模式、开创拉丁美洲民族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因为从地域主义小说开始，拉丁美洲作家描写的对象逐渐从社会上层转向“底层的人们”失去土地的农民、牧场的苦工、黑人和印第安人。地域主义小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推动了土著文学的诞生。

土著文学系指以印第安民族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对于这一题材的处理，不同作家之间的态度和艺术手法差别很大，不同时代的作家也不尽相同。1920年以前的土著文学大多强调作品的教育作用，企图通过消除印第安人的迷信思想来改变他们的愚昧、落后状况。这一思想是从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派生出来的，认为迷信巫术是妨碍人类“自我完善”的古代残余，所以应该加以清除。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有所改变，广大受奴役的印第安民族被左翼作家看做是潜在的革命力量，认为他们迟早会起来推翻压在身上的各种反动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拉丁美洲作家主张发扬灿烂的古印第安文化，并且把这一文化同欧洲文化加以比较；他们认为，应该从印第安内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根溯源，找出区别于欧洲文化的基本特征来。土著文学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阿尔西德斯·阿尔格达斯（玻利维亚人，1879~1946）的《青铜种族》（1919），霍尔赫·依卡萨（厄瓜多尔人，1906~1978）的《养身地》（1934），西罗·阿莱格里亚（秘鲁人，1909~1967）的《广漠的世界》（1941），何塞·马利亚·阿尔格达斯（秘鲁人，1911~1969）的《深沉的河流》等。这些作品突出地揭露了大庄园主对印第安农民的欺辱、压迫和剥削，讴歌了印第安农民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在表现手法上，这些作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以写实为基础的基础上，注重描绘印第安农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因而具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在语言方面，这些作品引进了大量的方言土语，使得作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土著文学发展到50年代以后，由于借鉴了欧洲的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等表现手法，从而拓宽了作家的视野，使得作品既带有浓

郁的乡土气息而又不囿于狭隘的乡土观念，因而将这一文学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新阶段。

拉丁美洲的先锋派小说是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派文学在思想上反映了处于矛盾和危机中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时还反映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精神创伤、心理的扭曲、悲观绝望的情绪、虚无主义思想等等。在艺术手法上，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派强调以暗示和联想为主，使用直接诉诸官能的手段和某些自然主义手法，反对由作者直接出面讲述故事或者做正面描写。作品的情节往往是荒谬的，人物默默地为荒谬所摆布。叙述者的语调常常是冷漠的，甚至是超然的。对拉丁美洲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有：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的弗兰茨·卡夫卡、美国的福克纳等人。拉丁美洲的先锋派小说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这些作家从欧洲现代派文学中更多借鉴的是艺术技巧，这是因为拉美作家虽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也产生了苦闷和失望的情绪，但他们意识到新大陆贫困落后的根源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本身。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作家们把笔锋直接对准社会痼疾，宣泄愤怒和不平。当然，其中也不乏表现绝望和虚无思想的作家。但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坚持文学应该扎根本土、开创民族文学之路的人们。此外，欧洲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还粉碎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因而促进了拉丁美洲民族自信心的提高。许多作家不再盲目效仿欧洲的文化模式，而是提出认识本民族文化特点的要求，因为美洲的祖先也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印第安文化，所以应该从现存的印第安民族生活入手去追寻民族之魂的根源。在艺

术方面，拉丁美洲的先锋派作家开始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肯定了潜意识和梦幻是“心理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从而敢于涉足于不曾问津的“神奇”领域，冲破了传统小说设置的藩篱。在语言和结构上，先锋派作家也进行了一系列革新，例如，打破语言逻辑和语法规则的限制，以便表现事物的非理性和非现实性；在作品的结构上，作者不再设置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只负责讲述自己的感受，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依赖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作品中还安排了“主观心理时间”，即按照人物的主观情感把过去、现在和将来重叠起来。与欧洲先锋派作家的艺术技巧相比，拉丁美洲作家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去平心静气地剖析复杂的个人心理活动。严酷的社会环境使拉丁美洲小说首先成为一门新大陆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它的使命是搜集资料，做出评价 给予批评（引自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讲话）。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主要有：爱德华多·马列亚（阿根廷人，1903~1982）的《死水之滨的城市》，阿莱霍·卡彭铁尔（古巴人，1904~1980）的《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人，1899~1974）的《总统先生》（1946），雷翁波尔多·马雷查尔（阿根廷人，1900~1970）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1948），罗伯特·哥多弗雷托·阿尔特（阿根廷人，1900~1942）的《狂暴的玩偶》（1926）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埃内斯托·萨瓦托（阿根廷人，1911~）的《地道》（1948），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人，1909~1994）的《短暂的生命》（1943）胡安·鲁尔福（墨西哥人，1918~1986）的《佩雷罗·帕拉莫》（1955）等。先锋派小

说的发展有二十年之久，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称之为“光辉而关键的二十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涌现出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代作家无论在创作实践还是理论高度上都为独具拉丁美洲艺术特色的民族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一代人开始，拉丁美洲文学出现了流派多元化并存的倾向：社会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重大理论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并付诸试验的。没有这一代人的努力和探索，就不可能有 20 世纪 60 年代“文学爆炸”的发生。因此不少评论家认为，先锋派作家是 20 世纪下半叶拉丁美洲文学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先驱者。没有博尔赫斯、帕斯、聂鲁达、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胡安·鲁尔福等文学大师的出现，绝对不会有今天拉丁美洲文学的辉煌。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先锋派文学的基础上，又有重要作家出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博尔赫斯大力推崇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1918～1986）的《佩雷罗·帕拉莫》

（1955），他说：“这是一部神奇的小说”、“《佩雷罗·帕拉莫》是西班牙语各国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也是所有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引自《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下》第 613 页）这部中篇小说叙述了墨西哥大庄园主佩雷罗·帕拉莫专横跋扈、掠夺土地、欺压百姓、奸淫妇女……最后被他本人的私生子杀死的故事。作者在结构作品时创造了一套奇特的叙事方法：打破时空界限，打破生死界限，打破阴间和阳间的界限，通过对话、回忆、独白、暗示、梦幻等技巧，把过去和现在、人和鬼魂穿插在一起，从而制造出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进而反映内战和大庄园制度给农民造成的灾难。这部作品的问世进一步推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发

展。进入 60 年代后，拉丁美洲文坛上出现了文学“爆炸”现象，即：一大批思想内容深刻而生动、艺术技巧复杂而奇特的作品纷纷问世，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并且形成阅读“新小说热”的现象。代表作家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人，1928～）、胡里奥·科塔萨尔（阿根廷人，1914～1984）、巴尔加斯·略萨（秘鲁人，1936～）、卡洛斯·富恩特斯（墨西哥人，1928～）、何塞·多诺索（智利人，1924～1996）等人。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说，这个时代也在呼唤文学反映人们的情绪和精神。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以后，拉丁美洲各国政治上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干涉、经济上要求独立发展、文化上要求有民族特色的呼声日渐高涨。作家感到有责任把这一精神风貌表现出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这非同寻常的现实不是纸上的东西，它与我们终日同在、并且给我们造成大量死亡。与此同时，这一现实也就成为我们永不枯竭、充满美丑与善恶的创作源泉。”巴尔加斯·略萨于 1968 年 8 月 4 日在接受一项国际文学奖时明确地表示：“必须告诫那些排挤、压迫文学家的社会：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意味着反抗。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就是因为他要抗议压迫，揭露矛盾，批判黑暗。”他们对文学的认识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也与他们对欧洲和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了解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国外，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状况给了他们很深的刺激，迫使他们深入思考自己国家落后的原因。他们看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本国独裁统治的压迫、反动、落后的经济制度、农村的愚昧和贫困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障碍。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不拘泥于过去某种固定的文学模式，而是在继承和借鉴外来文化和拉

丁美洲文学传统的同时，大胆开拓一条新路，即艺术多样化的道路。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电影艺术手法……任何足以反映和表现艺术真实的技巧都可以拿来一试，不存在什么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流派。新叙事文学的作家们有着更为宽广的视野，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根”还是应该扎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他们的作品总是试图通过一城一镇一村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的境遇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来，《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绿房子》中的皮乌拉，《最明净的地区》中的墨西哥城……都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为了更好地表现本土生活，作家们还努力使自己的表现手法民族化和现代化。瑰丽、多姿、奇特的大自然，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欧洲和亚洲的移民所形成的民族混杂，畸形发展的现代大都会和人烟罕至的原始森林和落后山区，高科技的跨国联合经济集团和印第安人刀耕火种的原始劳作，所有这一切造成一个“神奇的现实”（卡彭铁尔语），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充满压迫、剥削、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实，总之，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又充满痛苦的现实。为了更好地表现和反映这一现实，作家们认真发掘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意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习俗……一切可以表现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内容和形式，努力使艺术技巧现代化，特别是在表现故事人物的心理活动、潜意识和梦境时，他们充分注意到对非理性因素的发挥，注意到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人物的情绪和感觉。由于这一代作家开拓民族文学又不排斥对欧洲和美国现代派的学习和借鉴，重视本土生活又不忽视艺术技巧的现代化，有些优秀作品还把电影、音乐、绘画的形式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例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

语言学等)熔于一炉,因而使得他们的作品立意深刻、艺术技巧奇特,所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拉丁美洲和西班牙等国的出版公司闻风而动,积极推波助澜,很快便形成读书热潮。对此,西班牙著名作家米盖尔·德里维斯说:“也许我们欧洲的小说创作已经进入衰落时期,而拉丁美洲则相反,它是一个年轻的大陆,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的,那里正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丝毫没有欧洲已经可以察觉的衰竭先兆。甚至可以这样说,拉丁美洲文学已经居于世界文坛的首位。”(引自《西班牙人和拉丁美洲文学的“爆炸”》第124页,1972年西班牙新时代出版社出版)。在美国,翻译家乔治·拉巴萨说:“目前,拉丁美洲作家的创造处于全面的鼎盛时期。美国和欧洲的书店里摆满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出版的小说。从纽约到伦敦,从评论家到一般读者,都经常谈及这些人的名字: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若热·亚马多和卡洛斯·富恩特斯。拉丁美洲作家第一次不模仿外国文学而被外国所模仿。”(引自1982年3月16日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日报》转载美国《新闻周刊》的文章)。毋庸置疑,拉丁美洲文学从20世纪60年代真正地迈入了世界之林。继文学“爆炸”之后,从70年代初开始,又有一批文学新人登上舞台,他们继承了“爆炸”的反抗精神,继续以社会生活、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为创作对象,写出了一大批题材丰富、艺术技巧新颖奇特的作品,进一步强化了“爆炸”在西方世界的冲击波。由于他们比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一代人要年轻,因此评论界称他们是“爆炸后的新一代”,称他们的作品为“爆炸后文学”。“新一代”大多数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们的成长年代正值拉丁美洲军事政变频仍、独裁专制政权对广大群众实行高

年时代的生活，尤其是家乡城镇的风土人情。一年以后，他发表了第二部小说《红红的小嘴巴》（有中译本），讲述了阿根廷某城镇三对年轻人的感情纠葛：美男子卡洛斯爱上了

“春天的皇后”奈丽达。可是，他不幸染上肺病，不得不住院疗养。两人分居两地，天各一方，只好互相通信倾诉衷肠。不久，年方 29 岁的卡洛斯病逝。奈丽达后来怀着对他的深深思念出嫁，30 年后带着一一直保存的情书离开了人间。卡洛斯还有过一个女友，名叫玛贝尔，为人风骚，追求过卡洛斯，但是父母强迫她嫁给了一个老博士。卡洛斯还有个朋友，名叫潘乔，先是爱上了玛贝尔的使女拉瓦，但是后来抛弃了这个姑娘，拉瓦一怒之下杀死了潘乔。那时还活着的奈丽达理解和同情拉瓦的做法，给这个姑娘提供钱财，让她去外地谋生。从此，拉瓦过上了俭朴但平静的生活。 1976 年，普伊格又有新作出版：《蜘蛛女人之吻》，讲述了一位同性恋者——一位革命者及其女友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通过生动有趣的对话、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和心理分析，真实地反映了处于军事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社会生活。该书被改编成电影后获得巨大成功。普伊格这一雅俗结合的文学创作特点不仅表现在小说与电影、电视的联系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用通俗的形式表现严肃的主题的追求，比如，他曾经尝试用惊险小说的形式来写军事独裁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这样，作品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同样可以达到揭露压迫和伸张正义的目的。在文学语言问题上，普伊格认为，小说创作关键是语言，而不是题材、情节和结构。如果语言变化多端、内涵丰富，各种声音充满作品，那就会使得情节活泼起来，与此同时，也就要求结构复杂起来。他强调创作实践的重要性，主张艺术形式要自由，不受束缚。他认为，文学就

压暴政时期，因此他们的创作更多地表现为对自由、民主的崇尚和对人权、个性解放的追求，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控诉也更为大胆、严厉、彻底。从文化养成来看，他们很好地学习了“爆炸文学”的作品，同时又紧密跟踪欧洲和美国文化思潮的变化。“新一代”中有些人直接得到前辈作家的指导和帮助，因此他们在创作艺术上既受益于前辈作家，又比前辈更有大胆试验的勇气。进入 80 年代中期以后，这批作家在西方文坛已经颇有知名度。90 年代前后，他们进而掌握了与高科技传媒结合的手段，大大地拓展了搜集资料的天地和创作空间。“新一代”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被评论界称之为“语言文字改革派”，他们极力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追求“对语言结构的扭曲，以嘲笑小说传统概念为乐事，以叛逆者自居”。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阿根廷作家马努埃尔·普伊格和奈斯多尔·桑切斯、墨西哥作家古斯塔沃·萨因斯和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杜伊。另外一派则仍然坚持“更敏锐、更深刻地捕捉和反映现实生活”，他们的兴奋点在于：艺术技巧的新颖和奇特，比如，使用魔幻变异的情节、心理分析的手法、夸张调侃和巴罗克式的语言。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哥伦比亚作家拉斐尔·温贝托·莫雷诺—杜兰，秘鲁作家阿尔弗莱多·普利塞·埃切尼克、阿根廷作家阿韦尔·巴塞等人。下面分别对他们做一简单介绍：

马努埃尔·普伊格（1933~1990）少年时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小城镇里，成年后侨居美国和欧洲，从事小说、剧本和电影摄制工作，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界及电影界有知名度。1968 年，第一部小说《丽塔·海华兹的叛变》问世，以日记、书信、对话和独白等形式反映了作者少

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解释生活的，因此就必须认真对待语言本身的涵义。他这一系列看法在 70 年代中期对拉丁美洲青年作家很有影响。

墨西哥作家古斯塔沃·萨因斯 1940~ 现任墨西哥大学教授，美国客座教授，报刊专栏作家。1965 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幼兔》出版 讲述了青年一代的精神危机。口语化和句子短小，结构变化复杂是这部作品突出的特点。他以后的一些作品也极力追求通过不同渠道贴近现实，例如：《固执和循环的白天》（1969）、《铁宫公主》（1974）、《以狼为伴》（1977）。1987 年，他的创作又回归到 20 世纪 60 年代的风格。

古巴作家塞维罗·萨尔杜伊（1937~ 1993）作为诗人有三部诗集：《奥维尔多塞》（1972）、《乒乓》（1974）和《水果王国》（1991）。作为散文家，必须一提的是：《写在肉体上》（1969）、《巴洛克》（1974）和《为着呐喊》（1978）。作为小说家，他主张对叙事语言进行改造，打破语法规定的语序，寻求丰富和生动的表现方法。1963 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嘴脸》问世，就形式而言，在有些方面依然与传统小说联系紧密，从内容上讲，讲述的是一个黑人姑娘如何从洗衣妇变成歌手、演员和恐怖分子的故事，但是，使这位女主人公最烦恼的是失恋和身上的小毛病。1967 年，他发表了《歌手们来自何方？》，用反小说的形式阐释了土著、非洲黑人和欧洲人如何融合为今天的古巴文化。1972 年，长篇小说《眼镜蛇》出版，用交叉叙述的方法讲了一个人的两个故事：“眼镜蛇”是个两性人的绰号，种种遭遇迫使他要做出选择，对生殖系统进行改造；另外一个故事讲述主人公如何追求情爱快乐的过程和悲惨死亡的结果。1973 年，长篇小说《弥勒》问世，作品中刻意表现了人类渴望通

过一位救世主来解决危机的愿望，而书中的救世主就是佛教中的弥勒佛。作者使用戏谑的方式，讲述了弥勒为什么拒绝承担这一重任的原因：既然“万物皆空”，救与不救有何区别？1990年，他的一部文字游戏玩到了不可思议水平的作品发表了：《硬木》，讲述了一个儿童如何从无知懵懂的状态变成了聪明机智的青年。正是生活本身让他看清了黑奴贩子的嘴脸，看清了妓女们的苦难，尤其是他那弱视的爱人被玷污以后，更加激起了他对达官贵人们的仇恨并且开始了报复行动。1999年10月，在萨尔杜伊逝世后6年，西班牙出版了他的作品全集。

古巴作家雷纳尔多·阿雷纳斯（1943~1990）曾经在几所美国大学里教书。他创作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也喜欢写同性恋题材。1965年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黎明前的赛莱斯提诺》，1967年在哈瓦那出版，1982年重新修改后，用《井里唱歌》的书名发表。作品用独白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古巴农村的儿童如何在暴力和冷酷的家庭环境里备受虐待的故事。这个孩子编造了一个人物，起名叫赛莱斯提诺，是孩子梦中的伙伴，后者在树皮上写下许多诗歌。书中有许多地方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童年经历，因此它既有实际生活也有许多想象，其中充满了抒情的意味和童年的感觉，作者还试图把捍卫自由与自杀和死亡无处不在的威胁结合在一起描写。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习作，阿雷纳斯真正成熟的长篇小说是1969年问世的《离奇的世界》。这部作品以墨西哥多明我会传教士塞万多·特莱莎·德·米尔的生平为基础，讲述这个教士为躲避殖民政府的迫害四处流浪的故事。有趣的是作者把历史人物和故事与当代发生的事情糅合在一起，不时地用嘲讽的口气调侃古今人物。在叙述艺术

上，作者使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三个叙述者同时在场的方式）同时开口说话的方式，三者互相补充又互相矛盾。从 70 年代到 1992 年自杀前，他写了 6 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游记，大都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之情，另外也有批评古巴现状的文论和一部介绍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故事。

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1942~ ）出身名门世家，父亲是外交官，伯父是前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73 年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被杀害）。1958 年，伊莎贝尔步入社会，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机构中工作。一年后，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1973 年政变发生后，她营救了許多受军方追捕的亲友。不久，她和家人也不得不流亡国外了。在委内瑞拉生活期间，她一面做新闻记者，一面从事文学创作。1981 年，她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幽灵之家》出版。该书用回忆的方式记叙了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荣辱变化的一生，通过两个大家族的风云变迁，描绘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出身名门、然而家道已经中落的埃斯特万原本是个地质勘探家。他爱上了家势显赫的德瓦尔列家族的大小姐罗莎。不幸的是美丽的罗莎误饮毒酒身亡。埃斯特万和罗莎的父母悲痛不已。这时，二小姐克拉拉年纪还小，但是善解人意。更为神奇的是，她从小就有超人的预测（曾经准确地预测到姐姐死亡的时间）和意念致动能力。埃斯特万旧情难忘，罗莎死后他仍然经常去德尔瓦列府上拜访。天长日久，克拉拉生出落得楚楚动人，逐渐吸引了埃斯特万的注意。后来，二人终于结为夫妻，搬到一座新庄园里生活。不久，克拉拉生下一女，取名布兰卡。随着时间的推移，埃斯特万的庄园日渐发展起来，成为当地的富豪。发财后的埃斯特万慢慢变得不安分起来，开始在外面拈花惹草。他还肆意

奸污雇工的妻子和女儿。但是，他却不允许布兰卡与雇工之子佩德罗的正当恋爱，残忍地把佩德罗的三个手指砍掉。这一做法引起妻子和女儿的强烈不满。后来，势力强大起来的埃斯特万对政治发生了兴趣，通过竞选当上了地区议会议员。与此同时，佩德罗领导雇工起义失败而被迫离开庄园。1973年，一场军事政变改变了智利的历史，也改变了各种人物的命运：埃斯特万因为不满军政府的倒行逆施，放弃了议员的席位，回到家中与克拉拉重修旧好。佩德罗也不肯与军政府合作，在埃斯特万的帮助下逃往国外。布兰卡由于受到佩德罗的牵连而被捕入狱，而对她进行百般折磨的竟然是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埃斯特万与女雇工的私生子。这个家伙正在蓄意报复：少年时因为生活苦难曾经向埃斯特万要抚养费，遭到后者拒绝。从此，他怀恨在心，尤其嫉妒养尊处优的布兰卡。军事政变使他有爬上了警察上校的位置，于是立刻使用手中的权利对埃斯特万一家采取报复行动。埃斯特万千方百计地动用了种种社会关系，侥幸使得布兰卡出狱。她在父亲的帮助下来到边境与佩德罗会合，二人双双离去。留在国境这一边的埃斯特万这时已经是孑然一身了，因为在动乱中克拉拉已经离开了人间。《幽灵之家》问世后，由于可读性很强而深受读者欢迎，使得作者从此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爱情与阴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女主人公名叫埃万赫利娜，她患有癫痫病。但是，她发病时与众不同：房屋摇撼，禽畜飞舞，家具跳动，因此被当地人称为“圣女”。中尉拉米雷斯认为她这是妖孽惑众，将她逮捕入狱并且拷打致死。为掩盖这一罪行，中尉把她的尸体埋入矿井之中。但是，女记者伊雷内历尽艰辛终于发现了埃万赫利娜和一群难友们的遗骸。她立刻把此事送上

报端，国人闻讯后哗然。军方首脑欲盖弥彰，特别派遣杀手去暗算女记者。伊雷内虽然遭到枪击而且腹部中弹，最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化装逃到了国外。与此同时，军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拉米雷斯送上军事法庭。但是，这个中尉被判刑后不久，一道大赦令下来，他就出狱了而且得到了晋升。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作者通过生动鲜活的故事和一系列个性突出的人物揭露了军事独裁统治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在表现手法上，这两部作品都很好地将现实、神话和想象融会贯通成为一体，语言简洁、明快、洗练，很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2002年，伊莎贝尔·阿连德推出三部曲之一的《野兽们的城市》，作品以一个男人和他的祖母在亚马孙热带丛林的冒险经历为主线，历经桩桩离奇的遭遇，激发了读者对大自然和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作者在题材的选择和叙述的手法上都有了新的突破。

秘鲁作家阿尔弗莱多·普利塞·埃切尼克（1939~ ）1964年前往欧洲读书。后来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67年，开始文学创作。1970年，发表长篇小说《为胡立乌斯准备的世界》，这部作品用讽刺、调侃的口气讲出胡立乌斯这个介于利马上层社会和贫苦下层边缘人物的一生。作者试图通过这个微观世界反映出秘鲁社会的全景来。他的眼睛注视着胡立乌斯及其一家，脑海里考虑的是拉丁美洲资产阶级贵族，因此胡立乌斯的世界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1977年，第二部长篇小说《如此狂热的佩德罗》问世，该书描写一个秘鲁青年在欧洲的坎坷生活和精神苦闷的状态。书中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处处显露出作者驾驭鸿篇巨著的能力。这种能力随后在1981年出版的《马丁·罗马纳的夸张生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书中的

主人公也是秘鲁资产阶级上层的一员，来到巴黎的目的是打算攻读文学，当个作家。其中时时闪现出作者自己的经历：爱情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孤独，对祖国的怀念等等。这些内容的继续发展是在 1985 年发表的《谈及奥克塔维亚·德·加迪斯的那个男人》中；1988 年这个主题又在《菲里佩·卡利约的新变化》得到进一步拓展。颠沛流离，孤独寂寞，寻找自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普利塞·埃切尼克极力在文学创作中要表现的情绪。这种情绪在旅居欧洲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因此作品问世后得到了读者的积极肯定。

进入 2000 年以后，像普利塞·埃切尼克这样活跃在文坛上并且产生重大影响的拉丁美洲作家，除去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之外，还有智利作家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1940~ ）、尼加拉瓜作家塞萨尔·希奥·拉米雷斯（1942~ ）。斯卡尔梅达从 1967 年开始文学创作。他的短篇小说《热情》获得 1967 年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1969 年，又一部短篇小说《屋顶上的裸体人》再次得到该奖。他曾经积极支持阿连德竞选总统。

1973 年，皮诺切发动军事政变后，斯卡尔梅达被迫流亡欧洲。在德国，他满怀着愤怒和激情写下一系列智利反映人民反抗军事独裁的作品，例如，《自由的枪声》、《圣克里斯托瓦山上的运动员》、《新郎与修士》。1975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也是描写智利人民抗暴斗争的故事。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德文、法文和英文，在欧洲的读书界中产生强烈反响。1980 年，斯卡尔梅达又完成一部以人民反对独裁统治斗争为主题的长篇力作：《叛乱》。这部小说是根据尼加拉瓜人民在桑地诺阵线领导下对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进行最后阶段的战斗为背景写成的。作

品中描写了莱昂小城百姓不满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和特务迫害，他们秘密联络起来，采用消防队的办法，穿墙凿壁，人不知、鬼不觉地铺设了一条通道，把消防用的帆布管道安设在中间，里面注入汽油，一直通向敌人指挥部，最后在游击队的帮助下点燃汽油施行“火攻”，取得了胜利。在这部作品中，紧张的情节主线与轻松愉快的插曲组合得自然、和谐，使读者感到愉快。比如，对游击队战士、诗人莱昂内尔的描写就是如此：在积极参加作战的同时，也描写他如何为爱人作诗，如何向往朴素安静的家庭生活。作者是要说明：不是人们喜欢“叛乱”，而是反动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巧取豪夺，人民的“造反”完全是反动派逼出来的。像斯卡尔梅达这样的作家，在当代拉丁美洲文坛上不乏其人。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1942~ ）也是这样优秀作家的代表。他本人就是桑地诺阵线的重要成员，夺取政权后，1984年至1989年底担任过尼加拉瓜共和国副总统。在参加游击队之前，他喜欢文学，1960年主办过文学杂志，提倡文学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1964年大学毕业后，他长期从事学生运动。1970年，他加入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负责争取国际声援的工作。1979年，索摩查独裁政府倒台。1984年，全国大选，民族解放阵线获胜，拉米雷斯担任了副总统。但是，他依然眷恋着文学创作，百忙之中，于1985年动笔写下长篇小说《天谴》。这部作品是根据一桩真实的案件进行艺术加工而成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律师，名叫奥利维里奥·卡斯塔涅达，危地马拉人，曾经在国内组织过反对独裁统治的示威游行，成立过反对党，甚至策划过武装起义。这样一个人物自然会成为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的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卡斯塔涅达在种种压力下不得不

逃到尼加拉瓜去。乌维科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与尼加拉瓜的独裁统治者索摩查沆瀣一气，制造了对卡斯塔涅达的审判，准备将他“合法”杀害。但是，审判没有结果，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圈套，让卡斯塔涅达死于“越狱”的枪击之中。这部作品问世后，尼加拉瓜著名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指出《天谴》中某些人物和故事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也有大量虚构成分，而且做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其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无论法律用语还是答辩文章、新闻报道、讣告、广告，还是文人墨客咬文嚼字的谈话或是下里巴人的叫骂，都使用得准确无误、活灵活现、闻其声如见其人。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专门写了长篇评论，认为作品中显然有《红与黑》、《包法利夫人》和《罪与罚》的艺术影子更有作者自己的创造和发展。诗人卡德纳尔指出，《天谴》的艺术水平完全可以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人相比。这说明“文学爆炸”后出现的一大批新作家具有极大的创作潜力。实际上，在 20 世纪末的拉丁美洲文坛上，拉米雷斯这一代作家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

综观拉丁美洲文学在 20 世纪里的变化，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作家的个性极强，自由散漫，桀骜不驯，喜欢标新立异，绝对不人云亦云，善于学习他人但是绝对不模仿他人，因此独辟蹊径成为时尚，但是在作家的个性中又充分反映出拉丁美洲文学的统一性：总是在同一个人文化体系中发展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虽然受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思潮的影响，甚至党派直接干涉，但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思考，而且总是处于调整之中：在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追求中进行选择；寻找适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艺术表现

形式，是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觉承担的任务，但是并不以牺牲艺术创作原则为代价；评论界与创作界常常是同一批人，因此形成良性互动，有批评，甚至激烈的辩论，但是更有经验交流、感情上的支持、声援和鼓励。通过对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的回顾，笔者发现，作家追求“现代性”和评论界给“现代性”下的定义是两回事。1888 年，“现代主义诗歌”就出现了，到 1916 年结束，前后不到 30 年。可是评论界却很难认定拉丁美洲从此进入了“现代化”。由此，“现代化”提法的本身也值得商榷，因此既然总是今天给昨天和前天下定义，那么明天又如何说今天呢？难道会有无数个和无穷个“现代派”不成？另外，笔者还发现：拉丁美洲许多优秀作家并不愿意接受“主义”或者“流派”代表的桂冠，实际上用某个“主义”套在他们头上往往不能说明他们创作的整体情况和复杂性，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例，他的《百年孤独》有魔幻现实主义的特点，但是《迷宫中的将军》、《霍乱时期的爱情》、《绑架的消息》等作品并不坚持和发扬魔幻现实主义的“光荣传统”。作家本人也一再声称，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写实”的。所以认真研究具体作品的具体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语言结构、叙事角度、时间、空间等基本因素，恐怕是比较确实可靠的研究方法，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作家的文化养成、家庭和社会环境、文艺思潮的影响等外部作用，得出的相对结论可能接近文学作品的“本真”。但是，这样的研究方法如果可以称之为“点”的研究的话，那么也还应该注意“面”上的情况，例如，这种“轨迹扫描”的关照，即不同时代作家、作品之间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以及不同时代社会生活对文艺的不同要求。“点”和“面”若能结合，会不会减少一些简单化和片面性的认识和有助于一步步加深对拉丁美洲文学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了解呢？

第一章

加乌乔小说

加乌乔 (gaucho) 又译做高乔或者高卓，来源于印第安人的克丘亚语，意思是“可怜的孤儿”，指的是 17、18 世纪南美洲拉普拉塔河流域的西班牙和印第安人生出的混血后裔，他们生活在现在的巴西南部、乌拉圭西北部和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上。讲土著化的西班牙语。生活方式沿袭土著人的习惯。17 世纪时，他们以狩猎和贩卖野生牛、马为生，在草原上过着动荡、漂泊的生活，性格勇敢、剽悍，放荡不羁。18 世纪末期，大多数被迫沦为大牧场主和大庄园主的牧工和雇工。19 世纪初，拉普拉塔地区爆发了针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加乌乔人成为阿根廷和乌拉圭独立大军的主力，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初，阿根廷一批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推动下，选取加乌乔人的生活为创作题材，写下了一些脍炙人

口的诗歌和小说，因此成为加乌乔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阿斯卡苏比（Hilario Ascasubi, 1807 ~ 1875）的《桑托斯·维加》（Santos Vega）、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波（Estanislao del Campo, 1834 ~ 1880）的《浮士德》（Fausto）和埃尔南德斯（Jose Hernandez, 1834 ~ 1886）的《马丁·菲耶罗》（Martin Fierro）。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被称为加乌乔三大史诗。在小说方面，20世纪初有些阿根廷作家也十分热衷加乌乔题材，例如这一章要介绍的贝尼托·林奇和吉拉尔德斯的作品，除此之外，还有第一位以加乌乔人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的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古铁雷斯（Eduardo Gutierrez, 1853 ~ 1890）。他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长篇小说《胡安·莫雷拉》（Juan Moreira）讲述了一个名叫胡安·莫雷拉的暴徒与警察搏斗的故事。后来有人把这个故事改编成话剧，演出取得了成功，从此为加乌乔题材的戏剧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乌拉圭，第一位以加乌乔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家是爱德华多·阿塞维多·迪亚斯（Eduardo Acevedo Diaz, 1851 ~ 1921）。他是职业外交官，曾经长期工作和生活在美国、墨西哥、瑞士、奥匈帝国、古巴、巴拉圭和阿根廷。但是，一直对独立战争和加乌乔题材情有独钟，因此创作了反映独立战争（1808 ~ 1825）、民族意识觉醒和抵抗巴西入侵等重大题材的历史小说三部曲：《伊斯迈尔》（Ismael, 1888）、《土著女人》（Nativa, 1890）、《光荣的呐喊》（Grito de gloria, 1894）以及《长矛与军刀》（Lanza y sable, 1914）。描写加乌乔人生活的成功作品是《孤独》（Soledad, 1894），作者出色地描绘了加乌乔人倔强的性格，孤寂的环境以及充满暴力和野蛮行径的社会现象。乌拉圭另外一位描写加乌乔人生活的重要作家是哈维尔·德比亚纳

(Javier de Viana, 1868 ~ 1926)。他是个新闻记者，除小说创作，还写下许多剧作和大量报刊文章。他非常关注加乌乔人的“消失”问题，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变化造成的一系列冲突，草原上的加乌乔人正在“消失”，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历史见证的意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加乌乔姑娘》（Gaucha, 1899）。主人公名叫胡安娜，她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孤独地生活在辽阔的草原上。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方言土语是这部作品的显著特点。乌拉圭另外一位重要的加乌乔文学作家是胡斯蒂诺·萨瓦拉·穆尼斯（Justino Zavarra Muniz, 1897 ~ ?）。他的重要作品有《穆尼斯记事》（Cronica de Muniz, 1921）、《一桩罪行记事》（Cronica de un crimen, 1926）和《铁窗记事》（Cronica de una reja, 1930）。分别讲述了祖父充当加乌乔首领的英雄业绩，加乌乔人沦为土匪的经过以及在监狱中回忆往事的失意心情。加乌乔小说的全盛时期发生在 20 世纪的 20 ~ 30 年代，其代表人物就是贝尼托·林奇和吉拉尔德斯。

第一节 贝尼托·林奇的小说创作

贝尼托·林奇（Benito Lynch, 1880 ~ 1951）出生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贵族家庭里，童年生活在大庄园度过，非常熟悉大草原的环境和风土人情。1916 年开始长篇小说创作，以草原生活为题材，运用质朴的艺术风格写出了《佛罗里达的鹰》（Los carachos de la Florida）描写父亲和儿子的冲突：父亲是草原上的大牧场主，儿子是留学欧洲归来的博士；二人经常因为生活观念和方式的分歧发生口角。作者

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二人的心理活动，意在揭示加乌乔人的思想变化。1924年他又发表了一部加乌乔题材的长篇小说，题为《挖骨头的英国人》（El inglés de los huesos）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英国人类学家和一位加乌乔姑娘的恋爱故事。男主人公名叫格雷，英国人类学家，受考古基金会的委派来到阿根廷大草原上考察印第安人的进化问题。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发现和挖掘印第安人的尸骨。来到草原后，他居住在一家雇工的茅屋里。雇工有个女儿，名叫芭尔贝娜，这是个美丽、聪明但是性格倔强的姑娘。一开始接触这个“洋鬼子”的时候，她看不惯他那一套古里古怪的生活习惯，但是后来逐渐对格雷产生了好感。这个年轻的科学家也似乎接受了她的爱慕。可是当挖掘工作结束时悲剧发生了：格雷决定抛弃芭尔贝娜。姑娘得知这个冷酷、自私的英国鬼子是如此的无情无义时便愤然自杀了。这部作品的情节比较简单。但是性格刚烈的加乌乔姑娘以身殉情的故事写得非常成功。文学评论界认为，围绕着人物性格的塑造，作者运用了大量农村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巧妙地烘托了人物感情的变化，因此可以看做是林奇的代表作。这部作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用幽默的口气制造紧张的戏剧冲突；善于描写故事发展的舞台和草原的自然环境；把女主角刻画成理想化的完美人物，但同时把男性加乌乔人描写得非常愚昧、无知、性格粗暴，从而为芭尔贝娜的悬梁自尽做了详细铺垫。

《一个加乌乔人的浪漫史》（Romance de un gaucho, 1933）是林奇最后一部以加乌乔人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以古卡斯蒂利亚语为基础，通过一个老人用加乌乔人讲话的口气叙述故事。主要情节是青年农民莱耶斯爱上了年轻、美貌、心地善良的胡里亚太太，但是这个小伙子娇生惯

养，性格内向，不敢向心上人倾诉衷肠。最后，他在大草原上走夜路的时候，由于疲劳和惊吓而死在大路上。这部小说用地道的方言描写了走向“消失”的加乌乔人，莱耶斯这个人物是有象征意义的：无法抵抗社会和人际关系复杂变化的加乌乔人最后便“消失”在大草原上了。莱耶斯性格的变化也是意味深长的：祖辈身上的勇敢、顽强、吃苦耐劳而又放荡不羁的性格特点，经过几代人的“退化”，已经荡然无存。这时的加乌乔年轻人已经变得胆怯、懦弱、娇气而又木讷。《一个加乌乔人的浪漫史》忠实地记录了这个“退化”过程，并且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终究要代替愚昧、无知的野蛮状态。《新编拉丁美洲文学史》的作者优素佩·贝依尼写道：“林奇给加乌乔小说引进一股新鲜空气，他从容不迫地描绘着大草原的生活，平静而又有节制，没有半点刺耳的闹声。他作品中的加乌乔人与现实中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①

第二节 吉拉尔德斯的小说创作

里卡多·吉拉尔德斯（Ricardo Güiraldes, 1886 ~ 1927）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生活优裕的大地主家庭里。童年时经常跟随父母去欧洲旅行，其中在巴黎度过的日子给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热爱法国文化的种子，而家乡土地的壮美景色对他也有强大的吸引力。他对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同时热爱，对于他逐渐形成的世界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①G·贝伊尼著：《新编拉丁美洲文学史》，第 439 页，西班牙 Castalia 出版社，1997 年版

成年以后影响他文学爱好的既有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例如阿根廷诗人卢贡内斯的影响，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的影响。同时他也非常喜欢法国作家福楼拜、莫泊桑、巴尔扎克和左拉的艺术风格和文学思想。1915年，他发表了诗作《玻璃丁当》和短篇小说《死亡和鲜血的故事》。但是，这两部作品都没有赢得读者的好评，因为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平淡无奇，丝毫没有新意。1917年他的第一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问世，书名叫做《拉乌乔》（Rauchó），讲述主人公虽然身在巴黎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家乡的大草原，最后的结局是：无论巴黎多么美丽，终究不能阻止主人公回到潘帕斯草原上来。这部作品引起了读书界和评论界对他的注意。1918年他在乌拉圭著名作家奥拉西奥·基罗加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季节的情话》（Un idilio de estacion），即后来的长篇小说《罗萨乌拉》（Rosaura）的雏形。这部作品讲述了草原上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1923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萨伊玛卡》（Xaimaca），这是一部游记加爱情故事的小说。作者曾经在1916年从智利出发沿着拉丁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国家前往牙买加和古巴做过一次航行。《萨伊玛卡》就是根据作者的亲身体验加上丰富的想象创作而成的，它充分表现了作者在叙事和抒情两方面的才能。1924年吉拉尔德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定居，经常为文学杂志《马丁·菲耶罗》撰稿，同时还帮助博尔赫斯做《船头》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他又创办出版社，专门出版加乌乔题材的作品。1926年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堂塞贡多·松勃拉》，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1927年他前往巴黎治疗疾病，同年在那里去世。

《堂塞贡多·松勃拉》不仅是吉拉尔德斯个人的代表

作，同时也是阿根廷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也是拉丁美洲 20 世纪 20~30 年代广为传播的文学作品之一。1927 年 10 月 5 日，这部小说获得了阿根廷全国文学奖。三天后，作者即与世长辞了。他的亲戚朋友把他的遗体运回了家乡，把他安葬在赶马人堂塞贡多·拉米雷斯的坟墓旁边，让这位著名作家和他小说中的原型人物永远长眠在一起。吉拉尔德斯用了 6 年的时间创作了《堂塞贡多·松勃拉》。全书共 27 章。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口气讲述故事。这个“我”名叫法比奥·卡塞雷斯，是个 14 岁的少年，原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乡村小镇上，童年时读过三年书，母亲去世后由姑妈养大。法比奥顽皮、好玩，经常出入饭店、酒吧和理发馆，喜欢聊天喝酒。有一天，他在街上把钓来的鱼出售时遇到了一个骑马人，他名叫堂塞贡多·松勃拉。这个神奇的草原上来的人物强烈地吸引了他，便情不自禁地跟随着这个心目中的英雄来到了潘帕斯大草原上。堂塞贡多·松勃拉将他收为“养子”，教他骑马和养马，带领他熟悉草原的环境，给他讲解草原上的风俗习惯。法比奥在 5 年的时间里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在大草原上放牧牛、马，真正经受了大自然风吹日晒的考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加乌乔人，他不仅掌握了高超的赶牛和驯马的技术，而且养成了勇敢、刚毅的性格。他爱上了大草原，爱上了那里的人们，熟悉那里的自然环境，更了解了加乌乔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放牧之余，堂塞贡多·松勃拉还让养子参加舞会、赛马、斗鸡等活动，还在漫游草原时给养子讲述草原上流传的各种故事。但是有一天从法比奥原来的老家有人来告诉他，他的生父刚刚死去，给他留下了遗产：一大片牧场。法比奥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他当上了牧场主。堂塞贡

多·松勃拉陪伴着“养子”回到了法比奥的家乡，两人在那里定居下来。这时，法比奥在朋友拉乌乔的影响下，感觉自己需要学习文化知识，于是开始认真读起书来。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以后，堂塞贡多·松勃拉提出离去的要求，因为他觉得养子已经成人，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生活了。法比奥为了报答他的养育之恩，表示愿意终生奉养堂塞贡多·松勃拉。但是老人不打算过这种寄生生活，便悄然离去，重新回到大草原上去了。

《堂塞贡多·松勃拉》的创作主旨在于发掘阿根廷国民性格中的加乌乔因素：自由、散漫、倔强、刚毅。作者心目中有个理想化的草原英雄，但现实中的加乌乔人已经走向“消失”了；作者试图运用抒情诗般的语言把他的英雄留在人间，因为这些英雄的所作所为已经化做一种精神，成为国民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表现这种加乌乔精神，作者精心构筑了一个理想化的草原世界：牧场、酒吧、驯马、斗鸡、晚会、屠宰场、赛马、打架、讲述民间故事、放声歌唱爱情歌曲……构成了草原生活绚丽多彩的画卷。这样的环境与加乌乔性格的养成是息息相关的。加上作者能够熟练地使用方言土语，就更平添了许多乡土气息。作者的叙述语气是回忆、怀念、惆怅和抒情的，这也是作品会打动广大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堂塞贡多·松勃拉》已经成为拉丁美洲的经典小说，一代又一代读者看到了阿根廷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种群体：勇敢、坚强、永远追求自由的精神。他们虽然从草原上消失了，但是他们的性格已经构成了阿根廷国民性的一部分了：热爱自由自在的生活，热爱大自然。这在高科技发展的 21 世纪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无论从文学题材还是作者展示的思想来看，《堂塞贡多·松勃拉》永远会是一部拥有读者的作品。

第二章

现代主义 晚期的小说

拉丁美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发端于 19 世纪的 70 年代，结束于 20 世纪的 20 年代。起因是诗人们不满现实，但是又无力面对现实，因而走上“艺术为艺术”的道路。最早提出“现代主义”（modernismo）一词的诗人是墨西哥的胡斯托·谢拉·门德斯（Justo Sierra Mendez, 1848~1912）。这一文学运动的主要成就表现在诗歌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墨西哥诗人萨尔瓦多·迪亚斯·米龙（Salvador Diaz Mmilon, 1853~1928）、古巴著名革命领袖、诗人何塞·马蒂（Jose Marti, 1853~1895）、墨西哥诗人古铁雷斯·纳赫拉（Manuel Gutierrez Najera, 1859~1895）、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Ruben Dario, 1867~1916）、秘鲁诗人曼努埃尔·贡萨莱斯·普拉达（Manuel Gongzalez Prada, 1848~1918）等人。他们的作品大多追求伤感的情调和朦胧的意境；喜欢

描写奇珍异宝和异国风光，例如，中国、日本、印度；喜欢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中寻求意想不到的素材；为追求纯粹的“美”，诗人们常常以天鹅、孔雀、百合花等美丽的花鸟为描写对象。从外部文学思潮的影响上看，拉丁美洲现代主义的诗人一方面极力摆脱西班牙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古典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则积极吸收法国象征主义和高蹈派诗歌的营养；与此同时，也努力继承西班牙黄金世纪（16~17 世纪）文学留下的遗产。从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角度看，现代主义运动表明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国作家都在积极创造自己的民族风格。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晚期的创作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否定“纯艺术”的倾向，明确提出“扭断天鹅的脖子”，要重视新大陆本身的题材。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阿根廷作家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Leo Poldo Lugones, 1874~1938）、秘鲁诗人何塞·桑托斯·乔卡诺（Jose Santos Chocano, 1875~1934）等人。现代主义在散文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Jose Enrique Rodo, 1871~1917），其代表作是 1900 年发表的《爱丽儿》（Ariel），书名取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中的人物爱丽儿，如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一样《爱丽儿》中的普罗斯彼罗也代表“善”和“人性”，凯列班也代表着“险恶”和“兽性”，爱丽儿则是“超凡脱俗”和理想主义的化身。所不同的是何塞·恩里克·罗多深刻地分析了当时西方文化的特征，预言了 20 世纪可能的前景。他指出 20 世纪的凯列班就是美国文化；应该举起爱丽儿的理想主义和普罗波斯的人本主义抵抗美国的野蛮威胁，因为美国疯狂推行的功利主义是对人类道德的腐蚀剂。作者的这些思想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6 年现代主义运动的领袖鲁文·达里奥逝世，

这个运动也随之进入晚期。但是，它对于 20 世纪初的拉丁美洲小说却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小说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三位，他们是：委内瑞拉作家曼努埃尔·迪亚斯·罗德里格斯（Manuel Diaz Rodriguez, 1871 ~ 1927）、阿根廷作家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 1875 ~ 1961）和乌拉圭作家卡洛斯·雷耶（Carlos Reyess, 1868 ~ 1938）。

由于曼努埃尔·迪亚斯罗德里格斯的大部分作品的创作时间是在 19 世纪，本书就不做专门章节的介绍了。但是，考虑到他在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地位，这里应该做一简单说明。他于 1871 年出生在委内瑞拉的米兰达州苏克雷县的一座庄园里。大学期间攻读医学。1891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96 年在巴黎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旅游观感》（Sensaciones de viaje），既讴歌了古罗马艺术，又对意大利的异国风情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899 年结集出版了《色彩故事集》（De mis romerias）由 9 个短篇小说组成，内容多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作者的审美情趣和对人生的思考，其语言艺术风格属于现代主义的旨趣。1901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破碎的偶像》（Idolos rotos）主人公名叫阿尔贝托·索利亚，侨居在巴黎，从事美术雕塑研究。回国后，他企图用艺术来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但是，老百姓并不理解他的艺术，一次又一次打碎了他的塑像。这位脱离大众的艺术家的曲高和寡感到非常孤独、失望和悲观。1902 年他又创作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题为《贵族的血液》（Sangre patricia）作者充分运用他的医学知识，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其中特别刻画了两人复杂的心理活动。1922 年发表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贝莱戈丽娜或曰迷人的深渊》（Peregrinao El pozo encantado）。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生动地描绘了

委内瑞拉农村的风光和人们的心理变化。主要情节是：兄弟二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名叫贝莱戈丽娜的姑娘。哥哥阿马罗寡言少语，性格内向，只知道干活；弟弟布鲁诺热情、活泼，性格外向，喜欢玩乐。姑娘爱上了弟弟，二人发生了性关系。可是布鲁诺是个不负责的人，他不敢承担责任，竟然抛弃了已经怀孕的贝莱戈丽娜。姑娘痛苦之极，毅然投河自杀，但是被阿马罗救了上来。布鲁诺闻讯赶来，非常后悔自己的背叛行径。可是姑娘已经离开了人间。评论界认为这是他的代表作，因为组成这部作品的三个故事：《塞拉芬神甫的绵羊和玫瑰》、《夏天的牧歌》以及《野蛮的音乐》都是极力追求诗情画意，都是刻意表现缠绵情调的，而这种艺术追求恰恰符合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张。

第一节 恩里克·拉雷塔的创作

恩里克·拉雷塔于 1875 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时攻读法律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历史教员。后转入外交界，1929 年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堂拉米罗的荣誉》（*La gloria de don Ramiro*, 1908）中。作品描写了西班牙腓力二世统治下的变化。腓力二世是查理五世的儿子。1527 年 5 月 21 日出生。1556 年登上王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帝国分裂时，他继承的领土有：西班牙、两西西里王国、尼德兰、法兰西一孔德、米兰、美洲和非洲的领地。腓力二世加强了君主专制制度，血腥镇压了阿拉贡地区于 1509~1591 年的起义，取消了西班牙三个地区的部分市政法规权力，亲自干预

行政领导事务。腓力二世还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坚决捍卫教义，以铲除异端学说为己任，支持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在他的指使下，许多异教徒受到迫害。由于他对尼德兰地区的专制压迫，导致了 16 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571 年，腓力二世领导建立了“神圣同盟”，发动了针对土耳其的战争。1573 年在勒班多海战中（塞万提斯参加了两次战斗）消灭了土耳其海军。1581 年，腓力二世把葡萄牙并入了他的王国。1554 年他在与玛利·都铎结婚后，又屡屡干涉英国事务，如对宗教改革分子实行恐怖政策。1588 年，腓力二世建立“无敌”舰队，后被海上风暴和英国海军所消灭，从此动摇了腓力二世的统治基础。腓力二世还干涉法兰西的宗教战争，支持那里的天主教徒。1595 年 6 月西班牙军队被纳瓦拉国王亨利的部下所击溃。连年战争使得国库空虚，增加税收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凡此种种加剧了老百姓的贫困化。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西班牙国力大减。腓力二世于 1598 年 9 月 13 日逝世。此时国家颓败的势头已经相当明显了。恩里克·拉雷塔从 1903 年起开始搜集这段历史的资料，随后用了五年的时间进行创作，于 1908 年在马德里出版了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安排的情节是这样：主人公名叫堂拉米罗，是阿拉伯人的后裔，属于摩尔人，母亲是卡斯蒂里亚地区的名门闺秀。堂拉米罗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腓力二世对异教徒实行的恐怖镇压政策迫使他告发那些曾经拯救过他的摩尔妇女，使得她们惨遭火刑。后来，他爱上了阿隆索。布拉兹克的女儿贝阿特里斯，但阿隆索家族拒绝了他这个摩尔人的求婚，尽管姑娘已经接受了他的爱情。堂拉米罗愤怒之极，又无可奈何。从此，他变得消沉起来，终日沉湎于酗酒和赌博之中。不久，他就债

台高筑了。终于，有一天，他和债主之间的矛盾爆发了：两人从口角到决定通过决斗解决问题。结果，堂拉米罗杀死了债主，彻底勾销了那笔债务。但是，他在感情方面的“债务”依然存在：他还在爱着贝阿特里斯。他经常暗中到姑娘的住宅附近走动，希望再见上心上人一面。一天，他发现姑娘好像在观景台上要接待一位绅士，便醋意大发，戴上假面具，登台勒死了贝阿特里斯。作为杀害了两条人命的凶手，他再也不能停留在西班牙国内了。于是，他便偷偷来到了美洲。由于是王室通缉的杀人犯，他不能合法地生活在城市里，便钻进了大山，当了土匪。很快就集合了数百人之众，他一下子成了“山大王”，满足了他出人头地的虚荣心。但是，驻秘鲁的王室总督岂能容他占山为王，便派遣军队将他们打散了。堂拉米罗只好逃到一座矿山上当矿工。在那里，幸运之神并没有抛弃他：一个美丽的姑娘出现在他眼前。可是，由于宗教信仰的障碍，两人始终不能结合。小说最后以他的贫病交加而死作为结尾。但是，他总算获得了真正的荣誉，因为他归依了万能的上帝：著名的圣女罗莎·德利马为他做了临终祈祷。这对堂拉米罗来说是真正的“荣誉”。

拉丁美洲文学史界有人认为：“拉雷塔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小说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他那优美的文字达到了和谐完美的程度，因为他做到了精雕细刻、反复推敲。现代主义对异国情调的兴趣促使拉雷塔把情节置于黄金世纪时期西班牙的阿维拉地区神秘和骑士风格的氛围内。整个作品充满了动人的激情，作者使用了大量情感的音符，为的是让人物和事件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联想。”^①G·贝伊尼在这里提到的

^①G·贝伊尼著：《新编拉丁美洲文学史》，第441页，西班牙 Castilia 出版社，1997年版

“阿维拉氛围”让我们想到了拉雷塔在《堂拉米罗》的艺术追求。如果对照一下作品中的阿维拉和今天现实中的阿维拉，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在文化氛围上的一致性：阿维拉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省的省会，位于阿达哈河畔，处在两座山脉之间，风景秀丽。公元 714 年前后为摩尔人占领。1088 年为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收复。城内有 13~15 世纪兴建的大教堂、古罗马风格的王宫和修道院。拉雷塔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阿维拉的风貌，这可以充分证明作者对这一地区进行过认真的考察。在故事情节方面，作者更是力图揭示出腓力二世统治下的种种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矛盾：堂拉米罗自己身上流动着摩尔人的血液，可是因为他接受了天主教教义，就会坚决地出卖摩尔妇女，结果他自己成为这种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可以看出作者非常痛恨宗教裁判所的暴行。他有意塑造了堂拉米罗私人忏悔神甫罗伦索这个人物，正是在这个神甫的唆使下，堂拉米罗才去告发那些摩尔妇女的。阿根廷文学史家安德孙·因贝特认为：“拉雷塔是阿根廷为现代主义优美风格提供的最杰出的小说家。《堂拉米罗的荣誉》这部关于腓力二世时代的历史小说（结尾处主人公来到美洲，从而把两个西班牙文化世界联系起来）出色地协调起历史回顾与感情变化的关系。他那属于印象派的风格——是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的特例。”

布拉斯·玛塔摩罗认为：“拉雷塔参加到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后，创作了小说方面最杰出的作品：《堂拉米罗的荣誉》；他生动地重建了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生活，作者使用的是古西班牙语，文风十分雕琢；其中有道德问题的辩

①E·A·因贝特著：《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一卷，第 412 页，古巴图书协会出版社，1972 年版

论，即上天堂和肉欲诱惑之间的冲突，这场辩论时而集中在几个不同的女人身上，时而概括为一个女人的双重作用问题上，这是现代主义者们谈论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方式；拉雷塔并不回避法国和意大利颓废派作家的影响，尤其是邓南遮给他提供的启示。”^①从上述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拉雷塔在接受法国和意大利印象派、象征主义和颓废派影响的同时，更加严格遵循的还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美学原则，即：追求异国情调，向往世界主义，讲究语言和形式上的精雕细刻，寻求惆怅、伤感和忧郁的感觉等等。

1926 年拉雷塔又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题为《索高伊比》（Zogoibi），故事的地点发生在阿根廷大平原上，时间从 1913 年夏初到 1914 年冬初，主人公名叫菲德利科·阿乌玛达，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索高伊比”，意思是“不幸的人儿”。女主人公名叫卢西娅，是个温柔、美丽、纯洁的姑娘。二人在田园牧歌般的环境里相爱了。但是，卢西娅的几个姑妈一起反对二人的爱情，因为菲德利科是个无神论者。这时一个神秘又性感的外国女人出现了，她名叫兹塔，是个有夫之妇，丈夫是个美国企业家，名叫威尔伯恩。菲德利科失恋以后正处于苦闷之中，便与兹塔勾搭成奸。可是他心中并不平静，因为他知道通奸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罪恶，应该悬崖勒马。终于在一天晚上，他决定与兹塔分手。告别这女人之后，他来到了旷野，突然他看到一个黑影，以为有刺客要害他，便立即掏出匕首扑上去给那“刺客”一刀。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那不是什么“刺客”，而是他心爱的姑娘卢西娅，因为这姑娘穿了一身加乌乔人的骑马

布拉斯·玛塔摩罗撰写的《恩里科·拉雷塔》条目，《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大词典》上卷，第 824 页，辞书联盟出版社，1993 年版，马德里。

服装。真相大白之后，菲德利科痛不欲生，便自刎而死，一对恋人双双倒在了血泊中。整个故事由一个非常了解人物及其心理活动的第二人称来讲述，因此是单一线索的叙述方式，即把一桩桩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事件按照时间顺序讲出来。与现实主义小说中那个无所不知的客观而隐蔽的叙事者不同，《索高伊比》的叙事者是按照印象和直觉来说故事的。但是，这部小说是经过精心结构的，以结局为例，这对恋人之死是在叙述者的讲述过程中通过暗示和预言早就有所铺垫的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虽然不断地涉及美术、音乐、文学等文化知识以及叙述者自己的感觉，但是仍然与故事情节保持和谐的关系。因为作者有意安排了高雅的阿根廷人或者社会上层的外国人扮演主要角色。这些人有的是刚从巴黎回国的“颓废派”作家，有的是受过欧洲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不乏伯爵夫人和“瘾君子”。

菲德利科自己感觉自己是个法国小说中的英雄，而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是扮演他读过的书籍中的角色。这些人物身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赶时髦的癖好真实地反映了阿根廷土生白人上层社会的文化追求方向。作者是有意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上写这部作品的。他没有特别安排两种不同社会的对立气氛。

小说中的观点是统一的。20世纪初的阿根廷大资产阶级处处以欧洲为榜样，尤其以法国马首是瞻。但是，他们的双脚毕竟是踩在南美洲这块土地上的；他们的统治对象毕竟是阿根廷的农民、牧工、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因此书中偶尔描写的风土人情或者社会上的政治、经济风波，还是十分真实的记录，说明作者也相当熟悉底层人们的生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是《索高伊比》又一特点，读者在了解人物

外部活动的同时，不得不同叙述者一道去分析人物的心态，比如菲德利科落入兹塔的怀抱以后，他的心理活动是非常复杂的：既有享受性爱的欢乐，也有无颜面对卢西娅的内疚；既有对兹塔淫荡手段的厌恶，也有对自己行为不检点的悔恨……这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这样的描写手法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和动人。

拉雷塔创作的小说还有：《阿尔特米斯》（Artemis, 1896）、《堂胡安寻找的女人》（La que buscaba don Juan, 1923）、《肯定发生》（Tenia que suceder, 1943）、《埃布罗河岸》（Orillas del Ebro, 1949）、《贵妇人之塔》（la torre de las damas, 1953）、《潘帕大草原》（La pampa, 1955）等。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和剧本。1961年逝世。

第二节 卡洛斯·雷伊莱斯的创作

卡洛斯·雷伊莱斯（Carlos Leyles, 1868~1938）是乌拉圭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优秀代表。他的父亲是乌拉圭当时最大的庄园主；母亲是西班牙人，出生在南方的安达卢西亚。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从此，一方面经营农业开发，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和在世界各地旅行。1888年，正当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兴起的时候，他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生活》。但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这部作品都让他感到不满意，便毅然决然把已经印刷好的书籍付之一炬。189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喝吧！》（Beba）描写了大草原上的牧工生活和风土人情，运用了现实主义手

法：客观、冷静、深藏不露，对于牧工的艰苦劳动不表同情。随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美学原则开始影响了雷伊莱斯的创作，他写出了《未开化的》（Primitivo, 1896）

《怪人》（El extrano, 1897）和《劫掠的梦》（El sueño de rapina, 1898）三部小说，表现了“千年末日来临的绝望情绪”以及作者接受法国颓废派文学的影响后极力发掘社会病态现象的结果。这个风行于19世纪末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文坛上的“颓废”和“世纪末”的情绪也极大地影响了拉丁美洲文学。所不同的是，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和费尔兰的诗学主张在新大陆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拉丁美洲的残酷现实迫使作家直面人生和社会。这在雷伊莱斯于1900年创作的《该隐的部族》中表现得十分明白：揭露颓废主义与拉丁美洲的现实相去甚远。这部小说试图通过《圣经·旧约》中该隐杀死弟弟亚伯的故事来说明游牧民族从始祖开始就受到耶和華神的看顾，因为“耶和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①，而不看好从事农业的该隐，“看中了该隐和他的贡物”，结果该隐杀死了弟弟亚伯，从此受到神的诅咒：“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该隐害怕报复，只好过起流离失所的生活。作者用这个故事来影射阿根廷社会已经丧失了斗志，正在走向解体。他针对的现实是：1880年后代表大庄园主和大牧场主利益集团的民族自治党垄断了政权，这个反动、保守的政党用欺骗和舞弊的手段操纵公民选举，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在1891年以后，激进公民联盟成立，他们与民族自治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雷伊莱斯正是这个保守政党的成员，看到了自己所在集团正在

引自《旧约·创世纪》第四章。

走向解体，因此借助该隐的故事来提醒党内的同志们。整个作品是安排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展开的，因为那里是两党进行角逐的政治舞台。但是，作者并没有忘记农村，他把一个大庄园主经营农业开发活动做了详细的介绍。

在雷伊莱斯的全部作品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小说是《塞维利亚的魅力》（*El embrujo de Sevilla*, 1922）。塞维利亚是雷伊莱斯母亲的故乡，他多次回到母亲的出生地去“寻根”。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第四大城市，也是省会，位于安达卢西亚地区，面临瓜达尔基维尔河，距大西洋 80 公里。在历史上，公元 711 年后被阿拉伯人占领。12 世纪时，一度成为北非帝国在欧洲的首都。1212 年费迪南德三世征服了瓜达尔基维尔河谷；1248 年，塞维利亚被基督教控制，穆斯林全部被逐出该城。1503 年在这里建立了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贸易所，塞维利亚逐渐成为前往新大陆的探险和开发的中心。16 世纪该城已经成为西班牙最富有的城市。17 世纪西班牙虽然政治、经济实力下降，但是塞维利亚却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开始构思《堂·吉珂德》的。18 世纪波旁王朝的统治进一步促进了该城的繁荣。1847 年开始在这里举行一年一度的“四月文化节”。1929 年在该城举办了西班牙—美洲博览会，知名度大增。1992 年还在这里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如今该城完好地保存了许多中古世纪的建筑，加上又经常举行斗牛、赛诗、歌舞表演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活动，所以这里又是享有盛誉的旅游名城。塞维利亚的魅力无穷，这除去城市本身的吸引力之外，作者对母亲故乡的眷恋之情则是更为主要的原因。他以饱满的怀念情绪生动地描绘了城中的古墙、古塔、古桥和古教堂，详细介

绍了斗牛的场面、吉卜赛人的舞蹈和诗人们朗诵自己作品的情景。文学评论家霍尔赫·鲁菲奈利（Jorge Ruffenelli）认为：“雷伊莱斯企图通过对斗牛、歌舞场面的描写来捕捉安达卢西亚人喜欢沉湎于声色犬马生活的天性，从而说明阿根廷人自由散漫性格的来源。”

1932 年雷伊莱斯创作了一部加乌乔题材的小说，题为《加乌乔人福罗里多》（El gaucho Florido）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看到的加乌乔人的艰苦生活。但是影响甚微。

①J·鲁菲奈利撰写的条目《卡洛斯·雷伊莱斯》，《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大词典》下卷，第 1403 页，辞书联盟出版社，1973 年版，马德里。

第三章

地域主义小说

地域主义小说发生在 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因集中描写某一地区的自然风光而得名。这一派作家认为，大自然代表一种力量，它决定了关注人的性格，因而较多描写自然风光，较少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情感；较多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间接反映社会生活问题。在艺术方面，他们十分注重作品的抒情性与语言的完美性，尤其喜欢用诗歌的语言描写风景，但是并不忽视吸收人民大众的口语。主要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有：墨西哥作家阿苏埃拉和他的《底层的人们》，哥伦比亚作家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和他的《旋涡》，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尔盖达斯和他的《青铜种族》，阿根廷作家曼努埃尔·加尔维斯和他的《师范女老师》，乌拉圭作家恩里克·阿莫林和他的《大车》和《同乡阿吉拉尔》，智利作家爱德华多·巴里约斯和他的《驴子兄弟》，

厄瓜多尔作家霍尔赫·伊卡萨和他的《瓦西蓬戈》，委内瑞拉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和他的《堂娜芭芭拉》以及秘鲁作家西罗·阿莱格里亚和他的《广漠的世界》。地域主义小说虽然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但是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不断地震撼着拉美作家的心灵，比如 1910 年的墨西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农村土地的大庄园化、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等等，作家无法回避这些重大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冲击，他们逐渐将视线移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主义小说的题材从单一性转为多样性，如有描写墨西哥革命为题材的墨西哥革命小说；有以描写印第安人生活为题材的土著小说；有以描写土生白人生活的克里奥约小说；有以描写人与土地关系的大地小说；有以描写人物心理活动的心理小说等等。

地域主义小说的贡献在于，拉美文学从反映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转向了“底层的人们”——农民、贫民、印第安人和黑人。由于作品的重点是放在描写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上，作品带有浓重的拉丁美洲色彩，这样就为摆脱欧洲的文学模式、开创拉美民族文学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地域主义小说依然沿袭现实主义的传统，情节比较简单，作者在抒情之时好发表政见；作品中总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按照自然时序讲述故事。因此在艺术技巧上还远未达到成熟的地步。

第一节 《堂娜芭芭拉》(Dona Barbara)

委内瑞拉著名作家罗慕洛·加列戈斯(1889~1969)是拉丁美洲大地小说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是拉美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之一。

1884年8月2日加列戈斯出生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兄弟姐妹很多,家庭生活困难。1909年他同几位好友创办《黎明日报》。与此同时,加列戈斯开始为现代主义文学刊物《瘸腿画报》撰写关于教育、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他投身于教育事业,担任了加拉加斯中学的副校长,并且一直工作到1930年。从1920年起,加拉戈斯还创办了《小说周刊》,同时参与《现状》杂志的出版工作。

192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最后一个家族》。1925年他的长篇小说《爬藤》问世,确立了他在委内瑞拉文坛的地位。

1929年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出版,立即引起拉美文学界的震动。1930年前后,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当选为阿布雷州参议员。1931年由于政治原因被放逐,旅居美国。

1932至1936年间他生活和工作在西班牙。在此期间发表了两部小说:《坎塔克拉罗》(1934年)和《卡纳伊马》(1935年)。1936年回到委内瑞拉,担任了公共教育部部长。1937至1940年被选为众议员。1941年被国家民主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并在1947年大选中获胜。次年即被军事政变推翻,流亡到墨西哥政治避难。随后又在中美洲各国进行访问。1952年他在古巴出版了《风中草屑》。1958年军政权

垮台，加列戈斯载誉归国，委内瑞拉政府授予加列戈斯全国文学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危地马拉圣卡洛斯大学、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和名誉教授的称号；阿根廷总统和秘鲁政府分别授予他“圣马丁大十字勋章”和“太阳勋章”。1969年4月5日在加拉加斯逝世。终年85岁。

加列戈斯首先是位政治家，他在许多文章里以进化论和实证论做指导，提出一套用文明克服落后和野蛮的改良主张，例如：《尊重法律》、《西班牙美洲联盟》、《教育因素》、《文化价值的必要性》、《通向希望的大陆》。加列戈斯还以演说和讲座的形式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爱国热忱同欧洲式的物质文明结合起来，以改变落后的生产力、艰苦的生活环境和人们守旧的精神面貌，发展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实行资产阶级法制，反对暴力和遏止保守势力。

使加列戈斯步入拉美第一流作家行列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堂娜芭芭拉》。据作者讲，他曾在1927年4月去阿布雷大平原搜集素材。当地居民讲述的许多人物和故事激励着加列戈斯非写出《堂娜芭芭拉》不可。1954年加列戈斯为墨西哥出版的《堂娜芭芭拉》写《序》时也明确表示书中的人物确有原型。

《堂娜芭芭拉》主要情节如下：美丽的混血姑娘芭芭拉在一艘强盗船上当厨娘。15岁时，船主打算把她卖给一个患麻风病的土耳其人。这时一位叫阿斯德鲁瓦尔的年轻流浪者来到这艘船停泊的地方，恳求船主让他搭船去里约内格罗，他愿意用劳动来抵偿船费。船主同意了，派他帮厨，这样小伙子便结识了芭芭拉，并且产生了爱情。芭芭拉在获悉将被卖掉的消息以后，请求阿斯德鲁瓦尔搭救她。后者于是

和几名船员发难，杀死了船主，但阿斯德鲁瓦尔也不幸被杀死。芭芭拉惨遭船员们的蹂躏，从此便对所有的男人产生了仇恨。后来，一位年迈的印第安人领水员把她从匪巢里赎出来，带她到印第安部落里居住。就在此时，年轻的大学生洛伦索·巴尔克罗因家族纠纷而放弃学业回乡做了庄园主。一个偶然的时机，洛伦索·巴尔克罗与芭芭拉相遇了。二人一见钟情，不久生下一个女孩，起名叫马丽塞拉。由于洛伦索·巴尔克罗嗜酒成性，不管家事，芭芭拉乘机攫取了洛伦索·巴尔克罗的家产，并把洛伦索和马丽塞拉父女二人抛在一边，自己胡作非为。芭芭拉依靠一群恶棍偷盗他人的牲畜，强占别人的土地，不断扩大势力范围，不久便成为奥里诺科河以北的土霸王。芭芭拉还凭借她的美貌、财富和权势，笼络、摆布和虐杀一切落入她手中的男人。

与芭芭拉庄园毗邻的有个阿塔米拉诺庄园，其主人何塞·卢萨尔多，因年老体衰准备让儿子桑托斯·卢萨尔多继承家业。桑托斯原在城里学习法律，他在回乡的路上便已从船夫口中了解到芭芭拉的为人，到家后他又进一步做了详细调查。他试图通过善意的谈判和法律手段来制止芭芭拉的非法行为，但无济于事。因为在蛮荒的大草原上，强权就是公理，暴力才是最有力量法律。

芭芭拉这时正在秘密策划，准备用姿色、权势和狡诈的手段，把这个初出茅庐的律师弄到手，既占有他的财富，又满足她的欲望。但是桑托斯胸有成竹，全然不为她的美色所动。他热烈追求马丽塞拉，教育和帮助这个美丽的姑娘去过文明的生活。两个年轻人最后决定结婚。堂娜芭芭拉得知后极为震怒，立即赶到桑托斯的庄园。她站在窗外向室内张望，只见马丽塞拉和桑托斯正亲热地坐在一起。胸中的怨恨

和妒忌促使芭芭拉拔出手枪，对准女儿的胸膛。但是，望着马丽塞拉那可爱的面庞，骨肉之情涌上心头，持枪的手软了下来。最后，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把财产留给女儿之后，悄然乘船离开了草原，从此不知去向。

《堂娜芭芭拉》的主题思想是文明与野蛮之争。这个题材最早是由阿根廷作家萨米恩托在《法昆多，文明与野蛮》中提出的。随后是何塞·马莫尔于 1851 年在长篇小说《阿玛利亚》中再次重申。加列戈斯在《堂娜芭芭拉》中又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文明与野蛮之争会成为拉美作家长期关注的问题呢？这是与拉美各共和国独立之后的社会特点与历史进程分不开的。独立战争之后，拉美各国内部的军阀互相混战，庄园主之间互相吞并。农村经济凋敝，工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如何尽快摆脱贫困、改变极端落后的面貌，成为进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却是不尽相同的。仅以萨米恩托和加列戈斯为例，前者以殖民主义的眼光看待阿根廷的土著居民和民族传统，认为他们统统是野蛮的，是应该加以消灭的，阿根廷人应该效法欧洲文明，其目标是建立欧洲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加列戈斯则是满腔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他讴歌土著居民的生活，主张把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与欧洲文明结合起来。二人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诸如发展工业和交通、开办学校、提倡科学，主张理性主义和人性论，倡导教育，启发和感化人们的良知等等改良主义的办法。这种立场固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压迫和剥削问题，但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发展时期却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艺术方面，加列戈斯成功地塑造了堂娜芭芭拉这个人

物。她是野蛮、落后、保守势力的象征，是野蛮、落后、保守的社会产物，又是这一社会的牺牲品。她的典型意义在于：野蛮的大自然造就了野蛮的人，她身上带着一种野蛮的力量，一种凶残的破坏一切的力量，她是任何文明、进步力量的死敌。为了表现芭芭拉这种性格特征，作者把写景与写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奥里诺科河上她牺牲了美好的青春；圭亚那河畔她燃起了复仇的烈火；在阿布雷大草原上她强占他人土地，偷盗别人的牲畜……总之她的一切行为都是与自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善于运用象征的手法是《堂娜芭芭拉》的另一个艺术特点。芭芭拉的含义是“野蛮”，她的庄园埃尔-米埃多的意义是“恐怖”；桑托斯·卢萨尔多的含义是“光明的圣徒”，他的庄园阿尔塔米拉的意思是“高瞻远瞩”。野蛮与文明、善良与暴力形成强烈对比。芭芭拉的失败意味着大庄园制度的衰败，意味着野蛮与暴力的失败，意味着文明与进步的胜利。

善于用优美而抒情之笔描绘委内瑞拉大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是《堂娜芭芭拉》的又一艺术特色。驯马、围场等场面的描写，衬托着辽阔的草原和湍急的河流，加上平原人的生活习惯和民间传说，构成了一幅幅色彩绚丽的风俗画。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了解，加上作家丰富的想象和运用强烈对比的手法，使得《堂娜芭芭拉》既有现实主义的特点又有现代主义后期的艺术风格的痕迹。

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堂娜芭芭拉》与《旋涡》和《堂塞贡多·松勃拉》齐名，并称为长篇小说中的三大经典作品。

第二节 《旋涡》 (La voragine)

哥伦比亚作家何塞·埃乌斯塔西奥·里韦拉（1888~1928）是大地小说的重要代表，他的作品也是以描写森林生活为题材的，尤其是描写了橡胶采集工人所受的剥削与压迫，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推动了哥伦比亚民族文学的发展。

里韦拉于 1888 年出生在哥伦比亚的涅瓦。其父母虽属名门，但家境并不宽裕。里韦拉的儿童时期是在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他经常下地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学期间，里韦拉攻读法律与政治。1917 年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获得法律硕士学位。随后即与一批进步的作家交往。大学毕业后，里韦拉在政府任职。1921 年陪同安东尼奥·戈麦斯·莱斯特雷波出使秘鲁。1922 年，里韦拉被政府任命为哥伦比亚一委内瑞拉边界划分委员会委员，从而有机会遍游奥里诺科河流域、内格罗河流域和卡西基亚雷河流域；他爬过高山大川，深入过原始森林，在印第安部落中生活过，受到过蚊虫、干渴和热病的折磨，亲眼目睹了橡胶采集工的悲惨处境。这一切为他日后创作长篇小说《旋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924 年回到首都后，立刻以这段生活经历为基础创作了《旋涡》，出版后获得极大成功。1928 年他被政府派往古巴参加国际移民问题大会，随后访问了美国，不幸因患脑溢血而病逝于纽约。

里韦拉的文学作品并不多。1921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

《乐土》共有 55 首诗歌，描写哥伦比亚森林、高山和平原，均为帕尔纳索派式的十四行诗。这部诗集使里韦拉得以步入哥伦比亚文坛。

《旋涡》是里韦拉惟一的长篇小说。它以主人公阿图罗·科瓦用第一人物叙述的方式展开。他原本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勾引上年轻美貌的姑娘阿丽霞之后，为逃避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二人秘密私奔，逃往东部平原。起初，科瓦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抛弃阿丽霞。但不久即发现姑娘已经怀孕。小伙子受到良心的谴责，只好在当地向导陪同下，前往菲德尔·法朗哥的庄园投宿，法朗哥的妻子格丽塞尔达是个轻浮的女人，她企图勾引科瓦。出于对法朗哥的友谊，科瓦拒绝了格丽塞尔达的追求，并且对阿丽霞产生了真正的爱情。这时，一贯行骗的人贩子巴雷拉来到这座庄园，他把维卡达原始森林里的生活吹嘘得天花乱坠。格丽塞尔达动了心，准备跟巴雷拉逃走。一天，巴雷拉趁法朗哥和科瓦去牧场的机会，放火烧掉了庄园的建筑，强迫格丽塞尔达和阿丽霞跟他逃进森林。法朗哥和科瓦闻讯急忙跟踪追赶巴雷拉。他俩在丛林中历经千辛万苦，四处打听巴雷拉和两个女人的下落，但一时没有结果。他俩只好在印第安部落中生活了几天。有一天，他俩遇见了老橡胶采集工克雷门特·席尔瓦。老人一生含辛茹苦，备受监工的欺侮与剥削，为寻找儿子的遗骨在丛林里漂流。三人于是合作一处，踏上了寻找亲人和追捕仇人之路。在大量的现实生活的教育下，科瓦的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三人来到橡胶种植园之后，目睹了采胶工的悲惨处境，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愤怒写信给哥伦比亚领事，揭露外国种植园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但是政府方面迟没有回音，他们三人终于亲手杀死了种植园主和人贩子，

救出了格丽塞尔达和阿丽霞。最后他们这一群人走向了大林莽的深处，从此便失踪了。就在《旋涡》问世的 1924 年，里韦拉分别于 5 月和 8 月在报刊发表了两篇披露橡胶采集工人深受欺压的文章。《旋涡》则是力图通过艺术形象展现这个悲惨世界的作品。作者巧妙地把艺术虚构与真实生活结合起来。第一版的《旋涡》上，作者插入三幅照片并题上：

《阿图罗·科瓦在瓜拉固峡谷》、《一个橡胶采集工》和《老采集工克雷门特·席尔瓦》。小说传播开来之后，有人发现所谓阿图罗·科瓦竟然是作者里韦拉的模样。但是，插图的确起到了以假乱真的作用，许多读者坚持认为，小说中的故事确有其事。就连批评家爱德华多·卡斯提约也在 1924 年 12 月 13 日的《彩印月刊》上撰文写道：“《旋涡》显然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里韦拉把自己的照片当作主人公的肖像放在第一页就公开了这一秘密。即使他本人不肯公开，读者也能从作者描绘科瓦的愉快情绪里猜到这一点。”可是，仔细研究过里韦拉的生平之后便不难发现，科瓦其人其事显系杜撰。科瓦放荡不羁的性格，诱拐阿丽霞之后的良心发现，采胶工悲惨生活对他的震动，从报私仇到为正义而斗争的思想转变，都是作者精心设计、精心提炼和加工的产物。次要人物中的善与恶的绝然对立，更是作者艺术加工的结果，如美丽、善良的阿丽霞，忠厚、正直的老采集工克雷门特·席尔瓦与狡猾、凶残的巴雷拉，偷盗成性的打手毕克等等。甚至连名字的设计都含有某种象征意义，如克雷门特·席尔瓦意味着“忠厚的森林”，菲德尔·法朗哥意味着“忠诚与坦率”，纳尔西索·巴雷拉意味着“自私与设置障碍”。这些都表明《旋涡》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但绝非单纯的生活写照，而是作者高度地进行了艺术加工的结果。

《旋涡》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作者笔下的大林莽是活动的、沸腾的、喧嚣的、好像植物和动物都在说话和行动：吵闹的群猴、袭击生物的蚁群、埋伏在水潭里的鳄鱼、尖口的野鸟，甚至“无数的花朵，以肉感的悸动在收缩，分泌出黏糊的汁液，使人像吃了药一般地麻醉，邪恶的藤蔓发出嗡嗡之声，使动物不知所向……”。就是在这样危险四伏的困境中，采胶工一面割胶一面抵挡着“云雾般密集的蚊蝇的进攻和林莽瘴气的侵袭，树和我都受苦，都面对着死神在流泪。我们俩要挣扎着直到死去”。但是比这更残酷的还有种植园主和监工的皮鞭、棍棒和枪弹，大批采胶工不堪忍受这地狱般的生活，或者吞下乳胶而自杀，或者潜逃中死于追击的枪弹之下。面对这极度悲惨的可怕处境，惟一的出路就是奋起斗争。科瓦他们斗争了，也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是命运之神的安排却是森林吞噬了他们。《旋涡》中贯穿的宿命论思想是显而易见，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思想局限性。

第三节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奥拉西奥·基罗加（Horacio Quiroga）是现代拉丁美洲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毕生经历与其创作道路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878年12月31日出生在乌拉圭驻阿根廷萨尔托的领事馆中。基罗加在少年时即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大量阅读了左拉、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从18岁时起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00年去巴黎求学，同年回国，组织了乌拉圭第一个现代主义诗社，并

在诗歌比赛中获奖。1901年他的第一部散文诗歌集《珊瑚礁》问世。1903年他随著名作家雷昂波尔多·卢贡奈斯到外省考察，发现大片原始林，这段经历成为基罗加创作森林小说的主要素材。1904年他前往大厦谷种植棉花。同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别人的罪行》。1905年放弃棉花种植业，创作了小说《被迫害的人们》。1908年长篇小说《朦胧爱情的故事》问世。1917年4月《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出版，成为轰动一时的佳作。1918年基罗加结识了巴维尔出版社创始人萨姆埃尔·格鲁斯贝格，后者出版了基罗加的几乎全部著作。同年，《森林的故事》问世，同样反应强烈。1919年《野人》出版。1920年6月基罗加组织了文学团体“阿纳贡达”，团结了广大的文学艺术界人士。同年发表了他的惟一的剧作《被牺牲的人们》。1924年他的第九部小说《不毛之地》出版，巴维尔出版社为他举办庆祝会，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纷纷与会祝贺。1929年长篇小说《过去的爱情》问世。1934年由于乌拉圭发生政变，他辞去领事之职。1935年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来世》出版，并荣获乌拉圭公共教育部授予的奖金。同年患病不起。1936年经检查，发现是癌症。1937年2月19日服毒自杀。首都蒙得维的亚为基罗加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按照题材分类，基罗加的作品可分为玄幻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

玄幻小说，即在作品中引入“破坏现实的因素”，而又不能确切说明这种因素产生的根源，比如，幽灵和鬼魂对社会生活的干扰；又如，男女病态关系的奇怪因素。在《羽毛枕》中，豪尔丹的妻子阿丽霞，被藏在羽毛枕中的蜘蛛吸干了血液而死。实际上，这只蜘蛛就是豪尔丹病态的性欲的象

征。小说一开篇就暗示了阿丽霞的死因：“她的蜜月生活简直是漫长的寒战，丈夫的粗暴破坏了她当新娘的天真美梦。”“寒战”一词既给蜜月定性，又贯穿了故事的始终。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告诉读者，现实生活里往往隐藏着许多表面上看不见的虚幻因素。此外，基罗加还常常借用电影手法表现梦幻世界。

基罗加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以森林生活为题材，反映人与自然的搏斗、林业工人备受压迫与剥削的惨状以及对死亡、爱情、希望等方面的看法。比如《漂流》描写的是对死亡的看法；《死人》描写林莽里的居民被毒蛇咬伤后感到死神来临时的绝望情绪；《门苏》描写苦工们受压迫的惨状以及自发的斗争，林业工人在原始林中干着沉重的伐木劳动，身患疾病也不能治疗，“监工看看波德雷伊（工人）那副已经散了架的躯体，根本无动于衷，根本不把工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依然逼债：“你还欠多少钱？”“我还欠 20 比索……星期六我已经交了……这一次我病得太厉害了……”

“你的账一天不还清，就得在这里干一天！”于是工人们便采取秘密逃离森林的办法，企图离开这绿色的地狱。有人成功了，有人则死于追捕的枪弹之下。基罗加以准确而生动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令人震惊的悲惨图画。

基罗加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1928 年，面对欧洲先锋派文学的浪潮，他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诸如：

《文学信仰》、《文学证券交易所》、《民族小说的危机》、《小说的修辞》、《优秀小说家手记》、《优秀小说家十诫》，分别就短篇小说的情节、结构、语言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这些著述对后世的拉美作家起着较大影响。

基罗加的贡献在于，他一反浪漫主义把美洲写成伊甸园式的花园，用客观、准确的笔触直接描绘拉美人民在开发自然时的艰苦状况，庄园主对工人的压迫与剥削，下层群众孤独、苦闷的心情以及宿命论的思想；在艺术方面，他善于把描写热带森林、河流、树木和动物等自然风光与离奇、怪诞的传说和寓言相结合，构成一幅幅具有罕见想象和艺术美的图画；在语言方面，他称得上是以凝练、朴素和流畅为特点的艺术大师。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胡安·达里恩》和《儿子》：

《胡安·达里恩》的故事发生在大森林边缘的一座村庄里。有一年，村里闹天花，许多人死了。一个寡妇也失去了自己最后的亲人——小儿子。夜晚来临以后，可怜的寡妇坐在门口，孤独地望着黑黝黝的大森林。一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地望着森林发呆，突然发现有只小老虎摇晃着走来。寡妇连忙抱起了那只刚刚出生没有几天的小老虎。“可怜的虎崽一碰到人手就发出满意的呜呜声，因为它已经不孤独了。母亲把那只人类的小小敌人，在半空中举了好一会儿，要消灭这只没有自卫能力的野兽，那是太容易了。无法知道这只虎崽来自何处，它母亲准是死了，面对这样一个无助的小东西，她陷入了沉思。”虎崽在她怀抱中静静地睡着了。下半夜，小老虎因为饥饿而发出了呻吟声。母亲连忙把乳房塞到虎口中，她想：“按照天地间的最高法则，儿子的生命和虎崽的生命是平等的。”她给小老虎命名为“胡安·达里恩”，把它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抚养。但是，村里人可不是这样看待老虎的。一天夜里，有个村民从她门前走过，听到屋里有老虎的叫声，便拔枪要冲进来。寡妇知道自己的“虎儿”会有麻烦，就想把老虎藏到后花园里去。这时，突

然有条大蛇出现在她眼前，挡住了她的去路并且发出了人的声音：“别怕，女人。你那颗母亲的心已经让你拯救了自然界的一条生命，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天地间里都有着同样的价值。可是，人们不会理解你的，他们将要杀死你的虎儿。不用怕！要镇定！从此时此刻起，你的虎儿就有人的外形了。别人绝对不会认出它的。至于它的心，你要教育它，让它跟你一样善良。它就不会知道自己不是人类了。除非……除非……除非人类中有个母亲揭发它；除非有个母亲要它用血归还你为它付出过的心血，那么你儿子就应该永远是你的。快去吧！那男人要推门了。”寡妇相信蛇的话，“因为蛇知道生命的奥秘”。于是，她跑过去把门打开，那个怒气冲冲的男人拿着左轮手枪冲了进来，在屋里搜查起来，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那男人走后，寡妇急忙把怀里的披巾掀开，发现安睡在里面的竟然是个婴儿。她幸福极了，望着已经变成人形的虎儿，悄悄哭了好久。从此母子相依为命，度过艰难但是幸福的时光。胡安·达里恩在母亲的关怀和教育下渐渐长大了。在同龄的孩子里，他是最优秀的一个：热爱学习，待人诚恳，善良而慷慨。但是，到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痛苦极了，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不久，灾难就降临到了胡安·达里恩头上。教学督察来到胡安·达里恩读书的学校视察工作，发现这孩子讲解课文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还观察到这孩子的头发非常粗硬，而且眼睛里放射出一种绿色的光芒。为了弄个明白，督察想起祖父用过的催眠术可以让人说出真情来。于是，他命令胡安闭上眼睛把脑海里出现的景象讲出来。胡安不得不讲。结果说出了：我的胡须感到了泥土的湿气。督察明白了这是一只老虎。他对身边的老师说道：“必须杀死胡安·达里恩。他是森林里的野兽，

可能是老虎。必须杀死他！不然他迟早会把咱们全杀了。”为了揭露这个披着人皮的老虎，督察建议邀请驯虎师来让老虎恢复原形。胡安觉得自己是个大写的“人”。在母亲的教育下只懂得热爱人类，根本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但是，人类一旦偏执地认为老虎是伤人的，就一定非要消灭它们不可。驯虎师请来了。人们捉住了胡安，先是对他拳打脚踢，接着把他关进了兽笼。驯虎师命人把四只猎虎犬放进笼中。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四只狗根本不攻击胡安，只是友好地摇摇尾巴而已。因为胡安已经“人化”。但是，人类非强迫胡安“恢复兽性”不可，驯虎师用皮鞭拼命抽打胡安，目的是：“把你的老虎斑纹亮出来！”一个刚刚十二岁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人们把他拖出兽笼，拉着他在大街上游行。无论大人还是儿童都叫喊道：“胡安，滚回森林去！”特别是有个母亲也狂吼道：“他是老虎！咱们得马上杀死他！免得他杀害咱们的孩子！”这一下子应验了蛇的预言。

胡安于是被送上了烟火架。在熊熊的烈火中，人们疯狂地叫喊着：“胡安，这是你的末日！快把斑纹亮出来！”可是，胡安还在顽强地坚持他的“人性”。他在大火中喊道：“不，请原谅！我是人！”但是，在一股股烈炎的烧炙下，胡安的躯体发生了变形，终于老虎身上那种黑色斑纹显露了出来。野蛮的人们发出了胜利欢呼声。可是，老虎没有死，它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爬进了森林。舔净了伤口以后，它召集起森林中的虎群，说明人类对它的迫害。老虎们决定报仇：要杀死驯虎师。一天，驯虎师从森林边缘走过，被埋伏在那里多时的胡安一掌打昏在地，然后用牙齿叼住他的腰部来到了虎群当中，他说：“我在人类中生活了十三年，今天晚上我要斩断与过去的联系了。”说着，他把昏迷的驯虎师

放到一堆干柴上点燃了。驯虎师被火舌舔醒了，他一面痛苦地扭动身体一面哀求道：“原谅我 原谅我做的一切 胡安·达里恩，我求求你了！”但是，胡安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老虎身上的“人性”，老虎最后来到母亲的坟前跪着说道：“母亲，在人类里只有你承认万物生灵都有生存的神圣权利。只有你明白，人和老虎只是心地有些不同而已。您曾经教育我说，要爱，要理解，要宽恕！母亲，我永远是你的儿子！我仅仅是您的儿子！再见，母亲！”

这篇小说写于 1910 年前后，作者紧紧抓住“人性”和“兽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个题目大做文章。这个条件就是人类的母爱，虎崽有了母爱可以转变成人类，因此具有了人性；胡安失去了母爱，特别是被一个为保护自己儿子的母亲出卖了以后，在人类“兽性”的逼迫下、拷打下、烧炙下，就又变成了老虎。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再次恢复了虎形的胡安最后仍然坚持人性：母亲，我永远是你的儿子。人之所以成为“人”，正是因为“人性”的萌发。如果人吃人、人人互相仇恨、厮杀，那与豺狼何异！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既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没有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于个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看看这篇小说就可以明白，兽性和魔鬼的邪气总是顽强地要在我们心里表现出来。幸运的是 90 年前问世的《胡安·达里恩》仍然健康地活在我们中间。他老人家“我是个人”的呐喊仍然言犹在耳。

《儿子》发表于 1928 年。故事发生在阿根廷的米西奥内斯省，这里气候炎热，但是地处巴拉圭和巴西的三国交界之处。森林密布，丘陵起伏，人烟罕至，所以是个生活安静的地方。主人公是只有相依为命的父子二人。这一天，儿子

要去森林打猎，出发前在检查猎枪时，听到父亲这样叮咛道：“要加小心！注意安全！吃午饭的时候就得回来！”儿子一一答应了，然后扛起猎枪向森林走去。望着 13 岁的儿子，父亲“一直盯着儿子远去的背影，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方才回去干活”。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亲何尝不是如此。儿子刚刚离去不久，这位父亲就“眼睛盯着手里的活计，心里却在想着儿子的行程”。他想，儿子此时此刻大概已经穿过那条羊肠小道了，现在正通过那长满茅草的谷地向森林走去。

一想到儿子打到猎物时心花怒放的情景，父亲也高兴起来。他当然希望儿子能够自力更生，因为“如果从小就养成只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难题，那生存的危险就会减少许多”。但是，让儿子单独去打猎，父亲又总是担心个没完，他甚至产生了种种幻觉：儿子在敲击一颗子弹时一声爆炸便躺倒在血泊里……正当他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远方传来一声枪响。他停下手中的活计，判断了一下：是猎枪的枪声，他想：“森林里又少了两只野鸽子……”就又埋头工作起来。人在专注工作时，时间会过得飞快。等到他再次想起儿子时，看了看手表：12 点了！儿子应该回来了。现在，他一定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呢。可是儿子没有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儿子的身影。父亲有些焦急了，他终于放下手中的活计想了想：那一声枪响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只响了一次就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呢？他越想越感到不安，就精神恍惚地踏上了儿子走过的小路。他东张西望，哪里都没有儿子的影子。他放开喉咙大喊：“孩子，你在什么地方啊？”这时他产生了幻觉：儿子躺在地上被一颗铅弹打中了。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朦胧中，他觉得儿子出现了，正在向他跑

来。他急忙迎上去问道：你怎么不注意时间呢？儿子回答说：“我发现了那对苍鹭，就追了上去，忘记了时间……”父亲揽住儿子的肩膀，幸福地回家去了。实际上，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这样写道：“他亲爱的儿子依然躺在太阳底下，腿上缠着铁丝网，上午 10 点钟就死了。”

这是一桩不幸的偶然事件：儿子经过铁丝网时摔倒在地，被走火的猎枪击中而死。父亲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过去：儿子的音容笑貌总是在他眼前晃动，因此他要永远和儿子在一起。表现父爱，表现父子情深，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作者使用的叙述语言是自然和朴实的，既重视描写人物的言行，更着力发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在故事变化的因果关系上，特别注意在平淡之中安排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在艺术技巧方面，奥拉西奥·基罗加深受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和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影响，众所周知，契诃夫和莫泊桑都擅长从平凡琐碎的事物中截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片断，以小见大地道出生活的真实，他们非常讲究布局，讲究细节描写，注重环境与人物的紧密关系，结尾耐人寻味。在奥拉西奥·基罗加的作品中，这些特点都是显而易见的，所不同的是：大自然扮演的角色是举足轻重的，森林、动物和气候都是影响人物生存的决定因素，所以基罗加的小说更有南美洲的地域特色。

第四章

墨西哥大革命 题材小说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墨西哥实行的是独裁统治。独裁者名叫波菲里奥·迪亚斯（Jose de la Cruz Porfirio Diaz, 1830~1915）。1876 年他趁着社会动乱的机会，借助军队的支持爬上了国家元首的宝座。在他执政期间，大庄园主、天主教势力和外国资本家结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垄断联盟，对全国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在农村，这个统治阶级大量掠夺印第安和一般农民的土地，以便强化大庄园制，因此许多印第安人和农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沦为农奴或者雇工。天主教势力急剧膨胀，疯狂地扩大教产，垄断文化思想，钳制和打击任何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在迪亚斯统治后期，他开始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打开国门，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用巨资兴建了铁路、公路，开发石油，因而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逐渐落到外国资本和少数官僚贵族的

控制之中。与此同时。为了强化独裁统治，政府坚决镇压一切工农运动和反对派的活动，极力控制报刊舆论工具。1908年，迪亚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宣布1910年任满时告退，但是到了1910年便违背了诺言，组织假选举，再次“当选”为总统，从而激起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1910年4月弗朗西斯科·因达莱西奥·马德罗（Francisco Indalecio Madero, 1873~1913）在“反对连任党”代表大会上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全国进行竞选活动，6月被捕入狱。10月总统大选后，他被保释出狱，立即逃往美国。10月底，他在美国宣布自己为临时总统，号召推翻迪亚斯的独裁统治。11月中旬，墨西哥各地纷纷响应他的号召，爆发了武装起义。其中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队伍有：比利亚（Francisco Villa, 1878~1923）率领的北方起义军和萨帕塔（Emiliano Zapata, 1879~1919）领导的南方农民游击队，他们屡屡打败政府军，频频向城镇发起进攻。1911年5月10日与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 1882~1916）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道攻克了北方重镇华雷斯；与此同时，萨帕塔率领南方起义军攻占了距离首都只有50公里的库埃纳瓦卡。同月24日，迪亚斯政权垮台，独裁者本人被迫辞职，后逃亡法国。1915年死于巴黎。1911年10月，马德罗在总统竞选中获胜，11月6日正式就任总统。但是上台伊始就置广大农民的要求于不顾，一心忙着任用亲信巩固政权。于是，引起新的反对派发动叛乱。1912年，奥罗斯科再度起义；同年，迪亚斯的信子费利克斯（Felix Diaz, 1868~1945）也发动了反对马德罗的变乱。

1913年2月9日，首都再次发生反对马德罗政权的暴动，原迪亚斯政权的旧部突然向马德罗所在的总统府进行袭

击。政府军和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和互相炮击，首都惨遭破坏，居民死伤甚多，史称“悲剧的十天”。然而，负责镇压叛乱的政府军首脑维多利亚·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 1854~1916）却调转枪口与叛军密谋联合，1913年2月18日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威尔逊策动下发动政变，颠覆了马德罗政府并且杀害了马德罗，自己出任临时总统。他在台上仅仅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实行独裁统治，镇压农民武装力量，因而遭到了萨帕塔、比利亚和维护宪法的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 1859~1920）将军指挥的宪法军的联合打击，终于在1914年7月下台。但是，同年8月进入首都的卡兰萨将军又因为土地问题与萨帕塔和比利亚发生冲突。这时，在农民武装占领的地区已经实行土地改革，把大庄园主和富翁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了雇工以及贫苦的农民。承认不承认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承认不承认农民起义军的合法地位，成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焦点问题。1914年12月12日卡兰萨将军答应实行社会经济改革。1915年1月宣布实行土地改革。但是，他害怕农民武装力量。为了消灭农民起义军，他一方面改善与工人的关系，挑拨工人的“赤卫营”去进攻农民起义军，另一方面派遣自己的嫡系宪法军去围剿比利亚的主力部队。1915年卡兰萨将军回到了首都，次年正式当上了总统。这一年，美国派兵干涉墨西哥的内政，卡兰萨总统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政策。在1916~1920年的任内，他对外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扶植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坚决镇压工农运动，例如，1919年4月10日南方农民起义军领袖萨帕塔就是他派军队诱杀的。但是，卡兰萨将军的命运也并不美妙：1920年4月军方发动政变，5月他从首都逃出，结果途中被杀。墨西哥这场大革命所造成的后

果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唤起民众觉醒、为工农大众争取和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方面，也有对经济破坏的方面，特别是代表各种强势利益集团的军阀之间的混战给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长达八年的内战和两次反对美国入侵的战争，强烈地震撼了墨西哥作家的心灵，原来沉湎在现代主义中的诗人们和风俗主义的小说家们，面对革命的浪潮都惊呆了，作家队伍迅速分化，有的对抗革命洪流，有的逃避，也有的积极参加并且拿起笔来忠实和客观地记录这场大革命的生动场面。由此便产生了“墨西哥革命小说”并且一直影响到 20 世纪 50 年代作家的创作。

从创作的时间上说，墨西哥革命小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玛里亚诺·阿苏埃拉（Mariano Azuela, 1873~1953）的《底层的人们》（*Los de abajo*, 1916）为代表，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忠实地记录了大革命中的故事；第二个时期以洛佩斯·弗恩特斯（Gregorio Lopez Fuentes, 1895~1967）以及马丁·路易斯·古斯曼（Martin Luis Guzman, 1887~1976）为代表，他们参加过这场大革命，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以热情态度讴歌革命中的动人场面；第三个时期是 50 年代又有作家以这场革命为创作题材，例如，奥古斯丁·亚涅斯（Agustin Yanez, 1904~1980）的《洪水迫在眉睫》和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 1928~ ）的《最明净的地区》，这时的人们已经感觉到了大革命的负面影响，感觉到了大革命时代的一些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而作家是非常敏感的族群，他们很快捕捉到了人们的感觉、情绪和态度，于是认真思考大革命的诸多方面，用分析和批评的态度对待问题，然后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下面，我们对各个不同时期创作的革命题材小说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节 《底层的人们》

(Los de abajo)

作者玛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年1月出生在墨西哥哈里斯科的莫雷诺。高中毕业后进入医学院学医。青少年时期就喜爱文学。1903年他的短篇小说《来自我的土地》获得莫雷诺湖区文学奖。取得医学硕士之后，他一面行医一面从事文学创作。191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马丽亚·路易莎》。次年又完成了长篇小说《失败的人们》。这部作品使他跻身于墨西哥文坛。1909年小说《毒草》问世。1912年小说《没有爱情》问世。这些作品描写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的悲惨境遇，作者怀着同情的态度，希望穷人能够有出头之日。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阿苏埃拉参加了马德罗的部队。1911年马德罗取得胜利后，阿苏埃拉被任命为莫雷诺湖区的政治首领，但不久便同马德罗分道扬镳，参加了潘丘·维亚的起义军担任医务主任。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为阿苏埃拉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1915年他退伍到墨西哥城定居。1916年完成中篇小说《底层的人们》。卡兰萨任总统期间，阿苏埃拉避居到得克萨斯州生活。1917年回国，他仍然一面行医一面创作。1918年他完成3部长篇小说：《苍蝇》、《多米迪里约想当议员》和《一个正派家庭的苦恼》。1925年，正当阿苏埃拉处于苦闷而准备停止创作时，他的《底层的人们》引起文学界的广泛注意，认为它是墨西哥大革命时期的经典之作。从1923年至1952年，阿苏埃拉创作了14部小说，为当代墨西哥文坛留下一笔宝贵

财富。1949 年阿苏埃拉被授予全国文学奖。1952 年 3 月 11 日病逝于墨西哥城。

阿苏埃拉一生创作了 25 部小说，他运用现实主义的表現手法，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见证材料。作为革命队伍中的医生，他亲眼看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纪事阶段，而是对选择的角色一一进行艺术加工，从而塑造出一批形象鲜明的英雄群体，准确地反映出一个处于激烈变革的历史时期。

阿苏埃拉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1903 年开始，至 1916 年结束。这时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忠实地记录了 1910 年前后的墨西哥社会生活，创作了《马丽亚·路易莎》、《失败的人们》、《毒草》、《没有爱情》等作品。第二个时期从 1916 年开始，至 1932 年结束。代表作就是《底层的人们》。阿苏埃拉这时吸收了欧洲先锋派某些技巧，比他第一个时期的表现手法有所改进。作品有：《酋长们》、《苍蝇》、《多米迪里约想当议员》、《一个正派家庭的苦恼》、《萤火虫》等。第三个时期从 1932 年起，至 1952 年止，阿苏埃拉又回到他惯用的现实主义纪事风格上，写出了墨西哥革命中的许多动人故事，如：《彼得罗·莫雷诺》、《起义者》、《先驱》、《潘多哈同志》、《前哨》、《新资产阶级》等。

《底层的人们》于 1915 年 10 月至 12 月首先以连载形式刊登在得克萨斯州的《北方通道日报》上。1916 年由该报社出版全书。这部作品叙述了以起义农民德梅特利奥为首的一支 20 余人的武装队伍，如何被逼起义，如何多次打败政府军，如何接受了一个名叫鲁易斯·塞万提斯的医科大学生参加起义队伍，并且在这位知识分子的启发下，革命的觉

悟有所提高。此外中间还穿插描写了农村姑娘卡米拉追求鲁易斯·塞万提斯的故事。作者忠实地记录了这支农民游击队如何揭竿而起、又如何走向失败的的全过程。这支小小队伍的首领德梅特利奥起义前是个普通农民，有几头牛、几亩薄地，有妻子和儿子，但是革命的洪流席卷到他的家乡时，他也就如同他自己说得那样“仿佛石头滚下山一样”身不由己地带领二十几条“好汉”拉起了队伍，攻打政府军，洗劫大庄园。打赢了几仗之后，名声大震，加入他队伍的人越来越多，他自己的头衔也越来越大：从上校到了“将军”。但是他始终没有革命的理想和纲领。他讲究实际：革命就是大碗酒、大块肉和漂亮女人。他说：“革命胜利后，我不要别的，只要让我安安静静地返回自己的家园。”“过日子”、“过好日子”这是广大老百姓的合理要求，但是由于大庄园制的存在，由于贪官污吏、土豪恶霸的横征暴敛，许多贫苦雇工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个战士说：“我就是因为饿得发慌才跑出来革命的。”所以不是老百姓故意要造反，实在是“官逼民反”，是阶级压迫和剥削迫使贫苦农民拿起了枪杆子。按照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鲁易斯·塞万提斯的说法：“祖国需要贫苦的儿子们的牺牲来拯救它，为的是不让祖国重新落入残暴的官吏、军警和大庄园主之手。”这个道理当然是可以打动人的，但是对于德梅特利奥来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政权总是落入达官贵人手中？迪亚斯被马德罗推翻，韦尔塔又打倒了马德罗，韦尔塔又被卡兰萨赶下台……但是无论谁上台都立刻把支持他们的农民抛在一边。人间最苦，农民最苦；迪亚斯实行独裁统治时，最穷的是农村，尤其是大庄园里的雇工和农民；革命领袖无论马德罗还是卡兰萨也不把农民的生计大事放在心上，只知道争权夺利。内战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总统的宝座跑马灯似地轮流坐，因此德梅特利奥从追随“北方师”的领袖比利亚到投靠到奥夫雷贡、到卡兰萨，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倒是他的“革命行动”让他每占领一座城镇、每座庄园就可以吃喝玩乐一通。鲁易斯·塞万提斯的变化也是意味深长的：起初，他参加农民起义军是抱着崇高的理想而来的。他是个记者，因为在报纸上写文章支持农民起义而被军警逮捕，随后被迫当上了政府军的骑兵上尉，但是他一有机会便直接投奔革命根据地来了，他对德梅特利奥说：“我跟你们信奉着同一信仰。我跟你们一样追求着同样的理想，来捍卫你们正在捍卫的事业。”德梅特利奥笑着回答道：“什么信仰？什么事业？”他手下一个战士听了更是不耐烦：“把他枪毙算了！”因为战士们怀疑这个知识分子是政府派来的奸细。鲁易斯·塞万提斯不是奸细，他是有革命理想的，他对起义军的战士们说：“革命会给穷苦人带来好处，会让奴隶当家做主人。”但是，残酷的现实告诉他：每当胜利果实落到革命领袖手中时，曾经跟随领袖闹革命的战士们就还得服从领袖继续为国献身和牺牲。当他亲眼看到德梅特利奥大量藏匿金银珠宝的时候，他也放下了革命思想原则，觉得“不捞白不捞”，最后携带着私吞的财宝跑到美国去了。作者对鲁易斯·塞万提斯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别具匠心的，因为大革命爆发之后墨西哥的知识分子分化得很厉害：有的恐惧、厌恶和逃避革命；有的站在政府一边坚决镇压革命；有的有革命理想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支持农民起义；也有的参加革命之后，发现起义行动中负面现象因而产生悲观、失望情绪，继而叛变了革命……总之，大浪淘沙，革命洪流席卷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并且让他们做出了充分的表

演。《底层的人们》准确和生动地记录了鲁易斯·塞万提斯这一类型知识分子的表演。许多拉丁美洲文学史上都认定：毫无疑问，德梅特利奥这样的农民起义英雄人物能在文学作品中占据主角的位置，是从阿苏埃拉的创作开始的。其实让鲁易斯·塞万提斯这样的小知识分子陪伴着由“底层的人们”组成的小游击队一道行动，也是由阿苏埃拉首先创作出来的。这让我们想起苏联作家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1924），作品中同样描写了一位游击英雄——郭如鹤，他在1918年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中率领一支数千之众的“铁流”要冲破白匪的围追堵截，去和主力部队汇合。两部作品的明显区别不仅是德梅特利奥最后失败了，而郭如鹤最后胜利地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而且是组成“铁流”的人们有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我们要替苏维埃政权拼命，我们要和地主、沙皇的将军、军官们拼命！……”而“底层的人们”则认为：“革命就是火山爆发。投身革命的人就不再是人了，而是被狂风席卷的一片枯叶。”这两部题材相同、故事近似的革命小说给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两部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各自国家内的革命战争的一个侧面，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对“革命”的认识和信仰不同，《铁流》表现了苏维埃革命必胜的信念；而《底层的人们》则认定：“革命就是石头滚下山，滚到哪里算哪里！”实际上，这个看法本身已经包含了作者对墨西哥大革命的批评。在作品中，作者用了许多笔墨描写内战造成的流血和破坏，而德梅特利奥和战士们的献身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安宁的生活，只是一批又一批新贵的粉墨登场而已。在20世纪，暴力革命和战争给人类生活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文学家、艺术家作为感觉敏锐的族群及时地记录下革命和战争中人们的情绪，感觉和

精神状态，因而给后人留下了通过文学证明历史的宝贵资料。

《底层的人们》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首先，作者把这场大革命既作为社会、政治问题加以思考，同时也把它当成一个审美对象。在阿苏埃拉眼里，这场大革命的悲剧色彩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他认为只要真实地描绘下来就是一种“悲壮美”，因此他花在描绘景色的笔墨要多于人物的言行。例如，作者是这样描写一座被战争破坏的村庄的：“胡奇比拉是一片废墟。大火留下的黑色痕迹在坍塌的屋顶上、在烧毁的门窗上处处可见。家家户户都紧闭着大门：可是偶尔总有一两家商店仿佛嘲弄人似地大门敞开着，以便显示那空空如也的货架子，这令人想起倒毙在每条路旁的马匹白骨。狰狞可怖的饥饿表情显露在人们土黄色的面庞上，眼睛饿得发绿，那目光停留在士兵身上时便使用诅咒魔鬼般的火焰烧烤着这些大兵。”就情节叙述而言，作者安排了一个完整的封闭圆周结构：全书的开头与结尾衔接在一起。一开篇，作者描写主人公德梅特利奥夜间离开游击队回家看妻子和儿子的情景，这位游击队长正在吃饭时听见附近有马蹄声和家狗的狂叫声，便立刻拿起枪和子弹“走出门外，消失在夜幕沉沉的黑暗中”。不久，一个军官和两个士兵闯了进来，他们向德梅特利奥的妻子要食物和饮料。正当三个家伙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德梅特利奥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那军官和两个士兵一看到来者是大名鼎鼎的游击队长，马上“惊叫起来，吓得连连后退”，急忙哀求德梅特利斯放他们一条生路。游击队长放三个家伙走了，但是也赶紧让妻子和孩子回爷爷家躲一躲。随后，他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登上高山，几个小时后，他再次回头看一眼河边的住屋时，发现那里正在燃烧……全书结尾时，德梅特利奥带着队伍又回到了家乡，

他又看到了妻子和孩子：“分别几乎有两年了！夫妻拥抱在一起，默默无语。妻子只是不停地啜泣着。”但是，他不得不再次离开妻子和孩子，革命的“惯性”把他这块“石子”推下了山坡，他要一直滚到谷地才能停下。最后，他的队伍中了敌人的伏击，他本人就牺牲在山岩下方。作者为了强调社会大风暴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主要因素，便着力描写环境的重要性，因此人物的言行在组成大革命的画面中就仅仅是一些色块而已了。阿苏埃拉认为没有政治信仰和精神自由的人们与动物没有差别。他运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的手法试图表现墨西哥大革命的“客观性”，因此他不大写细节，而是喜欢用粗线条勾勒画面，叙述节奏快捷、迅速，多用跳跃和暗示，对话简洁并且故意使用方言土语。在处理景物和人物关系时，作者有意用“蓝天、绿地、清水”与人类的血腥残杀形成强烈反差，旨在表现人类凶恶的“兽性”。但是，阿苏埃拉并不是追求形而上学的思考，他直抒胸臆，把自己在大革命所见所闻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让事实说话。而这些轰轰烈烈的事实本身就有巨大的魅力。

1979年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回顾墨西哥革命小说时纠正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幼稚”的说法，例如，他曾经认为阿苏埃拉不重视小说技巧等等。接着，他郑重声明：“阿苏埃拉是个头脑清醒的作家，可以很好地驾驭自己的表现手法；他的小说创作在许多方面做了探索，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道路。”

①帕斯著：《基督教与革命》第574页，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

第二节 《元首的阴影》

(La sombra del caudillo)

作者马丁·路易斯·古斯曼 (Martin Luis Guzman, 1887 ~ 1977) 出生在墨西哥的奇瓦瓦城。 1913 年开始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大革命爆发以后, 他加入到马德罗的队伍中战斗; 韦尔塔叛变后, 他参加了潘乔·比利亚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作战。大革命后期, 他被迫流亡国外。 1928 年发表了《鹰与蛇》 (El aguila y la serpiente) , 讲述作者参加农民起义军转战各地的亲身经历, 时间从 1913 年至 1915 年, 其中既有农民领袖潘乔·比利亚的故事, 也有普通战士的动人事迹, 是一部关于大革命的真实记录。 1929 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元首的阴影》。 1934 年从西班牙流亡回国。 1940 年创作了《回忆潘乔·比利亚》, 由于他曾经亲身与这位农民领袖一道共事, 所以这部作品有着宝贵的历史见证价值。潘乔·比利亚本人的生动事迹和他在大革命的非凡功绩也是这本著作吸引读者的主要原因。潘乔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16 岁时杀死了一个残暴的大庄园主。随后, 与一些穷苦雇工组成农民武装, 在墨西哥北部杀富济贫, 袭击大庄园和大牧场, 深得贫苦百姓的欢迎。 1910 年他在奇瓦瓦州宣布拥护马德罗推翻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统治的斗争。在他指挥下, 起义军接连打败了反动的政府军。 1911 年 5 月 10 日他与帕斯科尔·奥罗斯科领导的农民军一道共同攻克北方重镇华雷斯。 1912 年奥罗斯科发动叛乱, 负责平叛的政府军总指挥维多里亚诺·韦尔塔指责潘乔·比利亚“抗拒命令”并且判处他

死刑，后改为徒刑。1912年底潘乔越狱逃往美国。1913年2月韦尔塔推翻马德罗总统上台执政。潘乔闻讯后立刻回国召集旧部，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力量。1913年9月他成立了“北方师”，至12月解放了奇瓦瓦州全境，建立州革命政府，亲自担任州长，立刻没收大地主和大牧场主的土地和财产，把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和雇工，开办学校，降低物价，改善人民生活。1914年他屡屡打败政府军，至4月，已经控制了整个北方。随后挥师南下，6月打通了进军首都的道路。韦尔塔政权被推翻以后，潘乔与新上台的卡兰萨将军分歧越来越大。9月，他宣布不承认卡兰萨为革命元首。10月他与南方的农民领袖萨帕达建立联合关系。12月二人共同占领了首都。1915年卡兰萨将军反扑过来，包围了首都，二人分别撤退。4月，潘乔·比利亚被政府军两次击败，退回奇瓦瓦州开展游击战。在1916~1917年美国入侵墨西哥的战争里，潘乔·比利亚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抗击美国侵略者。1920年6月卡兰萨政府被推翻后，他停止了战斗，退隐到乡村生活。1923年7月20日被暗杀。马丁·路易斯·古斯曼把这些生动的事迹一一真实地记录在他的《回忆潘乔·比利亚》中，因而成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中的珍品。

《元首的阴影》于1929年问世，以卡列斯总统执政为背景，故事围绕“谁做总统候选人”展开：年轻的国防部长阿吉雷原定为总统候选人，起初很为元首看好。但是后来失宠，他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长一职。可是，他不甘心落得这个结果，于是与亲信们密谋策划，准备发动政变，推翻元首的独裁统治，以便取而代之。不料，元首早有觉察，抢先调动了军队。阿吉雷被迫仓皇出逃，但是在关键时刻被出卖，结果整个集团都被送上了断头台。作者在讲述政客们争权夺利

的故事的同时，也用了许多笔墨描写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把权力和掌握权力后享受生活欢乐的内在联系揭示出来，从而告诉读者：追逐权力的人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都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众议员阿斯卡纳公开声称：“政治上没有报恩可言，因为它毫无作用。人们往往认为对自己有利时才肯帮你的忙，或为你效力。政治家从来不干违背自己利益的行动。既然如此，人们干吗要报恩呢？”作品围绕着权力之争，把高层政治斗争的黑幕一一拉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读者看清这些政客们的丑恶表演：一方面是口若悬河地大讲“思想原则”、“代表人民”，一方面拉帮结伙，营私舞弊。从根本上说，这是各个强势经济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掌握政权为的是让政权为他们的经济利益服务，所以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推举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元首的阴影》中，元首面临一个年事已高、任届已满需要交出权力的问题，其实这位老人家是非常“恋栈”的，只要有人谈起“接班人”的事情，他就警惕起来。当国防部长阿吉雷在一次散步时谈起这个问题时，他立刻“一反常态，柔和的目光顿时消失了。元首冷冷地说：‘你说吧。’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狡猾的光芒，令人揣摩不透。‘你说吧’三个字仿佛不是从元首嘴里说出来的，而是紧张的神经反射出来的，表明元首不仅要听下文，而且还要进行自卫和反击”。阿吉雷是元首的老部下和亲密战友，他来找元首谈话是打算试探一下自己做接班人有无可能性。为了表明自己没有野心、只不过是他的“追随者”支持他出来“竞选”而已，因此他要向元首声明自己并不想当这个接班人。谁知老人家明察秋毫，立刻发现了阿吉雷的企图，特别是听到“追随者”三个字时，马上警惕起来：这是不是在搞阴谋集团呢？这是不是要篡党

夺权呢？所以立刻批评阿吉雷：“你说自己没有一点想当候选人的欲望，这不是在自欺欺人吗？”可是元首本人呢？难道不也是在自欺欺人吗？他一会儿说要把政权交给年轻人，一会儿又说“人民还需要他掌舵”。对于这些自欺欺人的把戏，众议员阿斯卡纳看得非常透彻，他说：“在政治范畴里谈不上什么友谊。讲政治就是讲功利。就是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元首。官场里没有真诚和友谊可言。高层领导之间，如果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永远是潜在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者或者敌人。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昨天还在握手拥抱、亲密无间，今天反目成仇，互相残杀。在政治生活中，最顽强、残忍的敌人往往就产生于最亲密的战友之中！”无论暂时的和平共处还是撕破脸皮打得昏天黑地，一切为了争权夺利，这就是墨西哥大革命时期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就小说技巧而言，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很善于安排悬念：从国防部长阿吉雷与女友罗莎丽奥的幽会写起，一下子抓住了读者好奇心理：这位年富力强、充满青春活力的国防部长既在情场上得意又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当上元首的“接班人”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进入第二章阿吉雷就和他的政敌基梅内斯将军开始了激烈的明争暗斗；第三章元首渐渐转而支持基梅内斯将军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竞争双方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第六章阿吉雷集团在仓皇出逃中被捕，不久就被秘密地处决了。全书是这样结尾的：基梅内斯将军的亲信塞古拉少校杀死了阿吉雷，他从死者身上搜出一笔钱，那上面已经染上了血迹，因此他用这些钱购买价值两万比索的钻石时，店员收下钞票时有些犹豫不决，书中这样描写道：“塞古拉的目光迫使店员赶紧低下头去。店员装作

重数一遍，什么也没说，收下了这些钞票。塞古拉走出了店门阿吉雷用过的凯迪拉克牌轿车还在等着他呢。”金钱和财富在一轮权力的角逐之后就这样落到了新主人手中！除去善于安排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之外，《元首的阴影》也很讲究通过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人物的心情，比如，阿吉雷乘坐着豪华的凯迪拉克牌轿车从老远的地方看到了情人罗莎丽奥，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亭亭玉立的姑娘，容颜娇美，光彩照人。随着轿车的驶近，阿吉雷感到浑身充满了力气，一阵阵难以克制的冲动使他神魂飘荡。这冲动立刻传到了他手下的凯迪拉克身上，并且很快就表现在激烈晃动的刹车过程中。因为熟悉主人脾气的司机，不到指定地点是不会减速的，为的是让汽车停车时可以如同赛马的骑手到达终点那样猛然勒住雄健、高大的坐骑。这时，只见车身突然一抖，车轴向上一弹，车轮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马路上立刻划出两道深深的、带有胶皮气味的黑辙印。”轿车懂得主人喜欢“炫耀”的脾气，何况是在美人面前呢！此外《元首的阴影》使用的是小说艺术语言，其主要特点是：五光十色，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例如，作者是这样描写美丽的罗莎丽奥与阳光和树影的关系的：“她在树下来回踱步，阳光一面追逐着她的身影，一面把她融进周围的景色之中，一面与她做着时明时暗的光线游戏。比如，当她踏进阳光直射的地面时，全身便抹上了她那小红阳伞折射出来的暗红色；而当她跨进树阴下时，浑身上下便披上了金黄色，以及阳光从叶缝中漏下的小亮点。金银器般的光片首先投射在她那把火红的阳伞，随即滑落到她那身淡绿的衣服上，最后这些光片变成了火红色，它们颤动着，倾泄在她走过的地面上。与此同时，总有些小光点间或落到她的肩头，然后按照她迈步的节拍依次溜到她

那光洁的裸臂上。此外，还有些光点在她抬脚的一瞬间便落在她的踝骨上，于是，那突起部分的皮肤上映照出又一些亮点来。更为妙不可言的是，有些光点在罗莎丽奥回头时便紧张地纠缠在她那头乌黑的卷发上。”这样五彩缤纷的语言与《回忆潘乔·比利亚》相比，已经属于成熟的文学语言了。因此，上述分析可以充分证明马丁·路易斯·古斯曼在创作《元首的阴影》时已经注意到了在揭露大革命中种种丑恶现象的同时也要注意这一题材的文学特点。所以拉丁美洲文学史专家、阿根廷作家安德孙·英贝特评论说：“《元首的阴影》最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就是，作者用文学语言讲述了墨西哥大革命中的阴谋诡计和暴力活动。总之 这是一部优秀小说。”^①

第三节 《洪水迫在眉睫》

(Al filo del agua)

作者阿古斯丁·亚涅斯 (Agustin Yanez, 1904 ~ 1980) 1904 年 5 月生于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城。1922 年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大学时攻读法律专业，1929 年毕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随后在家乡教书，同时 (1929 ~ 1930) 办杂志《州旗》与“当代派”作家建立联系。他本人则翻译和介绍爱尔兰作家詹姆斯·奥古斯丁·艾罗伊修斯·乔伊斯 (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 和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 (Franz Kafka) 的作品。1946 年开始创作《洪水迫在眉

安德孙·因贝特 (E. Anderson Imbert) 著《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下卷，第 83 页。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出版，1979 年第 6 版第 2 次印刷。

睫》。1951 年获得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和文学博士学位。1952 年当选为墨西哥语言科学院院士和文学学院院士。1953 ~ 1959 年任哈利斯科州州长。1964 ~ 1970 年担任墨西哥教育部长，同时兼任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1973 年获得墨西哥全国文学奖。1980 年 1 月 19 日逝世。

亚涅斯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三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里，即：《洪水迫在眉睫》（1947）、《富饶的土地》（La tierra prodiga, 1960）和《贫瘠的土地》（La tierra flaca, 1962）其中，《洪水迫在眉睫》是亚涅斯的代表作。他的主要贡献是：开创性并成功地把“内心独白”、“内心反省”、“变换叙述时间层面”、“变换叙述视角”等欧洲先锋派作家的小说新技巧运用到描写墨西哥农村生活上来，换言之，技巧是“洋”的，题材是“土”的，在墨西哥把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是从亚涅斯开始。因此，有评论家认为亚涅斯是现代墨西哥小说的开拓者之一。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亚涅斯从乔伊斯和卡夫卡那里学来的不是简单的小说技巧，而是观察和思考现实生活的态度和方法：人们被日常琐事所掩盖的“意识流动”、“梦境”和宗教信仰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是一种“心理现实”，它们是变化的：时而潜伏，时而显露；这是外部环境影响的产物，但是一旦显露出来，就会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亚涅斯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对人类“意识与行为”关系进行揭露的新尝试。

《洪水迫在眉睫》全书由《序幕》和十六章组成。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而是由众多的人物心理活动和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及琐事构成。主要人物有：加布列尔、路易斯·贡萨卡、达米汤、里蒙、马丽亚、米卡埃拉、迪奥尼秀。作者一开篇就使用了大量的笔墨描绘死亡的气

氛，例如：“村庄里到处是身穿丧服的女人。无论这里还是那里，无论入夜还是黎明，无论是阳光沐浴的上午还是头顶烈日的中午。无论阳光充足的下午——明亮而强烈——还是温柔的黄昏——光线微弱、模糊——，到处是老婆婆、中年妇女、朝气蓬勃的姑娘、纯真的少女，她们倘佯在教堂的庭院里，寂静的胡同里，商店里，偶尔敞开的住宅里。

“全神贯注的人们和专心致志的街道。有条不紊的是一排排高大的围墙。门窗用粗石建成外框，用实心贵重木材做成的门板和窗户，不装玻璃，不涂油漆；所有的门窗仿佛由同一个工匠一人制造完成。漫漫时光、日晒雨淋、手指的触摸给门楣、门框和窗户的把手上染上了锈色。紧闭的门窗关住了宅内的一切嘈杂：笑声、哭声和喊声；但是，住宅的上方却漏出壁炉和厨房燃烧细柴的香气，袅袅炊烟给蓝天送去一份贺礼。

“无论村子中央还是边缘，到处都守口如瓶。村边的房屋，位于河边和山旁的房屋，由于远离了条条道路，以其石结构的高贵给大墙烙下了威风凛然的气派。

“即使是最寒酸的房屋，顶端也有十字架；在无尽无休的街角墙壁上，挂着花圈；十字架有石头的，有混凝土的，有木头的，有棕榈的；有高大的，有矮小的，有结实的，有易折的，有精雕细刻，也有粗制滥造的。

“这是个没有节日欢庆的村庄，就连太阳也不都是每天放射光芒。这是个没有音乐的村庄，除非丧钟轰鸣，那也是因为苦难而发；除非教堂里高音加低音的唱诗班借助哀怨曲调释放心中的块垒。游艺场所，从未有过。出于神圣而厌恶跳舞。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跳舞，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亲友不相往来。除非重病探视或者告别亡灵，可能还有长期下落

不明者光顾家门。

“这是个干旱的村庄；没有树木，没有果园。村口和街道如同没有树木的公墓。村中央广场上有人浇灌了几棵绿草。有条小河，一年有十个月是干枯的：石板形成的河床反射着阳光。远处是贫瘠的丘陵，它那单调的线条代替了同样单调的地平线。除去丘陵，还是丘陵。

“这是个没有林阴道的村庄。这是个烈日炎炎的村庄，干燥得闪闪放光。石墩，广场和街角都有磨损的石墩。这是个封闭的村庄。这是个到处都有身穿丧服女人的村庄。这是个庄严肃穆的村庄。”

痛苦、压抑、令人窒息的气氛浓重地笼罩着这座暮气、晦气、死气沉沉的村庄。究其根源，则是根深蒂固的宗教迷信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宗教信仰可以给人们视死如归的巨大精神力量。宗教信仰也可以成为一个个精神陷阱，让人们顽固和偏执地循规蹈矩，沉湎于某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部作品以迪奥尼秀神甫做完一次弥撒后突然死去而告终，因为他已经预感到“洪水迫在眉睫”，预感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摧毁他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他患的是“革命恐惧症”。在革命到来的前夜，哪些人会害怕革命呢？掌权的，有钱的，控制人们精神生活的神职人员。“革命”是无产者的欢乐节日。但那是在“洪水到来之时”，而在这之前，他们不得不听命和服从于金钱和权力结合的强势集团以及控制、“引导”人们精神生活的宗教领袖。神甫之死还意味着“上帝死了”，意味着农民自主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这个病态和停滞的乡村生活的结束”。不仅如此，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试图发掘小农意识的复杂层面：谦卑与傲慢混杂，淳朴有时会变成狡猾，善良有时会变成狠毒。

帕斯评论说：“亚涅斯笔下的这个村庄如同沙漠里的一种水果，外表多刺，果壳坚硬，里面多汁多肉、鲜嫩可口。作者描绘这个封闭世界的方式有点像剥开这种水果的技巧：小心翼翼地用刀剥掉外壳。一道道大墙——有形的和无形的——把这个村庄与外界隔离开来。交通不便，重山阻隔，地域偏僻；消息闭塞，文化落后，思想陈旧。如果说地理上的隔绝使得这个村庄不受外来人的干扰，那么教堂则帮助村民抵御魔鬼从肉欲方面的进攻。精神上的大墙是无形的，它建筑在每个人的灵魂里。这个村庄面对着上帝和死神是孤独的。男女老少在孤独的梦呓中向可怕的幽灵求助，这些幽灵就是傲慢、嫉妒、贪婪和万能的情欲。活着就是一场漫长的垂死挣扎，生命摸索着始终向深渊走去。谁也没有忘记卧铺就是灵床。男女老少摇摆在互相矛盾的谵妄之中，谵妄过于焦急、过于冲动。因而不能同梦中那些指手画脚的形象没完没了地对话，最后导致暴力的发生。只有暴力才能打开那灼热的通道大门。”

《洪水迫在眉睫》的技巧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一方面，作者大量使用了现代小说的手法，诸如“意识流”、“拼贴法”、“内心独白”、“视角变换”等等；另外一方面，他所使用的叙述语言是非常缓慢和华丽的，有时甚至是堆砌和令人感到沉重的，好像一件巴洛克式的首饰，因而给人的印象是在继承 17 世纪西班牙巴洛克文学的传统。在叙事的着眼点上，作者既注意从整个村庄的角度讲述村民们整体历史意识的觉醒，同时也用了许多笔墨于个人的内心冲突

上，例如，地主的儿子达米扬，他看不惯地主对雇工的剥削和压迫，独自去美国工作。当他回国探亲时，家里人批评他去了魔鬼统治的地方，说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人连猪狗都不如。达米扬心里很矛盾，因为美国白人的确歧视有色人种，但是在墨西哥生活的雇工难道就过上了好日子吗？在美国，至少还是按时、足额、用现款发放工资的，而在墨西哥的大庄园里拖欠工资不说，偶尔发下来的还是不足额的“代物卷”。此外，他还因为得罪了地方恶势力而被控“杀人”最后，他毅然出走，参加了革命队伍。路易斯·贡萨卡的故事也表现了这样的心理矛盾：他是神学院的学生，有才气、有思想、有个性，熟读《圣经》，但是，他对许多教义和教规提出了疑问，比如，他认为男女交往是天然合理，禁欲主义是错误的。可是神甫强调“活着就应该一心侍奉上帝”而不能追求情欲。要上帝还是要男欢女爱？二者是矛盾的吗？人间的欢乐和天上的欢喜快乐是冲突的吗？他百思不得其解，终于被当做疯子而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就作品的结构而言，作者运用了“多头线索同时叙述的方式”^①，即一个人物一条线，所有的线索同时都在同一股旋风中飘舞，最后以神甫之死而告终。总之，无论作品的结构、语言还是叙述方式，它们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服务：表现一座墨西哥村庄在 1910 年大革命爆发前夕人们的情绪和精神状态。如果旧制度的消亡可以比喻为一棵腐朽的老树，那么人们的情绪就是不再给这棵树提供营养和水分的土壤。

E. A. Imbert 著：《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 2 卷，第 232 页，经济文化基金会 出版，1979 年版。

第五章

土著主义小说

土著主义（indigenismo）一词是秘鲁作家、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作家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于 1928 年在《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中提出来的，他说：“作为秘鲁新文学特点的‘土著主义’这种流派，它在目前所以能够传播而且可能进一步发展，并不是由于通常决定一种文学时尚的偶然原因。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只要看一看它与在青年中获得日益增多的拥护者的那种思想和社会潮流如何明显一致，并且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就可以懂得，文学上的土著主义反映了新秘鲁的一种精神状态，即一种觉醒状态。”

“目前我国文学中的‘土著主义’与当代其他新因素不是毫无关系的，相反，是与它们紧密相连的。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无所不在的土著人问题，不能不在文学艺术中

表现出来。”^① 马利亚特吉主张尊重印第安人的主权，恢复印第安文化，帮助他们从大庄园主和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一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潮主要发生在安第斯山脉国家，如，玻利维亚、秘鲁和厄瓜多尔。如果从文学创作上追根溯源，开创土著主义小说的先驱者要首推秘鲁女作家科罗琳达·玛托·杜内尔（Clorinda Matto de Turner，1854~1909）。她于 1889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无巢的鸟群》（*Aves sin nido*），全面涉及了山区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印第安人的土地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和政治压迫问题。作品的主人公名叫曼努埃尔和玛尔卡丽达，通过二人的爱情故事揭露出神甫对印第安妇女的欺骗和凌辱：原来这二人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是同一神甫奸污了两位印第安妇女怀孕的结果。书中对政治官员、教会神职人员和大地主的种种恶行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作品问世后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影射的人物纷纷抗议。政府发出了对作者的通缉令。这位女作家不得不流亡到阿根廷生活。但是，《无巢的鸟群》所产生的榜样作用却一直影响到了二十世纪 20 年代的土著主义文学。因为她鲜明的举起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长矛，对准了压迫印第安人的三座大山刺去。她在《无巢的鸟群》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小村子里的头头脑脑们，无论他如何改换名称，也离不开村长、神甫和地主这个恶势力的范围，正是这三座大山专横跋扈的压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这位女作家在 1889 年提出的问题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变得更加严重了 除去本国恶势力的压迫依然如故之外，又加上了外国资本家的介入，其中以英、美资本势力为甚。矿产品几乎全部为英、

美公司所垄断。许多丧失了土地的印第安人沦为矿工。著名作家、诗人、小说家塞萨尔·巴列霍的《钨矿》就是反映矿工生活的优秀作品。在 20~30 年代的秘鲁，印第安人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但是他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极端贫困，文化非常落后；他们备受各种恶势力的欺凌，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求告和投诉。因此，进步作家为土著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呐喊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的意义，也因此，土著主义文学的影响已经涉及到了社会、政治的范畴。

第一节 《青铜的种族》

(Raza de bronce

作者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 (Alcides Arguedas, 1879 ~ 1946)，玻利维亚作家，是 20 世纪初土著主义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他的生活与创作同玻利维亚社会形势的变化以及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密切联系。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这段时间里，即阿格达斯的青、壮年时期，玻利维亚生活在自由党的统治之下。这个执政党的对手是保守党，前者代表首都和北部地区的锡矿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代表中部和南部银矿业主和大庄园主的利益。自由党主张废除教会的特权，主张企业自由和资本自由，通过发展科学和教育改造社会。而阿格达斯就出生在一个大庄园主的家庭里。他出生不久就爆发了智利为了争夺硝石资源而针对秘鲁——玻利维亚联盟的战争 (1879 ~ 1883)，其结果是玻利维亚丧失了出海口，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全国处于精神沮丧的状态之中。1899 年自由党从保守党手中夺取了政权，励精图治，准备

推行一系列改革政策。战争的失败和自由党的上台对于阿格达斯家族都是沉重的打击。年轻的阿格达斯是在实证主义思想的强烈熏陶下长大的，因此也很注意“实证的事实”即经验事实的描写和记录。他做过战地记者，也一直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发展。1903年，他对自由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深感失望，组织了一批青年成立了“自由论坛”，批评时政和社会弊端。与此同时，为深入实际和反映现实，他也试图开创一条真正的民族文学之路。为此，他创作了长篇小说《毕萨瓜》（Pisagua）（1903）、《瓦塔一瓦拉》（Wuata Wuara）（1904）、《土生白人的生活》（Vida criolla）（1905）。1905年底，他与自由党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便不得不离开玻利维亚去巴黎生活。但是，他仍然关心着祖国的动态，研究国家的实际问题。1909年他在西班牙发表了研究成果《病态的民族》（Pueblo enfermo）。当时的西班牙弥漫着“改造”社会的空气，阿格达斯受到启发，在这篇论文中详细列举了玻利维亚存在的种种病症，批评伊斯梅尔·蒙特斯总统（Ismael Montes, 1861~1933）的施政纲领，从而动摇了自由党和保守党陈腐的政治理论基础。1909年埃利奥多罗·比利亚松（Eliodoro Villazon, 1849~1939）就任总统，实行大赦，邀请阿格达斯回国参政。此后他便从事外交、新闻、政治和历史研究等多种活动。1946年逝世。

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于1919年首次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问世，第二版于1924年在西班牙出版，最终的修订本于1945年在阿根廷出版。这三国文学评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土著主义小说。作品的情节如下：

美丽的印第安姑娘玛鲁哈·瓦塔一瓦拉（Maruja Wuata Wuara）与青年农民阿古斯丁·阿希阿利（Agustín Axiali）相

爱。一天，阿希阿利与三个印第安农民被大庄园主的管家派往到远方去出售农产品和购买种子。四人赶着骡子，穿山越岭，跋涉在崎岖的山麓上。一路上，他们看到了雄伟的安第斯山风光，看到了庄园雇工艰苦劳动的场面，看到了山区农民贫困的状况；他们四个也走得十分辛苦：时而是危险的悬崖峭壁，时而是汹涌的泥石流；先是一头骡子陷入泥石流中，接着是一个伙伴被滔滔的激流卷走，最后又是一个伙伴得了热病。走到黄昏，他们终于来到集市，卖掉了农产品，买好了种子，返回了家乡。

阿希阿利和瓦塔—瓦拉准备结婚，他俩恳求神甫主办婚礼。神甫要他们交纳 50 比索，他俩拿不出这么多钱，结果挨了一顿臭骂。但是，乡亲们纷纷解囊相助凑够了费用，婚礼得以如期举行。土著劣绅潘托哈早就对瓦塔—瓦拉的美貌垂涎三尺。一天，他和几个狗腿子在山上打猎，发现瓦塔—瓦拉在山坡上放羊。他们悄悄来到她身边，借口请她带路，企图把她诱骗到一座山洞里去。当他们走到山洞附近时，天上忽然下起大雨来，刚好为潘托哈提供了邀请姑娘一起进洞的理由。但是，瓦塔—瓦拉似乎预感到了某种不幸，她执意不肯进洞。潘托哈于是命狗腿子强行把姑娘拖进洞去。瓦塔—瓦拉拼命反抗。黑心的地主竟然用石头打昏了美丽的姑娘。这时有人看到了洞口发生的暴行，连忙跑去告诉阿希阿利。一听说妻子出了事，阿希阿利飞也似的来到了山洞里。但是，他晚了一步，只见爱人躺在地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痛苦的向大山呼唤求助，而回答他的只有乌鸦的叫声。全村的印第安人得到瓦塔—瓦拉被害的消息以后，积压多年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他们冲向庄园，抓住了罪大恶极的潘托哈和他的狗腿子，立刻把他们处以绞刑。最后，点燃了庄

园，让熊熊的烈火烧亮黑暗的山区。为印第安人受到的压迫、剥削和歧视打抱不平的情绪是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早在 1904 年发表的《瓦塔一瓦拉》和 1909 年发表的《病态的民族》中就已经流露出来过。他出生在大庄园主家庭，从童年起就看到了印第安农民受到的欺凌和污辱，看到了他们极端贫困的生活，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 1905~1909 年的欧洲生活，使得他可以冷静的思考种族歧视的根源究竟在哪里。那就是由于大庄园制度造成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因此也就产生了印第安人对大庄园主的仇恨，所以他在《青铜的种族》中是把印第安民族作为一个集体主角加以对待的。这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压迫。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对于一个出身大庄园主家庭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根据作品中诗人苏阿雷斯的表述——经常把印第安人与俄国农民加以比较——估计阿格达斯很可能阅读过高尔基的作品。在小说技巧方面，作者使用第三人称叙述故事，但是也经常加入作者自己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见解。在语言方面，作者使用的是一种绮丽文体，即特别偏爱华丽的辞藻，尤其在描写安第斯山风光时，更是不遗余力的使用五彩斑斓的颜色：美丽的山川、河流和草地以及山区居民的风土人情和艰苦的劳动场面如同一幅幅水彩画。就小说的结构而言，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写景物、农民的劳作、艰苦的生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第二部分，集中描写阿希阿利和瓦塔一瓦拉的爱情故事以及潘托哈的罪行，进而导致农民起义、围攻庄园并处死恶霸地主的完整过程。因此，拉丁美洲文学史家安德孙·英贝特是这样评论《青铜的种族》的：“第一部分是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的描写；但是第二部分很快转向对悲观现实的

控诉——谴责白人地主对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作者从外部世界开始叙述，但是不断插入自己的看法。他是把印第安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描写的。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反抗^①。另一位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说：“《青铜的种族》是土著主义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它既是印第安人真正的抗议呼声，同时又是一部充满了丰富民间艺术色彩的作品。”^②

第二节 《养身地》（Huasipongo）

作者霍尔赫·依卡萨（Jorge Icaza）（1906~1978）是厄瓜多尔著名作家、优秀的土著主义小说家。1906年7月10日生于首都基多。由于家贫，只好随父亲在亲戚的庄园里打工。整个少年时期都生活在农村，亲眼看到了土著人极端贫困的生活状况。大学时原攻读医学，不久改学文学艺术，肄业后，加入剧团工作，当过演员和编剧。在巡回演出时，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了印第安人的艰难处境。此后，依卡萨开过书店。1933年他创作了《山上的泥土》（Barro de la sierra）。这是由六个中篇故事组成的小说，基本上反映出依卡萨后来在小说创作的内容，即：印第安人被压迫、被剥削的状况；印欧混血人难以界定的身份以及他们对印第安人病态的排斥态度。1934年发表了《养身地》（又译做《瓦西蓬戈》），作品深刻的揭露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社会上引起

安德孙·因贝特：《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上卷，第426页，古巴图书协会1972年版，哈瓦那。

托雷斯·里奥塞科著，吴健恒译：《拉丁美洲文学简史》第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震动，从此确定了他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的地位。1944 年他创办了厄瓜多尔的“文化之家”。同年被政府任命为驻阿根廷使馆文化参赞。1950 年担任驻前苏联大使。1953 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国立图书馆馆长。1958 年他的长篇小说《流浪汉罗梅罗·伊·弗洛莱斯》(El chulla Romero y Flores) 荣获全国文学奖，文学评论界认为这是在小说艺术上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因为作者生动地塑造了城市中一类人——流浪汉的形象。依卡萨的最后一部作品是自传体长篇小说《落网者》，由三部分组成：《誓言》、《虚构》和《现实》分别涉及作者的生平文艺的精神宣泄功能、文学的目的和诗学。其中作家的责任、艺术与社会、现实与虚构的关系等问题都是讨论的重点。这是依卡萨长期以来关心的问题，因为走在文学道路上，他逐渐意识到社会上有种种束缚在妨碍着文学的发展，有的来自政治上的独裁专制制度，有的来自传统的文化观念，有的来自现行的文化政策，有的来自作家自己的心理障碍，如果不挣脱这些束缚，作家的思想不可能处于自由状态，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综观依卡萨一生的文学创作，他的成就除了反映在上述作品中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以土著居民反抗压迫为题材的作品。例如，1935 年发表的《在大街上》(En las calles) 详细分析了印第安人一次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一个村庄的灌溉水源被白人地主强占了，因而激怒了印第安人，他们烧毁了地主庄园，暴动的烈火从山区传到了城市。工人也发动了起义，占领了市中心广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当然不允许这种“社会动乱”，立刻派遣军队把革命的烈火扑灭下去。这部作品获得 1935 年厄瓜多尔全国文学奖。再有 1937 年发表的《混血种人》(Cholos) 表面上涉及的是城市里印第安人与欧洲移民所生的印欧混血种人的社会地位问题，实际上，作

者关心的是产生这一混血现象的历史渊源，尤其是造成印欧混血种人处于尴尬地位的社会、经济和种族的种种因素。还有 1942 年出版的《眼花缭乱的半生》（*Media vida deslumbrada*）分析了土著人不甘受人歧视的复杂心态。总而言之，霍尔赫·依卡萨以毕生的精力为印第安人奔走呼号，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因此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贝伊尼在他的《新编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中说道：“在厄瓜多尔，霍尔赫·依卡萨是一位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作家，他在 30~40 年代的小说界占有突出的地位。”

《养身地》讲述的是庄园主作为部分劳动报酬而分给土著农民的小块土地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养身地”的产权是庄园主的，他允许印第安人在上面盖房子，在给主人劳动之余种植自己所需要的农作物。书中的庄园主名叫堂阿尔丰索，他为了牟取暴利与一家美国公司签定了一项出租土地和修筑公路的合同。签约后，美国佬让堂阿尔丰索派警察指挥一批亡命徒去驱赶土著居民离开养身地。起初，这些印第安人还指望向堂阿尔丰索求情以避免这场灾难；但是，随后就发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出卖他们的正是这个恶霸地主。土著居民中有个领袖人物，名叫安德列斯·奇里金，是个有胆识和智谋的角色，作者是如此描写这个人物的：“安德列斯·奇里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已经不再怀疑这场波及整个谷地的暴行了。这个倒霉的消息已经沿着条条山路向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已经激起了印第安人的不满和愤怒了。在冷漠无情的蓝天下，一些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都撩起斗篷，如同酒后那样准备打架了。心中有某种东西让

他们血液沸腾、眼珠发红、手指哆嗦、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让他们忍不住要骂娘。”在安德列斯·奇里金领导下，反抗的行动开始了：“四乡的印第安人越聚越多，逐渐汇成了一股凶猛的洪流，人们高喊着安德列斯·奇里金提出的口号，沿着盘旋的山路一泄而下。有些勇敢而性急的人连窜带跑，一不留神竟然从山坡滚到了山底。喧闹的人流震撼着安谧的树林和沟壑，惊扰了田野上静静伫立的庄稼，使得本来冷漠的苍穹也为之动容。”但是，“政府当局对这件事情一向反映迅速，立刻从首都派出 200 名士兵前往山区镇压。各种果断的命令纷纷下达：对暴徒格杀勿论，除恶务尽，坚决保护外资企业！”于是，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开始了：密集的枪弹疾风般的扫射过去，一群群人应声倒地，大火在吞噬茅屋，檀条在燃烧，房子里浓烟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孩子在哭，大人在喊，人人咳嗽不止。大火烧毁了茅屋。枪弹杀害了大批的农民。养身地上陈尸遍地。最后，美国佬到来了，公路修通了，汽车开来了。矿山得到了开发，但是印第安人依然贫困……《养身地》的主题思想是明白无误的：为土著居民的悲惨处境和不公正的待遇呐喊；抗议反动政府和大庄园主对印第安人的血腥镇压。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全书不分章节，只分大小段落。就人物而言，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两个对立阵营的代表：大庄园主堂阿尔丰索和农民领袖安德列斯·奇里金。造成双方冲突的导火索就是“养身地”。对于印第安人来说，这一小块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但是，在堂阿尔丰索心目中，印第安人只是为他劳动的奴隶。他和他叔叔的谈话可以为证，他说：“印第安人算得了什么？当然，他们是有用处的。他们可以为修筑这条公路提供劳动力。”在他眼里，印第安人不是人，而是“劳动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书中在描写他准备去强奸印第安姑娘时是这样想

的：“他不是从年轻时就已经看惯了庄园主可以任意蹂躏和强奸印第安使女的吗 他想 他是个大老爷 是万物之主 其中当然包括可以支配这个印第安姑娘。于是，他轻轻推开了房门。屋里比外面要黑暗得多。他摸索着，一直走到那姑娘的床前，扑了上去……”^①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在强奸了这个姑娘以后 他居然如此骂道：“真是些畜生 连让人得到起码的满足都不会 简直像头母牛 他妈的 的确是劣等民族！”堂阿尔丰索的祖先来自“文明的欧洲”从 1492 年起，一代又一代“文明人”在欺压印第安人 使得土著居民人口大减 生活极端贫困，尤其是精神和信仰方面受到了残酷的践踏。这样的民族压迫理所当然的要导致印第安人的不断反抗。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霍尔赫·依卡萨面对着这场斗争立场坚定 态度鲜明 民族矛盾的背后往往是阶级压迫造成的，土著居民的暴动完全是大庄园主和反动政府逼出来的 是“官逼民反”所以他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作者之所以用文字为武器来表现阶级斗争，是因为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拉丁美洲左翼作家普遍认为：拉丁美洲的残酷现实需要的是一种战斗的文学，而不是什么文人风花雪月的吟诵或者自怜自哀的咏叹。

在小说技巧方面，作者善于运用土著语言的自然形态讲述故事，他直接挪用印第安人的土语，特别是那如泣如诉的语言节奏和谦恭的讲话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情。此外，运用简短的、直接引用的对话方式来叙述快速变化的场面也是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比如 安德列斯·奇里金的足部受伤了 作者仅仅运用了几句对话就把事情交代明白了：一个看来熟悉治

伤土方的小伙子喊道：“天哪！吓死人啦！看来不轻啊！快！快去河里捞点烂泥糊上！免得让邪气钻进伤口。”“毛小子，你去！”“快去！”“快回来！”一个只有十来岁的男孩光着脚丫子跑了，消失在山梁后面。人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通过短短的对话，读者就可以猜出来安德列斯的伤情了。总的说来，《养身地》是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产物，他虽然在文学性和小说艺术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和明显的缺陷，但是他的社会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养身地’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本身的意义，它是争取生存、人权和尊严的象征，这从全书的结尾处可以看得格外分明：“天亮以后，如同梦境一般，在那断壁残垣、瓦砾灰烬和余温尚存的尸体中间，伸出了无数瘦削的手臂，犹如美洲高原寒风掀起的麦浪，印第安人发出钻心刺骨的呜咽：‘还我养身地！’‘还我养身地！’”

第三节 《广漠的世界》

(El mundo ancho y ajeno)

作者西罗·阿莱格里亚(Ciro Alegría)(1909~1967) 秘鲁著名小说家。1909年11月4日出生在秘鲁的一个庄园主家庭里，他父母爱好文学艺术，给了他良好的影响。从少年时期开始，他便同印第安人一道劳动，因此十分熟悉他们的生活。据他自己回忆说，“印第安这古老种族的妇女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摇我并教我走路；我从小就同印第安儿童一起嬉戏玩耍；年纪稍大些，我就跟着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雇工干农活，犏牲口……我从我脚下的土地上开出来的犁沟中，

从耸立在我面前的挺拔的群山里，学到了安第斯山区人积极的生活准则。”大学期间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不久便成为“大学改革运动”的领导人，并因此被校方开除。1932年因参加“美洲革命人民同盟”进行反政府的活动而两次被捕。1934年被流放到智利。在那里，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第一部小说《金蛇》问世，同年底，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小说竞赛中，他的这部小说以“文字优美、气势磅礴并富有独创性”而获得首奖。1938年他的第二部小说《饥饿的狗》出版，再次获得智利文学首奖。但是他依然过着艰苦的流亡生活。尽管如此，他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经过两年多的奋战，1941年他的第三部小说《广漠的世界》完成了，这部蜚声西方文坛的长篇杰作，获得美国纽约一家出版社组织的拉丁美洲文学竞赛大奖。以后，阿莱格里亚迁居到美国生活，并且先后去波多黎各、古巴等地从事文学教学和新闻工作。1948年，他因对“美洲革命人民同盟”的活动感到失望而退出该党。1957年回国时，首都利马的群众曾为欢迎他们所喜爱的这位作家举行隆重集会，其他城市也纷纷邀请他前往访问。翌年，他再度出国讲学，60年代回国，1967年2月17日在利马去世。

阿莱格里亚的文学成就主要反映在小说创作方面。第一部小说《金蛇》，通过一个讲故事人之口，用他的故乡马拉尼翁河畔的印欧混血种人特有的方言，叙述了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的梦想、他们的迷信思想和当地的风土人情。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放木排的混血种人，同那条金蛇绕山般的湍急长河进行生死搏斗的故事。此外，一个来自首都利马的工程师来到深林里，打算开采一处名叫“金蛇”的金矿，但尚未动土，他就被当地金黄色的毒蛇咬死了。作者在小说中

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了山区人与大自然斗争的勇敢精神；对于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是在这部作品里，人与自然的斗争冲淡和掩盖了阶级矛盾。

第二部小说《饥饿的狗》描写安第斯山高原上牧羊的印第安人在大旱之年所遭受的苦难作者通过牧羊犬的变化，间接地反映出印第安人的悲惨生活。在这一群牧羊犬之中，有的突然死去，有的被土匪骗走，有的死于政府士兵的枪弹之下。尤其令人吃惊的是，由于饥饿的威胁，牧羊犬不再听命于主人，他们疯狂地争食家畜，甚至互相残杀。而牧羊犬的主人们，有的被抓去当兵，有的揭竿而起当上绿林好汉，最后又被政府军杀死。这样的遭遇与牧羊犬又有何异？小说的主旨在于控诉反动政府和庄园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在思想深度和艺术技巧上都较《金蛇》提高了一步。

第三部小说《广漠的世界》是阿莱格里亚的代表作。他描绘了一个印第安部落——鲁米公社的三代人，为保卫土地、保卫自由生活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本来这个公社社员的人身是自由的，社内的风俗也是淳朴的；生活虽然艰辛，人们却可以凭借耕种公有的土地维持生计。但是大庄园主阿尔瓦罗·阿梅纳瓦尔企图把社员赶到他开办的矿工上去做苦工，便制造了纠纷。他勾结官府硬说鲁米公社的土地是他的财产。社长罗森多·马基勇敢地捍卫自己公社的权利，结果被捕入狱，并且被乱棒打死。鲁米公社的社员纷纷被赶出家园，迁徙到一个高寒荒园上生活。由于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许多人只好弃家出走，有的去矿山，有的去古柯种植园，有的去当割胶工……结局都相当悲惨。最后，马基的养子、混血儿贝尼托·卡斯特罗领导社员奋起反抗，也被政府军野蛮地镇压下去，古老的鲁米公社惨遭血洗，终于被彻底

摧毁。

小说之所以题为《广漠的世界》，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通过贝尼托·卡斯特罗之口做了解释：“在这广阔世界上，我们换了一处又一处地方，打算生活下去。可这世界不是我们的，他啥也不给我们，啥也不给……我们就这样前额贴着浸透苦水的大地死去了。让我们起来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我们在这世界上安身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保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生存的权利。天下穷人的命运一样苦，我们希望所有的穷苦人跟我们一道干，这样我们会得胜的……许多年来，几百年来，许许多多起来造反，失败了。谁也不要想到失败就胆怯，因为战死总比当奴隶强。”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印第安人不甘受奴役的坚强决心和英雄气概。作者的笔锋凝聚着四个世纪的愤怒，直指用枪杆和皮鞭书写秘鲁历史的魑魅魍魉。阿莱格里亚谈到他写作《广漠的世界》的动机时明确表示，他希望以他的作品唤醒他沉睡的同胞，使他们起来反饥饿、反剥削，反对在所谓维护社会秩序的幌子下进行的一切卑污的、非正义的勾当。这部小说完成了这一使命，他暴露并谴责了社会弊病及其制造者，有助于唤醒人们起来反对丑恶的现实。因而在思想性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广漠的世界》的艺术技巧也是成功的。首先，作者善于刻画人物，这突出的表现在对老社长马基的描写上。他不仅以细腻的笔触勾画出马基的外貌，更注意描写马基的内心活动。如在第一章《罗森多·马基》里，通过老队长的登山活动写出他对家乡的热爱与顽强的毅力：“他之所以上山去，还因为他喜欢使劲爬上那陡峭的高峰，锻炼锻炼他的筋骨，而在登上峰巅之后，他又喜欢纵目远观。他喜爱那开阔的天空，那安第斯山的宏伟壮丽。他看不厌的有冰峰雪裹的

乌尔皮耀峰，智慧的白头翁，像个年高的印第安先哲；粗鲁暴烈的乌埃尔卡峰，好似同变换风云不断周旋的战士；重峦叠嶂的伊略克山，山间有个印第安人永远永远地朝天酣睡；蹲伏着的狮子山，就像一头即将腾跃的美洲狮；墩实的苏尼山，它秉性温良，夹在它的邻居中间有点不自在；牧歌式的山妈妈，它展开锦缎罗裙，铺开那色彩斑斓的庄稼地，几乎没露出一块岩石可凭借来窥视远方；还有这道岭，那座山，那座山……印第安人罗森多长时间地观望这些山岭，凭想象赋予它们各式各样生物的形态和性格……罗森多自信了解它的形体和精神的秘密，就像了解他自己一样……他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清楚，可他非常非常的热爱着大地。”^①这种情景交融的写作手法，既描写了自然景观，更达到了以写景烘托和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目的。阿莱格里亚是位诗人，他所描写的风景饱含着诗意，它们像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和习俗画，为他的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阿莱格里亚还善于运用诙谐、幽默的笔调讲述故事，笑声过后便会体会到一丝苦味。他常常用寥寥数语便能讲出一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有些章节好似完整的短篇小说，但其情节又是围绕主线展开。这样的小说结构法，显然是继承了西班牙小说的传统。

《广漠的世界》是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与斗争的史诗，它不愧是拉美土著小说中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界公认他是与《旋涡》、《堂娜巴巴拉》等并列的优秀小说。

第四节 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小说

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 (José María Arguedas) (1911 ~ 1969) 是秘鲁著名的小说家。1911 年出生在南方山区印第安人聚居的库斯科省安达瓦伊拉县。父亲是律师, 母亲在他三岁时就病死了。童年时, 由于受到继母的虐待, 他逃到印第安人的村落里躲藏了起来。在那里生活了 20 年之久, 熟练的掌握了盖丘阿语, 深切地了解了土著居民的悲惨处境, 也深深受到印第安文化的熏陶。1923 年, 陪同父亲骑马走遍安第斯山。1924 ~ 1925 年, 进入阿普里马克省会阿班凯一家住宿中学读书。1931 年考入首都著名的圣马尔科斯大学。1932 年辍学, 开始在邮电局工作。1937 年被捕入狱, 原因是他参加了抗议西班牙佛朗哥军队对人民政府的进攻。1939 年他回库斯科省担任一家中学的语文老师, 同年结婚。1940 年第一次出国, 去墨西哥旅行。1946 年回大学继续攻读人类学。1948 年大学毕业。1950 年前往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观光。1951 年去智利旅行。1953 年被任命为秘鲁历史博物馆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从 1933 年起, 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就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一年他发表了小说《水》(Agua), 作品着重描写了印第安人贫困无助又无奈的状况以及压抑的心情, 从而引起了秘鲁文学界的注意。继《水》之后, 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血的节日》(Yawar fiesta) (1941)、《深沉的河流》(Los ríos profundos) (1958)、《所有的血》(Todas las sangres) (1964) 以及数量可观的中、短篇小说。1966 年因为心情郁闷曾经自杀, 未遂。身

体康复后，第二次婚姻。但是，忧郁症总是沉重的压在他的心头。1969年 11月 28 日开枪自杀。12月 2 日抢救无效身亡。

短篇小说《水》是阿尔格达斯的处女作，故事发生在印第安人聚居的圣胡安村里，该村庄的大部分土地和水源被白人庄园主布劳略霸占。他和其他几家地主的玉米长得穗大秆长，一片碧绿，地被水浇得甚至都成泥浆了。可是印第安居民的庄稼却快要旱死了。号手潘达查和他的好朋友埃内斯托对此十分不满，他俩用号声和歌声召集起村民，看看听命于地主的分水员究竟怎样分水，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发动村民起来反抗地主的压迫。但是，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印第安人对白人地主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地主及其走狗鸣枪威胁时，许多人便吓得四处逃窜了。惟有勇敢的潘达查和埃内斯托不畏强暴，大骂地主布劳略是“贼”，愤怒地高喊：“要杀就杀，随你的便！”残暴的布劳略果真开枪打死了勇敢的号手。埃内斯托见状立刻怒火中烧，“气得肺在爆炸，血管在崩裂，眼睛在冒火”，他愤怒的吼道：“你们这些家伙是一帮贼！”他操起潘达查扔下的号角，“然后就像扔弩石一样朝布劳略的头上砸去，鲜血顿时从地主的额头上涌了出来，流到地上。”潘达查发动的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失败了，但是，他那英勇不屈的形象犹如一团烈火燃烧在印第安农民的心中。这篇小说真实的反映了秘鲁农村的阶级压迫，其艺术风格又颇具印第安民族的特色（如作品中介绍了许多印第安人的歌舞），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引起了秘鲁文学界的极大关注。

《深沉的河流》是阿尔格达斯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书中汇聚了作者对人种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人公埃内斯托是个律师的儿子，他父亲由于独裁统治者的迫害，只好把他托付给亲戚照管，但是这些亲戚经常虐待埃

内斯托。他不堪凌辱便逃到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里生活，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印第安人正直、善良、勤劳的美德深深教育和感动着他；他在那里听到许多美好的传说和故事，他深深地爱上了那里的人们。几年以后，他父亲找到他，将他接回家，并且送他去读书。他常常给同学们讲述印第安人的风土人情，他的讲述充满了对印第安人的同情，甚至对印第安人的落后面都是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去解释。小说以埃内斯托决心献身给捍卫印第安人的斗争而告终。

阿尔格达斯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所有的血》该书于 1964 年问世。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大庄园主、美国跨国公司和印第安村民之间的复杂矛盾，揭示了秘鲁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真实状况。大庄园主安德列斯·阿拉贡·德佩拉尔塔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费尔明曾在美国读书，接受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小儿子布鲁诺生长在印第安人中间，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哥哥费尔明为发财致富，打算重新开采一座旧矿，为此向银行贷了款。但是一家美国跨国公司也看中这座矿山，他们千方百计阻挠费尔明购买，最后终于霸占了这座矿山。随后，该公司为建立发电厂，便勾结反动政府，用推土机强行推平了矿山周围的印第安村落。手无寸铁的印第安居民奋起反抗，反动政府立即派兵镇压。许多农民惨死在屠刀下，不少人被捕入狱，更多的人被迫逃往他乡。美国跨国公司取得了胜利。《所有的血》出版后，在秘鲁引起了极大震动，因为该书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拉美国家的侵略和渗透，深刻的揭示了秘鲁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压迫，尤其是对印第安人的压迫。

1971 年何塞·玛利亚·阿尔格达斯的遗作《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El zorro de arriba y el zorro de abajo) 出版。作

品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可以看出作者生前对社会激烈冲突的困惑情绪，因此很有研究价值。故事发生在琴博特海港。60年代中期，秘鲁鱼粉工业迅速发展，琴博特就是一个典型，这个港口吸引了大批山上的土著人进城打工。三年的时间里，渔港的居民从 4000 人发展到 30000 人。作品通过两只狐狸的谈话，讲出了渔港的故事。山下的狐狸告诉山上的狐狸：有艘鱼船名叫“参孙一号”船主丘咖多与美国派遣到秘鲁来从事“和平工程”的队员麦克斯韦尔因为争夺一个舞女而发生冲突，丘咖多怂恿一个绰号叫“哑巴”的船工去刺杀那个美国佬，“哑巴”到了夜总会刺杀未遂，反而遭到痛打，丘咖多趁机带走了麦克斯韦尔的舞伴。夜总会事件发生后，美国佬害怕遭到暗算便转到一家美资建筑公司工作去了。再说有个渔工名叫阿斯托 刚从山上下来工作不久 赚了一些钱就去嫖娼。一天 他在妓院里竟然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兄妹相见既惊讶，又羞愧 更感到痛苦。哥哥最后把妹妹带出了火坑。讲述到这里 山下的狐狸问山上的狐狸：你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吗？山上的回答说 基本明白。山下的说 那我就继续讲下去 妓院老板发现少了一个妓女，就四处寻找，最后来到了阿斯托家里，看到了后者的妹妹 便拔出刀子 逼迫姑娘回到妓院去。这时 幸亏一个盲人乐师闯了进来，替姑娘解了围。就在这时，城里出了一件大事：政府要改造城市面貌，决定把公墓拆迁到郊区的洼地里去。老百姓愤怒之极，纷纷扛着十字架上街游行。其中有个疯子，名叫蒙卡达，一直冲在队伍的前头。游行队伍在公墓集合之后刚刚走出大门口，便遇上了前来阻止游行的神甫。他拿着扩音喇叭高喊道：“主教大人已经决定：除去刚死的人要埋葬在新公墓之外 老坟墓就不再迁移了。”但是 蒙卡达不听这一套 大骂神甫：“美国佬 滚蛋！”游行队伍继续前进。那位

神甫赶忙去找主教大人报告。主教也拿不出好主意来，便命令神甫去找卡多索神甫想办法。卡多索是个神秘人物，资本家喜欢他，美国大使欣赏他，工会领导人虽然讨厌他，可是会员们常常去找他。他家里挂着切·格瓦拉的画像，同时挂着基督像。他能把基督教义和革命口号糅合在一起。他的话在印第安人、黑人和工人中很有影响。但是蒙卡达不相信卡多索的“鬼话”，他冲进豪华饭店里，把在那里吃喝玩乐的达官贵人统统臭骂一通，吓得老爷太太们四处躲藏。最后，警察把这个疯子抓走了。小说的结尾是作者的一段日记：“我在与死亡的斗争中写下了这一个个不完整的故事。我准备让这两只狐狸继续谈下去。他们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左派政党领袖之间的争吵还没有完结。渔业工会之间各个派别的矛盾还没有解决。疯子蒙卡达还要发表演说呢。美国佬麦克斯韦尔还没有死呢。丘咖多也得有个结局啊。”“两只狐狸还得在蓝天下没完没了地跑来跑去……”

《山上的狐狸和山下的狐狸》充分证明了作者已经冲破了土著主义文学的范围 他既涉及了“山上”的问题 也用了许多笔墨描绘城市里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秘鲁文学界非常重视它。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善于捕捉印第安人的心理活动，他深深地热爱着他们，他用自己的笔为他们的不平等待遇大声疾呼。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秘鲁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压迫有着深刻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他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在艺术技巧方面，他将克丘亚语融于西班牙语之中，将印第安的民间文学与从欧洲传入的现实主义文学结合起来，从而使得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又不囿于狭隘的乡土观念。拉美文学评论界认为 玛利亚·阿尔格达斯将印第安土著文学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第六章

先锋派小说

拉美的先锋派小说是在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产生的。欧洲现代派文学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动乱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化所引起的人们的悲观失望心理。时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算起。其主要特征是：在思想上，反映分崩离析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物质、自然和个人与自我之间的扭曲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创伤、变态心理、悲观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在艺术上，强调以暗示和联想为主，直接诉之官能的象征手段和某些自然主义手法，反对由作者直接出面讲述故事或作正面描写。对拉美作家影响较大的有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等人。

拉美的先锋派小说是从 30 年代开始的。拉美作家从欧

洲现代派文学中更多的借鉴了艺术技巧，他们坚持文学的任务在于植根本土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因为拉美作家虽然在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也产生了苦闷失望的情绪，但是他们意识到新大陆贫困落后的根源不在于自然界，也不在于个人，而在于社会本身；拉美人民的悲惨处境并非某个地域的个别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从这种认识出发，拉美作家不再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不再描写个人奋斗，而是以更加客观、更加尖锐、更加深刻的态度去揭露、抨击、批判社会的痼疾，同时宣泄出内心的愤懑与不平。当然这中间也有的作家表现出绝望和虚无的思想，但是许多优秀的作家则是严肃地探寻社会的出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还粉碎了欧洲文明优越的神话，因而从反面促进了拉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自信心的提高。许多作家不再盲目效仿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而是提出了认识民族的自我的要求，他们认识到历史并非一部野蛮史，它有过灿烂的文化，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成为作家追根溯源的钥匙，因此他们不再带着文明人的优越感去怜悯土著人，而是深入到心灵深处去了解他们，进而了解拉美社会的特点。

在艺术方面，拉丁美洲的先锋派作家开始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发掘，肯定了潜意识和梦幻作为一种精神现实具有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从而冲破了传统小说的樊篱，大胆探索拉美人的内心世界，敢于涉足不曾问津的意识流和梦境。因此，他们在语言和作品的结构上进行了改革，如打破语言的逻辑性和语法条文，以表现“事物的非理性和非现实性”；在作品的结构上，作者不再设置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作品中的人物只负责讲述自己的感受，人物性格的塑造主要依赖人物自己的意识流动，无需第三者出面介绍；作品

中出现了“主观时间”，即按人物的情感，把过去、现在和将来互相交织重叠起来。同欧洲先锋派作家的艺术技巧相比，拉美作家在语言和结构上的改革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正如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所说，“我们没有条件去心平气和地剖析复杂的个人心理，严酷的环境使拉美小说首先成为一门新大陆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它的使命是搜集资料，作出评价，给予判断。”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有：阿根廷小说家爱德华多·马列亚，主要作品有《一种阿根廷激情的历史》、《靠近死亡的城市》；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主要作品有《这个世界的王国》、《消失的脚步》

《追踪》、《启蒙世纪》、《方法的根源》；危地马拉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主要作品有《危地马拉传说》、《总统先生》、《玉米人》、《强风》、《绿色教皇》、《被埋藏者的眼睛》；智利作家马努埃尔·罗哈斯，主要作品有《窃贼之子》、《比酒还香》；阿根廷作家雷翁波尔多·马雷查尔，主要作品有《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塞维罗·阿尔坎赫洛的宴席》；阿根廷作家罗伯特·哥多弗雷托·阿尔特，主要作品有：《狂暴的玩偶》

《七个疯子》、《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铜版画》；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主要作品有《小径分岔的花园》、《阿莱夫》、《死亡与罗盘》；阿根廷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主要作品有《地道》、《关于英雄与坟墓》；乌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主要作品有：《短暂的生命》、《无主的土地》、《为了今天晚上》、《生死离别》、《收尸人》；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主要作品有《佩德罗·帕拉莫》。

第一节 爱德华多·马列亚的作品

爱德华多·马列亚（Eduardo Mallea）（1903~1982）是阿根廷的小说家和散文家。1903年出生在布兰卡港。1916年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求学。1926年开始写短篇小说《为一个绝望的英国女人而作的小说》（*Cuentos para una inglesa desesperada*），多为戏谑和调侃的故事。1934年创作了《欧洲夜曲》（*Nocturno europeo*），一反过去游戏的笔调，用十分严肃和虔诚的口气，通过女主人公阿德里安（Adrian）的忏悔深入表现人生苦短的观念。1935年长篇小说《阿根廷受难史》（*Historia de una pasión argentina*）问世，讲述了阿根廷这一历史时期让人们感到焦虑的诸多问题，例如，在何塞·费利克斯·乌里武鲁总统执政时期（1930—1932），阿根廷在这位军事独裁者的专制统治下，保守势力猖獗一时，疯狂镇压进步、民主力量，议会被关闭，实行戒严法，限制工会和激进公民联盟的活动，企图建立法西斯制度。他的继任者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将军担任总统后继续维护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的利益，打击工人运动，变本加厉地镇压激进公民联盟的活动，增加苛捐杂税，因而加重了广大人民的负担。政治压迫和经济危机使得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感到精神十分压抑，《阿根廷受难史》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反映。这部作品中有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对独裁专制、大选中欺骗活动的猛烈抨击，也有对祖国前途改善的盼望。作者明确指出：现实的阿根廷是坏人当道，一个看不见的美好祖国蕴藏在好人心中。1936年

马列亚发表了长篇小说《静河之城》（*La ciudad junto al río inmóvil*），书中的城市就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静河”是指拉普拉塔河；由于首都位于这条河的入海口处的一侧，朝海洋的方向望去给人静止不动的感觉，故名“静河”。作品集中描写了一群感到孤独和绝望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知己，缺乏温暖，老死不相往来。以上的作品大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加以表现。1938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十一月的节日》（*Fiesta en noviembre*），开始使用对话形式表现各类人物在政治压迫下的复杂心理活动：有的攀附权贵、阿谀奉承，有的逃避现实、明哲保身，有的沽名钓誉、腐化堕落，也有的刚直不阿、敢于怒骂丑恶现象……

1940年长篇小说《寂静的海湾》（*La bahía de silencio*）问世，其主题思想是“人何以为人”。实际上，作者是在质问30年代阿根廷的残酷现实：为什么经济危机的恶果总是落到“底层的人们”头上？为什么达官贵人总是“社会动乱”的受益者？为什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冲突会表现得麻木不仁？或者不知所措？或者行动无力？

1941年长篇小说《凡绿皆亡》（*Todo verdor perecerá*）出版。书中的主人公名叫阿伽塔·克鲁斯（*Agata Cruz*），她幼年丧母，跟着一个有怪癖的瑞士人——终日醉心于阅读《圣经》——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方一个小村庄里。长大成人后，她嫁给一个并不喜欢的男人。此人名叫尼卡诺尔·克鲁斯（*Nicanor Cruz*），是个农民，沉默寡言，一心务农，但是年年因为自然灾害而庄稼歉收。年复一年，年年减产。夫妻二人的爱情也随之降温，而怨恨则逐渐升温。后来，丈夫得了肺炎，妻子反而把房子的门窗全部打开，让刺骨的寒风吹进来。她的企图非常明显：大家同归于尽。但是，她侥幸活了下来，丈

夫真的死了。最后，她来到了布兰卡湾，因为她觉得有必要摆脱那种压抑的心境，她渴望找到一个男人，她渴望爱情。一次，在一种奢靡氛围的社交场合里，她认识了一个名叫索特罗的律师。二人一见钟情。但是，他和她只做了几个星期的“露水夫妻”。随后，索特罗就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了。她再次陷入孤独之中，不久，便回到了农村老家。但是，精神状态几近于崩溃。最后的结局是：果然变成了疯子，自杀身死。作者用了大量笔墨描绘了阿伽塔个人生活中的寂寞和孤独状态，并没有特别强调外部环境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重点放在描写女主人公的意识流动上。为此，他把作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述眼前发生的事情，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故事，另外一部分讲述阿伽塔的回忆，这样一来，读者就了解了她的过去。无论现在还是过去，故事都按照客观自然时序进行。作品中有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时常进入到故事情节里点评人物的思想言行。他的点评可以使得读者感到：复杂多变的客观现实常常让“小人物”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是个农民，丰收还是歉收并不完全取决于你，天气管着你，市场管着你，政府管着你……你自己可以掌握的却十分有限。反之，大人物可以操纵一切：经济、政治、文化……他们慷慨激昂地说假话：“历史赋予了我们这样的使命，人民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力！”文学评论界认为《凡绿皆亡》是马列亚的代表作。贝伊尼在《新编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中说：“阿根廷作家爱德华多·马列亚是本世纪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由于非常讲究艺术特色和风格，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思想深刻、艺术新颖的表达方式的原始证明。马列亚高雅的文化修养，因为有最现代的思想支撑着他的哲

学理念，使得他可以深入到阿根廷人的心灵中去。”

善于深入描写对象的心灵是马列亚每一部作品的特点之一。1943 年他创作了《鹰群》（*Las águilas*）。主人公名叫罗曼·里卡尔特（*Román Ricarte*），故事一开始就讲述他的牧场是怎样破产的，然后用倒叙的方式介绍了从 1853 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富有的阿根廷家族是如何走向破产的：因为从 1852 年推翻了罗萨斯的独裁统治之后，阿根廷从 1853 至 1880 年间有过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1880 年后代表大地主、大畜牧业主集团利益的保守党民族自治党垄断政权，以欺骗和舞弊手段操纵选举，引起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1912 年激进公民联盟成立，1916 年该组织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其领袖伊里戈延就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代表保守势力的军队于 1936 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激进公民联盟组阁的政府。保守势力再度上台。此后，到 40 年代，阿根廷政局反复处于政权更迭之中。近一百年的历史表明，历史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里卡尔特家族的兴衰变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到了罗曼这一代人，这位家长品德高尚，但是为人懦弱，遇事优柔寡断。整个作品都是来刻画他的性格的。可是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却希望他飞黄腾达。马列亚不愿意讲个没完没了。他时不时地停下来进行心理分析，进行慢悠悠的哲学思考，因此有些文字显得语焉不详。但是，关注阿根廷人的境遇，担心祖国的前途，有时还十分悲观，这种种情绪同样时时流露

在《鹰群》之中。

1950年《心灵的敌人》问世，主要讲述纪廉兄弟的故事。他俩住在布兰卡湾的一个小村庄里，哥哥名叫马里奥·纪廉，弟弟名叫戈拉·纪廉。此外，有个妹妹叫德博拉。作者对这三个人物一一进行了心理分析。马里奥喜欢投机取巧，戈拉比较好色，德博拉小肚鸡肠，心胸狭窄。马里奥极力想发财，戈拉千方百计玩弄女性，德博拉诡计多端，一心要杀害两个哥哥。结果是这个妹妹点燃了住宅，自己烧死在房子里。作者认定这是个性情乖戾的姑娘，她本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缺乏活力，原因是作者没有让他们自己通过言行表现性格，而是一开篇就规定了他们是什么样性格的人物，没有给他们一个性格变化的过程，好像性格鉴定一样。由于缺乏故事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乏味。而且有些精彩的小故事刚刚说到高潮的时候却戛然而止，这就越发地引起了读者的不满，因为下文既不交代故事的发展，也不说明中断的原因。比如，作者介绍说，“咱们先听一听某某智者是如何议论的吧，”但是读者看到的却是作者的议论，而没有听到智者的声音。难道这是作者自以为是的表现？评论界认为这是一部心理分析的杰作，但是一般读者却难以卒读。

1953年马列亚发表了中篇小说《恰威斯》（Chaves）故事情节单一：恰威斯是个锯木厂的工人，由于生活对他的一连串打击——妻子和孩子们一一去世——，他变得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可是，工友们并不理解他的痛苦，以为他故作有教养的样子是傲视别人的表现，所以特别讨厌他，甚至敌视他。只是到了作品的最后一行，读者才看到这样两句对话：有人问恰威斯：“你永远也不打算跟别人说话吗？”他

回答说：“是的。”因为心中的痛苦早已经淹没了他说话的愿望。在《恰威斯》里，布局有了较大改善：故事情节由两条线索编织起来，一条是眼前发生的事情：恰威斯来找工作；另外一条线索是恰威斯的回忆：从少年时期回忆到妻子如何逝世为止。两条线索交叉叙述，不断形成一些悬念，因此阅读起来比较有趣。

1957 年长篇小说《辛巴特》（Simbad）出版，讲述一个名叫费尔南多·费（Fernando Fe）的剧作家的故事。《辛巴特》这个书名也就是剧作家正在创作的作品名字。这位剧作家的生活与辛巴特的生活一模一样，仿佛“他创作中的障碍就是辛巴特生活中的绊脚石一样”。作品中安排了两个时间视角：一个是叙述费尔南多与女友玛戈达分手后孤独的生活。这个视角从 1952 年 12 月 28 日讲到 12 月 31 日，即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手写体完成，由 5 个故事片断组成，而这 5 个故事片断又是组成这部作品 5 个部分的开头。另外一个时间视角由费尔南多的回忆组成，即他从 1914 年 12 岁起一直回忆到玛戈达回到他身边、他又恢复了改稿的信心为止。到全书结束时两个时间视角汇合在一起。作品叙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费尔南多与玛戈达的同居生活，与此同时他又与另外一个女人（名叫莱阿）过从甚密，玛戈达需要他的保护，莱阿则给他灵感；二是费尔南多积极工作，努力通过经典节目的上演发扬光大阿根廷的戏剧；三是描写费尔南多是如何进行戏剧创作的。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按照自然时间顺序在展开的同时又纠缠在一起。在书中，马列亚装扮成一个名叫古斯塔沃·比亚的人物来担当见证人的角色。作品中有些篇章是马列亚全部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段落。但是就全书而言，《辛巴特》比不上《凡绿皆亡》，因为费尔南多的道德

说教和他的通奸行为非常不和谐，仅仅用艺术家的心理分析很难说服读者。此外，由于叙述的方式模糊和抽象，因而使得费尔南多这个人物缺乏真实性。

1971 年以后，晚年的马列亚继续小说创作，但是出现了题材和人物反复露面的现象。但是，综观他的一生创作，他的小说和散文对于阿根廷先锋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节 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的作品

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Leopoldo Marechal）（1900～1970）是阿根廷诗人、小说家。大学毕业后曾任中学教师。1924 年 2 月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现了一本名叫《马丁·菲耶罗》的杂志，是政治评论性的刊物，之所以借用著名诗人埃尔南德斯创作的这部民族史诗的书名，是因为该刊物的宗旨是要发掘阿根廷民族性格的“根”。但是，仅仅出了四期以后，《马丁·菲耶罗》便转向文化问题了。这时，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积极为该杂志撰稿。不久，以该刊物为核心逐渐形成宣传欧洲先锋派文学的作者队伍。马雷查尔喜欢自由体诗歌，主张多用深刻的比喻和强调民族性，这在他早期的诗歌中都有反映，例如，《幼鹰》（Los aguiluchos）（1922）和《光阴似箭》（Días como flechas）（1926）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些追求。1925 年 12 月 29 日马雷查尔为博尔赫斯的诗集《面前的月亮》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马丁·菲耶罗》杂志上，他声称这部诗集“最有力地驳斥了阿根廷现代主义诗人卢贡内斯的过时理论”，并且称赞博尔赫斯的

诗歌“是强有力的宣言”。1926年12月12日博尔赫斯也在《马丁·菲耶罗》杂志上著文肯定了马雷查尔的《光阴似箭》。1928~1931年期间，马雷查尔旅居西班牙和法国，开始构思长篇小说《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Adan Buenosayres），他企图把20年代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拟人化，模仿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抓住首都的时代脉搏，把那时人们的精神面貌艺术地反映出来。但是，当他回到阿根廷时，就中断了这部作品的创作。直到20年以后，1948年这部长篇小说方才问世。不过在内容上已经有了变化：除去介绍“马丁·菲耶罗”派的作家们的情况，还对20年代风行一时的“极端主义”文学冷嘲热讽。这部作品分为七个部分，用旅游观光的形式走遍布宜诺斯艾利斯全城。主角是个信仰天主教的青年艺术家，实际上是作者的化身，他时而欣赏风景，时而大发议论；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及新柏拉图主义的“艺术灵感说”以及城市里地狱般的生活。书中还影射了他和博尔赫斯的关系：20年过去了，二人分别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博尔赫斯反对带法西斯色彩的庇隆政权；马雷查尔则成了天主教势力和庇隆集团的重要人物。在《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中，作者把博尔赫斯丑化为“路易斯·佩雷达”（Luis Pereda），这是个浪荡诗人，身体高大粗壮，走路像头瞎眼的野猪；他每天无所事事，只知道寻找早年间的探戈唱片。马雷查尔明明知道博尔赫斯从来没有在牛津、巴黎和苏黎世读过书，他故意借助书中一个人物的嘴巴攻击这位大作家：“家里把他送到牛津去学希腊文，到巴黎攻读文学，去苏黎世学哲学，可是他一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陷进了留声机式的本土主义！嘿，这家伙真是疯了！”在长达741页的这部小说里，“路易

斯·佩雷达”这个形象占了很多篇幅，他时而出现在首都的贫民区，时而在构思流氓们的未来模样；时而背诵黄色歌曲的歌词，时而和同伴一起去逛妓院……总之，作者对“路易斯·佩雷达”极尽挖苦之能事：什么“乡巴佬哲学家”、

“死抠字样的语言学家”、“日内瓦加尔文教育糟蹋了的劣等生”等等。《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高潮是一大段梦境：青年艺术家来到了寓言中的首都——如同《神曲》一样，那里是个地狱，按照七大类罪行分成七个圆圈。“路易斯·佩雷达”被归入“流氓”一类，他被指控为“冒牌教师”和“冒牌诗人”，因而被收入第七圈里。当然，如此针对博尔赫斯的影射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戏谑的成分。布拉斯·玛达摩罗（Blas Matamoro）认为：“《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文学的顶峰作之一，因为它语言丰富：有日常对话，有绮丽文体，有理论表述，有景物描写等等；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画面；因为它有对人、对事冷嘲热讽的点评；因为它有色彩斑斓的各种世界。当然，它也有缺点：整体上不和谐，显得支离破碎。”1948年该书出版时，阿根廷读书界和评论界并没有特别关注，直到60年代才得到广泛的认可。对于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来说，发现

《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价值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今天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马雷查尔在发现和分析阿根廷国民性格方面是深刻的和超前的，至今有现实意义；作品中的语言今天仍然令人感到生动、活泼和新颖。书中的亚当仍然可以代表今天的阿根廷人，国民性格特征依然如故，社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人们的焦虑和痛苦未减分毫，祖先来到这块南美土地后的不适应症仍然在子子孙孙身上有反应，半个世纪前的盼望今天还在盼望……因此可以说，马雷查尔忠

实地把 20~40 年代阿根廷的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了。阿根廷著名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评价说：“通过《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创作，马雷查尔坚决踏上了这样一条道路、凡是要写阿根廷题材小说的作家无一例外都必须走的道路：不要用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去解决自相矛盾的“合理”法则和社会冲突，而是应该如同古希腊吟唱歌手那样表达出与故事情节吻合一致的方法即可，就是说，注意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第三节 比奥伊·卡萨雷斯的作品

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1914~1999）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祖父母都是法国人。父母都出身庄园主家庭。阿道弗小时受法语教育。大学没有毕业就放弃了攻读的法律专业，转而从事文学创作。1932 年 5 月他认识了博尔赫斯，从此二人结为好友，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他俩共同创办了《不合时宜》杂志。二人联手创作的小说有：《堂伊西特罗·巴罗迪的六个难题》（Seis problemas para don Isidro Parodi）（1942）、《两首值得纪念的幻想曲》（Dos fantasías memorable）（1946）、《给死神做榜样》（Un modelo para la muerte）（1946）、《布斯托斯·道麦科记事》（Cronicas de Bustos Domecq）（1967）、《布斯托斯·道麦科的新故事》（Nuevos cuentos de Bustos Domecq）

① Bellini 著：《新编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 479 页，Editorial castalia, 1997，马德里。

(1977)，以及创作于 1955 年的《郊区人民》（Los orilleros）和《信徒的天堂》（El paraíso de los creyentes）两部电影剧本。在这些作品里，二人巧妙地构思了一系列侦探故事，但目的是嘲讽阿根廷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故事里既表达了作者的感觉，也阐发了他俩的理性思考。阿道弗特别喜爱几何结构的叙述方式，这在作品的布局中清晰可见。人物性格的刻画、场景和具体细节的描写都服从这个结构。

阿道弗个人创作的重要作品有：1940 年发表的《莫雷尔的发明》（La invención de Morel）、1954 年问世的《英雄梦》（El sueño de los héroes）和 1969 年出版的《对猪战争日记》（Diario de la guerra del cerdo）。

《莫雷尔的发明》用第一人称叙述“我”、一个被判处了死刑的逃犯，为了逃脱警察的追捕，从意大利西西里岛独自乘一条小船，来到了一个名叫维林斯的海岛上：大概在 1924 年一些白人在岛上修建了一座博物馆、一个小教堂和一个游泳池。完工后，人们患上了一种怪病——指甲和头发脱落、眼角膜坏死，随后在 8 到 15 天内，内脏坏死。后来，一艘日本巡洋舰发现了岛边停靠着一汽艇，上面的船员都死了：没有皮肤，没有指甲，没有头发。日本人感到疑惑，就用炮火把汽艇打沉了。“我”来到这座海岛上 100 天之后，发现突然出现了许多人，他们跳舞、散步、去游泳池游泳，好像是避暑胜地上的避暑者。“我”不得不躲避这些陌生的人群，逃到海边的山洞里，忍受着潮水的浸泡以及黑暗的折磨。但是，避暑者中间有个美丽的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她经常坐在山顶上朝西方望去。“我”希望认识她，但苦于没有借口，于是用野花编织了一句话，种成花圃安排在她每天散步的必经之路上。那句话是：“一位恋人

胆怯的敬献。”这一天，她在一个长着大胡子、高大男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山顶。男人后来看到了那花圃，可那女人依然装作没有看见。接着，“我”听到一些感叹声，说的是法语。只听得大胡子叫着那女人的名字说道：“福斯蒂内，请相信我的话。”那女人则称大胡子“莫雷尔”。大胡子莫雷尔一面同美丽的福斯蒂内谈话，一面来回践踏那个小小的花圃。福斯蒂内也发现了花圃的字句，但是并不阻止莫雷尔的践踏活动。“我”觉得这是福斯蒂内在故意捉弄“我”的感情。也许是对“我”表示鄙弃，而莫雷尔是个陪衬。想到这里，“我”有些受不了，觉得自己会发疯，或者会杀掉这个姑娘。此后的三天，“我”没有上山去看福斯蒂内，到了第四天，“我”坚持不住了，连忙上山去找福斯蒂内。但奇怪的是，“我”看到莫雷尔后立刻从躲藏的地方走出来，一面指着莫雷尔，一面对福斯蒂内说：“福斯蒂内女士，他是长胡子的女人！”可是这个玩笑并没有成功，甚至无人理睬。大胡子继续朝那女人走去。如果“我”不是赶快让路的话，就会与大胡子相撞。与此同时，福斯蒂内并没有中断同莫雷尔的谈话，而且她脸上是喜气洋洋的。“我”决定晚上去博物馆看福斯蒂内，令人惊讶的是：那里空无一人！“我”走遍了博物馆、小教堂和地下室，突然听到有两个人在用西班牙语说话。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更奇怪的是，这两个人还说到了莫雷尔的名字。由于可能见到福斯蒂内，“我”的心怦怦直跳。“我”走上博物馆的楼梯，躲在一个平台上向下面的饭厅张望。这时，“我”看到了福斯蒂内以及坐在她对面的大胡子莫雷尔。他们的谈话让“我”觉得乏味。莫雷尔又在提他那个“永生永存”的话题。天亮以后，“我”越窗而下，跑下山

去。对于这种“我”可以看到别人而别人看不到“我”的现象，“我”想有多种解释：一是“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瘟病，因此产生了幻觉，那些人都是幻觉的结果；二是岛上的有毒空气和不卫生的食物把“我”变成了一个肉眼看不见的人；三是那些人可能是外星人，他们有耳朵，但不是用来听声音的；有眼睛，但不是用来看东西的；所以他们一直看不到“我”的存在；四是“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疯人院里，梦见“我”在岛上；梦见莫雷尔是罪犯疯人院院长，“我”也是疯人院院长。梦把“我”给弄糊涂了；五是岛上的人们都是鬼魂，“我”也是但丁笔下的鬼魂，小岛是涤罪所，然后从这里去天堂。“我”一一梳理这些思想，感到莫大的快乐。一想到“我”是鬼魂，“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几天后，海上来了一艘大轮船。船长登陆后同大家一起去游泳池戏水。“我”在一旁观察。“我”发现莫雷尔悄悄约了两个男士和“我”单相思的福斯蒂内在某个地方宣布一个重要的事情。原来莫雷尔发明了一种可以“让所有灵魂可以获得永生的机器”。对于“我”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但是，那套机器可以放出人们的映像，因为它可以保存人们的感觉，所以也就可以让人们永生永存下去了。“我”一直爱着福斯蒂内，因此希望这套机器放射的映像中看到心爱的福斯蒂内。“我”把放置机器的蓝色房子凿开一个洞，进去之后不久便发现机器已经运转起来了。但是“我”忽然发现凿开的洞口不知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已经把它给堵死了。“我”拼命地用铁棍捅啊捅，但是就是捅不开。不久，“我”明白了这是机器运转后发射出来的映像墙壁，人和映像作战，当然不会有结果了。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一种说法：这套机器会把肉体与映像分离，一旦肉体化做灵魂转

移到映像上，肉体就腐烂了。最后，“我”用日记形式提出，希望有人再发明另外一种机器：把分离的仪容体态及其映像恢复成原形。这部作品主要表现世界令人产生的幻觉、一个乏味故事的周期重复以及孤独的岛民感觉。作者喜欢讲述这类形而上学的故事，他笔下的寓言常常谈及历史经验中没有的生命因素：非现实、神秘和魔幻的成分。

《英雄梦》的主人公名叫埃米利奥·高纳（Emilia Gaudina）。1927年时21岁，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工人。一天，在理发师帮助下，他用36比索买了赛马彩票，结果赢了1000比索。高纳来到朋友中间，提议把这1000比索同大家一道花掉。朋友们七嘴八舌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高纳还是坚持用这些钱请大家痛快地玩一场。这时有人建议：还是听听德高望重的巴莱加博士怎么说吧。没人敢反对。于是，众人来到博士家里。博士听了高纳赢钱的经过和花钱的想法后，说道：“朋友，我认为很好。赌博赢来的钱应该花得大方。”这样便商定：第二天下午六点钟在博士家门口集会，去参加狂欢节。在回家的路上，高纳忽然想起：应该邀请那位帮助他赢钱的理发师。于是，众人又一窝蜂地来到理发师家。高纳把老大不高兴的理发师从床上硬拉起来，告诉他第二天去狂欢节的事情。理发师望着床上的漂亮媳妇说：

“我怎么能把她一个人留在家呢？”高纳不礼貌地反驳说：“离开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第二天，高纳的好朋友拉尔森染上了流感。高纳提议改期去玩乐。但是拉尔森反对，坚持他们去玩，不能改日子，否则大家会生气的。二人分手时，拉尔森劝高纳不要喝得太多。去参加狂欢节的一行七人乘坐一辆四轮双座带篷马车，前往狂欢节的中心会场，高纳后来回忆那时的情景，只记得遇到过一个迷路的孩子，

只记得一个朋友在唱歌。后来，他眼前就出现了幻觉：“马大得出奇，成弯弓状，全身汗淋淋，叉着腿，摇摇晃晃；他还仿佛听到马像人一样在叫……”再往后，高纳的记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认识了一位戴面具的姑娘、与朋友吵架、睡在树林、稀里糊涂地来到了湖边、认识了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小伙子，二人大谈足球比赛……狂欢节过后，高纳回忆起这三天的事情，对上述有些事件感到奇怪，例如，自己是怎么到了湖边的，那戴面具的姑娘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会睡在森林里等等。他觉得自己也发生了某些奇怪的变化。节后，第一天上班，高纳就旷工半天，他无精打采，不想干活，不到五点钟，扔下工作，就去了咖啡馆。朋友们在那里打台球，高纳只想听听他们都聊些什么。后来，他想还是去找理发师为好。结果，理发师又不在家。接着，他又想去找博士，但是突然明白了：“如果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以揭开湖边之谜，那就不要违反常规，不要引起朋友们的注意。”星期三，有人打电话，是个陌生的女人声音，约高纳晚上八点见面。高纳想：会不会是那个戴面具的姑娘呢？去还是不去呢？高纳准时赴约去了。但是，一直等到九点那姑娘也没有露面。星期四是大家和博士聚会的日子，高纳到咖啡馆一看，博士和一个会唱歌的朋友正在大谈音乐呢。后来，博士又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因此，高纳不敢贸然上前打扰博士。那天晚上高纳回到家里，一面啃着干面包，一面想着心事。他觉得每个人的孤独都是绝对的。狂欢节期间湖边上发生的事情，让他感到奇怪，决心弄个明白。几天后，高纳去找那个理发师朋友。人家告诉他：理发师因为害怕狐朋狗友的骚扰而逃走了。一天，高纳的一个朋友建议去找巫师塔沃亚达打听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大多数人不相信巫术。高纳

也不相信。可是一想到那个来电话的女人和湖边的事情，就决定去看看巫师。塔沃亚达告诉他可以继续调查湖边的事，也可以见一见那个女人。离开巫师那里的时候，高纳认识了巫师的女儿、演员克拉拉。从此二人开始交往：一起看电影，高纳看克拉拉排戏，散步。不久，高纳正式向克拉拉求爱了。这姑娘也爱上了高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巫师塔沃亚达同意了女儿的婚事并且送给他俩一幢房子。婚后的生活是甜蜜的，但是高纳仍然不能忘记狂欢节那三天里发生的许多怪事。1929 年来到了，汽车修理行业大发展，高纳从修理工变成了老板的合伙人。但是，他仍然不能忘记 1927 年那三天狂欢节里发生的事情，也一直没有忘记向博士学习，当个聪明、勇敢的人，因为这是他的“英雄梦”。1930 年狂欢节前夕，高纳又在赛马中赢了一大笔钱。他决定用这笔钱投入到调查之中，一定要把三年前狂欢节上发生的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邀请博士和其他朋友仍然像三年前一样重复走一次狂欢的路线。最后，他发现博士原来竟然是个“坏蛋”，是个“强盗”。三年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例如，酗酒，湖边遇到的姑娘，树林里的一夜都是博士安排的圈套。高纳心目中那个“聪明、勇敢”的形象被轰毁了。他为了证明自己有勇气面对命运的挑战，便与博士进行了决斗。结果，被刺身亡。《英雄梦》的主题思想旨在揭示“命运的力量”，尽管巫师死了，可是他的预测仍然要兑现。在主人公的生活里有两大互相矛盾的因素：不可选择的命运力量和可以选择的自我挣扎；与此同时，对外部世界的感觉与理性判断又往往是互相冲突的。在小说技巧方面，作品的叙述风格显得漫不经心，时而微笑，时而嘲讽，夹叙夹议，贯彻始终。此外，故意设置悬念，也是《英雄梦》的一大特

点，其目的在于制造阅读兴趣。总之，这是一部生动有趣的作品。

《对猪战争日记》的主人公名叫伊西多罗·比达尔（Isidoro Pidal），他还不到 60 岁就提前退休了。由于政府经常拖欠养老金，所以比达尔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只能靠儿子当勤杂工维持生计。他每天和几个老伙计打打牌，晒晒太阳，消磨时光。但是，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一群激进的小青年集合起来袭击老人，因为他们认为：老人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应该发动一场战争，消灭老人。于是，绑架、殴打和袭击老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比达尔对于自己的老伴一个接一个死去深感悲痛，同时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但是，有个名叫内利达的姑娘恰恰在这个时候爱上比达尔。二人沉醉于幸福和欢乐之中。特别是比达尔，他又一次焕发了青春的活力，一再坚持他不属于老人之列。然而，外面的世界却总是来打搅他的爱情生活：青年人搜查和围捕老人的行动范围在扩大，他们一旦抓住上年纪的人就直接送到公墓里去。一天，比达尔和内利达的爱巢也被惊动了：一个名叫法维尔的老朋友前来报告，青年搜查队已经来到这个小区，他们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内利达劝告比达尔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消灭老人的战争中，老人也拼命捍卫自己的生活权利。比达尔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老朋友，他觉得不能同内利达生活在一起，因为这姑娘还没有与她的未婚夫断交，这说明年轻人在一起更融洽些，他不应该充当“绊脚石”的角色。但实际上，“代沟”并不是绝对的，年轻人之间的分歧一旦激化起来并不次于同老年人的矛盾。一些年轻人开始反对另外一批激进的小伙子的野蛮行为：殴打和枪杀老人。于是，战争出现了停歇状态。这时，内利达找到了未婚夫，

说明了她已经爱上了比达尔。后者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感动，最后，她回到了内利达的怀抱中。《对猪战争日记》记录了所谓的“代沟”矛盾，实际上揭示的是人和人相处的准则问题：仇恨、斗争和残杀带来的是两败俱伤；爱情、理解和共处则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快乐。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是1969年，距离1966年6月28日三军司令发动政变刚刚过去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比奥伊·卡萨雷斯看到军事独裁政权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严格控制新闻、舆论工具，军警经常突击搜查和抓人，全国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作者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对猪战争日记》的暴力场面和恐怖气氛描写不能说与阿根廷当时的政治形势无关。

第四节 乌斯拉尔·彼特里的作品

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er Pietri）（1906~2001年2月26日）是委内瑞拉著名的作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出身于首都加拉加斯上层社会。1929年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1939年起进入政界，先后担任教育部长（1939~1941）、财政部长（1941）、教育法起草人（1940）、总统府秘书长（梅迪纳·安加里塔任总统时期：1941~1945）、内政部长和参议员。1945年10月18日民主行动党和青年军人发动政变，梅迪纳·安加里塔总统下台。乌斯拉尔·彼特里被捕入狱，后来被流放到了美国。1958年回国后，彼特里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抨击马尔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的独裁统治。这个独裁者1945年曾经参与推翻梅迪纳总统的政变，1946~1948年担任武装部

队总参谋长。1948年又参与推翻加列戈斯总统的政府，随后担任三巨头军事执政委员会成员兼国防部长。1953年4月19日开始独裁统治，在全国实行高压恐怖政策，取消宪法保障，解散政党，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与此同时，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出让石油开采权和铁矿开采权，全国大搞道路、基础公共设施建设，经济有了快速发展；但是，不重视农业生产，通货膨胀严重，官场腐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成风，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彼特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1958年，他被佩雷斯·希门内斯政权逮捕入狱。但是，全国爆发了武装起义、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独裁者逃亡到了多米尼加。1963年，彼特里成为总统候选人，同年成立了全国民主阵线。在学术方面，彼特里是委内瑞拉社会政治学院院士、语言学院院士、全国历史研究会理事、中央大学经济系创始人之一。

1931年乌斯拉尔·彼特里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红色长矛》（*Las lanzas coloradas*），主人公名叫波雷森达西奥·甘博斯，是个庄园的管事，早晨在床上听到有个奴隶在讲述玻利瓦尔的历险故事，立刻起床去抓那个奴隶。这是小说的开始。在全书的结尾处，这位管事病死在家中，没有能看到玻利瓦尔的解放大军胜利入城。这是小说的基本框架：玻利瓦尔的形象衬托着整个作品，但是这位英雄并不露面。故事是在残酷和血腥的战争气氛中展开的。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例如，写甘博斯傲慢、好战和残忍的性格；写美丽的姑娘伊内斯如何温柔和耽于幻想；写她哥哥费尔南多如何意志消沉；写英国人大卫如何热爱生活……作品中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但不是用传统方式表现

出来的。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真正主角是参加独立战争的愤怒群众。最后，每个人物的命运各有不同：伊内斯被大火烧伤，疯狂地四处寻找甘博斯报仇，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仇人。费尔南多没有去帮助妹妹，也没有去为新生的共和国战斗，也没有找甘博斯报仇，而是自甘堕落。由于作者着力描写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战争，而不是个别英雄，所以用不着英雄上场。但是，在战马嘶鸣中和刀光剑影的缝隙里，总是闪烁着英雄主义的光芒。作者有意把一切写得模糊而朦胧，但是强调心理活动的艺术价值。他极力追求印象主义的画面效果，因此使用了大量生动而鲜活的比喻，所以作品的美学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历史价值。

1947 年第二部长篇小说《黄金国之路》（*El camino de El Dorado*）问世，讲述了西班牙征服者洛佩·德·阿吉雷（*Lope de Aguirre*，约 1508 ~ 1561）的故事。这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 1544 年到达秘鲁，多次参加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活动以及征服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1560 年 9 月 26 日参加乌苏亚指挥的一次远征，他们的目的是要前往亚马孙河的源头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1561 年，在途中，阿吉雷杀死了乌苏亚及其继任人，夺取了指挥权。

他率队到达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来到了大西洋。一路上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害印第安人。1561 年 7 月占领马加里塔岛，宣布反对西班牙王室。后被西班牙人捕获并被处死。作者在讲述阿吉雷故事的同时，还对亚马孙河流域的风景进行了抒情的描写。

《独裁者的葬礼》（*Oficio de difuntos*）于 1976 年出版，讲述了独裁者佩莱斯的一生。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委内瑞拉历史上著名的独裁者胡安·维森特·戈麦斯（*Juan Vicente*

Gomez, 1857 ~ 1935) , 他先后于 1908 ~ 1915 年、1922 ~ 1929 年和 1931 ~ 1935 年三次执政。他的生父是西班牙人, 母亲是印第安人, 他是非婚生子。青年时经营农业和牧业, 是塔奇拉州的首富。1892 年因为支持一次地方暴乱而被流放到哥伦比亚。1899 年西普利亚诺·卡斯特罗率部队进攻首都加拉加斯胡安·维森特·戈麦斯随军前往, 后被西普利亚诺任命为首都联邦区行政长官。1900 年担任塔奇拉州州长。1904 年因镇压各地起义有功而升任共和国副总统。1902 ~ 1908 年担任陆军总司令。1908 年 12 月他趁总统去欧洲治病之机, 在美国政府支持下, 发动政变并取得了成功, 自封为临时总统。1910 年当选为正式总统。以后, 又任两届总统。不任总统期间, 仍然控制军权, 操纵政治, 实行独裁统治长达 27 年之久。他的统治“诀窍”是: 拉帮结伙, 任人惟亲, 高薪优待军官, 军队成为稳定政权的最重要力量; 全国组成严密的特务、警察网络, 坚决镇压一切反对派的活动和声音, 严格控制新闻、出版、电台等部门; 压制地方势力的抬头。与此同时, 他的家族和亲信大量侵吞国有土地, 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委内瑞拉发现石油以后, 他对英国和美国资本实行开放政策, 大量租让土地, 因而使得委内瑞拉很快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但是, 老百姓没有得到丝毫利益, 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有压迫就有反抗。1928 年全国发生大规模学生运动。1929 年拉蒙·德尔卡多·查尔波特 (Ramon Delgado Chalbac) 将军在特立尼达岛上组织队伍远征委内瑞拉, 动摇了独裁者的统治。1935 年 12 月胡安·维森特·戈麦斯逝世。从生活中的戈麦斯到小说中的佩莱斯, 乌斯拉尔·彼特里进行了艺术加工。首先, 他设计了一个便于叙述故事的人物——阿尔贝

托·索拉纳神甫。这位神甫本来是个普通的教士，年轻时因为与参加推翻佩莱斯统治活动的人接触而被捕并且蹲了 10 年监狱。作品用倒叙的方式，首先从佩蒂斯逝世写起：“他是经过长时间弥留后于夜间死在病榻上的。”军政府命令阿尔贝托·索拉纳神甫起草悼亡弥撒经并且还要他在葬礼上宣读。实际上，索拉纳扮演的是替罪羊的角色。面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独裁统治的呼声，你总不能站在他的灵柩前为独裁者大唱赞歌吧，可是你也不能当着许多军政大员的面臭骂死者啊！索拉纳真是左右为难。何况他那次入狱以后，还多亏了佩莱斯将军的命令才获得释放的，就是从感恩戴德的角度说，他也不能批评将军啊！可是如果赞美了将军的“伟大功绩”，那肯定是要遭到人民的唾骂的。索拉纳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由此也诱发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佩莱斯本来是个普通的小庄园主，一个偶然的让他结识了一名卡梅罗·普拉托的军官。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终成莫逆之交。佩莱斯和普拉托经常议论天下大事，他俩觉得可以趁混乱的局势揭竿而起。于是，二人纠集了一群乌合之众发动了起义。不料，出师不利，队伍被政府军击溃。二人只好流亡国外。不久，国内局势再次发生动荡，佩莱斯和普拉托再次拉起一支“起义军”，向首都进攻。一路上。许多人参加到“起义军”中来，因为老百姓对政府的极端腐败和倒行逆施已经深恶痛绝。在连连挫败政府军的反扑之后，“起义军”攻占了首都，夺取了政权。普拉托当上了总统。佩莱斯也因屡建战功被任命为副总统。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定和佩莱斯势力的膨胀，他和总统之间的摩擦、倾轧和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表面化。不久，总统普拉托因劳碌过度，加上沉湎于酒色，身患重病，不得不去欧洲求医。临行前，他只好

把大权交给副总统佩莱斯，与此同时，又严密地布置了一大批亲信耳目监视着佩莱斯的一举一动。总统走后，佩莱斯一面乔装出谨慎小心、忠于总统的样子，一面悄悄地做夺权的准备工作。终于，机会来了：有谣言说总统派人来暗杀佩莱斯。以此为借口，佩莱斯将军突然召集内阁成员开会，一举逮捕了普拉托的亲信，同时宣布新内阁成立，“宫廷政变”没有使用暴力，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上台以后，佩莱斯对军政界元老们的意见做出言听计从的样子，同时紧锣密鼓地营造声势，拉帮结伙，树立绝对领导权威。随后，他密切注视着反对派的动向，坚决压制一切持不同政见的声音；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提倡“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鼓励竞争，分化群众，总之，他的目标就是建立长治久安的“佩莱斯王朝”。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个“天”就是自然规律：正当佩莱斯进入他统治的“全盛时期”的时候，已经75岁了。这位“至高无上者”重病缠身，体力衰竭，无论怎样恋栈，也只好见上帝去了。全书以索拉纳神甫的回忆和思考结束了叙述：“人们将要埋葬的已经不光是佩莱斯一个人，人们将要埋葬整个佩莱斯时代，如同古代的人们埋葬国王一样。当然有人会做殉葬品，比如，宫女、侍从、奴隶和牲畜。”

《独裁者的葬礼》在塑造和刻划佩莱斯这个人物身上有独到之处。作者紧紧抓住了佩莱斯的“土气”大做文章。这个普通的小庄园主在农村时就是个“大家长”，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指挥一切，因为他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深谙权力的重要性；他早就明白“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的道理。为了夺权和掌权，他可以同老百姓一道干农活，放牧牲口；起义以后，往往身先士卒，不怕牺牲；掌握政权以后，他非常

注意内部是不是会有政敌出现，因此不遗余力地清除身边的“定时炸弹”。他很清楚：“政权的核心是军权”，因此无论是否在总统的宝座上，他总是要担任三军总司令的职务。作者非常注意描写这位独裁者的心理活动，尤其是他的孤独感和落寞的心情。由于他不信任别人，所以处处感到不自由，他经常说：“我是惟一真正的囚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与叙述人民群众的“集体觉悟”过程分离开来。老百姓从相信和依赖“救世主”到明白了“自己救自己”需要一个认识社会和自己能力的过程。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摆脱苦难，过上真正人的生活。这是 20 世纪一百年来，拉丁美洲人民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的基本要求。以佩莱斯造反为例，许多农民跟着他走，就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但是，在他稳定政权之后，首先是他背叛了人民，权力的集中导致了官场的腐败，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治安的混乱，贫富悬殊造成了严重的阶级对立，人民就不再拥护他了，不是人民背叛了他和他的政党，而是他和他的政党背叛了起义时对人民许下的诺言；此外，执政党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他末日的到来。乌斯拉尔·彼特里深刻地挖掘出滋生独裁统治的土壤，也揭示出拉丁美洲独裁统治难以持久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因此他的《独裁者的葬礼》在 20 世纪拉丁美洲反独裁题材的小说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创作手法上说，这部作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方法，作者客观、忠实地介绍了佩莱斯复杂的一生，对这个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都有详细的描写。尤其有必要指出的是，他于 1929 年在巴黎接触过超现实主义运动，会晤过拉丁美洲著名作家卡彭铁尔和阿斯图里亚斯，交换过对拉丁美洲“神奇和魔幻

现实”的看法。是他经过近 20 年的思考，第一个明确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思想，在《委内瑞拉的文学与人》（1948）中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但是，他并不拘泥于这一理论，而是根据生活素材的内容决定写作手法。总之，作为反映 20 世纪初到 30 年代委内瑞拉社会真实面貌的作品，《独裁者的葬礼》的确是一部上乘之作，因此在 20 世纪的拉丁美洲小说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第五节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

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Augusto Roa Bastos, 1917~ ）是巴拉圭诗人、小说家、记者、散文家、电影编剧和戏剧家，当代拉丁美洲最有国际影响的作家之一。1917 年 6 月 13 日出生在首都亚松森一个糖业工人家庭里。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巴拉圭内地农村的一个名叫伊图尔贝（Iturbe）小镇上度过的。后来，伊图尔贝便屡屡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由于家境贫困，他没有机会读书。但是，他借助一个叔叔的藏书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16 岁时应征入伍，参加过巴拉圭—玻利维亚之间的“厦谷战争”，为后来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人子》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38 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但是影响不大。1942 年又一部诗集问世，题目是：《歌唱黎明的夜鹰》（El ruiseñor de la aurora y otros poemas）。40 年代巴拉圭出现了诗歌改革运动，罗亚·巴斯托斯是主要发起人之一。由于 1947 年爆发了内战，他被迫流亡国外 40 多年。他的全部小说都是在阿根廷创作和

出版的。90年代以后，他移居到法国生活，在图卢兹大学教授文学。他是做为诗人踏上文学之路的，但是主要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方面。他的许多小说获得西方文坛的认可和奖励，被翻译成几国文字出版。他的代表作《人子》和《我，至高无上者》被搬上了银幕。

罗亚·巴斯托斯的小说创作是从1941年开始的：他的一个短篇小说参加了文学征文比赛，结果获得奖励，从此引发了创作小说的兴趣。1953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雷落草丛》（*El trueno entre las hojas*），其中收集了十六篇小说。内容主要描写巴拉圭底层的人们的苦难生活，尤其是表现了巴拉圭内地那些遭受恶势力和恶劣自然环境双重压迫下的农民、混血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悲惨处境。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同大庄园主、政府、警察进行艰苦的斗争，例如，在《沼泽》里，一个团的正规部队把造反的群众包围在沼泽边上，最后在机枪和火炮的逼迫下，全部淹死在泥塘里。又如，在《皮鲁利》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名叫皮鲁利的男孩的故事：小小年纪的他，不得不站在榨机跟前往轧辊里塞甘蔗。可是这种枯燥、单调的工作常常让他走神。正当他在想那次用一条死大蟒吓唬列车上的旅客时，便忘记了填料。这时，他母亲来了，气急之下，这个顽皮的孩子用一只空衣袖欺骗妈妈。母亲以为儿子的胳膊被机器“咬”住了，便焦急地大喊起来：“上帝啊！”皮鲁利连忙露出完好无损的胳膊给母亲看。结果，他不但挨了母亲一通臭骂，脑袋上还挨了妈妈一棍子。“那孩子哼都没有哼一声就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她的脚边。”如今，这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见证了。

1960年罗亚·巴斯托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子》

(Hijo del hombre) 问世，当年即获得阿根廷罗萨达出版社组织的长篇小说国际征文一等奖。这部反映巴拉圭人民苦难生活的史诗从何塞·卡斯帕尔·罗德里戈斯·德·弗朗西亚的独裁统治（1814~1840）开始，直到厦谷战争（1932~1935）结束为止。小说一开篇，国家元首弗朗西亚就以执法严厉的形象出现。他手下有个忠实的仆人名叫皮拉尔。这位老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地服侍元首。可是老人有个儿子名叫马卡里奥非常调皮。有一次这个顽童好奇地拿起一枚金币，谁知这是元首在考验手下的仆人是否手脚干净，事先已经把金币烤得滚烫。马卡里奥一拿到手里，便发出一股烧焦的肉味。元首派人抓到了马卡里奥，命令皮拉尔亲自拷打儿子。皮拉尔含着眼泪打了儿子 50 木棍。不久，皮拉尔为了解气踢了元首的爱犬几脚。元首闻讯大怒，把皮拉尔痛打一顿后关入监狱，最后跟其他反叛者一道处死了。在巴拉圭历史上，弗朗西亚其人是个获得了神学博士的知识分子。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爆发以后，他逐渐登上了巴拉圭的政治舞台。1814年 10 月被推举为最高独裁者，原定任期 5 年，但是到了 1816 年 6 月改为终身元首。在他执政期间，一人独揽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依赖私人卫队和军警特务镇压和控制反对派的活动，严厉打击地方势力派的抬头，削弱教会力量，关闭修道院，大力发展初级教育，积极推动农业建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他统治期间，巴拉圭成为拉丁美洲惟一自给自足的国家。1840 年 9 月去世。数年后，他的反对者们把他的尸体从陵墓中挖出，扔进巴拉圭河中。厦谷战争则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因为厦谷地区北部的领土争端而进行的战争。结果双方死亡人数高达 10 万，财产损失巨大，但双方的目的均未达到。这场战争对两

国的政治、社会都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人子》全书分为九章，每章都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一章通过马卡里奥老爹和他的外甥加斯帕尔·莫拉的故事，表现了伊图尔贝的村民为维护自己的信仰而进行的斗争。第二章讲述了阿列克赛·杜布洛夫斯基的故事。这是个俄国移民，职业是医生。他来到伊图尔贝镇以后受到镇长的怀疑，后来治疗好了一些病人方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其实，他是来这里发财的，而不是什么革命者。但是通过他的故事，反映了政府对反对派的高度警惕。《人子》都是通过“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进行的，所以在第三章里讲述“我”去首都上学的事情，其中着重叙述了列车到达萨普开车站“我”高兴的心情，因为“我”要亲眼看看这个名声响亮的地方。萨普开车站之所以闻名遐迩，是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战斗：1912年3月农民革命军集会在这里，准备向首都进军。不料有个叛徒向政府告密。于是政府军开来一辆装有炸药的火车，炸毁了革命军的列车。“直到现在，修路工人还不断从坑里挖出死人骨头……”第四章讲述有个名叫塔库鲁一普库的农场，那里专门种植马黛茶。那里的管家和工头不仅残酷剥削工人，还凌辱他们的女人，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整个农场由警犬和武装卫队看守。还没有哪个工人能够从那里进出。1912年那次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农场利用起义者的逃亡和老百姓的迁徙，大量招收了工人。其中有一对年轻夫妻，丈夫名叫卡西亚诺·哈拉，妻子名叫纳蒂维达。二人刚刚结婚不久就被打工的潮流卷进了塔库鲁一普库农场了。卡西亚诺一踏上去农场的路就发现他们这次是落入虎口了。果然，农场主、工头和打手们对待工人的野蛮暴行证明了卡西亚诺的判断。夫妻俩勉强忍耐了一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

出这座地狱。特别是当纳蒂维达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以后，农场的保安头子恰帕罗看上了这个年轻、美貌的媳妇。他坚持要用 300 块钱买下这个女人。卡西亚诺当然不肯。夫妻二人最后决定就是拼死也要逃走。于是，一面计议逃跑的细节，一面等待时机。四个月过去了，二人上路了。但是，纳蒂维达由于紧张和劳累而早产了：一个小生命提前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世界。三人只好回农场去。不久，机会来了。三人千方百计地躲开了追捕，在一位赶车人的帮助下终于脱离了苦海。第五章讲述“我”在军事学校里参加了一次暴动，失败后被政府流放到萨普开地区来。他在一名土著向导的陪伴下先是乘坐卡车，随后步行，把一路上耳闻目睹的事件记录下来，例如，1912 年那次农民起义失败的经过。又如，萨普开车站上有辆车厢如何被卡西亚诺夫妇通过木轨悄悄推到森林里去。最后，“我”在森林里遇到了事先等着“我”的游击队。队长告诉“我”：希望“我”留下来做教官。第六章讲述了“我”的身份和真实姓名：米格尔·维拉上尉。在一次酒醉之后，维拉上尉吐出了游击队的秘密。驻在这个镇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马雷科大尉。他希望通过镇压游击队而得到晋升，因此拼命搜捕逃跑的游击队员。但是，他没有能够得逞，反而受到游击队的捉弄。第七章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我”的遭遇：这时是 1932 年 1 月 1 日，玻利维亚军队不断在厦谷地区进犯，可是“我”因为与游击队“勾结”而被关进了军事集中营。由于边境形式越来越紧张，集中营里的大部分“犯人”又都是军人，所以大家经常讨论这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及其前景。有个因为领导学生游行而被捕的左派领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不仅要为本国庄园主的地契和股票打仗，而且还要为外国石油公司的地契和股票打仗。”

这就是厦谷战争的性质！“我”在8月3日中的日记写道：“国家颁布了全民动员令。”“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在9月的几篇日记里，“我”详细的记录了上战场以后与玻利维亚军队激烈战斗的情况。“我”在这一章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我们的确是在活受罪：活着比死还要痛苦。最好是一下子死去……可是，死是多么不容易呀！”因为威胁他们生命的不仅有敌军，而且还有干渴。没有水，他们渴得要死。于是，第八章就讲述了一个名叫克里斯托瓦尔的军曹和一名女护士——萨路易，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军的炮火，终于把水车开到了维拉上尉指挥的阵地上。但是，萨路易最后还是牺牲了。第九章讲述“我”经过三年战火的洗礼又回到了家乡。“我”听到了镇长是如何横行霸道、欺压乡里的。不久，几个复员军人就把镇长处死了。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我认为，这些故事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本身的见证作用。也许，它的发表有助于了解一个人和美洲一个国家的人民。他们曾受到许多人的诽谤；他们在几个世纪里，不遗余力地反对吸血鬼的压迫和侮辱，捍卫先烈们的理想……”

1974年《我，至高无上者》问世，这部作品在罗亚·巴斯托斯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是个重要标志，由于这部长篇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于1988年获得巴西颁发的拉丁美洲文学纪念奖、1989年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塞万提斯文学奖和1990年巴拉圭民族功勋奖章。这部作品出版的同一年，古巴著名作家卡彭铁尔的长篇小说《使用手段》（*El recurso del método*）也问世了，同样是揭露独裁暴君统治的作品。1975年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出色地刻画了暴君尼卡诺尔的形

象。三个大作家几乎是同时抓住了拉丁美洲独裁专制这一社会问题，因而引起评论界和读书界的极大关注。《我，至高无上者》的特色在于：作者描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即前面介绍的何塞·卡斯帕尔·罗德里格斯·德·弗朗西亚。这个人物在《人子》中已经出现，但更多地是说明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而在《我，至高无上者》里，他上升为主角。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弗朗西亚亲自动笔或者口授给秘书帕蒂尼奥的记录，书中称这些记录为“历史文献”。其中还穿插着二人的谈话。

此外，还有一位无所不知的叙事者出面做解释和介绍工作。再有，就是一位“编纂者”，他的任务是给正文做注释和补充。小说一开始是一张讽刺性的匿名传单：“我，共和国的最高独裁者，特别命令：在我死后，我的尸体必须身首异处，要将我的头颅插在长矛之上，在共和国广场上暴晒三日，届时必须用钟声号召百姓前往观看。至于我手下的全体军政要员，一律要受绞刑。他们的尸体要埋葬在郊外牧场，不得安置任何纪念性标志或者十字架。三日之后，我的遗体必须火化，骨灰抛入巴拉圭河中……”元首一看到这张传单，大为震怒，连忙召集心腹分析：传单的作者是谁？有什么政治背景？有无群众支持？于是，作品围绕一系列问题逐一展示这位独裁者的复杂心态：时而猜测有哪些人是自己的政敌，时而怀疑身边有无“奸细”；时而感到恐惧，时而感到悲哀；时而忧心忡忡，时而焦躁愤怒……特别是在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以后，由于脑震荡，他感觉神情恍惚，出现了幻觉和复视现象。作者巧妙地利用他病态的心理，创造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元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至高无上者”，故意让二者形成对峙。“我”表现独裁者的色厉内

在和害怕群众的心理。“至高无上者”则刻画元首刚愎自用、自吹自擂、心黑手狠和武断专横的嘴脸。弗朗西亚并非无能之辈，他是凭着聪明才智和善于看风使舵登上元首宝座的。在他的统治下，巴拉圭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的果实主要落到了外国资本家、本国大庄园主和有权、有势力的集团手中。在他的统治下，巴拉圭坚决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作者客观而公正地肯定了弗朗西亚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作者丝毫不掩饰巴拉圭在其独裁统治下的严重问题：官场贪污腐败，贫富日益悬殊，工人和穷苦农民身受压迫和剥削，底层的人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特别是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崩溃的边缘：要么追求享乐，要么萎靡不振；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焦虑不安。总之，《我，至高无上者》勾勒出一幅从 1811 年 5 月 14 日亚松森市民起义，1813 年 10 月 13 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巴拉圭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罗亚·巴斯托斯强调这个“现实的画面”不是他创作的，他仅仅是个“编辑”，他只是希望读者看到巴拉圭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的，特别是了解一下 70 年代巴拉圭社会现实的“真面貌”。因此，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还特意在书后附上一份“参考书目”——，以便恢复弗朗西亚时代的生活场景。这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使得作品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在《人子》还是在《我，至高无上者》中，作者都提到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问题。罗亚·巴斯托斯是赞成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即：人民大众的“最终解放”只能通过“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道路，其手段可以是武装斗争的形式，例如《人子》中的游

击战争。但是，与此同时，武装斗争更需要一种牺牲精神，即基督为拯救世人而牺牲自己的精神，也就是书中代表“人子”的加斯帕尔·莫拉（Gaspar Mora）。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切·格瓦拉 1966 年进入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的事迹，尤其是 1967 年 10 月格瓦拉牺牲以后在拉丁美洲引起的强烈反响。《人子》是 1960 年出版的，因此可以说这部作品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实际上，格瓦拉就是一位伟大的“人子”、人间的基督，他用革命行动而不是用口号证明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此外，60 年代中期“解放神学”理论的提出，也可以证明罗亚·巴斯托斯思想的超前性。“解放神学”是拉丁美洲一种激进的天主教神学理论。秘鲁青年神学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errez, 1928 ~ ）于 1964 年在巴西一次神学研讨会上提出：从拉丁美洲贫困、落后的现实出发去探讨拯救穷人和人类解放的关系，而不是用宗教教义解释现实。他认为：改造社会与传播福音应该结合起来，拉丁美洲只有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发展，教会不能回避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为，通过暴力手段使社会得到解放也是可以接受的。“解放神学”的理论在 1968 年第二次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上占据了上风，从而加大了教会对社会改革的参与程度。但是，到了 1979 年这种理论受到教会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总之，无论格瓦拉的革命行动还是“解放神学”的理论，都可以充分证明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在客观回顾历史、准确把握现实的基础上，为拉丁美洲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非常有预见性的一些想法，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93 年长篇小说《检查官》（El fiscal）问世。作者在书中说道：“这是巴拉圭痛苦的三部曲的第三部，前两部就

是《人子》和《我，至高无上者》。”主人公是侨居在法国的一个巴拉圭的流亡者，即作品中的“我”。“我”要回国去暗杀当时的独裁者阿尔弗莱多·斯特罗斯纳，因为这个独裁者自 1954 年借助军事政变上台以后实行一党专政，通过军队和警察镇压反对派的活动，公开推崇纳粹主义，坚决取缔共产党，迫害一切持不同政见者。使得一百多万人流亡国外（当时全国人口约 400 万）；严格限制新闻、出版、言论、结社自由，禁止上街示威游行；在他执政的 35 年里，多次宣布全国戒严令。但是，他也非常重视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特别是加强了与巴西、阿根廷的经济、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了边境地区的水利资源，成功地修建了大型的伊泰普水电站，使得国民收入有了较大的增加。但是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人是有尊严的、有思想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丝毫不下于物质生活，因此人民也要维护做人的尊严和独立、自由思想的权利。这就是《检察官》要开掘的主题思想，同时也是“我”追求的目标：搬掉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暴君，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我”有意回忆了巴拉圭战争中牺牲的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总统（1862~1870 年执政）的故事，目的是编写一个关于这位总统受难的电影剧本。“我”认为洛佩斯总统是个热情而真诚的爱国者，也深深地为总统和他的爱尔兰情妇林奇夫人的恋情所感动。此外，让“我”感到愤怒的是，在巴拉圭战争中，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联合起来欺负他的祖国。在书中，他引用了英国驻巴西领事、著名的探险家弗朗西斯·理查德·伯顿（Francis Richard Burton, 1821~1890）撰写的大量文章，同时提出了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我”还通过洛

佩斯总统军中的主教、军事法庭的检察官菲德尔·玛伊斯神甫（el padre Fidel Maiz）之口，认定洛佩斯总统是“巴拉圭的基督”，说“他的血白流了，并没有能够拯救巴拉圭”。这是“我”在编写电影剧本时引起的回忆和思考。与此同时，“我”还在时时怀念祖国的一草一木，时时关心巴拉圭局势的变化，经常和女友希梅娜（Jimena）讨论暗杀巴拉圭那时的独裁者斯特罗斯纳总统的方案是不是可行。这个“我”名叫菲力斯·莫拉尔（Felix Moral），他坚持要回国暗杀独裁者。1987年9月1日他以参加巴拉圭作家暨知识分子代表大会正式代表的身份入境，但是两天以后就失踪了。原来国家安全部门的特工一直在跟踪他，现在机会来了，便决定把他秘密逮捕。希梅娜由于在法国出了车祸、腿部打上了石膏而没有同行。但是，当菲力斯·莫拉尔的好友、法国人科罗威斯·德·拉尔撒克闻讯赶到巴拉圭时，特务再三恐吓他：“不得营救菲力斯，因为他与国际恐怖组织勾结阴谋暗杀我国元首！”科罗威斯急忙通知希梅娜。她不等腿伤痊愈就挣扎着来到了巴拉圭。这时，情况更加严重了：接受办理此案的律师也打退堂鼓了，因为他也受到了特务的恐吓。希梅娜这时设法结识了安全局的一个上校，他名叫佩德罗·阿巴特·奥罗（Pedro Abad Oro）。这是个既好色又贪财的家伙。希梅娜利用他的弱点，到监狱里看望了菲力斯·莫拉尔。她的爱人已经被刑讯拷打得遍体鳞伤，成了残废。希梅娜强烈要求佩德罗上校立刻送菲力斯去医院治疗。随后，她又赶到作家和知识分子代表大会上，向各位代表散发了菲力斯在狱中状况的报告，呼吁代表们向政府提出释放菲力斯的要求。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没有响应，因为他们都是“御用文人”，个个都是独裁者的驯服工具。相反

地，两天后，他们在各大报纸上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政府镇压恐怖活动和一切颠覆性组织！希梅娜冒着生命危险，不顾种种威胁，终于让佩德罗上校把菲力斯转移到了武警医院。但是，她有一种感觉：这是当局在利用给菲力斯治疗的机会，宣传政府是如何讲究人道主义的。因为在把菲力斯·莫拉转移到医院的时候，许多记者应声而至。希梅娜一刻不离地守护在爱人身旁，全然不顾警卫和医护人员的敌视和骚扰。5个月过去了，菲力斯的健康有所恢复。希梅娜于是决心逃走。她考虑再三，觉得只有一种逃走的可能：设法混入3月1日人们去给索拉诺·洛佩斯陵墓进香的队伍中，到达边境地区后，再潜入巴西境内。她知道这个计划的成功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但是也要试一试。到了2月26日夜里，希梅娜买通了两个护士，用锉刀锉开了菲力斯的脚镣。接着三人穿着白大褂把菲力斯抬到担架车上，然后装进救护车，逃离了医院。她谢了两个护士，然后亲自开着救护车来到事先约好的一艘客轮上。轮船把他和她一直带到了进香的地方。二人艰难地混入了人群，然后慢慢靠近举行仪式的中心。谁知安全局的佩德罗·阿巴特·奥罗上校早就在那里“恭候”他俩了。原来这个狗特务从始至终就在监视和跟踪希梅娜的一举一动。上校只是在选择杀害菲力斯的时机罢了。现在机会来了：“罪”犯在越狱中被乱枪打死了。希梅娜被带回首都接受审判。结果，她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仅仅过了两年的时间，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斯特罗斯纳独裁政权。希梅娜被释放出狱。全书在希梅娜如此的感触中结束：“无论仇恨还是报复已经都不能改正历史进程中的这种错觉了。菲力斯就是这类错觉的牺牲品。让我们永远怀念他吧。”

1995 和 1996 年罗亚·巴斯托斯又有两部长篇小说问世，一篇是《反生命》（*Contravida*），另外一篇是《徐夫人》（*Madame Sui*）二者的内容有着紧密的联系。《反生命》一开始讲述的是一个政治犯是如何在一场大屠杀中侥幸逃脱的。后来，他经过乔装打扮混上了一列火车，设法回到了他童年生活过的故乡。最后，他在那里等待着生命的终结。《徐夫人》讲述了一位年轻、美貌又善良的交际花是如何被巴拉圭一个有着德国血统的独裁者，即斯特罗斯纳总统（执政 35 年：1954~1989 年）遗弃的故事。这个独裁者不仅自己荒淫无耻，而且把整个上层社会弄得乌烟瘴气：道德沦丧，奢靡之风甚嚣尘上。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是徐夫人的情人。尽管二人悄悄相爱，最后还是被总统的特工发现了。斯特罗斯纳闻讯大怒，立刻派人杀害那个男子。这两部作品的可读性很强，因为情节非常曲折，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更因为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巴拉圭人民的苦难生活：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精神上的压抑程度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第六节 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的作品

米盖尔·奥特罗·西尔瓦（*Miguel Otero Silva*, 1908~1985）是委内瑞拉著名作家。中学时阅读过大量欧洲先锋派文学的作品。1930~1936 年由于反对独裁统治而被迫流亡到欧洲生活。在那里从事新闻工作。1937 年回国后，再度被政府流放到墨西哥。他从那里去美国考察；随后返回南美洲生活。1937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水与河床》（*Agua y cauce*）。1939 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热病》

(Fiebre) . 1954 年第二部长篇小说《死屋》 (Casas muertas) 问世, 次年即获得委内瑞拉全国文学奖以及阿里斯迪德斯·罗哈斯 (Aristides Rojas) 文学奖。《一号办公室》 (Oficina número 1) 可以说是《死屋》的续篇, 发表于 1961 年。《奥诺里奥之死》 (La muerte de Honorio) 出版于 1963 年, 它记录了委内瑞拉 1945~1958 年国内混乱、动荡和可怕的局势, 忠实地描写了人们为推翻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内斯将军 (Marcos Pérez Jiménez) 的专制统治而进行的斗争。1970 年他又创作了一部反映革命游击活动的长篇小说《我想哭时我不哭》 (Cuando quiero llorar no lloro), 揭示了一代青年大学生的政治追求。1979 年根据真实的历史人物西班牙征服者洛佩·德·阿吉雷 (Lope de Aguirre) 生平, 他创作了长篇小说《自由王子洛佩·德·阿吉雷》 (Lope de Aguirre, príncipe de la libertad) . 1984 年发表了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石头就是基督》 (La piedra que era Cristo) . 1985 年米盖尔·奥特罗·席尔瓦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逝世。

《死屋》发表于 1955 年, 叙述的故事发生在委内瑞拉, 时间是 20 世纪 20~30 年代, 当时正是胡安·维森特·戈麦斯将军独裁专制时期。这个暴君后来又在《独裁者的葬礼》 (1976) 中受到著名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的口诛笔伐。这本身可以说明独裁统治给委内瑞拉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精神创伤。《死屋》一开篇就描写了死亡在威胁着奥尔蒂斯镇的人们: 年轻力壮的塞瓦斯蒂安死了! “如果连他还不能免于一死, 那么其他的居民就只好老老实实地等死了。”原因是一场可怕的瘟疫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塞瓦斯蒂安的未婚妻卡门·罗莎 (Carmen Rosa) 在母亲和妹妹的搀扶

下艰难地走在送葬的队伍中。她的眼泪早已经哭干了，现在她机械地走向墓地。未婚夫离开了人间，卡门·罗莎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在她周围的一切遭到毁灭的时候，她却以顽强的精神进行建设。”作品通过倒叙的手法回忆了奥尔蒂斯镇的兴衰变化：这个小镇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繁荣时期，到了卡门·罗莎降生以后，镇子开始衰败了。到了她会走路时，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些废弃的房屋。当她像男孩一样上房、爬树、下河戏水的时候，倒塌的房子就越来越多了，如今父亲和未婚夫先后被瘟疫夺去了生命，面对着即将毁灭的镇子，必须做出抉择！她克制住心头的悲痛，第一个提出：迁居！把家搬到东部去。决心一下，她立刻采取行动：打点行李，租来汽车，准备上路。可是她的母亲却有些故土难离，她对女儿说：“孩子，咱们到东部去干什么？咱们生在这里，也要死在这里，就跟你父亲一样，跟塞瓦斯蒂安一样，跟大家一样。咱们生来命苦，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卡门·罗莎回答得非常坚决：“妈妈，咱们不能服从命运的安排，至少我不服从！”她要到新开发的油田上闯一闯。这个决心是有根据的：镇上留下的人，大部分病倒了。健康人惟一的任務就是看护病人和埋葬死人。终归不能坐以待毙吧！卡门·罗莎告别了为数很少的几户邻居，告别了荒凉的镇子：“无论街上，还是倒塌的房子里，都见不到一个人影，人们仿佛害怕灾难的降临，慑于上帝的诅咒，都逃走了。”卡门妈妈感叹地说：“我的上帝，真可怕啊！”卡车加快了速度，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奥尔蒂斯镇。全书到此结束。但是，从塞瓦斯蒂安死去到卡门迁居，时间仅仅过去了八九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例如，在首都闹学潮的大学生们有的被军警抓了起来，在押送他们

到外地的途中需要经过奥尔蒂斯镇。当卡车来到镇上时，居民们纷纷跑出来围观和打听情况。原来这些被捕的学生是被送往劳改营的。他们有的为学生感到不平，有的愤怒，有的难过。塞瓦斯蒂安甚至打算组织力量去营救学生。当卡车离开镇子的时候，学生谈的不是自己的不幸，“而是奥尔蒂斯镇及其居民遭到的不幸。”“多么可怕的村庄！里面到处是鬼魂！”“这个镇子像是被土匪抢劫过一样！”“是瘟疫毁灭了这个镇子。”“这些可怜的人，他们是多么善良啊！”老百姓关心大学生，大学生关心老百姓。是被压迫的共同处境使得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的。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独裁专制政权。作者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个道理，作品中还安排了一个代表镇上恶势力的角色——库维略斯上校。这个家伙在总统面前失宠后被贬到奥尔蒂斯地区当地方长官。他强抢民女，横行霸道，滥施淫威，俨然一个“小霸王”。作者深刻地指出：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里，中央有“暴君”，地方上必定有这种“小霸王”，因为这是一条有机的“生物链”。这种少数人不仅控制着多数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的制度，如果不从根本上进行变革，那国家肯定会长期处于贫穷、落后、封闭、愚昧之中。从艺术形式方面看《死屋》设置了一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他使用的是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故事情节的发展仅在八九个星期的时间里，即：从塞瓦斯蒂安的逝世开始到卡门·罗莎迁出镇子为止。但这个时间结构不是单一直线的，而是由在回忆往事和讲述现在发生的事情过程中组成的。这是一种过去与现在交替进行叙述的结构。此外，作品虽然写的是瘟疫和废墟、痛苦和灾难，但是丝毫没有忽略劳动人民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反抗压迫，与死亡搏斗。作品中时时闪烁着充满生

命活力的亮色，例如这样的描写：“有一种植物的长叶子上有红色和褐色的脉络；另外一种圆叶呈齿轮状，颜色发白，犹如乳白色的玻璃；还有一种细窄、弯曲的叶子，形似喷泉。其中，巴丝瓜头戴粉红火花冠，石竹花鲜艳夺目，番石榴的果实为免受鸟类的侵害，已经戴上了小布袋。总之，所有这些植物都用自己的美丽、勃勃生机和绿色的生命来感谢卡门·罗莎的劳动。”

《一号办公室》发表于 1961 年，可以说是《死屋》的续篇，因为有些人物继续出现在这个“办公室”里，例如，卡门·罗莎、堂娜·卡尔梅里达、奥雷卡里奥等。但是，作品的主题已经转向美国石油公司对委内瑞拉油田的掠夺性开发以及石油工人的生活问题上了。小说一开篇就讲述卡门·罗莎和她的母亲堂娜·卡尔梅里达如何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来到了东部准备开发的油田上。那里有个美国石油公司的经理和地质学家，名叫泰勒，他建议卡门开一家杂货店。卡门同意了这个建议，她在一些好心工人的帮助下盖成了一间简陋的店铺。新生活又开始了。泰勒是个铁腕式的人物，既懂业务也善于管理。作品中三番五次地描写他是如何解雇工人的，例如，有一次在测量油田面积时，他时时在观察干活的人们中有没有人在偷懒。突然，他发现有个伐木工人在发呆。他立刻说道：“你被解雇了。”并且马上掏出 36 块钱和 3 块银币付给那个工人，请他立即回家。紧张的劳动换来的是开发出来的滚滚石油。而公司的股东们从中捞到了巨额利润，因此可以过上骄奢淫逸的生活。与此同时，油田上居民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泥巴茅屋开始变成了砖石结构的房子；工棚周围出现了一排排酒吧、饭馆、药房、百货店、五金商店……随后是汽车房、家用电器、轮胎等大型商店；当

然也少不了赌场、妓院、夜总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期”变化。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剥削和压迫使得“底层的人们”逐渐走向觉悟；附庸在大垄断资产阶级的中层官僚和工程技术人员走向分化；跨国集团的董事们则跟国内的统治阶级上层沆瀣一气，处心积虑地掠夺委内瑞拉的财富，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加强专制制度。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中，卡门·罗莎也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有的真心爱慕她和关心她，如，革命家马提亚斯·卡尔瓦哈尔；也有的别有用心，企图侮辱她。总之，她是油田变化的见证者之一。全书也以她在夜间散步看到老油井一号办公室的旧地为结束：“在一盏灯光下，有四个孩子在玩耍：一个是光着脚的小黑孩，一个是美国钻井工人的金发男孩，一个是开洗衣房的中国人的小孩，一个是委内瑞拉男孩卢卡斯·达德奥。他们在玩打仗的游戏。四个孩子都是在这个镇子里诞生的，他们为自己的出生地自豪。”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新一代是有国际性的，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战争亦或和平和发展？

《一号办公室》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一、善于塑造人物性格：作者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像卡门·罗莎这样的人物，通过他（她）们的亲身经历来描绘委内瑞拉 1929~1941 年期间的社会变化和矛盾；二、善于把人物的外部活动同内心感受结合起来；三、语言朴实无华，但是不乏幽默感。四、作品的布局有张有弛，叙述节奏和谐，时而集中叙述中心人物的遭遇，时而抒情或者讽刺性地描绘舞台的变化，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阅读起来令人感到愉悦。

《死屋》和《一号办公室》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国文字，在世界文坛上有一定影响。

第七节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的作品

胡安·何塞·阿雷奥拉（Juan José Arreola, 1918~ ）墨西哥戏剧家、电视编剧和导演、丛书主编、杂志社总编和文学社团领导人。出身于一个小工商业者家庭。11岁起就开始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小贩、搬运工、面包师、中学教员、校对、编辑、记者等。虽然曾在法国研究戏剧，但基本上是自学成才。1943年开始创办文学杂志《回声》。他的短篇小说在墨西哥很有影响。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多变的虚构》（*Varia invención*）（1949）、《密谋策划》（*Confabulario*）（1952）以及惟一的长篇小说《集市》（*La feria*）（1963）。短篇小说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有：《扳道工》（*El guardagujas*）和《与魔鬼达成契约》（*Un pacto con el diablo*）。

《扳道工》说的是有个外国旅客匆匆来到墨西哥内地某火车站要乘火车于次日赶到T城去。正当他四处张望时，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小老头：一个手提红灯的扳道工。他告诉那外国人：“快去租个房间吧！如果能租上，那就租它一个月。”老外说：“我明天就得赶到T城。”扳道工告诉他：火车不按照时刻表行驶，也不按时到站。“全国的老百姓就这么等着，一面容忍着这混乱局面，因为爱国主义是不允许表示不满的。”那么到底有没有火车呢？这很难说，“火车道不管怎么失修，总还在那里摆着。有些地方，画上两条道道，也就算上有火车了。眼下这里不需要过火车。可是我这辈子也的确看到过火车从这里开过去

了。”老外坚持要到 T 城去。扳道工开导他说：“为什么非到 T 城去不可呢？要是能上了火车，您就应该知足了。因为上了车，生活就肯定有了方向，去不去 T 城又有什么要紧呢！”这个老外是个认死理的家伙：“我买票是去 T 城的，当然要去那里了！”道理是不错的，但我国的国情是旅客需要买下大量车票。老外不明白这样的“国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扳道工耐心地解释说：“火车运行既不规范也不按时，但是铁路公司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让人意想不到的措施：让火车跑到那些还没有通车的地方去！这些远征列车一上路就是几年的时间。旅客死在车上也并不奇怪。为此，公司就在列车后面挂上充当教堂和停尸的车厢。如果路经某个车站时可以放下一具涂有高贵香料的尸体并注销他的车票，那是列车员的荣誉。有时候，列车不得不在一根铁轨上行驶，有一边的车轮就会与枕木碰撞，那一侧的车身就会激烈地颤抖。公司事先安排头等车厢的旅客坐在有车轨的一侧，以减轻颤抖。假如两侧都没有路轨，那就大家一起颤抖，直到列车被完全颠散了为止。”老外听了以后吓得连连叫道：“我的上帝呀！”扳道工给他打气说，有列火车开进沙地里出不来了，旅客们只好在车上生活，不久，大家建立了友情和爱情，有的爱情就变成了家庭，结果列车旁边就出现了一个新村。如今孩子们整天拿那辆废火车当玩具了。老外说：我可不愿意碰上这样的事情。扳道工又给他举出另外一个更加离奇和惊险的故事：有一次，一趟列车开到悬崖边停下来，原来司机发现公司忘记修建桥梁了。可是，旅客们不肯后退，他们都下了车，把列车拆成零件运到了悬崖那一边。这真是铁路史上的创举！公司为了表彰这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雄精神，决定给参加劳动的

旅客们的车票打折扣。可这个老外是个务实的角色，他坚持次日要到 T 城。扳道工于是建议道：赶快找旅店住下，养精蓄锐，准备同上千个愤怒的旅客一道争先恐后地抢着上车吧？老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吗？扳道工回答说：组织警察小分队太费钱。再说，即使有了警察，他们又个个喜欢接受贿赂：谁给钱就让谁先上车。不过，公司打算搞培训班，训练人们如何正确上车。老外问：上了车以后还有麻烦吗？扳道工说：有的。一是要注意外面的车站，因为有的车站是用布景制造的假车站；二是千万别跟闲人聊天，因为车里有许多特务在偷听谈话内容。有时候，你还不明白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就被特务挑出了毛病。他会马上把你抓起来关到后面的监狱车厢里。就算你一路平安到达了目的地，也不要贸然下车，一定要看看站台上有没有熟人。为什么？因为有的车站是假冒的。这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这是铁路公司出于好意：尽量打消旅客误点的顾虑。为的是让旅客觉得有这样的铁路公司为你服务真是荣幸之至！因为公司主宰你的一切，你根本用不着考虑列车从哪里开出又向哪里开去。老外听了扳道工这番介绍，觉得这个老工人肯定多次乘坐过火车。扳道工回答说：根本就没有出过远门，也不想外出。他肚子里那些故事都是过往的旅客们讲的。他甚至还听说过这样的事情：火车在某站停下来，列车员请大家下去看看附近的名胜古迹，等旅客们走远了以后，火车就悄悄开跑了。那旅客们回来以后怎么办呐？那些旅客都是经过选择的年轻人，又有足够的姑娘陪伴，您说应该怎么办？这时，远方传来一阵阵汽笛声。老外急忙问道：是火车吗？扳道工突然跑掉了，消失在曙光里。“与此同时，火车从地平线那里像只吼叫的怪物，由远及近，渐渐靠

近着，靠近着。”故事到此结束了，但是它留给读者的思考和遐想却是很多的。这篇小说是虚构的，但是它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内容：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弥漫在全国各地，是特务和警察在维持着政权的稳定，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制造着荒诞离奇的故事，嘴巴里却高喊着“这是为人民服务”。这种欺骗能够维持多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老百姓能够忍耐多久。但这毕竟是文学作品，是小说。它要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达作者的批评思想。因此人物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安排就需要巧妙的想象力和艺术的布局了。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曲折，结局出人预料之外，叙述语言简洁明了，这些就是胡安·何塞·阿雷奥拉短篇小说的特点。

《与魔鬼达成契约》讲述的是“我”去看一场电影，由于“我”迟到了，便请求邻座的人介绍已经放映过的部分。邻座告诉“我”：丹尼尔·布朗是个贫苦的农民，为了一笔钱就把灵魂出卖给魔鬼了。出卖的时间为七年。在这段时间里，丹尼尔·布朗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我”和邻座边看电影边议论这笔交易。“我”问邻座：他俩之中谁付出的代价更高？邻座回答说：魔鬼。“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呢？邻座道：因为丹尼尔的灵魂不值钱，可他换来了大把的钞票。银幕上：第七个年头马上要到了，丹尼尔在拼命花钱。“我”是同情丹尼尔的，因为“我”也是个穷人。

“我”不由得联想起自己的处境：如果“我”有了钱会怎么样呢，“我”的妻子宝丽娜就可以穿上新衣服，家里也可以焕然一新了。突然，“我”想起一个问题：既然丹尼尔的灵魂不值钱，魔鬼干吗要花大价钱呢？邻座解释说：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会后悔的，而悔恨可以让他身价百倍。接着，

“我”和邻座围绕着该不该履行诺言展开了讨论。“我”认为：既然连魔鬼都肯履行诺言，那人就更应履行诺言。丹尼尔为了妻子献出了灵魂，他应该履行诺言。邻座忽然发现“我”一直站在丹尼尔一边。于是问“我”：“您也会履行诺言吗？”“我”回答不出来。这时，银幕上的丹尼尔正在发愁，面色阴郁；豪宅里的气氛非常凄凉。钱币很快就从丹尼尔手中花掉了，但是换回来的是悲哀和悔恨。“我”为了妻子的幸福，也宁肯献出一切。这时，邻座邀请“我”到走廊去谈谈，免得打搅别人看电影。二人来到外面，“我”朝银幕望了最后一眼：丹尼尔正在哭哭啼啼地向妻子忏悔，不应该和魔鬼订契约。随后，“我”想到自己家里的贫穷状况，一时还不明白丹尼尔有了钱为什么还哭哭啼啼？来到走廊里，邻座建议“我”签署一份合同：用灵魂换取金钱。“我”一想到有了钱可以住上豪宅，可以给妻子购买衣服和首饰，便下了决心：准备签约。但是，“我”有最后一个条件：看看电影的结局。这时，邻座已经露出了魔鬼的真面貌，他催促“我”赶快签约。“我”坚持要看看电影的结尾。于是，二人又回到了放映厅。这时，丹尼尔的生活发生了突变：豪宅已经变成了破烂的农舍，丹尼尔的妻子正在火炉旁做饭。正是黄昏时分，丹尼尔扛着锄头、浑身泥土地回到家中。他温柔地望望妻子，问道：“你不怀念过去豪华的生活吗？”妻子答道：“你的灵魂要比那种生活更值钱……”在夫妻的微笑里，音乐起，银幕上出现了“全剧终”的字样。“我”稀里糊涂地随着人流来到了大街上。“我”感觉有人在拽“我”的胳膊，企图揪住“我”。“我”拼命挣脱出来，向家里跑去。妻子正在等着“我”，她看着“我”迷迷糊糊的样子，笑着问道：“你大概睡着了

吧？”“我”趁机解嘲道：“是啊，我是睡着了。”然后，“我”用抱歉的口气说道：“我做了一个梦，现在我讲给你听。”妻子听完故事以后笑个不停，显得非常开心。但是，上床以前，“我”看到妻子悄悄用一把灰在门槛上撒了一个十字架。《与魔鬼达成契约》揭示的道理是明白无误的：没有钱要受穷，而只是为了钱活着，又要出卖灵魂，结果是无穷的烦恼。“安贫乐道”谈何容易！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人总得有点精神，总得讲点道德。总得在心灵的门槛上设置一道“防鬼符咒”。总得注意精神和物质互相转换的条件，因为任何一种偏颇都会带来麻烦。

在小说技巧方面，作者很巧妙地把电影的情节发展与主人公的心理变化结合起来，显得自然而生动，因而产生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第八节 加夫列尔·卡萨克西亚的作品

加夫列尔·卡萨克西亚（Gabriel Casaccia, 1907~1981）是巴拉圭的著名作家。出生在首都亚松森。1931~1932年在外交部任职。厦谷战争后（1935）流亡到阿根廷。193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男人、女人和玩偶》（Hombres, mujeres y fantoches）；1938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瓜赫胡》（El guajhu）；1940年创作了《马里奥·巴雷达》（Mario Pareda）；1943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井》（El pozo）；1952年发表了《蠢妇》（La babosa）；1963年发表了《烂疮》（La llaga）；1966年出版了《流亡的人们》（Los exiliados）；1975年创作了《继承遗产的人们》（Los herederos）

等。罗亚·巴斯托斯认为卡萨克西亚是巴拉圭当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卡萨克西亚从 1930 年创作《男人、女人和玩偶》开始就非常关注巴拉圭的社会问题，坚持走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1926 年西班牙作家巴列一因克兰的长篇小说《暴君班德拉斯》出版，讲述了拉丁美洲某国独裁暴君的故事。其中的班德拉斯和甘达里塔上校都有真实的原型。卡萨克西亚阅读后深受启发，因此在《男人、女人和玩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暴君班德拉斯》的影响。如同巴列一因克兰一样，卡萨克西亚把矛头对准了巴拉圭的独裁统治现象，因为他从童年起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政变和政变后的独裁统治：1911 年陆军部长阿尔维诺·哈拉发动政变推翻了贡德拉总统的政府，自任临时总统，实行独裁统治。从此红党和自由党为争权夺利反复发动内战。国家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人民对此深恶痛绝。《男人、女人和玩偶》就是反映人民呼声的一部杰作，因此在作品中主题思想是非常明确的。罗亚·巴斯托斯认定：“卡萨克西亚是当代巴拉圭叙事文学的第一位先锋。他出色地反映了巴拉圭那无耻的一面，这个国家在警觉和惴惴不安中寻找着那另外的一面、那不可能整合的一面。”在小说技巧方面，这个时期的卡萨克西亚处在探索阶段。因此作品中既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唯美主义对他的诱惑。

《马里奥·巴雷达》塑造了类似歌德笔下的维特式人物，即马里奥·巴雷达。他像维特一样感到与丑恶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所不同的是，他的愤世嫉俗更多地指向独裁统治。他的绝望情绪更多的是来源于社会黑暗。当然，失恋也给了马里奥很大的打击，更加感到悲痛欲绝。《马里奥·巴

雷达》中还有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的影响，这是卡萨克西亚公开承认的。1930年安德烈·纪德表示赞同共产主义理论，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反对法西斯主义。这一转变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和美洲的许多知识分子。因此在《马里奥·巴雷达》中可以看到主人公终于走上了觉悟的道路。

《蠢妇》的主人公名叫堂娜·安赫拉（Doña Angela）。她生活在巴拉圭内地的一个小村庄里，主宰着村庄里的一切，愚蠢而又狭隘，但很自以为是，爱慕虚荣，专横霸道，可又色厉内荏，非常害怕群众。由于社会的总体气氛是在独裁统治之下，所以堂娜·安赫拉可以为所欲为。作者的用意非常明显，就是通过这个人物和这个地狱般的微观世界来抨击专制政权。作品问世后受到巴拉圭政府雇佣报刊的猛烈攻击。这从反面也证明了小说命中了独裁者的要害。作者的语言风格已经显得十分老道：简明、生动，三言两语就画出人物的嘴脸。这部作品已经充分显示出卡萨克西亚文学创作的独创性，已经摆脱了欧洲作家的影响，找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个性。

《烂疮》发表于1963年，作者已经从社会制度上看出“烂疮”的根源，他无情地批判漫长的独裁专制给人们心身造成的伤害。作品通过主人公阿迪里奥的巨大变化揭示出国民性格中可以忍受独裁统治的心理因素。阿迪里奥本来出身农民家庭，为人忠厚本分，处处讲究实事求是，但是在一次政变过后，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事当先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甚至沽名钓誉，说假话，搞欺骗，生活也腐化起来：买豪宅，乘豪车；花天酒地，赶快享乐。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之前后判若两人。作者从心理分析入手，认为阿迪里奥原来就有“压抑的情结”，现在条件成熟了，使释放出

了人性恶的种种毒素。

《流亡的人们》讲述了因受政治迫害而出国的人们，其中有人就生活在国境线的那一边，整天盼望着祖国的形势发生变化，盼望着独裁政权快快垮台；但是，令人煎熬的等待把许多人的意志摧垮了。尤其国境线那一边的祖国可望而不可及，更是格外折磨人。尽管他们都知道漫漫长夜总有尽头，黎明的曙光就在东方，但是残酷的眼前现实必须对付：特务的跟踪，居住地警察的骚扰；特别是需要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他们中原来有些人是生活在社会上层的，但是看不惯上流社会的丑恶，为着追求美好的理想，特别是希望在推翻独裁统治以后能够建立民主、自由的美好社会的梦想，他们放弃了舒适的物质生活，坚决走上了为民主而战的道路。如今，他们必须忍耐这一时看不到出路现状。作品中有作者自己的亲身体会。1975年卡萨克西亚发表了他一生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继承遗产的人们》。这部作品继续批判独裁统治给人们造成的灾难，其背景仍然是内地一个小村庄。小说的主题仍然是描写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的现实处境：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人们的精神非常压抑和绝望；实际上这是70年代巴拉圭社会的缩影。

综观卡萨克西亚的文学道路，可以看出这位民主战士以毕生的精力、用文学做武器向法西斯独裁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尤其令我们深思的是：在谈及巴拉圭当代小说时，为什么读书界和评论界都首先推出他和罗亚·巴斯托斯为代表，而不是某些给独裁者涂脂抹粉和捧臭脚的御用文人呢？

第七章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

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1974）是拉丁美洲重要作家。

1899年10月19日，阿斯图里亚斯出生在危地马拉城，父亲是一位正直的律师。当时的危地马拉正处于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的独裁统治之下。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阿斯图里亚斯目睹了独裁者利用军警镇压、迫害革命群众所造成的白色恐怖。为了躲避反动军警的迫害，阿斯图里亚斯全家迁居到内地省城萨拉马。阿斯图里亚斯因此有机会广泛接触土著印第安人。当时，危地马拉纯血统的印第安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半数以上，大多居住在农村，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阿斯图里亚斯怀着极大的关切与同情，逐渐了解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感情和古老的印第安文化。这一切对他一生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进入大学法律系后，他曾

多次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他获得法学硕士的论文就是《印第安人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投身于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下台之后，阿斯图里亚斯同一批青年学生创建了“民众大学”，试图通过教育改变群众愚昧落后的状况。1923年阿斯图里亚斯离开祖国，首先来到英国，随后去法国巴黎求学。他在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乔治·莱纳托指导下攻读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古印第安文化，并且参照乔治·莱纳托的法译本《波波尔·乌》，用西班牙语重新翻译了这部玛雅基切人的“圣经”。他还同一位学友合作整理了基切人著名的剧本《拉比纳尔武士》。通过5年的系统学习，阿斯图里亚斯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关于印第安文化传统的知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他艺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法国求学期间，阿斯图里亚斯还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倡导者勃勒东、本哈明·佩雷、查拉等人建立了友谊，并且同著名的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一起创办了《磁石》杂志，宣传超现实主义的主张。1930年他的第一部故事集《危地马拉神话》在西班牙出版。1933年阿斯图里亚斯回到祖国。1937~1938年阿斯图里亚斯创办了《凉风日报》，同时从事诗歌创作。1944年霍尔赫·乌比戈独裁政权倒台。阿斯图里亚斯积极支持社会改革，曾多次以公使衔参赞的身份出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1946年他的代表作《总统先生》终于在墨西哥出版，从此蜚声拉丁美洲文坛。1954年阿本斯政府被军人政权代替，阿斯图里亚斯被剥夺国籍，在国外流亡10年。这期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绿色教皇》（1954）、短篇小说集《危地马拉的周末》（1956）和《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1956年曾应邀来中国参加鲁迅逝世20周年

纪念大会。1954~1962 年他受委内瑞拉《国民日报》委托，担任驻阿根廷特约记者。1962 年被新上台的阿根廷军政府驱逐出境，阿斯图里亚斯来到日内瓦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机构工作。1966 年，危地马拉国内政局发生变化，阿斯图里亚斯得以回国，并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1967 年“由于出色的文学成就”、“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和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此后，他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晚年的作品有：《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1974 年逝世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一部作品是故事集《危地马拉神话》，出版于 1930 年。作品取材于民间流传的神话和《波波尔·乌》中的故事，反映了古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世界观和文化传统。作者以诗一般的笔触描绘出印第安人生活的神奇和魔幻的气氛。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莱里将该作誉为神话、梦幻和诗的结晶。实际上，《危地马拉神话》是阿斯图里亚斯在探索民族艺术特色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1946 年，《总统先生》问世，立刻在拉美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后面将详细介绍这部重要作品。

1949 年，长篇小说《玉米人》出版，作者借助神话说的虚幻意境，描写山区农民的现实生活，以印第安人和土生白人之间在种植玉米问题上发生的冲突为线索，揭示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间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阿斯图里亚斯努力追求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一种美洲本土的语言，一扫过去小说中过分雕琢、晦涩、华丽的文风。为了深入挖掘印第安人的内心世界，他努力摆脱西班牙文化传统的心理结构，不是简单地吸收方言土语，而是从口语中去捕捉巨大的

心理力量。他解释说：“《玉米人》中的口语具有宗教含义。作品中的人物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总是处于大自然洪亮的声音的包围中，处于河流和山脉的声音的包围中，背景描写不再是像过去那样，比如浪漫主义小说的纯粹舞台装饰，而是已经变得具有活力，已经有了生命。”

在 1950 年至 1960 年的 10 年中，阿斯图里亚斯创造了反映危地马拉香蕉种植园生活的三部曲：《强风》（1950）、《绿色教皇》（1954）和《被埋葬者的眼睛》（1960）。这 3 部长篇小说的主题思想虽然是揭露美国垄断资本“联合果品公司”对危地马拉农业工人的压迫与剥削，并且歌颂了群众的英勇斗争，但绝不限于简单的控诉与说教，而是运用了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此外，阿斯图里亚斯还创作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是《危地马拉的周末》，揭露 1954 年美帝国主义对危地马拉内政的武装干涉和扼杀民主政权的罪行。他的后期作品有《珠光宝气的人》（1961）、《这样的混血女人》（1963）、《丽达·萨尔的镜子》（1967）、《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

阿斯图里亚斯还创作过不少诗歌，主要诗集有《十四行诗集》（1937）、《云雀的鬓角》（1949）、《贺拉斯主题习作》（1951）和《玻利瓦尔》（1955）。此外，他还是位剧作家，主要剧作有《索鲁娜》（取材于印第安文化中的神话剧）和《讹诈》、《干堤》、《国境线上的正式会见》（取材于政治生活）。下面重点介绍《总统先生》和《玉米人》。

第一节 《总统先生》

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成就主要在小说方面，他成功地创作了长篇小说《总统先生》。小说并未指明故事发生在哪个具体的国家，但是从内容上看，社会背景显然是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执政时期。作品的主要情节是这样的：在中美洲某国，一天黑夜，在大教堂门口，乞丐佩莱因受到何塞·帕拉雷斯上校的嘲笑，一怒之下将上校杀死。案发后，该国总统极为震怒，因为帕拉雷斯上校是他手下一名得力的爪牙。警察局立即逮捕了当时在场的乞丐。尽管众人异口同声地作证说凶手就是佩莱，政府当局仍不肯罢休，非要追查幕后操纵者不可，企图将杀人罪责归咎于总统的两个政敌——阿维尔·卡瓦哈尔和欧塞维奥·卡纳雷斯头上。经过严刑拷打之后，除一名乞丐外，所有的见证人都推翻了原来的证词。

警方立即根据伪证逮捕、审讯和枪杀了阿维尔·卡瓦哈尔。对于另一名政敌欧塞维奥·卡纳雷斯，总统采取了不同的办法，他让自己的亲信卡拉·德·安赫尔设法让卡纳雷斯逃走，然后再命令士兵将卡纳雷斯击毙，这样即可不经审判便将政敌除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有了意外的变化：卡拉·德·安赫尔爱上了卡纳雷斯惟一的女儿，他真的放走了卡纳雷斯，并没有让士兵将其枪杀。阴险的总统闻讯后装出同意卡拉·德·安赫尔与卡纳雷斯女儿结婚的样子，实际上已布置了圈套，惩罚安赫尔的不忠与背叛行为。他命令安赫尔出国工作，当后者即将离境时，秘密将其逮捕，随后即投入死囚牢中。他不仅让警察从肉体上折磨安赫尔，还派一个

犯人告诉安赫尔，他的妻子卡米拉已经做了总统的情妇，安赫尔听罢肝胆欲碎，在绝望中停止了呼吸。

《总统先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拉丁美洲专制暴君的典型形象。在他的统治下，全国充满了混乱、死亡与毁灭的恐怖气氛。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恐惧心理：只要一提到总统的名字，“连街头的石子都会恐惧得发抖”；到处都有总统的耳目，“稍有风吹草动，这些耳目就会像暴风雨即将来临似地警觉起来……一个比电话线还要纤细的无形的通讯网使每片树叶都和总统先生连接着，他密切地窥伺着他的子民们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活动”，甚至在总统亲信的家中都暗藏着一对对监视的眼睛：厨娘、女仆窥伺着主人的行动，他（她）们之间又彼此戒备，互相告发。上至高级将领、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乞丐娼妓，每个人的生死、荣辱完全在总统一人掌握之中。全国上下形成一种盲目的敬畏与迷信，人们称总统是“祖国的功臣、伟大的自由党领袖、忠诚不渝的自由战士、青年学生的保护人”。作者在小说出版后解释说：“这是人们对貌似现实、实则古老神奇力量的崇拜。总统是一种神人、超人。他代替了原始社会中部落酋长的职能，具有像神一样肉眼凡胎看不见的神力。”

《总统先生》没有停留在一般地谴责独裁者个人的罪行，而是以高度概括和集中凝练的手法，揭露出独裁统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即：反动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干涉以及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宗教意识和宿命论思想影响等等。阿斯图里亚斯揭露独裁统治的目的在于唤醒民众，他说：“人民好比地下的矿藏，被成吨成吨的误解、偏见、忌讳所埋没。而我们的小说通过谴责、摆事实和揭露等手段向下挖掘，使它们重见天日。”他要把人民群众从噩梦中唤醒，激

起人民对独裁统治的义愤，并且明确指出屈从命运只能继续过地狱般的生活，只有奋起打碎暴政的锁链，并且同时破除迷信和宿命论的桎梏，才有可能赢得自由和解放。

在艺术方面，阿斯图里亚斯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神话中的某些表现手法，力求揭示拉美人的心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具体地说，阿斯图里亚斯已经明确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因为梦幻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阿斯图里亚斯指出，梦幻是独裁统治下人们为了逃避不堪忍受的现实而吞服的一剂鸦片，是那些破碎心灵的避难所。作品写道，安赫尔救助了卡米拉之后遭到恶语中伤，他为摆脱心中的苦闷而求助于梦幻：“但愿能够忘掉一切，安然入睡，连自己也不复存在。停止那像机器零件一样可以任意装卸的逻辑思维，让知觉统统见鬼去吧！最好还是进入梦乡，停止思想……”于是他在梦乡里遇见了梦神，后者“把他收留在一条船上。几双无形的手把他从饿虎扑食般的海浪中救出来，从严酷现实的狼嘴里抢了出来”。

残酷的社会现实伤害和扭曲了人们的心理，而表现这种扭曲的心理就需要一种扭曲的形式。梦幻与非理性意识的描写就是这样一种形式。乞丐佩莱莱那种亦梦亦醒的感知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人世间受尽了凌辱，他在梦境里看到的也是恐怖、血腥与污秽。他想逃脱这地狱般的现实和梦幻，但是无路可走，只有躲进墓地。梦幻可以间接反映现实生活，梦幻还可以寄托对未来的幸福向往。佩莱莱在梦中得到了母爱，安赫尔力图在梦境里得到安宁。阿斯图里亚斯在《总统先生》中虽然还没有将魔幻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全面地运用到创作中去，但是他为后人发展魔幻现实主义

的创作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阿斯图里亚斯是一位语言大师。他认为，语言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因为它是依附于生活而存在的，它是生活的复写，是生活的回声和投影，因此他特别重视语言的表现力和它的心理效果，而蔑视所谓语言规范。他往往抛开语法，直接向生活探求更生动更有活力的语言表现形式。他认为，欧洲和拉美有着不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拉美人 and 欧洲人的语言思维逻辑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摆脱欧洲式的西班牙语，创造一种“美洲的语言”。《总统先生》的语言便贯彻了作者的上述指导思想，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丰富的表现力、新奇的形象感、富于诗意和音乐感，成为这部作品的语言特色。新奇而形象的比喻是《总统先生》的主要特色之一。作者常常把看来最不相干的事物拿来类比，如用坟茔比喻苍穹，伤痕比喻血红色的晚霞城市。罗列名词、反复强调某个词或句给读者以强烈的刺激是阿斯图里亚斯惯常使用的又一手法，如描写乞丐佩莱莱身上盖满了“废纸、碎皮、破布、伞骨、草帽沿、破铝锅、碎瓷片、硬纸匣、旧书皮、碎玻璃、晒翘的破鞋……”给读者造成越来越强烈的肮脏印象。又如佩莱莱向城郊逃去时，他的身旁闪过“几扇门、又是几扇门、又是几扇门、几扇窗户、又是几扇门、又是几扇窗户……”突出地再现了一个狂奔的镜头。所有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是来源于作家对社会生活认识的真知灼见，而绝非文字游戏。

阿斯图里亚斯是主张创作“抗议”文学作品的，他说：“拉丁美洲文学绝非廉价文学，它是战斗的文学，并且一贯如此。”他认为，正是那些具有明显社会倾向的作家，开创了拉丁美洲的文学，“给了风花雪月的文学一记响亮耳光，

将新大陆面临的问题放在了首位。”他公开声明自己“为民喉舌”的艺术观，他说：“对我来说，作家就是代沉默者疾呼的人。危地马拉的土著玛雅——基切人中间有一种被称为‘伟大喉舌’的人。在土著公社和部落里，‘喉舌’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负责表达本村或本乡全体土著居民的愿望、不满以及合法要求。”“‘喉舌’是部落的代言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是这样的人：是我部落的代言人。”因此阿斯图里亚斯自觉地用文学来反映人民的疾苦，积极干预生活，并且使之成为战斗的武器。

阿斯图里亚斯又是一位率先树起革新拉丁美洲文学旗帜的旗手。新的时代、新的社会矛盾要求作家运用新的手法加以表现。阿斯图里亚斯首先敏感地意识到这一变化，即需要展示拉美人的“内心现实”、拉美人的精神世界和拉美人观察社会的新眼光。为此，他一方面认真吸收和借鉴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文化的精神，为文学充分表现土著拉美人的心理找到了理论根据和可资借鉴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他坚定地立足于本大陆的现实生活的土地上，并不像超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把人的本能冲动、非理性看作惟一的真实，是现实世界的动因；也不把潜意识和梦幻当作文学创作的惟一源泉，更不认为潜意识和梦幻就是生活的全部和最本质的内容，而是只当作拉美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他努力要反映的是“民族的集体的潜意识”，并且始终坚持文学作品应当成为时代和民族的回声，他明确表示，拉美小说家没有条件去平心静气地剖析复杂的个人心理，严酷的环境迫使“拉美小说首先成为一门新大陆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它的使命是搜集资料，作出评价，给予批判”。也就是说，忠实地反映拉美人的精神和拉美社会的本质是他文学创作的根本宗旨。阿斯

图里亚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正是按照这一宗旨产生出来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神奇与魔幻因素来源于拉美人感知现实的奇特方式，来源于他们的信仰，来源于他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作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它们，并且经过加工和提炼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阿斯图里亚斯正是这样一位孜孜不倦的发现者和努力加工与提炼的巨匠。

第二节 《玉米人》

《玉米人》是阿斯图里亚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49年。全书分为六部分，即：加斯巴尔·伊龙；马丘洪；七戒梅花鹿；查洛·戈多伊上校；玛丽娅·特贡；邮差——野狼。表面上这六个部分各有独立的故事，实际上都服从于以下两个主题思想：反映土著人的宇宙观、生死观及其宗教信仰；反映土著人的悲惨境遇。为了理解这部作品，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书中土著玛雅人的宇宙观、生死观及其宗教信仰。玛雅人认为，大地浮游在大海中的鳄鱼（一说为乌龟）的脊背上。大地中央有棵高大的神树，支撑着天。上面有天堂，分为十三重，每重有一位神仙掌管。地下有地狱，分九层，每层也有一位神仙掌管。玛雅人相信，无论天上还是地下，万物都有神灵，不仅是有形的物体有神灵，无形的东西也有神灵，甚至连日期、数目、职业、年龄、性别、颜色、生死、自杀等都有神灵。神灵无处不在：无论任何状态、需求、时刻……都有神灵。玛雅人最崇拜的是天神、太阳神、雨神、虹神、玉米神、战神、死神、统治者的家神、商人之神、北方之星神等。神灵通常都是人形、兽形或者半

人半兽形。玛雅人崇拜神灵，也祭祀神灵。其目的是祈求健康、丰收和事事如意。有关地方命运大局的祭祀典礼，要由统治者亲自主持，有时要用自己的鲜血祭祀。此外，祭品还有食物、宝石、活人等。进行典礼时要焚香、饮酒和跳舞。重大典礼要在庙宇前举行。庙宇通常建筑在金字塔形的台座上，四面有台阶，直达顶端。最高处设有龛室，供奉统治者的神位。如此完整系统的信仰体系可以充分说明玛雅人认识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能力达到了怎样的水准。

《玉米人》一开篇说到的“伊龙”就表明了玛雅人的信仰。“伊龙”是个地名，但是它也有神灵。加斯巴尔是伊龙地方的酋长，因此他的全名就是：加斯巴尔·伊龙。他在梦中听到伊龙大地的抱怨声：有人用斧子在砍伊龙大地的眼皮，有人用火在烧毁伊龙大地的睫毛，酋长呀，你怎么不管管他们？这是一场保护大地神灵的斗争：有人要砍伐森林种植玉米。加斯巴尔在战神的鼓舞下拿起猎枪去射击那些放火烧山的家伙。他要把那些打算种玉米的人统统赶出去。他想：“蛀虫十分可恶，种玉米的人更加可恶。蛀虫能在几年间毁掉一棵大树。种玉米的人放把火，几小时内就能毁灭一片森林。多好的树木啊！那是珍贵的上好木材，是大量的药材。种玉米的人把树木烧个净光。要是为了吃，也就罢了。可他们是拿玉米做买卖。”加斯巴尔的愤怒还在于：这些人背后有老板。收获的玉米有一半要交给老板。而且种过玉米的地方变得贫瘠以后，他们就都撒手不管了。因此，加斯巴尔要坚决保护这块土地，这决心既来自传统的信念和本地土著人的实际利益，也来自他的保护神——黄毛兔子。关于保护神的信仰，也是玛雅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人人都有一个保护神，这是出生以后就要找好的。保护神往往附

着在动物身上，用玛雅语说，就是人人有个“纳华尔”。加斯巴尔的“纳华尔”是黄毛兔子。玛雅老人说，加斯巴尔一走动，黄毛兔子也跟着走动。加斯巴尔一说话，黄毛兔子也说话。老人们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对那些种玉米的人们说的：加斯巴尔为了伊龙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而战，他有黄毛兔子保护，因此无往不胜。阿斯图里亚斯深刻地理解玛雅人的宇宙观和宗教信仰，他尊重他们的看法和想法，不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们，而是努力理解他们心灵深处的观念和思维方式。这与代表和维护大庄园主利益的讨伐队队长查洛·戈多伊上校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这位上校大人的任务就是来“剿除印第安人”的，而且要“悉数歼灭”。他在一个名叫托马斯·马丘洪的印第安人的帮助下击败了保卫伊龙的印第安人。这个马丘洪是被一个叫瓦卡·玛努埃拉的风骚女人勾引到白人一方的。这对狗男女利用加斯巴尔的邀请，给这位酋长的酒里下了毒药。戈多伊上校趁机击溃了守卫山头的印第安武士，逼得加斯巴尔从河里游泳逃走，没有想到，河水把他腹中的毒药给冲干净了，结果救了这位酋长一命。在这部分的结尾处，作者写道：“加斯巴尔·伊龙战胜了死神，战胜了毒药。可是，他的部下却遭到骑警队的突然袭击，被消灭得一干二净。”悲痛之余，他投河自尽了。

第二部分题为《马丘洪》，故事一开始讲述托马斯·马丘洪已经老了，他同意儿子马丁·马丘洪出外寻觅一个理想的姑娘做妻子。儿子走后，托马斯·马丘洪感到寂寞，他想起加斯巴尔死后，部落里的萤火法师们痛哭五天五夜，然后发出诅咒：谁使用白草根毒药害死了加斯巴尔，就让“嘤嘤哀鸣的小鸟跟定他们，永远不离他们的左侧！让他们的妻子、女儿的肚腹变成寸草不生的死地！让他们的后代浑身长

满毛刺！听着，部落的灵光、子孙万代的灵光、儿孙的灵光，把灾祸一代又一代降给使用白草根的人，降给他们的子子孙孙，降给他们所有的后代！”想到这里，托马斯·马丘洪有些坐不住了，他骑上马打算去找儿子，结果遇到了庄园主胡安·罗森多。后者劝他放心，可他心里有鬼，实在放心不下。再说，马丁·马丘洪这个小伙子下山后找到了一个可心的姑娘。她名叫坎黛拉莉娅·雷伊诺萨，长得“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面颊上有两颗笑靥”，“她散发着泉水的清香”。但是，就在他跟未婚妻分手之后，萤火法师们的诅咒在他身上应验了：一群群萤火虫挡住了他的去路，一只只哀鸣的小鸟干扰着他的听觉，搅乱了他的视线，结果坐骑狂奔，把他带离了正路，消失在无人知晓的地方。过了几天，消息纷纷传来了：马丁出现在放火烧荒的土地上，潇洒地驰骋在火焰里。托马斯着了魔似地跑到烧荒地上去找儿子。人人都说看到了他的儿子。惟独他这个当父亲的看不见。于是，他把自己的大片土地廉价租让给别人，希望大火烧掉森林，以便找到儿子。实际上，许多人在利用他的妄想狂拼命瓜分他的土地。种玉米的人们都在盼望着好收成，按照传统的租赁规定，他们应该把一半收成交给托马斯·马丘洪。但是，这个失去儿子的老地主已经精神失常了。一天，他去庄稼地里看玉米，恍惚中他觉得应该烧光庄稼，儿子就会出现。到了晚上，他偷偷骑上马蹿到玉米地里。这时的庄稼已经成熟了，玉米的叶子开始干枯，沉甸甸的“棒子”把细杆坠弯了腰。疯狂的托马斯为了逃避幻觉中黄毛兔子的报复，放火点燃了玉米。结果熊熊的烈火不仅烧光了庄稼，还烧死了托马斯本人，烧死了前来营救他的老婆和乡亲们，烧死了十四名骑警队员。

第三部分题为《七戒梅花鹿》，讲述一个巫医库兰德罗的故事，他的“纳华尔”（保护神）附着在一头梅花鹿身上。这头梅花鹿之所以是“七戒”，因为它曾经七次从烧荒的大火中逃脱了性命。在土著人的观念里，库兰德罗就是梅花鹿，梅花鹿就是库兰德罗。他能给人治病，也能预测吉凶。他在给特贡家的老妈妈治病的时候指出：需要让老妈妈的七个儿子中的一个喝下他准备的符水，那个儿子就可以说出是什么人用蛔蛔使坏，害得老妈妈打嗝不止。大儿子卡利斯特罗喝下了符水，“绿汤像泻药似的顺着嗓子一直流下去。他用巴掌擦擦嘴巴，身体轻轻靠在苇墙上，恐惧得张大眼睛，瞧着几个弟弟。突然，他莫名其妙地痛哭起来。”库兰德罗也没有闲着，“他跑到门口，两臂伸向茫茫夜空，手指直僵僵的，好似一根根石笛。然后，转过身来，张开双手在病人的眼睛上来回晃动，他要用星斗的光辉恢复病人的视力。”卡利斯特罗经过一番折腾以后说出了：“是萨卡通家对咱娘下的毒手。要想治好娘的病，除非砍下他们全家人的脑袋。”五个弟弟听罢，立刻抄起砍刀，到萨卡通家里，一口气杀死了全家八口人。老妈妈的病果然好了。可是，大哥卡利斯特罗却疯了。这时，库兰德罗说，要想治好这疯病，就必须杀掉一头七戒梅花鹿。五个弟弟中间的高登修是个好猎手，枪法百发百中，远近闻名。可是，这时一个名叫乌佩托的弟弟送来一个消息：卡利斯特罗杀死了库兰德罗！高登修听罢立刻从打死了一只鹿身上“出溜下来，四脚朝天倒在地上，面如死灰，一声不吭，仿佛要昏厥过去”，因为他明白自己杀死了库兰德罗。乌佩托劝告他说：“你杀死的是七戒梅花鹿。反正杀死库兰德罗的是卡利斯特罗。”高登修反驳说：“库兰德罗和七戒梅花鹿是一个东西。我朝鹿开了一

枪打死了库兰德罗。库兰德罗和七戒梅花鹿是一个东西。”乌佩斯很难理解这个道理。但是，他看到大哥卡利斯特罗在疯狂地跳舞。老妈妈知道只有梅花鹿吐出的石头才能治好大儿子的疯病。一个儿子听说以后连忙去找。结果真的找到了。老妈妈用这种“鹿眼石”在卡利斯特罗的太阳穴和脑瓜顶上蹭来蹭去。最后，大儿子真的清醒了过来。

第四部分题为《查洛·戈多伊上校》，讲述骑警队长查洛·戈多伊上校和他的副官穆苏斯少尉在巡逻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起初，上校回忆起他的对手加斯巴尔英勇善战的情景：“加斯巴尔一会儿一个主意，谁也捉摸不透，就跟烧荒的野火似的，忽东忽西，忽南忽北。他到处点火，咱们只好跟着他到处灭火。他是个大活人，打起仗来主意多得，谁能扑灭得了呀？有一回，我亲眼看见他硬是把一棵李子树连根拔了出来。他力大如神，抓起李子树，像用扫把一样把我的人打得东逃西散……”接着，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上校和他的副官走夜路的情景：风声、树叶唰唰声、山泉哗哗声让他俩感到恐惧，说起话来哆哆嗦嗦个不停。突然，二人眼前一黑，连忙拔出刀子，抽出手枪，结果定睛看，“原来是月光下松树树干的阴影一条条地扑打在他们的脸上，遮住了视线。”一路上，上校心情不好，越走火气越大。一会儿是萤火虫，一会儿是猫头鹰，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吓唬他俩。翻过一道山梁之后，他俩忽然发现大路上有一口棺材。上校认定这是盗马贼设下的圈套，便决定等候后续部队上来再对付强盗。等到大队人马来到以后骑警们胆战心惊地揭开棺材一看，里面竟然坐起一个活人。原来这是个运棺材的，他要把这口棺材背到村子里去，因为库兰德罗死了，需要给他下葬。上校听了这个背棺材的脚夫的叙述，将信将疑，命令副

官带上五个队员，押解着脚夫朝村里走去。他们来到特贡家的住处。这时家里只有老妈妈一人，儿子们都出去喝酒了。副官穆苏斯少尉问老妈妈：库兰德罗在哪里？老妈妈告诉他：就在屋里。骑警们进去一看，发现地上果然躺着一个人。少尉问老太太：库兰德罗是怎么死的？老太太回答：“老死的。千病万病，老了才是病，准死没跑儿。”于是，脚夫把棺材拖进了茅屋。少尉下令去谷地与上校会合。再说，戈多伊上校这时在谷地里吃东西。他忽然发现四周山头上有三道包围圈：夜猫子的眼睛，没有脖子的巫师脑袋和丝兰花环。第一道包围圈紧紧地盯着上校；第二道包围圈也在望着上校，第三道包围圈原来是烧荒的大火。大火烧得骑警们四处逃散。只有一个名叫贝尼托·拉莫斯的队员伫立在丝兰花环中，因为他事先已经跟魔鬼签了契约：大火根本碰不着他。他骑上马逃走了。与此同时，在山头上，特贡家的兄弟在回忆七戒梅花鹿跟他们说过的话：这第七次烧荒一定要给加斯巴尔报仇。他们看到谷地的骑警拼命打算冲上山头，就开枪把他们给撂倒了。再说，少尉带的几个人这时还没有走到谷地，一看到大火包围了上校，他们吓得连忙逃回松林小路去了。

第五部分题为《玛丽娅·特贡》，讲述印第安妇女玛丽娅·特贡带着两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故事。她的丈夫名叫戈约·伊克，是个上了年纪的瞎子，整天依靠求乞度日。他一发现妻子和孩子们悄悄逃走了，就挣扎着出来寻找，向四面八方大喊：“玛丽娅·特贡！”心里一面想着这女人是他从萨卡通家的大屠杀下救出来的，她应该感谢他啊，怎么会出走呢？一次，他在求乞的时候听到几个妇女聊天才知道玛丽娅·特贡是因为厌倦了贫困的生活，更因为老头子爱吃醋

才离家逃走的。过了一些日子，戈约·伊克积攒了一些钱，决定去找一个会用草药治疗眼病的医生奇古伊琼·库莱夫洛先生。他请求医生无论如何也要治好他的眼睛，因为他得睁开眼睛看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女人——玛丽娅·特贡。特贡这个姓是老瞎子送给她的。她原来姓萨卡通，是萨卡通家的女儿。在特贡家那群兄弟把萨卡通全家杀害的那一天，玛丽娅躲藏起来，幸免于难。是老瞎子把她从躲藏的地方领回来并且养大成人的。库莱夫洛大夫经过精心准备以后，给戈约·伊克做了刮去眼中云翳的手术。过了十几天之后，医生给戈约去掉了绷带。他的眼睛看到光明了！青山、绿水和鲜花让他激动万分，但是一想到他从来也不知道玛丽娅的模样，那怎么能够认出谁是他心爱的女人呢！从前，他熟悉妻子的一切，那都是通过触摸呀！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来：装扮成走街串巷的货郎子。这样可以在买卖交易中听出女人的声音来。于是，戈约·伊克就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走下去，一有女人说话，他就格外注意地听。但是，几年下来，妻子依然杳无音信。他开始灰心了。一天，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多明哥·雷沃罗里奥的小商贩。二人一商量，决定做贩卖白酒的生意。本钱和利钱，轮流背酒都按照一人一半来分配。假如在背酒的路上渴了想喝酒，那怎么办？两人商量的结果是：谁也不能白喝酒，谁喝酒谁掏钱。上路以后，多明哥渴了，他按照规矩交了六个比索给戈约，买了三碗酒喝了下去。过了一会，戈约也渴了，也按照规矩交了六个比索给对方，也买了三碗酒喝了下去。就这样走了一路喝了一路，那六个比索一会儿在戈约手中，一会儿在多明哥手中。最后，一坛酒喝了个净光。二人还醉醺醺地坚持认为一路上喝酒是花了钱的，总共加起来应该赚了一千多比索。可是，骑警把他俩当

成走私贩子抓起来的时候，无论怎么审问，他俩就是交代不清楚那一千多比索到哪里去了。最后，二人被送进大西洋一座海岛的监狱里去了。

第六部分题为《邮差——野狼》，讲述邮差尼丘·阿吉诺的故事。尼丘是个印第安人，性格内向，固执，沉默，但是忠于职守，负责往返首都取送信件。他居住的村镇名叫圣·米盖尔·阿卡坦。这一天，他取信回到镇上，交接手续办完以后，邮政局长把 60 比索的出差费给了他，警告他不要因为喝醉酒误事。他答应了，连忙换上新衣服，回家看媳妇。可是一进家门，感到气氛不对，“屋子里臭气烘烘，到处是尘土、蜘蛛网和无人收拾的破烂东西。总之，人去楼空，四壁萧然。”原来媳妇跑了！尼丘慌了神，心想：“就是死了，也要找到她！”他急忙跑到镇公所报案。接待他的是一个挂上尉军衔的老军人。听了尼丘的叙述，他说：“八成她跟别人跑了。那个男人准是比你强。女人嘛，都想过得舒坦点儿，哪怕是送死，她也干！”上尉还警告尼丘：“你可要当心，别自个去找！别忘了瞎子戈约·伊克那档子事。听人家说，他到处找玛丽娅·特贡，结果掉进山涧了。据别人说，他听见玛丽娅·特贡说话的声音，正要赶上去，忽然他不瞎了，只见玛丽娅·特贡变成了一块大石头。他忘了自己站在山上，一下子摔了下去。直到今天大家还在找他。听明白了吗？千万别乱来！”尼丘离开了上尉，打算卖掉原来准备送给妻子的披肩。中国人开的商店不要，德国人开的店也不要。尼丘非常沮丧，便去教堂找神甫，结果“宗教信仰也很难抚慰一个遭人抛弃的不幸儿。他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厄运。在这个节骨眼上，魔鬼也会乘虚而入，他本人也会自暴自弃”。神父在尼丘走后拿出一个笔记本，他打开

写有“蜘蛛狂”的那一页又念了一遍：“关于‘蜘蛛狂’，患者颇多，妇女尤甚。她们染病后逃离家门，下落不明。人数与日俱增。土人称这种女人为‘特贡娜’。此名源于一姓名为玛丽娅·特贡的女子。据称，她为妖法所迷，喝下一碗蜘蛛爬过的巧克力玉米粥，遂患疯病，四处乱跑。其夫双目失明，对妻情爱甚笃。他到处搜寻，终无所获。最后，总算在人间最危险之地听到妻子的声音，极度兴奋之余，居然视力恢复。然不幸的事情发生：妻子已经化作巨石。于是，此山峰被命名为‘玛丽娅·特贡峰’。”接着，这位神甫还对“纳华尔”进行了一番考证：这也是印第安人的一种信仰，他们相信人人都有一位保护神，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天主教也有保护神一说，所不同的是，印第安人认为自己可以变成保护自己的“纳华尔”，即某个具体的动物，比如，邮差尼丘，他的“纳华尔”是只野狼。

他一离开镇子就化作野狼，奋力狂奔，一溜烟就到达了目的地。神甫看到这里想到：“野狼，野狼，我要是抓住它，一定在它屁股下放把火，就像烧野狼一样。”邮差尼丘走进酒馆，心绪很乱。他翻来覆去地想：妻子为什么要出走呢？她跟谁跑了？想不明白，他就喝酒，结果喝得烂醉。酒馆女老板企图趁他烂醉的时候偷走他准备送给妻子的披肩。但是，几个脚夫进来要喝啤酒，打破了女老板的如意算盘。他们发现尼丘已经不省人事了，便赶忙派人去镇公所报告。一名班长带着四个士兵来了。士兵一看，都说尼丘中毒了，决定马上送医院。三个礼拜以后，尼丘大病初愈，又背起邮包上路了，走到一个名叫三水镇的地方，尼丘看看天黑了，就决定住在蒙查大婶开的客店里。身体感觉不好，心事重重，他一夜没睡好。黎明时分，客店老板起来干活，一面同

尼丘聊天。老板批评人们拼命种玉米，“把土地耗乏了。再这样种下去，土地会变得光秃秃的，到头来还得让土地休息休息……”随后，老板问起尼丘妻子失踪的事情。尼丘说，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他都需要找到妻子。老板最后决定陪尼丘走上一程，因为他知道尼丘的老婆在哪里。上路不久，老板就带尼丘偏离了大道，走上了一条羊肠小道。原来这个老板就是萤火法师的化身，他带领尼丘来到了海边。他们遇到了玛丽娅·特贡。与此同时，尼丘的保护动物——野狼又遇到了库兰德罗——七戒梅花鹿。全书是这样结尾的：尼丘继承了一家大饭店，但是他已经老朽得无法动弹了。戈约·伊克和玛丽娅·特贡回到了老家，盖起了一座更宽敞豁亮的茅屋。儿子们成了家，生了许多孩子。全家住在一起，男女老少，人丁兴旺。到了收获季节，大家如同蚂蚁搬家那样往家里搬玉米。人人都忙忙碌碌，好像一只只蚂蚁……

《玉米人》一方面描写了 20 世纪 40 年代危地马拉军政府对印第安人的迫害，另外一方面也忠实地反映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世界观和生死观，作品中有大量近乎噩梦式和图腾式的故事就是他们思想情感的逼真描写。1967 年瑞典文学院在授予阿斯图里亚斯诺贝尔文学奖时有如下的评价：“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如此出类拔萃，不同凡响，以致超越了它所属的文学环境和地理疆界，因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阿斯图里亚斯提到过一个印第安传说。据说，死去的祖先不得不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后代受苦受难、奋力挣扎。直到子孙赢得了正义、收回了失去的土地，他们才瞑目安息。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民间信仰。我们不难想象这位战斗的文学家一定会常常感到祖先凝视的目光，一定会听到那震撼人心、无声和象征性的呼唤。”阿斯图里亚斯时时感

受到拉丁美洲历史的呼唤，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强调说：“并非是一些作品追求骇人听闻的效果，而是我们的历史事实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他又敢于面对残酷的现实，能够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去。他说：“新小说的第一步就是要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呼吸相通。任何与人类有关的东西，任何现实的东西，都和拉丁美洲文学息息相关。这就是拉丁美洲小说的情况。如今，没有人怀疑，在全世界小说领域中，拉丁美洲小说逐渐取得了领先的地位。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里，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家正在创作出这种小说。他们使用的都是拉丁美洲的材料，因此成为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见证。”（引自米·安·阿斯图里亚斯《拉丁美洲小说——时代的见证》，刘习良译，漓江出版社）

阿斯图里亚斯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说：“今天拉丁美洲的小说家们继承了为人民服务的悠久传统——我们伟大的文学正是在这种传统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仍然为穷苦百姓大声疾呼，为受剥削者仗义执言，为民众争取权利。劳苦大众在马黛茶园中受尽折磨，在香蕉园里被晒得皮焦肉烂，在甘蔗园里被榨干血汗。因此，我以为，真正的拉丁美洲小说就是为他们争取权利而发出的呐喊，就是散布在成千上万书页上发自世纪深处的呼声。”大作家的特点就是要与人类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就是要勇于反映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生活，就是要敢于为他的民族揭示精神悲剧和指出精神出路。具体到拉丁美洲，作家们在殖民时期就敢于抵抗宗教裁判所的高压，在独立战争时期就首先提出“祖国的独立高于一切”的口号，在 20 世纪就勇敢地举起反对独裁统治、反对政治欺骗、反对残酷剥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干

涉的大旗。为此，阿斯图里亚斯坚定地说：“拉丁美洲小说是我们的小说，如果要名副其实，就不能背离我们全部伟大文学过去和现在始终保持的伟大精神。假如你写小说仅仅是为了消遣，那就请你把它付之一炬吧！退一步说，即使你自己不烧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小说也会和你一道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而文学家梦寐以求的恰恰是留在人民的记忆中。过去，有多少人写小说只是为了消遣啊！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可如今还有谁记得他们呢？而我们当中那些为了提供见证而写小说的人，人们一下子就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为民请命，为民呐喊，这就是阿斯图里亚斯的使命。与此同时，他认为作家有责任为历史做见证，他说：“提供见证。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我们不能熟视无睹！这种现实压迫着我们，逼得我们高喊：为什么这样迫害我们？是的，我们的确受到无法拒绝的现实的迫害。这样的迫害表现在许多作家的作品当中。”

阿斯图里亚斯又是非常重视小说的艺术性的，他说：

“作为有文化修养的拉丁美洲人，我们当然都希望用优美的艺术形式表现事物，因此，每部小说才成为一项语言的壮举。为此，就必须提炼小说的语言。每个词句都应该切准脉搏——事物形成的脉搏。词句如同金石，应该落‘纸’有声。这就是所谓的‘声喻法’。在我们使用的语言技巧中，首先应该提到‘声喻法’。优秀的小说家是以声音为指导的：倾听自己的声音，也倾听人物的声音。最优秀的小说仿佛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诗歌般的语言首先表现为声音，其次才表现为概念。因此拉丁美洲伟大的小说都是一首首宏篇巨制的交响乐。”他既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无论《总统先生》还是《玉米人》都十分讲究“声

喻”，人类、大山、海洋、河流、湖泊、森林、动物、花草……都会发出各自具有特色的声音，都在纷纷倾诉痛苦、悲伤、忧郁、愤怒、欢乐的情绪，都在表现某种精神和思考。阿斯图里亚斯还注意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土著人的语言、欧洲人的语言、东方人的语言、非洲人的语言。此外，他还善于用充满抒情、风趣、幽默的细节生动地描写人物和讲述故事情节。因此，他的作品非常吸引读者，读者一经开卷，便参与其中，与书中的人物同甘苦、共患难。当然，无论语言技巧还是情节安排，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服务的，那就是：“完整地保留了人的价值，使人更加完美和高尚。”

第八章

阿莱霍·卡彭铁尔 的小说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 1904.12.26 ~ 1980.4.24）是古巴著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音乐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1904 年出生在哈瓦那。他的父母是 1902 年来到古巴的。父亲是法国人，建筑师。母亲是俄国人，曾任外语教师。受父母影响，阿莱霍从小喜欢文艺。童年在哈瓦那度过并接受了初等教育。8 岁时（1912 年）跟随父母前往法国、奥地利和俄国旅行。随后定居在巴黎。阿莱霍·卡彭铁尔就读于杰昂孙·德·赛伊中学（Liceo de Jeanson de Saily）与此同时，他跟着母亲学习音乐，开始表现出他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这一学习为他后来长期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全家回到哈瓦那。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哈瓦那大学攻读建筑工程专业。17 岁（1921 年）开始在哈瓦那一些报刊上发表文学评论文章。 18

岁担任《争鸣日报》（El diario La Discusión）编辑部主任。1922年，父亲破产，父母离异，阿莱霍随即辍学。从此，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古巴的文艺活动中。1923年，阿莱霍参加“十三人抗议签名”活动，抗议萨亚斯（Alfredo Zayas y Alfonso, 1861 ~ 1934）总统执政期间（1921 ~ 1925）的腐败行为。1924年，阿莱霍开始在《挑战书》（Carteles）杂志社工作，后来他同这家杂志社的联系长达27年之久。1926年，他应墨西哥政府的邀请，出席了拉丁美洲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1927年，他还参与了《前进》杂志（La revista de avance）的创办活动。1928年，他因为参加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斗争被捕入狱。在狱中，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古巴黑人士语：“耶稣，拯救我们！”）数月后出狱，他与著名音乐指挥家阿玛德奥·罗尔丹（Amadeo Roldan）一道在古巴组织音乐会，大力介绍法国著名作曲家萨蒂（Erik Satie, 1866.5.17 ~ 1925.7.1）、美籍俄罗斯人伟大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1882.6.17 ~ 1971.4.6）、意大利著名作曲家马利皮埃罗（Gian Francesco Malipiero, 1882.3.18 ~ 1973.8.1）等人的“新音乐”作品。与此同时，他开始为法国音乐杂志《和声》撰稿。这个时期，他还编写了几部芭蕾舞的故事情节脚本。1928年底，阿莱霍·卡彭铁尔悄悄离开了古巴前往法国。他在巴黎生活了10年，主要从事文艺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安德列·布勒东。后者邀请他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撰写文章。他还与法国作家路易·阿拉贡、著名画家毕加索过从甚密。在法国期间，阿莱霍·卡彭铁尔以录制音乐和广播节目为生。1933年，他在马德里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埃古·扬巴·奥》，通过一个黑人的遭遇，反

映了古巴黑人神秘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痛苦生活，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而使得该书具有强烈的民间文学的色彩。在西班牙，阿莱霍·卡彭铁尔密切了与诗人佩德罗·萨里纳斯(Pedro Salinas)、拉法埃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ía Lorca)等人的友好往来。1937年，他同古巴著名诗人、作家胡安·马里内约(Juan Marinello)、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和菲力斯·彼塔·罗德里格斯(Felix Pita Rodríguez)一道参加了在巴伦西亚和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国际保卫文化代表大会。在会上，他结识了一批拉丁美洲著名的作家，例如，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危地马拉大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等人。回到巴黎后，他还同阿斯图里亚斯一道共同创办了文学杂志《磁石》。1939年，阿莱霍·卡彭铁尔回到了古巴，开始在教育部主办的广播电台工作。1941年，他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从1939到1945年期间，他为一系列报刊杂志撰写文章，例如，《起源》(Orígenes)、《古巴杂志》(Revista Cubana)、《加勒比地区报》(La Gaceta del Caribe)、《我们的时代》(Nuestro Tiempo)等。1943年，他同演员路易·热韦一起去海地考察，为他后来创作长篇小说《人间王国》积累了素材。1944年，他在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的赞助下去古巴东部圣地亚哥调查民间音乐的情况。1945年，由于政治原因，他再度流亡国外，这一次是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那里，他从事广告节目制作和为报刊撰写文章。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阿莱霍·卡彭铁尔回到了哈瓦那，先后担任了一系列文化、出版和外交方面的重要职务，如，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副主席、古巴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国家出版局局长、驻法国大使等。

1975 年，他荣获墨西哥阿方索·雷耶斯国际文化奖；1977 年，获得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79 年，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梅迪西文化奖。1980 年 4 月 24 日，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巴黎逝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古巴，革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1961 年和 1967 年，卡彭铁尔曾经两次来到中国访问，多次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第一节 关于《人间王国》

《人间王国》出版于 1949 年，全书由《序言》和四个部分组成，讲述了 1760 年至 1820 年海地黑人起义的原因、历史嬗变和复杂的政治风云。

在《序言》中，卡彭铁尔第一次阐述了关于“神奇现实”（lo real maravilloso）的观点，他说：“这里处处是神奇现实。我想，这种神奇现实并非海地独有，而是整个美洲的特性。”“美洲的神话之源至今远远没有枯竭，这是由于美洲拥有原始纯真的景物，它本身的结构、本原、被发现得很晚以及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间奇异的并存和多血统的混杂。”卡彭铁尔感到的“神奇”是经过比较和思考之后得出的。他的参照系统是欧洲文化，更具体的说，是超现实主义主张的“梦幻和潜意识中的神奇”。经过比较，他看出美洲的印第安文化中早就存在着这样的“神奇”现实；哥伦布和他的同行者们来到美洲以后面对如此奇特的自然景观、奇特的人种所感到的“神奇”与卡彭铁尔感到的“神奇”有共通之处，即：他们的参照系数是同一个欧洲文化。其实，美洲的“神奇”本来就是如此，或者说，它的现实就是如此，无需到梦

幻和潜意识中去寻找。因此，卡彭铁尔在《序言》的结尾处强调说：“必须指出，小说所叙述的历史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的，不但历史事件真实，连人物（包括次要人物）、地点、街道以及一切细节都真实无误。纵然是貌似超然的时序也掩盖不了真实时间的显现。不过，在某个特定时期，以卡博城（海地一城市，法国占领时期称为法兰西角——译注）为神奇的交叉路口，戏剧性的离奇事件与富有幻想色彩的人物交织在一起，使得整个现实充满了欧洲无法企及的神奇，而这一切是如此的真实，如同小学教材中为传播知识而指明的典型事件一样。但是，整个美洲史难道不就是一部神奇现实的记录吗？”

小说的第一部分讲述了黑人蒂·诺埃尔（Ti Noel）起初跟随法国主人勒诺尔曼·德·梅西先生（Monsieur Lenormand de Mezy）的心理活动以及后来与黑人领袖马康达尔（Mackandal）发动武装起义的故事。马康达尔发誓要把白人奴隶主赶出海地，于是，他到处串联黑奴，焚烧庄园，毒杀牲畜，最后举行了起义。但是，法国殖民军队迅速扑灭了动乱的大火，马康达尔被捕，最后活活被敌人烧死。“马康达尔已经靠在行刑柱上。刽子手早已用火钳夹起来一块火炭。总督重复着前一天晚上面对镜子捉摸出来的表情，抽出指挥刀，下令行刑。火焰点燃了马康达尔的双腿，向上身蹿去。这时，马康达尔挥动着他那残废了的断臂（绳索无法捆绑的三角肌），他是在恐吓什么，动作虽然笨拙，却让人感到害怕，一面发出令人费解的谶语，一面激动地晃动着身体。他身上的绳索脱落了，身躯高大起来，一下子飞过了黑奴们的头顶。黑压压的人群连忙低下头来。这时，一声大喊响彻了整个广场：‘马康达尔得救了！’”

马康达尔的思想和黑人意识传给了蒂·诺埃尔。复仇的火焰依然在黑人胸中燃烧，他们渴望自由，盼望着解放，因此人人都相信马康达尔没有牺牲，总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在马康达尔领导下举起革命的大旗，推翻法国殖民统治，消灭奴隶制度。

第二部分叙述黑人第二次武装暴动的经过。这一次起义是由布克曼（Bouckman）领导的，他率领黑奴们用钢刀和长矛击败了强大的法国殖民军队。在海螺响起的时候，“黑人冲出茅屋，拿起棍棒，迅速包围了管家和工头的住宅，夺取了武器。拿着手枪刚一露面的出纳员就成了第一个牺牲者，他是被瓦刀刺中喉咙而倒下的。黑人们用这个白人的鲜血染红了双臂之后便向庄园的主要建筑物扑过去，一路上愤怒地高呼‘打倒地主！打倒总督！打倒白人的上帝！打倒世界所有的法国人！’但是多数人由于长期的饥饿，还是冲向了地窖，去寻找食物和饮料。他们凿开一个个放置葡萄酒的大桶。一块块桶板被凿出窟窿之后，红色的葡萄酒喷涌而出，染红了女人的衣裙。人们喊叫着，你争我抢，烧酒和甜酒的瓶子在墙上摔得粉碎。黑人们又打又闹，纷纷滑倒在撒满香油、西红柿、胡椒、鱼子酱和橄榄油汨汨流出的地面上。有个黑人开玩笑似地脱光衣裳跳进了装满猪油的大缸里。两个黑人老太婆又蹦又跳地在争夺一个瓦盆。许多人从房梁下摘下火腿和鱼干。蒂·诺埃尔没有参加人们的混战，他一心一意地叼住一桶西班牙葡萄酒的出酒龙头，喉节一起一落地拼命喝起来。到了喝得不能再喝的时候，他带着几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登上了二楼，因为多年以来他们父子就梦想着强奸弗洛丽多小姐。这女人虽然度过了一个个凄凉的夜晚，但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美丽和窈窕的线条。”解放了

的黑奴们尽情的享受着自由带来的欢乐，同时发泄着种族和阶级的仇恨。但是，这时拿破仑大帝的妹妹波利娜·波拿巴（1780~1825）率领大批增援部队来到古巴的圣地亚哥。

第三部分讲述亨利·克里斯托夫国王统治海地的情况。亨利·克里斯托夫 Henri Christophe, 1767~1820 出生在向风群岛格林纳达一个自由黑人家庭，从来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正式教育。1786~1788 年曾经在商船和饭店做侍者。1791 年参加海地黑人起义部队，由于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后被革命领袖杜桑·卢韦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 1743~1803）提升为主要将领。1802 年，法国军队进攻法兰西角时，亨利·克里斯托夫奉命抵抗法军，焚烧了海地角。后来在西部作战时，连续受挫，一度接受法军的议和条件，使得杜桑处于孤立地位。同年 6 月杜桑被法军诱捕，法国殖民政府企图恢复奴隶制。亨利和德萨林纳再度发动起义。1803 年二人彻底击败法军。1806 年亨利率领部下反对德萨林纳。同年 10 月，德萨林纳在太子港遭到伏击身亡。亨利召开制宪会议并当选为总统。在他任期内，实行独裁专制，维护大种植园经济，兴建豪华宫殿，引起普遍不满。1811 年 6 月 2 日自封皇帝，为亨利一世。1820 年身患中风，反对派乘机起义。同年 8 月亨利自杀身亡。《人间王国》反映了亨利·克里斯托夫从革命将领蜕变为独裁者的事实经过。但是这个变化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蒂·诺埃尔的亲身感受表现出来的。自从布克曼领导的起义又被法军镇压下去之后，蒂·诺埃尔就跟随梅西先生来到了圣多明戈。不久，法国大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美洲，奴隶制度被废除了。梅西先生在孤独和贫困中死去。蒂·诺埃尔回到了海地，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但是，好景不长，亨利·克里斯托夫维护大种植园主

的利益，推行强制劳动。这一切打破了蒂·诺埃尔明哲保身的想法。

第四部分讲述蒂·诺埃尔觉醒的过程。亨利·克里斯托夫政权垮台以后，大批黑白混血种人涌入海地，他们拼命抢占土地，蒂·诺埃尔发现“到处都有土地测量员在丈量土地；他还看到一些黑白混血种人骑在马上，穿着开领衬衫，腰间系着绸带，脚上穿着军靴，在指挥划分地界和田里的农活。有成百上千的黑人在士兵的看押下劳动。与此同时，许多庄稼人骑着毛驴，驮着鸡鸭猪狗，在女人的哭喊声中，纷纷离乡背井，躲到山里去了。蒂·诺埃尔从一个逃难的人口中得知，强制性的农业劳动制度又恢复了，如今掌握皮鞭的人是共和派的黑白混血种人了，他们成了北部大平原的新主人”。蒂·诺埃尔心里想：马康达尔可没有预料到黑白混血种人会搞这套强迫劳役制，那个牙买加人布克曼也没有想到。当过奴隶的人还会搞奴隶制度，这也算是一件新鲜事物吧。被压迫者也会“异化”为压迫者，蒂·诺埃尔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但是残酷的现实最终让他懂得了：“人类永远也不会知道为谁受苦，为谁期盼未来。人类受苦、期盼和劳作，为的是那些永远见不到的人们，而未来的人们又是受苦，又是期盼，又是劳作，可为的是另外一些同样不会幸福的人们，因为人类总是在渴望着比现状更加幸福的明天。可是人类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希望改善现状。这是必须的劳作。天国里就没有这份争取的辉煌，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事先确定好的规矩，那里有永生，不会有牺牲，只有欢喜和快乐。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只有在这人间王国里才能发现自己的伟大之处，发现自己确定的准则……”

《人间王国》的确使用了大量真实的历史资料，例如，

1757 年马康达尔领导的黑奴起义和 1791 年布克曼发动的黑人暴动；但是，《人间王国》毕竟不是历史书，而是小说。作者紧紧抓住“神奇现实”中的黑人信仰、观念和情绪这个“灵魂”，因为这样的“灵魂”让他感到神奇，让深受欧洲文化熏陶成长的土生白人知识分子感到神奇。在此之前，自从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以来，这些欧洲人就一直觉得美洲的自然和民族非常神奇。这在哥伦布的日记里和给西班牙王室的奏呈中、在贝尔纳尔多·迪亚斯·德·卡斯迪略的《新西班牙征服信史》中、在埃尔西利亚·伊·苏尼加的长诗《阿劳乌加》中都有这种对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族性格表示“惊奇”和感到“神奇”的记录。问题是为什么到了卡彭铁尔这一代人眼中，土著人的思想、意识、信仰会成为“神奇的现实”呢？这是因为卡彭铁尔们有幸了解到了欧洲超现实主义提倡的“潜意识”和“梦幻感觉”。布勒东们千方百计寻觅的“联想形式的超现实信念，梦想万能和毫无得失考虑的思想活动的信念”在美洲土著人的灵魂里是个实在的“现实”：土著人既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马康达尔在黑人同胞眼里是可以自然地变成飞禽走兽的，他被火刑烧死以后，同胞们认为这是“飞翔、飞腾”，因此感到“兴高采烈”。与此相对照的是白人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兴高采烈”是黑人“麻木不仁”的表现。其实，这是两种世界观、生死观和宗教信仰的冲突，换句话说，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否承认土著文化的宝贵价值和平等地位，这是考验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能不能抵御欧洲文化中心论影响的一块试金石。拉丁美洲土生白人直到 19 世纪才逐渐告别西班牙宗主国文化的影响，但是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追求目标是法国模式。什

什么样的文化模式才是拉丁美洲自己独特的模式呢？离开了美洲的自然、古印第安的文化传统、现存土著居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是不可能产生具有美洲特色的文化的。因此，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的生活和思想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拉丁美洲作家反映、表现、阐释和描写的对象。

第二节 《消失的脚步》

《消失的脚步》完稿于 1953 年 1 月 6 日，是卡彭铁尔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一开始通过第一人称“我”描述了“我”和妻子的处境和心境。“我”是个职员，妻子露丝是个话剧演员。“我”除去上下班之外就是去剧场接送妻子。露丝在一出名为《王位继承战争》的话剧里扮演女主角，本来她以为演上二十场也就罢了，没想到演出场次多达一千五百之数。她感到厌倦了，“她不是不想撕毁合同。可是在这个行业里，反叛的代价会是长期失业。”三十五岁的露丝感到艺术的青春即将过去，可是不得不混日子。“我”恨死了演艺这门行当，因为它破坏了“我”和妻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一天，“我”醒来时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但是看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妻子要到外地出差。“我”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孤寂感向我袭来”，“无所事事，因而感到孤独的威胁”。百无聊赖之余，“我”来到大街上闲逛，一切都不能让“我”感兴趣，因为一想到妻子外出，“我”的火气就不打一处来：“是她，实际上我此刻需要的是她”，“我真正想要的人只有她”。可是，妻子的演出活动硬是把“我”和她给分开了。“我”生气地思前想后，这时突然来

了一场雷阵雨，雨点打在了“我”的手上，给“我”激发出某种灵感：预告着一种机遇的来到。为了躲雨，“我”急忙跟着一只乐队走进了音乐厅。“我”没想到，乐队准备演奏的是《第九交响乐》等等“崇高”的乐曲，“我”“厌恶一切带有崇高味道的事物”，因此就离开了音乐厅。来到大街上以后，“我”突然撞到了一把撑开的雨伞上：“风把雨伞从对面来人的手中卷了出去又被一辆汽车轮子压扁了。那样子十分滑稽，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没有料到丢掉雨伞的人竟然是“我”的导师、现在的大学博物馆馆长。老人家高兴地说：“我正要找你呢！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我”跟着馆长来到博物馆。老人拿出一张旧唱片，放在一架老式唱机上，结果传出来的只有一种单调的鸟鸣。“我”不明白导师的这份礼物究竟有什么意义。导师给“我”解释说：“那是一种烧陶乐器吹出来的声音。是美洲最原始的土著用来模仿一种鸟在交配时的叫声，为的是将鸟引诱过来便于捕捉。”原来这是“我”曾经研究的课题，现在这张唱片证明的确存在着这种非常原始的乐器。所以老人激动万分地向“我”表示祝贺：“这是您的理论第一次得到验证。”“我”也很激动，回想起自己关于“神奇旋律模仿”理论的提出和后来不了了之的经过。“我”害怕导师会询问研究的结果。导师果然问起“我”研究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方法。“我”只好胡编乱造了一些理由，例如，不得不去担任军事翻译啊，不得不流浪街头啊，不得不为了生计现在拍广告片啊，等等。但是，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研究，由于“我”不会撒谎，便丑态毕露，“我一下子恼羞成怒，冲着馆长大动肝火，责问他是否以为如今还会有许多人能靠研究原始乐器混饭吃。”馆长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诉苦，然后

拿起电话，拨通了大学校长办公室。老人对校长极力推荐“我”利用假期沿着奥里诺科河逆水而上，去土著人居住的地区寻找几种大学博物馆缺少的原始乐器，而这个任务非“我”不能完成。几天下来，校长的决定下来了：赞助“我”去原始大森林寻找一套土著人使用的乐器。于是，“我”带着女友穆切坐上飞机前往几千公里之遥的一座边境城市。降落之后，“我”发现社会治安非常混乱，后来在“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居然发生了枪战。“我”决心“履行对大学博物馆馆长和校长的承诺，老老实实地完成人家交给我的任务”，继续向深山老林进发。次日，“我”带着女友穆切上了一辆长途汽车。“我”望着车外的风景，突然产生一种“回归”的感觉。但是，一路上也遇到不少麻烦事情，比如，“车子突然在一座小石桥上来了个急刹车。小桥架在一道深不见底的山涧上，可以听到从谷底传来的隆隆水声。一个身披蓝色毛毯的女人坐在桥栏杆上，脚边放着一个包袱和一把雨伞。人们跟她说话，可她不回应，好像是个傻瓜；她目光呆滞，嘴唇哆嗦，不停地摇晃脑袋。一位我们的旅伴上去给她嘴里喂了一块糖果，强迫她咀嚼，然后咽下去。那女人似乎有些省悟，开始慢慢地咀嚼，眼睛也逐渐有了精神，仿佛从遥远的地方归来，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惊讶。”原来这是一个被高寒和缺氧弄得险些丧命的混血女人：“头发和颧骨是当地土著人的，脑门和鼻子是地中海人的，浑圆的肩膀和宽阔的臀部是黑人的。”旅客们七手八脚地把这女人拉上了长途汽车。“我”望着这个女人，联想到了古代欧洲的混血现象，继而又想到古印第安人：“世界上最伟大的种族、最有个性的种族、最纯粹的种族、几千年来不被其他大陆知道的种族。”“我”昏昏欲睡，朦胧中睡了

一觉，醒来时已经来到一个古朴的村落。旅客们纷纷下车住进了简陋的客栈。穆切头疼，觉得自己在发烧，就上床睡觉去了。“我”来到客栈餐厅，看到了那个混血女人。二人攀谈起来，“我”方才才知道她仅仅为了把一幅《十四助理》的画像给她病重的父亲送去而走了几千公里的路程。餐厅里有许多装草药的抽屉，那女人给“我”一一说明每种草药的名称和用途。那女人还说，草药是森林王国的精灵，森林里有神守护的。人们进入森林不能白拿里面的东西，必须祷告和在一株老树根处放上几枚钱币。刹那间，“我”不知何故，觉得她长得很美。

但是，那女人道了一声“晚安”就去睡觉了。“我”一人独自望着壁炉沉思起来。突然，什么地方有音乐传了过来，“我”仔细一听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本来“我”是讨厌这种“崇高”的音乐的，但是此时此地，由于心境的变化，“我”联想起来欧洲文化和拉丁美洲文化的差异。最后，突然之间“我讨厌起《第九交响乐》这支曲子来了，因为它所包含的诺言没有实现，因为它所表达的救世愿望竟然以明显的‘土耳其音乐’的市集调平庸地变成了收束的‘急快板’”。第二天早晨，旅客们又登上了汽车。穆切通过“我”认识了那个混血女人。原来她叫罗莎里奥（Rosario），她耐心地听着穆切的抱怨：旅途中的种种苦楚。随后，两个女人看起来。穆切阅读的是一部欧洲名著，“我”因为看到里面有淫秽的内容而没有读完。罗莎里奥看的是一本讲述女英雄传奇的《热诺韦娃》。不久，汽车到达了火焰谷——一片盛产石油的沼泽地，光秃秃的平原上到处是点点火团，那是采油机旁排气管点燃的火团。这里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人们纷纷下车进入餐厅。这时，一大群外地

的妓女也如同赶集一样地来到这里凑热闹。穆切觉得好奇，就钻到妓女堆里问东问西。不料，一个希腊人看中了穆切，便纠缠起来。穆切吓得大喊大叫。“我”赶来营救穆切，却被希腊人打得鼻青脸肿。结果是罗莎里奥跑过来救了“我”。俗话说“不打不成交”，“我”结识了这个希腊人，二人喝了几杯老酒之后就成了朋友。穆切居然若无其事地凑过来，“脸上还带着挑逗和激动的笑容”，“这真让我火冲脑门”，“我突然发现她竟然粗俗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原来这是个在家待不住、不安分、好惹事的女人。”相比之下，罗莎里奥“变得越来越高大、越来越真切、越来越实在、越来越完美”。“我”接着对这两个女人进行了比较：穆切接受的是欧洲文化教育，一进入大山以后，她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格格不入、不合时宜、离奇荒诞，罗莎里奥与脚下这块土地有着相通之处，“这相通表现在她的皮肤、头发、腰肢、肩膀和大腿的各个方面”。但是，“我”明白：“她的见解、知识和精神生活和我的文化教养有着不可调和的因素。”但是，“我”觉得随着接触的增加，爱情可以减少“我”和罗莎里奥之间的文化差异。与此同时，“我”感觉穆切的存在成了“我”的包袱，而且这个包袱会越来越重。休息一天之后，“我”、穆切、罗莎里奥和希腊人离开了火焰谷，一同乘船逆水而上，向阿农西亚西昂港进发。“我”越来越后悔把穆切带来同行，因为“我”想跟船上的人们、尤其是女人们更亲近些。但是，“我”不敢，尽管“我”越来越佩服穆切的胆识。经过一处名叫“马的领地”的地方，“我”感触良多：“马这种牲口的光辉历史，继作为欧洲人的最大财富——既是战争机器、代步工具、信史邮差又是显贵们的雕像的底座、建筑排挡和凯旋门

的装饰——之后，只是在美洲真正得以延续。因为正是在新大陆，马还在一成不变地在极大范围继续担负千百年来一直都在履行着的使命。”接着，这条船又经过了“一座奇妙的废城”：空空荡荡的街道，无人居住的房屋，一座经过战火的教堂……总之，这片废墟表明此地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洗劫。但是，“我”随即看到了一支有土著人、黑人、混血种人和白人天主教徒们组成的宗教游行队伍。嗣后，又听到了罗莎里奥邀请的两位吟游歌手演唱的查里曼大帝、法兰西史诗《罗兰之歌》和西班牙拉腊七王子的故事。“我”在琢磨：“这一地区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是否就在于第一次使不同文化的共生成为可能呢？”“我”和“我”的朋友们来到了阿农西亚西昂港，“我”发现“我们已经远离了马的领地而进入了狗的疆域”。原来，他们已经来到大林莽的边缘：高大的树木下面长着茂密的荆棘和草丛。马是绝对无法进入林区的。但是，狗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方便地跟着人类出入没有路径的原始森林：“这些草莽繁生的速度足以在一夜之间抹去人类开辟出来的一切路径。在这个没有道路的世界里，马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我”和穆切下榻在一家原来是兵营的破旧客店里。穆切的情绪坏透了，她不能接受这个“仍然处在油灯和蜡烛时代的事实”；她时时流露出“厌烦、疲倦、嫌恶以及想要大吼一声说这次旅行是多么让她难以忍受而又不能抱怨的神情，因为这次旅行是她自己要做的，而且还满怀着颇带诗意的兴奋之情”。“我”和穆切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我”感到这一路上的收获已经不少：这里的人们仍然“保持着一种灵性、一种对非常古老传统的认知、某种文化——比我们熟悉的文化更为诚实和更为有价值的文化——的活标本”。穆切完全不理睬这一套，“断言这

里根本就没有可看的和可研究的东西。她说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没有特色，作为结论，她断然宣布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回家。”“我”坚持要履行跟大学签订的合同，“一定要到能够找到让我搜集的乐器的地方之后才返回。”于是，“我”的女友立刻火了起来，骂“我”是资产阶级。接着，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床上站起来，头发披散到脸上，“将两只小拳头举到我的头顶，那股疯狂劲儿，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两人吵架之后，“我”来到附近一家酒馆，看到那个希腊人在开怀畅饮。他把一个外号叫“先行官”的小个子男人介绍给“我”，他说“先行官”掌握着进入森林王国的钥匙，只有“先行官”知道进入森林的通道。此外，“先行官”还有一条名叫“雀鹰”的猎狗，它善于捕鸟，“能一毛不损地把鸟逮给主人去做交易，因而得了‘雀鹰’的名字。”“先行官”告诉“我”：有个采集植物的专家可以帮助“我”走上三天水路，到一个土著村落里找那些古代乐器。“先行官”还描绘了他看到过的那些乐器的形状。这时，有人来告诉“我”：罗莎里奥的父亲由于没有及时看到《十四助理》的画像，已经去世了。“我”前往罗莎里奥的家慰问。“我”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哭丧场面，那悲痛欲绝的神情让“我”感到震动。“在哭喊着愿意跟随父母一起进入坟墓的时候，罗莎里奥等九姐妹在履行着这一古老仪式中最为崇高的程序。依照这一程序，为使死者免受孤寂之苦，必须给他们陪葬物品，必须对他们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正当“我”反复比较农村和城市人对死亡的不同态度时，那个希腊采油工跑来告诉“我”：应该抓住罗莎里奥在厨房煮咖啡的机会，让“我”好好跟这个美人套套近乎。“我”不好意思地去了。经过交谈，“我”方才知道罗莎里

奥的父亲是死于中风和心肌梗塞的。葬礼后，“我”的女友穆切“好像把前一天夜里大吼大叫要回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她说愿意跟着割胶工人的船逆水而上。“先行官”认为可行。一个名叫亚涅斯搞钻石矿的人说，当天夜里就可以赶到他兄弟开的钻石矿。穆切一听更加来劲，她请求罗莎里奥一道前往。罗莎里奥看看“我”的眼色，就表示同意了。但是，到了钻石矿上一看，穆切大失所望：原来那里仅仅是一片烂泥塘，根本没有什么闪闪发亮的宝石。失望之余，穆切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她在洗澡时，用污秽的语言挑逗罗莎里奥，遭到了后者的怒骂。“我”对穆切已经彻底失望了，因为她曾经跟那个希腊采油工去一座岛上做爱。正当“我”感到左右为难的时候：带穆切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又患上了疟疾；为她留下而放弃计划，也是不行的，因为那古老的乐器就在眼前了。这时，那个采集植物标本的专家表示可以陪同穆切回港口上等待“我”的归来。“我”非常高兴，喜上加喜的是：罗莎里奥向“我”倾诉衷肠，原来她早就爱上了“我”。“我俩”就在穆切的病榻旁发生了性关系。送走了穆切之后，“我”和罗莎里奥更是肆无忌惮地公开“勾搭”起来。“所有的人全都注意到罗莎里奥跟我‘勾搭’——这是当地人的说法——上了。她对我关怀备至，为我端饭，给我挤羊奶，用干净毛巾给我擦汗，专注地听我讲话，静静地陪伴着我。”“我”和一行十几人的“探险队”又重新上路了。他们一路乘着木船上行，险恶的水路让“我”感到害怕，尤其是夜间行船：“当困倦终于战胜了对周围险情的恐惧时，我真差点儿坚持不住了，差点儿要大喊一声‘我害怕’……”天亮以后，“我”知道自己闯过了第一关。“昨天的种种恐惧全都随着夜色的隐退而消失了。”

“我”在洗脸的时候，不时地看看美丽的罗莎里奥，不时地思考着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森林中的黎明总会唤起我们那深藏在血管中的欣喜之情。”但是，原始森林也有令人迷惑和恐惧的面孔：“森林是个虚假、险恶、披着迷彩的世界。那里的一切都是伪装、计谋、假象、虚拟的状态。”不久，他们继续乘船前进。很快，第二道险关又临近：一场暴风雨来了，“小船忽而潜入浪谷，忽而跃上礁顶，一会儿是前冲，一会儿是急剧地侧向滑入湍流，船在浪花中发出‘吱吱’乱响，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闪电中只见同船的佩德罗教士已经不是在指引航向，而是在祈祷了，这更增加了我的恐惧。罗莎里奥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镇定自若，她双手搂着我的脑袋，仿佛一位母亲在危险关头护住新生婴儿头颅似的。”就这样，“我”在情人的保护下度过了第二关。大家在船搁浅的地方上了岸，走进一个村落。“我”立刻筋疲力尽地睡着了。一觉醒来，“我”发现参天大树的背后，是刀削般陡峭的悬崖。“如此恢弘的景观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凝视片刻后，我不得不低下头来。”“我”看到：“水塘边零星地建有几间茅屋，几个打鱼归来的土著人抬着用木棍穿着鳃部的大鱼。再过去一点的地方，有几个编织衣物的土著女人，她们的奶头上全都吊着个吃奶的娃娃。罗莎里奥正在一棵大树下面洗我的衣服，她身边有个捣木薯的老妇人。罗莎里奥跪在水边，披散着头发，手里拿着捶衣棒，那样子完全像个原始人。”这时，“我”非常有感触地想到：“我周围的人全都在忙着自己分内的事情，显示出了一种顺应生活基本节律的劳动分工的和谐。我过去只是在多少带有杜撰成分的故事里听说过他们的生活，而且总是以为他们属于真正人类之外的生灵。如今他们是在自己的天地里，自己

的生存环境中，他们是自己文化的绝对主人。那种他们属于‘野蛮人’的荒唐概念与他们的真实情况完全不符。”

“我”看到这些土著人一点也不“原始”，他们会射箭，会捕鱼，会盖房子，掌握了生活所需的全部技艺，许多人是真正会生活的能工巧匠。正当“我”在清理自己对土著文明的认识时，“先行官”从一间茅屋里跑出来，他欣喜若狂地招呼“我”，“因为他刚才发现了我此行所要找的东西，也就是我使命的目的和终结。在那边地上的火炉旁，放着我奉命要收集的乐器。我如同一个徒步跋涉二十几个国度终于看到了所要朝勤的圣物的香客一样，激动地把手放在那有着十字形抓手、最原始的烙花鼓槌上。接着，我又逐一看了上面插着一束羽毛用在奠仪上的沙球、鹿角号、花铃和召唤那些走失在沼泽里的打鱼人的陶哨。那里面还有一整套堪称风琴老祖宗的芦笛。尤其是那里还有用于葬礼的嚎啕罐：透着任何与死亡有关系的器物所特有庄严、肃穆，发出的声音沙哑而凄厉，仿佛墓地在回响，两边各有一根管子，与最早记载的描述完全一样。在谈妥把那套人类凭借最崇高的本能创造出来的物品交换给我的条件之后，我仿佛觉得自己跨进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我的任务完成了，只用十五天就圆满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先行官”还告诉“我”：如果愿意深入到森林里去，还可以看到更加“神奇”的现实。“我”同罗莎里奥商量此事，她非常温柔地愿意跟着“我”走遍天涯海角。于是，在“先行官”的陪同下，“我”又走了几个更加原始的部落：时间仿佛倒退了几千年。一次，有个土人被眼镜蛇咬死了，人们把这个土人抬回到部落里来，请巫师设法从死神的手里夺回这个人的生命。看到巫师手舞足蹈、抽抽噎噎的样子，“我”顿时愕然醒悟：音乐原来就是这样起源

的。在随后的两天里，“我”、罗莎里奥、“先行官”和教士决定继续沿着小河乘船前进，因为“先行官”要带领大家去看看他创建的城市。“我”想到创建城市是何等伟大的壮举啊。但是，当小船泊定以后，“我”看到了“先行官”说的鹿城圣莫尼卡，“然而，说实话，我感到疑惑不解。举目望去，眼前的小山谷里只不过有一块用砍刀清理出来的二百米见方的空地罢了。空地尽头有一所泥巴苇箔做墙的大房子，有一扇门和四扇窗户。在一间似乎用做仓库或者牲口棚的大房子两侧各有一座结构与前者相似的住宅。此外，还有十来间土著人居住的茅屋。里面正冒着白烟。”“先行官”得意地对“我”说：“这是中心广场……那是政府大厦……那儿住着我的儿子马尔科斯……那边是我的三个女儿……库房里有一应器具，还养着牲口……后面是土著人的居住区。”“先行官”还说，将来还要建造教堂。正在这时“先行官”的土著妻妾、混血的儿女们、土著人和酋长都闻讯前来欢迎“总督”（指“先行官”）和“主教”大人（指佩德罗教士）归来。教士给“我”解释说，这里之所以叫“鹿城圣莫尼卡”，是因为盛产红鹿，这座“城市”缔造者的母亲名叫圣莫尼卡。“我”心目中想象的“城市”还要更为“壮观”和“奇异”。教士进一步给“我”解释说，西班牙最早来到美洲的征服者就是这样建设“城市”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自由自在的土著村落还要建造一座欧洲式的教堂？难道“先行官”不知道种种教规会成为一种累赘？到了晚上，“先行官”讲述自己的生平和一些危险的经历：他原来的名字叫帕勃罗，本来是一家药店的伙计，后来跟着一群淘金者来到了原始森林的边缘。帕勃罗喜欢独自一人行动。一天，他迷了路，受了伤，幸亏土著人救了他。伤愈之后，

他把发现的金块换回一些种子、秧苗、农具及木工用具。第二趟出去时，他用小船运回来两头猪。接着，又弄回来牛和羊。这样，时间一长，“先行官”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感情，土著姑娘们也纷纷找他做爱。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建造“城市。”于是，他有意识地规划这个地方：广场、政府大厦、纪念碑等，甚至还规定了公墓的范围。“先行官”的这套设计并不是要重复现代城市那种模式，恰恰相反，他讨厌“那边的文明世界”，因为“那边”的社会让人感到恐惧、残酷和冷漠。“这边”虽然有自然灾害、毒蛇、猛兽，但是这些危险是“可以预知的，是严酷的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人们会为一些极平常的事情感到欢欣鼓舞。”在这个精神充满自由的土地里，“我”和罗莎里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让“我”下决心不回“那边的文明世界”去了。“我”把这个意思告诉罗莎里奥。她毫不犹豫地表示赞成。但是，她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决定对“我”的真正分量。因为，“我”得放弃“那边”的一切，得从头开始适应这里环境、气候、人们的风俗习惯。“我”一想到，每天的清晨都可以在这自然造化的瀑布下戏水；每天晚上都可以睡在美丽的罗莎里奥身边，“就会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这个充满了石器时代文化氛围的环境里，“我”在不断反思自己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我”认为，要想了解人类的艺术起源，为什么不到那些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中间了解一下他们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呢？音乐理论家的主观论断是没有益处的。“我”反省自己对音乐起源理论的研究思路，本来“我”对巫术与音乐的联系有某些推断。而如今是“亲眼”看到了“重复某个音节就会最后使之产生某种旋律”；看到了“真假声音的融和使巫师发出高低不同的两种

音调”；看到了“音乐的主题产生于非音乐的活动”

“我”觉得那些断定音乐产生于人类模仿鸟儿啁啾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但是，“我”随后想到“既然已经决定留下来，那就应该果断地放弃这类毫无意义的高深探索”。那么如何处理与博物馆馆长的关系呢？“我”决定把那些原始乐器通过邮局寄出去。从此，“我”心里坦然地参加了鹿城的建设活动。“我”感觉到“大脑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体型也变得精干了。”“我”要好好体验和观察一下这里的原始生活。其结果是“对神奇的自然造化有了新的领悟”。这时，“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非要写一首题为《哀歌》的曲子不可。“我”没有五线谱，就向“先行官”要小学生使用的练习本。在充满激情的创作过程中，“我”发现罗莎里奥非常冷漠，常常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这时，佩德罗教士不厌其烦地数落着“我”不应该不举行结婚仪式就与罗莎里奥同居。“我”感到非常难办，因为妻子露丝并没有同“我”离婚；如果同罗莎里奥结婚，那就会犯重婚罪。“我”把这个意思跟罗莎里奥说了，出乎“我”的预料之外，罗莎里奥并不同意结婚，因为她坚持认为“结婚意味着女人落入了法律圈套，而这个圈套是男人设置的。自由同居就不同了，只有男人表现好的时候，女人才会愿意跟他睡觉”。对于任何强奸行为，这里的人都是不答应的：马尔科斯枪毙了麻风病患者尼卡西奥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坏蛋强行污辱了一个女孩。一天，土著人纷纷跑出茅屋向天空惊恐地张望。“我”也被惊动了。天空传来一阵阵“嗡嗡”声。原来是一架飞机在天空盘旋。“我”连忙挥舞着双手。飞机驾驶员发现了“我”，就在广场上降落了。两名驾驶员下了飞机，连连呼唤“我”的名字。接着，他俩讲述了“那边的世

界”发现“我”失踪了，便由一家大报社出面重金悬赏，请飞行员帮忙寻找。飞行员根据博物馆提供的情况来到了高原上空，侥幸发现了“我”的存在。“我”一问飞行员这个原始部落的地理位置，原来这里距离最近的大城市只不过三个小时的航程。“我”深有感触：从石器时代跨越到“那边的世界”只要三个小时的时间！飞行员们请“我”立刻上飞机，“我”拒不从命。“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但是，“我”感到“不能没有纸和墨，不能没有用纸和墨表达出来的东西”。“我”想到只要飞上三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创作用的很多纸张和墨水了。于是，“我”望望罗莎里奥，“她脸上表情冷漠，看不出不高兴、担忧或者难过。”“我”向前来送行的人们一再表示：“几天之内我再回来，然后就永远留在这儿。”“我”回到“那边”以后，要跟妻子露丝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斩断至今还把我捆在‘那边’的世界上的法律联系。”“我”还准备“不出三四个星期，我就将携带着足以供我几年之需的东西重返这鹿城圣莫尼卡”。“我”的如意算盘是：重返鹿城以后，还要继续音乐创作，但是会完全摆脱“虚荣心的制约”，通过港口的邮局寄出去之后，只要有一个知音或者对某个青年有所启迪，“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把这一整套想法告诉罗莎里奥，可是，她“一言不发，耸了耸肩膀，流露出轻蔑的神情”。于是，“我”把草稿交给她作为信物，还说，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你和这些本子”。她却满怀怨怒地说：“你可以带走。”“我”想吻她，她急忙避开并且挣脱了“我”的拥抱，头也不回地走了。这时，飞行员再次招手命令“我”上飞机。“我”登机以后，飞机开始滑行，土人们发出欢呼声。接着，“我”从空中俯视：看到佩德罗教士挥舞着手

杖，“先行官”双手叉腰望着天空，马尔科斯摇动着草帽，罗莎里奥独自一人走向“我俩”同居过的茅屋。“我”似乎闻到了她的体香，心头不由得一颤。与此同时，“那边的世界”已经为炒作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将扮演忠于妻子，但是要为科研而殉道的烈士。一切都是骗局，“我”是个大骗子。“我”刚一下飞机，妻子露丝就迎上来拥抱、亲吻“我”，接着就伏在“我”的肩头哭了起来。记者蜂拥而上，无数支闪光灯晃得“我”睁不开眼睛。博物馆馆长走过来热情地拥抱了“我”。随后是以校长为首的各系主任组成的大学代表团。接着是中央和市政府的官员、各大报社社长。最后是“我”所属的广告公司董事长和公关代表。

“我”在人们的簇拥下步入市政接待大厅。招待会开始以后，“我”发现妻子露丝“逐渐变成了场上的中心，人人瞩目的对象，她以舞蹈家的优雅和轻盈独霸了女主人的地位”，“总之，她是用尽了浑身解数努力给人们造成值得由衷祝贺的幸福妻子的印象。”但是，“我”的心仍然在千里之外，对这一切全都无动于衷。“我”和妻子回到家中。这时，有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剪报来。露丝看了勃然大怒。原来是穆切和一家小报记者的谈话：穆切以“我”的合作者身份出现，她说自己是“星相学家”，只是因为患上了疟疾才半途而归的。“实际上，她这是在对我和罗莎里奥私奔以及对我妻子通过大肆欺骗舆论的方式为自己设计美妙角色的报复。”“我”妻子导演的这一切突然变成了滑稽戏。露丝大闹了一场。“我”原原本本地交代了一切。“这时，我出其不意地说出了‘离婚’二字，她好像没有听懂，我就又重复了两遍，心平气和，口气坚决。”露丝歇斯底里地折腾了一通以后，“直言不讳地说她有办法让事情旷日持久地拖延下

去。她要让离婚案充满麻烦，她要用反复无常的法律绳索、用没完没了的程序把我捆住。”“我”听了以后气愤地离家出走了。“我”走在城里的街道上，心里对“这边”和“那边”两个世界做着比较：这个“文明”世界里处处是不文明的现象，死气沉沉，冷漠，残酷，恐惧，混乱，污秽，疯狂……那个所谓的“野蛮”世界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先行官”的经历让“我”懂得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确立一种精神追求，生活在自由自在的天地里。这个“文明”世界处处充满了束缚；那个“野蛮”的天地，心灵可以自由地驰骋。“我”决心不做“文明”世界的奴隶，不当别人的工具，冲破一切羁绊，一定要回到森林里去。这时，“我”的女友穆切又露面，她试图用旧情拉住“我”。“我”毅然从她家里逃了出来，“我知道今后永远都不会再登那个门槛了。”“我”终于回到了森林的边缘，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通向鹿城的那条小河的标记。正在“我”发愁的时候，那个采钻石的希腊人亚涅斯来了。“我”恳求他先讲一讲罗莎里奥的情况。亚涅斯说：“她当了马尔科斯的老婆，而且还怀了孕。”“我”听了以后，感觉撕心裂肺，五雷轰顶。“我”心灰意冷，觉得只好回到那个给人做奴隶或者工具的世界去了。

阅读《消失的脚步》之后，读者会产生震撼的感觉，会对当代“文明”提出一连串的质疑，会对当今世界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重新加以审视，会对“文明”与“野蛮”的定义和内涵重新加以评估。此外，这部长篇小说还会充分满足渴望了解拉丁美洲文化的读者的好奇心，因为它展示了一幅印第安文化、欧洲文化与多民族混血文化互相交融的生动画卷。

第三节 《光明世纪》

《光明世纪》是卡彭铁尔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发表于1962年。这是一部历史题材小说，着重表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尤其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主要人物有：姐姐索菲亚、弟弟卡洛斯、表弟埃斯特万以及起初是太子港的商人、随后是革命家、最后投机取巧成为独裁者的法国人维克托·雨格。小说一开始介绍了索菲亚和卡洛斯的父亲突然中风去世、亲人们治丧的情景。老人家生前是庄园主兼商人，他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母亲去世得更早。父亲死后，索菲亚只好从修道院回家照看弟弟和表弟。表弟埃斯特万是老人家的外甥，这孩子从小就失去了父母，他是和索菲亚以及卡洛斯一起长大的，但是他体弱多病，总得需要别人照顾。悲痛过后，尽管三人年纪不大，但是也得撑起门面。索菲亚要管家，卡洛斯也得准备继承父亲的商业：“想到他必须当买卖人的日子就要临近了，不禁害怕起来：他一不了解行情，二不会分辨货物质量，可他得把货物卖出去。”埃斯特万则每天同哮喘病斗争，但是他“梦想去巴黎，那里有画展，有知识分子聚会的咖啡馆，还有他们的文学生活。他想去法兰西学院学习东方语言”。三人在讨论今后怎么生活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哭泣着互相拥抱，感到在世界上很孤单，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对任何艺术或者诗歌都不感兴趣，而沉迷于做生意和干丑事之中，他们是无人照管的孤儿。”一年以后，一个名叫维克托·雨格的商人唐突地来看望“老人家”。孩子们不高兴地告诉他：

“父亲已经去世了。早就安葬了。”这个不速之客大大咧咧地自我吹嘘一番，全然不顾索菲亚的愤怒，拿出自己带的葡萄酒邀请两个男孩喝起来。随后，这个三十多岁的商人竟然带领两个少年玩起游戏来。三人整整玩了一个通宵。最后，少东家命令仆人套上车把这个法国客人送到附近的旅馆去。索菲亚、卡洛斯和埃斯特万本应该为亡父做弥撒的，但是由于疲倦，就都上床睡觉去了。从此，维克托·雨格便经常来索菲亚家做客，他懂得的事情很多：会烹饪，会布置房间，会摆弄科学仪器，会唱歌、跳舞……随后，就干脆从旅馆搬到她家里来了。一天，埃斯特万的哮喘病又发作了。维克托·雨格请来了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混血医生奥赫。这位江湖郎中坚持认定，周围有某种植物是埃斯特万的病根。结果，他们发现庭院后面有一道篱笆拦住了行人的去路。他们从仆人雷米修的房间穿过，打开一扇蓝色漆门，立刻惊讶地看到那里生长着一些植物：木犀草、欧芹、金雀花、荨麻、含羞草等。奥赫坚持认为，某些疾病与植物有关系：“每个人都在某些植物上有自己的‘替身’”，“‘替身’为了自己的生长而偷窃那人的精力，因此那植物开花或者结果时，那人就会病倒。”奥赫拔掉了那些植物，用一铲燃烧的炭把它们给烧掉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仆人雷米修买药回来看到这一切，“见此情景，脸色顿变，暴跳如雷，叫道：‘谁把我的草药烧了？’”原来这些草药是可以卖钱的。接着，雷米修气急之下还说出一个秘密：老爷生前是死在一个女人身上的。这让索菲亚感到羞愧难当，立刻解雇了雷米修。但奇怪的是，埃斯特万的哮喘病竟然不发作了。“病人睡得很实，呼吸正常，指甲在恢复本来的颜色。”但是，雷米修无意中泄露出来的关于父亲玩弄女人的秘密却让索菲亚非常生气。

埃斯特万的病渐渐地痊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从少年向青年过渡了：身体发生变化，有了性欲要求，居然去红灯区嫖娼。索菲亚也发生了进入青春期的变化。卡洛斯的变化更大，竟然长时间一人在外面闲逛。这时，有消息说，奥赫大夫的家被搜查了。医生本人下落不明。维克托·雨格出去打听情况，结果也不得要领。这时，每年一度的飓风季节到了。狂风暴雨带来的大水冲进了庭院，流进了餐厅，漫过了房间的门槛。索菲亚、埃斯特万和卡洛斯忙着收拾家具。维克托带领仆人们去仓库抢救货物。大风过去了。人们都累得筋疲力尽。维克托·雨格把索菲亚抱到了床上，他想奸污这少女，结果遭到坚决反抗，只好灰溜溜地跑了。索菲亚又惊又怕，但是发现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已经引起成年男子的注意了。“在几个小时里，她就告别了少女时代，感到自己成熟了，感到自己已经成为男人注意的目标。”她生气地想：“我是女人了。”清理过飓风造成的财产损失之后，维克托发现遗嘱执行人堂柯斯梅先生利用这几个孤儿没有理财的经验在中饱私囊，大发横财。他严厉地批评了这位律师的卑鄙行径。堂柯斯梅立刻反唇相讥，大骂维克托是“共济会员”、“魔鬼”、“异教徒”，他说，“这类人无孔不入，以‘博爱’、‘幸福’、‘民主’为名，从事反对教会、政府和社会现行秩序的国际阴谋活动。”最后，律师发出威胁说，他要报告警察来抓这个叛乱分子。然后，他就愤然离去了。索菲亚先是感到惊愕，随即愤怒起来，把父亲的遗像摔在地上猛踩。这时，仆人雷米修前来报告说：警察要来抓共济会员。众人商量之后，决定去庄园里躲一躲。除卡洛斯看家外，索菲亚、埃斯特万、维克托以及刚刚找到的奥赫大夫都来到了庄园。维克托亲自动手杀鸡、炖肉、做菜。

饭后，他给大家讲为什么从事商品走私活动的原因。“这是对西班牙垄断贸易、滥征赋税的报复。”接着，维克托和奥赫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介绍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博爱派的活动。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埃斯特万感到此前真是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索菲亚发现自己热衷这个“革命”的话题了。第三天，卡洛斯快马加鞭地来到了庄园，他告诉维克托和奥赫大夫：西班牙总督已经下达了逮捕他俩的命令。维克托说：马上开路！等到他俩收拾好东西以后，索菲亚和埃斯特万决定送他俩到海边。四人来到一个小渔村以后，那里有艘法国船，船长名叫德斯特，也是个讲究“自由”、“平等”的博爱派分子。维克托邀请索菲亚和埃斯特万做一次海上旅行：先去法属海地的首都太子港玩几个星期，再去苏里南卸货，最后返回哈瓦那。他们没有想到这时的太子港爆发了黑人起义。大家决定让索菲亚留在古巴的圣地亚哥等待消息。嗣后，德斯特的船向太子港进发。到达那里以后，大家看到港口已经烧成一片大火。奥赫和维克托上岸分别去打探消息。奥赫回来时伤心地说，他弟弟已经被法国白人移民给杀害了。维克托说，他的财产被烧得一干二净：“他失去了全部家产，连一件家具、一份合同、一本书都没有了……；他现在一无所有，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了。”奥赫要留在太子港，他劝告维克托和埃斯特万赶快离开海地。维克托看到了危险性。埃斯特万还在犹豫不决。奥赫说：“你要是不走，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把你给宰了！”埃斯特万犹豫的原因是德斯特的船已经开走了，刚来的船名叫北风号，满载着难民，准备立即起锚回法国。他如果上了这条船，那就不能回古巴的圣地亚哥了，索菲亚就要白白在那里等候了。好在奥赫会设法通知她，卡洛斯也会去

接她回家。“埃斯特万既担心又后悔，但是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他又有些兴奋。同维克托·雨格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变得成熟、坚定、有男子气概了。”起航以后，维克托同船上一个法国人闲聊起来，方才得知：1791年6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带着家属逃出巴黎，6月21日在东北边境被抓获。如此重大的消息让维克托感到激动：“祖国的人民正在为新人类的出现而奋斗，而我还在这里做什么丝绸生意……”埃斯特万和维克托来到了巴黎。埃斯特万觉得巴黎的一切都很“奇异”：“这里的旗杆、小旗、彩饰和徽志，他都觉得奇异，真正的奇异。”对于这场震撼世界的大革命，他闹不清楚究竟是谁在领导：“事件连续发生，讲坛上出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演说者比他大不了几岁，这一切闹得他目瞪口呆。他混在群众中参加大会，但也得不到多少消息。演说者的高谈阔论让他感到茫然。”维克托整天早出晚归。埃斯特万虽然跟他住在一起，但是也很少有时间说话。这个小伙子落得自由自在：每天跟着游行队伍乱跑，或者溜进随便哪个政治俱乐部，也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他的口气比法国人还法国人，比革命者还革命……”他的思想变化很快，有一天，“他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演说，提出：要把革命推进到新大陆去！”不久，他又结识了侨居法国的西班牙人团体，他们里面有共济会员、博爱派成员和教会的死对头，人人都主张“打回老家去！解放西班牙！”埃斯特万说：“在西班牙搞革命还不够，也要在美洲闹革命！”思想越来越激进的埃斯特万后来又加入了共济会。就在这时，维克托问他：“你愿意为革命工作吗？”埃斯特万表示愿意：“他将自豪而热情地为革命工作。”维克托警告他：日后不要再参加共济会的活动了。那是个反革命组织。只有雅各宾派才是

惟一的革命派。随后，革命领袖布里索接见了埃斯特万，交给这个小伙子的革命任务是：到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地区去，那里“需要一个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善于用西班牙语写作并且能够翻译法文文件的人”。埃斯特万接受了这一任务，一路辛苦之后，终于来到了边境小城巴荣纳。几个月过去了，埃斯特万尽力完成单调的翻译工作，但是工作之余，他非常想念祖国和亲人，尤其是想念索菲亚：“如今在痛苦时，他真想把头轻轻地靠在她的腿上，寻找使人宁静的母性力量……”这时，埃斯特万的一个在军队担任上校的朋友怒气冲冲地跑来告诉他：巴黎掀起一股排外浪潮，“这几个月来，在法国只要是外国人就是犯罪。”上校生气地说道：“他们一方面在巴黎出卖真理，另外一方面，由于他们无能 and 嫉妒，失去了在西班牙搞革命的大好时机。他们只考虑法国革命，哪里有搞世界革命的念头！”埃斯特万害怕邻居听到他俩的谈话，急忙借口买纸张把上校拉到外面大街去了。二人走进文具店，发现连音乐也革命化了。上校又发了一通牢骚。埃斯特万连忙制止上校不要胡说八道。两个人来到大街上。上校发现有部队在调动，他拦住一个大兵询问原因，方才得知法国革命政府要派兵到加勒比海地区，去对付那里日益横行的英国海军势力。指挥法国舰队的最高行政长官有两位：克雷蒂安和维克托·雨格。埃斯特万心想：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摆脱眼下这个无聊的工作。于是，他给维克托·雨格写了一封信，要求跟法国舰队一道回美洲“去闹革命”。不久，来了回音：维克托·雨格命令他立刻到舰队集结的港口去报到，他已经给埃斯特万在舰队上谋得了一个职位——书办。法国远征军的目标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瓜德罗普岛。埃斯特万非常高兴，连忙前往港口。一见到维克托·雨格，埃

斯特万立刻发现这位“革命家”已经端起了大官的架子。舰队起航以后，埃斯特万感到：现在的任务是打英国人，离开革命是越来越远了，离开红色恐怖的气氛也是越来越远了，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远航的次日，舰队冲破了英国舰队的封锁以后，“全舰的上上下下都在愉快地唱呀，笑呀。”维克托·雨格身穿行政长官的制服检查工作，人们停止了歌唱，个个对他敬而远之。但是，他本人对这一畏惧的态度很有几分得意。维克托·雨格的得意自然有他的道理：他将送给美洲一份厚礼：“宣布取消奴隶制。今后所有的人，不分肤色和种族，凡居住在咱们殖民地的，都是法兰西公民，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但是，随船而来的还有一架断头机。这是意味深长的：革命解放了奴隶，但是革命的权威性还需要铁腕来维护。维克托·雨格就是一位铁腕人物，断头机就是用来对付内部和外部叛逆者的。在内部，他建立了“汇报”体系，因此警告埃斯特万不要胡说八道：“你说话小心点儿，有人马上会向我汇报的。”舰队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埃斯特万的心情反而变得矛盾起来：这几年来，特别是在法国参加了大革命之后，他的脾气变得古怪起来，越来越喜欢抬杠。如果有人把这场大革命吹得天花乱坠，他会举出一大堆错误和缺点来。但是，如果保皇党要跳出来攻击大革命，他“会挺身而出为革命辩护”。舰队开始攻打英国人占领的瓜德罗普岛了。另外一位行政长官克雷蒂安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光荣地牺牲了。但是他的表率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结果把英国人打得溃不成军。法国人占领了港口，缴获了八十七艘商船。埃斯特万被派往外贸商行，接收战利品。不久，英国人重新集结了部队，组织了火力，向法国军队发起进攻。这时，维克托·雨格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

才能，坚决顶住了英军的炮击和进攻，赢得了军民的拥护。与此同时，法国本土传来消息：革命党内部发生了分裂。维克托·雨格的态度很明确，谁掌权就拥护谁。对此，埃斯特万感到十分惊讶：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居然不管是非曲直，只知道一味地服从掌权者，这是不是典型的奴隶主义呢？有一天，维克托·雨格回答了他的疑问：“革命不是争辩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眼下，英国人还盘踞着巴斯特尔城呢。这是咱们惟一应该关心的事情。”维克托·雨格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利用英军内部发生热病的混乱时机，一举攻下了巴斯特尔城。他成为瓜德罗普岛的主人并郑重宣布：“人们可以安居乐业了。”断头机也公开运转起来：砍掉了两个教士的脑袋，因为他们私藏武器。“从这天起，大恐怖的日子开始了。断头机在胜利广场上不停地工作着，一刀一刀地铡下去，丝毫不放慢速度。在这个小地方，观看处决人犯的好奇心一直不减，所以断头台开始变成城市生活的中心。”维克托·雨格一手抓废除奴隶制，一手镇压反对派，不久就确立了他在瓜德罗普岛的统治地位。但是，1794年7月27日发生了热月政变，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被送上了断头台。消息传到加勒比地区，维克托和埃斯特万都惊呆了：前者骂道：“无耻！他们竟然敢杀害革命志士！”后者气得说不出话来。愤怒之余，维克托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反动派很可能进行无情的报复，这意味着他的前程和生命将就此完结。埃斯特万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痛恨反动派的复辟活动，另外他又“产生轻松和恢复安宁的感觉”。维克托思考的结果是：暂时不理睬这条消息，继续执行原来的革命方针和政策。他想：“如果革命在法国要失败，那么美洲革命将继续下去。现在是我们关心美洲大陆的时候了。”他吩

咐埃斯特万把《人权宣言》翻译成西班牙文，从这个岛屿向美洲大陆散发。埃斯特万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但是，法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代替了红色恐怖，这迫使维克托迅速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一天，他问埃斯特万是不是愿意离开这个岛屿。埃斯特万说了真心话，他想回家。维克托听了很不高兴，但是把真实情况说了出来：英国舰队在逼近这座岛屿，法国舰队必须“化整为零”，采取海盗袭击的方式攻击英国和西班牙船只。埃斯特万被分配到一艘名叫“人民之友”的船上当“书办”，负责登记战利品。出海以后，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本来应该“拥抱大自然”，但是却在“这个荒唐的舞台上扮演着这个荒唐角色”。特别是有一次“人民之友”号抓住了一条满载黑人奴隶的船只，这些口称“解放奴隶”的革命者竟然奸污黑人妇女，随后又偷偷地把他（她）们贩卖了出去。维克托凭借抢劫货船和贩卖黑人，财富迅速增加，加上新上台的国民公会又承认了他在加勒比地区的“政绩”，于是就“独断专行”起来，“这位掌权者竟然自封为法国大革命的惟一继承人”。埃斯特万越来越看不惯维克托那副“商人得志”的样子。这时，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力量出现了新变化：美国海军开始介入，“他们把武器和舰只卖给英国人，企图把法国从美洲殖民地驱逐出去。”

“美国人用八面玲珑的手段欺骗了全世界，已经变成了反动派，成为一切自由思想的敌人。”维克托建议法国国民公会向美国宣战。国民公会劝告他小心行事。但是，美国人抢先宣战了。一只强大的美国舰队向加勒比海域进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美国人就会在瓜德罗普岛登陆。这时，维克托找到了埃斯特万，说道：“你没有必要在瓜德罗普岛上呆下去了。我给你开一张通行证。”维克托建议埃斯特万去法属殖

民地圭亚那首都卡宴，从那里转道去苏里南首府帕拉马里博。那里有美国和西班牙的船只。然后就回古巴老家去。他劝告埃斯特万：“回家去，好好做生意，别再去外面冒险了！”告别时，他拥抱埃斯特万时又说道：“法国大革命已经失败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依赖和信任的了。”他让埃斯特万带给索菲亚一封信，随后二人就分手了。埃斯特万辗转来到了圭亚那首府卡宴，感到那里十分混乱，于是急忙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了帕拉马里博。但是，那里情况也不美妙：黑人准备发动起义。最后，他怀着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心情回到古巴首都哈瓦那。他对索菲亚说：“我是从野蛮人那里回来的。”索菲亚这时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成熟、稳重、温柔的女子了”。埃斯特万觉得一切都很陌生。“他日思夜想要回家，却没有感到预期的激情。原来十分熟悉的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回想起童年的生活，他不由得伤感起来。索菲亚如同少女时代那样把这个表弟拥抱在怀里。埃斯特万稍稍平静一些之后，问起表兄卡洛斯的情况。表姐回答说：

“他一早就同我丈夫到乡下去了，很晚才能回来。”埃斯特万一听说“我丈夫”三个字顿时“吃了一惊”。索菲亚用轻松的语调解释了一年前结婚的经过。她的丈夫是个爱尔兰人，名叫豪尔赫，善于经商，与卡洛斯合伙以后，商行的赢利增加了四五倍。埃斯特万一面听着表姐讲述，一面悲哀地望着她。他没有想到这个聪明的女子也大讲起“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一套，难道她一心只想着当个贤妻良母？索菲亚主动问起维克托·雨格的情况。埃斯特万把信交给表姐，说了一声：“他待我可狠呢！”就上街去了。到了晚上，卡洛斯和豪尔赫回来了，埃斯特万看到卡洛斯变得富态了，也认识了豪尔赫：这是个瘦高个青年，皮肤细嫩，是个美男子。

晚饭后，大家要求埃斯特万讲一讲法国大革命的情况。“这些人远离革命舞台，他就只好做个讲解员了。”他从维克托和他逃离海地的太子港说起，然后二人到了巴黎，参加了大革命。接着，他就说起来这场革命的代价和结果：尸骨堆积成山。索菲亚听了以后说：“地球上任何伟大的事业不流血是办不到的。”“她喜欢看到腐败的官僚、奴隶主和为富不仁的财主一个个掉下脑袋来。”但是，埃斯特万明确表示：他不会把最好的青春岁月献给大革命，他已经厌倦了动荡飘流、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厌倦了清贫的生活方式。圣诞节前夕，豪尔赫的亲戚邀请索菲亚、卡洛斯和埃斯特万去一座豪华的大庄园里过节。豪尔赫和卡洛斯有商务需要处理，因此请埃斯特万陪同索菲亚先行一步。旅途中，表姐弟二人谈起了维克托·雨格。埃斯特万问表姐：维克托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内容。索菲亚回答说：“他说内心很悲伤，因为没有朋友。”埃斯特万愤愤地说道：“他以为当了大人物就可以不要朋友了。罗伯斯比尔也没有这样。”接着，他就一一数落起维克托的坏毛病：向上钻营，投机取巧，野心勃勃，霸道专横。他的结论是：“就是这种人把革命给抹黑了……”在庄园里等待过节的日子，埃斯特万对表姐表示了爱慕之情，但是遭到了表姐的拒绝。这时，仆人赶到庄园向索菲亚报告说：豪尔赫染上了瘟疫。索菲亚和埃斯特万急忙赶回城里，到家里一看，发现豪尔赫病情十分严重。索菲亚昼夜看护着丈夫，但是病情不见好转。这时，埃斯特万的一个美国朋友卡莱布·德斯特船长来到了哈瓦那。他告诉埃斯特万和索菲亚：维克托·雨格在巴黎国民公会领导委员会上证明自己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做法是正确的，从而赢得了领导委员会的信任，现在被委派到圭亚那的首府卡宴担任最高行政长

官去了。据这位船长说，维克托到达卡宴时船头上摆的不是断头机，而是一个军乐队。埃斯特万评论说：“狼装扮成羊了。”船长离开哈瓦那三天以后，豪尔赫终于不治身死。几个月后，索菲亚突然出走了。仆人告诉卡洛斯和埃斯特万：她已经上船准备去卡宴了。埃斯特万赶忙去港口说服索菲亚不要前往卡宴。但是，索菲亚执意不听劝告。埃斯特万急忙赶回家中，准备跟卡洛斯商量想些非常手段留住索菲亚。谁知一进家门就发现许多警察在翻箱倒柜地搜查什么。到了凌晨三点，搜查结束，结果是：“证据非常充分，证明这是一个反对西班牙王室、宣传革命思想的老窝。”警察审问仆人：女主人哪里去了？仆人回答：从早晨出去就没有回家。卡洛斯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个警察说：赶快封锁港口。这时埃斯特万搭腔道：“那是白费时间。我表姐索菲亚跟这事毫无关系。这些文件是我今天塞到她床底下的。”警察们立刻把他团团围住。埃斯特万为了拖延时间，就东拉西扯，胡乱招供。于是，警察便认定他是个狂热的革命分子，把他抓走了。再说索菲亚，她上船以后过了三天的时间，情绪慢慢平静下来，“产生了自由轻松的感觉”。她想：新生活开始了，伟大的事业在前面等候着她。一路上，她不断听到人们对维克托·雨格执政的赞美之词。最后，她终于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情人。二人很快投入了如胶似漆的情爱生活。索菲亚感到幸福之极，“整个身体因为性爱而欣喜若狂”。但是，一瓢瓢冷水很快就泼到了她梦想的“伟大事业”上来了：教会的特权恢复了，奴隶制恢复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恢复奴隶制的那个人，恰恰就是当年宣布废除奴隶制的人——维克托·雨格。索菲亚感到非常失望。当年的革命者居然干起买卖奴隶的勾当。这些人的振振有辞让索菲亚

惊愕不已。她和维克托大吵了一通。这位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明确地告诉她说：“我是政治家。如果恢复奴隶制度是政治的需要，那我就服从这种需要。”索菲亚对于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和失望。维克托·雨格本来就是商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完全是个投机钻营的家伙，如今大权在握，当然用不着顾忌什么革命原则。他也“理直气壮”地买了许多奴隶，因为他要“开发美洲”，“要大兴土木”。索菲亚对这些土木工程根本不感兴趣。她依然渴望着革命的风暴能够摧毁这死水一潭的生活。她的感觉是有道理的，被压迫的黑人纷纷逃往森林里去了。维克托·雨格要求巴黎政府增加殖民地驻军的数量。不久，曾经参加远征埃及的法国侵略军来到了法属圭亚那。维克托·雨格精神大振，劲头十足地指挥部队去围剿黑人起义武装。索菲亚看到情人如此凶残地屠杀黑人，她感到非常难过，既为维克托的背叛革命，也为自己看错了爱慕的对象。六个星期的讨伐战争过去了。维克托和他的部下被黑人游击队打得狼狈不堪。索菲亚看到维克托和大批伤兵撤退下来，感到十分高兴。在维克托离开港口去看病的前夕，二人又大吵了一通。结果维克托命令她：“滚蛋！”索菲亚离开了法属圭亚那。这时她获悉埃斯特万被西班牙殖民者逮捕后押解到了马德里。她连忙赶到了西班牙看望表弟，经她多方奔走，国王赦免了埃斯特万的“颠覆罪”。从此，表姐弟二人就在马德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1808年5月马德里发生了反对法国入侵的大游行，随后就变成了武装起义。男女老少拿起了棍棒刀枪冲上街头。索菲亚激动不已，她要同西班牙人民一道“打击法国佬！”埃斯特万看到无法拦阻表姐的行动，便也拿起了猎枪。法国侵略军对起义进行了血腥的镇

压。“无论是索菲亚还是埃斯特万再也没有回到原来的住处。没有人知道他和她的下落，也不知道他和她的骨殖埋在哪里。”关于维克托·雨格的下场，作者是这样交代的：“那么维克托·雨格究竟是怎么死的？我们仍然不清楚，同样关于他的出生也知之甚少。但毫无疑问，他的前后表现的不同（前期诚恳、勇敢、坚定；后期言行不一、聚敛钱财、甚至厚颜无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寻常人物的形象；这一表现说明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因此，作者认为：在这样一部涉及整个加勒比地区的小说中，介绍一下这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的生平还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世纪》的主题是表现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复杂影响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革命口号是美丽动人的，可是革命的实践却是血腥、多变和残酷的。作品深刻地指出从革命理想到革命现实的距离是何等巨大，其中的苦难不下于西绪福斯推石上山的艰苦历程。作品还明确表现了美洲土著和黑人文化对欧洲文化的排斥，进而阐明社会革命的动力不在于“主义”，而在于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作者善于描写加勒比海地区的风土人情，其目的在于揭示美洲自然景观与土著文化的内在联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产生一种地方文化。外来文化不可能替代本土文化，因为本土文化有它自己的“特质”，有它的土壤和根基。就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时，本土文化也是根据“有用和有利”的原则加以吸收的。在小说技巧方面，故事情节基本符合历史真实情况，但是也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例如索菲亚和维克托的爱情生活。在时间方面，作品是按照“自然时序”讲述故事的，但是也不时地有倒叙的段落。总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年之久（1789~1808），但是作品

安排得非常紧凑，没有给读者产生拖沓的感觉。语言方面，作者仍然使用了巴洛克风格：华丽、雕琢、讲究音乐感。总之，这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安德孙·因贝特（E. Anderson Imbert）的评价是：“《光明世纪》是卡彭铁尔创作的优秀作品之一：凭借一个散文家聪明的巧妙安排，用抒情的描写，努力表现美洲的特色。但不是他的最佳之作。他是从十九世纪末的角度、即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角度，来看这个光明世纪的，同时又是从加勒比海的岛屿上来看待法国大革命的（第二章除外，因为在第二章里，作者从法国和西班牙的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法国人维克托·雨格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三个古巴人：埃斯特万、索菲亚和卡洛斯都是虚构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从 1789 年开始，到 1808 年结束。章节之间用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的大作《战争的灾难》的标题分开。全书的最后一场发生在 1808 年 5 月 2 日，埃斯特万和索菲亚死于马德里为抗击拿破仑军队入侵的战斗中；他和她似乎也走进了戈雅的画中。这是一部时代气息浓厚的历史小说，作者巧妙地选取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叙述角度是独特的，善于刻画人物性格，同时又把历险、暴力、游记、政治阴谋和爱情故事编织在一起。作者对法国大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政治活动中有进步，也有倒退；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革命的步伐是不一致的；作者既介绍倒下的英雄们，也介绍向上钻营的投机分子；既描写紧紧抓住权势的无耻之徒，也描写革命的逃兵、心灰意懒者和热情的战士；总之，书中有许多历史画面，但是读者也可以感觉到作者的确亲历过一些革命事件。”（引自因贝特著《西班牙美洲文学史》第二卷，第 248 页）

第四节 《元首的方法》

1974年卡彭铁尔创作了长篇小说《元首的方法》（El recurso del método），如果直译，应为《方法的运用》。主人公是拉丁美洲某国的元首，作者没有说出他的名字和国家。全书共有七章和以《1972年》为标题的结尾。作品开始时，作者详细介绍了元首在巴黎的起居、待客和娱乐、消遣的情形，旨在说明元首博学多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音乐、美术、文学、哲学、历史……无所不晓。当然他在巴黎长期居住不是来工作的，也不是外交的需要，而是要享受世界文化中心的物质和精神成果。那是1913年，正是法国文化影响西方世界的时代。但是，元首自己统治的国家却经常处于动荡之中。他不得不经常回国镇压叛乱。有一次，他的部下奥夫曼上校发来加急电报：国内发生大规模武装革命，请元首迅速回来决策。元首乘船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做短暂休息，这时他从领事馆得知奥夫曼上校虽然处境艰难，却顶住了革命者的进攻。元首放下心来，“由于是好消息，加上时值狂欢节，元首就参加戴假面具的游行去了。一路上他也向四面八方撒五颜六色的纸屑。后来，他又租赁了一件带风帽的长外衣，到舞会上去了。一个打扮成法国伯爵夫人的黑白混血女郎教元首跳原地不动的贴面舞：在一块方砖的范围内，两人紧贴在一起做前后扭动。”舞会散场以后，元首和他的保镖把那位混血女郎悄悄地带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元首秘密回国的烟幕，其目的就是造成假象，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一击。元首终于回到了国内，首次公开露面时就

发表了长篇演说。随后，他和已经担任了国防部长的奥夫曼上校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会议结束时，元首决定亲自到北方战区指挥作战。与此同时，美国给元首提供的武器和弹药也运到了。叛军首领阿塔乌弗·加尔万（Ataulfo Galvan）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开始撤退，最后变成了溃败。暴乱的政治领袖路易斯·莱昂西奥·马丁内斯（Luis Leoncio Martínez）已经从北部边境逃到国外去了。后来，他在流亡的地方宣布成立了临时政府。他们在国外虽然还在折腾：办报纸，搞集会，但是大势已去，追随者寥寥无几，“因为很多人都明白，在政治问题上，是成则为王，败者寇。”总之，这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被镇压下去了。元首班师回京，嘉奖三军。他提升奥夫曼上校为将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感到痛心疾首，因为他想到刚刚发生的动乱，这说明并非全体公民都相信他是忠诚、无私和热爱祖国的。因此，他决定交出政权，请求议长代理国政，以便举行大选，让更有能力、更年轻、更优秀的人才掌握国家的命运。不过，如果全民公决不同意他辞职的话，他也只好服从人民的决定”。于是开始筹备全民公决的大事。由于全国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是文盲，所以在选票上只印刷了红色和黑色两种；红色表示赞成元首辞职，黑色表示反对。但是，这时谣言四起：说是投票站上安装了“电子摄像镜头”，无论你怎么躲藏，当局都能知道你的政治态度。就是在穷乡僻壤，政府当局也派人偷偷躲在投票站的帷幕后窥视着你的动作。政府内的公务员、国营企业的职工也人人都知道：谁敢反对元首，那就得准备下岗。农民也得加小心：乡村警察的砍刀不是吃素的。最后，全民公决的结果出来了：绝大多数选民不同意元首辞职。于是，为了庆祝人民对元首的信任，各级组织纷纷举行游行和集

会，歌颂元首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的丰功伟绩。但是，“元首已经感到疲倦了。再说，他感到右臂疼痛无力，无论按摩还是汤药都无济于事。一个专程从美国波士顿赶来的医学专家诊断的结果是：这是一种关节炎，只有依赖专门的电疗器械才能治愈这种顽症。于是，全体内阁成员一致请求元首去美国看病，因为他的健康就是人民的福祉。元首出国期间，内阁总理全权负责政府事务，由奥夫曼将军襄理帮办，此外还有议长可以出谋划策……这样，元首便坐上一艘豪华游轮动身前往美国去了。”但是，刚一到达纽约，元首就不喜欢美国医院的那一套作风，也怀疑那里的医学水平，甚至讨厌那里财大气粗的做派。他对秘书说，还是去法国为好。秘书回答说，法国太遥远了，假如再次发生政变，恐怕不能及时回去镇压。元首说：“小伙子，咱们国家发生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我想眼下是不会发生政变的。何况，咱们只走几个星期。我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我生下来可不是缺胳膊少腿的。没有参加过勒班多海战就成了残废，那肯定是个胆小鬼。再说，没了右手，我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这样，元首便坐上“法国号”轮船去巴黎治病了。驻法大使听说元首突然来到巴黎，急忙从度假地赶来迎接。他看到元首的右臂吊在绷带上，不免惊慌地问道：元首的病情如何？秘书回答说：“胳膊疼痛，没有大碍。相信这里的医生们一定会看好元首的关节炎。再说，这里的气氛、欢乐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景象都有宜于元首的健康，就是呼吸一下这里的空气，他的感觉也会好得多。”元首吩咐大使去搬运行李和安排下榻的地方，他要秘书和保镖去娱乐场所散散心。过了几天，法国一家晨报刊登了几组照片，原来是元首在指挥士兵屠杀工人；还有妇女裸体躺在街头的画面；元首身穿军装在下达攻

击修道院的形象……如此惨无人道地枪杀起义的群众，使得法国舆论界哗然，许多法国朋友与元首断绝了来往。更为严重的是，元首的儿子断然对记者说：“我与南美洲这团乱麻毫无关系。”但是，元首并不生气。要不是他喜欢巴黎，他才不在乎报界叫他什么“屠夫”不“屠夫”呢。当然，元首也不甘心让法国报纸任意攻击，他立即花钱组织宣传活动。可是，收效甚微，敌视元首的声音依然高涨。正当元首考虑是不是应该离开法国的时候，议长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上面说：“奥夫曼将军率领步兵第 3、8、9、11 营，外加 4 个骑兵团，其中包括国家轻骑兵，还有 4 个炮兵连，发动了兵变。他们的口号是：宪法万岁！自由万岁！”更为让元首气愤的是：他在军队里的三个亲信也参加了暴乱。元首不停地喷吐着“龟孙子”和“婊子养的”，最后决定立刻动身回国平息叛乱。这时，传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元首对此无动于衷，他要赶回去解决内乱问题。可是他仍然忙里偷闲，秘密地和秘书一道去一家高级妓院里嫖娼。离开法国后，元首到达祖国的港口后，立即思考平叛的计划：一定要尽快组织队伍去追捕奥夫曼将军，把他的人马赶到沼泽地里去，包围起来；把那个“狗娘养的”奥夫曼抓起来，带到一堵大墙前面，元首要亲自喊一声：“开火！”方才能够解除心头之恨。没有别的办法，就得枪毙他！“这是游戏规则。是运用方法的问题。”但是，这一次叛乱让元首感到不安。

他忧虑的是用什么口号来打击敌人的气焰呢？“自由？民主？忠于祖国？继承光荣传统？履行历史的使命和责任？”如今都成了大话和空话。有谁愿意听这些陈词滥调呢？元首想：“再说这些空话，就有点使用假钞的感觉

了。”他痛苦地回忆起来：“从前大多数老百姓之所以欢迎他，那是因为他能够在国家危急的关头，拨乱反正，给民族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如今他已经看到由于他自己长期以来恋栈和抓权而不得不提出这样和那样的理由或者理论，可是人们早就看穿了他的种种花言巧语，他的威信大不如前了。他清楚地知道有许多人讨厌他，背后嘲笑他。但是，他更明白有些人需要他稳定地掌握最高权力，因为他们的利益与他的掌权是休戚与共，因此也是荣辱与共的。”想到这里，元首宽慰了许多。不过，他发现近年来他给美国公司的好处太多了，这招致了许多人的不满。当然，新大陆的人们普遍讨厌美国佬趾高气扬的态度，因此谁给美国谋利益，谁就会受到人们的唾骂。因为美国佬实在欺人太甚，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我们，他们说我们是‘拉丁人’，那意思就是‘杂种’、‘贱民’、‘群氓’……”突然，元首来了灵感：“拉丁人本身就意味着‘杂种’，就意味着‘混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黑人或者印第安人的血液，流淌着腓尼基人或者摩尔人的血液，流淌着西班牙卡迪斯人或者塞尔梯贝里亚人的血液。我们就是混血人种嘛，这很光荣！”元首觉得“混血”这个概念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就是敌人也得接受这个事实。元首想：从血缘入手，大谈团结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应该指出叛徒奥夫曼将军是野蛮的普鲁士人的后代，他的背叛和分裂国家说明其祖先的野蛮性格，因此应该全国共讨之，全军共诛之！想到这里，元首踏实了许多。这样就可以兴师问罪了！元首心里很清楚，不平息政治动乱，自己的下场就会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独裁者没有两样了。决心一下，讨伐叛军的檄文一发，在政府军的追击下，奥夫曼将军慌忙撤退到森林和沼泽的边缘地带去了。天助元首：

奥夫曼不小心误入泥沼中了。烂泥吞食了叛徒，元首乐不可支。凯旋归来的元首受到了参、众两院、各部部长、工商巨头、社会名流的夹道欢迎。这时，欧洲大战的进行急需大量物资，拉丁美洲对欧洲的出口刺激了新大陆各国的经济繁荣。元首统治下的这个国家也不例外，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他喜在心头。但是，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许多改善，在工会和进步团体的组织下，各种反对独裁的力量开始团结起来了。开始有人散发反对独裁统治的传单。一天，元首的洗澡间里突然发生了爆炸事件。而且爆炸的时间是早晨六点半，即元首洗澡的钟点。幸运的是，这一天元首比平常晚起床半小时。他想：“看来我对他们（反对派）是手太软了。”

他立即召集内阁成员来到洗澡间开现场分析会议。部长们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工会革命组织干的，有人说这是大学生看了革命传单之后的个人行为。公安部长用侦察的眼光分析说，这是专业人员干的，因为这颗定时炸弹使用的炸药和装置都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因此他建议立刻撤换警卫人员。他还说，他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现在就可以请元首过目。元首说，还是不看为好，“看了名单我会心软的。我信任您。您行动吧！要快！要坚决！”秘书提醒公安部长说：“千万别搞冤假错案！”元首对司法部长说：“要花点力气扫除那些反动传单！”司法部长领命而去。爆炸当天的中午，街上的人们就发现了不少异常现象：警察增多了，警车增多了，便衣特务增多了。大家纷纷议论道：“出事了。一定出事了。”果然出事了：警察冲进大学课堂，抓走了正在上哲学课的副校长。冲进一些系的办公地点，抓走了经常写批评社会时弊文章的教授。社会

舆论哗然。与此同时，警察在四处搜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例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等。元首望着摆放在办公桌上的这些书籍，随便翻阅了几页以后，不以为然地说道：“这些玩艺儿能让人造反？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呢，还能有钱看这种书！让他们继续卖好啦！”但是，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一座座新型监狱修建起来了。那里面经常发生刑讯拷打、枪杀囚徒的事件。不久，一种地下刊物出现了，名字叫《解放》。第一期上就刊登了警察和特务拷打犯人的照片；还刊登了政府内阁成员贪污腐败的揭露文章，其数据和证物翔实可信，这让元首和部长惊讶不已。元首气急败坏地吼道：“我们内部有叛徒！”他命令内政部长立刻调查《解放》的组织者、撰稿人、印刷地点和散发者。警察和特务们立即扑向一切可疑的地方。但是，搜查毫无结果。元首召集部下分析案情。有人说，这是邻国庇护“布尔什维克干的勾当”。有人说，这是“莫斯科用黄金收买了拉丁美洲共产党人的破坏活动”。元首似信非信，但是他的决心是不变的：一定要捣毁这个地下秘密刊物，绝对不允许《解放》的第二期问世。可《解放》如同幽灵一样地游荡在工厂、商店、居民区、甚至政府办公大楼和达官贵人的豪华住宅里。元首被这份刊物弄得睡不着觉。正在他感到烦恼的时候，又一颗定时炸弹在元首府的存衣间里爆炸了。这真是火上加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使用的水库里漂着一匹死马，自来水会被病菌污染。卫生部长急忙前去调查，结果是匹木马。人们刚刚松了一口气，市中心一家大型商店又烧起了大火。消防车赶去一看，原来是人们在放烟火。总而言之，人们故意用各种方式与政府作对：“一个愚弄当局、

传播流言、搞恶作剧的时期开始了，目的是制造动荡不安、不信任政府的气氛。”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这时，《解放》连续发表社论说，“国内一连串奇怪现象的出现，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干的。我们的斗争是严肃的。真正的革命者不是那种在舞厅、赌场和酒吧里闲逛的人们。”文章还引用了不少马克思的语录。元首看着这些文章，心里不得不承认：“这帮家伙说的还是真话。”这时，各类情报纷纷而至，其中最多的是关于署名“大学生”组织的报告。据说，“该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其成员遍布工厂、农村、学校、甚至军队和政府机关，他们到处行侠仗义，主持公道，抱打不平，如同罗宾汉一样。”元首愤怒地说：“这是一块制造神话的大陆。哥伦布没有来到之前，阿兹特克人就相信‘会有白人骑怪物从东方而来’的神话。征服之后，又有印第安人相信会有神仙化作印加王的后代来恢复帝国的统治。独立以后，又有什么加乌乔人刀枪不入的神话。海地人的神话更绝：说什么他们的领袖马康达尔可以变成蝴蝶、蜥蜴、马或者鸽子。墨西哥人说他们的农民领袖埃米里奥·萨帕塔并没有牺牲，而是骑着那匹喷着火苗的黑马，向天堂奔腾而去。今天，我们这里也制造了什么‘大学生’的神话，说什么他们是斯巴达克式的英雄，无所不在的好汉。必须打破这个神话！”元首没有料到“大学生”的领袖在农村被警察抓住了。大喜过望之余，他决定亲自与“大学生”谈话。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从容不迫地反击了他的威胁、利诱和收买，坚定不移地陈述了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正当元首无法下台的时候，又一颗炸弹在元首府爆炸了。办公室被炸得一塌糊涂。元首和大学生都没有受伤。元首明白爆炸事件是无政府主义分子干的，因此决定暂时释放“大学

生”领袖，准备放长线钓大鱼。随后，元首与秘书有过一次长谈，他们都担心“大学生”继续宣传革命。元首后悔不该轻易释放那个学生领袖，《解放》小报又露面了，大鱼也没有钓着。

他想当初在办公室里应该制造一个“大学生”攻击元首的假象，元首被迫自卫反击，用手枪击毙了那个小伙子，事情或许好办多了。秘书安慰他说，老百姓看不懂那些传单，资产阶级讨厌那些空洞的革命口号，所以“大学生”不会有市场的。元首说，你还是头脑简单，“大学生”抓住了不少具体问题，比如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说我们专制等等。秘书献策说，咱们可以打爱国主义这张牌，还可以打出“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的口号。二人的谈话被蜂拥而至的内阁成员和军队首脑打断了。原来全国发生了大罢工。部长们七嘴八舌地说：工厂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元首问到：公共汽车呢？火车呢？政府工作人员呢？回答是：汽车和火车都停了。办公室里空空如也。元首急忙跑到阳台上去看：街道上静悄悄。元首既愤怒又恐惧，他命令军警采取行动：让警察开着广播车四处通知：两小时内，商店必须开门营业，工厂开工，汽车和火车恢复运输，否则开枪镇压。两个小时过去了，除去一些广东人害怕被驱除出境不得不回军阀混战的中国之外，没有商店开门。元首发怒了，他下令：“开火！”于是，警察和士兵冲向商店，他们开枪打碎商店的门窗，捣毁一切。但是，市民们愤怒了，他们拿起了棍棒、猎枪与军警展开了殊死搏斗，老百姓还怒吼道：“打倒独裁！总统下台！”军警抵挡不住老百姓的进攻，纷纷撤退到兵营里去了。内阁会议急忙商讨对策。最后议长提出请元首为国牺牲。不久，在街道和广场上战斗的人们都在传说：

元首死了！元首自杀了！元首被打死了！人们立刻欢呼起来，决定向元首府进攻。他们没有想到，正规军从四面八方把他们给包围住了。一辆辆装甲车和坦克开火了。群众中一批又一批人被打倒在地，死伤无数。更多的人逃散了。原来这是元首设计的圈套：引诱群众向元首府和兵营进攻，然后出动正规军镇压。这一次动乱是平息下去了。元首得意地说：“先生们，咱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大学生”革命组织重新发动群众，再次占领了首都。元首不得不逃到美国大使馆避难。美国政府借口保护美国侨民利益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元首只好宣布辞职，随后便流亡到法国去了。全书的最后一章仅仅写了“1972年”：在法国一座公墓里，有座坟墓就是元首的：与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波尔菲里奥为邻。这就是独裁者“轰轰烈烈”一生的结局。

卡彭铁尔的小说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卡彭铁尔是参加过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他从这一文学运动中学习了许多东西，例如，梦幻和潜意识对于发掘人物心理活动的积极作用，他说，“超现实主义教会我观察从前我没有注意到的拉丁美洲人的心理结构。”但是，他清醒地注意到：如果脱离古巴本土，如果脱离拉丁美洲的现实，如果一味遵守超现实主义那脱离理性控制的“无意识写作”方法，那就不可能创作出真正反映新大陆社会生活的作品来。他说：“我认为，我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的。我不会给这个运动增添任何光彩。于是，我产生了反叛情绪，因为心中有一种力图表现拉丁美洲大陆的热切愿望。”

卡彭铁尔在坚持表现重大社会题材的同时，始终注意拉丁美洲多元文化共存的因素对社会变化的影响，这在《消失

的脚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批评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白人城市文化的堕落和歌颂印第安土著的乡村文化魅力。他认为，土著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建立在土著人的认识和信仰的基础上的，而无论这样的认识还是美洲的自然本身都充满了“神奇和魔幻般”的力量。这是文学创作最可宝贵的源泉。为此，他既重视对拉丁美洲神奇大自然的描写，例如，原始大森林、大河流、大高原和多变的气候，更重视生活在这种奇特自然环境中的土著人，其中特别重视土著人的观念，重视他们对自然和人生的看法，重视他们的神话传说、想象、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这些观念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

为此，卡彭铁尔拓宽了“现实”的含义，即，“心理现实”、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梦幻也是生活现实的重要部分，其中想象力是思想自由的原动力。而思想自由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在拉丁美洲，土著人的想象力创造了许多神奇的故事和传说。这些口头“文学”也是卡彭铁尔非常重视的创作素材。例如，在《人间王国》中，有个人物名叫蒂·诺埃尔，他起初变成了鸟，后来又变成了驴，随后又因为种种顾虑变成了胡蜂、蚂蚁、鹅，最后头脑清醒了，重新认识到人的价值，还是变成了人。拉丁美洲文学评论家认为，这种突破“常规”的变形描写，大大丰富和扩展了艺术的表现力，因而也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再比如老黑人麦克康达尔讲述的非洲部落迁徙的传说以及蛇神和彩虹王后幽会的故事，也都可以充分证明黑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

从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卡彭铁尔是提出表现“神奇现实”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这种活生生地存在着的神奇现实是整个美洲的财富”，因为，“美洲神话的源头

远未枯竭，而这是由美洲的原始风光、它的构成和本源，恰似浮士德世界中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这块大陆上的存在，以及各个人种在这块土地上的大量混杂所决定的。”基于这种认识，卡彭铁尔努力通过文学作品去捕捉新大陆的本质，即探索拉丁美洲各种类型人物的思想感情，为达此目的，小说就不能拘泥于一种僵死的模式，所以他提出：“当小说不再像小说的时候，它就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品了（比如，普鲁斯特、卡夫卡和乔依斯）。”

第九章

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

博尔赫斯是当代具有世界声誉的拉丁美洲作家，也是阿根廷最有名望的诗人、散文家和小说家。他的全名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1899年8月24日诞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图库曼大街八百四十号。他的父亲名叫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Jorge Guillermo Borges, 1874~1938），是位律师，曾任师范学校心理学教师，精通英语，拥有大量藏书，也有过翻译著述。他的母亲名叫莱昂诺尔·阿塞维多（Léonor Acevedo, 1876~1975）出身望族，精通英语，博览群书。他的外祖母和家庭教师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英语文学的爱好者。博尔赫斯虽然出生在阿根廷，首先学会的也是西班牙语，但是他的童年教育是英国式的：说英语，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听英语儿童故事。由于体弱，他受到的是封闭

式家庭教育。丰富的藏书使得他有可能大量读书。天资聪颖使得他小小年纪就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写作文。9岁前，他已经阅读了狄更斯、吉卜林、马克·吐温、爱伦·坡、威尔斯等英语作家的作品；9岁后，开始接触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文学作品。他特别喜爱《一千零一夜》和英国作家威廉·莫里斯的《沃尔松族的西古尔德》。13岁以前，他已经阅读了史蒂文生、切斯透顿、萧伯纳、乔伊斯、康德拉、约翰逊等人的作品。1914年，父亲因患眼疾，决定去欧洲治病。母亲带着儿子乔治（小博尔赫斯）和女儿诺拉一道前往。他们遍游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最后定居在瑞士的日内瓦。博尔赫斯正式上中学时，学校里教授法语和拉丁文。博尔赫斯又自学了德语。这样，他就直接通过原文阅读了都德、左拉、莫泊桑、雨果、福楼拜、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的作品；直接通过原文阅读了海涅、梅林克、叔本华、尼采以及表现主义等德语世界作家的作品以及德译本的中国文学作品；直接通过拉丁文阅读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英国文学。这时他迷上了惠特曼的诗歌和叔本华的哲学思想。1919~1921年间，博尔赫斯生活在西班牙，与该国的极端主义和先锋派作家有过交往，也在西班牙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其间，他还创作了歌颂十月革命的《红色旋律》。旅居西班牙期间，他广泛阅读了世界著名西语作家的作品，大大提高了鉴赏文学作品的的能力。1921年，博尔赫斯回到阿根廷。他立刻同朋友们一道创办了文学杂志《棱镜》，介绍欧洲先锋派文学发展情况。1922年，他同阿根廷著名的诗人和小说家马赛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andez, 1874~1952）创办了《船

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文章，同时积极介绍刚刚在欧洲兴起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这时在阿根廷，一批青年作家（大约出生在 1900 年前后）纷纷起来组织文学团体，创办各种文学刊物，宣传欧洲时髦的文学思想和哲学流派，批评拉丁美洲老一代作家的文学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丁·菲耶罗》杂志。但是，为这本杂志撰稿的作家们很快就分裂成了两大派。一派叫波埃多派，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文学，赞成文学的党性原则。另外一派叫佛罗里达派，强调文学的“纯粹性”和“非时代感，主张享乐主义”。博尔赫斯觉得两派各有偏颇之处，他同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 1900 ~ 1942）、马雷查尔（Leopoldo Marechal, 1900 ~ 1970）、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Ezequiel Martinez Estrada, 1895 ~ 1964）一道主张置身于两派斗争之外。1974 年 12 月 14 日博尔赫斯在对著名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 1911 ~ 2000）谈及此事时说：“我回想起波埃多派和佛罗里达派之间的大辩论。这在今天可是闻名遐迩啊！可是当年那是由罗贝特·马里亚尼和埃内斯托·巴拉西奥策划的一场玩笑。那时候，他们把我算在佛罗里达派一边。其实平心而论，我愿意站在波埃多派一边。可是有人告诉我：这是事先分配好的！那我就没办法了！听天由命吧！”1921 ~ 1923 年间，博尔赫斯创作了许多诗歌。1923 年正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Fervor de Buenos Aires）。同年暮春，博尔赫斯的父亲带领全家横渡大西洋，来到英国的南安普敦，嗣后在伦敦、巴黎等地做短暂停留，最后来到了日内瓦。同年盛夏，全家来到了西班牙，重访了南方文化名城塞维利亚，随后在马德里住下来。在这里，博尔赫斯再次见

到了两年前结识的西班牙极端主义的倡导者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森斯（Rafael Cansinos - Assens, 1883 ~ 1964）。博尔赫斯一直把坎西诺斯-阿森斯当做自己的文学老师。

1924 年 4 月正当博尔赫斯一家准备回国的时候，由西班牙著名学者何塞·奥尔特加-加赛特主编的《西方杂志》发表了著名文学评论家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Ramon Gomez de la Serna）写的文章，内容是评论《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的，文章作者对这部诗集给予很高评价。同年的《西班牙报》还有评论家恩里克·迭斯-卡内多（Enrique Diez Canedo, 1879 ~ 1945）也发表文章盛赞《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这使得博尔赫斯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已经在西班牙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了。但是，博尔赫斯选择的文学之路还是在阿根廷，这从 1925 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面前的月亮》（Luna de enfrente）和同年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探究》（Inquisiciones）以及 1926 年出版的散文集《我希望的大小》（El tamaño de mi esperanza）的题材中可以得到证明：作者选取的创作素材主要来源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风土人情和阿根廷的历史。1927 年在做《阿根廷人的语言》的讲座时，结识了《南方》杂志的创始人、阿根廷著名女作家维多利亚·奥坎坡（Victoria Ocampo, 1891 ~ 1979）。从此，他成为《南方》杂志的积极撰稿人。1928 年散文《阿根廷人的语言》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颁发的散文二等奖。1929 年博尔赫斯出版了诗集《圣马丁札记》，大部分作品的灵感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潘帕大草原的风光以及诗人的祖先、尤其是外祖父在独立战争中的事迹。1931 ~ 1932 年间，博尔赫斯与比约·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 1914 ~ 2000）合作写了许多电影剧本和中篇小说，署名布斯

托斯·多麦斯克。1938年圣诞节前夕，博尔赫斯头部撞在敞开的窗户上，受伤昏倒在地，住院治疗三个星期。从此以后，他觉得写短篇小说最合适。1938年博尔赫斯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劝告儿子：不要仅仅依靠写作为生。1941年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问世，作者用这部作品参加了阿根廷全国文学奖的角逐，结果落榜。朋友们纷纷表示抗议，在《南方》杂志上发表文章，替博尔赫斯抱打不平，因为《小径分岔的花园》，无论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称得上是一部很有独创性的作品。《南方》杂志专门为此事刊登了一组抗议文章，总标题是：《给博尔赫斯赔礼》。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界和读书界的广泛注意。1943年博尔赫斯公开谴责纳粹主义和阿根廷的军事独裁统治。1944年阿根廷作家协会特别设立荣誉大奖，以奖励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1946年底隆上台不久，博尔赫斯因为反对庇隆的法西斯政治而被解除图书馆馆员的公职，派遣他去鸡鸭市场当稽查员。博尔赫斯拒绝这一侮辱性的命令，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从此他依靠写作和讲学为生。1950~1953年，他被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1955年底隆政府倒台后，新政府鉴于博尔赫斯的文学成就和他恢复名誉，特别任命他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同年，他还被选为阿根廷文学院士，并且开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文学系讲授英国文学。1956年博尔赫斯荣获阿根廷国家文学奖。1961年获得西班牙福门托文学奖。同年，应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大学的邀请，去讲授阿根廷文学。这时他的许多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意、瑞典等国文字。欧美文学评论界认为，博尔赫斯是阿根廷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之一。1963年他应英国、西班牙、瑞士和法国的邀请，前往欧洲讲学。1965年他赴德国

参加作家代表大会，会后再度访问西班牙。1967 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博尔赫斯晚年在失明的情况下通过口授还创作了许多散文精品。1986 年 6 月博尔赫斯在瑞士日内瓦逝世，终年 87 岁。关于博尔赫斯的详细生平和文学创作的情况，请看本章后面的附录《博尔赫斯小传》。

博尔赫斯重要的短篇小说集有：《恶棍列传》（1935）、《小径分岔的花园》（1941）、《杜撰集》（1944）、《阿莱夫》（1949）、《布罗迪报告》（1970）和《沙之书》（1975）。

《恶棍列传》（Historia universal de la infamia）收集了以下几部作品：《灭绝人性的救世主拉撒路斯·莫雷尔》（El atroz redentor lazarus Morell），《难以置信的骗子汤姆·卡斯特罗》（El impostor inverosimil Tom Castro），《海盗金寡妇》（La viuda Ching, pirata），《作恶多端的蒙克·伊斯曼》（El proveedor de iniquidades Monk Eastman），《杀人不眨眼的比尔·哈里根》（El asesino desinteresado Bill Harrigan），《无礼的掌礼官小冢之助》（El incivil Maestro de Ceremonias Kotsuke no Suke），《蒙面染公梅尔夫的哈基姆》（El tintorero enmascarado Hakim de Merv），《玫瑰角的汉子》（Hombre de la esquina rosada）等。博尔赫斯在 1954 年版的序言中说：“当时我少不更事，不敢写短篇小说，只以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作为消遣。”这里所说的“篡改和歪曲别人的故事”大都根据改编古典名著而成。他在改编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感情色彩，比如在《玫瑰角的汉子》里，博尔赫斯“用了一位祖父的祖父的姓名署名，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有点神秘的成功”。实际上，这个故事是模仿美国西部电影的形式写成的。就思想内容而言，博尔赫斯不满意自己

这些早期的作品，他说：“《恶棍列传》是一个胆小鬼不负责任的游戏。除去混乱和一堆肤浅的形象之外，毫无可取之处。”阿根廷作家、拉丁美洲文学史家安德森·因贝特说：“《恶棍列传》基本上是改编、甚至是翻译他人的作品，但是有一篇例外，那就是《玫瑰角的汉子》，那里面已经表现出作者的独创性来。”为此，我们就在下面第一节里专门介绍《玫瑰角的汉子》。

第一节 《玫瑰角的汉子》

《玫瑰角的汉子》（*Hombre de la esquina rosada*）收在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中，其主要故事情节是通过第一人称“我”讲述出来的。主人公名叫弗朗西斯科·雷亚尔。一天晚上，“我”正在胡丽亚开的舞厅里跳探戈舞。突然，弗朗西斯科·雷亚尔闯了进来。门给撞开时正好打在“我”身上。“我”心头无名火起，向雷亚尔扑去，一面用左手打对方的脸，一面用右手去掏“那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快刀”。可是那人轻轻一拨，就把“我”给撂到一边去了，然后完全不顾众人的推搡，旁若无人地一直向舞厅里面走去。保护这个舞厅的“老大”名叫罗森多·华雷斯。这时正在注视着雷亚尔的动静。雷亚尔是有备而来的，他要“会会”这个绰号叫“炮手”的汉子，因为“炮手”心狠手辣，会玩刀子，他要“领教领教这位好汉的能耐”。说着，雷亚尔就掏出了刀子，同时眼睛盯着罗森多。这时有个跳舞的女人拿出一把刀子给罗森多，怂恿他动手。众人没有想到罗森多把刀子扔到窗户外面去了。刀子落到舞厅外面的一条河里了。雷

亚尔说：“我因为恶心才没有杀你。”说着举起手来要惩罚罗森多。这时那个跳舞的女人跑过去搂住雷亚尔说：“别理那家伙！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条汉子呢！”雷亚尔愣了一下，然后搂起那女人跳舞去了。“我”为罗森多的“窝囊”感到难堪，便抛下舞伴到舞厅外面去了。

不一会儿，罗森多也从舞厅里出来了，他对“我”说了一句：“你这个混小子老是碍事。”说完就沿着一条河走了。此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罗森多。与此同时，雷亚尔已经领着那个舞女出去做爱了。舞厅里的人们仍然在跳舞。谁也没有察觉出有任何异常。但是，不久，雷亚尔在那个舞女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回来了。一进门，这个高大的汉子就轰然倒地了。大家围过去一看：雷亚尔浑身是血！原来他在外面被人捅了一刀。舞女发誓说：她不知道是谁干的，反正不是罗森多，“可谁会信她的话呢？”雷亚尔死了。跟他一起来的朋友们认为这事非要查清楚不可。他们都怀疑那舞女。“我”挺身而出，为舞女辩护：“你们看看她的手！难道她能有这份力气捅刀子吗？”这时大家听到远处有马蹄声，知道警察要来了，便商量把死尸扔到河里去，免得给大家带来麻烦。警察来了，但是看到人们都在快乐地跳舞，此事就不了了之了。故事的叙述者最后对博尔赫斯说：“博尔赫斯，我又把插在马甲左腋窝下的那把锋利的短刀抽出来，端详了一番。它跟新的一样，精光锃亮，清清白白，一丝血迹都没有留下。”作品没有交代是谁杀死了雷亚尔。但是有两条线索暗示叙述这个故事的人有重大嫌疑。这篇小说最早发表在《评论报》上，时间是1933年8月，署名弗朗西斯科·布斯托斯，这是博尔赫斯曾祖父的名字。小说的素材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的一群地痞流氓，作者对他们爱动刀

子的行为和说话方式特别感兴趣。但是，一进入写作状态，博尔赫斯就加入了大量虚构的成分，立刻脱离了传统的写实手法，展示了他喜欢游戏文字和渊博学识的本领。从小说叙述的口气（有凶手讲述故事）和方式（不直接描述暴力场面）看都很像英国作家克里斯蒂的《罗杰·阿克罗埃谋杀案》。善于描写细节和塑造生动的视觉形象也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作品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让博尔赫斯不安的程度。1970年他在《随笔》中说：“我如今觉得它不真实、矫揉造作、人物虚假。我从来也不把它看成是一个起点。”

第二节 《小径分岔的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中的一篇，结集前没有发表过。这部小说集于1941年4月出版。作者在《序言》中说道：“第七篇（《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侦探小说；读者看到一桩罪行的实施过程和全部准备工作，在最后一段之前，对作案目的也许有所察觉，但不一定理解。”

《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它讲述了一个名叫俞琛的中国博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德国充当间谍的故事。俞琛发现了一处英国炮兵阵地。但是，从事反间谍的英国军官理查·马登上尉也发现了俞琛的活动，并且立刻前来跟踪俞琛。这位侨居在英国的中国博士不得不仓皇出逃。他乘火车来到阿希格罗夫镇，躲入一个名叫史蒂芬·阿尔贝博士的家中。作者从这里引出小径分岔的花园。最后马

登上尉赶到，将俞琛捕获归案。可是军事机密情报早已经传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其办法就是：俞琛杀死了阿尔贝，报刊将这个信息公布于众后德国间谍机关便猜出了英国炮兵阵地的位置。原来阿尔贝就是这个炮兵阵地的名称。德国立刻派飞机轰炸了这个阵地。但是作品的主旨是介绍这座小径分岔的花园，即这座花园是座“迷宫”，而“迷宫”就是“小说”本身，用书中史蒂芬·阿尔贝的话来说，“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那么这种迷宫式的小说是什么样子呢？阿尔贝解释说：“只能想象这是一本循环的书，一本兜圈子的书，它的最后一页和第一页完全一样，具有无限地继续阅读下去的可能。”但是，这还不够明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于是，作者通过解释崔朋的残简，对“小径分岔的花园”和“各种不同的未来”做了如下的阐述：“我几乎立刻就明白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这部混乱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这句话使我想到：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形象。”接着，作者又进一步说明，

《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主题是“时间”，认为“时间是无限连续的”，“时间是一张正在扩张、变化、分散、集中、平行的网”，“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这张网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博尔赫斯故意将这张“迷宫样的时间网”的发明权交给一个中国人，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他关于时间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可超越性的思想是从东方的哲学与宗教中学来的、“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类佛教中关于时间相对性的故事，《古兰经》中“一夕之梦，翱翔百年”这类时间长短与体验者关系的故事，博尔赫斯是熟知的，并且在他的小说《秘密的奇迹》中有所介绍。博尔赫斯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居然能

够运用小说的形式将这样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阐释出来，居然能够运用生动的艺术形象（例如“迷宫样的时间网”）去描绘一个抽象、艰深的哲学道理，尽管其中包含着戏谑的成分，但是说明他有着深邃的哲学见解和深厚的艺术功底。但这只是作品的表面现象，实际上，透过对“迷宫样的时间网”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作品中的“我”之所以进入这座时间“迷宫”，是不得不体验死亡（马登上尉）的追踪。“我”清晰地感觉到：这一次，“我”必死无疑。但是出于对命运的挑战和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我”一次又一次逃脱了死亡的追捕，与此同时，我一次又一次思考着迷宫。迷宫中心有什么呢？有黑夜、树林、楼阁、灯笼、中国音乐，“我”想象着这座迷宫有无限大……“我”“想到一座迷宫中的迷宫，想到一座不断扩展、弯弯曲曲、可以包括过去和未来、以某种方式包括天体的迷宫。”显而易见，迷宫的本质就是幻想的能力，“我”拥有这样的能力，因此可以恢复曾祖父的迷宫，而且人人都可以恢复他人的迷宫，因为幻想是无限的，所以迷宫也是无限的。这是人类对付死亡的游戏：用精神，用幻想，也用肉体来展示生活的秘密。但是生命的奥秘是复杂的，如同一座迷宫。人们总是希望找到谜底。阿尔贝告诉俞琛，他已经找到了谜底：小说就是他祖先建造的迷宫。博尔赫斯在作品中建造了一个又一个迷宫，这既说明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更表明了博尔赫斯有着怎样惊人的艺术想象力。

第三节 《阿莱夫》

《阿莱夫》发表于 1949 年，作品仍然使用了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我”有个女友，名叫贝亚特里斯·维特博。这个姑娘不幸于 1929 年 2 月病逝了。“我”在姑娘生日那一天（4 月 30 日）去看望她的父亲和表哥。她的表哥名叫卡洛斯·阿根蒂诺，是个诗人，正在创作一部题为《大地》的长诗。由于“我”每年 4 月 30 日去她家表示问候，因此逐渐博得了卡洛斯·阿根蒂诺的信任。这位诗人自视才高，认为自己有能力描绘整个地球，他要“把这个星球的表面加以诗化”。他一年又一年地创作着这首长诗，直到 1941 年 10 月底。这一天，卡洛斯忽然打电话给“我”，激动而痛苦地说，有人要把他住的房子拆掉，可是为了写完那首长诗，那所房子是非有不可的，因为在房子的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阿莱夫。他还解释说，阿莱夫就是包含着一切点的空间的一个点。“我”不相信这番胡言乱语，认为“卡洛斯·阿根蒂诺是个疯子”。但是，“我”还是答应去看看。“我”来到卡洛斯家的客厅后，疯子介绍说：几分钟后，你就能看到阿莱夫了。那是炼金术士和犹太密教的微型宇宙，我们众所周知、实实在在的朋友，一个 *multuminparvo*（拉丁文，意即：具体而微）！”“我”下到地下室后，起初以为这一切完全是卡洛斯的胡说八道，但是，随后“我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这时候，我看见了阿莱夫”。接着，“我”描绘起阿莱夫来：“我看见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圆球，发出几乎无法忍受的光。……这个阿莱夫的直

径仅仅只有两三厘米，然而宇宙的空间却在其中，一点没有缩小它的体积。”“我”在这个巨大无比的瞬间，看见了数百万精美的或者丑恶的行动；它们都占据着同一个点，既不重叠，也不穿透；“我”还看到了海洋，黄昏，黎明，美洲的人群，黑色金字塔中心的一个银丝蜘蛛网，葡萄串，雪花，烟草，矿脉……最后，“我”感到“无限的崇敬，无限的凄凉”。那么，阿莱夫是什么呢？“阿莱夫就包含着一切点的空间的一个点。”阿莱夫体现着一和多的统一，体现了有限和无限的统一；它既是有限的，也是无限的；既是单一的，又是复杂的；既是空间上的一个有限的点，无限的宇宙又可以不缩小地放在里面；既可以在某个瞬间看到它，这一瞬间又可以成为无穷尽的永恒。总而言之，阿莱夫是博尔赫斯用来说明一与多、有限与无限、一瞬与永恒等复杂哲理的象征物。那么，博尔赫斯是否真的严肃对待这些哲理问题了呢？博尔赫斯的好友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在他的专著《生活在迷宫——博尔赫斯传》里是这样说的：

《阿莱夫》实际上是以讽刺模仿文体来简化《神曲》的。从这一点来看，‘博尔赫斯’就是但丁，贝亚特里斯就是但丁爱慕的女子贝亚特里奇，而卡洛斯·阿根蒂诺既是但丁又是维吉尔。……博尔赫斯在故事的关键部分对阿莱夫做了极其精彩的描写，阿莱夫可以被看做是但丁的世界观的缩影。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博尔赫斯力图在短短的两页篇幅里表达出但丁在其《神曲》的结尾部分（很明智地）拒绝做的事——描写不可言喻的事物。为了描写同时包含了时空各点的空间一点，博尔赫斯运用了惠特曼的指代法，求助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混乱枚举法。这篇作品的手法非常巧妙，许多既是博尔赫斯又是但丁的忠实读者也都没有能看出这是一篇讽

刺模仿文章。”

我们借助莫内加尔的提示可以看到：博尔赫斯在叙述过程中常常忽真忽假，或者以假乱真，例如，在《后记》中，博尔赫斯这样写道：“看来难以置信，我却认为另外有个阿莱夫，我认为加拉伊街的阿莱夫是假的。”这就等于否定了文本中介绍的阿莱夫，当然也就否定了卡洛斯的说法和他的创作。同时，博尔赫斯还嘲笑了国家文学二等奖居然会授给卡洛斯的那种平庸之作。此外，《阿莱夫》还表现了作者面对大千世界的悲哀与无奈，尤其是对女友的怀念，他说：“我们的记忆是容易消退的；在岁月悲惨的侵蚀下，我自己也在歪曲和遗忘贝亚特里斯的面貌。”

第四节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是短篇小说集《布罗迪报告》中的一篇，发表于 1970 年。博尔赫斯在《序言》中说：“题为《马可福音》的那篇故事是本集中最精彩的，它的大致情节取自乌戈·拉米雷斯·莫罗尼的一个梦；我根据自己的想象或者理解作了一些变动，可能有损于原意。说到头，文学无非是有引导的梦罢了。”看来这是作者比较得意的一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阿根廷的胡宁县南端的白杨庄园，时间是 1928 年 3 月底。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巴尔塔萨·埃斯比诺萨的医科学生。这是个性格中充满了矛盾的青年：有口才，却不喜欢辩论；爱赌博，赢钱会让他感到不快；聪明，但是懒惰；年纪 33 岁，还没有找到他感兴趣的专业；善良随和，却有不少见解或者习惯不能令人赞同；不关心国家大事，却

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的祖国；景仰法国，却瞧不起法国人；蔑视美国人，却羡慕美国的摩天大楼……1928年夏天，他的表哥丹尼尔邀请他去白杨庄园过暑假，他立刻就同意了，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扫兴，再说也找不到可以拒绝的适当理由。到了庄园后过了几天，丹尼尔要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敲定一笔牲口交易，巴尔塔萨就由管家古特雷照顾了。古特雷的妻子已经去世，膝下有一儿一女。三人都瘦长，但结实、高大，长得像印第安人，沉默寡言。巴尔塔萨百无聊赖地看看教科书，闷热的天气中，他盼望着来点凉风。黎明时分，大雨来了，洪水泛滥，田野变成了一片汪洋。古特雷一家三口，加上这个动作笨拙的大学生，七手八脚地把大部分牛群从洪水里救了出来。这时庄园与外界的通道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古特雷一家居住的偏房也漏雨水了。巴尔塔萨就请他们搬到正房后面挨着工具棚的一个房间来住。于是，大学生与这家人就接近了许多，加上一一起在大餐厅里吃饭，说话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古特雷一家对乡村的事情了如指掌，但是不会解释。庄园没有什么图书，只有几本杂志、一本兽医手册、几本故事书和一本那时非常畅销的《堂塞贡多·松勃拉》。晚饭后，巴尔塔萨就给古特雷一家念几段《堂塞贡多·松勃拉》。可是他们对这本讲述潘帕大草原高乔人生活的小说不感兴趣，因为放牧牲口的事情，他们实在太熟悉了，用不着听别人说。巴尔塔萨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十分怀念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广场和商店。庄园的房屋一直被洪水包围着。大学生无处可去，就在房子里乱翻一气。他找到了一本英文的《圣经》，翻到最后几页白纸上的时候，他发现了古特雷原来姓古斯里，祖先是英国人，19世纪来到美洲，大概是雇工，与印第安人通了婚。家谱记录到

一八七几年，那时的古斯里家族的人已经不会写字了。又过了几代，后人把英语也忘光了。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血液里仍然流动着基督教加尔文派的固执和狂热以及对潘帕大草原的迷信。巴尔塔萨把他们的家史讲了一遍，可他们无动于衷。大学生继续翻阅《圣经》，翻到《马可福音》时，决定晚饭后念给他们全家听一听，一方面他想练练口译，另外一方面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能理解。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猜测，他们血液里就有宗教信仰，因为追求理想和信仰上帝是人类的两件大事。古特雷一家为了不耽误听福音总是匆忙吃完烤肉和沙丁鱼。古特雷的女儿有头羔羊，一天被铁丝网刮伤了，巴尔塔萨用了几片药就给治好了。古特雷全家感激得不得了。这让大学生惊异不已。最初，他不很信任古特雷一家，把带来的 240 比索藏在一本书里。现在，丹尼尔不在家，他代替了主人，怯生生地吩咐一切，但是古特雷一家立刻照办。他朗读《圣经》时，看到他们把他掉在桌上的食物碎渣小心地收集起来。古特雷一家对他满怀敬意。《马可福音》念完以后，他们请求他再重复一遍。这时，本来已经减弱的雨势又加大了。古特雷告诉他，暴雨摧毁了工具棚的屋顶，等他修好大梁以后，请他去看看。他们对他毕恭毕敬，甚至有点宠着他。大家都不喝咖啡，但会给他单独煮上一杯，还加了不少糖。暴雨开始后的第三天，晚上，有人在轻轻地敲门。他起来开了门：是那个姑娘。黑暗里看不清楚，但从脚步上他猜出她是光着脚的。上床后，他才知道她是光着身子从后屋里跑来的。她没有拥抱他，只是一言不发；她挨着他躺下的时候，浑身打哆嗦。她这是第一次同男人睡觉。她离去时没有亲吻他。大学生想，她竟然连他姓名都没有打听。他暗暗

发誓：回到城里以后，决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第二天，古特雷主动跟大学生打招呼，问他基督是不是为了拯救世人才被人杀死的。巴尔塔萨是个主张思想自由的人，本来是不受宗教信仰束缚的，但是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念给他们听的福音辩护，于是回答说，基督为的是世人不堕入地狱。古特雷继续问道：地狱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地底下的场所，灵魂在那里不断地受煎熬。古特雷穷追不舍地又问：给基督钉上钉子的人也能得救吗？巴尔塔萨心里没有把握地说：可以得救。谈话中，大学生担心古特雷会问昨天晚上他同姑娘干的事情。午饭后，古特雷一家要求巴尔塔萨念完福音书的最后几章。大学生午睡时听到锤子的敲击声，朦胧的预感把他惊醒了。傍晚时，他起身来到走廊上，自言自语地说：“水开始退了。要不了多久。”古特雷如同回音一样也说了一句：“要不了多久。”他们一家三口跟在巴尔塔萨身后，来到石砌地跪下，请求他祝福。

接着，他们咒骂他，啐他，把他推到后屋去。姑娘一直在哭泣。巴尔塔萨明白外面等待他的是怎么了。门开了，他看到了天空。有只鸟叫了。他想，那是朱顶雀。工具棚的屋顶不见了。他们拆下了大梁，钉了一个十字架。

博尔赫斯通过《马可福音》写了一个人类是如何拯救自己灵魂的故事。不信仰基督教的大学生在无意中宣传了基督教拯救世人的思想。处于蒙昧状态的古特雷一家，在巴尔塔萨传播福音以后，接受了基督救世的思想，但是他们要实践这一思想：用巴尔塔萨的鲜血换来他们灵魂的得救。何况他们不能原谅巴尔塔萨和那姑娘偷吃禁果的罪孽，因此只能把小伙子钉到十字架上。这是对伪善文人的惩罚，因为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

长衣游行，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欢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作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给巴尔塔萨准备的十字架既惩罚了这个假意传播福音的伪君子，也拯救了古特雷一家的灵魂。

第五节 《第三者》

《第三者》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弟：哥哥名叫克里斯蒂安，弟弟叫爱德华多。两人落落寡合，不大与人来往。但是敢跟警察和流氓头子打架。兄弟感情如同“铁板一块”，如果有人惹翻了一个，也就等于惹翻了另外一个。两人都喜欢玩女人。但是长期以来都是“偷鸡摸狗或者逛逛妓院”而已。兄弟感情出现了裂痕是从“第三者”插足开始的。这个“第三者”名叫胡利安娜，来自贫民区，长得算是好看的。她是克里斯蒂安带回来的。街坊们议论纷纷，因为克里斯蒂安经常带着这个女人招摇过市。起初，弟弟爱德华多陪着哥哥和那个女人出去，但是不久也找了一个姑娘回来，不过很快就把那姑娘轰走了。他变得更加阴沉了，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谁也不搭理，因为他爱上了哥哥的女人胡利安娜。街坊四邻都知道了这件事，都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危机的爆发。一天，哥哥对弟弟说：“我要出去玩几天。胡利安娜就交给你啦。你要是喜欢她，你就派她用场吧！”哥哥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下命令，但是很诚恳。弟弟吃惊地看着他，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哥哥骑上马，向弟弟挥挥手，就走了，“他没有和胡利安娜打招呼，好像她只是个物件。”从那天起，哥俩

就分享一个女人。街坊们都认为这是不正派的人才干的肮脏勾当。表面上，兄弟俩相安无事；实际上，经常吵嘴，但是都不提那个女人，因为为了一个女人伤了和气，这在当地是件丢人的事情。“在冷漠的郊区，女人除了满足男人的性欲，供他占有之外，根本不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但是哥俩都爱上了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让他们感到丢人。”可两人都爱着这个女人，这样鬼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一天，流氓头子胡安在广场上遇到了爱德华多，用调侃的口气祝贺他弄到了一个漂亮娘儿们，同时取笑克里斯蒂安甘心戴绿帽子。爱德华多愤怒之极，恨恨地揍了胡安一顿。胡利安娜同时温顺地伺候兄弟两个，但无法掩饰对弟弟更有好感。爱德华多起初就没有拒绝插一杠子，可是也没有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一天，兄弟俩商量了一下，就把胡利安娜卖给了一家妓院。然后，两人把钱给分了。从此，表面上两人恢复了往日单身汉的生活：赌博、斗鸡和打架；实际上，两人经常轮流跑到那家妓院去看胡利安娜。终于，兄弟俩忍耐不住了，决定把那娘儿们赎回来。可是，他俩也忍受不了嫉妒引起的愤怒，常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脾气，最后，哥哥做出了决定并且采取了行动：他把那个女人杀死了。兄弟俩把胡利安娜埋葬在大草原上之后拥抱着一起，几乎哭出声来。从此兄弟俩之间又多了一层联系：那个为他俩牺牲的女人和强迫自己遗忘她的义务。

博尔赫斯在《第三者》的第一段说道：“我认为这个故事是过去郊区平民性格的一个悲剧性的缩影。”这是一种什么性格呢？作者在题目下面给出了一把解读的钥匙：《圣经》中的《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一节上有如此的说法：“以色列的国王扫罗嫉妒大卫的勇敢并担心王位会

被大卫夺去，因此起了坏心，三番五次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喜欢大卫，二人结盟，约拿单多次设法保护大卫不死。扫罗和约拿单被非利士杀死后，大卫在哀歌中唱道：“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几千年来，人们在阅读《圣经》时都会看到约拿单和大卫的故事，都会为他俩之间的深厚友谊所感动。博尔赫斯在《第三者》里提出了兄弟情谊与男欢女爱之间的冲突：对于克里斯蒂安来说，要胡利安娜，就不能要弟弟！如果让弟弟分享同一个女人，兄弟俩又会产生嫉妒。对于爱德华多来说，他也是既爱哥哥，也爱胡利安娜，可是也不能忍受分享同一个女人。哥俩都觉得不应该为一个女人闹矛盾，实际上又都离不开心爱的女人。最后的办法，既然不能共享，那就把她杀掉。但是，杀掉了胡利安娜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他俩永远也不能抹掉心头的阴影，因为胡利安娜点燃的嫉妒之火永远不会熄灭。友情，爱情，嫉妒是人类的本性，所以博尔赫斯说这是“郊区平民性格的一个悲剧性缩影”。其实，地球上哪个民族没有这样性格的悲剧在上演呢？

第六节 《南方》

《南方》是《杜撰集》中的一篇小说。主人公名叫胡安·达尔曼。祖父是日耳曼人。外祖父是阿根廷人，当过兵，与印第安人作战时，被长矛刺死。外祖父的家族给后代留下来一座庄园，地点在南方的大草原上。胡安·达尔曼省吃俭用，勉强保住了这座庄园。但是，他平时还是在首都图

书馆当秘书。琐碎的事物让他一直留在城市里。“年复一年，他满足于拥有一份产业的抽象概念；他确信大草原上的家在等着他归去。”1939年2月下旬，他在上楼梯时由于急着看新版的《一千零一夜》，不小心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他用手一摸，满脸是血。当天晚上他就发了高烧。医生诊断的是败血症。过了不久，大夫告诉他：病情已经好转了，很快就可以去庄园休养了。他没有想到，回庄园看看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乘坐出租车来到火车站。由于距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三十分钟，胡安·达尔曼就走进一家熟悉的咖啡馆喝咖啡，那里有一只大黑猫，任人随意抚摩。他一面抚摩着猫，“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黑猫）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火车向南方驶去的时候，他打开了随身携带的《一千零一夜》。这部书同他不幸的遭遇密切相联，“他带着这部书出门就是要表明不幸已经勾销，是对被挫败的邪恶力量一次暗自得意的挑战。”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他有种幸福感；“胡安·达尔曼合上书，充分享受愉悦的时刻。”他有一身为二的感觉：一身在祖国大地上行进；另外一个躺在疗养院里。他看到车窗外一一闪过的砖房、骑手、沟渠、水塘和农庄……觉得“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进入大草原以后，窗外有时除去一头牛外，空无一物。隐秘和孤寂向胡安·达尔曼袭来，他“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

这时，检票员告诉胡安·达尔曼：列车不停在惯常的车站，而要停在胡安几乎不认识的稍前面的一个车站。下了火车以后，胡安来到一家杂货店询问主人是不是可以找到一辆

马车。店主说是可以套四轮马车送他。于是，胡安决定先留在杂货店吃晚饭，一面等着马车的到来。胡安吃饭时发现有几个小伙子又吃又喝，闹闹嚷嚷。开头，他并没有理会。他看到有个穿戴像高乔人的老者背靠柜台蹲在地上。“他黧黑、瘦小、干瘪，仿佛超越时间之外，处于永恒。”

嗣后，胡安无聊地喝着酒，突然，他觉得有个什么东西打在他的脸上：原来是个面包心搓成的小球。这是有人故意朝他扔的。他打开《一千零一夜》，似乎要掩盖事实。几分钟后，又有一个小球打中了他。他决定离开。这时，店主惊慌地走过来央求他：“胡安·达尔曼先生，那些小伙子醉了。您别理会他们！”胡安并没有因为店主能叫出他姓名而感到奇怪，而是觉得这些劝解的话反而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为“现在却针对他，针对他的姓氏，闹得无人不知。”胡安把店主推开一边，面对那些雇工，问他们想干什么。一个长相粗鲁的家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距离胡安一步之遥，破口大骂，一面掏出匕首往空中抛去，然后接住；一面强迫胡安决斗。店主声音颤抖地反对说，达尔曼先生没有武器。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那个蹲在角落里的高乔老人朝胡安扔出一把匕首来，“正好落在胡安脚下”。“仿佛南方的风气决定胡安应该接受挑战。”胡安弯腰捡起匕首，心里闪过两个念头。“首先，这一几乎出于本能的举动使他有进无退，非决斗不可。其次，匕首在他笨拙的手里不但起不了防护作用，反而给人以杀死他的理由。”他还想，“要是我呆在疗养院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了。”那个家伙提出到外面去决斗。

“两人走出了杂货店。胡安心里不抱着希望，可他并没有恐惧。跨过店门时，他觉得：如果他住进疗养院的第一个晚上就在针头扎进皮肤的时刻能够跟什么人在朗朗晴空下、于决

斗中死去的话，那倒是一种幸福和值得庆祝的事情。他想，如果那时候能够选择死亡或者梦想死亡，那时候他会选择或者梦想这种死法。”“胡安握紧了匕首，可能他不会用，但是他向草原上走了过去。”

博尔赫斯是怀疑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靠不住的，经验也靠不住，反而是偶然性总是作怪。胡安的命运就总是被偶然性摆布：受伤，住院，上、下火车，遇见几个雇工，挑衅，高乔老人提供匕首，甚至店主的劝阻，都是偶然发生的。这让人感到冥冥之中有无数的偶然因素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胡安在火车上就感觉到“南方的风气决定了胡安只能接受挑战”。重要的是他如何对待这些偶然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他有选择的余地，有主动权。可是，他自身的血液中也流淌着祖父和外祖父的精神。祖父是德国人，有冒险精神，外祖父有勇敢精神，所以小说的一开篇作者就这样介绍道：“他的外祖父是作战步兵二团的弗朗西斯科·弗洛雷斯，被印第安人用长矛刺死了；胡安·达尔曼（可能是由于日耳曼血统的原因），在这两个格格不入的家世中选择了浪漫主义的先辈，即浪漫主义死亡的前辈。”胡安·达尔曼可以选择的天地很小，有时甚至是别无选择。难道人类不也是如此吗？或许在别无选择时还要去选择就是伟大的人类精神？

附录：

博尔赫斯小传

一、童年与少年时期

1899年8月24日，博尔赫斯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土库曼大街840号。全名叫豪尔赫·弗朗西斯科·依西多罗·路易斯·博尔赫斯。他的父亲是律师兼师范学校的心理学和英语课的教师，名叫豪尔赫·吉列尔莫·博尔赫斯·哈斯拉姆（生于1874年）。母亲是一位有英国血统的家庭主妇，名叫莱昂诺尔·阿塞维多·苏阿莱斯（生于1876年）。博尔赫斯的全名分别取自父亲、母亲和一位叔叔。他还有个名：乔治，这是亲朋好友对他的爱称。乔治是个早产儿，在母腹中度过了8个月就来到了人间。先天不足和后天的失明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乔治的祖父名叫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拉菲努尔（1832~1874）是一位阿根廷上校，曾经立过战功，最后英勇地牺牲在战场上；祖母名叫范尼·哈斯拉姆，是来自英国的妇女。乔治的外祖父名叫依西多罗·阿塞维尔（1835~1905）也曾经参加过反对独裁者罗萨斯的战斗，晚年过着隐居的生活。乔治就出生在他的家中。反复影响博尔赫斯诗歌创作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曾外祖父曼努埃尔·依西多罗·苏阿莱斯上校（1799~1834）曾经在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中在圣马丁将军指挥下转战经年，在许多重大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乔治在一次寻根之旅中发现，家谱世系中包括以下几种血缘：犹太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格兰人，当然还有阿根廷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几种文化融合的因子。

乔治出生的 1899 年，阿根廷全国人口 400 万，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 80 万，共和国总统是保守党领袖胡里奥·阿根蒂诺·罗卡，反对他统治的党派动员工人抵制他的保守政治。但是，全国的经济形势相当稳定。1901 年，乔治的妹妹诺拉出生。父亲的收入可观，他在市郊买下一座两层小楼，全家迁居到这个名叫巴莱尔摩的居民区，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国的移民，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

1904 年，5 岁的乔治在祖母范妮·哈斯拉姆（1842 ~ 1935）和家庭女教师、英国小姐迪克的教导下，开始学习阅读英语读物。家里人一致认为乔治是个胆怯、内向的孩子，喜欢独处，安静地读书和绘画，尤其爱画老虎和狮子。6 岁时，他向爸爸表示长大要当作家，受到父亲的热情鼓励。此时，占据阿根廷文坛的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是莱昂波尔多·卢贡内斯，他在 1905 年发表了诗作《花园的晚霞》，获得好评。1906 年，乔治 7 岁，用英语写了一篇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短文；又用西班牙语写出他第一个文学故事：《致命的护眼罩》，是根据《堂·吉珂德》中的一个片段发挥而成的。这时，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距离他家不远的动物园，最喜欢看的动物是老虎。1907 年，父亲的大量藏书使得乔治终日躲在书房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英语世界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和阿根廷现代作家的作品。同年，他写下第一部剧本：《贝尔纳多·德尔·卡尔比奥》，是一部三场悲剧，准备和妹妹诺拉一起演出。1908 年，父亲送给乔治一本詹姆斯·格林伍德（James Greenwood）的《家中的激进分子》（The Wild man at home）。同年，阿根廷诗人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883 ~ 1912）赠送给老博尔赫斯一部他的诗

作《异教徒的弥撒》。此事给乔治留下深刻印象，1930年他还专门写下纪念这位诗人的文章《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08年这一年还标志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修建地下铁路。1909年，10岁的乔治在《国家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的《快乐王子集》。许多读者误以为这是老博尔赫斯的译作。这一年，乔治进入距离他家不远的国立学校读书。但是，这个地方给乔治留下了坏印象，因为同学们嘲笑他“戴眼镜，穿高领制服像个伊顿公学的学生”。10岁这一年乔治在一次旅行中看到了距离首都234公里圣尼科拉斯城附近潘帕大草原的壮丽景观。同年，阿根廷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动了全国大罢工，乔治的父亲表示支持。可是这一年，政府在积极准备庆祝建国100周年。阿根廷首次成为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肉类出口第二大国。著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年。1910年，正当中国处于辛亥革命前夜的时候，阿根廷为庆祝五月革命胜利100周年，邀请许多世界名人参加庆典活动，西班牙王室派遣伊莎贝尔公主参加；著名作家拉蒙·德尔·瓦耶一英戈兰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也应邀访问阿根廷。在这一年，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领袖、尼加拉瓜著名诗人鲁文·达里奥发表了《阿根廷颂》。1912年，乔治写出一篇叙事性散文：《森林之王》，发表时用的笔名是“内摩”。

过圣诞节时，母亲送给他一本关于苏阿莱斯曾外祖父家世的传记，从而引起乔治后来长时间的“寻根”兴趣。这一年，父亲的好友、诗人埃瓦里斯托·卡列戈不幸逝世，乔治极为悲痛。

1914年年初，博尔赫斯全家以及外祖母莱昂诺尔·苏

阿莱斯·阿埃多·德·阿塞维多（1837~1918），乘船前往欧洲，目的是给乔治的父亲治疗眼疾。他们在伦敦作短暂停留，随后来到了巴黎，乔治说：“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不喜欢这座城市。”接着，他们又参观了意大利的米兰和威尼斯。这一年的4月中旬，全家在瑞士日内瓦马拉加侬大街17号楼一层安顿下来，在那里一直居住到1918年6月。在日内瓦，15岁的乔治开始学习法语。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博尔赫斯全家被迫留在瑞士。这一年秋天，乔治作为走读生进入加尔文中学读书。从这一年开始，乔治阅读了许多法国和英美作家的作品，例如：雨果、伏尔泰、波德莱尔、福楼拜、都德、莫泊桑等；英美作家如：卡莱尔、切斯特顿、惠特曼等。德国向法国宣战时，乔治的父母正在德国旅游，夫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慕尼黑逃回日内瓦。父母讲述的历险故事给乔治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给他上了“战争是丑恶”的一课。1914年，有三位拉丁美洲大作家来到人世：帕斯、科塔萨尔和比约·卡萨雷斯。最后这一位后来成为乔治的挚友，两人合作写下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1915年，乔治随同父母去意大利观光，这使得乔治大开眼界：“意大利是让我非常激动的国家之一。”这一年，乔治开始学习德语，直接阅读海涅的诗歌。通过英译本，他看完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这一年，他还直接从法语阅读兰波的诗歌；还“解读”了古斯塔夫·梅林科的长篇小说《机器人》。这一年来乔治生平第一次为“他”人的书稿作序，即他的妹妹诺拉的诗集《遥远的音符》。1916年，乔治阅读了父亲从阿根廷带出来的一些本国作家写的文学作品，如：阿斯卡苏比的诗集，萨米恩托的《文明与野蛮》、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马丁·非耶罗》、

古铁雷斯的《胡安·莫莱伊拉》、埃瓦里斯托·卡列戈的诗集、卢贡内斯的诗集等等。这一年，鲁文·达里奥逝世，同时标志着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终结。这一年，在瑞士的苏黎世“达达”运动组织宣告成立。1917年，乔治借助词典直接阅读德国表现主义诗歌。他开始读叔本华、尼采的著作和罗曼·罗兰的长篇巨著《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年，他用法文创造了一些诗歌，后来都散失了。祖母范妮·哈斯拉姆克服了战争给海上通航造成的诸多困难，来到日内瓦与全家团聚。这一年4月，美国参战；10月，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

二、青年时期

1918年，乔治19岁，高中毕业。父母送给他一套德国大百科全书。这一年，外祖母去世。乔治用英文和法文写下许多十四行诗。同时，重点阅读德国的哲学和文学作品。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1919年，全家决定回国；但是首先去西班牙访问。他们乘火车到达巴塞罗那，从那里渡海去马略卡岛。乔治与岛上的诗人胡安·阿罗玛尔和雅各布·苏莱达相识并建立友谊。这一年，他在一位教士帮助下开始学习拉丁文，目的是直接阅读维吉尔的作品。8月20日，他在日内瓦的《活页选刊》上发表了一篇评论和介绍西班牙著名作家巴罗哈、阿索林和鲁伊斯·阿玛多三部著作的文章。这一年的冬天，全家迁移到西班牙的南方城市塞维利亚居住。乔治在那里加入了极端主义派诗人们组成的团体，为该团体创办的刊物《希腊》撰稿。这一年的12月31日该刊物发表了乔治的长诗《大海进行曲》。1920年，乔治去马德里旅行，结识了诗人吉列尔莫·托雷；8年后，这位朋友成为乔治的妹夫、诺拉的丈夫。这次旅行中发生的

“最重大事件”（乔治的说法）是认识了出生在塞维利亚的老作家拉法埃尔·坎西诺斯—阿森斯。乔治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坎西诺斯—阿森斯身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活着仅仅是为了文学，丝毫不关心名利。”乔治决定拜这位老作家为师：“至今我一想起我是他的弟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在马德里期间，乔治经常光顾文学聚会，结识了许多西班牙著名的作家，例如：文坛领袖拉蒙·戈麦斯·德尔·塞纳纳，大作家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大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奥尔特加·依·卡塞特。这一年，他阅读了西班牙文学史上一系列经典作家的作品，如：克维多的《骗子外传》，贡戈拉的《孤独》和《比拉莫和蒂贝斯的寓言》，乌纳穆诺的《雾》和曼努埃尔·马查多的诗集等等。这一年，乔治分别在《希腊》、《探照灯》、《塞万提斯》和《巴利阿里群岛人》四种杂志上发表诗作。还在《塞万提斯》上发表了他翻译和编选的《德国表现主义诗选》。1921年，已经22岁的乔治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活动中去：为极端主义运动起草各种宣言，为报纸和杂志撰稿。老博尔赫斯则把自己191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首领》自费出版，馈赠给亲朋好友。1921年3月底，博尔赫斯全家离开巴塞罗那回国。动身前，乔治撕毁了他写的两部作品：一部是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诗集《红色诗篇》，另一部是政治和文学性散文集《赌徒的纸牌》。全家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居住在巴莱尔莫区的布尔内斯大街2216号。乔治立刻同一群青年诗人创办了名叫《多棱镜》的墙报，他们的宣言是：“我们勇敢和自觉的信仰就是无信仰。”“我们的诗歌有着电报式的简明行文。”这一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蔓延到了阿根廷，南方的工人们纷

纷起来罢工，但是遭到军队的血腥镇压。1922年2月，乔治和全家去阿根廷南方旅游，因为他叔叔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担任一处海军基地的司令。随后，乔治自己参加了圣菲省罗萨里奥市一所大学的文学聚会：介绍极端主义。这一年3月，《多棱镜》第二期刊世。随后，乔治与阿根廷作家、老博尔赫斯的大学同学和朋友马赛多尼奥·费尔南德斯等人一道创办了《船头》文学杂志。该刊物中的插图由乔治的妹妹诺拉用木刻方式解决。第一期8月问世，有乔治的文章。这一年他爱上了一位17岁的姑娘。她名叫康塞普西昂·盖莱萝。法国里昂一家达达派杂志刊登了乔治的诗歌《星期六》。波兰一家杂志发表了他的诗作《清晨》。1923年，乔治自费印刷了第一部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共计300册，其封面插图是由妹妹诺拉设计的。乔治在《我们》杂志上回答了关于“何为一代文学新人”的问卷调查。这一年，全家做了又一次欧洲之行，他们游览了伦敦、巴黎、尼姆（法国南方加尔省首府）、蒙彼利埃（法国南方埃罗省首府）、佩皮尼昂（法国南方东比利牛斯省首府）和日内瓦。随后，全家再次来到马德里，在市中心住了8个月。乔治又一次见到了坎西诺斯—阿森斯和文坛领袖戈麦斯·德尔·塞尔纳。他还结识了诗人海拉尔多·迪埃戈。乔治一人又周游了西班牙南方安达卢西亚的山山水水，从那里转到马略卡岛与诗歌界的朋友们相会。这一年，西班牙文学家和哲学家奥尔特加·依·卡塞特创办了《西方杂志》；后来该杂志发表了许多评论博尔赫斯创作的文章。这一年，乔伊斯发表了《尤利西斯》，艾略特发表了《荒原》，从此为欧美现代派诗歌开了一代新风。1924年，博尔赫斯全家来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准备从那里上船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国

后，乔治积极参加《船头》杂志的策划工作。这个阶段加盟这一团体的，还有著名的小说家里查多·吉拉尔德斯（1886~1927，是拉丁美洲流传最广的长篇小说之一《堂塞贡多·松勃拉》的作者），小说家巴勃罗·洛哈斯·巴斯（1896~1956）和诗人阿尔夫莱多·布兰姆·卡拉法。由于多次外出旅行和搬迁，老博尔赫斯的图书散失了许多，因此乔治从这一年起养成了去国立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一年，他开始为《马丁·菲耶罗》杂志撰稿。《西方杂志》发表了乔治一篇关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大作家克维多艺术风格的学术文章。这一年，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首次发表宣言。1925年1月，乔治在《船头》第6期上第一次发表文章，是分析《尤利西斯》的；同期还刊登了乔治翻译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两章。11月4日，乔治的第二部诗集《面前的月亮》问世，仍然用妹妹诺拉的木刻画做插图。这一年5月，乔治的散文集《探究集》问世。同年，意大利文艺理论家、诗人、未来主义理论的首创者马里内蒂（1876~1944）到阿根廷访问。乔治参加了欢迎这位意大利作家的宴会。经吉拉尔德斯介绍，乔治认识了女作家和女翻译家维多利亚·奥坎博。这位杰出的女才子后来成为沟通阿根廷和欧洲、美洲著名作家之间交流的重要桥梁。这一年，拉丁美洲著名文学史家、多米尼加作家佩德罗·恩里克·乌雷尼亚（1884~1946）因遭到政治迫害而流亡到阿根廷，很快与乔治结为好友。法国作家瓦莱里·拉博（1881~1957）在巴黎出版的《欧洲杂志》12月号上，发表文章介绍博尔赫斯的《探究集》。阿根廷女作家挪拉·兰黑（1906~1973）出版了诗集《下午的街道》，乔治为之作序。1926年，《船头》由于经济拮据而被迫停刊。《马丁·菲耶罗》杂志设宴款待乔

治，祝贺他第二部散文集《我希望的大小》问世。这一年，乔治成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日报》专栏撰稿人。他还为《评价》杂志写了一篇介绍《我希望的大小》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赞扬独裁者罗萨斯的内容引起读者的震惊。这一年，乔治与智利著名诗人、创造主义理论的提出者维森特·维多夫罗（1893~1948）和秘鲁先锋派诗人阿尔贝托·伊达尔戈（1894~1967）一道确定了《美洲新诗选》的篇目。这一年，阿根廷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我们》的负责人胡利奥·诺埃在编选《现代阿根廷诗选》时，将乔治列入其中。这一年，里查多·吉列尔德斯的名著、长篇小说《堂塞贡多·松布拉》问世并立刻引起轰动。12月，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界举行招待会，祝贺这部作品的成功，乔治应邀出席。1927年，乔治第一次做眼科手术（一生做了8次，始终未能阻止失明的逐步发展）。2月26日，在《马丁·菲耶罗》杂志上，发表了《斗殴的人们》，这是博尔赫斯后来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玫瑰角的汉子》的雏形。6月加入到《综合》杂志的编委会领导中；当月发表了评介墨西哥著名作家阿尔丰索·雷耶斯（1889~1959）的《日晷》的文章。9月，雷耶斯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墨西哥驻阿根廷大使。乔治与这位大师会晤，结为好友。后来他的创作深受雷耶斯的影响。这一年，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接待了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戏剧作家皮兰德娄（1867~1936）的来访。同年，博尔赫斯与西班牙著名作家、“98”代文坛领袖乌纳穆诺（1864~1936）书信往来，交流文坛情况和写作心得。同年，应维多利亚·奥坎博的邀请，法国籍瑞士人建筑艺术家、画家和美术理论家勒·科布西（1887~1965）来阿根廷访问，博尔赫斯参加了接待工作。这一年，他的好友、著名

作家里查多·吉拉尔德斯在巴黎死于癌症。1928年，博尔赫斯首次就《阿根廷人的语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剧院作学术报告；后来，全文刊登在《新闻日报》上。这一年，妹妹诺拉与西班牙诗人吉列尔莫·托雷结婚，告别全家去马德里定居。在妹妹结婚前，乔治曾经与托雷讨论过西班牙文学是否仍然影响着拉丁美洲文学的问题，博尔赫斯坚持后者正在超越前者。同年，乔治结识了翻译家奈斯托尔·伊巴拉，博尔赫斯早期的作品都是由这位翻译家第一个译成法文的。同年，乔治与西班牙诗人海拉尔多·迪耶戈（1896~1987，皇家学院院士，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在阿根廷相识并结下深厚友谊。这一年，博尔赫斯与一群青年文学家和艺术家组成声援委员会，支持激进派首领伊伯利托·依里高扬（生于1852年，卒于1933年，1919~1922年曾当选总统，主张民主改革，提倡发展教育）第二次竞选总统。4月1日，依里高扬获胜，继续执行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政策。阿根廷进入又一个社会进步和全面繁荣的时期。1929年，博尔赫斯在墨西哥著名作家、驻阿根廷大使阿尔丰索·雷耶斯个人帮助下出版了他的第三部诗集《圣马丁札记》。这本书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颁发的诗歌二等奖，奖金为3000比索。乔治拿出其中的300比索购买了一套旧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一年，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整个拉丁美洲，阿根廷也不例外。1930年，博尔赫斯出版了《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这是一部介绍卡列戈生平传记和作品研究的专著。文字简练、生动，内容翔实而丰富，思想深刻而充满智慧，这时博尔赫斯个人独特的风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一年，奥坎博姐妹（维多利亚和西尔维亚）把博尔赫斯介绍给比约·卡萨雷斯（1914~1999，后来与博尔赫斯合作写

出多部侦探小说和幻想小说。他个人的代表作是：《莫雷尔的发明》、《逃跑计划》、《英雄梦》等。1990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这一年，法国人马克斯·泰劳斯(Max Daireaux)出版了《拉丁美洲文学》，作者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博尔赫斯的生平和创作。同年9月6日，依里高扬总统领导下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1931年，维多利亚·奥坎博创办《南方》杂志，博尔赫斯从此直到生命结束都为该杂志撰稿。在创刊号上，博尔赫斯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评论诗人阿苏卡苏比的作品；另外一篇评论街道送货车的现象。这一年，他与西班牙著名作家拉蒙·戈麦斯·德·拉·塞尔纳再次相会。同年夏天，乔治与回国探亲的妹妹、妹夫一道去巴西—乌拉圭边境旅行，壮丽的自然景观给博尔赫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散文随笔集《探讨集》问世，其中收入了博尔赫斯对一些电影的评论。这一年，法国著名诗人保尔·瓦莱里(1871~1945)的代表作《海滨墓园》被翻译成西班牙文出版，博尔赫斯为之作序。同年，他还为阿根廷诗人和好友罗贝托·戈德尔的诗集《火焰诞生》写了序言。193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筒》杂志在第11期上(8月出版)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讨论博尔赫斯的作品。这一年8月，博尔赫斯在《评论日报》文化副刊上刊登了几则故事，两年后，这些故事加入到《恶棍列传》中。同年9月，署名拉蒙·多尔的一位作者在《人文科学》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攻击博尔赫斯的散文中表现了“反阿根廷倾向”。博尔赫斯无论褒贬，一律不予理睬。他在《文摘》月刊上发表影评文章。8月，聂鲁达来访。10月，西班牙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到达阿根廷。南方出版社成立，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洛尔卡的《吉普赛谣曲集》。1934年，博尔

赫斯分别为两位诗人的诗集作序：女诗人埃尔维拉·德·阿尔维阿尔的《宁静》和阿尔图罗·豪雷切的《自由人的通道》（因反对军事独裁政府而入狱，其作品本身就是一部抗议书）。亲纳粹的《熔炉》警告博尔赫斯不得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乔治在《话筒》杂志上予以回击。同年，结识加西亚·洛尔卡。这一年，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作家恩里克·阿莫林（1900~1960，擅长描写潘帕大草原的风光和农民的生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马车》、《农民阿基拉尔》、《马和它的影子》、《胜利不会自己来》等）陪同下去乌拉圭—巴西边境旅行；在一家冷饮店里，他俩亲眼看到一个男人是怎样被杀害的。同年8月18日，博尔赫斯在《评论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最后一期文章，随后辞去主管一职。8月24日，恰恰是博尔赫斯35岁的生日，由于心情压抑，他计划在一家旅馆中自杀，结果未遂。1935年，《恶棍列传》问世，《玫瑰角的汉子》也被收入。冬天，博尔赫斯与比约·卡萨雷斯在后者的庄园里合作写侦探小说。这一年，祖母范妮·哈斯拉姆去世。大诗人卢贡内斯赠送给博尔赫斯一部诗集：《耶稣会帝国》。经济危机迫使首都的建筑工人举行了长达6个月的大罢工。同年，博尔赫斯的好友、西班牙马略卡岛上的诗人雅各布·苏莱达逝世。1936年，散文集《永恒的历史》出版，开创了散文中融入小说成分的新风。应《家》杂志主编的邀请，博尔赫斯在这家刊物上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外国图书与作家》。在9月召开的国际笔会上，博尔赫斯结识了法国作家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 1899~1984）。与比约·卡萨雷斯和曼努埃尔·贝伊鲁一道创办了《非时尚》杂志。这一年，博尔赫斯为南方出版社翻译了《安德列·纪德作品选》和维吉尼亚·吴尔夫

的《一个自己的房间》。同年，博尔赫斯发表演说，声援西班牙人民阵线建立的民主政府。7月，佛朗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加西亚·洛尔卡被害。乌纳穆诺逝世。为此，博尔赫斯感到极度悲愤。1937年，博尔赫斯与多米尼加文学理论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合作出版了《阿根廷文学经典作品选》。与母亲合作，为南方出版社翻译了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奥兰多》。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撰写奶制品广告小册子，这是比约的母系家族开办的一系列乳制品公司提出的要求。同年，博尔赫斯担任市立图书馆馆长首席助理。在《南方》杂志12月号上，乔治为比约短篇小说集撰写评论文章。乌拉圭“小说之王”基罗加自杀身亡。

阿根廷的经济开始复苏。毕加索为抗议德国纳粹空军轰炸西班牙北部巴斯克人的故都格尔尼卡，创作了巨幅油画《格尔尼卡》。1938年2月24日，老博尔赫斯因患半身不遂和长期失明忧郁而死。家庭的重担落到乔治身上。这一年，他为罗萨达出版社翻译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并写下译者序。同年8月6日，阿根廷首届反对种族主义和排犹主义全国代表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博尔赫斯当选为理事和组织委员。这一年的圣诞节，由于视力不佳，脑部意外受伤，15天内，败血症使得博尔赫斯生命处于垂危状态。伤愈后，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幻想小说：《唐·吉珂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这一年，博尔赫斯的失明程度有所发展。同年，大诗人卢贡内斯夫妇自杀身亡。噩耗传来，博尔赫斯极度悲伤。1939年，乔治和母亲、妹妹、妹夫迁居到安丘莱那大街1672号的二层楼内居住（自1995年以后，隔壁的住宅用作博尔赫斯基金会的办公地点）。这一年5月，《唐·吉珂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发表在《南

方》杂志第 56 期上。短篇小说《秘密奇迹》被翻译成法文。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三、中年时期

1940 年，博尔赫斯 41 岁。1 月 15 日，为比约·卡萨雷斯和西尔维娜·奥坎博作证婚人。南美出版社出版了《幻想文学作品选》，博尔赫斯的《特隆·乌克巴尔，奥尔比斯·特蒂乌斯》被收入其中。为诗人卡洛斯·M·戈隆贝尔的诗集《犹太人诗选》作序；为比约·卡萨雷斯的小说《莫雷尔的发明》作序。向女作家娜拉·兰黑的大姐埃伊德·兰黑求婚，结果失败。12 月 13 日，博尔赫斯在《家》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纳粹主义，题目是《给亲德分子下定义》，受到广泛好评，这一年，阿根廷人口增加到 1350 万。出版业迅猛发展。1941 年，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版，包括 8 个幻想故事作品。该书申请参加全国文学奖评奖活动，虽然有著名作家埃德华多·马列亚（1903~1982）投了赞成票，但其他 4 位评奖委员均表示反对，因此未获任何奖励。1942 年，《南方》杂志闻讯立刻发表文章，题目是《向博尔赫斯赔礼道歉》。消息不胫而走，增加了博尔赫斯的知名度。与赛西丽娅·因海涅罗斯小姐恋爱。为南方出版社翻译法国作家亨利·米肖的《一个野蛮人在亚洲》；为南美出版社翻译威廉·福克纳的《野棕榈》。同比约·卡萨雷斯夫妇一道为南美出版社编选《阿根廷诗选》，博尔赫斯坚持不选自己的作品。这一年，维吉尼亚·吴尔夫自杀而死。希特勒设立集中营杀害犹太人和一切反对纳粹的人们。1942 年，同比约·卡萨雷斯合作创作了《给堂伊西德罗·巴罗迪提 6 个问题》，署名布斯托斯·道麦斯科，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南方》杂志内部，法国作家罗歇·凯茹阿与博尔

赫斯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此时因为发表在第 91 期（4 月号）上的侦探小说而变得公开化了。从 6 月 7 日开始，以发表《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为开端，博尔赫斯与《民族日报》进行了长期和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一年，《南方》杂志第 94 期上正式刊登了《向博尔赫斯赔礼道歉》的文章，朋友们为此事隆重举办宴会庆贺博尔赫斯的胜利。1943 年，罗萨达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诗选（1922~1943）》，埃梅赛出版社出版了他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的《最佳侦探小说选》。翻译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这位奥地利作家的其他小说。这一年，博尔赫斯与母亲迁居到金塔纳大街 263 号，从此与妹妹、妹夫分居另过。在《民族日报》上发表《猜测的诗》，纪念于 1829 年 9 月 22 日牺牲的弗朗西斯科·拉普里达（1786~1829）博士——博尔赫斯外祖父的近亲，学识渊博，曾任圣胡安市市长，1816 年参加了著名的土库曼会议，后当选为总统。1944 年，根据恩里克·阿莫林的建议，阿根廷作家协会设立荣誉大奖并决定授予博尔赫斯。南方出版社推出他的短篇小说集《虚构集》。《法国人文科学》杂志上刊登了博尔赫斯的一组短篇小说。为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作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学家，1868~1874 年任共和国总统。）的《外省回忆》作序。为美国作家梅尔维尔（1819~1891，代表作：长篇小说《白鲸》）的《代笔者巴特贝》作序。8 月，在比约·卡萨雷斯家中认识了女作家埃斯特拉·甘托。博尔赫斯在《南方》杂志 9 月号上发表文章，庆祝巴黎解放，题目是：《为 1944 年 8 月 23 日做注释》。8 月 23 日这一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民上街游行庆祝巴黎解放，遭到警察残酷镇压。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庇隆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庇隆本人这时任副总统和

国防部长。1945年，博尔赫斯与布伊里奇合作出版了《牛皮大王，他的命运、街区、音乐》。1月，开始创作短篇小说《阿莱夫》，准备献给未婚妻、女作家埃斯特拉·甘托；

《南方》杂志在9月号上发表了这部作品。7月，博尔赫斯在接受阿根廷作家协会授予的文学大奖时，发表政治性演说，全文刊登在《南方》杂志第129期上。10月，前往乌拉圭蒙得维亚大学讲授高乔文学。全文随后发表在《前进》杂志上。1946年7月，由于博尔赫斯曾经在几份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新成立的庇隆政府为了侮辱博尔赫斯命令布宜诺斯艾利斯最高行政长官解除博尔赫斯图书馆馆员的职务，调任他去鸡鸭市场做稽查员的工作。这位长官名叫艾米利奥·西里。由于签署了这份嘲弄博尔赫斯的命令，后来受到广大知识界的嘲弄并因此而臭名远扬。博尔赫斯拒绝接受这一调令，开始在阿根廷和乌拉圭讲授文学，庇隆政府总是派遣特务监视。7月，阿根廷作家协会和诗人罗伯特·莱德斯玛在首都中心广场马尔科尼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声援博尔赫斯。这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年刊》杂志问世，博尔赫斯担任社长。在嗣后的两年中，该杂志一共出版23期，其中有乌拉圭当代大作家菲力斯贝尔多·埃尔南德斯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作品。这一年，博尔赫斯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出版了两本书：《两个值得记忆的幻想》和《给死神做榜样》。给阿根廷诗人埃斯塔尼斯劳·德尔·坎博(1834~1880)的代表作《浮士德》(讲述法国作曲家戈诺德的歌剧《浮士德》对一个高乔人的影响)作序；给塞万提斯的《警世典范小说集》作序。好友佩德罗·恩里克·乌雷尼亚逝世。这一年，博尔赫斯后来的女秘书和妻子玛丽娅·儿玉出生。1947年，博尔赫斯发表《时间又一次反

驳》，后收入到《探讨别集》中。这一年，曾临时代理《南方》杂志的主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年刊》上发表以下作品：《永生》、《神学家们》、《阿斯特里昂的家》和《萨伊尔》。与比约·卡萨雷斯完成《鬼节》，该作直到1950年方才发表。1948年，博尔赫斯为女作家埃玛·里索·布拉德罗的短篇小说集《失眠结构》作序。在164~165合期的《南方》杂志上，一个署名穆雷纳的人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著文《反对一种诗歌》，指责博尔赫斯的诗作有反民族主义倾向。9月8日，博尔赫斯的母亲和妹妹在市中心被捕，理由是未经批准唱国歌和散发反对庇隆主义的传单。鉴于母亲年事已高，警察把她软禁在家中；而妹妹诺拉却关入监狱一个月。同月，《南方》杂志上发表了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埃玛·宗兹》。1949年6月26日，短篇小说《阿莱夫》出版，文学评论界为之震动，作者的知名度大增。这一年，博尔赫斯翻译了英国作家卡莱尔（1795~1881）和美国哲学家艾默生（1803~1882）的著作。为马尔塞·施沃布（Marcel Schwob）的《孩子们的圣战》作序。撰写关于《人间喜剧》的论文。博尔赫斯当选为巴西圣保罗歌德学院院士。11月7日，女作家埃斯特拉·甘托在《新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博尔赫斯采访记》。马尔科斯一里查多·巴纳旦在《博尔赫斯大事记》上特别注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博尔赫斯当选为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任期3年。该组织是反对庇隆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为埃瓦里斯托·卡列托的《全诗集》作序。这一年，他出版了《高乔文学的面面观》。在阿根廷英国文化协会中，开设英国文学讲座，担任自由高等学院英国文学教授。这一年，他开始研究古英语文学。1951年，埃梅赛出

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又一部短篇小说集：《死亡与罗盘》。墨西哥出版了博尔赫斯与戴丽娅·因海涅罗合作的《古日尔曼语文学》。与比约·卡斯特罗合作出版了第二套《最佳侦探小说选》。博尔赫斯法译本的《杜撰集》在巴黎问世。10月，《南方》杂志上又一次发表署名穆雷纳的文章，再次攻击博尔赫斯的诗学思想是反民族主义的。对此，他在自由高等学院做了题为《阿根廷作家与传统》的讲座，回击了穆雷纳与其民族主义同类的诬蔑。美国韦尔斯利学院邀请博尔赫斯开设文学课程，遭到在美国的西班牙文学教师的抵制，理由是：“博尔赫斯一贯是西班牙文学的死敌。”在阿根廷国内，第二任庇隆政府加强了对新闻和出版的控制。1952年，增加了新作品的《阿莱夫》问世。南方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一部新的散文集：《探讨别集》。法国出版了由罗歇·凯儒阿编选的博尔赫斯作品集《迷宫》。埃梅塞出版社开始陆续推出《博尔赫斯全集》。这一年，他辞去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大作家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逝世，博尔赫斯为之送葬。恩里克·贝索尼发表文章驳斥穆雷纳对博尔赫斯的攻击，同时捍卫博尔赫斯从事文学创作的正当权利，这篇文章刊登在《南方》杂志11月和12月的合刊上。1953年，《博尔赫斯全集》第一卷问世。为芭蕾舞剧《消失的形象》写舞台脚本。维多利亚·奥坎博被捕。《南方》杂志社办公室被警察搜查。1954年，《博尔赫斯全集》第二、三卷出版。第一部专门研究和评论博尔赫斯创作的著作问世，作者：阿道夫·普列多；书名《博尔赫斯与新一代人》。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埃玛·宗兹》被雷奥波尔多·托莱斯·尼尔逊搬上银幕，改名为《仇恨的日子》；博尔赫斯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1955年1月，胡安·卡洛斯·保尔旦迪

诺在《大学人文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祝贺《博尔赫斯与新一代人》的问世，认为该书揭露了博尔赫斯和一些作家“背叛了祖国”。博尔赫斯在 1、2 月合刊的《南方》杂志上公布了他在 1951 年以《阿根廷作家和传统》为题的讲座全文，以此回击了民族主义评论家们的进攻。10 月，阿根廷新政府成立，立刻任命博尔赫斯为国立图书馆馆长。同年，他还当选为阿根廷文学院院长。这一年 9 月，《城市》杂志上专门列出阅读和研究博尔赫斯创作的书目。9 月 30 日，乌拉圭《前进报》刊登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鬼节》。这一年，墨西哥出版了博尔赫斯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的两个电影剧本：《奥里耶罗人》和《信徒的天堂》；一部《微型小说选》和《高乔诗歌》。这一年，博尔赫斯还同女作家路易莎·麦尔塞德斯·莱文森合作出版了《埃罗伊萨妹妹》；与贝迪娜·埃德尔伯戈合作出版了《论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同年，《博尔赫斯全集》第四卷问世。意大利出版了博尔赫斯的《杜撰集》。1956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授予博尔赫斯以哲学与文学系英国文学教授的职称。阿根廷政府把 1954~1956 年度全国文学奖颁发给博尔赫斯。蒙多萨省古优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这一年，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埃塞基埃尔·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1895~1964）发表文章批评博尔赫斯是“雇佣来的吹鼓手”；博尔赫斯当即在《南方》杂志第 242 期上著文回击。由于视力急剧下降，眼睛手术没有成功，医生禁止博尔赫斯读书和写作。从此，母亲为他阅读书籍和做速记。这一年，《博尔赫斯全集》第五卷出版。1957 年巴黎用《探究集》（1937~1952）的名字出版了博尔赫斯的散文集。墨西哥出版了他的《幻想动物学手册》。《博尔赫斯全集》第五、六卷问世。

在博尔赫斯领导下,《图书》杂志复刊。为祝贺西班牙大诗人胡安·拉蒙·希门内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博尔赫斯为波多黎各大学的《塔》杂志撰写介绍文章。诗人塞萨尔·费尔南德斯·莫雷诺(1919~1985)出版专著:《博尔赫斯简介》。女语言学家安娜·玛丽娅·巴莱内切(1913~)出版了学术专著:《博尔赫斯作品中对非现实性的表达方式》。10月26日,法国《自由射手》日报错误地发出博尔赫斯逝世的消息。1958年,法译本《恶棍列传》和《永生的故事》经过阿根廷著名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参与翻译得以问世。这一年,《达瓦尔》杂志第77期上发表了博尔赫斯的诗歌《机械人》。第254期《南方》杂志上刊登了他的散文:《以色列的阿根廷见证》。1959年,博尔赫斯短篇小说的德译本和意大利译本出版。这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各大报纸的文艺副刊上纷纷刊登博尔赫斯在庇隆统治时期不能发表的文章和作品。在9、10月合刊的第260期《南方》杂志上,博尔赫斯著文参加文化界的大辩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是否应该封存美国作家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这一年,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马尔罗(1901~1976)访问阿根廷,与博尔赫斯会晤。墨西哥著名作家阿丰索·雷耶斯逝世,博尔赫斯深感悲痛。

四、晚年时期

1960年,61岁的博尔赫斯仍然笔耕不辍。这一年,出版了随笔集《创造者》;发表一篇关于高乔诗歌的论文;增补、再版了《探讨别集》;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出版了《天上和地狱的书》。同年,加入了阿根廷保守党。1961年,国际出版家代表大会决定授予博尔赫斯国际文学奖。由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他的名字在西方读书界

广为流传。这一年,《杜撰集》用6种不同的语言同时出版。意大利政府决定授予他“骑士勋章”。9月10日,应得克萨斯大学和奥斯汀基金会的邀请,他在母亲陪同下第一次访问美国,6个月中做了多场报告,参观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纽约出版了他的小说集《迷宫》。12月,南方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自选集》。1962年2月25日,博尔赫斯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文学院召开特别会议,宣布博尔赫斯为“文学大师……;争取自由的大师”。11月27日,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根据安德列·马尔罗的提议,授予博尔赫斯“文艺骑士勋章”。英美版的《杜撰集》问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首次上演电影《玫瑰角的汉子》是由勒内·穆西卡根据博尔赫斯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而成的。墨西哥《大学杂志》刊登了詹姆斯·伊尔比对博尔赫斯的长篇采访。1963年1月底,博尔赫斯在母亲陪同下去欧洲讲学。母子访问了马德里,拜会了“导师”甘西诺斯-阿森斯,做了几场学术报告。西班牙语文化协会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博尔赫斯到西班牙访问,许多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应邀出席。随后,应英国议会邀请,母子来到伦敦。博尔赫斯先后在牛津、剑桥、爱丁堡等处大学讲学。从那里,母子来到巴黎和日内瓦,与两位中学同学会面。3月12日,母子回到阿根廷。次日,博尔赫斯接受国家艺术基金会颁发的大奖。这一年,阿根廷著名作家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在古巴的《美洲之家》第17~18合刊上发表文章,肯定了博尔赫斯的成就,但是否定了他小说中“时间和空间之外的虚构”。这一年,博尔赫斯在阿根廷各地讲学。12月,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授予博尔赫斯荣誉博士称号。年轻一代的拉丁美洲作家纷纷在这一年发表有

分量的长篇小说，例如：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对此，西方文坛称之为“文学爆炸”现象。1964年，博尔赫斯访问联邦德国并出席作家国际代表大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举办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邀请博尔赫斯参加。法国广播电台对博尔赫斯进行了连续采访和报导。嗣后，应赫伯特·里德爵士（1893~1968，英国诗人和评论家）邀请去伦敦做客。接着，瑞典出版家伯涅邀请博尔赫斯访问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他在返回阿根廷的途中顺访了西班牙历史、文化名城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这一年，法国杂志《Cahiers de l'Herue》以专号形式介绍博尔赫斯，许多阿根廷和欧洲著名作家为之撰稿。埃梅塞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全诗集》（1923~1964）。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出版了英译本的《创造者》和《探讨别集》。阿根廷女诗人阿莱罕德拉·比萨尔尼克采访了博尔赫斯，她随后将采访结果发表在委内瑞拉的《自由区》杂志的第二期上，博尔赫斯对她说：“我认为所谓我有些名气的这个事实本身，就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文学正在走向衰退。”这一年，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1965年，博尔赫斯与玛丽娅·埃斯特尔·瓦斯盖斯合作出版了《中世纪日尔曼文学》。他在这位女作家陪同下前往秘鲁讲学并参观古印加文化遗址——马丘比丘。秘鲁政府授予博尔赫斯太阳勋章。随后，前往哥伦比亚和智利讲学。这一年，他还接受了英国政府授予的“大不列颠帝国特别骑士勋章”。同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第九届诗歌节，结果把金奖授予博尔赫斯。同年，他发表了《为六弦琴而作》。1966年，巴黎出版了《探讨集》，由翻译家克莱尔·斯陶译出。《博尔赫斯诗集》（1923~1966）（增订本）问世。意大利

米兰举办第九届诗歌节，博尔赫斯获得大奖。纽约英格拉姆·梅里基金会授予博尔赫斯文学奖。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巴黎出版《话语和事物》，一开篇他就坦率地承认：“这本书是从博尔赫斯的一篇文章中诞生出来的。”这一年5月22日，博尔赫斯的母亲90岁整。阿根廷作家协会提名博尔赫斯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6月，阿根廷军队发动政变，解除了总统职务，胡安·卡洛斯·翁卡尼亚上台执政。同年，军方对大学实行军事管制。1967年，与比约·卡萨雷斯合作出版了《布斯托斯·道麦斯克记事》；博尔赫斯自己还出版了诗集《另一个，同一个》和《博尔赫斯诗集》（修订本）。9月21日，与青年时期的女友埃尔萨·埃斯德特·米扬结婚。新婚夫妇定居在国立图书馆附近的单元住宅里。同年，第二次去美国讲学，由妻子陪同，在哈佛大学讲授诗歌。此外，还在其他美国大学举办文学讲座。这一年，在美国逗留了7个月的时间。与西班牙诗人豪尔赫·纪廉相识并成为好友。还与一批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进行学术交流。荷兰杂志《北方》为博尔赫斯出了专刊。与他人合作出版了《美国文学入门》。这一年，博尔赫斯翻译了美国作家纳撒内尔·霍桑（1804~1864）的《给作者的书》。纽约出版了格罗夫·普雷斯翻译的《博尔赫斯自选集》。这一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问世，轰动西方文坛。1968年，博尔赫斯于4月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幻想动物学手册》经过修订，用了一个新书名出版：《神话人物之书》。10月，埃麦塞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自选集》（新版）。同年，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知识分子反对种族主义国际大会”。被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意大利驻阿根廷大使代表本国政府授予博尔

赫斯“共和国功勋章”。阿根廷电影制片人乌戈·桑地亚哥把博尔赫斯写的剧本《入侵》搬上银幕。1969年1月，在妻子陪同下前往欧洲和以色列。本一古里安（1886~1973）总理亲自迎接博尔赫斯夫妇的来访。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大学作学术报告。与希伯来文化的专家格尔松·斯丘林（Gershom Scholem, 1897~1982）会晤。回国后，阿根廷希伯来文化协会举行盛大宴会，祝贺博尔赫斯70寿辰。12月，第三次去美国讲学，仍然由妻子陪同，在俄克拉何马大学、乔治敦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就他自己的创作作了报告。在芝加哥大学，西班牙著名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介绍博尔赫斯的文学成就。参加纽约举办的国际诗歌节，此时该城正在首演哈罗德·曼特尔（Harold Mantell）编导的纪录片《博尔赫斯的内心世界》。这一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博尔赫斯名誉博士称号。博尔赫斯出版了一部新的诗歌、散文集：《影子颂》，用这个书名纪念日本现代重要小说家古崎润一郎（1886~1965）。这一年，纽约都东出版社陆续推出英译《博尔赫斯全集》。他翻译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巴特尔比》。11月，法国电视台播放关于博尔赫斯生平和创作的纪录片。法国上演根据博尔赫斯的小说《埃玛·宗兹》改编的电影。在伦敦，理查德·伯金发表了《与博尔赫斯一席谈》。1970年，巴黎出版了《博尔赫斯诗选》（到1965年为止）。8月，埃麦塞出版社终于推出读书界盼望已久的博尔赫斯小说集《布洛迪的报告》。8月22日，他前往巴西圣保罗领取玛塔比索·沙比里奥泛美文学奖。10月，与妻子离异，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生活。意大利一家报社对世界许多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赞成博尔赫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要超过赞成索尔仁尼

琴的人。但是结果是后者获奖。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预演了两部以博尔赫斯小说内容为主要情节的电影：《叛徒和英雄的故事》和《埃玛·宗兹》。同年 9 月 19 日那一期《纽约》杂志上，刊登了博尔赫斯的《自传回忆》，作者声明他在世时不得翻译成西班牙文。伦敦出版了《迷宫》。巴黎出版了《埃瓦里斯托·卡列戈》。1971 年，第四次去美国讲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把他的作品与塞万提斯、埃德加·爱伦·坡、波德莱尔和卡夫卡相提并论。耶鲁大学举办了“与博尔赫斯相会”的活动，世界上许多作家和学者到场。同年再次去欧洲讲学，这一次由女秘书玛丽娅·儿玉陪同，从此二人一直没有分离。5 月到达伦敦，做四次报告，接受牛津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访问苏格兰。这一年 4 月 19 日他还曾去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市授予的图书节大奖。返回阿根廷途中访问了冰岛。10 月，墨西哥的《学报》刊登了诗人何塞·埃米略·巴切戈（1939~）从英文翻译的《博尔赫斯自传回忆》。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代表大会》以珍藏本的形式出版。1972 年，博尔赫斯又有一部新诗集问世：《老虎们的金黄》。2 月，根据博尔赫斯的《马尔科斯解释的福音书》改编的话剧在阿根廷上演。3 月，第五次去美国讲学。密执安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马德里出版了阿根廷诗人和作家马尔科斯·里查多·巴纳坦（1946~）研究博尔赫斯的两部专著：《博尔赫斯传》和《博尔赫斯诗歌研究》。同年，博尔赫斯被任命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犹太博物馆领导成员。1973 年，阿根廷纪念《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激情》问世 50 周年。作家豪尔赫·贝科（1923~1973）发表了《博尔赫斯作品书目总集》。4 月，博尔赫斯前往西班牙讲学，主题是：博氏的诗

歌与散文创作。路易斯·豪威尔和里查多·巴纳坦通过西班牙电视台对博尔赫斯进行了采访。同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宣布一批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为“杰出公民”，其中有博尔赫斯。12月，他前往墨西哥领取以他好友、著名学者阿丰索·雷耶斯命名的文学奖。这一年，庇隆主义党重新执政。博尔赫斯立刻申请退休并立刻得到批准，他是从1955年开始担任国立图书馆馆长这一公职的。美国《新周刊》在12月10日这一期上刊登了博尔赫斯对庇隆主义的严厉批评。12月30日，阿根廷《民族日报》用专号的形式发表了50多位作家对博尔赫斯的支持与敬意。1974年7月中旬，埃麦塞出版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推出一卷本《博尔赫斯全集》。5月，意大利出版了豪华本的《世界代表大会》。这一年，博尔赫斯在各种场合严厉批评庇隆主义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也因此受到种种迫害和威胁（特务扬言要结果他的性命）。9月1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舆论日报》为庆祝发刊第1000期，专门组织了共有23页的一个副刊，刊登了《博尔赫斯的自述回忆》。11月，南方出版社出版了科萨林斯基的专著：《博尔赫斯与电影》。同月，博氏的外甥女5岁的安海丽娜不幸溺水身亡，这位舅舅痛不欲生，悲伤中写下十四行诗《怀念安海丽娜》。1975年3月，博尔赫斯新的小说集问世，共收入13篇，取名为《沙之书》；第一次印刷了4万册，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销售一空。8月诗集《深刻的玫瑰》出版，《怀念安海丽娜》也收入其中。同年，还出版了《博尔赫斯 序言 文选》。意大利的里西伯爵委托博尔赫斯编辑《巴别丛书》。7月8日，母亲去世，终年99岁。《民族日报》发表了博尔赫斯最悲痛的诗：《内疚》。9月，第五次去美国讲学，由女秘书玛丽娅·儿

玉陪同，地点在密执安大学。这一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演了两部根据博尔赫斯和比约·卡萨雷斯小说和故事改编的电影。1976年，伊莎贝尔·庇隆的政府刚一倒台，3月24日博尔赫斯就表示支持军政府，这一态度受到欧洲文化界的强烈批评。他还在埃内斯托·萨瓦托陪同下拜会军政府主席魏地拉将军，请后者过问一些失踪的作家。同年，应西班牙电视台的邀请，在玛丽娅·儿玉的陪同下前往马德里。5月8日，他的《沙之书》被授予西班牙新文学评论奖。这一年，他第六次去美国讲学，地点在缅因大学；辛辛那提大学授予博尔赫斯荣誉博士称号；在华盛顿，在纪念莎士比亚的国际研讨会上，由他致开幕词。8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文学副刊》发表了博尔赫斯的诗歌：《铁币》。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他在墨西哥城稍事停留；9月，应智利圣地亚哥大学的邀请，接受荣誉博士称号。智利语言学院聘请他担任名誉院士。他还接受了智利皮诺切军政府颁发的“奥西金斯大十字勋章”。对此，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Artur Lundkvist, 1906~ ）发表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在马德里，著名的《西班牙美洲札记》杂志取消了准备发排的“博尔赫斯专号”，理由是“遇到了技术故障”，而这些“故障”经过了16年的时间才得以排除。这一年，博尔赫斯出版了一部新诗集：《铁币》；一部诗选：《梦之书》；一部与阿莉霞·胡拉多合作的《何为佛法》。就在他77岁生日这一天，他的《宇宙起源学》出版了。9月，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访问。这一年，他还获得布宜诺斯艾利斯第十三俱乐部奖。他的一些作品被译成意第绪语（犹太人使用的一种语言）。1977年，博尔赫斯与比约·卡萨雷斯合著的

《布斯托斯·道麦斯克新记事》问世。4月，前往法国，接受巴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随后，应出版家弗朗哥·马利亚·里西的邀请，游览日内瓦、米兰、威尼斯和罗马。与意大利著名诗人、197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蒙塔莱（1896~1981）会面。从罗马转道希腊参观，终于实现了多年来一睹克里特岛风光和了解克诺索斯“迷宫”的愿望。10月，博尔赫斯回到巴黎，参加纪念阿根廷作家吉拉尔德斯的活动；为他的好友画家苏尔·索拉尔（多次为博尔赫斯的作品设计封面）的画展开幕剪彩；在巴黎大学做学术报告。11月，在西班牙做短暂停留，出席《玫瑰与蓝色的博尔赫斯》一书的首发式。11月，他献给玛丽娅·儿玉的诗集《黑夜的故事》和随笔集《阿特罗盖》问世。1978年，博尔赫斯再次去巴黎大学，参加祝贺他文学成就的活动。出席《巴别丛书》第一卷首发式。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对博尔赫斯的长篇采访记。在玛丽娅·儿玉的陪同下，访问了日内瓦和埃及。瑟德尔贝里出版了瑞典文版的《布洛迪的报告》。在西班牙，卡洛斯·梅嫩塞斯汇编了博尔赫斯青年时期的诗歌。博尔赫斯与玛丽娅·儿玉合作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文选》。应墨西哥电视台的邀请访问该国，途中在波哥大停留，接受该市授予的“城市金钥匙”和哥伦比亚政府颁发的勋章。在哥伦比亚安第斯大学讲学。这一年，里查多·乌里切和贝尔纳多·卡明摄制了纪录片《让亿万人了解博尔赫斯》。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号角》日报用了8个版面的篇幅介绍了“永不休止的博尔赫斯”。1979年，博尔赫斯步入80岁高龄。3月15日，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日报副刊发表了短篇小说《柏树叶》，这是博尔赫斯献给玛丽娅·儿玉的作品。5月，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纪念维多利亚·奥坎博的活动。接受法国文学院的金质奖章；联邦德国功勋奖章；冰岛政府的“雄鹰十字”勋章。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在塞万提斯剧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祝贺博尔赫斯诞辰80周年。9月4日，接受前列腺良性肿瘤切除手术。马德里的国家日报开辟专栏祝贺博尔赫斯80大寿。应日本基金会的邀请，在玛丽娅·儿玉的陪同下访问日本，游览了东京、京都等城市；与日本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会晤。埃梅塞出版社推出了《博尔赫斯演讲集》。博尔赫斯翻译的杰克·伦敦的《同心圆之死》和卡夫卡的《兀鹫》问世。1980年，应纽约国际笔会分会邀请，第七次访问美国；在芝加哥和波士顿大学讲学；在印第安纳大学做客座教授一个月。这一年，阿根廷诗歌基金会授予博尔赫斯荣誉大奖。西班牙文化部授予博尔赫斯西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巴塞罗那布鲁盖拉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自选集》，第一次印刷高达50万册，三月内销售一空。首次上演阿道夫·加西亚·韦德拉编导的大型纪录片《与博尔赫斯散步》。4月23日，在西班牙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大学，博氏接受国王卡洛斯亲自授予的塞万提斯文学奖。马德里为他举办招待会。随后，访问塞维利亚。4月26日，巴塞罗那中心大学举行大型招待会，回答两位主持人提出的问题。游览马略卡岛；与作家们会晤。回到阿根廷后，接受《新闻日报》采访，强烈谴责军政府的政治迫害行为：“面对这如此多的死亡和失踪事件，我不能保持沉默！”6月，重返马德里。6月11日，加泰罗尼亚政府授予博氏西拉文学奖。8月12日，他和萨瓦托签署联合宣言，要求军政府调查失踪者的下落。这一年，巴黎授予博氏西诺文学奖；意大利授予他最高文学奖——巴桑奖。瑞典文版的

《沙之书》问世。博氏在 1977 年做的学术报告文集《七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12 月，重返马德里，担任塞万提斯文学奖评委；连续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阿根廷的军事独裁政治。1981 年 3 月，博氏前往罗马接收由意大利总统贝尔迪尼亲自颁发的巴桑奖，约合 15 万美金。他声明说：“我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帮助，因为他们没有给我诺贝尔文学奖。”在罗马，他对教皇体制提出尖锐批评，引起轩然大波。返回阿根廷途中，在马德里逗留，因为那里出版了《博尔赫斯诗选》。这一年，博氏当选为法国政治、伦理学院院士。8 月，墨西哥总统授予博尔赫斯一笔约合 8 万美元的尤里兹提文学奖。同年，参加墨西哥国际诗歌节。诗集《密码》在马德里出版。6 月，哈佛大学和波多黎各大学先后隆重集会，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与阿根廷雕刻家、建筑师阿道夫·佩雷斯·埃斯基韦尔（1931～1980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签署联合声明，要求军政府遵守人权公约和履行阿根廷宪法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7 月，米兰市政府授予博尔赫斯一笔文学奖金；同月，意大利出版家邀请博氏参加《迷宫》研讨会。这一年，博尔赫斯发表文章《纪念莎士比亚》。82 岁生日那一天，他宣布：“我需要活下去，至少再活一年。”1982 年，两次去美国讲学。马德里出版了博尔赫斯又一部新书：《但丁式的散文集》，序言是青年作家、研究博尔赫斯的学者马尔科索一里查多·巴纳坦写的。应爱尔兰政府邀请，博氏参加纪念詹姆斯·乔伊斯的活动。应德国政府的邀请，访问慕尼黑和柏林。随后，在日内瓦和马德里做短暂停留，接着游览马略卡岛。阿根廷《号角日报》发表博尔赫斯的长诗《胡安·洛佩斯与胡安·沃德》，反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6 月，美国驻联合

国女大使柯克帕特里克在安理会上朗诵了博尔赫斯的这首诗。1983年1月19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博尔赫斯荣誉骑士军团勋章。巴黎政治、伦理学院为博氏访法举行盛大招待会；法兰西学院邀请他做学术报告。与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雷蒙·阿龙、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会晤。法国一家出版社与博氏签约，准备出版法文版的《博尔赫斯全集》。2月，伦敦BBC广播公司在乌拉圭拍摄一部关于博氏生平影片。3月27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日报》刊登博氏的小说《1983年8月25日》，其中有作者宣布自杀的消息。后来有人问作者为什么没有履行诺言。博尔赫斯的回答是：“因为胆怯。”这一年，再次去美国讲学。4月6日至8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迪金森学院举办博尔赫斯诗歌国际研讨会；博氏在玛丽娅·儿玉的陪同下出席，并且做了三场报告。6月，前往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锡切斯市主持大学暑期班开幕式。同年，在西班牙桑坦德市大学，副首相阿丰索·盖拉在文化部和教育部长陪同下授予博尔赫斯“阿丰索十世智者国王大十字勋章”。8月25日，前往日内瓦与中学同学一道庆祝84岁寿辰。12月，前往美国领取艾略特文学奖。1984年1月，同年时的好友毛里塞·阿布拉摩维奇逝世，博尔赫斯写下《挽歌》，发表在1月29日的《民族日报》上。这一年，前往意大利、日本、希腊接受荣誉博士称号。在他85岁生日那天，意大利出版家里西赠送给博氏相当85英镑的金币。10月，出席了在摩洛哥召开的第九届诗人国际代表大会。12月13日，博尔赫斯针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系取消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做法发出警告：“阿根廷文化处于危险之中！”1985年，接受意大利比萨市授予的埃特图里亚文学奖。同年，再度去美国讲

学。重返西班牙，先后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停留，准备出席最后一部新书《参与阴谋者》的首发式。6月3日，与贡萨莱斯首相和夫人在政府宫共进午餐。这一年，伊斯巴美里卡开始出版《博尔赫斯个人丛书》袖珍版，由博尔赫斯根据世界文学名著选定并作序。5月，纽约拍卖行以25000美元的价格将《阿莱夫》的手稿卖给了西班牙文化部马德里国立图书馆。7月22日，博尔赫斯出席了对前军政权军警头目的公审，法庭揭露了这些刽子手对作家的刑讯拷打和杀害。对此，博氏在《号角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这一年11月，博尔赫斯因患癌症和对阿根廷激进派政府政策的失望，决定永远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日内瓦定居。玛丽娅陪同前往。这一年，阿根廷西鲁埃拉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翻译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切斯特顿的《阿波罗的眼睛》和爱伦·坡的《被盗窃的信》。1986年1月，博尔赫斯进入日内瓦州立医院治疗。4月22日，与玛丽娅·儿玉结婚。6月13日，病情恶化。6月14日清晨逝世，死于肺气肿和肝癌，终年87岁。这一年，他翻译的邓萨尼（1878~1957，爱尔兰作家）的《扬的国度》问世。西班牙联合出版社出版了拉法埃尔·甘西诺斯-阿森斯的《七枝烛台》，其中的序言是博尔赫斯写的。

一代世界文学大师离开了人间，他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第十章

埃内斯托·萨瓦托 的小说

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abato, 1911 ~ ）是阿根廷著名作家。1911 年 6 月 24 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罗哈斯市，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大学期间攻读数学和物理，毕业于拉普拉他大学，曾经去法国深造，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在著名的居里实验室从事过原子放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轰毁了他致力科学研究、造福人类的梦想。面对血腥的现实，他决心用手中的笔来干预生活，反映阿根廷的社会现实 揭露人类的丑恶面目 于是毅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埃内斯托·萨瓦托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地道》（El tunel, 1948）、《关于英雄与坟墓》（Sobre heroes y tumbas, 1961）、《地狱使者阿巴东》（Abaddon el exterminador, 1974）。另外他还有几部重要的文学评论专著，如：

《作家与幽灵》（El escritor y sus fantasmas, 1963），《走近当代文学：罗伯·戈里耶、博尔赫斯、萨特》（Aproximaciones a la literatura de nuestro tiempo, 1968）。

埃内斯托·萨瓦托不仅是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正直的社会活动家。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制度后，他出任失踪者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出版了调查报告《不许重演》，公布了对三万余名失踪者的调查报告，揭露了军事独裁政权残酷迫害进步人士的暴行，在阿根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84年12月10日埃内斯托·萨瓦托荣获西班牙政府授予的塞万提斯文学奖。此前，法国政府于1979年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晚年由于视力减退而放弃文学创作而从事绘画。根据西班牙世界报2002年4月11日的报道，萨瓦托在马德里美术家协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勇敢地迎接政治、经济、文化危机的挑战。他虽然91岁高龄，却慷慨激昂地说：“面对四周贫困现象的日益严重，我们绝对不能容忍那种惟一的模式、那由少数跨国集团为控制世界而强加给我们的模式。”

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的作品富有哲理性，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在创作中非常重视人物的内心活动，描绘手法细腻，文字洗练，因而被誉为拉丁美洲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埃内斯托·萨瓦托从事文学创作的年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危机的时期。除去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外，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欧洲和美洲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精神危机。在阿根廷国内，庇隆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文化艺术活动受到严格控制，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

家遭到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压抑和失望。加上20世纪初，阿根廷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大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角逐和经济竞争日趋激化。所有这一切都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少来往、多猜疑的紧张关系：“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使得人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享乐之风甚嚣尘上。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不可避免地受着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多是在冷漠环境中挣扎的小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经济竞争中，他们常常感到彷徨、苦闷、悲观和失望，可是也有人依然在坚持传统的信念，有人仍然在执著地追求美好的理想。

第一节 《地道》

《地道》的主人公是“我”。这个第一人称的名字叫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是个画家。“我”开宗明义地道出来：“我就是那个杀死玛丽亚·伊利瓦内的画家。”“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仅仅想讲出自己的犯罪经过，如此而已。谁若不喜欢就别看。但是，我不信他们不愿看，因为正是那些一贯爱寻根问底的人好奇心最盛；我想，他们谁也不肯放过读一本完整的犯罪故事的机会。”“我”随即表示要公正地讲出认识玛丽亚的经过，两人的关系以及产生杀死她的念头。“我”在1946年9月21日开幕的阿根廷全国美术雕塑展览会上摆出了一幅画，题为《母爱》，内容是：画的左上角有个小窗口，有个女人在那里眺望远方的大海，她似乎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在幽静中等待一声微弱的呼唤。

“我”认为，这场景表现出一种绝对的孤独，而且包含着某种不安。那女人脚下是个正在玩耍的男孩。许多观众从这幅画面前走过。只有一个女人望着画面，伫立良久。“我”焦急不安地望着她，既想上前攀谈，又感到胆怯。结果，那女人走掉了，消失在人群里。“我”很懊丧，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中。一连几个月，那女人都没有露面。“我”一直思念她，渴望有机会再看到她。一天下午，“我”终于在大街上看见了她。“我”激动得难以形容，可又不知如何是好。事先准备好几套搭话方式，“我”由于种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而不能启齿。但是，“我”又不甘心失掉这次宝贵的机会，便无可奈何地跟在她身后走了一街又一街。机会终于来了：那女人进了某公司大楼。“我”也跟了进去。

她在等电梯。“一股奇特的胆量使我脱口说出一句蠢笨至极的话：‘这里是T公司的大楼吗？’’，一块大招牌明明就安装在大楼的下面，可是她仍然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话。那女人脸红了，因为她认出了“我”。“我”激动得要命，语无伦次地问她是不是还记得那个“小窗口”。那女人一时没有明白画家的意思，慌乱得说不出话来。“我”很尴尬，道歉之后，走出了大楼。

但是，那女人追了出来，告诉画家：她一直记得画面上的窗口。说完之后，她就跑掉了。“我”急忙跟上去寻找，但是已经不见那女人的踪影了。“我”又回到了大楼，默默地等待着下班的时间。但是，“我”一直等到7点，可是没有看到她的影子。第二天，“我”又来到大楼门前，她依然没有出现。就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她从地铁出口走了出来。“我的心狂跳起来，腾地起身向她跑去。她一看到我便陡然停住了脚步，仿佛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尊石像。很明

显，她没有料到我会出现在这里。奇怪的是内心猛烈的悸颤却赋予我一股特殊的力量，我觉得浑身是胆，满身是劲，什么都敢干。于是，我近乎粗鲁地抓住她的一只手臂，一句话也没说，就拖着她沿圣马丁广场走去。她似乎不知所措，半天没说出话来。直到走出两个街区以后，她才问我：‘您带我去哪儿？’‘去圣马丁广场。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讲。’我一边说，一边抓着她的胳膊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两人来到广场上，在一条路椅上坐下来。“我”急切地问道：“您为什么逃走？”她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回答说：“不知道。我现在仍想逃走。”“我”恳求说：“请您答应我不再逃走了。我需要您，我非常需要您。”但是，这个漂亮女子不说话。“我”一再说“我需要您，非常需要您。”她就是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那女子问“我”为什么需要她。可是“我”又一时回答不清楚，只是说：“我的脑袋里像一座黢黑的迷宫。偶尔有几道电光闪过，照亮一些通道。我总搞不清自己干某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她困惑地看着“我”。“我”继续清理着思路，一面说了出来：“我预感到您对我今后的事业是不可缺少的，虽然我还没有发现其中的道理。”突然间，“我”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她是惟一注意到《母爱》画面上窗口的人。她是“我”艺术上的知音！“您和我想的一样！”可是当她问“我”的想法时，“我”又说不明白，只是强调说：“这一切与整个人类相关联。有时，我觉得一切都毫无意义。在一个从几百万年来就毫无目的运行的小小星球上，人类在痛苦中降生，成长，奋斗，患病，受苦，也让别人受苦，喊叫，死亡，人人都得死亡，然后又有人降生，接着又重复这无聊的闹剧。”那女子帮助“我”澄清思路：“那是不是意

味着失望？”俩人谈得投机起来。但是女子冷漠地说：“我不知道您认识我会有什么好处。我会给所有接近我的人造成不幸。”两人分手时，那女子给“我”留下了电话和地址。次日，“我”给玛丽亚（那女子的名字）打电话，希望再次见面。玛丽亚慌乱地说：不行。“我”坚持要见面。她勉强答应第二天再联系。“我”高兴得很，“原来对人类的厌恶和蔑视也减少了许多”。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玛丽亚，可接电话的是另外一个女人。她说，玛丽亚到乡下去了；还说，玛丽亚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我”很不高兴地去她家拿信，结果见到了玛丽亚的丈夫阿连德。原来他是个盲人，一面拿信给“我”，一面解释玛丽亚突然下乡的原因：

“玛丽亚就是这样。许多人把她的一时冲动错当成什么急事。实际上，她办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也是着急得要命。”

“我”打开信一看，只有一行字：“我也想念您。”阿连德继续解释说：“比如说今天，她一早起来就对我说，她要去别墅。去我们的别墅。也就是说去我祖父的别墅。现在那别墅归我表弟翁特尔了。我想您大概认识他。”听了这一番话，“我”大失所望，随后就匆匆告辞了。在电梯里，

“我”气恼地想：“这是一场多么令人作呕的喜剧啊！”

“我”来到大街上，脑袋里乱哄哄的，成了一团乱麻：各种各样的念头，爱情，仇恨，疑问，烦恼和回忆接踵而来，全都交织在一起。“我”一一分析着玛丽亚的一切：丈夫、佣人、电话、别墅、表弟翁特尔是不是她的情人……最后回到“我也想念您”这封信上来。“我”分析的结果是：“我隐隐约约感到这女人已经闯进了我的生活，她属于我了。”可是疑心很重的“我”马上又推翻了这个“属于我”的结论，觉得她是在提醒“我”她是有夫之妇，我们的关系

不宜发展。但是，“我”立刻推翻了这个想法，反而认为“那是一封巩固我们之间关系的信。”接着，“我”觉得：“她与我性格相仿。”“我”感到自己的全部爱情都倾注在玛丽亚身上，不应该胡思乱想。但是“我”做不到。以后的几天“我”是在焦躁中度过的。玛丽亚还没有从别墅回来。“我”于是向玛丽亚的女仆要了别墅的地址。同一天晚上，“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玛丽亚，询问她的归期。“我”在煎熬中等待着玛丽亚的回信。终于她来信了。信中说：“我度过了奇怪的三天，大海、沙滩和道路不断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回忆中有形象、话语、喊叫和长长的沉默。奇怪的是生活总是给未来准备回忆。现在，我面对着大海就在编织精巧的回忆。但这回忆肯定会给我带来悲哀和失望的。海水在翻腾。往日的泪水于事无补。我伫立在海滩上，凝视着大海，一面期待着什么，然而这是无谓的等待。你发现并且画出了我的回忆吗？或者你已经画出了许多与你我相同的人的回忆？但是，你现在出现了！你站在我和大海之间。我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你伫立不动，面带忧伤，目光似乎在向我求援。”这封信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信中信任的口气让“我”感到：她只属于“我”一个人。“我”在回信时只写了一句话：“我爱你！玛丽亚，我爱你！我爱你！”两天后，她回信说：“我怕给你带来不幸。”“我”立刻回答说：“你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都不在乎。如果不能爱你，我就活不下去了。看不到你，我每时每刻遭受折磨。”但是，这一次玛丽亚没有立刻回信。过了几天，玛丽亚打来电话，说她已经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要求约会。两人商定晚上8点在莱科勒塔大街见面。到了晚上，“我”一看到玛丽亚就“挽住她一只手臂，痴痴呆呆地一次又一次呼唤

着她的名字，除此之外，我想不起说什么话了。”玛丽亚则沉默不语。突然，“我”发出一连串问题：你为什么抛下我一人走了？你为什么把信留在家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有夫之妇？玛丽亚回避这些问题，反而说：“还是谈谈你吧！我一直想着你那幅画，想着你在圣马丁广场对我说的话。我想知道你眼下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是不是又创作了新画。”“我”一味地追问：“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爱我。”她不吭声。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便划了一根火柴。“我”看见她在流泪。随后，她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说道：“我当然爱你……有些事情为什么非要说出来不可呢？”“我”固执地追问“爱”的方式。她在黑暗中好像笑了一下。“我”生气了：“你在笑我的幼稚。”她忽然起身要走。“我”急忙问道：“你为什么要走？”她回答说：“恐怕你根本不会理解我。”“我”气极了，吼道：“这对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你用微笑回答，还发火，我当然不能理解你了！”她冷冷地说：“我根本就没有笑。那是你的幻觉。”实际上，“我”并没有真的看到她的笑容。于是，“我”道歉说：“玛丽亚，请原谅！”她重新坐下来，抚摸着“我”说：“我提醒过你，我会给你带来痛苦的。”此后，连续一个多月，两人天天见面。玛丽亚到“我”的画室里来了。“我”和她发生了性爱。但是这非但没有密切了两人的关系，反而引起了“我”的猜疑：因为后来她试图逃避做爱，“她这种态度只能使我更加怀疑她对爱情的诚意”；因为，“我弄不清楚她是不是在逢场作戏，并怀疑她提出性爱有害无益的论点后，能否将来避免这种事；因为既然从一开始她就讨厌这样做，那么她的快乐就是伪装的。因此，矛盾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她根本无法说服我，反

而使我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怀疑，这样一来，又出现了许多更加复杂的新问题。”“最使我生气的是在这个假定的骗局中，我完全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戒备地倾心于她”“我”愤愤地对她说：“假如我发现你欺骗了我，我会像杀死一条狗那样杀死你。”每当这种时候出现，玛丽亚就像个孩子，吃惊地望着“我”，或者露出悲伤、温顺的神情。有一天，两人吵得比往常都凶，“我”骂了她，说她是“婊子”。玛丽亚惊呆了，随后哭了起来。“我”赶忙上前道歉。她又幸福地微笑了。“我”又猜疑起来：“她能够这么快就高兴地忘却，却是十分可疑的，我觉得任何一个女人，包括妓女在内，被人如此谩骂也会感到抬不起头来；然而她却能够这么快就重新高兴起来。除非这称呼当真有些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疑心越来越重。“我”追问她和她丈夫的感情，追问她和别墅主人的关系。“我”几乎变成了怀疑狂。与此同时，“我”自甘堕落：酗酒，嫖娼……这时，玛丽亚又到别墅去了。“我”不停地给她写信。玛丽亚终于回信要“我”去别墅看她。“我”像疯了一样，拎了一个提箱，带上画具，直奔火车站。到达乡下以后，玛丽亚因为身体不适没有来迎接“我”，这让“我”很不高兴，更让“我”产生了猜疑。到了别墅之后，翁特尔（玛丽亚丈夫的表兄）和他的妹妹米密·阿连德接待了“我”。玛丽亚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出来。直到午饭后，大家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玛丽亚方才露面。“我”一看见心上人，立刻烟消云散。但是，玛丽亚为了躲开米密和翁特尔，便借口要看“我”的素描，拽着“我”回房间去了。“我”又产生了疑团：翁特尔一定爱着玛丽亚。“我”和她回到海边的时候，米密和翁特尔已经不在沙滩上了。玛丽亚回忆了两人相识的

美好时光。“我”默默地倾听着她那悦耳的声音，沉浸在快乐中。可与此同时，“我”又产生了许多忧伤的念头：“我观察着脚下的峭壁，想到我把她一道拖进深渊是多么容易啊！”两人回到别墅时，“我”发现翁特尔特别激动和不耐烦。晚上，“我”又偷听到翁特尔和玛丽亚在说悄悄话。于是，“我”得出结论：玛丽亚是翁特尔的情妇。“我”本来准备多逗留几天，现在发现了这个秘密便在第二天偷偷溜走了。回到首都，“我”立刻给玛丽亚写信，说明自己不辞而别的原因，希望能在城里再见一面。几天后，玛丽亚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要求约会，玛丽亚答应了。但是，到了第二天，女仆打电话告诉“我”：玛丽亚回别墅去了。

“我”立刻就急了，跟朋友借了一辆汽车，匆忙向别墅赶去。一路上，仇恨、爱慕、嫉妒充满了“我”的心头。

“我”在思考自己的一生：一条孤独、黑暗的地道贯穿了我的生活。到了别墅，“我”偷偷溜到花园里看到了玛丽亚挽着翁特尔的手臂在散步。“我”强压着心中的怒火，等待夜幕的降临。晚上，“我”拿着匕首闯进了玛丽亚的房间。她惊恐地看着“我”喊道：“胡安，你要干什么？”“我”左手揪住她的头发，回答说：“我要杀了你，玛丽亚。你抛弃了我。”于是，“我”流着眼泪把匕首刺入她的胸口。她下颏一阵抽搐，便闭上了眼睛。“我”凌晨四五点钟回到了首都。在一家咖啡馆里，“我”给玛丽亚的丈夫阿连德打了电话，告诉他要立即见到他。“我”随后跑到阿连德家里，一见面就告诉他：“玛丽亚是翁特尔的情妇。”可是“我”没有想到，阿连德却骂“我”是“蠢货”，是“混帐东西”，并且挥舞着拐杖追打“我”。快6点时，“我”到警察局自首了。在监牢里，“我”仍然不明白阿连德为什么骂“我”

是“混帐东西”。警察也嘲笑“我”由于画面上的窗口才认识玛丽亚的说法。理解“我”的人只有一个，可是她已经去了。

《地道》里没有涉及什么社会重大事件，也没有展现什么广阔的文化背景，而是集中全部的笔墨描绘画家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孤独、压抑、绝望和病态的心理。作品强调的是卡斯特尔的生存环境就是一条黑洞、一条没有尽头的地道。细致的心理描写和悬念丛生使得这部作品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也是这部作品的突出特色。《地道》自 1948 年出版以来，陆续被翻译成英、德、法、葡、日、瑞典等文字。一些文学评论家给予了很高评价。阿根廷文学评论家安德孙·因贝特在《拉丁美洲文学史》（下卷）中说：“主人公卡斯特尔开宗明义地说：他犯了情杀罪，他要一一讲述出来。他的供状不是通过案情让人感到兴趣，而是通过他的每句话；而每句话就是他疯狂过程的象征；而他的疯狂又是象征着一种绝望的思辨。卡斯特尔的疯狂是有道理的，有时还颇有几分哲理：说到底，其原因在于，他已经无法与外部世界交流了，甚至跟他情妇玛丽亚也做不到了。（顺便说一句，玛丽亚是拉丁美洲小说中第一个阅读萨特作品的女英雄。）卡斯特尔似乎迷失在地道里了：有时洞壁是透明的，因此他可以看到别人生活的情形；但是他供状中令人感到痛苦的是他的孤独，他的与世隔绝。一个独立的‘我’在望着世界，这个‘我’几乎纯粹是个主观天地，它没有能力与外部环境沟通。”意大利文学评论家优素福·贝伊尼（Giuseppe Bellini）说：“《地道》和《关于英雄和坟墓》使得萨瓦托享有国际声誉。作者在《地道》中认定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类是不幸的。它表现在主人公胡安·巴勃罗·卡

斯特尔的内心不平衡中，其结果就是杀害了玛丽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很善于深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他借助人物的嘴巴，无情的批判了社会，即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都市生活。作者非常精辟地给人类的生活下了定义：生活是一种孤寂的讽喻。萨瓦托随后的小说，如《关于英雄与坟墓》的艺术特色在《地道》中已经露出端倪。”

第二节 《关于英雄与坟墓》

这部作品一开始就公布了 1955 年 6 月 28 日刊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理性报》上的一份警察局的报告。通过这个报告，读者知道了书中的第一个人物——亚历杭德拉。根据警察的报告，这个女子在卧室里开了四枪，打死了自己的父亲，随即引火自焚而死。事件发生后，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之震动。人们的初步感觉是：这女子很可能是精神失常后杀了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亚历杭德拉的父亲费尔南多·比达尔写过一份令人奇怪的《关于瞎子的报告》。费尔南多·比达尔患有妄想狂，但是从这个报告里可以分析出女儿弑父的原因并非精神失常，而是另外“有险恶的用心”。作者用这种方式设置了第一个悬念。第一章题为《龙与公主》。这一章一开头作者就交代了时间和地点：1953 年 5 月，即在亚历杭德拉弑父的前两年；地点在布宜诺斯区利斯的莱萨玛公园。主人公名叫布鲁诺。他在回忆跟一个名叫马丁的年轻朋友的谈话内容。通过布鲁诺的回忆，又引出马丁与亚历杭德拉是如何相识的：这个美丽和气质高雅的姑娘是在公园里看到马丁的。随后，两人又在拉布拉塔河口借

助“心灵感应”又一次见了面。马丁很快就爱上了亚历杭德拉，“如果说她使我心烦意乱的话，正是因为我爱她，我需要她。”姑娘很关心马丁的家世，连连询问马丁的父母情况。马丁的父亲是个画匠；母亲是个喜欢吃喝玩乐的女人。她很不愿意要小孩，曾经多次设法堕胎。但是，马丁还是顽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为了保持苗条的身材，母亲不给马丁哺乳。因此，马丁从小就对母亲没有好感，他说母亲是阴沟洞里的女人。由于缺乏营养，马丁发育不良，长成了驼背：“从孩提时代起，这些痛苦就一点一点地在马丁的脊背上堆积起来，犹如一个体积不断增大、与身材不成比例的重负压在身上一样，这让他行动时必须小心翼翼，总像个走钢丝者踏上深渊上的钢丝，而他背上还要驮着一个又脏又臭的包袱，好像驮着垃圾和粪便。”听完马丁讲了自己的家世，亚历杭德拉说了一句话让马丁大吃一惊：“你和我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非常重要的东西。”分手时，她没有留下地址，但是她说：“你别担心，任何时候我都知道怎么找到你。”这以后，马丁就天天盼着她的消息。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姑娘还没有露面。马丁胡思乱想起来：“我不再看到她了。她已经离开人世，也许她自杀了。好像她既燃烧着渴望又充满了绝望。”他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想法，认为她的失约，是一种欺诈行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姑娘依然没有露面。马丁绝望了。他痛苦地回忆自己的身世，感到很悲观，感到无依无靠。他回想起父母之间的矛盾，他对母亲的厌恶之情，他的离家出走。他本来想到南方去。但是，没有成行。1955年2月，马丁正在公园里看一本书的校样时，由于疲倦，便朦胧入睡了。他做了一个噩梦。把他晃醒醒来的就是亚历杭德拉。马丁又惊又喜。姑娘温柔地抚

摸着他的头。从此，两人便经常约会了。一天，姑娘把马丁带到了她曾祖父居住过的古望楼。两人爬到楼上，姑娘烧好咖啡后给马丁讲起她高祖父、曾祖父在独立战争中的故事以及党派之争给她的家族带来的灾难：曾外祖父的妻子受惊吓而死，一位姨姥姥和一位叔叔吓得精神失常。这位姨姥姥疯了以后就不再下楼了。她看守着父亲的头颅（被敌人砍下来的）度日，从 1852 年到 1932 年去世为止。姑娘还泄露了一个秘密：她 5 岁时母亲病死，11 岁时发现父亲和另外一个女人在古望楼同居。于是，她就离家出走了。最后，她来到一座庄园，认识了一个名叫马科斯的男孩（比她大一岁）

男孩的父母收留了她。到了她 14 岁的时候，她对马科斯说：她希望两人去中国或者亚马孙地区传播福音。马科斯回答说：那太危险了，他没有那个胆量，还是留在庄园里安全。他还明确表示要跟她结婚、生孩子。亚历杭德拉愤怒地叫嚷道：“我决不会要孩子。我警告你，你永远也别抚摸我！任何人都别碰我！”但是，突然之间她又脱光了衣裳倒在沙滩上，命令马科斯也脱光衣服躺下来。那少年吓坏了，连呼“罪过，罪过”，逃走了。后来，马科斯主动地亲吻了她。但是，他没有料到姑娘愤怒地咬破了他的嘴唇。小伙子吓得逃走了。亚历杭德拉还要报复，她准备了一把小刀去找马科斯。她没有想到小伙子发现了她的企图，一下子夺走了她的刀子并且顺手扔到黑暗的草地去了。姑娘气得跑向大海，小伙子连忙把她抱住。随后，他把她送到家中休息。亚历杭德拉好了以后就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但是，她内心里一时也平静不下来。终于有一天，她又去庄园找马科斯。两人来到海滩上。她和他双双向大海深处游去。但是，小伙子胆怯了，坚持要游回海岸。两个裸体的少男、少

女拥抱在一起。姑娘狠命地亲吻小伙子。马科斯害怕了，大喊道：“我们两个要下地狱的！”姑娘说：“地狱是神甫编造的谎话。”可是小伙子还是逃跑了。以上就是亚历杭德拉向马丁袒露的真情：她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恋情。姑娘和马丁回到了房间，她吃了两粒药丸，随后就睡着了，马丁望着她美丽的睡姿，不敢打搅她，又不愿意离开她，他陷入了冥思苦索，感觉她虽然近在咫尺，却可看不可及，似乎还有什么重大的秘密妨碍着他和她的关系。他回想起来了，她害怕提到盲人，害怕提到费尔南多这名字。这时，亚历杭德拉好像在噩梦中挣扎，口中连连说“不”。马丁急忙把她喊醒过来。他怀疑梦中一定是盲人或者费尔南多在捣乱。于是，下决心弄个明白。他问到她先辈。她回答说：曾祖父潘乔还活着，已经 95 岁了。“他的记性好着呢。另外，只要有可能，他就整天说过去的事情。”马丁说：“我很高兴有一天能听他说说。”姑娘说：“现在我就带你去见他。

可这时是清晨 3 点了。姑娘说：对老爷爷来说，无所谓什么清晨 3 点钟。特别是夜里，他总是不睡觉。于是，他和她就来到了潘乔的住处，老爷爷看到姑娘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她把马丁介绍给老爷爷并且说他想听听过去的故事。于是，老爷爷讲述了一个英国人如何在阿根廷定居下来，如何热爱这个国家，如何在著名的胡安·拉瓦列将军与独裁者罗萨斯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故事。老人讲得累了，亚历杭德拉留下来照顾老爷爷。马丁走了，他来到大街上，一面想着姑娘的家族史真是复杂。随后，又想到为什么一提到盲人和费尔南多这个名字亚历杭德拉就惊慌失措呢？几天后，马丁失去了校对稿件的工作，漫步街头时遇到了老朋友——油漆匠德阿尔坎赫洛。这位油漆匠帮助马丁解决了吃饭和住宿的难

题。两人在谈话中，回忆了“这个国家的变化，所有那些好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马丁又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亚历杭德拉了。这一天，他的朋友奇钦给他带来了一封信，原来是那姑娘约他见面。到了约会的时间，马丁又看到了自己的心上人。“他像个孩子一样向她跑去，给她讲了印刷厂不再给他活干的事情。”马丁说：“你说过有个叫莫利纳里的人，他有个大企业。”姑娘惊奇地反问：“我说过这个人吗？”马丁希望能在这个人的企业里找份工作。姑娘怀疑马丁的能力，但是最后还是答应想想办法。这时，她感觉胃部有些不适，就喝了几滴药水：阿片酊。姑娘建议到码头上坐一坐。两人望着水上的货轮，看着滚滚流动的河水，一面谈话。她突然说道：“远走高飞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事啊！我想离开这座肮脏的城市。”姑娘进一步说：“世界是堆垃圾。”马丁不愿意看到她如此沮丧，就安慰她说：世界上还有美好的东西；并且对她表白了爱慕之情。可是亚历杭德拉仍然说：“我是一堆垃圾。马丁，你懂我的话吗？”马丁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但是隐约中感到这姑娘有难言之隐，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比如，为什么她不愿意别人说到“盲人”，一提到“费尔南多”这个名字就紧张？两人吃完饭后向姑娘的家走去。亚历杭德拉谈起她经常做梦，总是梦见大火。马丁极力安慰她。到了家里，马丁在向她进一步表白爱情的时候拥抱和亲吻了她。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马丁感到惊悚的事情：她的双手如同鹰爪一样抓破了他的皮肤，随后用力把他推开，坐了起来。更让马丁吃惊的是，姑娘大口地喘气，用力撕开了衣裳，突然躺倒在地，浑身颤抖起来。马丁急忙把她抱在怀里，送到床上。姑娘不停地扭动着身体，不停地呻吟。最后，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马丁看着她渐渐人

睡的样子，方才放下心来。一个多小时以后，她睁开了眼睛，要水喝。马丁一手搂住她的肩膀，一手端水给她喝。接着，她要求把电灯关上。她说：“我非常、非常累，我想睡觉。可是你别走，就睡在我身边吧。”马丁脱了鞋子，在亚历杭德拉身边躺下。姑娘很快睡着了。可是马丁的脑子乱得很，心里觉得很难受，仿佛自己是个王子，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终于在一座岩洞里找到了由蛟龙守护的公主。现在这位美丽的公主被粪便和污泥包围，她在呻吟，在战栗，呼唤着他的名字，恳求他帮助。可是他发现他俩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深渊。这时，姑娘又醒了过来。她对马丁说：“我希望你能习惯这种场面。”马丁想要抚摸她的脸。她恐惧地叫道：“别碰我！”随后便起身说：“我去洗澡。”好长时间她才回来，一面解释说：“我很脏。”原来，她又做了噩梦，因此想用水和清洁剂洗掉可怕的梦境。马丁痛苦地问道：“难道我永远也不能吻你？永远不能碰你的身子？”接下来，姑娘用具体行动回答了他的问题：她脱光了全部衣裳。马丁也脱了衣服，随即进入了“迷人的宫殿”。天亮以后，丁马醒来时看到姑娘正在望着他，方才知道“迷人的宫殿已经荡然无存了”。两人穿好衣裳以后，姑娘说：“马丁，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一堆垃圾。别忘记，我提醒过你。”最后，她要求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多年以后，马丁跟好友布鲁诺谈起这段恋情时，两个男子汉终究没有弄明白亚历杭德拉为什么性格如此怪异多变？她为什么年纪轻轻会有那么多痛苦和秘密？经历了那短暂的幸福时光之后，马丁便失去了亚历杭德拉的音信，长期处于失业、孤独、痛苦和失望之中。以上就是第一章的内容。

第二章题为《看不见的面孔》，继续讲述亚历杭德拉和

马丁之间的感情纠葛。马丁为了找到工作，约了一个名叫博德纳韦的人谈话。姑娘听着两个男人的交谈越来越不耐烦。谈话结束后，亚历杭德拉答应马丁跟银行家莫利纳里联系。次日，马丁按照亚历杭德拉的安排去找莫利纳里谈工作。结果，莫利纳里仔细盘问了马丁一番之后，用教训人的口气对小伙子说：“我不能因为单纯的友谊就给您一份工作，特别是在认识您不久就给您工作。如果这样，不难想象，我们会有麻烦的。”后来，马丁对布鲁诺谈及这次荒唐的会见时，觉得这说明亚历杭德拉与莫利纳里之间有某种不同寻常的关系：这姑娘肯定知道银行家不会给他工作，可是还要他去谈话；莫利纳里进而在百忙之中还要花时间来接待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伙子，这说明银行家不敢不给亚历杭德拉一个面子。尤其是莫利纳里还追问了马丁是如何认识亚历杭德拉的。这说明这位银行家很在意马丁和那姑娘的关系。特别是后来银行家还大谈生存和公正的问题，这更让马丁产生了疑问：他是不是跟亚历杭德拉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时间的长短是衡量两人关系的尺度。”银行家的话匣子一打开可就不得了了：他大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专制独裁和社会自由，一直说到妇女卖淫问题……马丁实在忍耐不住了，说了一声：“请原谅。我最好还是离开吧。”他跑到大街上呕吐起来。马丁再次见到亚历杭德拉的时候，这姑娘尖刻地骂莫利纳里是“一头完美无缺的蠢猪，是个数一数二的婊子养的”。后来，马丁回忆起就是在这次约会之后，经亚历杭德拉介绍他认识了布鲁诺。姑娘告辞走了。马丁和布鲁诺推心置腹地交换了许多看法，其中马丁谈到了他和亚历杭德拉的爱情，谈了这姑娘的复杂性格。最后，马丁因为要去看油漆匠德阿尔坎赫洛，便同布鲁诺分手了。许多天过去

了。马丁一直没有见到亚历杭德拉。马丁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连连给她打电话。姑娘终于来了，但是一见面就大谈时装店里女售货员粗俗的言行。会面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这姑娘开了一家时装店。时间一天又一天地过去了。马丁又一次给时装店打电话。可是接电话的是亚历杭德拉的女友万达。这女人说，亚历杭德拉不在，她可以转达他的口信。但是后来马丁并没有接到她的消息。他很想去时装店看看，但是觉得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如同在大海里的遇难者，越是口渴越不能喝海水。他想，还是让她自由选择为好。可是一想到她会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马丁不由得妒火中烧。于是，他决定冒险去一趟时装店，尽管他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而且有可能惹她生气。马丁进了时装店。亚历杭德拉看到了他，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但还是打了招呼，并且请马丁坐下等一等，因为她手上有活。这时，走进来一个名叫基克的男人，是个报社的记者，长得怪里怪气，他千方百计地逗乐子。亚历杭德拉和万达开心地笑个没完。这让马丁看到了亚历杭德拉庸俗的一面。正当基克评论昨晚剧院上演的节目时，一个名叫克里斯蒂娜的女演员走了起来。记者立刻上前去讨好这个美人。基克随后大讲演艺圈里的内幕。基克走后，亚历杭德拉把马丁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她说，她很忙，的确没有时间跟他约会。马丁聚集起全身的力量说：“那好吧。我走了。”姑娘连忙拦住他说：“咱们很快会见面的。”马丁说：“我不想干预你的生活，你的独立……至少见面时，不那么匆匆忙忙……”姑娘答应他下个星期一见面，但是不敢保证没有变化。马丁苦恼地走了。他还要等待五六天的功夫。于是，就用工作、看书、散步、看电影和找布鲁诺聊天来消磨时光。布鲁诺告诉他：爱情不是绝对的，

它总是处于变化之中。马丁问布鲁诺：相爱的人儿是不是应该都讲真话？布鲁诺告诉他：数学、化学和哲学需要讲真话，但是感情这东西是非常主观的，人是非常复杂、多变和矛盾的。有时爱和恨是交织在一起的，互相转化的，你不可能时时讲真话。如果总是讲真话，你的对象会感到绝望的。

星期一终于到了。马丁高兴地看到亚历杭德拉前来赴约。美丽、清秀、娇美的姑娘让马丁兴奋不已。他小心翼翼地陪伴着姑娘向河岸走去。在差不多一小时内，俩人没有怎么说话。马丁不愿意由于说话不当让姑娘不高兴。但是，要真正获得幸福，他认为：“就应该钻进她的身体里去，钻进她的每个缝隙、每个细胞、躯体的里里外外，要和她的肉体在一起，要跟她结合，而不是默默地坐在一块。”于是，他建议说：“咱们去你的房间吧。”姑娘说：还是去看电影吧！马丁不高兴了。姑娘说：“你别这样。我感到不舒服。”马丁固执地不肯说话。突然，姑娘说：“好吧。咱们回家。”可是，马丁又不愿意姑娘勉为其难，说道：“你这样做好像是一种牺牲似的。”姑娘说：“别犯傻了！咱们走吧！”两人回到姑娘家中，疯狂地做起爱来。马丁试图通过做爱，“来感受她痛苦之谜的神秘底部”。可是，姑娘用一种马丁无法理解的话语进行抗争。这种话语弄得两人心烦意乱。“后来，如同经历了一场横尸遍野又毫无意义的战争一样，两人都默默不语。”他和她走出了黑暗的房间，因为姑娘要打一个电话。马丁发现姑娘有些精神恍惚，便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姑娘回答说：“8点钟，我得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远吗？”她含糊其辞地说：“不远。”马丁忧伤地望着渐渐走远的亚历杭德拉，随后走进一家咖啡馆。

但是那里乱七八糟的谈话让他心烦，于是离开那里来到公园的长椅上回想和分析跟亚历杭德拉相处的每时每刻。他越想心里越乱，什么也梳理不清。于是决定第二天去找布鲁诺。次日，马丁看到布鲁诺以后希望到酒吧里谈谈。布鲁诺告诉马丁：他得去看看纳尔迪尼神父，因为神父病得厉害。两人正走在大街上时，忽然布鲁诺抓住了马丁的胳膊指着一个走在他俩前面并且拄着拐杖的人说：“博尔赫斯！”俩人加快了脚步，追上前去。布鲁诺把马丁介绍给博尔赫斯，说：“这是亚历杭德拉的朋友。”博尔赫斯说：“好呀，好呀。”布鲁诺问博尔赫斯在写什么，博尔赫斯结结巴巴地说：“写点小东西。”一面露出介于犯罪和恶作剧之间的微笑。讥讽而又谦虚，表面自卑而骨子里骄傲，这是阿根廷人性格的表现之一。随后，他们又遇到了评论家门德斯。后者挖苦博尔赫斯是“寡头太太们的讲演家”。但是，这样的说法实在太简单化了。布鲁诺与马丁交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幻想文学会在阿根廷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并且产生了如此高质量的作品？会不会是因为阿根廷的现实太让人讨厌了，幻想文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办法？可是美国的现实也让人讨厌啊，为什么没有如此发达的幻想文学呢？马丁说有人认为博尔赫斯不像阿根廷人。布鲁诺肯定地说：博尔赫斯是地地道道的国货。就连他那套欧洲主义都是阿根廷式的。有的欧洲人并不是欧洲主义者，马丁进一步问道：博尔赫斯是伟大作家吗？布鲁诺沉思了片刻后，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博尔赫斯的散文是当今西语散文中出类拔萃的作品。如果用伟大作家来衡量，他的文笔过于雕琢了。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某个人物的生命处在千钧一发的时候，他只用一个副词就能让人感到慌乱不安。在博尔赫斯

优秀的作品中，有些东西非常有阿根廷味道，比如，离情别绪，淡淡的忧伤……”布鲁诺就阿根廷文学的特色又讲了自己的看法：最重要的在于有深刻的思想；对阿根廷精神的关注和思考。到了里纳尔迪尼家中，布鲁诺告诉神甫刚才他们看到了博尔赫斯。神甫也写过评论博尔赫斯作品的文章，因此也有兴趣谈一谈这个话题。神甫说，博尔赫斯的小说越来越让我难以忍受，不过有些诗歌很好，有些是胡说八道。布鲁诺说，有些题材的诗歌，比如回忆童年生活的，描写郊区和庭院的，追忆时光流失的诗歌让他非常感动。神甫不能容忍的是博尔赫斯那些讲究哲学的游戏，他说：“使我不能容忍的是他那些哲学游戏，确切地说是伪哲学游戏。他是个有才华的作家，但不是真正给人以启迪的作家。英国人说他是个矫揉造作的作家。”布鲁诺提醒神甫：“一家法国报纸却大谈博尔赫斯哲理的深刻性。”神甫立刻举出一系列博尔赫斯的作品，以证明博尔赫斯在哲学问题上的辩护是对社会表示不满：“犹大还在阿根廷逍遥自在，给财政部长当守护神。犹大从来没有想当统治者，可是在阿根廷犹大好像已经取得了政府里的一席之地了。不过，不管有没有政府，犹大一定要上绞架。”

马丁和亚历杭德拉又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马丁经常陷入乱七八糟的想法之中，但是无论想什么，他都离不开亚历杭德拉。一天下午，马丁在大街拐角吃惊地看到亚历杭德拉坐在一辆高级豪华汽车里，开车的人是他认识的博德纳韦。车上的人也看到了马丁。博德纳韦邀请马丁上车。他问马丁去哪里？马丁回答说：去河口。博德纳韦说：“那么我们先送您回去。”这个“先”字让马丁好一阵苦恼。但是，亚历杭德拉开口道：“我先下车。就在五月大街。”博

德纳韦听了以后露出惊讶的表情。下车时，姑娘犹豫了一下，然后告诉马丁：“次日下午6点钟在赛马俱乐部见面。”在去河口的路上两个男子谁也没有说话。马丁脑海里掀起了一阵苦恼的风浪：为什么亚历杭德拉会上了博德纳韦的汽车？为什么姑娘下车时博德纳韦会露出惊讶的神色？为什么姑娘拒绝马丁下车陪伴而行？多年后，就亚历杭德拉自焚身亡时，马丁还和布鲁诺一道分析过博德纳韦这个人物。随后，马丁走进一家咖啡馆。那里有个疯子（名字叫巴拉甘）在大谈世界末日的到来，周围的人在嘲笑他。马丁听了他那番基督拯救世人的话，又看到众人那醉生梦死的样子，深深为这个世界的麻木感到悲哀。第二天6点钟亚历杭德拉没有赴约。前来的是姑娘的女友万达，她告诉马丁：活计多得做不过来。“不过，她会给你打电话的。”马丁迈着沉重的脚步去看布鲁诺，希望这位聪明的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布鲁诺感慨地谈起人性中感情和理性的矛盾，个人和社会的矛盾，理想和失望的矛盾……但是无论什么矛盾，人类最可贵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寄托。星期二，马丁终于又看到了亚历杭德拉：眉头紧皱忧心忡忡。她说：“我病得很厉害。”她头痛，做噩梦，眼冒金星。两人简单说了几句，决定第二天下午见面。次日，俩人在河边相会了。马丁非常高兴，姑娘一脸的忧愁。有好大一阵功夫俩人没有开口。后来，他俩看着地上的蚂蚁闲聊起来。气氛显得平静而有些忧伤。接着，姑娘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送给马丁。小伙子激动起来，但同时又感到难过，仿佛这张照片具有两人要分手的意思。马丁说出了心头所想。姑娘没有吭声，而是专心致志地观察着蚂蚁的活动。马丁则琢磨着姑娘的心思。他看到姑娘身旁有封信，就想打听是谁写来的。姑娘猜出了他的想法，就主动说

是胡安·卡洛斯，内容是与丹麦女郎调情的话。亚历杭德拉不打算给他看信，便说“他说了你一些坏话”。马丁非要追问胡安怎么知道他俩的事情的。姑娘于是把信拿给他看。马丁接过信来，但是一想到这可能失去姑娘的信任，就把信还给对方了。亚历杭德拉停了片刻，突然说道：“我要和你分手了。你千万别以为咱们的事情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丁惊愕地看着她。姑娘继续说道：“有很多理由让咱们不能这样下去了。分手会对你更好。”马丁不知道说什么好，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无论姑娘怎么安慰马丁，他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亚历杭德拉走了。马丁不肯死心，决定跟踪。他发现那姑娘进了一家咖啡馆。原来那里有个男人在等她！他仔细一看，那男人很像亚历杭德拉。于是，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她，非要求见面不可，因为那男人可能就是费尔南多，是她一直爱着的人。马丁一看到亚历杭德拉出现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费尔南多是谁？姑娘听了这个名字立刻就明白了：马丁在跟踪她！于是，她怒不可遏地喊道：“笨蛋！笨蛋！那是我父亲！”说完就跑开了。马丁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此后的日子，马丁陷入了黑暗、孤独和苦闷之中。被亚历杭德拉抛弃之后，他感到自己落入了黑洞洞的虎口中。就在这时城里发生了骚乱，人们冲向教堂。有人开始放火，有人摘下圣像。可也有人保护圣像。教堂烧起了大火。混乱中响起了枪声。马丁看到了庇隆主义分子是怎样煽起动乱的。突然，他发现了亚历杭德拉向一座建筑物走去。他跟踪了一段路，发现她上了楼。他一直等到天亮方才惆怅地离去。

第三章题为《关于瞎子的报告》。这一章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对“瞎子帮派”进行调查的经过。“我”觉得“瞎子的世界”是个神秘的天地，于是决定从 1947 年 6 月

14 日开始调查。那一天，“我”跟踪了一个在火车上卖东西的瞎子。下了火车以后，那瞎子在街道上走得飞快。

“我”一不小心就把瞎子跟丢了。“我”没有料到瞎子就在前面埋伏着呢，刚一走到拐角处就被瞎子抓住了。瞎子严厉地质问“我”为什么跟踪。“我”无言以对，拼命地挣脱了瞎子的手，慌张地逃走了。此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勇气调查下去。这既出于恐惧，也考虑到谨慎，因为被瞎子抓住的事情肯定会引起他们“帮派”的注意，甚至对“我”进行监视。“我”等待了 3 年的时间，之后，又重新跟踪瞎子并且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内部。“我”发现先天的盲人与后天的盲人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们的内部还有个最秘密的堡垒，里面有鲜为人知的大头目在统治着“帮派”。但是，“我”没有能够打进去。“我”了解到“帮派”里有一些统治手段，如写匿名信，玩弄诡计，传播瘟疫，控制睡眠和贩卖毒品等等。“帮派”外面还有一个庞大的服务网络，其组成人员是：视力完好的巫婆、江湖郎中、邮递员、招魂巫师等。“帮派”掌握着生与死的权力，它通过“瘟疫或者革命、疾病或者拷打、欺骗或者虚伪的怜悯、捏造谎言或者写匿名信、教师或者宗教法庭来实施的。”通过调查，

“我”对传统神学提出了否定的想法。“我”设想了几种可能性：1. 上帝是不存在的。2. 上帝是存在的，但他是个流氓。3. 上帝是存在的，但有时沉睡不醒：他的噩梦就是我们的存在。4. 上帝是存在的，但他有神经病：他的神经错乱就是我们的生活。5. 上帝并不是无所不在的，他不可能存在于一切地方。有时候，哪里都看不到他。难道他在另外的世界上？或者在别的东西里？6. 上帝是个可怜虫，他面临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他无力对付这个问题：他同物质的

斗争犹如艺术家同自己作品的斗争一样。有时候，他也会取得西班牙大画家戈雅那样的成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是个非常笨拙的家伙。7. 上帝早在史前时期就被“黑暗王子”打败了。此后，他变成了魔鬼，声名狼藉，人们把这个多灾多难世界的存在归咎于他。“我”的结论一目了然：“黑暗王子”依旧在统治世界，这是通过“神圣的瞎子帮”来实行的。

进入到《关于瞎子的报告》的第5节时，“我”做了自我介绍：“我”名叫费尔南多·比达尔·奥尔莫斯，1911年6月24日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一个小镇上：奥尔莫斯上尉镇。“我”小时候是在噩梦中长大的，总是在梦境中跟另外一个“我”搏斗。如今“我”继续跟黑暗的“瞎子帮”斗争：探索这个黑暗的世界。“我”的态度是尊重事实，哪怕这些事实会给“我”的生命投下不愉快的亮光。

“我”的故事得先从一个西班牙熟人开始：他叫塞莱斯蒂诺·伊格莱西亚斯。他性格和善，但是主张无政府主义；他吃素，希望世界和平，但是秘密地制造伪钞。这个人让

“我”跟“瞎子帮”联系起来。这是不是偶然性呢？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观察。“我”从小时候起，琢磨瞎子就成了无法摆脱的念头：渴望有一天打入瞎子们的世界。即使没有塞莱斯蒂诺·伊格莱西亚斯，“我”也会想其他办法。但是这个西班牙人发生了意外事故：他工作的排字车间发生了爆炸，他一下子就双目失明了。“我”判断“瞎子帮”一定会设法吸收伊格莱西亚斯入伙。于是，“我”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监视这个西班牙人，看看“瞎子帮”是如何发展新成员的。我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对伊格莱西亚斯的住宅57号公寓大楼进行监视。一天，“我”在监视57号时，女教师诺尔

马·普格列塞来到“我”的眼前，“我”在与她谈话时有调戏的行为。谈话后，“我”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个流氓。一天，“我”发现有个瞎子来到 57 号门前，但是他并没有停留。“我”认为这个瞎子是来侦察的先遣人员。于是，“我”仔细注意出入 57 号公寓的人是否有可疑分子。这一天过去了，“我”没有任何发现。第二天一清早，“我”赶忙去找 57 号的女房东埃切帕博尔达夫人，准备仔细询问一番。女房东回答说：“那个可怜的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谁也不想见。”“我”又追问：没有人来打听过的情况吗？回答是否定的。“我”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夜访”：夜间直接去拜访伊格莱西亚斯。但是，“夜访”没有结果，因为这个西班牙排字工非常拘谨，不爱说话。第二天，“我”又来“夜访”，果真发现了一点令人不安的迹象。“我”在去排字工的房间之前，先去了女房东的宿舍。她说出一个新情况：电力公司今天来人检查家电设备、熨斗、暖气是不是有问题。“我”被她的话“震惊得犹如烈马发现可疑物时突然停住飞奔一样：前蹄腾空，昂首直立，双耳激烈地扇动。”

“我”之所以惊慌，是因为这个所谓的“电力公司职员”和一个矮子陪同很可能是来找伊格莱西亚斯联系加入“瞎子帮会”的“密使”。“我”进一步跟女房东攀谈，方才知道那两个人是给伊格莱西亚斯提供工作机会的。后者答应考虑一下以后再说。“我”直觉地感到：只要“我”盯住伊格莱西亚斯，肯定可以接触到“帮会”的秘密。次日，矮子陪着伊格莱西亚斯到大街上来了。“我”连忙跟踪在他们后面，尽管“我”知道这很危险。矮子和瞎子时而上车时而走路，好像要摆脱跟踪似的。最后，他们来到一座非常奇特的建筑物面前，进了大门，上楼去了。“我”最初在外面等候，但是

八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凌晨两点钟，矮子和伊格莱西亚斯方才走出来。“我”仔细一想：这座楼可能是“秘密”所在，便决定冒险上去。等那两人一走远，“我”就飞也似地冲进楼去。上去以后，“我”发现：门上挂着一把锁！原来那里无人居住！“我”手中没有工具，没办法开锁，便去找一个叫 F 的朋友。那朋友很不高兴，因为正在熟睡。“我”强拉硬拽 F，两人来到那座奇特的建筑物里。F 仅仅用了大约半分钟就把锁打开了，然后回家去了。“我”独自推门进去了。如“我”所料，屋子里漆黑一团，死一般地寂静。这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想矮子和瞎子没有必要在这里呆上十个小时。因为这里连把椅子都没有。显而易见的是：

“这所神秘的房子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我”还想：探索这个瞎子的世界“已经成为探索自己的阴暗世界”。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通向另外一个地方的门。

“我”摸来摸去，最后终于发现秘密通道的入口在地板上。果然，“我”发现有块地板是活动的。原来下面是个梯子。下了梯子以后，是一条暗道。走到尽头，有个小门。“我”转动了门把，门开了。“我”用随身携带的手电筒一照，

“一股冰冷的电流传遍了我的全身：灯光在我眼前照出了一张面孔。”“一个女瞎子站在我眼前。她像地狱的幽灵，一个从冰冷、黑暗的地狱里钻出来的幽灵。”“显然她早已在等候我了。”“我”被吓呆了，一下子昏厥过去。昏厥中，“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天亮后，“我”苏醒过来，看见那女瞎子仍然站在面前，便连忙辩解说：“我进来想偷点东西，但是一看见了您就晕倒了。”女瞎子露出一副嘲讽的表情，然后从一扇敞开的门走了出去。“我”听到了锁门的声音。“我落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圈套。”“我”回忆起

1946 年 6 月 14 日，原来“帮会”一直在设法对“我”进行报复。从这里，“我”联想起《地道》中的画家胡安·巴勃罗·卡斯特尔。“我”判断：“毋庸置疑卡斯特尔的犯罪是‘瞎子帮会’进行无情报复的结果。”但是，“帮会”是通过什么手段来报复的呢？那肯定是通过玛丽亚的丈夫阿连德进行的：“阿连德命令自己的妻子到美术馆去，卡斯特尔正在那里展出他最新的几幅作品。玛丽亚对其中一幅画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全神贯注地在画前站了很长时间，这给卡斯特尔提供了发现她和研究她的充分机会。然后，她便消失了。”

‘消失了’是一种说法。如同帮会历来的做法一样，跟踪者往往变成了被跟踪者，从而使得报复对象迟早落入他们手中。卡斯特尔又一次跟玛丽亚相会了，他发疯地爱上了她。从此，他像疯子和傻瓜一样地追踪她。实际上，这都是‘帮会’通过阿连德安排的诱饵。最后，卡斯特尔精神失常，杀死了玛丽亚，被关进了疯人院。”对于帮会来说，这是囚禁卡斯特尔最保险的地方，而且永远排除了澄清事实的危险。

“我”联想起自己几年来在国外东躲西藏的经历：“我从巴黎到罗马，再到埃及，又乘船到印度。好像命运总是先我一步等在前头。在孟买，我一下子走进了一家盲人妓院。我吓得如惊弓之鸟，从那里逃往了中国，又逃到了旧金山。我在一家公寓里安安静静地住了几个月，直到我认为不会再发生任何可疑的事情时，我才决定返回阿根廷。”可是“我”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出“帮会”的手掌：现在“我”被囚禁在这个小房间里等死了。正当“我”感到绝望的时候，门开了，那个女瞎子出现了。“我”扑过去把她推开，夺门而去。“我”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一个向下的梯子前。

“我”想这个梯子大概通向地铁，便匆忙跑下去了。很快，

“我”发现下面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下世界。“我想象着上边地面上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娇艳的摩登女郎、衣冠楚楚的大亨、教育学生不要在墙壁上乱画的老师；我想象着那洁白的衬衫、薄如蝉翼的晚礼服以及那些甜言蜜语的情话和歌功颂德的演说。可是在他们脚下，在这里，污秽、恶臭的浊流中，混杂着那些荡妇们的经血、妙龄女郎的大小便、达官贵人使用过的避孕套、家庭和饭店的残羹剩饭，总之，首都的垃圾。”“所有这一切都经过下水道流入大海，上面的人企图忘记或者装做不知道这地下也是他们现实的一部分。而像我这样的反英雄，似乎命中注定要承担讲述这部分现实的讨厌又可恶的差事。”“我”要证明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我”要调查这“污秽”的原因。“骤然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是一位反英雄，是倒霉而又令人讨厌的英雄，但也是英雄。”“我”是绝对孤独的，根本看不到前途和光明。“我感到自己既伟大又渺小。”“我”顽强地向前走，走出下水道之后，又钻进了一个洞穴。这时，一场巨大的火灾发生了。《关于瞎子的报告》最后说道：“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死亡正在等着我。”“我的狡猾、我对生的渴望，使我设想出成千上万次的逃跑，成千上万种摆脱命运的方式。可是，谁能够摆脱自己的命运呢？”《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知道她一定在等待着我。”

第四章题为《陌生的上帝》，讲述 1955 年 6 月 24 日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夜里，马丁难以入眠。他又看见亚历杭德拉朝他走来。朦胧中，他看到姑娘在大火中走来。她神色慌张，双臂前伸，嘴唇不停地蠕动着。马丁大声喊道：“亚历杭德拉！”随即醒了过来。此时是凌晨 3 点钟。他睡不着了。于是，起床，穿衣，下地。最后，他来到大街上，朝亚

历杭德拉的住处走去。马丁从远处看到那个方向有大火烧起来了，便加快了脚步。他跑到跟前一看，警察陆续抬出了亚历杭德拉和她父亲的尸体，随后又抬出了潘乔老爷爷来。马丁伤心极了，像个白痴一样在大街上游荡。马丁的朋友布鲁诺这时还没有得到大火的消息。后来一个名叫埃斯特的人打电话告诉了他。布鲁诺连忙上街，向亚历杭德拉家跑去。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弄明白。布鲁诺回到家中时，女房东告诉他：马丁来找过他。这让布鲁诺回忆起马丁曾经问过他关于亚历杭德拉的事情。布鲁诺知道两人在相爱。而马丁却没有想到布鲁诺也曾经爱过亚历杭德拉。大火之后过了一段时间，马丁找到布鲁诺，详细讲述了与那姑娘的关系和心中的痛苦。多年以后，马丁从南方来看布鲁诺，直截了当地问这位比他大 25 岁的朋友：“您也爱她，是不是？”布鲁诺只是耸耸肩膀，依旧沉默不语，因为他也有难言之隐。大火过后的第一个晚上，马丁好像变成了一个丧失记忆的人。当马丁站在布鲁诺面前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一切从何说起。亚历杭德拉已经死了，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但是，对亚历杭德拉的怀念使得马丁一定要把压抑的感情宣泄出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马丁试图解开心中的疑团，他面对布鲁诺问个没完没了。他认为布鲁诺有条件解开这些疑团，因为布鲁诺从童年起就认识亚历杭德拉的父母而且是终生的朋友。布鲁诺心里想：是的，他应该知道许多事情，可是有许多非常隐秘的“私情”，是不可能弄明白的。以马丁为例，大火之后的一天晚上，他找到布鲁诺，非常痛苦地说：“我不能确定我和她之间是一种什么感情。”布鲁诺沉思良久，说道：“我明白了。”可是仔细想一想：他明白了什么呢？布鲁诺回忆道：“我的确在费尔南多身边生活过：1923 年，我俩还都

是孩子，一起在奥尔莫斯镇生活过；1930年，我俩已经是小伙子了，我们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然后是这几年的来往，我感到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早已经变成了一个疯子，一个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人。有一天，我看见他像个梦游病患者一样漫步在街头。他好像没有看到我，或者是佯装没有看到我。那时，我和他已经有20年没有见面了。这对于正常人来说，我们应该有多少话要说啊！我猜测他那时正处于犯病时期：追踪狂想病。因为我们认识，他才故意避而不见。”布鲁诺知道费尔南多曾经避居国外多年，也听说了许多关于费尔南多的传言。布鲁诺也承认费尔南多的影响：“他的灵魂一直支配着我的灵魂，甚至在他死后也是如此。这些思想虽然没有创造他的生命，可也没有毁灭他的生命。我承认，他的思想有强大力量。然而，我一直都不喜欢他，虽然我常常羡慕他。我恨他，因为他朝三暮四，从不贯彻始终。他身上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让人喜欢又让人讨厌。当我这种优柔寡断的人进入他的势力范围时，就会受到震动，宛如小小罗盘进入风暴撼动的磁场一样。更为严重的是，他变化无常，时而极端狂热，时而万分沮丧。这仅仅是他无数自相矛盾的表现之一。他一会儿逻辑严密，说得头头是道，一会儿又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可是，他自己总是感觉良好。”布鲁诺进一步分析了费尔南多的疯癫状态：从堂·吉珂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疯癫状态里除了有一般疯子的特征之外，还有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某些属性。费尔南多虽然也疯疯癫癫，但是他身上也不乏阿根廷人的特征，比如，他言谈举止矛盾，其中主要原因是疯病所致，但也是某些阿根廷人性格的表现。布鲁诺承认：“我也以自己的方式爱过亚历杭德拉。后来，我才明白我真正爱的是她的母亲

赫奥希娜。但是，她拒绝了我的追求，把我推给了她的女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明白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又唤醒了我最初对赫奥希娜的激情。但是，为之晚矣。我自信对赫奥希娜的热恋可以持续到她死去，持续到有一天可以把她追到手。赫奥希娜如今还活在人间，亚历杭德拉以为母亲不在人世，其实她错了。亚历杭德拉有理由恨自己的母亲，也有许多理由认为母亲撒手而去了。但是，您不要胡思乱想，我首先要说明：赫奥希娜是个非常善良的女性，她不会伤害别人，更不会伤害自己的女儿。”但是，赫奥希娜离开了费尔南多和亚历杭德拉。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费尔南多和赫奥希娜是姨表兄妹，两人没有举行婚礼就同居了。不久，赫奥希娜发现自己怀了孕，由于羞愧难当，她就悄悄出走了。亚历杭德拉出生以后在母亲身边生活了 10 年，后来就跟外祖父母生活去了。费尔南多后来跟一位 16 岁的妙龄女郎结了婚，那姑娘美丽而且富有。她父亲是几家纺织厂的老板，为女儿结婚，他特别买了一座花园别墅送给新婚夫妇。但是，放荡不羁的费尔南多两年以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而且卖掉了花园别墅，最后抛弃了新婚的妻子。关于赫奥希娜，布鲁诺的回忆是这样的：1951 年，他在市中心看到了赫奥希娜，她已经结了婚。两人已经有 10 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很激动，可是她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我不得不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用力地摇晃着她，为的是让她认出我来。”“一丝微笑爬上了她那疲惫不堪的脸庞，仿佛漆黑、寂静的大厅里点燃了一支蜡烛，散发出一片柔和的光芒。”布鲁诺把她带到了一家咖啡馆，落座以后，布鲁诺把手放在她手上。俩人默默地相对而视。但是，布鲁诺终于忍耐不住，说了一句：“这么说，费尔南多结婚了。”说完，他就后悔了。两滴不

易觉察的眼泪从赫奥希娜面颊上流下来。她说：“我不许你对费尔南多说三道四！”布鲁诺把手抽了回来。两人又陷入了沉默中。片刻后，赫奥希娜说道：“我得走了。”布鲁诺心里明白：命中注定两人要天各一方。此后，布鲁诺获悉：费尔南多已经和年轻的妻子分道扬镳了。费尔南多的花园别墅早已经被拍卖了。他只好搬迁到一个简陋的小房子里去了。《关于瞎子的报告》就是在小房子里完成的。布鲁诺还得知：费尔南多曾经和一批抢劫银行的嫌疑人混在一起。但是，在警方通缉的名单里并没有费尔南多的名字。布鲁诺后来弄明白了原因：费尔南多在那个时期全力以赴地在搞盲人世界的调查。说起费尔南多对失明天地的兴趣，布鲁诺回忆起少年时费尔南多如何扎瞎一只麻雀的背景：小麻雀由于疼痛和恐惧发疯似地飞来撞去。此外，布鲁诺还回忆起 12 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他给费尔南多的母亲安娜画了一匹马，那是她的坐骑：枣红马。他画得很成功，安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就亲吻了布鲁诺一下。费尔南多看到以后愤怒之极，向布鲁诺扑过去，举手便打。安娜把俩人拉开了。费尔南多愤然离去。布鲁诺在小河边找到了他，试图同他和解。费尔南多一声不吭地听着，突然之间掏出一把折刀向布鲁诺刺去。布鲁诺奋力挣扎，夺下了折刀，扔到了远处。但是他没有想到，费尔南多拾回折刀，猛力向自己手上扎去，然后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从那以后，又过了 3 年，两人已经 15 岁了。布鲁诺利用休假日回奥尔莫斯小镇，因为他怀念童年时的生活，希望看到安娜，因为安娜身上有母亲的影子。就在布鲁诺围着老宅院转悠的时候，他看到了费尔南多。后者冷淡地接待了他。两人在宅院里走动时，布鲁诺看见一个长相奇特的少年：约摸 14 岁左右，脑袋又大又长，酷似一个

橄榄球，皮肤白洁得如同象牙，头发纤细发直，牙齿发黄，鼻子上翘，眼睛发红。这个模样让布鲁诺感到厌恶。那少年（名叫贝韦）拿起一根笛子吹了起来。费尔南多一言不发，在一堆书籍里翻来翻去，好像布鲁诺不在场似的。布鲁诺感到处境非常尴尬。这时，幸亏赫奥希娜出现了，才给布鲁诺解了围。赫奥希娜那时十四五岁，对贝韦和布鲁诺都很有礼貌，把他俩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让贝韦继续吹笛子。赫奥希娜坐下来绣花。布鲁诺给她讲述一部恐怖电影的内容。贝韦这时停止吹奏，望着他和她。赫奥希娜请贝韦把收集的塑像拿给布鲁诺看看。贝韦在展示塑像的过程中，突然咳嗽起来。赫奥希娜连忙拿来药水，强迫他喝下去。布鲁诺回想起来：这就是他第一次在赫奥希娜家里见到赫奥希娜的情景。以后，他又见到她两三次。给布鲁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赫奥希娜在费尔南多面前显得毫无自卫能力，三个人的关系让他感到奇怪。布鲁诺那时对他们了解得很少，只是朦胧中觉得费尔南多控制着一切。多年以后，到了 1930 年，布鲁诺才认识了那大宅院中的其他成员，才对那里发生的怪事有所了解。他们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日益贫困潦倒，却又不出去赚钱。这个家族与世隔绝，似乎就要消亡。布鲁诺自从见到赫奥希娜两三次以后，就总是渴望再单独看看那姑娘。有一天，他悄悄观察那座大宅院的动静，等待费尔南多出门上街的机会。机会果然被布鲁诺等来了。他急忙溜进宅院，他见到了那姑娘，他向姑娘打听家庭情况。赫奥希娜于是讲起父母、祖父潘乔和姨妈玛丽亚的情况来。布鲁诺问道：“那阁楼上住的是什么人？”姑娘不愿意回答。布鲁诺说：“我看到那上面住着人。”

姑娘不情愿地说：“那是埃斯科拉斯蒂卡。”布鲁诺想

起费尔南多说起过有个女疯子的故事，于是他问那姑娘：上面是不是住着那个女疯子？姑娘说她从来没有上去过。埃斯科拉斯蒂卡也从来没有下来过。她已经有 84 岁了，是潘乔爷爷的二婶，是韦多司令的女儿，1853 年上楼以后就再也没有下来过，因为她一直守护着司令的头颅。她父亲是被独裁者的打手杀害的。两人谈到这里的时候，费尔南多回来了。姑娘立刻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胆怯，动作笨拙，一声不吭。这时费尔南多躺在床上望着他的表妹和布鲁诺。突然，他提议做游戏：先让赫奥希娜把贝韦找来，姑娘不敢不去。贝韦来了。费尔南多命令布鲁诺担任找人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三个分别藏到黑暗的角落去。如果布鲁诺找到其中的两个人，那就算赢。布鲁诺很快就找到了贝韦，因为他傻乎乎地坐在床上。随后，布鲁诺就有些费劲了。但是，他很耐心，一个角落一个角落地摸索着。终于，他听到了有人在紧张地呼吸。他上去一摸，就发觉那是赫奥希娜，可他故意叫着费尔南多的名字；与此同时，双手愉快地抚摸着姑娘漂亮的面庞。姑娘紧张得忍受不住了，方才大喊了一句：“我是赫奥希娜！”费尔南多点亮蜡烛说：“你赢了。”可是，布鲁诺总觉得这是个陷阱。这时，费尔南多又宣布：明天晚上玩个更刺激的游戏。第二天晚上，他对布鲁诺说：如果你不是胆小鬼的话，那就爬到阁楼上去看看埃斯科拉斯蒂卡老太婆。你拿着手电筒进去，从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拿出一个帽盒来。赫奥希娜胆怯地插话道：“别拿头颅！”费尔南多蔑视地说：“就是要拿头颅！”布鲁诺不愿意被人看做胆小鬼，硬着头皮，拿着手电筒上楼去了。当他胆战心惊地推开楼门一看的时候，差一点吓昏过去：老太婆直立在床前，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布鲁诺怒目而视。小伙子吓得转身就跑，

一进费尔南多的房间就昏迷过去了。布鲁诺苏醒过来时发现费尔南多露出一副嘲弄的模样，而赫奥希娜只是在默默地哭泣。布鲁诺想：这真是一对奇怪的表兄妹。30年过去以后，布鲁诺还是对费尔南多和赫奥希娜之间的秘密不得而知。他仅仅感觉到这许多年来赫奥希娜一直在怜悯她的表兄。她常说：费尔南多很痛苦，心灵和肉体都很痛苦。到了1925年，赫奥希娜嚎啕大哭地告诉布鲁诺：“布鲁诺，看在上帝的面，你别来了！”直到1930年，布鲁诺才又看到了费尔南多。那时，布鲁诺也发生了信仰危机：他在重新思考生命、祖国、人类命运的意义。就在那一年，布鲁诺认识了卡洛斯。这个小伙子是工人的儿子，那时在拼命地阅读马克思、列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书籍；他经常与一群青年讨论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和危机，探索“社会革命”的出路。布鲁诺深受卡洛斯的影响，跟随他一道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后来两人又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卡洛斯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了。1930年卡洛斯在阿根廷时，是通过另外一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同志认识布鲁诺的。这位同志是犹太人，名叫马克斯，爱好下象棋。相近的看法又把马克斯和费尔南多联系在一起。马克斯忠诚、善良、热情待人的品格吸引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团结在一起，其中也包括费尔南多这样的怪人。费尔南多有个很坏的毛病：勾引漂亮女人，无论老少，到手后对她们实施性虐待。1928年周末的一个晚上，费尔南多和马克斯拉上了关系。那时，阿根廷无政府主义团体正在讨论“无政府主义与暴力”的问题。费尔南多嘲讽的言词和表情引起了马克斯的注意。散会后，马克斯拉着费尔南多同另外一位同志（名叫波德斯塔）一道离去。1930年，布鲁诺也认识了波德斯塔。于是一个小组就这样成立

了。最初，波德斯塔希望领导这个组织，但是后来还是费尔南多掌握了领导权。在他领导下，小组成员迅速增多，连卡洛斯那样有影响的人物也被拉进团体来了。但是，最终还是离开了这个团体，因为他看穿了费尔南多贪婪和自私的嘴脸。无政府主义组织筹集活动资金的办法有两种：打家劫舍和制造假钞票。这一组织的开支有一部分应该用在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身上。费尔南多常常不守信用，应该掏钱的时候没有掏钱，因此让一些同志失望。1930年元月布鲁诺再度看到费尔南多的经过是这样的：布鲁诺和马克斯看完一场电影后来到一家咖啡馆。布鲁诺看见费尔南多坐在马克斯平时喜欢坐的位置上。可是，费尔南多非常冷淡。此后，虽然两人见面不多，但是布鲁诺时时可以感觉到费尔南多在团体内的影响。实际上，布鲁诺没有参加任何打家劫舍的活动，马克斯也仅仅是做些无政府主义不同派别之间的联络工作。真正参加到费尔南多抢劫活动中的是卡洛斯，虽然两人追求的目标大相径庭。费尔南多抢劫了一家银行（1930年11月底）之后露出了真面目，卡洛斯与其分道扬镳，踏上了共产主义运动之路，因为他已经看到：“只有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是反对组织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的唯一有效力量。”1930年12月1日布鲁诺从报纸上得知费尔南多这个小组抢劫了银行。从此，他与卡洛斯就失去了联系。直到1934年，两人才又见面。至于再见到费尔南多，那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原因是抢劫案一发生，警察也搜查了布鲁诺居住的学生公寓。布鲁诺只好转移到其他地方。一个名叫奥尔特加的共产党员接待了布鲁诺。奥尔特加早晨去学校之前给布鲁诺留下一本列宁批评恐怖主义的理论著作。布鲁诺翻阅了一下，觉得列宁说的道理符合实际情况，但是

在感情上他仍然觉得无政府主义的战士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中午时分，布鲁诺去一家自助餐厅吃了午饭。他在吃饭时和走在大街上，都觉得人们是无忧无虑的。这让布鲁诺难以理解：自己关在屋里阅读革命书籍时感到世界随时都会爆发革命，可是一来到户外，又发觉天下是太平的了：职员上班，商人营业，甚至有人在广场上懒洋洋地晒太阳。布鲁诺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很不理解这个世界的规律和意义。他漫步街头，百无聊赖地胡思乱想，最后回到奥尔特加的小屋，感到更加孤独，感到人与人之间互相不理解。布鲁诺在苦闷中想到了写小说，他要把对亲人的思念写出来，其中特别想到了安娜和赫奥希娜，想到了她们心灵中的奥秘。

《关于英雄与坟墓》的最后四节讲述了亚历杭德拉和费尔南多被大火烧死之后，马丁离开首都到南方去的故事，其中又用另外的字体穿插介绍了拉瓦列将军的事迹。马丁为改变一下难过的心情，决定跟随一个跑长途的老司机去南方走走。拉瓦列将军历史上确有其人，全名叫胡安·加洛·拉瓦列（Juan Galo Lavalle, 1797 ~ 1841），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810年5月阿根廷发生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拉瓦列跟随圣马丁将军组织和领导的安第斯山军转战智利和秘鲁。后来返回阿根廷，1825 ~ 1828年拉瓦列参加了对巴西的战争，立下赫赫战功，被提升为将军，阿根廷内战爆发后，军队分为集权派和联邦派。拉瓦列将军站在集权派一边。1828年12月拉瓦列将军发动军事政变，罢免了多雷戈的省长职务，遭到联邦派领袖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及内地各省首领的反对。1829年拉瓦列将军的部队被罗萨斯及圣菲省省长洛佩斯的武装力量打败，被迫签订和约，下台，流亡到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1839年拉瓦列将军在

乌拉圭红党和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率领部队杀回阿根廷。1841 年 12 月被罗萨斯独裁政权支持的乌拉圭白党军队打败，拉瓦列将军随同残部向阿根廷西北省份胡胡伊城撤退，后来被暗算身亡。《关于英雄与坟墓》详细介绍了拉瓦列将军向胡胡伊撤退的悲壮场面。

埃内斯托·萨瓦托在《关于英雄与坟墓》中表现了对人类命运、社会矛盾、革命者的追求、资产阶级的醉生梦死、资本主义世界丑恶与危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关注。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很有特色：时间和空间是立体交叉的。第一、第二、第四章的主要人物是亚历杭德拉、费尔南多、马丁和布鲁诺。其中马丁和亚历杭德拉的爱情故事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但是，作品一开始的时间是 1955 年，而这些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是从 20 世纪初、即他们的童年开始的，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倒叙、回忆等形式，让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有机地交叉起来，使得读者产生扑朔迷离的感觉。作者为了表现事物的多元、多样、复杂的特征，还常常用多人称插叙和插议的手法。第三章《关于瞎子的报告》是费尔南多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对盲人世界的探险经过。作者一方面揭示了这个人物复杂多变的阴暗心理，另外也表明了这个人物对地下丑恶世界的恐惧和厌恶，继而又揭露出人性恶所产生的种种梦魇。

作品中各类人物都有象征意义是《关于英雄与坟墓》的又一艺术特征。马丁是天真、善良性格的象征。费尔南多象征着痛苦和残暴。亚历杭德拉则象征苦难和牺牲。布鲁诺总是躲避矛盾 企图置身于冲突之外 可又常常被牵连其中。

讲述历史事实和虚构各类故事、心理活动、梦境和梦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关于英雄与坟墓》的又一突出特

点。作品中的拉瓦列将军的历史、1930 年阿根廷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博尔赫斯作品的影响都有实在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而费尔南多的噩梦显然是作者的虚构。这二者的结合使得作品产生似真非真的艺术效果。事实与虚构相结合是为作者这样一种思想服务的：历史的后遗症总要在现实中所反映，以拉瓦列将军的事迹为例，他在战争中立过功，也杀过人，他的后裔亚历杭德拉就要偿还历史留下的债务，经受种种刺激和折磨。

善于心理分析是《关于英雄与坟墓》的又一特点。比如，马丁每次与亚历杭德拉交往之后都要把那姑娘的心理变化做一番分析。作者甚至把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地道》的人物画家卡斯特尔的心理变化作为参照系数，以便深入分析马丁心中的疑虑。

阿根廷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安德孙·因贝特在分析《关于英雄与坟墓》时说道：“萨瓦托是个聪明、有创意、经受过苦难的作家，他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用摇摆不定的灯光把阿根廷的现实置于惊心动魄的光明和黑暗之中。小说的情节猛然一看好像是‘流苏式’的：流苏之一是马丁和亚历杭德拉的爱情故事；流苏之二是《关于瞎子的报告》，流苏之三是拉瓦列将军的败退。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是个完整的统一体，因而它是阿根廷文学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原因恰恰在于萨瓦托总是处心积虑地要发掘人的内心世界。”（详见《西班牙美洲文学史》下卷第 292 页，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1979 年第六版第二次印刷）。

继《关于英雄与坟墓》之后，经过 13 年的酝酿，萨瓦托于 1974 年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地狱使者阿巴东》（Abaddon el exterminador），书名来自《圣经》中《新约全

书·启示录第九章》，即使徒约翰预言：世界末日审判之时，将有第五位天使吹号宣布：蝗虫将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上帝将派遣阿巴东来毁灭世界。这部作品的内容在许多方面与《关于英雄与坟墓》有联系，例如，布鲁诺再次出现在这部小说里。此外，为了纪念切·格瓦拉牺牲，作者怀着钦佩、敬仰和缅怀的心情，歌颂这位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的伟大英雄的丰功伟绩。当然，作品的主要情节是描写 1973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主显节（耶稣显灵日）的盛况，地点仍然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抨击的对象是阿根廷的黑恶势力。作者通过一系列“流苏式”的小故事的叙述，表达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看法和批评。作品出版后，文学评论界毁誉参半。

第十一章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小说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Juan Carlos Onetti, 1909 ~ 1994）是乌拉圭的重要作家。1909年7月1日出生在首都蒙得维的亚。从少年时起就酷爱文学，十三四岁就模仿挪威著名作家汉姆生（1859 ~ 1952）的作品进行小说创作。由于家贫，未能完成大学学业就开始独立谋生。先后担任过校对、编辑、路透社记者、该通讯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办事处主任。与此同时，他还协助出版乌拉圭的《前进》杂志和阿根廷的《请看与请读》杂志，并且一度担任《前进》编辑部的主任。1954年，经乌拉圭总统路易斯·巴特莱的推荐，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被任命为执政党机关刊物《行动报》社长。奥内蒂工作了三年便辞去了这一职务。1957年他开始担任蒙得维的亚图书馆馆长和国家喜剧艺术院艺术指导。1962年由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

就，被乌拉圭政府授予全国文学奖。同年，当选为乌拉圭作家协会主席。1975年乌拉圭发生军事政变，奥内蒂受到军方迫害，被迫流亡西班牙。1980年他获得西班牙政府颁发的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年5月29日在马德里病逝，终年84岁。

奥内蒂于1932年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39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井》（El pozo）问世；1941年和1943年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无主的土地》（Tierra de nadie）和《为了今天晚上》（Para esta noche）。这些作品大多描写“当代文明”给个人的思想和观念造成的诸多问题，例如，孤独、苦闷、彷徨的情绪，无论在题材的开掘和形式的运用上都为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同时构成了奥内蒂的第一个创作时期。1950年他发表了《短暂的生命》（La vida breve）。从这部长篇小说开始，一个具有大都会特色和省城特点、但是纯属虚构的港口城市出现了，它的名字叫圣达玛丽亚。此后，在《离别》（Los adioses, 1954）、《为了一座无名的坟墓》（Para una tumba sin nombre, 1959）、《不幸的面孔》（La cara de la desgracia, 1960）、《造船厂》（El astillero, 1961）、《像她那样悲伤》（Tan triste como ella, 1963）、《收尸人》（Juntacadaveres, 1965）、《死神与女孩》（La muerte y la niña, 1973）中，圣达玛丽亚都是重要人物活动的舞台。

《短暂的生命》如同福克纳的《萨托里斯》一样，也是一部“站在门槛上”的书，从它可以看出奥内蒂日后重要作品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如同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圣达玛丽亚也集中了许多人物：医生迪亚斯·葛雷依，骗子拉尔森，商人贝德鲁斯，集画家、警官、医生于一身的

梅迪纳等人，他们在几部作品中反复出现。每部小说之间的故事情节都有一些联系，但每个故事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圣达玛丽亚系列”的组成部分。福克纳的确给奥内蒂的创作很多启发，但直接影响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却是阿根廷著名作家罗伯特·阿尔特（Roberto Arlt, 1900~1942）。奥内蒂说：“惟一让我感到有才华的作家是阿尔特，他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这座他出生的城市，是他为我指引了创作方向。”阿尔特从小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和郊区的普通百姓中间，因此十分熟悉底层群众的苦难。阿尔特笔下的人物多是歹徒、乞丐、疯子和妓女，他通过这些人物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奥内蒂从阿尔特的长篇小说《疯狂的玩偶》（1926）和《七个疯子》（1929）中看到，绝望的人们是怎样生活在欺骗、虚伪、孤独、彷徨、尔虞我诈、情绪躁动之中的。奥内蒂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如此，蒙得维的亚也不例外。于是，他萌发了虚构一座城市的念头，旨在让绝望的人们充分地去表演。在小说的艺术技巧方面，奥内蒂更多地吸取了美国作家多斯·帕索斯在《曼哈顿中转站》（1925）中的手法，即“群像小说”的写法：作品中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中心人物，而是一群人活动在并列、重叠、乃至颠倒的时间和空间里。概括起来说，奥内蒂吸收了阿尔特对都市生活的看法，采纳了福克纳对小说背景的舞台设计，运用了多斯·帕索斯刻画“群像”的技法，尤其是选取了蒙得维的亚的原始素材，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艺术风格。他的这一风格在《短暂的生命》中初见端倪。虚构的圣达玛丽亚在这部小说中首次出现。它坐落在一条河流和外来移民的聚集地的中间。主人公之一是个小职员，名叫布拉森，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终日梦想成为文学博士，以便摆脱贫困的生活，故事

开始时，他正在完成友人胡利奥·斯德因交办的任务：编写电影剧本。他生活得很单调，除去上班和写作之外，很少与外界接触。他认为，生活是“一种苦笑”，现实是“荒谬”的，因此不愿意与外界交流。他的心理世界与外部社会生活是冲突的，但是他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因此现实和他的想象混合在一起，真真假假很难分辨。究其根本，还是社会上假冒伪劣的人和事太多，他很难相信这个社会是不是都有真诚。布拉森这群反英雄的出现给拉丁美洲小说带来了“新生面”，因此西班牙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拉丁美洲文学史》教材是这样评论《短暂的生命》的：“毫无疑问，《短暂的生命》是 20 世纪美洲小说的奠基之作，因为所有的评论家和新一代作家，如巴尔加斯·略萨，都一致肯定：这部作品确立了拉丁美洲小说新时期的开端，特别是在这样的文学观念上：文学是创造语言世界的活动。这一观念曾经指导过智利诗人聂鲁达和秘鲁大作家塞萨尔·巴列霍的诗歌创作，但是，小说方面并无先例。因此可以说，奥内蒂的这部作品具有重大意义，它开创了拉丁美洲小说的新时期。”但是，综观奥内蒂一生的创作，评论界认为最能代表他小说艺术成就的作品还是 1961 年完成的《造船厂》和 1979 年问世的《请听清风倾诉》。

第一节 《造船厂》

《造船厂》是圣达玛丽亚系列小说之一。作品以拉尔森重返圣达玛丽亚为开始。五年以前拉尔森因为非法为孕妇堕胎而被捕入狱并流放他乡。五年后，拉尔森刑满释放，重回

故里。“许多人都口气肯定地说，他们在那深秋的中午看到过拉尔森。一些人特别强调拉尔森那卷土重来的神情，强调他那近乎漫画式的夸张姿态，说他企图以此重演五年前那副懒散、玩世不恭和傲慢的言谈举止；另外一些人则提醒说，拉尔森是在极力让人们认出他来，因为他有两个手指总是蠢蠢欲动，随时准备与人打招呼时便举到帽沿，随时准备迎接因为重逢而表示惊异的目光。”拉尔森是准备“东山再起”的。但是，从哪里下手呢？这时命运做了安排：“原来他纯粹为了满足报复心理，故意在他仇恨的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可是命运却把他带到了那座饰有大理石雕像和滴漏龙头的杂草丛生的大房子跟前，带到了造船厂乱如麻团的电缆堆跟前。”大房子的主人是造船厂的老板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还有他的傻女儿安赫莉卡·伊内丝。在女仆何塞菲娜帮助下，拉尔森迈进了大宅院，第一次与安赫莉卡·伊内丝约会。其实，在这次约会之前，拉尔森在一家商场里就发现了“目标”：何塞菲娜陪伴着傻姑娘购物。从那以后，他就设法接近何塞菲娜，多次甜言蜜语地套近乎，因此他在第一次约会时这样对安赫莉卡说道：“您在商场里一露面，我就注意到了您。从那时起，我就渴望见到您，同您说说话。我不是本地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如果见不到您，我就不想离开。现在，我如愿以偿了。”接下来就是拉尔森与赫雷米亚斯·佩特鲁斯的见面了。会晤是在造船厂进行的。老板给拉尔森介绍说：“这是加尔维斯；那位是孔茨。一位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一位负责技术业务。”两人都露出讥消和敌视的神情。拉尔森看着这两个人的表情，知道遇到了对手，心里想：“抵抗和回击仇视可以是人生的一种意义，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享受。”他已经看出了

这个造船厂的破败。可是，这时他却听到老板说道：“股东们的利益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必须坚持到履行法律手续的那一天。要继续工作，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船厂可能跟它的船一起沉没。但是，我们，先生们，我们不会沉没。我们的船倾斜了，随波漂移，但还不是遇难。让我们明天一准结束盘点核查。拉尔森先生，帮帮忙！”随后，老板领着拉尔森走进一间布满灰尘的办公室。佩特鲁斯挂上帽子，请拉尔森坐下。然后，郑重其事地告诉拉尔森：公司还有三千万资产，还不包括可以抢救出来的物质，比如，废铁，楼房，机器零件等等。老板说，他已经筹备了必需的资金。现在的工作就是选好人才。他说，他是优秀人才的鉴赏家。他委派给拉尔森的职务是佩特鲁斯股份公司总经理。至于俸金嘛，拉尔森可以提出来。后者说，等他考虑一下再做决定。第二天中午，拉尔森在商场餐厅里看到了加尔维斯和孔茨。二人调侃地问拉尔森准备拿多少工资。拉尔森回答说：五千比索。负责财务的加尔维斯说：“您满可以要六千。”拉尔森还是坚持要五千。加尔维斯说：“既然您坚持，那就五千吧。对我来说都是一回事，写五千或者六千都费同样的手续。不过，据说，这里什么都包不住，您好像快当姑爷了。如果这是真的，那我祝贺您。一个满不错的姑娘和三千万比索。当然啦，不是现金，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但是谁也不敢跟我争辩说总资产不是这个数目。”拉尔森听了以后，一下子堕入五里云中，但是很快就觉察出有不对劲的地方。于是，他说，这是私人的事情，也还没有决定呢。

“对您二位来说，请别见怪，只应当知道我是总经理就够了。从明天起，我将认认真真工作。明天上午八点钟，我在办公室恭候二位。咱们把事情重新安排安排。”那两位当即

顶了回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九点以前到过办公室。”孔茨最后又加了一句：“您要的薪水太少了。实际上，少得可怜。”实际上，无论总经理还是财务、技术主管，都领不到工资。但是拉尔森“青春焕发，信心十足，梦想着未来，梦想建设更幸福的明天。幻想并实现幻想，他绝不会丧失信心”。尤其是他在追求大老板的傻女儿安赫莉卡·伊内丝，几次约会之后，二人准备结婚。与此同时，安赫莉卡的父亲、船厂的大老板佩特鲁斯利用公司的空招牌，伪造股票，四处行骗。拉尔森渐渐地察觉了骗局，但是他有他的打算，特别是他发现了加尔维斯和孔茨每个月都要变卖仓库的东西，用来维持生活的时候，他的计划就更明确了。拉尔森的野心是：重整旗鼓，把船厂化为己有，他对管理财务的加尔维斯说：“咱们快熬到头了！我授权告诉您：再过几天，咱们就能重新开工了。咱们不仅可以得到法律方面的许可，而且还将获得必要的资金，可以拿到千百万比索。也许有必要改一改公司的名字，在佩特鲁斯的名字后面再加上某人的名字，或者用谁的名字来代替佩特鲁斯名字，我没有必要对您谈欠付的薪水了，因为新的董事会将承认欠付的薪水并且补发。不论佩特鲁斯还是我，都不同意其他解决办法。这样，您就可以结账了。您用补发的薪水可以添置一些东西，过上应该过的体面生活。还有，公司还要为职工建造住宅。我很快会拿来图纸给您看。我说的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佩特鲁斯的保证。”实际上，他什么保证也没有得到。他是恶习难改，旧病复发：重操诈骗的勾当。他心里明白：呆在加尔维斯这个又脏又冷的窝棚里，他一口一口地喝着酒，不让自己喝醉。尽管他假模假样地扮演着总经理的角色，可是面临的只有寒冷的冬天、衰老的身体、无路可走的现实，以及呜

呼哀哉的可能性。“但是，他还要奋力挣扎，在码头的酒馆里，囊中羞涩的他，脸皮却很厚，居然向老板借五十比索。后来，他见到了行医的老朋友迪亚斯·格雷伊。后者把佩特鲁斯公司的真实情况给拉尔森讲了一遍。拉尔森心中更加有数了，他坦率地对迪亚斯医生说：“您认识佩特鲁斯的女儿吗？就是安赫莉卡·伊内丝。我俩订婚了。”迪亚斯的反应是：“他欲笑而不能，心里反复玩味着：这次跟拉尔森见面真是一场梦，也许是什么人导演的一场喜剧，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高兴几个钟头了。”接着，拉尔森道出了来访的目的：今年已经五十岁的他，如果跟这样一个傻姑娘结婚，那就有一个生育儿女的问题，这会不会对她有害呢？医生回答说：她母亲的死跟痴呆有关系，她父亲是在装疯卖傻，为的是不真的变疯。因此，医生建议：不要跟她生孩子，只能勉强过日子。几天后，拉尔森找到了佩特鲁斯下榻的旅馆。老板一见到拉尔森就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我们到了成功的边缘了。我得到一位部长的许诺。”拉尔森苦笑了一下，心里想着船厂里的那一堆堆废铁，加尔维斯夫妇那经受凄风苦雨的窝棚，孔茨那调侃和讽刺的表情。可是，他却口气坚定地撒谎说：“先生，一点困难也没有。我可以向您保证：一切都运转正常。”老板笑了笑说：他期待的就是这个，当领导的嘛，就是要“知人善用”。拉尔森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随后回答说：“我总是这么想，当我负责造船厂的问题和监督职工的工效的时候，我是在后方作战。而您是在……”老板接过话来说：“火线上。先生，正是这样。我的风险更大，也更光荣。不过，如果您后方失利的话……”拉尔森也接过话来说：“我一定要保障有力！”谈话的双方为了让对方放心，都在尽量说假话。但是，摆在眼前的矛盾是无法回避

的：如果佩特鲁斯的假股票被加尔维斯公布于众的话，那造船厂的骗局就会被拆穿。佩特鲁斯有气无力地解释说，在那次伪造股票的冒险之初，就有一张股票被偷走了。如果这张假股票被交到法院去，那会是个大麻烦。他要求拉尔森后方不能着火，一定设法不让假股票送到法院。只要事情能够成功，可以使用任何手段。佩特鲁斯闭上了眼睛，示意拉尔森可以走了。这时，大老板心里在想：其实假股票交不交到法院他都无所谓，他现在是以赌博为乐，赌博可以赚钱。拉尔森这时的心理活动也很复杂：“他因为一度嫉妒而愤怒，因为隐约的敬佩而觉得惭愧。”望着佩特鲁斯的睡态，他又想：“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了。他要我干掉加尔维斯，干掉他怀孕的妻子，他自己也知道这毫无用处。我走了，假如他睁开眼睛看看我的话，我就吐他一脸唾沫。”但他还是得冒着寒风和小雨去解决假股票问题。路过酒吧的时候，他进去要了一杯甘蔗酒。于是，他看到了一群失业工人。有个工人的话让他震动：“谁知道上面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公司开张他们赚钱，公司关门他们也赚钱，反正倒霉的是咱们工人！”工人说真话。可是贫穷会逼得那些妓女装出一张笑脸来。那个工人告诉拉尔森：这种女人很讲义气，够朋友。拉尔森告别了那个工人，登上一艘开往船厂方向的渔轮。第二天一清早，他走进船厂，远远就看到加尔维斯和孔茨正在跟两个汉子商量什么，他们身边是一辆载货卡车。他听到他们在为一台钻机讨价还价。拉尔森从来不参加这种盗窃活动，但是卖的钱，他要分三分之一，因为他要的是工资。拉尔森走进总经理办公室，然后把已经完成交易的两位部门经理召集起来开会。他首先介绍了与大老板见面的经过，宣告：法院已经解除了对船厂的干涉，大功即将告成。他故弄玄虚，装得热

情洋溢，可是他看出来了：那两位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因此也不好再说假股票的事情了。中午时分，他偷了一个安培计，因为饭馆里有个朋友对安培计感兴趣，结果安培计卖了四百比索，他留下二百比索给饭馆老板，偿还了赊账。下午回到办公室，拉尔森正在看一份前任总经理关于变卖船厂的报告，孔茨敲敲门，进来说：“请原谅，有位小姐想见您。我和加尔维斯都拦不住她。是不是让她进来？”孔茨的话音未落，门已经被推开了，安赫莉卡·伊内丝已经进来了。至于二人见面的真实情况，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故事里的这一段是出于对一个幽灵的忠诚而写的，没有证据说明它是真实的，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都表明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孔茨肯定地说，他看见了，听见了。好几个月以后，女佣只是承认说，“小姐有些不舒服”。再说，孔茨关好总经理的办公室的门之后就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去了。留下姑娘和拉尔森单独在屋里。孔茨向加尔维斯挤挤眼睛，然后就看他的集邮簿去了。加尔维斯双肘压在两本没有打开的账簿上面，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窟窿。二人后来说，他俩还没有干多少事情，总经理办公室里就乱开了。先是拉尔森的声音，接着是姑娘的喊声。拉尔森痛苦地在为自己辩解什么。他的语调低沉，显然是在说服对方，那口气仿佛不是对姑娘一人讲话。不难想象，他一定是站着，五个指尖支在写字台上，显出痛心疾首的样子，表现出无比的宽容大度。随后，是一片寂静。接下来就来了一阵姑娘的喊叫声。这时，只听得拉尔森不停地重复：“我冲着上帝起誓。”孔茨听见姑娘喊叫着：“别碰我！”孔茨认为，这二人的矛盾一定牵涉到“桃色”事件。其实是拉尔森在向加尔维斯的女人套近乎，目的是把那张假股票弄到手。拉尔森是这样对那女人说的：“太太，您知

道，我不能跟加尔维斯要那张股票。他那个人听不进道理。有可能随便哪一天，他心血来潮就把股票交给法院了。那就太危险了。佩特鲁斯老板就会被捕。至于股东委员会嘛，那是一群乌合之众。”拉尔森长篇大论地说明如果假股票一交到法院里可能带来的危险：股东委员会来人清查仓库，加尔维斯就不能再卖设备了。她和她丈夫就没了生活来源，而且她还怀着孩子呢，孩子出生以后可怎么活啊，孩子可是无辜的啊！那女人把她丈夫与佩特鲁斯的关系说了出来：他不会用这张假股票把老板关进大牢的，“他保存股票不是为了报复佩特鲁斯，仅仅为了相信，有朝一日，他愿意的时候，可以进行报复，只是为了觉得自己有力量报复，可以比佩特鲁斯更卑鄙。”那女人告诉拉尔森：佩特鲁斯曾经花言巧语地挽留她丈夫继续在船厂工作，可是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她丈夫，因此那张股票就是证据，保留股票就保留了算账的希望。如果丢了这张股票加尔维斯会变得非常孤独。她说：“实际上，他不爱我。他爱那张绿色的道林纸，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它放在心口上。我不是说他真爱那张纸，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更需要它，而不是我。我不会吃一张道林纸的醋，也不会因为他为报复而另有所爱而吃醋。”几天后，加尔维斯太太告诉拉尔森：她丈夫出走了。拉尔森赶忙四处调查，发现加尔维斯暂时没有去法院告状，但是下落不明。一个星期四，有人送来一封信，是写给总经理拉尔森的。拉尔森看了之后递给孔茨。写信的人原来是加尔维斯，信上说：他已经辞去了部门经理。他亲眼看到大老板佩特鲁斯已经被警察逮捕了。他听说圣达玛丽亚城市的人们不喜欢拉尔森这个人。拉尔森看了信以后大为震怒，连连骂道：“这个婊子养的！”他觉得应该立刻采取行动，但是他知道行动也会带

来危险，而他习惯于用假装来支撑自己：他挑战式地一笑，随后露出虔诚的表情。他脱掉大衣和外套，对着破旧的垫席欣赏了片刻，接着，把左轮手枪放在办公桌上，退出子弹。他坐下来，一面冥思苦索，一面装作顽强工作的样子：卸下击发装置，反复擦拭。到了下午六点钟的时候，他装好弹仓，把手枪插入腰间。他穿好衣裳，按了一下电铃，把孔茨叫了进来。拉尔森说：“应该马上把那些俄国买主叫来，告诉他们我们愿意出售。应该让他们明白：我们不会讨价还价的。不过，必须今天就来，几点钟都可以，清楚嘛？我亲自接待他们。”孔茨回答说：“我可以叫他们来，可是今天恐怕很困难了。明天早晨吧！”拉尔森急不可耐地说：“马上叫他们来！我希望您也在场。我们要卖东西。只要弄到去圣达玛丽亚市的旅费就行了。一定要找到加尔维斯那个狗娘养的。另外，还要给佩特鲁斯找个好律师。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请您陪我一道去，也许厂里有必要留一个人。”孔茨摇摇头，他现在与世无争什么神仙和皇帝都不感兴趣。他同人世间的惟一联系就是他正在研究的钻孔机。拉尔森的算盘是尽快地结束这一切。他坚持今天晚上请俄国商人来洽谈。孔茨请来了俄国人。拉尔森卖掉了一件东西，换回来一千比索。有了钱，拉尔森又去圣达玛丽亚市了。实际上，他去找加尔维斯只是一个借口，因此到了那里以后，随便打听了一下也就罢手了。第二天，他要去监狱探视佩特鲁斯。进了牢房，他一看到佩特鲁斯那副苍老、消瘦的模样，心里想：“他被逮捕了。一切全完了。这个花白的骷髅用他那每道皱纹告诉我：他再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自欺欺人了；他再也不能依靠谎言混日子了；再也不能故弄玄虚到处吹牛了。”但是，拉尔森没有料到大老板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几天来，我

就盼望着您的来访。我不相信你会开小差。我认为，一切都没变。实际上，我现在只是暂时被隔离。我是在休息。临时把我关押起来，这是我的敌人可以使出的最后一招，是他们能够给我的最大打击。我在这间不舒服的办公室里再呆上几天，这阵风也就刮过去了。眼下，我不能耽误时间，这里的人可以帮助我拦住那些浪费我宝贵时间的人。因此，我就可以从容解决我的问题了。现在我可以告诉您：我已经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了，那些难题再也挡不住企业的发展了。”拉尔森善于见风使舵，立刻顺着他的意思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消息。我回造船厂把这个消息转告大家，同事们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的。当然，这要征得您的同意了。”接着，谈话双方展开了一番互相摸底的较量：大老板想知道拉尔森是不是办事不力，或者是不是跟敌人同流合污了；与此同时，他用一句“我可以证明我根本不知道假股票的存在”就把自己洗清了。拉尔森则打算从老家伙手里捞到一些好处。于是他趁机提出：“我认为等到时来运转的时候应该给报酬。”老板说这个问题应该去找加尔维斯。拉尔森这时方才告诉老板：正是加尔维斯把假股票的事情告到了法院，而且几天前写信向总经理提出了辞呈。说到最后，拉尔森掏出手枪道：“我本来想用这个家伙把他辞退的，可是他没有露面。”老板不赞成用手枪解决问题，他说，辞退他就是了，另外找人吧。他嘱咐拉尔森说：“一定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造船厂都要办下去。”拉尔森要求老板签署个文件，订个合同，明确职务和报酬。佩特鲁斯非常痛快，立刻掏出公文包，起草了一份临时合同：任命拉尔森为造船厂总经理，任期五年，工资每月六千比索。拉尔森出了牢房，来到大街。他想应该设法找到加尔维斯。于是，他想到了警

察局里还有个熟人名叫麦迪纳。于是，他试着打了一个电话。麦迪纳如今当上了副局长。他马上邀请拉尔森过来一叙。见面之后，拉尔森说明了来意：请警察局帮助寻找加尔维斯。麦迪纳拉着拉尔森到了停尸房，让他辨认一具死尸。拉尔森一看，竟然是加尔维斯。副局长告诉他：加尔维斯是乘木筏跳水而死的。拉尔森伤感地回到了下榻的旅馆。伙计告诉他有一封信。原来是安赫莉卡·伊内丝三天前写的，邀请他去吃晚饭。拉尔森赶到傻姑娘的住宅。女仆告诉他：小姐病了。他说：一定要看看小姐，哪怕几分钟也行。这个名叫何塞菲娜的女仆一直钟情于拉尔森，这时便坚持要他去自己的房间谈谈。结果，拉尔森就与女仆何塞菲娜共度了良宵。天亮以后，拉尔森告别了何塞菲娜，向造船厂走去，一路上想着同何塞菲娜做爱的意义：“是为了回顾往事，为了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灵魂，是自我解嘲与安慰，是一种障眼法。”走到造船厂，他向办公楼看了一眼，仿佛在行使自己的职权。然后，他绕着加尔维斯住过的窝棚走了一圈，接着在一个木箱上坐下来，点燃一支香烟，一面感到深深的孤独，这是他在几年前就料到的。随后，他听到窝棚里有女人呻吟的声音，连忙起身去看。他看见那女人半裸着躺在床上，由于流血不止而在用手指紧紧抓住脑袋疯狂而有节奏地晃动着。他看见了那令人惊讶的圆肚皮，看清了那双眼睛的锐利目光以及咬紧牙关的表情。由于恐惧和厌恶，他浑身发抖，急忙离开窗口，快步向河岸走去。几分钟后，他来到木材码头，眼睛里含着泪水，呼吸着周围植物木材和烂泥塘的气味。天大亮以后，几个水手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他弄明白了驳船是向北方开去的，于是便向水手提出用他的手表抵押成船票。他们痛快地接受了。拉尔森上了船，在尾部找了个

位置坐下，裹着大衣，不久便进入了梦乡。一个星期以后，有人发现拉尔森因为肺炎而死在罗萨里奥城的一家医院里，全书到此结束。

《造船厂》突出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作者善于营造社会氛围和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奥内蒂解释说：“那种社会环境如同雨天有人送来一件湿漉漉的大衣，他非要我穿上不可。而人们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社会环境。我在写作的时候，是被关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我的心境常常如此。我经常处在完全沮丧的心情里，有一种死亡而不是活着的感觉。也许有一个好的社会制度可能治好我的疾病。”奥内蒂对那个腐朽的社会是完全绝望了。读者从《造船厂》可以看到那里充满了孤独、苦闷、绝望和凄凉的情绪。深刻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使得《造船厂》在 1975 年荣获意大利最佳外国文学奖。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英、法、意、俄、德、中文出版。

第二节 《请听清风倾诉》

《请听清风倾诉》出版于 1979 年，也属于圣达玛丽亚系列小说。全书有四十一章，分为上、下两部分。主人公是第一人称“我”，实际上就是在《造船厂》出现的警察局副局长麦迪纳。小说一开始，“我”的身份是“夜间看护”，是在看护一位病情垂危的老将军，并且负责夜间给老人注射。空闲的时候，“我”就回忆往事：如何在当医生时出了医疗事故；年轻时的错误；学习绘画时的情景等等，其中还穿插描写了老人的女儿苏萨娜和女婿贝莱斯上尉与“我”的一系列谈话，如关于战争、政治、信仰等问题。“我”对信

仰的看法是：“有信仰的人比饥饿的野兽更危险。信仰让他们采取行动，信仰让他们颠倒黑白，信仰让他们做尽坏事。如果跟有信仰的人谈话，他总是说他们是对的，否则难以相安无事。信仰可以在微不足道和主观臆断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我”迫于生计当了“夜间看护”，其实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不久，老人就去世了。“我”不得不另谋出路了。第二章讲述“我”同过去的情人来往的故事。这位情人名叫玛丽娅·塞瓦纳，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胡利安。与玛丽娅交往的男人很多，所以说不清胡利安的生父是谁，只是朦胧地感觉应该是麦迪纳。胡利安已经长大成人，喜欢绘画，他和麦迪纳的关系不好。玛丽娅对他二十年前的表现也不满意：

“二十年前，如果你表现得像个男子汉，那今天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在二十年前没有跟玛丽娅结婚，胡利安出生后，也没有从法律上承认这个儿子。因此，玛丽娅一直不肯原谅“我”。第三章讲述“我”在女友弗雷依达帮助下找到了一项喜欢的工作：在画室里给人画像。女友告诉“我”：

“你的购货卡可以在商店里购买画布、颜料和画笔。我有个朋友叫做奥尔卡，她急着需要一幅画像。我会邀请更多的朋友到你那里去的。”第四章的字数只有六行，题目是《特雷莎的一瓶香水》，全文如下：“如今她像是手帕中早已经挥发的香水一样淡雅、惆怅和遥远。有时，她来这里，但从来不事先通知。通常，她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看见特雷莎的面孔或者走路的样子。她出现在某个变幻莫测的地方，某个使我迷惑的建筑物里，她从来不说一句话，从来不直视我的眼睛。我在寂静和彩色的梦境里看到特雷莎走过去。有时我举起一只手试图触摸她可能留给我的信息。但在彻夜不眠中，我在怀念她的时候，总有一股丝毫不变或者难以消除的蛮横

情绪，使得我心中充满了仇恨和傲慢。”第五章讲述“我”给奥尔卡画裸体像的经过。奥尔卡从前有个情人名叫罗亚。“我”曾经卖给他两幅画。奥尔卡请“我”画一张裸体像，准备送给罗亚，因为罗亚已经订婚。她这时每天都来做裸体模特儿，不断地催促“我”加快绘画的速度。“我”并不愿意画裸体像，但是奥尔卡非常执著，她不仅脱光衣裳让“我”来画，而且常常与“我”做爱、喝酒、聊天……天长日久，二人就有了感情，“我”笔下的画像也越来越像奥尔卡了。有一天，画像终于完成了，“我”给画上的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古丽莎”。在罗亚结婚那一天，画像送到了新娘家中，并且附上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应该把过去与未来进行比较。”第六章讲述“我”在药房工作时看中了一个姑娘。同事告诉“我”：那是一个妓女，名叫维克托丽娅。这个姑娘总是唤起“我”在圣达玛丽亚当警察时的某种回忆：另外一个“我”爱过的姑娘。于是，“我”找到了维克托丽娅，二人做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说想起了你或者说你像谁。我是说，你可能像你母亲或者你姐姐，总之像一个人，像我曾经在遥远的圣达玛丽亚认识过的一个女人。”妓女感到一片茫然。“我”慢慢穿上衣裳，给了她应该给的钱和后来加上去的钱。“我”没有达到目的，感到房间里的空气充满了凝重和仇恨，这气氛排斥着“我”，不允许“我”诉说痛苦，“我”只好心情压抑地走了出去。第七章题为《一条线索》，讲述“我”通过女友弗雷依达和好友金德罗被介绍到一家广告社工作的情形。“我”称之为“地狱里的画师”，为改变现状，“我”委托金德罗另外找别的工作。有一天，金德罗打来电话说：“您的事情似乎有点线索了。但是还不能完全肯定。甚至连确切的地址我也不能告

诉您。有一对夫妻，都是老人了，他们在公墓旁边有家商店，出售花草和修理吉他。”“我”感谢朋友的帮助，但是并不相信他的介绍。“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我”是地狱中某一层里的画师，这种生活是朋友们替“我”安排的。第八章讲述“我”和两个女人——弗雷伊达和伊曼尔——如何度过了新年之夜的：“我”给弗雷伊达准备了过年的礼物，但是“我”看到的是弗雷伊达和伊曼尔的打闹，原来这是一对同性恋人。弗雷伊达因为吃醋挨了伊曼尔一顿臭揍。第九章题为《胡安尼娜》，“我”时常去看弗雷伊达，在她那里吃饭、睡觉和散步。有一次，“我”一人出来走走，一路上想着绘画的事情。突然，“我”明白了自己可以画好想要画的东西。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远处有个“蜷缩着的小小身影”。“我”原以为那是一条狗。但是，走近一看，竟然是一个姑娘。“我”本来是寻找“海浪”的，现在这个名叫胡安尼娜的姑娘闯进了“我”的世界；“我看见她坐在潮湿的岸边，坐在由水浪来回流淌形成的一个时隐时显的小坑里。她身上穿着栗色的旧大衣，双手抱着膝盖，时而抬起头看看，漆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好像一个男孩……”

“我”需要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做模特儿，便邀请她到家里换换衣服，休息一下，与此同时，也想打听姑娘的身世。原来这女孩与婶子同住，由于对男女关系抱着玩世不恭的态度，婶子把她赶了出来。实际上，她已经怀了孕，由于没有钱堕胎，就想出这个“泡海水”的法子。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对，我曾经在某个地方看到过，治疗拉肚子和堕胎的最好办法就是浸泡在冰冷的水坑里。”第十章继续讲述胡安尼娜故事：“我”在旅馆里遇到了胡安尼娜，二人一起吃了午饭。这里的“遇到了”只是一种说法，因为“我”的女

友弗雷伊达一语道破了真相。她说：“你喜欢上她了。不是天天都可以遇到怀孕的‘男孩’的。”但是，弗雷伊达最后还是同意邀请胡安妮娜来家做客。于是，“我”去旅馆的酒吧寻找胡安妮娜。“我”找到了那女孩，给她买了三明治，两人谈论起社会上的卖淫现象。胡安妮娜告诉“我”：她原来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两个女孩十四岁就开始卖淫，而她们的家庭环境都属于中产阶级，当妓女完全是因为兴趣所致。谈话到了最后，“我”邀请胡安妮娜到弗雷伊达家里做客。女孩接受了邀请。第十一章的标题是《弗雷伊达说好》，继续讲述胡安妮娜到弗雷伊达家里做客的故事。那女孩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您丈夫从河岸上带回来的小妓女。”弗雷伊达柔声柔气地说：“他不是我丈夫。我们有点疯，有时候非常疯，不过没有疯过头，我们是谨慎的疯子。”喝过茶以后，三人到河岸上散步。天气有点冷。胡安妮娜脸色不好。于是又回到了家中，胡安妮娜有些恶心，跑到卫生间里呕吐去了。胡安妮娜和弗雷伊达讨论三人如何睡觉的问题。“我”明确表示：只想给那女孩画像，她一小时之后就乘公共汽车离开此地。弗雷伊达说“我相信你会安排好一切的。我上去睡觉了”。这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她走到柜子前，给我拿来一瓶甘蔗酒和一根吸管。雨声中，我听到她上楼梯的拖鞋声和浴缸里的水声。”第十章题为《卡韦·布朗哥》。这一章的开始仍然是“我”和胡安妮娜的故事：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同裸体的胡安妮娜睡在一起。弗雷伊达在躺椅上打毛线。“我”起床，拿了一杯牛奶，走到弗雷伊达身边。她问“我”：昨天晚上幸福吗？“我”承认跟那女孩做了爱。她是可怜那女孩，不能让那女孩拖着有病的身子离去。“我”想到那女孩如果堕胎就

得有钱，可是上哪里弄钱去呢？“我”想到了一个名叫卡韦·布朗哥的人。他是个单身汉，爱喝酒，喜欢听音乐，也懂得美术作品，以前还买过“我”的作品。于是，“我”跟胡安尼娜商量：给她画像，画一幅头戴大草帽、身穿毛衣的画像。女孩同意了。“我”感到奇怪的是——“我”要记录下来，以免忘记这一现象，因为后来再也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在我开始作画几分钟后，胡安尼娜面孔的正面开始布满了蒸汽。”第十三章只有十行字，题为《路》讲述人生总得走在“路”上：“人们向前走着，兴高采烈，漫不经心，少有怀疑；人们如此无知、放松和机械地走向墓穴和说出最后的几句话。人们如此坚定、普通、沉默、虔诚、愚蠢。”第十四章题为《约会》，“我”继续给胡安尼娜画像。当“我”的工作的第一部分结束时，“我”请弗雷伊达到卡韦·布朗哥那里去推销作品。弗雷伊达同意了。她回来以后说道：约好明天九点钟谈判，她希望“我”表现得友好一些，以便成交。第十五章题为《出逃》，“我”感觉到了胡安尼娜的经历可能是非常坎坷的，也是充满了矛盾的。“我”每星期跟弗雷伊达做爱一次，其余的时间几乎总是在给胡安尼娜画像，之后，在床上结束一天的工作，所以那女孩对弗雷伊达说：“他让我光着身子来回走，天气很冷，我俩都没有工作的兴趣。他抽着龌龊的烟斗。他是头猪。对不起，说了这样的话。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画上一会儿。每画一笔就骂上一句。最后，我俩做爱到天亮。”

“我”心里明白胡安尼娜早晚有一天会离我而去。第十六章题为《午饭》，讲述“我”拿着几幅画去找卡韦·布朗哥。二人在一起吃饭、喝酒，然后谈论画像。“我”心里想着胡安尼娜堕胎需要的费用；卡韦想着全部买下来要支付多少

钱。第十七章题为《捕鱼》，讲述“我”回到弗雷伊达家中，告诉两位女士谈判的结果：“我们要有钱了。”弗雷伊达纠正说：“是你们要有钱了。你们什么时候走？”“我”回答说：“我认为明天就可以拿到钱了。胡安尼娜回她婶子那里去。我回画室。”胡安尼娜说，她要跟渔民出海捕鱼。她问“我”是不是讨厌她出海。“我”怀疑胡安尼娜出海的真正目的，但是“我”没有权利阻拦她跟渔民在一起，只好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不过，昨天，咱俩是幸福的。”那女孩突然起身，在“我”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拿起大衣就走了。第十八章题为《出售》，讲述“我”和两位女士拿着几幅画像来到卡韦·布朗哥的住所。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拿来的全部作品都售出去了。卡韦交给“我”价值 1000 元的支票。第十九章题为《夏天死了》，讲述“我”和胡安尼娜从河边回来，发现弗雷伊达已经走了，门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夏天结束了。”二人换上衣裳，胡安尼娜告诉“我”：弗雷伊达早就邀请她去同居。“我”说：“她可能爱上你了。可能的。”那女孩说：“我讨厌女人。讨厌极了。我一闻到女人气味就想呕吐。”

“我”完全明白：她说的是谎话。胡安尼娜说：“假如我婶子不收留我的话，弗雷伊达邀请我在人工流产之后到她那里去休养。”她随后向“我”要了一点钱。最后，二人分手时，她说出了真相：她根本没有怀孕，也不是什么妓女。

“我”上当受骗了：“我让她走了。我自己继续等候公共汽车，同时感到上当受骗了，但是仍然还在为爱情拼命挣扎。”第二十章题为《晚餐》，讲述“我”和女友弗雷伊达以及两位男朋友——金德罗斯和弗拉夫特——的一次晚餐聚会。第二十一章题为《科尔巴托》，这是一条狗的名字。四

个人共进晚餐时，弗拉夫特说到他有一匹马名叫科尔巴托，不过他还养过许多狗，有的狗也叫这个名字。接着，金德罗斯谈起有一次赌赛马的经历：一切全都赔进去了。随后，四人决定换个酒馆坐一坐。走出酒吧，“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把弗雷伊达给弄丢了。三个男子汉走进又一家酒吧，一面喝酒，一面聊天。“我”讲起在圣达玛丽亚当警察局长时是如何抓住走私集团的头目曼弗雷托的。第二十二章题为《另一次旅行》，讲述金德罗斯夫妇是如何移民到圣达玛丽亚的。第二十三章题为《诱惑》，讲述了“我”的几个女友的下落：奥尔卡来过电话；胡安尼娜经常秘密地造访弗雷伊达。“我”还有一个情人，名叫古丽莎，二人在画室里同居。一天，古丽莎在画室里留了一封信，告诉“我”这个地方要拆迁了，让“我”赶快想办法。“我”找到了古丽莎，两人乘出租汽车去一家旅馆。但是一下车后，古丽莎竟然失踪了。“我”感到很奇怪。这时有人来敲门。“我”仔细一看，吓得要死：一个名叫胡达·卡雷诺的男子前来拜访。

“我”一直以为这个绰号叫“收尸人”的家伙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呢。“我”看见他“漫不经心和无可奈何地拍打着从鼻子里爬出来的蛆虫。他看到有几条蛆在地板上蠕动，便伸出一只脚把它们踩死了”。“我”不明白这个死而复生的家伙要干什么。胡达说，他要还“我”的人情，因为“我”在当警察局长的时候帮过他的忙。胡达答应“我”设法找到古丽莎。二人于是谈起往事。片刻后，胡达打了一个电话，说：“让她上来！”不久，有人敲门，古丽莎走了进来。“她的脸上挂着一种新型的微笑，鬼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从别的女人脸上也看到过这样的微笑。她径直走进来，走过胡达身边时并不朝他看。”她在“我”背后的床上躺下来，

然后仿佛听不到“我”和胡达的谈话一样兀自抽起香烟来。过了一会儿，胡达告辞要走，一面用“食指和大拇指从鼻子上捏下最后一条蛆虫”。送走了胡达，“我”听到背后的古丽莎叫喊起来：“您一直都没问我到底发生了他妈的什么事情！”“我”安抚古丽莎说：“这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咱们可以呆到厌烦为止。”古丽莎幸福地笑了，但是她说：“这些纱窗太难看了，应该想办法换一换。”

第二部分从第二十四章开始到第四十一章结束。与第一部分不同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改成了第三人称——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但是麦迪纳仍然是主要角色。第二十四章一开篇就讲述麦迪纳走在圣达玛丽亚旧市场上的情景：他走在拱廊下的阴影里，“险些踩到乞丐和小偷们的手上，他不时地停下来，摘下草帽，用手帕擦擦额头。”他喘了一口气，不屑一顾地走在衣衫褴褛的人们中间。现在麦迪纳的身份是圣达玛丽亚这座城市的警察局长。他走到市场中央，掏出一把硬币，扔给周围的穷孩子。这时，酒馆老板巴里恩托斯在注视着警察局长的一举一动，心里想着：“这个家伙又在笼络人心了。”麦迪纳用职业眼光扫视了一下周围，便向巴里恩托斯的酒馆走来。老板虽然不高兴，可还是得挤出一丝微笑迎上来打招呼：“局长，你好！来点什么？老规矩：杜松子酒？”麦迪纳要了甘蔗酒加苏打水。他问老板：“您认为圣达玛丽亚是座让人讨厌的城市吗？有时候，我是这么想的。”老板回答说：“局长，我不知道。我没有做过比较。”麦迪纳闷闷不乐地看着地上的蛆虫和听着苍蝇的嗡嗡声，他想从老板这里看出点什么问题来。但是，毫无结果。可他还是不甘心，指着一个喝酒的人问：“那个人是谁？”老板说：“我不认识。他在我这里躲

账的时候，总是签上‘英国人’三个字，而且总是每月十号以前清账。我猜想他是领取铁路养老金的。他不同任何人打交道。”局长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发生。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个老年妇女走到老板身边嘟囔了几句。老板连连说：“不。”老妇人慢慢地走开了。老板打算解释一下老妇人的事情局长不想听，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老板：“他在哪儿？”老板说：“他不让我告诉您。”这个“他”名叫胡利安·塞瓦纳，是个年轻人。老板领着局长来到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局长让老板走开年轻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麦迪纳单刀直入，让他把偷走的手枪交出来。那把手枪就藏在枕头下面，麦迪纳一下子就掏了出来。通过他俩的谈话，读者知道了胡利安·塞瓦纳竟然是弗雷伊达年轻的丈夫。谈话结束后，局长把胡利安打了一顿。第二十五章题为《午睡》，讲述下午六点的时候，局长麦迪纳、副局长马丁和警官巴雷讨论几个案情。这时，电话响了，接线员报告说：有个名叫巴里恩托斯的酒馆老板要求见局长。麦迪纳让他上来。巴里恩托斯是来报告胡利安·塞瓦纳的情况的：自从局长放了那年轻人以后，他出去过一次，回来时穿了一身新衣服，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他没有喝醉。老板认为：胡利安是个好小伙子。可是第二天，他叫醒了老板，买了几瓶酒，付的是现金。老板报告说：小伙子后来连续几天都没有露面。又不知道过了多少天之后，他出现了：一副肮脏和潦倒的样子。直到昨天早晨四点，小伙子叫醒了老板，声称：要杀人！然后自杀！局长回答说：没关系。让他自杀好了。老板说：那小子还骚扰过老板娘，所以他把那小子揍了一顿。此外，那小子还吸毒，撒酒疯。最后，局长开车送走了酒馆老板。第二十六章题为《科罗拉托》。局

长开车送酒馆老板回家。一路上，巴里恩托斯保持沉默，局长则讲述着这个街区的变化：街道变换了名称，新住宅楼不断落成，新的暴发户代替了旧贵族。麦迪纳在蒙蒙细雨中下了车，闯进一家小酒店，因为胡利安·塞瓦纳在里面。店主人名叫卡姆·科罗拉托，连忙迎上前来问候局长。胡利安不高兴地看着局长，说道：“你好！我正在等着你。确切地说，我一直害怕你出现。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担心你会随时出现在我眼前。我倒不是怕挨打。”局长解释说，上次打了他，是因为要履行诺言而已。胡利安·塞瓦纳满不在乎地说：“局长，我无所谓。我不怕挨打。很多人都拿我撒气。我更害怕的是说教。我害怕愚蠢的说教，哪怕是好朋友出于好心也不成。我不喜欢反省，更不对自己‘一分为二’。我就是我，一个永远受苦的角色；我从来没有幸福过，对未来也不抱希望。我相信自己的生活已经走到了尽头；我过去一无所有，现在一无所有，将来也不会有。我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我是真正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只有命一条，你从我这里抢不走任何东西。生命也不过如此，没什么了不起，一文不值。”麦迪纳鼓励对方不要泄气，他说胡利安是个聪明人，“而聪明是一切高尚品质之源。”胡利安劝局长：“别再一味地要拯救别人了。”二人随后谈起了弗雷伊达。第二十七章题为《和解》，麦迪纳和胡利安谈到了那枝手枪。局长劝他不要玩枪，如果喜欢枪支，弄一枝玩具枪就行了。局长还劝胡利安不要再跟弗雷伊达鬼混了。胡利安说：“局长，你保证过不再说教。我要睡觉去了，不过我可以听最后一次说教。”第二十八章题为《一个儿子》，讲述麦迪纳通过与胡利安的谈话产生了一种当父亲的感觉。第二十九章题为《吵架》，讲述麦迪纳早晨起来路过美国老人弗

拉夫特的房子前面，听到里面有吵架的声音，便敲门进来打听。原来是弗拉夫特早晨出去遇见一位朋友，二人在谈到弗雷伊达时吵了起来。那位朋友是弗雷伊达的情人，他把弗拉夫特揍了一顿。老人回到家里还在嘟囔，结果让局长听到了。第三十章题为《圣达玛丽亚》，讲述警察局长麦迪纳正在办公的时候，一个饭馆的伙计跑来通知局长：今天晚上弗雷伊达和三四个女朋友要宴请麦迪纳。警察局长摸不着头脑，就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给医生迪亚斯·克雷依打电话，邀请他晚上也到饭馆里来“做个证人”。将近夜里十二点钟的时候，局长来到饭馆，他要了一瓶啤酒和两只杯子，抽着烟，喝着酒，等待着迪亚斯·克雷依。过了一会儿，迪亚斯跟着塞瓦纳走了进来。塞瓦纳与弗雷伊达等几个女人汇合一处。局长和医生单独聊天，他俩谈论炎热的天气、铁路运输和不景气的市场。医生说到了美国人在抢占城里的地皮。这个医生就是《造船厂》里的拉尔森，老板佩特鲁斯的诈骗暴露之后，拉尔森并没有死，而是制造了一个假相，改名换姓之后来到圣达玛丽亚。他真的和佩特鲁斯的傻女儿结了婚，因此当警察局长提到“祝贺他结婚”时，他解释说：“这差不多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来贺喜的人都以为，我是在跟佩特鲁斯那子乌虚有的万贯家财结婚的。其实，安赫莉卡·伊内丝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我就爱上她了。尽管现在和将来她都不会懂事，我依然爱着她。后来，什么打赢了官司和神秘的布劳森的帮助，都是空穴来风。现在，我们手上有几百万比索。我既回避这些钱财，也不隐瞒我的爱情，虽然她有些不正常。”局长感谢医生这番推心置腹的话。这时，弗雷伊达端着酒杯走了过来。她来宣布：她开始过起“有教养”的生活了；她已经同所有睡过觉的男人断绝了关系，其中包

括警察局长。她还批评局长是个靠女人生活的家伙。麦迪纳回答说：“你说得完全正确。过去我在拉万达依靠一位非常漂亮、有时也爱我的女人生活了好长时间。这个女人甚至容忍另外一个女人爱我。”这时，医生突然发现塞瓦纳总是去洗手间，看那小伙子出来以后的神情，医生怀疑他在吸毒，因此问警察局长：“您应该知道在圣达玛丽亚的什么地方可以搞到毒品？”麦迪纳用嘲讽的口气说：“您诊所里就有”医生说为了治病总得多少准备一些。局长说：“我必须知道这些毒品是怎么进来的。”医生和弗雷伊达都没有回答。局长于是带着古丽莎告辞了，但是走之前，他向医生打听一个人：“医生，您认识一个大家都叫他科罗拉托的人吗？我看见他在这一带转悠过。有人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情况。”医生回答说：“那是老掉牙的事了。我俩曾经在河边茅屋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是个奇怪的家伙。说来话长了。”第三十一章题为《道路》，原文只有十八行。是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感慨：人们愚蠢而无知地生活着。无论快乐还是悲伤，无论紧张还是放松，人们总得要走向坟墓。第三十二章题为《玛鲁赫》，讲述麦迪纳把一个杀人凶手送进监狱之后，找了一个名叫玛鲁赫的妓女解闷的经过。第三十三章题为《卡萨诺瓦》，这是个妓院的名字，现在由弗雷伊达买了下来。警察局长麦迪纳半夜里来到这里，他一边喝酒，一边要求播放一首叫做《宁肯你对我说》的歌曲。招待连忙给局长找陪酒女郎。这时弗雷伊达来了，她问局长是不是想知道她为什么要买这家妓院，应该不应该买下来；为什么她要把塞瓦纳留在身边。局长说，他跟塞瓦纳是朋友，甚至有父子的感觉；而且塞瓦纳觉得局长就是他的监护人。与此同时，局长心里想着：应该告诉塞瓦纳，他跟弗雷伊达睡

过觉，让这个小伙子离开这个臭女人。弗雷伊达声明：塞瓦纳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了。局长想：她把小伙子藏起来了。他告诉她：他要去首都十五天。第三十四章题为《为塞瓦纳设计的童年》。麦迪纳猜想：塞瓦纳出生在二十年前的七月十六日，他母亲叫玛丽亚·塞瓦纳；他父亲是个瑞士人。他出生的环境很神秘，长大以后又进了神学院，就更加显得神秘起来。第三十五章为塞瓦纳设计了另外一种童年：在母亲身边干活，参加田间劳动。第三十六章题为《窥视》，讲述警察局长用望远镜监视弗雷伊达的情况。随后，他走到弗雷伊达游泳的地方，直截了当地问她：为什么要带走塞瓦纳？她回答说，是为了可怜他。局长说，他准备辞职不干了。弗雷伊达说，你是不会依赖任何人生活的，当然更不会依赖女人。麦迪纳说，从前还可以绘画，现在“很难想象警察局长手里拿着画夹子的样子”。第三十七章的题目是《科罗拉托》，讲述警察局长麦迪纳和科罗拉托的关系。局长雇佣科罗拉托去完成一件秘密工作。第三十八章题为《弗雷伊达在草地、在收容所和在学校》，由医生迪亚斯·克雷依讲述弗雷伊达被杀的经过：早晨，古丽莎到河边去，发现了弗雷伊达的尸体。警察们把尸体运到附近一所学校去检查。医生判断：弗雷伊达先是被人殴打，后来被按到水中淹死了。凶手可能是个男人。第三十九章题为《一个忠实的儿子》，局长传讯了古丽莎，询问她发现弗雷伊达尸体的经过。随后，局长又准备审问犯罪嫌疑人塞瓦纳。但是，马丁来报告说：“毫无疑问，他已经死了。”当法官前来过问这个案件的时候，发现塞瓦纳留有遗书，上面写着：“是我杀了弗雷伊达。”法官对警察局长说：“局长，这是最关键的突破口。你写份报告交给我。从河边发现女人尸体写起，一直写

到这个东西。”他指指地下的尸体又说：“把这个家伙运到哥伦布医院去。我看这个家伙服用了过量的毒品。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瘾君子都是这个下场。他们还是早点死了好！”接着，法官说起与医生的谈话，他俩说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感情：我们好像是它忠实的儿子。第四十章题为《前夕》，警察局长麦迪纳给科罗拉托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后者消沉地说：“我感到浑身无力，也许是人们说的‘消沉’。另外，我觉得暴风雨要来了。可是风暴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第四十一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题为《最终还是风》，麦迪纳期待着暴风雨的到来。他在跟古丽莎做爱之后，走进浴室，出来的时候，他把手枪放进了浴衣口袋里。接着，他来到窗前，望着天空的变化：一道亮光正在升起，狂风席卷一切迎面而来。

“他不由得颤抖起来，心里有种恐惧感，害怕冒险又一次造成令人沮丧的结果。”他拿着手枪走到床边，但是害怕风声会把古丽莎吵醒。全书到此结束给读者留下一些谜团。

综观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圣达玛丽亚系列小说”，他非常注意发现社会的痼疾：欺诈、贪婪、纵欲、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等丑恶现象；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发现在这个假冒伪劣充斥一切空间的社会里，人们所表现的绝望情绪。人人都在弄虚作假，如果你说真话，那么就变成了“异类”，残酷的现实就逼得你处处违心地说话和办事。更可怕的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们，例如《造船厂》的大老板佩特鲁斯，他口口声声地说：公司是大有前途的，可实际上船厂早已经倒闭，他在到处骗钱，说是用来恢复生产的；拉尔森明明知道船厂是一堆废铁，还装模做样地摆出总经理的架子到处招摇撞骗。就是

警察局长麦迪纳也不相信在这个罪恶的社会里还有多少可以信赖的朋友，强烈的“绝望”感贯穿了整个《请听清风倾诉》。阅读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作品需要耐心，需要思考，需要联想和比较，需要体验书中人物的心理活动；阅读他的作品会产生沉重和痛苦的感觉。这是因为奥内蒂的小说不以故事情节取胜，不以悬念见长，而是把叙述的重点放在人物的内心变化之中。

善于营造气氛和描写细节是奥内蒂小说的艺术特色。气氛和细节是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造船厂》里，废弃的机器、破败的厂房、布满灰尘办公室、加尔维斯和老婆居住的茅屋……都在无言地告诉读者：这是个悲惨的世界。作者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流行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为了表现这地狱般的现实，作者营造的悲惨、凄凉的气氛往往就上升为“主角”的地位了。总体上说，奥内蒂的语言风格是明快的，但是在描写心理活动时也使用朦胧和跳跃的叙述方式。这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艺术联想能力。

第十二章

胡安·鲁尔福的小说

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是墨西哥著名小说家。1918年5月16日出生在哈利斯科州萨玉拉地区一个没落庄园主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母先后去世的痛苦、家境的贫寒和内战的动乱中度过的。这些心灵上的烙印都在他的小说中有着清晰的反映。1910~1918年，墨西哥爆发了全国性的革命战争。这造成了经济凋敝，社会治安混乱；加上旱灾和土地贫瘠，田野荒芜，饿殍遍地，到处都是萧条、破败的景象。1926~1928年爆发了基督教会反对卡列斯总统限制教会政治、经济权利的“教会叛乱”，联邦政府派兵镇压，引发了内战。战火很快就波及到了哈利斯科州，在1926年的头几个月里，胡安·鲁尔福的父亲就病倒了，不久便撒手人寰。6年后，母亲也去世了。亲戚们把胡安送到教会学校里读书，实际上等于进入了孤儿院。他后

来在回忆此事时说，“那就跟少年教养所差不多。”这样的环境慢慢形成了他孤独、内向、忧郁的性格。中学毕业后，他去学会会计；同时旁听大学文学课程，业余时间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后考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攻读法律和人文科学。1935年，他在政治移民局谋得一个职位，为安置从西班牙内战中流亡到墨西哥的进步人士做了大量工作。1947年至1954年，他从事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工作。1955年参加了高原地区农业灌溉工程。1956年，回到首都，以编写商业电影剧本为生。1959年到哈利斯科州首府电视台工作。1962年，在墨西哥全国印第安人研究所出版部工作，长达24年之久。1986年1月8日病逝于首都墨西哥城，终年68岁。

1942年，胡安·鲁尔福在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市的《面包》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人生无常》。作品的主人公是个怀孕的妈妈。她的丈夫老克里斯宾没有看到孩子出生就离开了人世。于是，未出生的孩子成了遗腹子，母亲也格外珍爱这个永远也看不到生身父亲的孩子。对亡夫的怀念和对腹中孩子出生的盼望交织在主人公的心头。实际上，这是一个生与死在特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主题。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她需要在大衣柜里找一件衣裳，衣柜比她高得多，于是上到第一层隔板，膝盖又上到第二层，这时她想到了腹中的孩子，为了不让孩子感到压迫，她挪动了脚步，结果摔了下去……

胡安·鲁尔福还有一个早期的短篇小说，题为《夜间一刻》，创作的时间是1940年，而发表的时间和刊物则是1959年9月出版的《墨西哥文学》杂志上。作品讲述一个名叫皮拉尔的妓女跟一个名叫克劳迪奥·马科斯的男子共度“良宵”的故事。克劳迪奥是个掘墓人，一天夜里，他的一

个朋友和妻子都喝醉了，扔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克劳迪奥便抱起朋友的孩子上了大街。当他看到皮拉尔时就决定和她彻夜长谈。起初，皮拉尔不肯做这笔“生意”，因为有孩子妨碍；后来她还是同意跟克劳迪奥一道去公园、酒吧和旅馆，因为他答应支付酒钱、饭钱和旅馆费。二人在谈话中，交流了感情，却没有发生任何别的事情。但是，从此以后，二人继续交下去，最后皮拉尔嫁给了克劳迪奥。这两个短篇小说在艺术风格和叙事技巧方面已经展示了作者的文学才华和兴趣，对于研究胡安·鲁尔福小说特点的形成过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1953年，胡安·鲁尔福把他创作的16个短篇小说结集出版，题为《平原烈火》。问世不久便引起墨西哥文坛的关注，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有时代感，文笔细腻，技巧娴熟，善于刻画农民心理”。1954年，胡安·鲁尔福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开始了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的创作，次年在墨西哥出版。作品深刻的内容和奇特的艺术形式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兴趣，随后很快在拉丁美洲和欧洲流传开来。截止到2000年末的不完全统计，这部小说已经被翻译成56种文字。它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奠基作之一，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叙事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获得国内外多项奖励。1980年，墨西哥政府为胡安·鲁尔福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这在墨西哥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这位作家当时还健在。

《佩德罗·帕拉莫》问世后，胡安·鲁尔福没有再发表新作。根据他的好友、乌拉圭著名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解释说：“确实，他甘于寂寞已经有30年了。他知道自己完成了文学使命。他是个正直的人，尊重自己已经无力创

作的事实。这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个良好的榜样，他们白白增加印刷机的负担，却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

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平原烈火》和《佩德罗·帕拉莫》。

第一节 《平原烈火》

《平原烈火》这部短篇小说集由 16 个作品组成，它们是：《人家给了我们土地》、《教母坡》、《就是因为我们的穷》、《男人》、《黎明时分》、《塔尔巴》、《平原烈火》、《告诉他们别杀我！》、《卢维那》、《扔下他孤独一人的夜晚》、《请你记住》、《你听不到狗叫》、《阿纳克莱托·莫隆内斯》、《地震那一天》、《玛蒂尔德·阿尔甘赫尔的遗产》和《马卡里奥》

这些作品主要描写 1910 年墨西哥大革命的某些场景以及革命给农村留下的诸多“后遗症”：土地荒芜，农民流离失所，失望、恐惧、报复、仇恨的阴影笼罩在千家万户人们的心里。其中有三部作品是直接描写这场大革命的，它们是：《平原烈火》、《扔下他孤独一人的夜晚》和《人家给了我们土地》。

《平原烈火》讲述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农民起义队伍由于无法忍受庄园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奋起走上反抗之路的经过。后来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又无正确的领导，最后被政府军镇压下去了。作品用第一人称（名叫比乔恩）叙述的方式描写了起义队伍在他们的首领佩德罗·萨莫拉指挥下反复较量的战斗经过。他们多次打败过政府军，也被政府军伏击过，双方都有伤亡。时间一长（“我”跟随萨莫拉有

5年之久），起义军已经感到疲惫不堪了：“我们倒是很愿意对人们说：我们不想继续干了，让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吧！”但是，这支队伍有严重的“流寇”思想，到处搞破坏活动，连印第安人都给得罪了：“我们搞了这么多的破坏活动，结了这么多冤家。连山上的印第安人也不喜欢我们了。他们说我们杀了他们的牲口。他们拿起了政府发给的武器，扬言说：一遇见我们就杀！”由于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这支农民游击队就被政府军消灭了。他们的首领佩德罗·萨莫拉被捕入狱，不久就被杀害了。“我”（比乔恩）也在监狱里蹲了3年。值得深思的是作品的结尾：“我”在打游击时曾经糟蹋过一个少女。在“我”出狱之后，姑娘一直在寻找“我”。她不是要报仇，而是希望“我”回来过“好人”的生活，因为她已经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她希望儿子当“好人”，而不当“强盗”。话说得不多，但是反映了老百姓的愿望：结束动乱，让我们过安静的生活。

《扔下他孤独一人的夜晚》讲述了3个掉队的起义战士如何长途奔波追赶队伍的故事。拼命赶路使得他们三个疲惫至极，结果三人中又有一个掉了队。等到他快要赶上战友时，突然发现两个战友（其中有他的叔叔）被吊在牲口棚的橡树桩上。他听到士兵们在谈论：他们一共是三个人，没来的是个年轻人。估计他会来的。如果他不来，那就杀掉年纪大的那一个，任务就算完成了。有趣的是：士兵们说，最好不要派他们去山里攻打游击队。原来政府军也产生了厌倦情绪。在结尾处，作者写道：“他没有回头看，也没有止步，一直跑到他觉得是河流与平原的交接处方才停下来。这时，他颤抖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人家给了我们土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客搞假土地改

革的丑剧。作品一开始，一群农民清晨去平原上察看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走了一整天，仍然看不到人烟。最后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然而看到的却是：“这么一大片土地竟是一块不毛之地！”农民希望要河边的土地，因为这块不毛之地是根本种植不了任何农作物的。面对农民的要求，政府代表说：“你们应该反对的是大庄园制，而不是分配给你们土地的政府！”农民不在乎这种恐吓，他们的要求非常明确：“我们没有说过任何反对政府的话。我们只是针对土地……”然而政府代表根本不想听农民说什么。土地就这样分配下去了：庄园主占据河边好地，普通农民分到的是石板地！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府兑现的“耕者有其田”！

胡安·鲁尔福的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 1910~1930 年间墨西哥大革命和“教会叛乱”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的灾难。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是，胡安·鲁尔福使用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手法。他描写景色的特点是，非常细腻和夸张，把人物的情绪熔铸到景色之中，比如《人家给了我们土地》中，作者用了大量的文字描写炎热和干旱的气候、荒凉和贫瘠的土地：“我们早就不想再讲话了，这是由于天热，连平常非常健谈的人到了这里以后，也不想开口了。在这里说话，酷热会使人口干舌燥，结果只剩下喘气的份了。”“这里是兔子不做窝，鸟儿不搭巢的地方。周围一无所有。”“几乎寸草不生。”

胡安·鲁尔福还非常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比如他常常使用内心独白的手法表现人物的情绪和思想。在《黎明时分》里，作者在叙述老牧工埃斯特凡看到庄园主堂胡斯多与侄女发生乱伦关系时，放弃了一开始使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故事的方法，而借助了老牧工的内心独白揭露出事情的真

相：“正当我要拉开牲口棚的门栓时，我看到东家从竹林里走出来，怀里抱着沉睡的玛格丽达姑娘。他穿过牲口棚，但是没有看到我。我赶紧躲在墙根下。他肯定没有看见我。”善于安排荒诞而怪异的情节是胡安·鲁尔福这些小说的又一特色。初读他的作品，会发现故事的发展缺少应有的逻辑性与合理性，感到叙述顺序是混乱的；但是，仔细阅读之后，便会发现作者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有意制造扑朔迷离的气氛，因为作者面对的现实就是混乱和荒唐的，为了表现这一真实性，作者便打乱了自然时序，刻意让情节的发展不受时间、空间、主观、客观的限制，从而创造了艺术真实，其目的是调动读者的艺术联想能力。胡安·鲁尔福在《平原烈火》等短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叙述技巧，在后来创作的中篇小说《佩德罗·帕拉莫》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提高和发展。

第二节 《佩德罗·帕拉莫》

《佩德罗·帕拉莫》是胡安·鲁尔福的代表作，它不仅内容上更趋深刻，揭示出墨西哥民族性格的某些特征（如对生死的看法），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达到了成熟甚至完美的程度。作品的情节并不复杂：佩德罗·帕拉莫是庄园主卢卡斯之子。幼年时，父亲被雇工杀死，他心灵受到很大刺激。青年时，佩德罗·帕拉莫喜欢玩弄女性，同时拼命聚敛钱财和霸占土地。他软硬兼施，巧取豪夺，逐渐把科马拉的土地全部据为己有。他抵赖债务，偷移地界，甚至谋财害命，无所不为。为了赖掉欠账，占有更多的土地，他与自己最大的债主多洛雷斯·普雷西亚多结婚，尽管他从来没有爱

过她。后来，他霸占了她的全部财产并且将她扫地出门。她只好远走他乡，最后含恨而死。此外，他还抢夺了一个名叫阿尔特雷特的地主的财产，随后派遣爪牙将其绞死在家中。就这样，佩德罗·帕拉莫终于成为独霸一方的“首领”。在他统治的势力范围内，无论雇工还是商人，律师还是神甫，对他的倒行逆施都是敢怒而不敢言，都只好忍气吞声地屈服于他的淫威。就连震撼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大革命，他都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并且趁机扩充了势力范围：假装投靠革命，指使心腹打入革命队伍，唆使农民起义军攻打周围的村落。当然这也反映了这一革命洪流造成的混乱状态。然而，为所欲为的佩德罗·帕拉莫也并不事事顺心，痛苦和不幸也同样要降临到他头上。他受到的第一个打击就是他的爱子米盖尔之死。这个坏种在 17 岁时就行凶杀人，村中半数的姑娘都被他蹂躏过。一天夜里，他外出寻欢作乐的时候，马失前蹄，坠地而死。佩德罗·帕拉莫从儿子的惨死中预感到自己欠下的血债应该偿还了。残暴专横给他制造了与世隔绝的堡垒，孤独和恐惧终日折磨着他。爱情能不能帮助他冲破这道孤独的包围圈呢？不能！他从小喜爱的姑娘苏珊娜拒绝了他的追求。苏珊娜象征着青春和幸福，是惟一能把他从空虚和苦闷中解救出来的人。但是成年的苏珊娜早已经是饱尝人间苦难的妇女了：幼年丧母，父亲又给她的心灵造成了不可医治的创伤。她父亲名叫巴托洛梅，是个矿工。有一次把女儿用绳子坠到深深的尸穴中去寻找金子。苏珊娜看到的只是一具腐烂的尸体，吓得她半死……长大后，她爱上了一个名叫弗洛伦西奥的小伙子。可是，结婚后不久，丈夫就死了，她成了寡妇。由于生活无着，她只好回到父亲身边。穷困潦倒的父亲又和她发生了乱伦的关系。这时的苏珊娜已经到了精神

崩溃的边缘。父女二人为逃避战乱，又回到了老家科马拉村。佩德罗·帕拉莫一直在打听苏珊娜的下落。他听说她和父亲回到了村庄，就阴谋杀害了她的父亲。然后，冠冕堂皇地把苏珊娜接到家中，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梦想：与苏珊娜结婚。但是，一切都为时已晚：苏珊娜疯了！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她死后，科马拉教堂的钟声响个不停。周围村庄的人们不知道科马拉发生了什么事情，纷纷跑到这里来观看。结果使得为悼念苏珊娜逝世的治丧期变成了人们聚会的节日。对此，佩德罗·帕拉莫非常生气，发誓进行报复：让人们饿死。他一生追求的爱人死了，梦想破灭了。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让田野野草不生。他自己也只好等死了。他每天卧在一把破旧的躺椅上，看着人们纷纷外出逃荒。他的死来得很突然：阿文迪奥是佩德罗·帕拉莫诸多私生子中的一个，他的妻子饿死了，悲痛中他喝得酩酊大醉。他要求佩德罗·帕拉莫帮助他安葬妻子，二人发生口角。阿文迪奥举起砍刀，杀死了父亲。佩德罗·帕拉莫死了。科马拉村也变成了废墟。

过了一段时间，佩德罗·帕拉莫的第一个妻子、被抛弃的多洛雷斯·普雷西亚多的儿子胡安·普雷西亚多，遵照母亲的遗嘱，到老家来寻找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路上给他做向导的人正是阿文迪奥。但是胡安并不知道阿文迪奥早已经死去，引导他的是个鬼魂。胡安·普雷西亚多本来希望看到母亲回忆中美丽的故乡，看到精心耕种的绿色庄稼，看到人们快乐的生活。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死亡的、充满了私语、同声、鬼影、痛苦亡灵的村庄。这些亡灵都像生前一样能活动，会说话，有思想，有性格，现在到处在村里游荡。胡安与他们一一接触，听到了种种关于佩德罗·帕拉莫的传

说和村庄里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里，胡安感到非常压抑，感到阴森恐怖。最后，他也死在那里。安葬他的是村里仅有的三个人：老贫婆多洛特阿、多尼斯和他的妹妹（也是他的妻子）。胡安继续和村里的亡灵通过对话、独白、回忆等等形式讲述着佩德罗·帕拉莫和科马拉村的故事。

以上是小说的故事梗概。但是作者不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叙述的。而是以胡安回到科马拉开始，以阿文迪奥杀死佩德罗·帕拉莫告终。全书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胡安回老家的前因后果，讲述他在村里奇异而可怕的遭遇。但是，他那好像是对话的叙述不时地被佩德罗·帕拉莫的内心独白和他母亲多洛雷斯的回忆所打断。这样又引出一系列其他的人物和事件。叙述的时间、空间和视角不断地在变换。直到这时读者还以为胡安是活人。但是，在全书一半的地方，读者方才明白胡安是在墓穴里与老乞丐多洛特阿（即老贫婆多洛特阿的丈夫）进行对话的。他对老乞丐说：“一开头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是来找佩德罗·帕拉莫的，听说他是我的父亲。”至此，读者恍然大悟。原来，从一开始就是胡安的鬼魂在讲述自己经历。

从读者知道胡安是个鬼魂以后，作品的第二部分就开始了。故事跳到了佩德罗·帕拉莫的横行霸道的行为以及他和苏珊娜的爱情悲剧上去了。最后写到他被阿文迪奥杀死为止。虽然倒叙、回忆、对话、独白仍然穿插在各处，但是作品发展到这里已经出现了清晰的轮廓。读者感到已经踩到了坚实的地面，而不是像第一部分那样艰难地在泥潭里试探深浅了。以胡安·普雷西亚多之死来划分作品的前后，是以作品的色调为根据的。前半部属于阳间的明亮色调（虽然是灰色的）；后半部属于阴间的黑暗色调。作品一开头，胡安好

像还活着，读者可以跟着他去观察神秘的科马拉。但是到了后半部佩德罗·帕拉莫出场以后，读者渐渐感到了地狱的气氛。

《佩德罗·帕拉莫》很像一幅超现实主义绘画，它完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不同事件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来描写。作者从事情的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梦幻、从人物的生前到死后，不断地变换着叙述视角，不断地给读者留下思考和联想的空间。在画面上，作者安排了许多由无数碎石拼成的镶嵌画。而每一粒碎石又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是这些碎石又是粘连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内在联系。做联系工作的恰恰是读者，一旦读完全书，一幅精美的镶嵌画便浮现在读者的脑海里了。

《佩德罗·帕拉莫》中的景物描写是别具匠心的。小说一开始作者多次写到“炎热”，如：“正当盛夏，八月的热风刮个不停”，“平原好像是个散发着蒸气的透明的湖泊”，“在山上走时还有热风，山下却连一丝风也没有，有的只是热”，“到了科马拉，你会觉得更热。那里的土地真好像搁在火炭上一样，又好像处在地狱的门口。”炎热、干旱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就是科马拉人的生存环境，它影响和决定了人们性格的形成：吃苦耐劳，沉默内向。

《佩德罗·帕拉莫》指明了故事发生的特定历史时期：1910年爆发的大革命和1926~1928年间基督教会的暴乱。一个鬼魂这样说道：“正当他快要去世的时候，打起仗来了。打的是什么‘基督战争’。军队把留在村里的少数人都给杀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一位农民起义的战士是这样解释造反的理由的，他对佩德罗·帕拉莫说道：“我们是起来造政府的反，也是造你们这些人的反的，我们已经

忍无可忍了！我们造政府的反是因为政客们卑鄙无耻；造你们的反是因为你们都是恶霸，是脑满肠肥的强盗。”谈话的结果是：佩德罗·帕拉莫连忙拿出十万比索讨好起义队伍。

《佩德罗·帕拉莫》还深刻地揭示出科马拉人（乃至广大墨西哥农民）的生死观念和宗教信仰。他们相信生死是没有界线的，阳间和阴间也是没有界线的：“这个村庄里充满了回声。好像连墙洞里都是回声，石头底下压的也是回声。甚至连你一走路，也会觉得回声就跟在你脚后头。你会听到噤噤喳喳的低语，你会听到笑声。这是时间很长的笑声，似乎已经笑得不耐烦了。”“有好几个夜晚，我都听到节日的喧闹声。我走出去一看，结果什么也没有，街道跟现在一样是空空荡荡的。”

综上所述，读者可以看出《佩德罗·帕拉莫》是分别从科马拉的外部世界、社会、历史条件的因素以及人物的主观、内心世界的诸多因素来揭示墨西哥农民性格的特点的，对此，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给予很高评价，说他的作品远远突破乡土文学的窠臼，独辟蹊径，举起了一面崭新的旗帜。其实胡安·鲁尔福在《佩德罗·帕拉莫》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与他大量借鉴欧洲和拉丁美洲前辈优秀作家的艺术成果分不开的。特别是他善于把先锋派作家的技巧创造性地用来描写墨西哥的农村现实，进而创造了墨西哥农村的现代神话故事：把古老的阿兹特克文化中的神话因素巧妙地融合到了古希腊神话之中。从《佩德罗·帕拉莫》一开始，读者就可以看到俄底修斯的影子。古希腊神话说，勒玛科斯离开母亲帕涅罗寻找外出多年不归的父亲俄底修斯。胡安·普雷西亚多也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回到故乡去找父亲的。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多尼斯因为和自己的妹妹发生性关系，同样受到上帝的诅咒，永远要在科马拉受苦。在村中游荡的许多鬼魂令人想起了但丁的《神曲》。根据阿兹特克的传说，犯有罪孽的人死后亡灵永远在大地上游荡。胡安·鲁尔福的家乡哈利斯科州有个节日是专门为亡灵回家而设置的。《佩德罗·帕拉莫》中就有为死人过节的生动描写。胡安·鲁尔福成功地把这些神话因素糅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神话：科马拉这个神秘的世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佩德罗·帕拉莫》中朦胧、灰色和神秘的笔调都是为了揭示和表现这个恶霸庄园主治下的现实世界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明白无误地指出：佩德罗·帕拉莫欺压了百姓，他的下场也没有逃脱命运的惩罚：死于儿子之手。这不是简单的“恶有恶报”，因为作者对宗教的虚伪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罪孽深重、死有余辜的米盖尔·帕拉莫（佩德罗的爱子）杀死了神甫伦特里亚的兄弟，奸污了神甫的侄女，可是这位神甫不但不报仇，反而在米盖尔摔死后给这个恶少祈祷祝福，希望他的灵魂进入天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老乞丐多洛特阿由于给米盖尔拉皮条而一再向神甫忏悔，可是却得不到神甫的宽恕。其原因就是神甫是由有钱有势的人供养的工具。对此，神甫毫不讳言。他说：“我怕得罪那些供养我生活的人。他们养活着我，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从穷人那里能得到什么呢？一无所得。祷告是不能解决肚子问题的。教会历来如此……”同样地，胡安·鲁尔福对于暴力革命的认识也是从墨西哥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他不盲目地歌颂革命的伟大意义，而是清醒地看到这场革命给农村带来的灾难：佩德罗·帕拉莫不仅没有受到革命的打击，反而混入革命队伍，并且变本加厉地

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更加为所欲为地欺压百姓。这不仅是对热情歌颂大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反诘，不仅是要揭露这场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产生的恶果，而且是要从墨西哥民族的劣根性上找出专制统治的根源，找出贫穷、落后、愚昧的根源。如此深刻的思想内涵，加上高超的艺术技巧，使得《佩德罗·帕拉莫》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之作，从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第十三章

胡里奥·科塔萨尔 的小说

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azar）（1914~1984）是阿根廷著名作家。他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并驾齐驱，是拉丁美洲“新叙事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最重要的作品有两部：《中奖彩票》（1960）和《跳房子》（1963）。他敢于冲破传统的文学理念，敢于标新立异，大胆改革和实验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在追求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文学表达形式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胡里奥·科塔萨尔 1914 年 8 月 26 日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个阿根廷外交官家庭里。1919 年跟随父母回到祖国阿根廷。不久，父亲离家出走。幸运的是母亲精通法语并且热爱文学，胡里奥在母亲影响下学习了法语，七岁便开始阅读法语和西班牙语读物。1934 年考取了师范学院文学

系。有两位教授对胡里奥的文化养成影响很大。一位是讲授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阿尔杜罗·马拉索(Arturo Marasso)；另外一位是教授东方哲学思潮的维森特·法多内(Vicente Fatone)。但是他仅仅学习了一年便因为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了。以后经朋友介绍，他做了中学教师。在执教的三年中，他一面教书育人，一面阅读文学书籍和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38年他受聘于门多萨省的库约大学，讲授法国文学。1943年，由于政局动荡，他失去了教书的工作。1946年底隆在总统竞选中获胜。胡里奥是庇隆政府的反对者，因此被迫辞去了图书委员会的工作。此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1951年他去法国工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巴黎总部担任翻译。1984年在巴黎逝世，终年70岁。

青年时期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十分崇拜法国文学。他走上文学之路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1941年他出版了一部诗集，其中象征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诗局优美，讲究韵律，但是内容浮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拉丁美洲文学本身就有许多大师值得认真学习，如阿根廷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卢贡内斯、乌拉圭著名作家基罗加、阿根廷大作家博尔赫斯等人。1949年，他发表了诗剧《国王们》，作品取材于提修斯怒斩牛头怪物的神话故事。但是，在科塔萨尔笔下，专食童男童女的牛头怪物变成了出类拔萃的诗人。这位奇怪的诗人四处讴歌自由、平等，抨击现行的社会秩序。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危险的东西，便设计将他骗入了迷宫。提修斯则以传统习俗的卫道士身份出现，他十分仇视敢于叛逆传统道德的人，终日手持宝剑，时时准备斩妖除怪。但是，代表真、善、美的阿里亚德娜却坚信真理在牛头诗人一边，并且认为牛头诗人一定会战胜卫道士。她期待着牛头

诗人逃出迷宫与她相会。这部诗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新奇的对话形式抨击了旧观念对人们的束缚，阐明了自由、平等的新思想。这是科塔萨尔在探索自己的文学道路上的一部习作。1951年，科塔萨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角斗士》，开始引起了阿根廷文坛的注意。他之所以借用古罗马竞技场上的“角斗士”一词作为书名，是因为他讲述的故事大多涉及人与恶势力的搏斗。例如，在《角斗士》这篇小说里，作者叙述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她日夜心头缠绕的感情问题，到了夜里的梦中变成了似虎非虎的怪物：她与怪物在一座迷宫般的建筑物里追逐、搏斗，最后毫无结果。又如在《被侵占的房子》里，两兄弟发现有陌生人闯入家中。这些无形的侵入者越来越多，迫使兄弟两人逐渐缩小活动范围。最后，屋内所有的通道和走廊统统被侵占者堵死，房门完全被封闭，弄得他俩竟身无立锥之地了。那么侵入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这座迷宫般的建筑物又象征着什么呢？作者没有交代。他让读者自己去想象。

1956年，科塔萨尔又出版了一部短篇小说集，书名是《游戏的结局》。在这个集子里，虽然还有些作品是写迷宫游戏的，但是作者已经对这类小说的社会作用产生了怀疑。他在序言里提出文学应该干涉人生和介入社会生活。因此，另外有些作品是正视社会问题的，具有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他并未减少浪漫和想象的成分。此后，在此基础上，科塔萨尔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时期，其标志就是长篇小说《中奖彩票》（1960）和《跳房子》（1963）的问世。下面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节 《中奖彩票》

《中奖彩票》一开始介绍了一群“旅游彩票”的中奖者的身份：有教师，有大学生，有公司职员，有摩登小姐，有财大气粗的老贵族……总之都是属于上层和中产阶级的人们。他们集合起来以后便对是不是真的能够出行产生了怀疑。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因为从集合地点到登船的码头本来有游览车来接，可却让旅客们步行几个街区去搭游览车。这是政府文化发展部组织的活动，部里派遣了监察员来指挥中奖者上船和安排舱位。整个登船过程是在警察监督下于夜色中进行的。这让中奖者们感到阴森恐怖。中奖者们不知道游船会把他们带往何方，因为时间竟然长达三四个月之久。有人猜测是去中国！开船后，航行一夜，中奖者发现游船竟然停泊在距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远的吉尔梅斯海岸处。有的中奖者想要去船尾看看风景。餐厅总管回答说：由于“技术原因”不得去船尾。人们追问道：是不是发生了故障。回答是：没有。这时已经有人发现：“可能遇到了大麻烦。当然也会有开心的地方。”禁止去船尾的命令不脛而走。越来越多的人从好奇转而愤怒起来。其中有些人开始行动了。他们四处寻找通向船尾的途径。结果发现所有的通道都被封闭或者有人把守。中奖者中有一批激进分子，他们设法搞到了枪支。经过一番枪战之后，他们终于占领了报务舱，向文化发展部发出了抗议电报，随后打通了去船尾的道路。但是，他们发现那里竟然空空如也。全书是这样结尾的：文化发展部监察员来到船上向大家道歉，他说：“文

化发展部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船长向部里发去了紧急电报……”大学生拉乌尔打断他的话说：“电报是我们发的。确切地说，是被船员杀害的那个人发出去的。”监察员继续说道：“游船刚一开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海湾，便突然发生了瘟疫。”他解释说，船长采取了措施，强迫大家不要走出各自的船舱；最后他要求大家上水上飞机离开船舱。这一决定刚刚宣布完毕，立刻有人揭露说：“根本没有什么瘟疫伤寒！这是当局在欺骗舆论和群众。”监察员立刻威胁说：“谁这样看问题，谁就准备让警察隔离起来。”同时他还宣布说，谁支持文化发展部的决定，谁就可以拿到赔偿金。有人指出，这是分化瓦解的诡计。监察员和警察马上采取行动，让支持政府决定的人们先上飞机。最后人们都情愿或者不情愿地离开了游船。全书到此结束。

《中奖彩票》的真正主人公是个封闭的小世界，里面有一个集体，由社会各色人等组成。他们是在“彩票”的牵动下来到这个封闭的世界的，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当他们发现这一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便千方百计地要与外界联系。为此，他们进行了斗争并且做出了牺牲。但是最后发现“彩票”是场骗局。作者的创作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要创造一个当代寓言故事。这艘游船就是 20 世纪 50 年代阿根廷社会的缩影。它摆出一副要前进的架势，但是却停泊不动。50~60 年代的阿根廷无论民选政府还是军事独裁政府，都是以“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国策的，而实际上这如同彩票一样，是一种欺骗，诱导群众“向钱看”；与此同时，在文化思想上，政府采取高压政策，限制言论出版自由，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作家。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了迷惘、悲观和孤独的情绪。《中奖彩票》成功地表现了这种精

神状态。比如，梅德拉诺和克劳迪娅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代表。这二人是有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他们都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但是精神上却总是感到彷徨、孤独、空虚和苦闷；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政客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政府官员腐败成风，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社会治安混乱……可是却无力找出矛盾的内在联系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当然，跟着潮流走的也大有人在，克劳迪娅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个争强好胜的中年妇女。她为争取人格独立、不受丈夫的约束而离了婚，她实行自我中心主义：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她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和自我表现意识，本事不大，处处要高人一头，凡是她干的事情就是“天下第一的大业”。其实，她的为人和“学问”都非常庸俗和浅薄，这是金钱驱动和物欲横流下知识分子丧失道德人格的典型人物。

洛佩斯是知识分子中另外一种“迷失自我和人格”的典型。他白天感觉良好，有时甚至骄傲得不得了：工作、生活、爱情样样得意，“老子天下第一”，在事业上有谁能比得“我洛佩斯”。但是，只要一入梦乡，他就梦见老同学、老朋友一个个当了大官，他感到“愤愤然”：“妈妈的，别人可以当部长，我有哪一点比他们差！”不平之余，他又感到自卑和不幸。他之所以总是生活在心理不平衡之中，就是因为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不能准确地给自己“定位”，尤其可悲的是他身上良好教育养成的美德在“沽名钓誉”的“时尚”推动下逐渐丧失殆尽，变成一个毫无思想原则的人。其实他是又一个“人格分裂”和“自我异化”的典型。

冷静思考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人也是有的。他名叫佩西奥，是应朋友之邀来船上旅行的。但他自始至终都是个站在

一旁观察和思考的人物。他喜欢怀疑和思考：“佩西奥很乐意沉湎于这种他称之为艺术或者诗学的怀疑中。他把最广泛地思考每个形势变化当做己任；他不仅思考现状，而且运用丰富的想象力预测未来。”他从根本上怀疑“彩票”组织者的动机，怀疑这种奖励机制，更怀疑船尾是“禁区”的说法。但是，他把游客看成一个整体，用占星术来解释人们的行为。他认为宇宙是个谜，这群游客也是个谜。从玄学的角度说，他是个不可知论者。看到这个人物，令人联想到科塔萨尔崇拜的大作家博尔赫斯。全书是由佩西奥的思考连缀起来的。作者在结尾的《说明》一节里做了如下的解释：“佩西奥投中了目标。”这就是说佩西奥的独白虽然枯燥和神秘难解，但是他的话道出事物的本质：天道运行自有规律！

虚实结合是《中奖彩票》的主要艺术特色。“虚”的部分表现在作者善于营造荒谬、虚幻、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以及描写人物荒唐、怪诞的心理活动和梦境。“实”的部分就是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习惯、男女情事、社交往来和冲破禁区的冒险经历。“虚”和“实”互为里表，相得益彰。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作者始终注意从多个角度刻划人物复杂的性格侧面：既讲述人物的庸俗和卑下心理，也揭示他们在特定情况下的正直、善良、甚至敢于挺身而出、为维护人的尊严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阿根廷的文化传统：永远为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的美好前途而奋斗。这也是《中奖彩票》的亮点之一。

第二节 《跳房子》

1963年，长篇小说《跳房子》问世。这部作品的深刻

思想和奇特的艺术形式在拉丁美洲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

《跳房子》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题为《在那边》，包括第一章到第三十六章。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名叫奥利维拉，原来生活在阿根廷首都中产阶级的圈子里，因为精神苦闷，便来到巴黎寻找精神乐园。女的名叫玛珈，是个乌拉圭姑娘。她来自社会底层，带着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来到法国谋生。通过他和她从相爱、同居到分手的经过，分别介绍了这二人的性格特征。奥利维拉怀疑资本主义社会既定的观念、规范和秩序，但是他终日陷于形而上学的思考和理性分析中，因为找不到答案而苦闷。玛珈心直口快，天性率真，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悟性极好，尤其是她的直觉判断常常为奥利维拉解开疑团。奥利维拉还和几个不同国籍的朋友组织了一个俱乐部，起名为“蛇社”。他们虽然职业和文化养成各异，但是却能在聚会时广泛交换意见。他们涉猎的话题很宽，诸如文学、哲学、宗教、艺术、音乐、社交等等。在这一部分的结尾处，玛珈与奥利维拉分手，儿子病故，她本人下落不明。蛇社解散。奥利维拉在巴黎塞纳河畔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他由于酗酒过度、行为不端被警察抓走。

第二部分题为《在这边》，包括第三十七章至第五十六章。讲述主人公奥利维拉因为怀念祖国又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昔日的好友重逢时又看到了特拉维勒和他的妻子塔丽妲。奥利维拉开始与从前的女朋友赫克里普顿同居，地点就在特拉维勒夫妻的住宅附近。奥利维拉以推销呢料为生，他的女友在一家商店工作。特拉维勒夫妻都在马戏团任职。奥利维拉干不好推销员的工作，特拉维勒便把他介绍到马戏团里干活。后来，二人又一道转入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奥利维拉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就是特拉维勒

的化身。他还发现塔丽妲身上有玛珈的影子。一天奥利维拉在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亲吻了塔丽妲。后来回到自己房间以后，他很后悔，连忙用绳子和水盆布置了几道防线，因为他担心特拉维勒会闯进来报复。悔恨和恐惧弄得他坐卧不安，于是上了窗台，随时准备跳楼。他是不是真的跳下去了，书中没有交代。作者希望读者启动自己的艺术想象力。

第三部分题为《在其他地方》，包括第五十七章至第一百五十五章。这部分也称之为《可以放弃阅读的各章》。其中既有对前五十六章的补充，也有从报刊、杂志、文学和哲学作品上剪下来的引文；此外还有奥利维拉的自我剖析和一个名叫莫莱里的人物的“思考”。这个人物对文学创作和人类生存状况都发表了一些看法。实际上，他是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理论代言人。以上是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梳理出来的顺序。

实际上，这部小说的结构和阅读方法是非常奇特的。一开头，它就给出了一个《导读表》：“根据结构和读法，本书包括多部书但主要包括两部。第一部，可以按照通常的方法去读，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这一章的末尾印有三个明显的星号，等于是‘终止’二字。因此读者可以毫不后悔地放弃阅读以后的各章。第二部，从第七十三章开始阅读，然后按照每章结尾处所指出的次序继续阅读下去。如果搞混了，或者忘记了，可查阅下表：73—1—2—116—3—84—4—71—5……”《跳房子》是一种“爆炸性”的“反小说”文体，它针对西方文明空洞的辩证法和理性主义的传统提出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法；它雄心勃勃，勇敢无畏。作者表达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明确反对传统的文学语言，记录了主人公不同寻常的精神历险过程。科塔萨尔的这一结构设计，犹如一位站

在深水里的渔夫，他撒下了几千张渔网，掌握着种种捕鱼的手段，但是他性格暴躁，心里充满矛盾，时而高兴，时而忧愁，有时又说出荒唐的话；他一方面显得非常幽默，时常冒出许多玩笑；另外一方面又十分严肃，滔滔不绝地讲出不少令人望而生畏的文学道理来。但是无论他性格怎样变化，他设计这一结构是有其艺术追求的。根据初步研究，他的艺术追求至少三个方面：打破传统小说的外表连贯性，追求结构的破碎形式；打破传统小说的封闭性，追求开放性；希望读者参加《跳房子》的建设工作。前面两个“追求”可以通过分析作品的结构找到明白无误的证据，后一个“追求”需要加以说明。科塔萨尔通过他的文学理论代言人莫莱里的阐释，道出了他对读者的希望：不要像传统小说那样总是让读者处于被动的接受状态，而是邀请读者主动参加到作品中来，与读者一道“合谋”创作小说。他的理论基础是“接受美学”，该理论出现于 20 世纪 60 年代，其创始人是德国的姚斯（Hans Robert Jauss, 1921 ~ ）、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 ~ ）等人，他们认为文学活动是作家、作品、读者三个环节的动态过程，作品的价值和地位是作家的创作意识与读者的接受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学作品用的是“描写性语言”，包含许多“意义不确定性”与“意义空白”，它们构成作品的“召唤结构”，召唤读者以“期待视界”去发挥想象力进行再创造。关于作家、作品、读者的关系，墨西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是这样说的：“通过读者的种种阐释，作品得以长存。实际上，这些阐释就是复活作品的药方：如果没有读者的阐释，也就不会有作品的存在。”（引自《信仰的种种陷阱》序言）。胡里奥·科塔萨尔在《跳房子》里始终遵循接受美学的原

则，在作品的结构、语言和一些具体技巧的运用上都时刻关注着读者，邀请读者、激发读者成为他的“合谋者”。他在小说的第三部分还比较详细地探讨了这一理论，作者的文学理论代言人莫莱里说：“通常说来，小说家都希望读者理解自己，分享自己的生活体验，获得某种信息，并使之变为自己东西。浪漫主义作家希望通过作品中的人物使自己了解自己；古典主义作家则希望通过训诫他人、在历史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即让读者成为同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作者同步，因为阅读这样的作品就会把读者的时间取消，然后转移到作者的时间里去。这样，读者最后就会在作者的经历上，在同一时刻，以同一方式，与作者同甘共苦……”莫莱里随后更加明确地说：“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读者。”他要与读者交流思想。作品向读者开放的这种结构是为这样的思想服务的：“《跳房子》差不多是我在巴黎的十年生活和在那以前岁月的总结。在书中，我做了当时我所能做的最深入的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讲出哲学家们用形而上的方法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重大的质询，重大的疑问。”这个疑问的核心就是：何谓人和现实的真实性的。胡里奥·科塔萨尔是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

“《跳房子》主人公的中心问题在于他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神奇的现实观，在这一点上，我跟他一样。神奇的意思在于他认为日常现实掩盖着一个第二个现实，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超出现实范围的，更不是神学意义的，而是深刻的人性的；但是由于历史的一系列偏差，这第二个现实被掩盖在一个由几千年文化制成第一现实的下面，而在这几千年的文化里面虽然有许多珍贵的东西，但是也有更深刻的错误和歪曲。”因此，他试图通过创作《跳房子》来挖掘第二个现实

的深刻层面。值得注意的是，科塔萨尔对第一现实的态度常常是幽默戏谑的。这是对“最严肃的东西”的一种挑战。它表明科塔萨尔对第一现实的反叛态度，同时也说明了他的苦恼和无奈。

《跳房子》问世后，在西方文坛引起强烈反响，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有些评论家称之为拉丁美洲文学中的《尤利西斯》。有些评论家认为《跳房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作家中关于情感和思想的百科全书”。无论何种说法，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跳房子》为拉丁美洲“新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十四章

加西亚·马尔克斯 的小说

在当代拉丁美洲小说的创作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82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其作品引起了世界文坛的广泛注意。1982年10月12日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确是一位才华横溢、技巧娴熟、章法严谨的语言大师。”凡是阅读过他一系列作品的人都会认同上述评价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全名是加夫列尔·何塞·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García Márquez）。他于1927年3月6日（星期天）清晨8时30分出生在哥伦比亚濒邻加勒比海的马格达莱纳省的小镇阿拉卡塔卡的一座香蕉园里。从两岁起，加西亚·马尔克斯就由外祖父母来照看了。这两位老人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在外孙出生时是个退伍上校，正赋闲在

家。外祖母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这二人都成为他们外孙创作的世界名著《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原型。加西亚·马尔克斯 8 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外祖母家里。两位老人经常给这个宝贝外孙讲故事和神话传说。这引发了他对文学的爱好。特别是外祖父高大的形象、倔强善良的性格以及香蕉园旖旎动人的风光以及他出生的“大屋”都给幼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童年生活的经历为基础的。多年以后，他对友人说：“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或真或假地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梦见我仍然生活在那里……没有年龄，没有原因，仿佛压根儿没有离开‘大屋’似的。”1952 年 3 月初，他随母亲去阿拉卡塔卡镇，准备出售他诞生于斯的外祖父母的宅院。这次故乡之行，正像他多年之后说的那样，也许是他文学生涯中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旅途中，他询问母亲有关家乡的一切：外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来到阿拉卡塔卡的？1908 年 10 月 19 日外祖父决斗中杀死的那个人是谁？外祖母家中有什么人？她是怎么和外祖父认识、结婚和建立家庭的？等等。母亲的回答为他的艺术想象力插上了翅膀。他一面继续搜集资料一面构思围绕家乡题材的一部部作品。加西亚·马尔克斯亲身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他文学创作的又一源泉。首先，通过阅读把他领进文学世界的是他的小学老师罗莎·埃莱娜·弗格森小姐，她既是校长，又是老师；既教语文，也教数学，甚至音乐和体操。她帮助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同学们认识了许多文学大师。当他第一次看到《天方夜谭》的时候，一系列神奇的故事让联想到外祖母讲述的神话传说完全是可信的。1940 年，加西亚·马

尔克斯进入一所教会学校读中学，为校刊《青年》撰写报道和诗歌。1943年1月，离家前往首都波哥大，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争取奖学金全国考试。获得奖学金后，进入锡帕基腊市国立男子中学。在文学教师卡洛斯·胡利奥·埃米达的指导和帮助下，广泛阅读文学书籍，其中，西班牙“黄金世纪”的作品以及哥伦比亚先锋派诗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甚大。他参加了该校十三人文学小组的活动。1944年3月，先锋派诗歌运动的组织“石头与天空”的成员卡洛斯·马丁担任了男子中学的校长。他与十三人小组一道组织了许多文学沙龙的活动。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无法摆脱的精神变态》。1947年2月25日开始就读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法律系。4月15日外祖母逝世。8月，第一次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受启发，开始大量阅读小说。随后，他创作了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9月13日发表在《观察家报》文化副刊上。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读者反应很好，作者备受鼓舞。10月25日他的又一个短篇小说《夏娃钻进猫肚里》同样发表在副刊上。评论家萨拉梅亚·博尔达说：“一位优秀的作家诞生了。”1948年4月9日自由党左派领袖、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遇刺身亡，史称“波哥大事件”，从此引发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暴力冲突。盖坦曾经多次谴责保守党政府对工人罢工的残酷镇压，谴责美国果品公司对哥伦比亚农业工人的剥削和压迫，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对哥伦比亚内政的干涉，因此他在工人群众和进步的大学生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深受影响。这在《百年孤独》中都有表现。1948年底，他试图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但是感到力不从心，暂时罢手。开始写中

篇小说《枯枝败叶》。1950年在故乡巴兰基亚市《先驱报》工作。完成《枯枝败叶》的第三稿。同时，创作一系列与家乡有关系的短篇小说。1952年3月，和母亲一道回阿拉卡塔卡镇变卖外祖父的宅院。随后在家乡周围搜集历史和民俗的资料，为文学创作做更深入的准备工作。这一年在阅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后感到很受启发。1954年，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首都波哥大，在《观察家报》任职，写专栏文章和影评。7月，《周末后的一天》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通讯《安蒂奥基亚省灾难的始末及总结》、《我的历险纪实》等使他成为颇有知名度的记者。1955年5月，《枯枝败叶》四易其稿后，在波哥大出版。7月，被《观察家报》派往欧洲，做长驻记者。曾访问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欧洲国家。1956年，《观察家报》被独裁政府查封。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九易其稿，第二年完成。1957年访问苏联。1958年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时刻》杂志社工作。1月23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目睹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内斯出逃国外。3月21日与梅塞德斯·巴尔恰·帕尔多完婚。1959年为古巴革命政府的拉丁美洲通讯社驻波哥大分社工作。1961年在墨西哥定居。阅读了墨西哥著名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帕拉莫》和短篇小说集《平原烈火》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小说的时间、空间、结构和叙事视角的变化方面尤甚。《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的作者哥伦比亚的作家达索·萨尔迪瓦尔是这样记录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佩德罗·帕拉莫》的情景的：“当天夜里他看完了两遍《佩德罗·帕拉莫》才睡觉，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

捧起了《平原烈火》。加西亚·马尔克斯喜欢上了胡安·鲁尔福，喜欢得如痴如狂，能背诵书上的话，谁想听就背给谁听。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年的年底，他什么书也读不进去，觉得其他一切书籍都等而下之。” 196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恶时辰》获得美国埃索小说奖。同年，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出版。1962年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问世。1963年他与墨西哥著名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合作改编《佩德罗·帕拉莫》为电影剧本。1964年为一家电影公司写电影剧本，发现“电影的艺术容量远不如小说”。1965年7月开始集中全力创作长篇小说《百年孤独》，把十七年来积累的素材进行艺术加工。经过十四个月的奋战，终于在1966年11月完成。1967年5月30日，《百年孤独》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美洲出版社出版，立刻引起轰动。第一次印刷8000册，在不到两周内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10000册，很快又销售一空。9月初。第三次印刷之后，出版社忙乱得一塌糊涂：印刷纸张和油墨全部用光，可是从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等邻国的定单如雪片一般地飞来。三年内，仅在西班牙语国家就销售了60万册；八年销售了200万册。短短几个月之后，就有法国、意大利、英国、丹麦、芬兰、瑞士、挪威、荷兰、苏联、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日本、葡萄牙和巴西翻译、出版了《百年孤独》。1967年8月1日，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出席第十三届国际拉丁美洲文学大会。在“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仪式上结识了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会后，二人前往秘鲁首都利马。9月5日，两位作家在国立工程大学进行了“拉丁美洲小说二人

谈”的对话，反响强烈。1969年，《百年孤独》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获得“最佳外国小说奖”。1970年抗议古巴政府关押持不同政见的作家。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72年短篇小说集《纯真的埃伦蒂拉与残忍的祖母》出版。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抗议书上签字。1974年由他编剧的电影《预兆》获得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一等奖；获得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75年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问世，是拉丁美洲反独裁统治的小说中又一部力作。1976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宣布“文学罢工”，以抗议智利军事独裁政府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活动。1977年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新闻工作者奖。同年，发表文章，坚决支持拉丁美洲民主革命运动。1978年与智利流亡艺术家米盖尔·利丁合作改编小说《蒙铁尔寡妇》搬上银幕。1979年发表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尼加拉瓜的战争》，支持桑地诺民族解放运动。同年，当选为拉丁美洲人权组织基金会主席。1980年重返哥伦比亚《观察家报》工作。他编剧的电影《我亲爱的玛丽亚》获得卡塔赫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81年哥伦比亚反动政府认定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古巴间谍”和支持哥伦比亚武装组织“M—19”运动的“后台”，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加西亚·马尔克斯向墨西哥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同年，回到墨西哥并接受法国政府授予的勋章。1982年接受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应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出任法国—西语国家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墨西哥政府授予他国家最高级勋章：“阿兹特克神鹰”。1984年创作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次年在西班牙、墨西哥、阿

根廷等二十多个国家同时出版发行。1986 年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由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哥伦比亚电影工作者联合摄制成功。同年，发表揭露智利独裁政权迫害民主人士的报告文学《米格尔·利丁历险记》。1987 年《百年孤独》的片断《俏姑娘》搬上银幕。1988 年在墨西哥创作长篇小说《迷宫中的将军》，次年出版发行。1990 年访问日本、中国和俄罗斯。1991 年访问欧洲。1992 年短篇小说集《十二篇异国旅行的故事》出版。1993 年创作中篇小说《爱情和其他的魔鬼》，次年出版。在这两年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走私和贩卖毒品的宣言上签名。1995 年开始创作长篇报告文学《绑架的消息》。1996 年 4 月 23 日在西班牙出席《绑架的消息》的首发式。1997 年开始写回忆录。同年，参加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和墨西哥总统联合召开的西语世界文化大会。1998 年创作长篇小说《我们相会在八月》，讲述一个 52 岁的女人 23 年的婚姻史；次年，在西班牙出版。2000 年访问古巴，关注在美国的古巴难民问题。2001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录》（第一卷）出版。

下面分别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几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百年孤独》、《家长的没落》、《霍乱时期的爱情》和《迷宫中的将军》。

第一节 几部重要的中、短篇小说

《枯枝败叶》

中篇小说《枯枝败叶》开始创作于 1948 年，完稿于

1955年，四易其稿。1955年底出版。作品一开头就给出了这样的历史背景：“蓦地，香蕉公司好似一阵旋风刮到这里，在小镇中心扎下根来。尾随其后的是‘枯枝败叶’，一堆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的、喧嚣的‘枯枝败叶’。”这里所说的“香蕉公司”就是指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该公司于1899年成立，主要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营果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其中香蕉为大宗生意；20世纪20年代由于铁路的修建和冷冻技术的应用，该公司大量组织种植和收购香蕉。但是到了1928年，由于飓风和病虫害的打击，香蕉种植业一落千丈，给上述种植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留下了一堆堆“枯枝败叶”：破败的物质废墟和堕落的精神、道德面貌。

《枯枝败叶》的舞台选在了马孔多。关于这个地名的解释，作者后来说“是在火车上看到一个庄园的名字”。

“马孔多”本身是一种热带植物。书中的人物很多，但是担任叙述角色的是三个人：“我”、“妈妈”和“外祖父”。作品一开始由“我”来叙述跟着妈妈和外祖父去停尸间看死尸。“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带他来这种地方。接着，

“我”看到了死尸：“原来死人光着头，脑袋青青的，下巴上系着一条围巾。嘴巴略微张开，紫里透青的嘴唇后面露着带黑斑的、参差不齐的牙齿。舌头朝一边耷拉着，又肥大又软和，比脸的颜色还要暗淡，跟用麻绳勒紧的手指头的颜色一样。死人瞪着眼睛，比普通人的大得多，目光显得又焦躁又茫然。皮肤好似湿土。我本来以为死人看上去应该好像普通人在静静地睡觉。现在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这个死人仿佛刚刚吵过架、怒气冲冲、完全清醒的活人。”死者是个医生。是“妈妈”拉着“我”，跟“外祖父”一道来给医生

送葬的。“我”原来并不知道这里还有人居住，以为是座空房子呢。现在“我”知道了这里曾经住过一位医生。可他又明白了：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参加葬礼呢？到这里来的只有外祖父、妈妈和给外祖父干活的四个印第安乡巴佬。“我”不想看死尸，可是好奇心总是顽强地迫使“我”的目光转向那死人。“我”发现：“放进棺材以后，他舒坦多了，平静多了。他那张脸本来像刚刚吵完架、清醒而生动的面孔，这会儿，显得心平气和了。从侧面看，他挺和蔼的。可能是躺在棺材里，他觉得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方。”接着，作品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让“妈妈”说话：“真不该带孩子来。这种场面对他很不相宜。就拿像我这样快三十岁的人来说，面对这尸体装殓的压抑气氛，我也感到很不得劲。”“妈妈”是被“外祖父”拉来的。原来这位医生十七年来和村里人断绝了一切来往，可谓“恩绝义断”。现在医生死了，村里个个幸灾乐祸，哪里肯来送葬呢！只有“外祖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来给医生收殓尸体和下葬。因此，“妈妈”担心她拉着儿子又陪着老父亲三人跟在棺材后面走在村里的街道上会显得非常尴尬，会惹来嘲笑和闲言碎语。通过“妈妈”的独白，读者方才知医生来到这里已经二十五年了。在最初的八年里，医生得罪了许多人，甚至逼走了爱他的女人梅梅。后来的十七年，他生活在孤寂之中。现在，他终于抵抗不住精神上的压抑，上吊自杀了！

接下来，作者通过“外祖父”的独白告诉读者：这位老上校是如何来对付前来验尸的镇长和警察的：“镇长直起腰来，敞着怀，满身大汗，面部表情怪模怪样。他走过来对我说：‘这人还没有发臭，很难断定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法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

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心里大概在想：‘现在你们不能说我眼里没有法律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叫他明白我看透了他思想深处在想些什么。我说：‘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他好像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回答说：‘上校，您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有我的职责。’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印把子在您手里。您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就行了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顿地说：‘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做滥用职权。’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虽然他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是一点也不糊涂。”就这样，通过祖孙三代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读者可以抓住作品一开头就出现的一个关键人物：医生。他因为十年前一场动乱中村里有人受伤而他拒绝治疗引起了众怒：“门外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情绪竟然变成了一种病毒，人人受到了感染。在医生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座房子里腐烂发臭吧！”上校在给医生收尸的过程中明白一个道理：“真犯不上跟全镇的居民顶牛，多余管这档子闲事。现在我惹得天怒人怨了。仇恨难消的人们恶狠狠地盯着我。就连教会也千方百计地反对我的主意。刚才神甫对我说：‘我不能答应把一个六十年来不信上帝、最后悬梁自尽的人安葬在教堂的公墓里。您要是不管这件事情，上帝一定会保佑您。这可不是行善积德，而是违抗天意的罪孽。’”

接着，通过“妈妈”的第一人称叙述，作品从医生之死引出梅梅这个人物来。梅梅是个印第安妇女：“我最后一次看见她，是在十一年前。那时她在这里开了一家小药店。对

街坊四邻总是有求必应，不知不觉地草药店变成了杂货铺。梅梅手脚勤快，持家有方，铺子里井井有条，货物一应俱全。”“她总是保持着印第安妇女特有的亲切神情，既落落大方，又含而不露，既纯真朴实，又有保留和防范。”起初，梅梅是在上校家里做保姆的，后来医生来了，最初也居住在上校家里。医生拼命追求梅梅，两次让她怀了孕，又两次强迫她堕胎。最后竟然被上校逐出家门，另外找了房子居住。医生和梅梅同居了六年，但是经常虐待她。最后，逼得梅梅离开他出走了。村里人对梅梅的失踪感到大惑不解。有传言说，是医生杀死了梅梅。人们愤怒地冲进医生的住宅，挖地三尺，寻找梅梅。但是，没有任何结果，她的失踪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团。通过“妈妈”的第一人称叙述，读者知道是梅梅告诉“妈妈”的家世是这样的：内战期间，上校带着妻子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来到了马孔多。那时的马孔多是个只有很少几户居民的小小村落：“马孔多是块宝地，是和平之乡，是人间乐园。”上校和妻子找到这个合适的栖身之地，便开始了建设家园的劳动。“过了没几年，他们盖起来一座庄园，有三个马厩和两处客房。”后来，上校的妻子生下女儿过后就死了。上校绝望极了，经常想念妻子，为了可以想象妻子的身影，“他在庭院靠近墙根的地方栽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上校续了弦，女儿伊莎贝尔（也就是后来的“妈妈”）也有了继母阿黛莱达。

接着是上校（也就是“外祖父”）的回忆。他回想起那一年神甫（绰号“小狗”）和医生同时进村的情况：“梅梅进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化验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上校那时正在吃饭，于是让阿黛莱达先去接待一下。他妻子暂时放下上校的女儿、五岁的伊莎贝尔，到办公

室去了。不大一会儿，她回来告诉上校：“他在办公室里兜圈子呢。”原来，那个外乡人对书架上的一个玩具“娃娃”发生了兴趣，所以不肯到饭厅里来。可是，阿黛莱达发现这个外乡人很像一个人，甚至：“就是那个人！”所以赶忙回来告诉丈夫。至于究竟是什么人呢？她没有说清楚。

接下来，插入了一小段“我”的回忆：跟一个名叫亚伯拉罕的小朋友去河边玩耍的情况。随后又是上校（外祖父）的回忆：那个外乡人带来一封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信。阿黛莱达以为这个外乡人是位高级军官，便设宴盛情款待：“餐桌上光彩夺目，铺着新台布，盛菜的盘碗是专供圣诞节和除夕夜家宴使用的中国瓷器。”“餐桌上的布置、家具、饭厅里的气氛都给人一种庄严、美观和整洁的感觉。走进饭厅时，医生一定会感到如此不修边幅实在自惭形秽，会感到与周围气氛很不协调。他摸了摸领口，仿佛打着领带似的；走起路来，脚步很重，磕磕绊绊。看得出来，他有些慌乱。我一生中记得最清楚的莫过于他走进饭厅一刹那间的情景。”但是，更让上校记忆深刻的是：这位医生竟然请梅梅用青草煮一锅汤。他特别声明：“普通的草。就是驴吃的草。”饭后，上校邀请医生在家里住下来：“就住在我们家里。就住在走廊上临街的那间屋里。我看这样比较合适。像他这种性子的人，在镇上的小旅店里面是没法住下去的。他在门上贴了一张广告。过了一个礼拜，登门求医的人纷至沓来。”

随后，作品又转回到“外祖父”、“妈妈”和“我”准备给医生送葬的场面上来了。先是“妈妈”的回忆：“我本来希望镇长能够横下一条心，不许给大夫下葬。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孩子就可以去上学了；爸爸就可以换上木

屐，倒些冰镇柠檬的凉水，洗洗脑袋了。然而，情况变了。起初，我以为镇长决定的事情是无法通融的。可是，爸爸又一次以雄辩的口才说服镇长收回了成命。”接着是“我”回忆：“棺材盖上了，可是我还记得死者的面孔，记得非常清楚。”“外祖父在妈妈身旁坐下来。刚才从隔壁房间回来的时候，他挪过来一把椅子。现在，他坐在妈妈身边，一声不吭，在等待着什么。妈妈和他一样也在等待着什么。”父亲和女儿在等待着什么呢？原来，他们是在等待着镇长的到来。“我”当时并不知道“外祖父”和“妈妈”在等待什么，随即，便想起自己特别敏感的嗅觉来：“家里没有一种气味是我不熟悉的。有时候，家里人把我丢在走廊上，我闭上眼睛，伸出双手，向前走去。我心里想：一闻见加樟脑精的甘蔗酒香味，那就是到了我外祖父的房间。再闭着眼睛继续前进，我闻到了新纸牌的气味、沥青和卫生球的气味，那就是妈妈的房间了。”到了晚上，“我”还闻到了茉莉花香。阿黛莱达外祖母告诉“我”：“九年前，你出生的时候，靠院子墙根那里有一棵茉莉。到晚上，天一热就闻得出这股香味儿。”后来，外祖母又告诉“我”：“茉莉花和人一样，死了以后夜间就出来游荡。”这就让读者联想起来上校为纪念亡妻而栽种的那棵茉莉。

随后，是上校的回忆：医生在他家一下子住了四年。起初，镇上只有这么一位医生，所以来求诊的病人很多。但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来到了马孔多，搞起来“香蕉热”，修了铁路，开办了医院。四年来找医生看病的人们都不来了。“他眼瞅着‘枯枝败叶’踩出了新路，但是没有吭气。他依然敞开临街的大门，成天坐在皮椅上，望着人们来来往往，可就是没有人看病。后来，他上了门闩，挂起吊床，躲

在房间里，不再露面了。”阿黛莱达瞅着这个吃闲饭的家伙很不高兴。上校出于“怜悯、敬佩和同情的复杂心理”固执地说：“还是得养活他。他在世上无亲无故，需要大家体谅他。”过了不久，铁路通车了。马孔多变成了一个繁华的集镇。来了不少陌生人，盖起了一家电影院和许多娱乐场所。那一阵子，人人有活干。惟独医生闲着没事情。后来，镇长要对自由职业者进行登记。医生拿不出合法的行医执照，索性就不出门了。医生在上校家居住了五年，可是上校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知道。

接着是“妈妈”（伊莎贝尔，上校的女儿）的回忆：她那时十七岁，已经订婚，未婚夫叫马丁。“我的未婚夫是个飘飘忽忽的人。我只记得他那模糊不清、捉摸不定的形象，惟一具体的东西大约就是那撇亮闪闪的小胡子，略向左偏的脑袋和从不离身、有四个纽扣的外套。”结婚两年以后，上校帮助马丁安排了一次旅行。从此这位女婿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已经过去九年了。马丁依然毫无音信。

随后是上校（外祖父）的回忆：他发现医生常常往理发馆跑。镇上的人们都说医生在追求理发馆老板的女儿。上校怀疑这传言的真实性。没有多久上校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医生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他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傲，坚毅，说到做到；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要摆脱过去的他。”后来，上校发现医生的变化越来越大：“他穿得越来越讲究，穿带假领的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粗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

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他仿佛一个在情场上屡屡失意的恋人。”

接着是“妈妈”（伊莎贝尔）的回忆：医生终于离开了上校的家。四年后，伊莎贝尔准备和马丁结婚。她希望和马丁居住在原来医生住过的那间临街的风子里。但是，她的继母阿黛莱达反对：“不行！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随后，继母说起来医生的古怪脾气：“五年前，他还住在这里的时候，整天像个牲口似地关在屋里。不仅如此，他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牯牛一样。”继母还说，那时人们都以为医生在追求理发馆老板的女儿。可是，医生突然又不去理发馆了。恰恰就是他最后一次去理发馆的那个下午，上校家的女佣梅梅在给大家端饭菜的时候病倒在地。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梅梅抬到床上去。上校急忙请医生给梅梅看病。可是医生死活不肯。两天以后，医生从上校家里搬走了。不久，梅梅就和医生同居了。原来梅梅已经怀上了她和医生的孩子。而最后成全了这对男女的恰恰是宽宏大量、慷慨大方、事事体贴别人的上校。

伊莎贝尔继续回忆说：“马丁回来后过了两天，爸爸把继母叫到办公室里，告诉她礼拜一举行婚礼。那天是礼拜六。我的衣服已经做好了。马丁每天都呆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吃饭的时候，爸爸再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我以前不了解我的未婚夫。我压根儿没和他单独在一起呆过。马丁和爸爸倒像是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爸爸一谈起马丁来，好像要同马丁结婚的是他，而不是我。”“婚期临近了，然而我一点也不激动。我的周围还是笼罩着一团淡灰色的雾气。在朦胧的气氛中，马丁显得虚飘飘的……”“礼拜天晚上，我在继母的卧室里穿上新嫁衣。从镜子里我看到自己面色十分苍

白，周围是一片茫茫的迷雾，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妈妈的幽灵。”作者刻意描写这一“朦胧”、“缥缈”的气氛，是别具匠心的：努力提示人物的感觉和精神状态。

上校和医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上校看着医生那忧郁、孤寂的表情，想到医生那寂寞的生活，对生活麻木不仁的态度。上校感到自己有责任保护医生，因为他可以体会到医生居住在那黑暗的小屋中肯定会感到苦恼和郁闷。上校明白这是社会环境把医生压迫得如此郁郁寡欢和活得如此窘迫；他仿佛猜到了医生为什么会生活得如此孤独。二人谈到了是不是有上帝的问题，谈到了幽灵是不是存在。通过谈话，上校发现医生因为没有信仰，所以活得非常孤独。从这里，上校想起了马孔多过节的时候，人们发狂地焚烧纸币；想起了到处流浪、目空一切的“枯枝败叶”，在泥塘里浑浑噩噩、滚来滚去的“枯枝败叶”，还有那些终日做梦过豪华生活的“枯枝败叶”。“十年前，在马孔多陷于破产的时候，那些希望重整家业的人，如果能够通力合作，本来满可以恢复元气。他们可以在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毁掉的田野上，清除丛生的杂草，重整旗鼓再干一番。可是，‘枯枝败叶’没有这份耐性。他们不相信过去，也不相信未来，只看到眼皮底下，光图今朝有酒今朝醉。”

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枯枝败叶》表达的主题思想就是马孔多人的孤独、封闭的心境，而一旦有外部的经济“热”袭来的时候，这种狭隘心态就变得混乱起来：惊慌失措的有之，随波逐流的人有之，投机取巧的人有之，顽固抵抗的人有之，退避三舍的人有之……活脱脱热锅上的蚂蚁们的众生相跃然纸上，生动地描绘出马孔多人性格中各个复杂的侧面来。这部作品里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出现在《百年孤

独》之中，说明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逐渐形成了他的“马孔多情结”：一定要把家乡的故事说出来，因为家乡给了他许多激情和思考，也给他提出了从“家乡问题”升发开来的民族命运问题：国家不发达，民族得不到解放的症结究竟何在！

但是，《枯枝败叶》毕竟是文学作品，是一部中篇小说而已。它的文学特征决定了作品的生命：必须讲究形式，讲究叙事风格，讲究故事动人和语言流畅。加西亚·马尔克斯四易其稿的原因主要在于追求一种新颖的艺术风格，要搞一场小说叙事艺术的革命。根据《加西亚·马尔克斯传》的作者达索·萨尔迪瓦的说法，“看过《枯枝败叶》的朋友毫不怀疑它会被出版社选中和采用，因为它虽然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不完善的一部小说，可在当时的哥伦比亚及拉丁美洲小说界，这一按照作者童年回忆，并且混合运用福克纳和弗吉尼亚·吴尔夫的技巧来展开一个索福克勒斯式的主题的作品，完全是革命性的。”（引自 2001 年 1 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萨尔迪瓦著，卞双成、胡真才译，第 207 页）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1956 年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来说，是他一生中最穷困的一年：派遣他到巴黎做长驻记者的《观察家报》被哥伦比亚的军事独裁政权给查封了。报社不能再给他按时寄支票了。起初，他还没有发愁，因为还有些积蓄。再说，他本来就打算在法国尽量多逗留一些时间，好把那些一拖再拖的小说写完。这一年 4 月底，报社给他寄来了回国的飞机票。为

了继续写作，他把飞机票退了，用退票款维持生活。1956年春天，一部以反独裁统治为题的小说《恶时辰》完成了初稿。这时，一个退伍上校的形象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里，这可能与他自己的处境有密切关系：时时刻刻等待着来自政府的经济接济，这种心境让他联想起许多在内战中建功立业之后的退伍军人，这些老人是靠领取养老金生活的，而动荡的政局使得养老金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这个退伍上校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外祖父的经历同样也是故乡阿拉卡塔卡镇许多退伍军官的经历。这些老人的悲惨境遇是相同的：都在苦苦等待着政府发放养老金。加西亚·马尔克斯小时候每到星期四一定要陪同外祖父去一趟邮局看看汇款是否已经来到。那时，他觉得外祖父“傻”得可笑，因此当《恶时辰》完稿后他开始动笔写《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以为可以写成“喜剧”，但是当他的积蓄花光、囊中羞涩得付不起房租时，他的心情变得恶劣起来。他连连向新朋友写信求救，可是汇款迟迟不来。心急如焚的他，这时才真正理解了老军人们在等待中忍受的煎熬。他自己写的故事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眼前残酷的现实。于是，他决定写一出“悲剧”。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开篇就直截了当地描写上校生活的窘迫状况：“上校打开咖啡盒，发现果然只剩下一小勺咖啡了。”作者巧妙地使用了“果然”二字，说明了上校是早就心里有数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是，再艰难也得活下去啊！他用小刀把咖啡盒刮了又刮，最后把“混有铁锈的咖啡末刮下来倒进锅里，方才住手”。他在用土坯砌成的炉灶旁边等着咖啡煮开，“神态天真而又自负”。人穷志不穷！精神不能垮！尊严不能丢！从上次内战结束以来已经

过去 56 年了，“上校除了等待，没有做过别的事情。”他在等待什么？等待着政府寄来养老金。咖啡煮好了。他端着咖啡走进卧室，撩起了蚊帐，送到犯了哮喘病的妻子跟前。妻子坐起来，接住了咖啡杯子，顺便问他：“你喝了没有？”上校骗她说，喝过了，还剩下一大勺呢。这时，村里响起丧钟来：有人死了，钟声召唤人们去给死者送葬。死者生于 1922 年 4 月 7 日。两位老人本来有个儿子，名叫阿古斯丁，生于 1922 年 3 月 7 日，也早已经去世了。妻子在思念死者和儿子，她说：“那人大概已经见到阿古斯丁了。也许他不会告诉阿古斯丁我们现在的处境吧。”上校说：“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正在为公鸡而争执不休呢。”上校的猜测是有根据的：村里有斗鸡的习俗。接着，上校郑重其事地打扮起来：换衣服，刮脸，梳头，找雨伞（因为正在下雨）。但是，“裤子小得像衬裤一样”、“假领已经破烂不堪”、“由于好久以来没有镜子，上校使用手摸索着刮完了脸”、“绸伞套也已经被蛀虫咬得千疮百孔了”、“上校试图用一把牛角梳理一理灰白、坚硬得如同猪鬃一样的头发。”可是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济于事。打扮好以后，上校出了家门，去给死者送葬。死者是位音乐家，在村里很有威信。上校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遗体面前，他觉得死者没有死。忽然，人群乱动起来，大家抬着棺材，上了大街，吹鼓手们演奏着哀乐。但是，送葬的队伍没有走出多远就被镇长拦住了去路。原因是国家正处在戒严时期，不允许队伍从警察局门前走过。队伍绕了一个圈子，终于安葬了死者。在回家的路上，由于没有穿丧服，上校感到非常难过。隔了一会儿，他又从家里走出来，到街角上一家商店里买了盒咖啡和喂公鸡的玉米。这一天是 10 月的一个礼拜四。雨不停地下着。上

校觉得自己的内脏“好像撕裂了”。患哮喘病的妻子呼吸也变得更加急促了。可是，上校还要喂好这只公鸡，因为这是儿子的遗产，儿子在九个月以前由于散发地下刊物，在斗鸡场上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了。伤心的父母看着这只公鸡，指望到了 1 月份斗鸡的日子卖个好价钱。

星期五到了。这是邮船来到港口的日子。上校急忙向港口走去。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邮船靠岸。他发现了船顶上的邮包，邮包系在排气管上，上面覆盖着一层油布。十五年的等待使上校的直观感觉变得敏锐了”。与此同时，上校心里也还在惦记着那只公鸡。“从邮差登上船到把那邮包解下来背在背上，上校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邮差。”上校跟着邮差进了邮局，恼火地望着邮差慢条斯理地分发着信件，一面紧张地凝视着邮差的动作：看看有没有信件放入自己的信箱里。最后，邮差望着上校说：“什么都没有。”上校不由得感到一阵羞愧。他撒谎说：“我什么也不等。没有人给我写信。”他和镇上的医生一路回家。医生订了报纸。上校问他有什么消息。医生回答说：“在新闻检查允许公布的东西中，要从字里行间看出点名堂可难了。”上校本指望通过选举改变现状。医生告诉他：“上校，别天真了。咱们已经是大人了，用不着等待救世主。”医生要上校把报纸带回家仔细阅读，第二天再还给他。上校回到家中，看完报纸，没有发现任何退伍养老金的消息，夜里，上校感到不舒服，好像发烧说起胡话来。第二天他醒来，妻子问他梦见了什么。他说梦见了内战中的一位英国人：“他曾经化装成老虎出现在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营里。他是玛尔博劳公爵。”起床后，他去大便，感到消化系统隐隐作疼。他自言自语地说：“10 月份我总是这样。他又摆出那自负又天真的

神态 直到内脏的不适缓和下来 然后才回卧室去看公鸡。

上校的妻子病了一星期之后恢复了健康。医生来给她做身体检查，结果正常。上校非常感谢医生，问医生要多少出诊费。医生回答说：“眼下什么都甭管。等您公鸡斗赢了，我再收您一大笔钱吧。”医生还留给他一些秘密传单，让他了解地下斗争的情况。随后，上校向裁缝铺走去。他要给儿子生前的同志们送去那秘密传单。儿子牺牲以后，上校常常到那里去看看，“那里成了他惟一的避难所”。“除了每个礼拜五盼望邮件以外，他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可是，家里只剩下五角钱了，妻子吩咐丈夫用这点钱去买一磅玉米、一点明天喝的咖啡和四盎司奶酪。上校回答说：“光买玉米就得花四毛二分钱！”最后决定还是买玉米。妻子只要身体健康可以缝缝补补做许多针线活，因此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然而，这样的信心只能持续几个小时，因为除了挂钟和一幅美人画之外，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的。礼拜四晚上，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处境，妻子流露出焦虑不安的心情。上校安慰她说：“别担心！明天就来信了。”第二天，上校来到港口等候邮船。邮差来了。他分发完毕信件之后，医生看到了上校焦急的神情，便问邮差：“上校什么都没有吗？”邮差把邮包背在肩上，走上了人行道，头也不回地答道：“没有人给上校写信！”一个礼拜五，又一个礼拜五。为了这退伍养老金，他已经等待了十五年了。他和妻子商量解决的办法，她建议说：“我提醒你该换律师。”“糟糕的是换律师需要钱。”“用不着。可以写信告诉律师，等领到退伍补助金以后，他们爱扣多少就扣多少。”换掉了律师，事情仍然没有进展。妻子又病倒了。上校只好咬着牙向附近的商店借钱。妻子在大病后认出丈夫时，大吃一惊：

“你瘦得皮包骨头了。”上校回答说：“我正在精心保养，准备把自己卖掉，我已经被一家黑管厂订购了。”实际上，他所以能够坚持活下去，就是因为对来信还抱着一线希望。一个个不眠之夜已经弄垮了他的身体。可是他还得照顾妻子和公鸡。妻子建议卖掉公鸡：“你马上把这只鸡脱手了吧！”上校回答说：“再过三个月就要比赛了。那时候咱们可以卖个更高的价钱。”夫妻二人从斗鸡想起了死去的儿子。但是，在这等待来临的三个月里，二人吃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卖掉挂钟。上校极不情愿地来到了裁缝那里，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儿子生前的一个朋友赫尔曼以为上校是要请人修理挂钟，便自告奋勇请裁缝看了看，然后回答说：“没有什么毛病。如果您愿意的话，我陪您回家把钟挂好。”上校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提出把公鸡送给小伙子们养活。赫尔曼明白了上校的困难处境，答应帮忙照顾那只公鸡。又到了个礼拜五。上校冒着雨去港口等候邮船，路上遇到了儿子的教父唐·萨瓦斯。后者告诉上校那只公鸡可以卖到 900 比索。上校听了大喜过望，他想十五年的养老金的总和也不过如此啊。于是，他连忙跑到港口，直截了当地问邮差是不是有政府给他寄来的航空信：“这封信今天肯定要到我的手里。”邮差回答说：“上校，惟一肯定要到来的是死亡。”上校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在吃玉米渣。她告诉丈夫：“这是小伙子们拿来的鸡饲料。咱们就和鸡一道分享吧！”第二天，妻子借口去一个朋友家里吊唁，到神甫那里借钱。神甫不借，还说什么不能用结婚戒指做抵押。妻子告诉上校，为了不让邻居们笑话，她每天要煮点什么，可是家里一无所有了，只好煮石头！妻子告诉他：“尊严不能当饭吃！”上校告诉她：明天就把公鸡卖掉！“明天我就以

900 比索的价钱把它卖给萨瓦斯。”第二天，上校找到了萨瓦斯。他没有料到这个贪婪的商人把 900 比索降到了 400 比索。他先塞给上校 60 比索，说道：“等卖了鸡咱们再算账。”上校随后遇到了医生，把卖鸡的事情说了一遍。医生告诉上校：萨瓦斯会转手卖到 900 比索的，“他爱钱远远胜过爱自己的性命。”上校想把卖鸡的决定告诉村里的年轻人，结果走到赌场遇到了警察搜捕散发传单的人。上校侥幸脱险。进入 12 月以后，上校的情绪稍稍好了一些。一天，又是一个礼拜五，他到港口去等邮船。他跟着邮差来到了广场上，发现那里人声鼎沸。原来这一天是预定开始训练斗鸡的日子。“他看见自己的公鸡立在斗鸡场的中央，样子孤零零的，毫无自卫能力，金属爪用破布裹着，两条腿在颤抖，显然它有些怯阵了。”上校望着人们热烈而疯狂的样子，“觉得这是一场骗子的把戏”，他冲到场子里，抱起公鸡，不顾人们的拦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家中。妻子迎上来告诉他：“他们硬把鸡带走了。我告诉他们，只要我还活着，鸡就不会离开这个家。可是他们说，就是踩着咱们的尸体也要把鸡带走。他们还说，鸡不是咱们的，而是全镇的。”上校温柔地回答说：“鸡不卖了！”妻子跟着丈夫走进卧室。上校翻箱倒柜，找出 29 个比索，说是要还给萨瓦斯。其余等养老金来了以后再归还。妻子问他：“如果不来呢？”上校口气肯定地说：“会来的。”妻子劝他好好想一想，因为 400 比索不是小数字。上校固执地不卖鸡了，他的理由是：“鸡的主人可以有权获得百分之二十的赌资。”妻子根据历史的教训。不相信什么权利之类的允诺。何况这百分之二十的赌资是在赢的条件下才能拿到。因此，妻子问他：“假如输了怎么办？”上校回答说：“再过 45 天才考虑这个问题

呢。”妻子恼火了。她问丈夫：“可是这段时间里咱们吃什么？”上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 75 年了，他终于感到自己是个纯洁的人，是个直率的人，是个不可战胜的人。于是，愤怒地回答说：“屎！”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塑造了一个退伍上校的高大形象。他曾经为国家转战经年，按照原来政府的许诺，他本来可以过上幸福的晚年。可是政客们总是在欺骗人民。上校也是上当受骗者之一。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上校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他不在贫困面前低头、弯腰；他看不起商人们贪婪的嘴脸；他同情弱者；与妻子相濡以沫。作者在刻画这个人物时，使用了写实、白描、象征等艺术技巧，语言朴实而明快，结构精当，没有任何多余的闲笔。其中善于营造气氛是这部作品中突出的特点，比如，上校去一位亡友家吊唁时，他对死者的母亲说：“他向您表示深切的慰问。”书中是这样描写当时情景的：“死者的母亲没有回头。她张嘴嚎叫了一声。上校禁不住大吃一惊。在一片悲痛欲绝的嚎叫声中，他感到自己被无形的人群向尸体跟前推去，便伸出双手，寻找支撑点。靠墙的地方早已经被别人占据，他无法接触墙壁。有人用十分温柔的口气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小心点，上校。”他回头一看，原来是死者。可是此刻他却没有认出死者，因为死者身上裹着白布，手里拿着一把短号；身上虽已僵硬，看上去却富有生气，似乎像他一样惊慌失措。上校仰起头来，想在一片嚎叫声中呼吸点新鲜空气。这时，他看到那口上了盖的棺材沿着用鲜花铺成的斜坡朝门口滚去，花朵在墙上被挤得粉碎。上校浑身冒汗，感到关节疼痛，隔了片刻，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来到了街上，因为蒙蒙细雨落在了眼皮上，使他的视线模糊了。“这是在非常混乱的

气氛中上校所产生的幻觉，他在朦胧中觉得似乎是死者在跟他说话。此外，生动而简洁的对话对于成功地刻画人物性格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校了解妻子性格坚强，是不会轻易掉泪的。但是，一天吃午饭时，他发现妻子在强忍着不流泪，感到妻子一定有什么委屈在心头，便用责怪的目光盯着妻子的眼睛，意思是说，你有话尽管说嘛！妻子果然开口了：“你是个不尊重别人的人。”这顶“帽子”可不小！但是上校并没有反驳，他耐心地等待着。妻子继续说道：“你任性、倔强，不尊重别人。我吃了一辈子苦，到头来还不如一只公鸡受人尊重。”上校仅仅回答说：“这是两码子事。”言外之意就是：公鸡是公鸡，你是你。妻子反驳说：“是一码子事。你应该知道，我快要死了，我不是在生病，而是在垂死挣扎。”上校默然无语，直到吃完午饭才开始讲话：“如果大夫向我保证，卖完鸡就可以医好你的哮喘病，那我马上就把它卖掉。可是如果办不到的话，那我就不卖。”短短的几句对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妻子的委屈和哮喘病的折磨，丈夫的忍耐、无奈和倔强。总之，无论《枯枝败叶》还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都为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西班牙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专家何塞·米盖尔·奥维德是这样评价的：“这几部作品开创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史的新时期。”

第二节 《百年孤独》

1965年7月中旬，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了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的创作。在此之前，他用了十七年的时间积累

素材和酝酿初稿。如今，他在墨西哥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静下心来面对脑海里一个个人物、故事和场景了。经过十四个月的艰苦奋斗，《百年孤独》于 1966 年 11 月问世了。1967 年 5 月 30 日该书由阿根廷的南美洲出版社出版了。

《百年孤独》通过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一百年的历史变迁，以加勒比海沿岸某国小镇为舞台，讲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诸如：家族的迁徙和定居，土地的开发和外来文明的引入，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长期内战，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制造的“香蕉热”，种植园工人的大罢工，独裁政府派遣军队对群众的血腥屠杀，最后，马孔多毁灭于一年十一个月零两天的大雨之中。在这些重大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布恩迪亚家族的变化是这样的：

第一代：由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与乌苏拉·伊瓜兰组成。二人是表兄妹。他和她的结合受到家族的反反对，大家认为近亲结婚会生下长猪尾巴的小孩。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不在乎这一套，毅然决然地结了婚。但是，乌苏拉·伊瓜兰一直有顾虑，婚后不肯同房。时间一长，村里有了闲言，说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不懂得性爱。在一次斗鸡中，何塞赢了邻居普罗登西奥。这位输家看到自己的鸡被咬得血淋淋，立刻火冒三丈，大声吼道：“看你的公鸡这回能不能帮帮你老婆的忙。”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对普罗登西奥说：“你，回去拿武器！我要杀了你！”二人进行了决斗，结果是何塞的标枪穿透了对方的喉咙。当天夜里，何塞挥舞着标枪对妻子说：脱下裤子。于是，夫妻圆了房。但是，普罗登西奥的阴魂不散，总是跑来要水喝。夫妻忍受不了死者的骚扰，决定走得远远的。路上，乌苏拉分娩了，生出了一个健壮的男孩。这就是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二代人，他

仍然沿用父亲的名字：何塞·阿卡迪奥。这次远行的结果是在一处小河边建立起名为马孔多的村庄。

第二代布恩迪亚家族人一共有两男一女：大哥何塞·阿卡迪奥、弟弟奥雷良诺和妹妹阿玛兰塔。何塞·阿卡迪奥长到十五岁时发育得如同成人一样，他跟一个名叫皮拉·特内拉的女人发生了关系。不久，皮拉告诉她的小情人：她怀孕了。小伙子吓坏了，趁着吉卜赛人来村里表演魔术和杂技的机会，跟着一个他喜欢的吉卜赛姑娘逃走了。不久，皮拉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阿卡迪奥，送到布恩迪亚家中来。

奥雷良诺长大后爱上了镇长的女儿雷梅苔丝。她结婚不久就有了身孕，但是一天夜里突然暴病而死。奥雷良诺痛不欲生，整天和岳父打牌消磨时光。后来，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爆发战争。保守党领导的军队开进马孔多，大肆搜捕自由党人。奥雷良诺是支持自由党的，便带人冲进司令部，消灭了官兵。他命令侄子阿卡迪奥镇守马孔多，自己则投奔到自由党将军梅迪纳的部队，由于英勇善战，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奥雷良诺上校。两党战争互有胜败。一次，奥雷良诺上校吃了败仗，被保守党判处死刑。面对着行刑队，上校回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下午，回想起他一生发动过的三十二次武装起义，十四次暗杀，七十三次伏击，跟十七个女人生下了十七个儿子。这一次，他又从刑场上死里逃生了。于是，他去投奔梅迪纳将军，但是将军已经遇害。奥雷良诺上校便接替了将军的职务，成为加勒比海革命军司令。十月初的一个早晨，奥雷良诺司令的队伍重新攻占了马孔多。保守党军队的司令蒙卡达将军被俘虏，送上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奥雷良诺司令被提升为革命军总司令。但是，他开始厌倦这场无休止的内战了。因此当自由党派人来跟他商量停战

一事，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字。两党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下午，奥雷良诺上校自杀未遂。从此，他精神萎靡不振，拒绝与外人接触，整天关在屋里制作小金鱼。最后，在家中一棵桑树下死去。

第二代中的妹妹阿玛兰塔终日生活在孤独中，天天缝制自己的殓衣。她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主动地在一天晚上躺进了棺材，平静而孤独地离开了人间。

第三代中奥雷良诺上校的侄子阿卡迪奥娶圣索菲娅·德·拉·彼达为妻，生下长女美人儿雷梅苔丝、次子何塞·阿卡迪奥第二、三子奥雷良诺第二。上校还在南征北战中与十七个女人生下了十七个儿子。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马孔多搞起来“香蕉热”，把社会风气闹得乌烟瘴气。上校十分气愤，召集十七个儿子准备武装起义。结果被掌握市政府大权的美国老板布朗下令把十七个孩子全部杀死。美人儿雷梅苔丝的美貌使得许多人神魂颠倒甚至丧命。一个阳春三月的下午，她终于披着床单乘风飘上天去。她的二弟、何塞·阿卡迪奥第二后来在解读吉卜赛老人梅尔加德斯羊皮纸手稿后睁着眼睛死去了。

第三代人中的奥雷良诺第二的情况最为复杂。他是美人儿雷梅苔丝的三弟，与何塞·阿卡迪奥第二是孪生兄弟。他与兰菲达·德·卡皮奥结婚，生下一子二女，即：何塞·阿卡迪奥、媚媚和阿玛兰达·乌苏拉。奥雷良诺第二本人与他的哥哥何塞·阿卡迪奥第二同时死去。第五代的何塞·阿卡迪奥进入了神学院。媚媚和她的情夫巴比伦尼亚生下一子，起名奥雷良诺·巴比伦·布恩迪亚。阿玛兰达·乌苏拉与加斯东结婚，但是没有生育。

第六代的奥雷良诺·巴比伦·布恩迪亚长大以后破译了

吉卜塞老人梅尔加德斯的羊皮手稿。他与姨妈阿玛兰达·乌苏拉发生乱伦关系，结果生下一个有尾巴的婴儿，即布恩迪亚家族的第七代人。整个家族的最后结局是：“就在奥雷良诺·巴比伦·布恩迪亚破译完手稿的这一时刻，马孔多这镜子般的城镇，就会被飓风一扫而光，并从世人的记忆里永远消失；手稿上所记载的一切，过去不曾、将来也永远不会重复，因为注定要遭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机会在大地上重新出现了。”

《百年孤独》的主题思想是十分鲜明的，它揭示了个人孤独、家庭孤独、社会乃至国家孤独的表现和原因。毫无疑问，贫穷、落后和封闭是孤独的重要原因。贫穷、落后、封闭的人们是会受压迫和欺凌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经济侵略”给香蕉种植工人带来的不是繁荣昌盛和快乐幸福，而是痛苦和灾难：“美国香蕉公司来了以后，一批专横霸道的外国佬挤掉了原来的人马，当上了地方官。美国人布朗先生让外国佬安居在‘电气化养鸡场’里，据布朗说，那是为了要让外国人享受与官职相称的高等待遇，有权有势的人们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受炎热炙烤和蚊子侵扰之苦呢！穷人嘛，就得忍受种种艰难和困苦。一帮子配着大砍刀的凶神恶煞，代替了从前的警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关在作坊里，一直苦苦地在思考着这些变化，后来他终于明白无误地认识到，当年没有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是个错误。在这个孤独、沉默的年代里，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让他第一次感到困惑和痛苦不堪。”随后，他的一个老战友的孩子被打手们杀害了。上校愤怒之极，他想：“街坊们遭的罪可是该到头了。他年轻的时候，看到疯狗咬伤的妇女被人们乱棒活活打死的时候，就曾经愤怒得不得

了。如今，他同样怒火中烧，对着门前聚集的人们高喊道：‘就在这几天，我要把我的孩子们武装起来，消灭这帮臭狗屎美国佬！’，但是有钱有势的美国资本家雇佣了一批杀手，把上校的十七个儿子一一杀害了。

造成孤独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孔多人的思想愚昧和认知水平的低下。第一代布恩迪亚家族的代表人物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认识磁铁、望远镜和放大镜的过程，就足以说明处于封闭状态的人们在摆脱愚昧和提高认知水平时需要克服多少旧观念的障碍和束缚：经过长期熬夜和“冥思苦索”，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形销骨立，发烧发得直打哆嗦，庄严肃穆地对家里人宣布了他的发现：‘大地是圆的，像只橘子。’”而他的妻子仍然认为这是“吉卜赛人的胡思乱想”。他把这个想法讲解给村里人听，大家都“以为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丧失了理智”。这就是马孔多人认识宇宙的水平：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在马孔多人中属于善于接受新事物者，他说：“世上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河那边。”特别是当他发现马孔多“整个被海水围住”之后，他“想出来一个把马孔多搬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遭到了妻子的反对：“咱们不走！咱们就待在这儿，因为咱们已经在这儿生了儿子。”她对丈夫那些新鲜玩艺儿毫不动心。她关心的是孩子们的成长：“你得关心关心孩子们啦！”没有观念的更新和思想的解放，人们的生活只能停留在“生儿育女”的水平上，而不能追求什么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演说中提出了“孤独”的症结问题，他说：“人们很少求助于想象。因为，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缺乏使生活变得令人可信

的精神财富。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精神财富匮乏的原因，除去环境封闭和生产力低下之外，马孔多人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扭曲也导致了他们精神的贫困、孤独、甚至错乱。马孔多人患上失眠症和健忘症就是这一错乱的表现：“病人习惯于昼夜不眠之后，童年的印象就会开始从脑海里模糊消失，接着会忘却事物的名称和概念，最后会认不得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落到一种忘记了过往一切的白痴状态。”必须指出的是，产生这种“白痴状态”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严酷的现实，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所说：“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是拉丁美洲这个巨大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它时时刻刻、日日夜夜决定着我們不计其数的生离死别。”这一现实就是：“我们历史上遭受的难以名状的暴力和痛苦是延续了数百年之久的不公正以及难以用数字计算的苦难结果。”

紧紧围绕着“孤独”这个主题，作者采用了一系列艺术手法，诸如，循环重复的空间结构，象征、夸张和讽刺等手法。下面做一些具体分析：

《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是模仿《圣经》的天启式结构：从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与乌苏拉如同亚当和夏娃那样偷吃了“禁果”开始，他们不得不在鬼魂的追逼下逃离伊甸园。随后，也带领亲朋好友“出埃及”一样地大迁徙，目的在于寻找“福地”。但是，布恩迪亚家族始终背负着“原罪”的重担（近亲结婚或者乱伦生下带“尾巴”的孩子）。最后，也如同《圣经》中启示录所预言的那样，马孔多受到惩罚：毁灭于滂沱大雨之中。这种起于“零”而又结束于“零”的圆形结构，是从小说一开始就确定好的：“多

年以后，奥雷良诺上校面对行刑队，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叙述者从“现在”开始讲述，但是他立刻给出来一个“多年以后”的时间，在这个“将来”的时间里，奥雷良诺上校会面对行刑队。然后，从那里会回想起“过去”“那个遥远的下午”：去看冰块。这样就构成了“现在”、“将来”、“过去”三个时态形成的一个圆圈，并且贯彻始终：三个时间和空间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将一切孤独的形态包含其中。就是在这个整体封闭的结构中又有圆圈套圆圈：人名重复人名，性格重复性格，情欲重复情欲，语言重复语言，行为重复行为……而所有这一切就是为着一个目的服务的：提示孤独的心理状态及其成因。

《百年孤独》善于使用象征手法，比如作品中的许多动物具有象征意义。这样的象征意义常常又埋伏着潜在和暗示的功能。这类的例子很多，例如，“那天晚上阿卡迪奥在吊床上等她，火辣辣地浑身打颤。他睡不着，盼呀盼呀，只听到石衡鸟严格地按时按刻地鸣叫。”这里的小鸟鸣叫象征着爱情的钟表。又如，“她知道媚媚在隔壁的房间的床上整夜整夜地翻来滚去，一只盘旋飞舞的蝴蝶把她折磨得好苦。”其中的蝴蝶象征着强烈的情欲。又比如，“那天晚上，兔子的忙碌声吵得他们再也无法安睡。天亮时，奥雷良诺第二打开房门一看，院子的地上铺了一层兔子，晨光熹微中一片青蓝色。”里面的兔子象征着繁荣。

善于把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进行对立的描写是《百年孤独》的又一个艺术特色。何塞·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兄弟二人从一出生就是“对立”存在的：小说一开始就确定何塞·阿卡迪奥是个缺乏理智的孩子，方方的脑袋，多毛的外表，

脾气任性，感情冲动，缺乏想象力，办事不动脑袋，完全凭着本能行事；而奥雷良诺“一生下来就睁着眼睛……好奇而不慌不忙地摆动着脑袋，辨认着房间里的东西”，长大后，办事稳重，沉着，有理智。不仅这两兄弟的性格是对立的，就是所有名叫何塞·阿卡迪奥和所有名叫奥雷良诺的后代们，也形成了这样的“性格对立”。由此又生发出对同一事物的对立看法，比如，何塞·阿卡迪奥们从来不介入社会政治活动；而奥雷良诺们和奥雷良诺上校则积极投身到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斗争中去。

《百年孤独》的写作时间持续了十四个月，而作家为准备描写和进入故乡的故事却经历了十七年之久。在《百年孤独》之前，他已经成功地创作了一系列围绕着故乡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例如，《格兰德大妈的葬礼》、《恶时辰》、《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百年孤独》中的许多人物早已经出现在这些中、短篇小说中了。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马孔多世界的理想，只有到了创作《百年孤独》的时候方才真正实现。作家在这个世界里既讲述了有根有据的社会历史事件，又讲述了一个家族七代人的历史；既有哥伦比亚、特别是阿拉卡达地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又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神话和民间故事；既有马孔多人从事的农业劳作、经济开发等物质生活方面的描绘，又有人们的信仰、思想、理想、情爱等方面的精神生活，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具体，而且气势磅礴，因而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的经典之作。

第三节 《百年孤独》之后的四部长篇小说

一、《家长的没落》

《家长的没落》出版于 1975 年 5 月，是 20 世纪 70 年代拉丁美洲反独裁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拉丁美洲各国自从 19 世纪纷纷摆脱殖民统治成立了共和国之后，普遍存在着民主与独裁的斗争。到了 20 世纪，封建大地主、反动教会、政治和军事寡头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一步强化了独裁统治，白色恐怖长期笼罩在中、下层百姓头上，加上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反独裁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有良知和政治觉悟的作家主动拿起文学为武器，参加到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来。其中，反独裁小说的成就和影响尤为突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创作了《家长的没落》的。

《家长的没落》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拉丁美洲某个国家的总统府内的时间长期处于凝固和停滞的状态。周末的这一天，有一群兀鹫突然冲进了总统府的阳台，它们啄破了铁丝网窗，巨大的翅膀扇动起一阵阵风波，搅乱了总统府的宁静。直到星期一黎明时分，人们方才大着胆子迈进总统府的大门。这时，它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府内的一切都显得腐朽不堪：光线昏暗，杂草丛生，处处散发着鸡窝和牛粪的臭味。大厅内外，各个办公室里面，都可以看到牛们在闲逛。精美的地毯已经被牛蹄践踏得稀烂。人们推开了一道道房门，终于在总统办公室看到了总统：他面

朝下趴着，双手遮脸。人们把他翻过身时，才发现他的面孔已经被兀鹫啄得面目全非了。谁能保证他就是总统本人呢？因为人们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总统的替身阿拉贡内斯被人用毒箭射死后的事变：总统把尸体擦洗干净以后，给尸体套上总统制服，然后摆放在办公室，自己悄悄藏到密室看看人们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让总统大吃一惊的是：欢乐的锣鼓和教堂的钟声响彻四面八方，人们冲进总统府，把尸体拖到大街上肆意践踏。更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他的情妇们纷纷抢夺家产，儿子们高兴地敲打着铜盆，欢呼：“爸爸死了！自由万岁！”总统怒不可遏，飞也似地离开藏身之处，找到了他的亲信兼总统府侍卫队长罗德里戈斯。总统的命令简单明了：对一切叛乱分子格杀勿论！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枪杀，刀砍，扒皮，抽筋。许多人被活活扔给美洲鳄鱼去享用。因为有了那次“引蛇出洞”的教训，人们变得谨慎起来。大家仔细搜查每个角落，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死人。人们涌进了总统夫人莱蒂西亚的房间，但是没有发现任何总统的踪影。在总统自己的寝室里，人们发现了一套军服，上面有六个弹洞。军服有点小，但是人们不怀疑这是总统的军服，因为大家都非常了解总统的历史：他活到 100 岁还在长身体，150 岁时还长出三颗新牙。他的情妇成群，私生子有 5000 之多。人们清楚地知道总统原来的出身：美国海军陆战队支持下的一个傀儡。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撤走以后他才改变了身份。人们至今都记得那一天：美国大兵撤退时带走了一切，他们对他高喊着：“你自己应付这个烂摊子吧！”

但是，他夺取了政权以后，羽毛日渐丰满，权力越来越大，后来竟然可以做到“翻天覆地，征服自然”。他随心所欲地把昼夜颠倒，将节日从这一天移到那一天；他下令把妨

碍他视线的房子搬走，把瞭望塔加高，使河水倒流。他明白，最危险的敌人还是在政权内部。因此，他频繁调动高层官员的职务。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放心。一天，有个兵营发生了骚乱。他的亲密战友、国防部长罗德里戈斯表示愿意前往镇压。他产生了怀疑，觉得罗德里戈斯有可能趁机夺权，便立刻加强了对这位国防部长的监视。罗德里戈斯熟知总统的脾气，感到这位独裁者有可能加害自己，于是索性决定利用手中掌握卫戍部队的机会举行宫廷政变，推翻独裁统治，时间定在几天后保护神的纪念日上。到了过节的那天晚上，宴会开始前，总统接见了卫戍部队的高级将官们，他对大家说：“请先喝点开胃酒吧！等罗德里戈斯来到时，咱们再一起喝个痛快！”十二点时，餐厅的大门开了。众人惊愕地看到：罗德里戈斯浑身被烤得焦黄，他躺在一个大托盘里，周围撒着沙拉、青菜和香料。国防部长被当成一盘大菜送上了宴会。这就是总统对付背叛者的手段。在清除“异己”的问题上，他是绝对不手软的！

曾经有个会算命的老太婆预言：总统死亡之日，就是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她说：“没有伟大领袖，我们可怎么活啊！”报纸则整天歌颂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和衷心祝愿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但实际上，总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特别是在他的夫人去世之后，他深感寂寞和孤独。可是在权力方面，他丝毫没有放松：母亲去世后，他下令全国教堂连敲一百天的丧钟，亲自颁布命令：授予母亲为国家保护神的称号，把母亲的诞辰定为国庆日。教会方面认为总统的做法不符合教义，采取了一些不合作的行动。总统勃然大怒，下令没收教会财产，流放全部神职人员。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是绝对不让步的！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了。今天，教堂的钟声又响了。它宣布了总统去世的消息，教会人士纷纷上街宣告：独裁者之死是千真万确的，他的死亡不会是世界末日的来临。人们终于相信了这个事实。但是，立刻又为接班人的问题发起愁来。总统曾经有过一个宝贝儿子，刚一生下来，总统就授予儿子将军军衔，三岁时，便由母亲抱着检阅军队。但是，有一天，母子二人在购物时被一群猎狗咬死了。总统为了报仇，用“四分尸”的方法，杀害了养狗的两兄弟，又趁机砍掉了九百一十八个政府官员的脑袋。此后，总统就深居简出，过起秘密的生活来，直到被兀鹫啄死为止。今天，他终于躺在庄严、肃穆的大会堂里了。隔壁，国会在讨论《告全民书》，希望全国上下继承领袖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大街上的老百姓还处于茫然和困惑的状态里，他们不知道“没了伟大领袖，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许多人回想起总统给他们带来的“恩典”，成千上万的人曾经相信伟大领袖可以征服自然，相信他可以带领人民走上富强之路，可是后来人们渐渐怀疑“伟大领袖”思想“上帝般的正确”了。无论人们如何担忧祖国的前途还是怀念“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历史无情地翻过了那一页：独裁统治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家长的没落》是一部揭露和批判拉丁美洲独裁统治的小说。作者虽然运用了讽刺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来描绘独裁暴君的丑恶嘴脸，但是作品处处都可以感到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在支撑着他的虚构。作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站在历史高度分析独裁统治现象的内、外部成因。比如，在第29页作品讲述道：“您坐上总统宝座不是因为您有赫赫战功，而是因为英国佬硬是把您捧上了台，以后又是美国支

持了您……”从外部因素分析，拉丁美洲历史上屡屡出现独裁统治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各国寻找可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买办”的结果。而从内因看，就是大庄园主和大资产阶级为了争权夺利而发动内战需要“代理人”的结果，因为统治阶级的“财富来源于内战战利品的分赃”（第 52 页）。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发现了独裁统治灭亡的规律：凭借帝国主义的支持，军事将领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后立刻让支持者们发财，同时坚决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目的是巩固政权。但是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政府官员骄奢淫逸“蔚然成风”。因此实行特务统治也就成为必然。而压制不同意见的结果就是“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才是真的”。其实“总统从一开始就知道下级欺骗他的目的是为了迎合他，阿谀奉承的目的是为了要钱……”（第 270 页）“警卫人员给他敬礼：‘报告总统：平安无事，一切正常。’可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欺骗他已经形成习惯：官场无诚实可言。他们还因为恐惧而说谎：伴君如伴虎。而老虎的屁股是摸不得的。因此一切都是假的。”但是假的终归是假的，无论总统多么喜欢和善于表演，他明白寿命是有限的，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不可能解决堆积如山的问题。实际上，他的政敌早就在暗中磨刀霍霍了。至于美国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总是在“傀儡”不听话的时候要进行干涉的。作品直接影射了 1954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入侵危地马拉和 1965 年入侵多米尼加的事实。

《家长的没落》还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和“家长”的关系。当人民深受战乱之苦、剥削和压迫之苦的时候，他们希望有“救星”出现，因为他们仅仅要求过上和平的生活。“伟大领袖”代表了这一意愿，人民就衷心地拥护他。但

是，当领袖脱离了支持他的群众，人民重新陷入饥饿和贫困之中的时候，就开始怀疑领袖是不是真的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了。可是总统一直陶醉在人民的拥护之中：“这才他妈的证实了人民热爱我！”而实际情况则是：“死人，死人，死人，到处都是死人，数不胜数，他们倒在肮脏的水坑里……”（第 246 页）到了这个时候总统方才叫喊道：“这一次我们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了。我只好一个人接受惩罚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家长的没落》是很有艺术特色的。首先，在结构方面，作品以独裁者三种混乱的心态为主线，刻意营造气氛。全书有六章，每章不分段落，前五章只使用了逗号和句号。最后一章，一气呵成，一逗到底，整个作品都用第一人称的单数或者复数，仿佛内心独白一样。作者用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和“我们”互相交叉的叙述视角、现实和虚构、

“竹筒倒豆子”般的叙述口气，编织成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兀鹫闯进了总统府，啄烂了窗楞上的铁丝网，用扑扑棱棱的翅膀搅动着停滞的时间。星期一的清晨，城市在伟大的死者和腐朽的伟大散发出来的温柔空气中结束了悠长的昏睡。惟独此时，我们才敢进去……”恐怖氛围自始至终都围绕着家长的出现和消亡。与此同时，这一气氛又自始至终压迫在每个人的心头。小说结构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死亡为开始，又以死亡为结尾，从而构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在这个封闭的圆圈里，章节之间互相独立，各自形成体系，因此可以互相颠倒，从而给人以重叠的感觉，似乎家长不止一个，而是一群。是独裁者们的集体群像。凡是独裁者都希望“万寿无疆”，都害怕死神的到来。总统的替身中了毒箭以后临终时那番话就道出了独裁者怕死的心态：“您心里充满

了恐惧……您如果一人以普通人的样子上街，那老百姓会像猎狗一样地向您扑去，会一笔笔地跟您算账！”“将军，跟我一起死吧！对您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死！”“您别害怕，我的将军，死并不那么可怕！”

《家长的没落》的叙述话语很有特色：夸张，幽默调侃……天然浑成。例如，在描写总统的权力时，说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昼夜颠倒，让洪水倒流。又例如，作者安排了这样的“黑色幽默”：总统把政敌罗德里戈斯将军烤得焦黄，当做一道大菜端上了国宴。作品在结尾处用这样调侃的口气说道：“总统从一开始就知道，首先欺骗他的就是那些迎合他的人；他知道阿谀奉承是要收现金的；他知道来祝寿的群众是被武装力量驱赶而来的；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但是他已经习以为常，而且深信：谎言比怀疑更方便，比爱情更有用，比真理更经久。”

《家长的没落》一问世，拉丁美洲文学评论界立刻做出了反应，提出了种种不同看法。乌拉圭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马里奥·贝内德蒂认为《家长》“是个令人怀疑的凶神恶煞，单调、呆板、近乎兽类”。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权力越大，人味越小”，因为权力会使总统“异化”和“兽性化”，因此作品的深刻性超过了《百年孤独》。

二、《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1981年4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约合中文55000字。中国电影界根据这个作品的内容拍摄了一部电影，题为《血色黄昏》。

小说的情节是这样的：

圣地亚哥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住在一个小渔村里。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5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去码头上迎接主教。就在他走在路上时，已经有些人知道维卡略兄弟准备杀害他了。比如，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尔德就知道此事，她紧张地祈祷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就算是为了主教吧，你们过一会儿再动手吧！”圣地亚哥兴冲冲来到了码头上。可是，主教没有下船，而是响了一声汽笛就继续前进了。小伙子有些失望，但是他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随后，镇长堂拉萨罗也看到了圣地亚哥，可他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呢。卡尔曼神甫也看到了圣地亚哥，但他觉得一切都是谣言。

维卡略兄弟要杀害圣地亚哥的原因是：美丽的姑娘安赫拉是维卡略的妹妹，追求这个美人的青年名叫罗曼，小伙子千方百计地接近安赫拉，最后终于赢得了姑娘的心，二人决定结婚。但是随着婚期的临近，安赫拉越来越感到不安。她决心把实情告诉母亲，可是女友劝阻她不要说出来，并且给她出主意：可以把丈夫灌醉，用红药水洒在床单上，第二天晾到院子里去。罗曼把婚礼办得热烈而隆重，仪式结束后，新郎和新娘进了洞房。于是，丈夫发现了妻子不是处女，便把安赫拉送回了娘家。女方的母亲听说真情后，勃然大怒，命令维卡略兄弟审问妹妹。安赫拉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是圣地亚哥！”

维卡略兄弟决定杀死圣地亚哥：用后者的鲜血和生命洗去奇耻大辱。动手这一天，兄弟二人于三点二十分进了屠宰场，一人一把锋利的屠刀。二人一进门就声称：“我们去杀圣地亚哥！”大家都知道他俩是老实人，谁也没有拿他俩的话当真。只有聪明的桑托斯猜到了真相，便问了一句“为什

么？”二人说：“他自己明白！”桑托斯立刻报了警。四点十分，兄弟二人来到牛奶店，一面朝圣地亚哥家的方向张望，一面告诉老板娘，说是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那个得到消息的警察来到牛奶店给镇长取奶时，看到了那兄弟二人，便询问了一下此事。

镇长吃早饭的时候，妻子告诉他：罗曼把安赫拉给休了！这时一镇之长方才想起警察报告的情况。于是，他找到那准备杀人的二兄弟，若无其事地没收了他们的屠刀，一面说道：“你们想一想，这事要是让主教大人看到了，他会怎么说呀！”对于镇长如此轻率的处理，牛奶店的老板娘深感失望。镇长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反正他俩已经没有刀子。”兄弟二人自然不肯罢手，哥哥又从屠宰场拿来两把屠刀，他说：“没法子，事情只能如此！”二人又来到了牛奶店，一面不慌不忙地喝酒，一面望着对面的窗户。这以后，不断有人来到店里买东西或者打听价钱，实际上都是来看动静的。

没有接到主教，圣地亚哥朝未婚妻弗洛拉家走去。这姑娘也听说了维卡略兄弟要杀害自己爱人的消息。她没有弄清真相就把情书还给了圣地亚哥，同时说道：“还给你！但愿把你杀死！”圣地亚哥没有心虚的表现，他离开了未婚妻的家，来到大街上。这时，人们已经闻讯赶来。有人劝圣地亚哥别走牛奶店前的大街；有个店主叫圣地亚哥先到店里躲一躲。四面八方的声音闹得小伙子不知所措了。这时他想起自家的大门是开着的，便急忙回家。但是维卡略兄弟已经看到了圣地亚哥的身影，立刻拿着屠刀追了过来。圣地亚哥的母亲从窗口处发现了这一情况，赶紧下楼关上了大门。正当她插门时忽然听到儿子的呼声，她以为儿子在家里呢，便连忙

转身去帮助儿子。圣地亚哥看到大门紧闭，立刻返身迎敌。维卡略兄弟猛虎般地扑上来，用屠刀连连捅了圣地亚哥几刀。小伙子不再抵抗，也不呼喊，反而好像在笑。随后，他从血泊中站起来，穿过邻居家的庭院，对着正在吃饭的人们笑了笑，说了一句“他们把我杀了”。最后，从后门回到自己家中，一下子扑倒在厨房里。

从叙述学的角度说，作者一开始采用了第三人称讲故事视角：圣地亚哥在被杀的那天，清晨五点半就起床了，因为主教将乘船到来，他要前去迎候。但是说完圣地亚哥夜里做了个全身盖满了鸟粪的梦之后，作者突然把叙述的时间放到 27 年以后去了：圣地亚哥的母亲在回忆儿子当年被杀的情景时对“我”说：她儿子曾经梦见在树林里自由飞翔。于是出现了“我”和第三人称的关系问题。“我”说话的角度站在 27 年后，第三人称是讲述 27 年前发生的谋杀经过。如此一来，“我”担任的角色既有回忆还有评论者的身份了。他如何评论的呢？以安赫拉是不是处女这一关键问题为例，书中这样写道：“根本没能想到，更没有听说过安赫拉不是处女。她和罗曼（后来的未婚夫）认识之前，从未有过未婚夫，况且她又是在母亲的严加管教下和姐姐们在一起长大的。即使到结婚前两个月的时候，母亲也不允许她单独同罗曼一道看新房，而是由她父母双亲陪伴才行，为的是保护她的贞操。27 年后，安赫拉对我说：‘我祈祷上帝给我自杀的勇气，但是上帝没有给我。’”“我”借助安赫拉和女友交流经验，说明丈夫在乎新娘的“贞操”完全暴露了男子愚蠢、狭隘、偏执、自私的心理。在评论维卡略兄弟杀害圣地亚哥一事时，“我”多次用了“荣誉”二字“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

愧的。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情可以再干一千次。自从他俩自首以来，人们就料到两人会说：是为维护荣誉杀人：“哥哥强调说：‘我们无罪。这是荣誉的事情。’”这个如此“神圣的荣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传统的封建观念，“男尊女卑”的观念。人们被这一旧观念紧紧束缚着。它像大山一样压在人们心头，甚至是会杀人的。“我”的评价说：“我个人的印象是，圣地亚哥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偏见比无知更加可怕，偏见不仅离真理更远，而且还会杀人！这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作品。

三、《霍乱时期的爱情》

1985 年 12 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作品展示了种种不同形态的爱情故事。主要情节是这样的：

摄影师赫雷米阿斯服毒自尽了。他用的是氰化物，那烟雾散发着苦巴旦杏的气味，这让人想起摄影师受挫的爱情。乌尔维诺医生是摄影师的好朋友。他一跨进摄影师昏暗的房间，就闻到了苦巴旦杏的气味。检察官和实习法医来了。他们发现了一封摄影师写给乌尔维诺医生的信。医生看了信，神情沮丧地说：“这是他最后的意愿。”随后，医生前往老城区会见一个 40 岁上下的妇女。这个女人陪伴摄影师 20 年之久，直到赫雷米阿斯临终为止。她对摄影师的态度不仅是爱情和温柔，更多的是仰慕。两人秘密同居如此之久，竟然无人察觉，实在不可思议。看到医生来得很快，她十分感激，随后说明了是她帮助摄影师完成了自杀的心愿。这是早在多

年以前二人就说好的：赫雷米亚斯坚决不进入老年时期，只要到了 60 岁生日，就一定自尽。因此，到了老年一月二十二日 60 华诞这一天，他和情人下完最后一盘棋时，就要求情人回家去等他的死讯。他给医生写了信后就服毒了。

乌尔维诺医生心情不好，是两次外出搅乱了他的心绪，不仅错过了圣灵降临的弥撒祷告，还耽误了他每天不可少的午睡。去年他度过了 80 大寿，今年又刚刚举行了金婚纪念会。他现在与妻子一分钟也不能分开，相濡以沫，既有感情的原因，更多的是生活上互相依赖的缘故，但是矛盾冲突始终不断。一天，洗澡间里没了肥皂。医生洗完澡后回到卧室里说：“我洗澡时总是没有肥皂，快一个星期了。”妻子想起来了：三天前她把肥皂用完了，忘记放上一块新的，可是丈夫说已经有一个星期了，显然是夸大其词，有意加大她的过失。于是，她以攻为守，大吼大叫道：“这几天我洗澡时一直是有肥皂的。”丈夫明白她这一套无赖把戏，觉得实在无法忍受了。在随后的三个月里，二人始终争吵不休，整天痛苦之极。

到了下午，乌尔维诺医生准备去参加摄影师的葬礼时，发现几天前丢失的那只鹦鹉正落在一棵芒果树上。他登上梯子去抓，可是梯子滑动起来，随后便轰然摔了下来。妻子费尔米娜发疯似地扑向丈夫。他顽强地坚持到最后，说了一句：“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乌尔维诺医生的逝世震动了全国，因为是他从法国学成归来，用他掌握的最新治疗方法制止了霍乱瘟疫的蔓延，从此他名声大震。为悼念他 中央政府宣布哀悼三日 降半旗 敲丧钟 直到下葬为止。

送走最后一批吊唁者，医生的遗孀费尔米娜看到了身穿黑色制服的费洛伦蒂诺。她正要答谢老朋友的慰问，忽然听

到老人开口道：“费尔米娜，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以便向您重申我永远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

费尔米娜听了以后怒不可遏，吼道：“滚开！别让我再见到你！”她哭了，为丈夫，也为自己。哭声弱了，她进入了梦乡，希望自己死在梦中。但是，太阳照到了她的眼睛。她没有死，依稀记得梦中的哭泣和丈夫的模样，但更多的却是费洛伦蒂诺的形象。

弗洛伦蒂诺是个私生子，亲生父亲是著名的船主堂皮奥。父亲去世时他十岁。十八岁时，他认识了费尔米娜，四年后二人分手，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五十一年零四天，但是心里一直想着费尔米娜。堂皮奥始终没有承认这个儿子。因此，父亲死后，弗洛伦蒂诺只好辍学去邮局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送信时认识了十三岁的费尔米娜。此后，他就拼命给小姑娘写情书。她被信中火辣辣的语言吓得半死，可是又不能不回信。陷入情网的小伙子狂热地表达心中的爱慕之情，通信持续了两年之后，他提出了正式结婚的建议。她害怕了，拖了四个月才勉强同意。可是，他和她的交往还是暴露了。姑娘的父亲用手枪逼迫弗洛伦蒂诺断交。接着，他带上女儿旅行去了，目的是让女儿忘记过去。可是小伙子在邮电局里是管发电报的，他能让电报准时送到姑娘手中。这让姑娘十分开心。但旅行结束时，小伙子却没能如愿：姑娘拒绝了他的求婚。在此之前，他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只有一次。

乌尔维诺从法国学成归来时，二十八岁，还是独身。风流倜傥，学识渊博，家道殷实，这些优势自然吸引了许多姑娘。但是真正让乌尔维诺动心的只有费尔米娜。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全了这对年轻人的结合：乌尔维诺有个同行，发现十

八岁的女患者费尔米娜身上好像有霍乱的苗头，他急忙邀请乌尔维诺会诊。检查结果不是霍乱，而是消化系统感染，用药三天就好了。第二周的星期二，乌尔维诺主动前来复查。结果是两个年轻人成了夫妻。

弗洛伦蒂诺获悉费尔米娜与乌尔维诺医生结了婚，精神一下子垮下来。母亲焦急万分，安排儿子到一个远离家乡（乘船需要 20 天）的地方谋生。弗洛伦蒂诺上船前往目的地。他在船上，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一天夜里，他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有个舱门突然打开，一只有力的手把他拉进舱内。黑暗中，他稀里糊涂地被脱光了衣裳，稀里糊涂地被一个女人搂到了怀里，稀里糊涂地失去了他引以为荣的童身。强奸结束后，那女人说：“走吧！忘掉这一切！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发现在本能的宣泄中可以找到自救的出路：逢场作戏可以暂时代替爱情。

国内战争爆发了。寡妇纳萨莱的房屋被炸毁了。她来到弗洛伦蒂诺家避难。母亲借口自己房间没有地方，把寡妇让进了儿子的卧室。28 岁的寡妇给弗洛伦蒂诺讲述三年前丈夫去世给她造成的痛苦。她越讲越愤怒，一面不停地撕扯丧服。说到热血沸腾的时候，她已经全身裸体了。她冲动得喘不过气来，手忙脚乱地把小伙子也给脱了个精光，同时把三年的禁忌抛到了九霄云外。内战结束后，寡妇回到自己家中，修建起一座爱巢，接待合乎她口味的客人。她不收钱，因为她觉得是男人解决了她的需要。她得意地说：她是全省惟一自由的女性。弗洛伦蒂诺虽然与寡妇有了床第之欢，可他不想结婚。她要自由，他也要自由。女人们喜欢他的沉默和执著。他把交往的女子一一记录在本子上。五十年后，这样的记录本他已经有 50 册了，上面记录着 622 次做爱经历。

而就在这时，他又再度见到了费尔米娜。后者已经成了寡妇。

故事还得回到费尔米娜和乌尔维诺的婚礼上去。他和她举行的是旅行结婚：乘轮船赴欧洲一行。一开始，加勒比海的汹涌波涛让旅客们吃尽了苦头。新郎的体贴使得新娘没有痛苦地度过了前三个晚上。第四天夜里，海上风平浪静，新婚夫妇躺在床上。丈夫温存地爱抚，妻子羞怯地承受。但是，她最冲动的动作也就是亲吻和拥抱。这时，乌尔维诺清醒地知道自己并不十分爱费尔米娜；他只是喜欢她的美丽、高傲和魅力，能娶这样的姑娘，他觉得骄傲。一觉醒来，新娘还是处女。第五天晚上，她怀着猎奇的心理，主动把处女的珍宝献给了新郎。二人如鱼得水，似乎早有默契，配合得天衣无缝。他和她在欧洲过了十六个月，月月是蜜月。第二年年底，他俩回到加勒比海时，费尔米娜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她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费洛伦蒂诺在教堂门口看到了怀孕的费尔米娜，下决心发奋图强、求得功名，争取赢得费尔米娜的欢心。他信心十足地确信乌尔维诺医生肯定先死，只要世界末日不到，就要坚持等待下去。在叔叔莱昂总裁的帮助下，他在加勒比海航运公司谋得一职。随后，他一气工作了三十年，胜任了各种职务，掌握大量商业秘密。日理万机的同时，他丝毫没有放弃眠花宿柳的勾当：妓女、佣女、美国女游客……一概不论。在一次赛诗会上，他送一个名叫萨拉的女教师回家，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女诗人还待字闺中呢，更令他惊喜的是：女教师性欲极强，但是善解人意，总要千方百计让他通体舒畅。一次，云雨之后，他问萨拉：什么是“爱”？她简单明了地回答说：凡裸体时所干的一切都是“爱”，“腰以上是灵魂之爱，腰以下是肉体之爱”。后来，他和萨拉合作了一

首诗歌，投稿到第五届赛诗会上。但是，评委会否定了他和她的作品。萨拉大怒，责怪评委会中的费尔米娜捣乱。萨拉的恶语相加、特别是无端地迁怒于费尔米娜，使得弗洛伦蒂诺讨厌萨拉的狭隘，随后与这个同居了五年的女友断绝了关系。

步入中年的费尔米娜在回忆往事时发觉：丈夫虽然衣冠楚楚，但并非自己所爱。尤其让她无法忍受的是他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对她的要求充耳不闻；加之婆婆尖酸刻薄，小姑子愚昧，她花了六年的时间才适应了这一切。她最后总结道：对夫妻生活问题，要学会控制厌恶情绪。但是控制能力总是有限度的。丈夫的一次“婚外恋”终于让她忍无可忍了。乌尔维诺在门诊时认识了漂亮的混血姑娘林奇。二人一见钟情，林奇约他幽会。乌尔维诺与美人的关系保持了三个月，终于被内疚弄得心力憔悴了。他找到忏悔牧师，做了深深的忏悔。回家后，他向妻子说出了“婚外恋”的秘密以及忏悔的经过。费尔米娜听了以后感到痛苦万分，一气之下，跑到表姐的庄园去了。但是，一路上许多悲惨的场面：一具死于霍乱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庄园里的事情也不尽人意，孤独、乏味的生活让她想家。这时，乌尔维诺接到地区主教的来信，知道妻子生活得不愉快，便前往庄园迎接。费尔米娜趁机下了台阶。不久，婆婆去世，小姑子进了修道院。费尔米娜的生活变得愉快起来。便是，有个核心没有变化：一切都是丈夫说了算，一切都是为丈夫服务的。她这个“女皇”其实只是个高级女佣。

弗洛伦蒂诺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作任务很重，时局动荡，影响航运，母亲得了痴呆症，下班后就在家中看护着她老人家。在寻花问柳方面，他出过一个大乱子。那女人名叫苏莱达，是个有夫之妇，喜欢养鸽子，二人相识以后就用鸽

子传递情书。一次，他跟她在一艘维修的船上幽会。苏莱达全身裸体在舱里跑来跑去。弗洛伦蒂诺突发奇想，用手指蘸着红漆，在苏莱达阴阜上方向下画了一个箭头，在箭头末端写了一句话：“这是我的。”苏莱达晚上回到家里，在丈夫面前脱衣服时忘记了箭头和那句话。丈夫看了以后没有立刻发怒。而是拿来一把刮脸刀，把妻子给杀了。几天后，警方抓获了杀人凶手，向报界公布了案情。这时，弗洛伦蒂诺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母亲去世后，他把老人葬在苏莱达坟墓附近，时不时地给两位亲爱的亡人送上一束玫瑰。放荡的他终究恶习难改，不久又开始寻找这样、那样的女人了。不到 40 岁，他已经浑身是病了。但是，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费尔米娜。担任总裁的莱昂叔叔终于在 90 岁高龄时把公司的领导岗位让给了他。他觉得距离费尔米娜又跨进了一步。他下决心得到她，因此要活下去，而且健康地活着。总裁一职让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多。到了乌尔维诺医生猝死的消息传来时，弗洛伦蒂诺只剩下一个女人了。确切地说，是个 14 岁的少女，名叫库尼亚。两年前，一个远方亲戚把库尼亚送来请他监护。没想到经过他一年多的调教和诱惑，库尼亚激情勃发、欲醉欲仙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乌尔维诺医生去世时，弗洛伦蒂诺刚刚和库尼亚在床上做完性爱游戏。他一听到教堂的丧钟，立刻明白接近费尔米娜的机会来了。他吩咐司机把库尼亚送回寄宿学校，随后赶往费尔米娜家中，迅速向她表白了自己苦苦等待了五十年的爱慕之情。

一个星期后，弗洛伦蒂诺收到了费尔米娜的一封信。她把他狠狠地唾骂了一通。他把信看了四遍，感到重新建立关系的机会来了，于是决定不停地写信。到了乌尔维诺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他已经写了 132 封信了。尽管他没有收到邀

请，他还是参加了对乌尔维诺的纪念会。费尔米娜没有拒绝他的来访，而是感谢他的好意。从此，二人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时间一长，费尔米娜觉得他的来访已经成为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了。一天，她从收音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一位 84 岁的老头和一位 78 岁的老太太坚持了四十年的秘密偷情，结果被强盗打死在幽会的小船上。费尔米娜为之感动不已。几天后，又一件事震动了她。报纸上揭露了乌尔维诺医生曾经与一贵妇人通奸。接着，报纸又揭露费尔米娜的父亲长期从事走私活动。弗洛伦蒂诺闻讯后用朱庇特为笔名写文章要求报纸尊重他人的隐私，要遵守新闻道德。费尔米娜看到了文章，从熟悉的笔调中猜到了是弗洛伦蒂诺所为，深受感动。她决心冲破女儿的反对社会和偏见，向弗洛伦蒂诺表明心迹。7月 1 日下午六时，她登上了加勒比海航运公司的“新忠诚”号，与弗洛伦蒂诺相会在豪华套间，开始了恋爱旅行。一路上，二人克服了种种心理障碍，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并且决心一生一世地爱下去。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突出特点是描写了爱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而揭示出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民族的情感和性格的复杂性。在作者笔下，任何一种爱情表现形式均属正常，无论是五十年如一日的苦苦等待，还是即兴诗式似的拈花弄草；无论是寡妇开“店”、接待八方来客，还是纯洁的飞鸽传书，都是哥伦比亚人对待爱情“我行我素”的态度和方式。在书中，不同的爱情不是互相排斥的，同一个弗洛伦蒂诺可以终生追求费尔米娜，同时又不影响他寻花问柳：扮演忠贞不渝的是他，在公园和海滩上与美女和外国妞逢场作戏的还是他。这既是爱情的复杂性，更是人性的复杂性。

《霍乱时期的爱情》成功地表现出了这一特征。

更为深刻的是《霍乱时期的爱情》成功地揭示出“林妹妹不会爱上贾大”的原因，阶级、门户、种族偏见等社会因素仍然是影响男女关系的重要成分，但是种种例外也说明社会、阶级、种族等因素往往是可以冲破的；这些因素的存在更增加了爱情的复杂性，因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乌尔维诺就是这一复杂性的产物：出身名门，却非纨绔子弟，勤奋努力，认真钻研医学，为扑灭霍乱的蔓延做出了贡献，因而在爱情上有骄傲的资本，这使得他追求到了最漂亮的姑娘，这有爱情的成分，但是也不乏爱慕虚荣的原因；“他娶她是因为他喜欢她那股傲劲儿，喜欢她的严肃，喜欢她的美貌，同时也是因为他的一点虚荣心。”而他打败其他情敌的关键因素也还是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霍乱时期的爱情》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作品的结构方面：全书以费洛伦蒂诺和费尔米娜的爱情变化为主线，然后从这条主线上不断地“枝蔓”出来许多小故事，从而展示出爱情的“众生相”；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孤独寂寞，有的玩世不恭，有的严肃认真……这样的叙事形式出色地完成了为内容服务的任务：描绘出爱情的复杂与丰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叙述口气：他时而严肃冷峻，时而讽刺挖苦，时而津津乐道于某些细节，时而“点评式”的议论三言两语，随后又将自己的批评态度掩饰起来。这样复杂多变的笔调既是表现特定内容的需要，也是作者的艺术追求：有张有弛，疏密有度，从而产生阅读快感。

四、《迷宫中的将军》

1989年3月长篇历史小说《迷宫中的将军》问世。书

中的“将军”就是拉丁美洲 19 世纪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但是小说的重要不是讲述玻利瓦尔的赫赫战功，不是介绍他那辉煌的南美洲大一统的美好理想，而是描绘他从 1830 年 5 月 8 日开始的“生命上的穷途末路”以及他对独立战争中发生的种种矛盾的“困惑”和“不解”。

小说是这样开始的：1830 年 5 月 8 日玻利瓦尔的贴身侍卫帕拉西奥看到将军仍然死人一样地泡在放满草药水的浴缸里，便在 5 点钟叫醒将军，因为天不亮，他们就应该出发了。这是他被迫下台出走的日子，因此他说：“走吧！越来越好。这里没人喜欢咱们了。”

到了 1830 年 7 月，玻利瓦尔才 47 岁，可是他从 1810 年拉美独立战争爆发伊始，就热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了：秘密前往伦敦迎接独立运动的领导人米兰达回国；在米兰达指挥下参加一系列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在米兰达被捕后，玻利瓦尔孤军奋战，在卡塔赫纳和马格达莱纳河流域连续打败西班牙殖民军队；1813 年玻利瓦尔率部下杀向加拉加斯，成立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他本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和“解放者”称号；经历了西班牙殖民军的疯狂反扑之后，玻利瓦尔返回哥伦比亚，指挥起义大军解放了波哥大，随即担任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接着他挥师南下，连续解放了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但是他成立南美统一共和国的理想未能实现。因为各个独立国家内部在争权夺利。1825 年玻利瓦尔要求辞去秘鲁等国的大总统、非常独裁者等职务，但是利益集团还需要他这面“旗帜”，因此反对他辞职，实际上高级政客各怀鬼胎，各有预谋。1828 年玻利瓦尔在波哥大险遭暗杀。同年有人建议他在哥伦比亚建立君主制，他断然拒绝。他已经厌倦了政

治舞台上的勾心斗角，深深感到名声和职位带来的烦恼，因此到 1830 年他要退出政坛，去欧洲安度晚年。

二十年的奋斗让玻利瓦尔感到心力交瘁，头发花白，骨瘦如柴。这段时间，他高烧不退，大汗淋漓，胡言乱语，性情暴躁，乱发脾气。夜里，他异常清醒，很难成眠。往事在脑海里复现，梦幻般的理想纠缠在心头，挥之不去，迷茫和困惑构成一座座迷宫，玻利瓦尔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他决心摆脱这一困境。1830 年 5 月 8 日是他动身的日子。这一天，前来送行的党政军民和外交界的代表一大早就在总统府外排队恭候了，他们要亲眼看到“解放者”玻利瓦尔大将军从此一去不复返的情景：一个转战经年、解放了五倍于欧洲面积土地的大将军就这样放弃了统治权，人们很难相信这个事实。

上路的第一天走得很不愉快：像筛子筛过一样的细雨不停地下着，路上冷冷清清，墙上还写着反对玻利瓦尔独裁的标语，远处什么地方有人在咒骂“独夫”、“民贼”。

第二天，跟随玻利瓦尔将军的只有五名侍从了。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将军的情绪有所好转。但是走了几天之后，一路上竟然无人认出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伟大领袖玻利瓦尔。将军感到奇怪：“难道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他觉得应该振作精神，坚持走下去，管它是陡峭的山峰还是羊肠小路。将军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到达港口城市翁达，参加省长举办的欢迎舞会。高超的舞技和勃发的生命活力粉碎了他快要死的传说。

1830 年 5 月 15 日玻利瓦尔登上船，开始他一生中第四次在马格达莱纳河上的航行。他明白这是生命航线上的最后行程。

玻利瓦尔记得，第一次他在马格达莱纳河上航行是在1813年。那时，身为起义军的少校，他带领二十名士兵、用破旧的武器横扫这一流域，在20天里把西班牙殖民军打得落荒而逃。等到第三次航行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时，独立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他关于美洲大一统的理想已经化做泡影。如今是第四次航行，这一理想已经完全破灭，但是仍然念念不忘统一的重要性：“只要我们不组成统一的美洲政府，敌人就会卷土重来。”

航行到第四天的时候，岸边出现了许多身穿黑衣服的妇女，她们在等待玻利瓦尔，等待着他的施舍和安慰。从前他非常关心战争造成的寡妇、孤儿、残疾人和一切被遗弃的人。但是今天，他自己成了被从政治舞台上赶下来的流亡者，难道这就是独立战争的结果？难道这就是成行上万的人们抛头颅、洒热血之后追求的目标？面对这些战争的受害者，尤其是面对着生活依然没有出路的人们的质问：“现在是解放了，可是我们仍然没法活呀！将军，我们怎么办？”玻利瓦尔这个毕生追求真理的斗士，这时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无话可说。1830年5月21日，船队驶向马格达莱纳河的入海口。次日两岸景色告诉人们大海近在眼前。

这时一艘标有“解放者号”的汽轮迎面驶来，巨浪掀翻了船队中的供应船。“解放者”望着骄横的“解放者号”扬长而去，他不由得浮想联翩。玻利瓦尔回忆起如烟的往事：在巴黎与拿破仑的会面；对米兰达立下解放美洲的誓言；四次横渡大西洋，为独立革命做准备工作。他想起了亲爱的亡妻，想起了那许许多多情妇，想起了种种荒唐与虚荣。

在图尔巴科，玻利瓦尔在等待办理出国手续期间，会见了一批批党政军界要员。针对这些人的牢骚和不满，玻利瓦

尔希望大家精诚合作、团结一致、维护统一的局面、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他反对暴乱，甚至怀疑赶走西班牙殖民者的必要性：“你们也许不信，这几天我甚至为我们赶走西班牙人而遗憾。”

1830年6月16日，政府确认了议会的这一决定：授予玻利瓦尔终身养老金。22日，他拿到了出国护照，高兴得喊道：“我们自由了！”两天后，他带着侍从前往美丽的海滨城市卡塔赫纳。但是战争给这座名城带来了一片破败、悲惨的景象，刻意组织的欢迎人群、教堂的钟声、军乐和礼炮声都无法掩饰战争制造的灾难和不幸。玻利瓦尔伤感地说：“这场狗屁独立叫我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1830年6月22日晚上，玻利瓦尔得到通知：英国邮轮已经到达海边。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很糟，无法远行。于是决定在卡塔赫纳城郊住下来疗养。9月1日乌达内塔将军发动政变，9月5日上台后立即派人请玻利瓦尔出任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玻利瓦尔精神为之一振，浑身的病痛不治而愈。他立即与同僚研究形势，制定行动计划，准备叱咤风云，再展雄风。但是，国家已经四分五裂，无政府状态如脱缰的野马，内战的烈火越烧越旺，乌达内塔领导的政府完全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对此，玻利瓦尔深受打击，因为他渴望统一，反对分裂。高烧、浑身疼痛、失眠、咳嗽彻底打倒了这位独立运动的伟大统帅。1830年12月17日下午1时零7分，玻利瓦尔终于在迷惘与困惑中离开了人世。他怎么也不明白：轰轰烈烈的独立战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座混乱的迷宫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选取了拉美这样一个几乎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伟大人物写小说，当然是别有用心的。其根据就

是作家抓住了玻利瓦尔的“末日”做文章，抓住了伟大将军“失势”和“落魄”杜撰成篇，显然是要刻意表现玻利瓦尔的迷惘与困惑：独立战争的伟大与辉煌遮蔽了口蜜腹剑、背信弃义、勾心斗角的阴暗面，而一旦领袖失势、大权旁落，早就窥测方向、准备抢权的野心家们立刻点燃了分裂的大火。通过玻利瓦尔由辉煌向迷惘的变化，作者不仅揭示出伟大人物在不同地位和环境下的复杂心理表现，而且发掘出任何伟大事业的种种复杂层面，其中不乏阴暗的层面。与大自然中其他物种相比，人类是最复杂的群体，他追求光明与美丽，但是言行中表现出的肮脏与丑恶在自然界也是罕见的。玻利瓦尔的一生可以为证。《迷宫中的将军》的要害是“迷惑”。玻利瓦尔末日的“迷惑”表现了个人无论多么伟大，他总是历史长河的一滴水。他一生四次航行在马格达莱纳河上，每次的感觉都不一样：从怀抱伟大理想去战斗到感到自己“穷途末路、来日无多”，说明了他的思想变化，同时也表现了他的种种无奈、无力和渺小。越是智者，越会感到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经历了《百年孤独》的成功与辉煌之后，荣耀和利益已经让他感到疲惫不堪，是否能再造辉煌已经是个考验。在这一点上，他与玻利瓦尔的心灵是相通的。或许困惑的将军正是作家处于困惑中的心灵写照。

不结束语：继《迷宫中的将军》之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又于1992年出版了《异国旅行小说集》；1993年创作了《爱情和其他魔鬼》；1995年创作报告文学《绑架的消息》；1997年开始撰写回忆录。1999年还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目前仍然笔耕不辍，他的作品需要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

第十五章

巴尔加斯·略萨的小说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道路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生活与文学创作道路都是不平坦的。1936年3月28日他出生在秘鲁的阿雷基帕市。父亲名叫埃尔奈斯托·J·巴尔加斯，是广播电台的技师，母亲名叫多丽塔·略萨，二人于1935年6月4日结婚。不久，这对年轻的夫妻便互相发现了对方的缺点。丈夫武断、专横、爱吃醋，对妻子的家庭有偏见。妻子来自比丈夫高贵的贵族白人阶层，娇生惯养，不会管理家务。“结果，他对我母亲的家族产生一种仇恨，一发起脾气来就会破口大骂略萨家族。”（详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著《水中鱼》第22页，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长春，1996年1月）1935年11月，丈夫告别了怀有五

个月身孕的妻子，前往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开办广播公司的办事处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给妻子打电话或者写信；直到十一年以后，即 1947 年初，他才再度露面与妻子和儿子相会。但是，儿子在外祖父母、几位舅舅的娇惯与呵护下已经是个“骄傲又任性，简直是个小魔王了。”父亲是个专制老魔王，儿子是个无法无天的小魔王。父子的矛盾和冲突直到老魔王去世都没有得到化解。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几部长篇小说都有这些矛盾和冲突的生动反映，例如，《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等。

1950 年父亲强迫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进入莱昂西奥·布拉多军校。这个强制性的决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父亲认为对付不听话、难管教、心理扭曲、缺乏男子汉气概的儿子，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军校的正规训练把孩子造就成守纪律、勇敢无畏、尊敬师长、一身大丈夫气概的男子汉。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那年 14 岁，一心想当海员，觉得进入少年军校，对于将来进海军学校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准备阶段，于是欣然同意了（实际上不同意也不行）。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入学的第一天就被高年级学生狠狠地污辱了一通：让新生弯腰互相踢屁股；强迫新生进行手淫；绕着跑道爬行。军校的生活刻板而又艰苦，这让少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看清了秘鲁社会的种种黑暗现象：暴力充斥、伪善欺诈、种族和社会等级歧视、道德沦丧、吸毒嫖娼……与此同时，这恶劣的环境也从反面激发他对读书的渴望与对文学的追求：“如果说军校有什么课程唤醒了我的某种爱好，那就是历史，因为我的老师很好。文学是以平静和个人的方式在课外产生的爱好。”（详见《水中鱼》第 118 页）他的第一篇情爱小说是写出来给同学们取乐的。后来，有同学愿

意花钱借去阅读，于是写小说又成了生财之路。写作要求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在军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读了大量书籍：“我在课间休息时读书，在上课时用练习本掩护着读书，有时溜出自习室跑到游泳池旁的凉亭上去读书，有时夜里轮到我值勤时，坐在破烂的地板上，借助洗手间昏黄的灯光读书，……”（《水中鱼》第120页）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回想他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因时，他认为有两条是最根本的：一是父亲对文学的反感，因此他故意反其道而行之，喜爱文学，用来对抗父亲的专横；二是军事学校刻板与黑暗的生活迫使他躲进文学作品生动、活泼、光明、美好的理想天地里去。

而实际上，外部机遇也是把他推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1952年夏天，16岁的马里奥在父亲的帮助下当上了《新闻报导》的记者。这份工作让他大开眼界：光怪陆离的奇特社会现象生动地呈现在他眼前。与此同时报社的同事们，特别是老编辑、诗人卡洛斯·内伊·巴里奥努埃沃“是我文学的引路人”，“他对我文学方面的教诲，远远超过军校的老师，也远远超过我在大学里的多数老师。通过他的帮助，我了解了一些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用火焰般的文学作品给我的青年时期打下深刻印记，比如：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的状况》和《希望》；美国的‘迷惘的一代’的小说家们；尤其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一天下午，卡洛斯送给我一本萨特的《墙》（中篇小说集）。从这本书开始，我就同萨特的作品及思想建立了一种对我的爱好产生决定性效果的关系。可以肯定，也是卡洛斯·内伊跟我谈起超现实主义，谈起爱尔兰著名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及《尤利西斯》。这本书也是卡洛斯给我买的西译本，我跳着页码勉强

看了一遍 没有读懂什么东西。”(引自《水中鱼》第 156 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新闻报导》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家族成员（舅舅们）认为他应该读完中学的课程；他父亲则认为可以边读书边搞新闻，于是他选择了去皮乌拉市中学读书，在《工业报》当记者的生活。关于在《新闻报导》的工作经历，后来他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中做了详细的描述。

1952 年秋天，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皮乌拉市的米盖尔中学攻读高中最后一年的课程，同时做工业报的兼职记者。他住在鲁乔舅舅家中，经常向这位他最喜欢的舅舅倾诉衷肠：“哪怕是饿死我也要当个作家，因为文学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引自《水中鱼》第 194 页）鲁乔舅舅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文学爱好，不要考虑后果，因为一个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一生在做他不喜欢的事情而放过了他愿意干的事。幸运的外甥还阅读了舅舅大量的文学书籍：古希腊、罗马丛书，当代欧洲文库。其中，德国共产党作家汉·巴尔丁写的自传体小说《黑夜落在后面》让他感到震撼：“这本书让我好几夜不能入睡，它在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震撼。书中有大量地下战斗的故事、为革命做出牺牲的突发事变以及难以忍受的过火行为，它对我来说是一声爆炸，迫使我第一次认真思考正义事业、政治和革命活动。我记得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非常敬佩那些世俗的圣徒，他们虽然冒着酷刑、砍头或者终生被监禁在德国纳粹地牢的危险，却把毕生献给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业。”(引自《水中鱼》第 195 页)。

除去鲁乔舅舅的鼓励和支持之外，米盖尔中学的一系列课程也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后来在大学攻读文学和法律奠定了基础，如政治经济学、法律、历史和文学。此外，

文学教师何塞·罗布雷斯·拉苏里对马里奥的文学爱好十分赏识；他帮助马里奥把《印加王之逃遁》（1951年马里奥创作的剧本）搬上市内百乐剧场的正式舞台。校长批准了文学教师的这一建议：由马里奥指挥排练，准备于7月17日皮乌拉文化周期间公演。演出前，百乐剧场做了大规模的宣传，入场券销售一空。首演之夜，许多没票的人强行冲进剧场，挤满了走廊和乐池前的通道。混乱中，留给省长的座位也被人占去，省长不得不站着看完演出。首演成功之后，又连续加演两场。这一成功进一步坚定了马里奥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而在皮乌拉的生活（当记者、演戏、读文学作品、组织中学生罢课，甚至包括逛妓院、吸白粉……）成为后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文学创作的丰富源泉；皮乌拉在他作品中出现的次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多。

1953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考入秘鲁首都著名的圣马尔克斯大学。“我在大学的头两年里，做到了在中学时没有做到的事：成为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我深入学习每门课程，包括我不喜欢的课程，完成老师要求的所有作业，有时还请老师开出补充书目。”“但是，在所有的课程中，我读书最多、用力最大的还是《秘鲁历史渊源》这门课，主讲教授波拉斯·巴雷内切阿的智慧闪光照得我眼花缭乱。他的课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使得我在上大学的头几个月里甚至常常在想：我是否应该攻读历史而不是文学，因为历史即波拉斯教授的化身，有颜色，有动人的力量，有创造力，似乎更加扎根于生活。”巴尔加斯·略萨后来的作品表现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与大学这些课程的研修是有密切关系的。

大学期间，巴尔加斯·略萨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与进步同学一起讨论秘鲁的独裁统治，研究苏联和中国革命胜利

后的巨大变化，参加了秘鲁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和列宁的《怎么办？》，办革命小报，组织声援电车工人的罢课。在一次与政府办公厅主任萨尼亚杜的会面中，马里奥做为学生代表要求给被捕的学生送毛毯。接见结束后，离开办公厅时，马里奥想：“早晚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写出来，后来这些人和事就成为我的长篇小说《酒吧长谈》的内容了。”（引自《水中鱼》第 256 页）

但是，他的主要精力和时间还是放在历史和文学研究上：“1954 年至 1955 年间，我上午和下午都拼命地读书和写作，空前未有地确信：我真正的爱好是文学。我决定：将来一面写作一面教书。”（引自《水中鱼》第 291 页）这期间，课余之后，他用短篇小说练笔，大小故事不论，特别是题材不论，但是写完以后大多以撕毁告终。圣马尔克斯大学文学系，是造就秘鲁诗人和作家的大本营。有些教师和学生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非常羡慕地注视着利马文坛，我极力要混入其间”。（引自《水中鱼》第 291 页）但是，他深感自己的功力不足，特别阅读了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一系列作品之后，如《野棕榈》、《圣殿》、《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等，感到必须认真学习不可。“福克纳是我手持笔和纸学习的第一位作家，为的是不迷失在他那时间和叙述视角变化以及家谱的迷宫里，还为了琢磨他每个故事组成的巴洛克建筑的秘密，还为了琢磨那蜿蜒曲折的语言和时序的错位；这样的叙述形式赋予每个故事以神秘性、深刻性、忐忑不安的模糊性和心理的敏锐性。”“如同萨特一样，福克纳是我在圣马尔克斯大学读书期间最为钦佩的作家；福克

纳让我感到了学习英语的紧迫性，为的是直接阅读他的原作。”（引自《水中鱼》第 294 页）

1957 年 2 月《秘鲁水星报》发表了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短篇小说《首领们》，讲述了皮乌拉米盖尔中学一次罢课未遂的故事。“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后来出版的第一本书的书名。这个短篇小说充分展示出后来我作为小说家做的事情：运用个人生活经验作为虚构的出发点；通过具体的地理环境，使用一种伪装的现实主义手法；用对话和无人称的口气描写景物，保持作者深藏不露的客观态度；但是，对故事背景和社会环境持批评态度。”（引自《水中鱼》第 302 页）

在大学期间，巴尔加斯·略萨认识了青年作家路易斯·罗阿易萨，“他后来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在我迈向文坛的起步时期给了我许多帮助。”（引自《水中鱼》第 305 页）这位青年作家给巴尔加斯·略萨介绍了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如：博尔赫斯、胡安·鲁尔福、奥克塔维奥·帕斯、阿丰索·雷耶斯、阿道夫·比约·卡萨莱斯、胡安·何塞·阿莱奥拉等，“路易斯·罗阿易萨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拉丁美洲文学，更有城市味道，更有世界性，也更优美，主要出现在墨西哥和阿根廷。”而在此之前，“我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冷漠是百分之百的。或许换掉冷漠这个词，可以说是敌视的。”（引自《水中鱼》第 306 页）他曾经攻击博尔赫斯，“我说博尔赫斯是形式主义者，有艺术纯正癖，甚至是资产阶级的看门狗。”（引自《水中鱼》第 306 页）但是，当他在路易斯·罗阿易萨劝告下认真地读起博尔赫斯的作品时，他由衷地钦佩这位著名的阿根廷作家了。

1955 年 5 月底，巴尔加斯·略萨一位舅妈的妹妹出现

了，此人叫胡利娅，她给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巴尔加斯·略萨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变化。胡利娅年轻、漂亮，吸引了许多追求者。舅妈为保护妹妹，便命巴尔加斯·略萨陪同胡利娅外出购物、看电影和参加舞会。结果，外甥爱上了姨妈。胡利娅比巴尔加斯·略萨大 12 岁，又是个刚刚离异的女人，她认为“这是在发疯。我还是个半大小子。她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女人。我还没有念完大学，也没有开始独立生活，连一份正经工作都没有，身无立足之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结婚就是胡闹，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女人都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她爱我，如果说我是个疯子的话，那她也一样。她说，马上结婚，绝对不能让他们把咱俩分开。”（引自《水中鱼》第 337 页）他和她立刻行动起来：秘密跑到首都远郊一个村镇政府做了结婚登记；悄悄在首都租好了房屋；通知鲁乔舅舅和舅妈……但是，纸里包不住火。巴尔加斯·略萨的父母还是得知了儿子结婚的消息。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拿着手枪四处寻找胡利娅，一面向警察局控告胡利娅“诱拐少年”，母亲只知道哭个不停。不久，巴尔加斯·略萨收到父亲一封信，“其口气既凶狠又疯狂。他只给我短短几天的时间让胡利娅自动出境。此前他已经同奥德里亚政府中一个部长谈过话。此人是他的朋友，这位部长向我父亲保证：如果胡利娅不自动出境，政府将宣布她为不受欢迎的人，把她驱逐出去。这封信越往下读就越不能让人忍受。到了末尾，更是连篇粗话，他说，假如我不听他的话，他就会像打死一条疯狗那样把我杀死。在签名后面，他还用附言的形式补充说，我可以去警察局要求保护，但是这挡不住他向我连开五枪。他又签了一次名，以证明决心之大。”（引自《水中鱼》第 343 页）巴尔加斯·略萨和胡利娅紧急商量对策。结

果决定：胡利娅暂时去智利外婆家躲避；巴尔加斯·略萨则半工半读，挣些钱设法租个公寓单元房，以便向父亲证明他有能力独立生活。胡利娅走后，巴尔加斯·略萨拼命四处找工作：给波拉斯教授做历史卡片，给《旅游》杂志写文章，给《商报》周末副刊做专栏记者，为高考生写复习教材，给秘鲁国家俱乐部图书馆管理员做助手（为新书做卡片），给侨民公墓中最古老的坟墓墓碑做卡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一共有了六份工作（一年后，达到七份，因为我又进入泛美广播电台工作了），从而收入增加五倍。”（引自《水中鱼》第347页）1955年8月初，巴尔加斯·略萨冒着挨子弹的危险去见父亲。他发现父亲惊人地平静和理智。父亲劝他：不要因为结婚就放弃了学业、毁坏了前程。“他相信只要我不再干傻事，我会很有出息的。过去他一直对我十分严厉，那也是为了我好，是为了纠正略萨家族出于溺爱给我养成的坏毛病，但是，他是爱我的，因为我是他的儿子，一个父亲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儿子呢？”父亲默许了他的婚事之后，巴尔加斯·略萨迎回了胡利娅。二人过起了紧张、忙碌但是幸福的生活。丈夫决心读完大学本科两个系的课程，拿到文凭，然后去巴黎进修。“我以前所未有的决心要努力成为作家，并且坚信如果不离开秘鲁、不去巴黎生活就当不上文学家。”（引自《水中鱼》第352页）妻子对此决心表示坚决支持：“对，对，先毕业拿文凭，然后申请银行贷款和大学奖学金，先去西班牙读研究生，再去巴黎，把你脑袋里的那些小说都写出来。”胡利娅是言行一致的：“从结婚第一天起，她就给了我许多帮助。没有她的帮助，我不可能完成七项工作，不可能有时间去圣马尔克斯大学上课，不可能完成老师们规定的作业。我感觉事情还不算很

多，因为我还有时间写出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引自《水中鱼》第 352 页）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1958 年 1 月巴尔加斯·略萨的短篇小说《挑战》获得法国杂志征文奖，具体的奖励办法是免费去巴黎旅游一个月（其中 15 天免费住在拿破仑饭店，后来的 15 天他准备自费住到一家小旅馆中，结果拿破仑饭店的经理邀请他再住 15 天，只交那家小旅馆的费用即可）。

巴黎的文化气氛深深激动着巴尔加斯·略萨，使他下决心拿到奖学金，准备大学毕业后去马德里孔普卢屯塞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在利马，他的毕业论文是《阐释鲁文·达里奥的基础》。在马德里，他准备继续研究这位拉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伟大诗人。1958 年 7 月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很快获得奖学金的消息也传来了。奖学金只给一年，但是他决心长期住下去。在西班牙呆上一年后，再设法转到巴黎去，“我要在那里定居。我要在巴黎当作家，即使回秘鲁，也是探亲性质的，因为如果要留在利马，我永远不会超出目前这种末流作家的水平。我非常严肃地把上述想法跟胡利娅谈了。她赞成出国定居。她对欧洲之行也抱有期望。她绝对相信我将来能成为小说家。她保证全力帮助我成为作家，为此做出必要的牺牲也再所不辞。”（引自《水中鱼》第 476 页）

1958 年 8 月就在前往西班牙旅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时，圣马尔克斯大学文学系会同墨西哥语言研究所准备对亚马孙地区的土著居民进行语言考察。巴尔加斯·略萨有幸参加了这一考察。“我看到了秘鲁原始大森林，看到不少风土人情，听到许多有趣的故事。后来这些故事成为我的三

部长篇小说《绿房子》、《潘上尉与劳军女郎》和《叙事人》的原始素材。我这一生，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还没有哪次旅行有这么大收获；它总是引起我一再回忆，总是有许多令人激动的人物、场景让我联想出一些故事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发现了亚马孙尚未驯服的风光的巨大潜力；亚马孙这个原始、蛮荒、危险、具有秘鲁城市地区不了解的自由世界，让我眼花缭乱，惊奇不已。这次考察还以令人难忘的方式使我了解到：对某些秘鲁人来说，社会的不公正已经达到了极端野蛮和逍遥法外的程度。但与此同时，在我眼前展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如同任何优秀小说描写的那样，生活可以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冒险，可以产生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精神，生活几乎总是意味着永久性的变化和危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森林、河流和湖泊的画框中，仿佛是在人间天堂。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一切总是成千上万次地回到我脑海中来，总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引自《水中鱼》第478页）

1959年巴尔加斯·略萨在西班牙马德里孔普卢屯塞大学获得了文学博士。1960年他和胡利娅终于来到巴黎，但是生活相当困难。他教过西班牙语，搞过翻译，当过编辑，最后在法新社西班牙文部和法国电视台各谋得一职，生活才较为稳定，从此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工作。1960年巴尔加斯·略萨开始创作以母校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为背景，反映士官生黑暗生活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该书于1962年获得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26岁的他从此一举成名。1965年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问世。1968年发表中篇小说《幼崽们》。1969年第三部长篇小说《酒吧长谈》出版。1973年第四部长篇小说《潘上尉与劳军女

郎》问世。1977 年发表第五部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81 年出版了第六部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1983 年发表第七部长篇小说《狂人玛依塔》。1986 年第八部长篇小说《谁是杀人犯》出版。1988 年发表了第九部长篇小说《叙事人》。1992 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继母颂》。1994 年第十部长篇小说《情爱笔记》问世。1998 年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元首的幽会》出版。

在散文创作方面，巴尔加斯·略萨也颇有建树。比较影响的散文集有《永远纵欲》、《谎言中的真实》

《顶风破浪》、《给白脸蒂朗下战书》、《致青年小说家的信》等。另外，还有记录他文学与政治生涯的回忆录《水中鱼》。

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巴尔加斯·略萨就获得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秘鲁、委内瑞拉等国授予的各种文学奖和荣誉称号。1979 年当选过国际笔会主席。1989 年参加过秘鲁总统竞选。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多次担任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电影、文学评奖委员会主席。如今，在欧洲和美洲的文化、政治方面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还经常在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讲授拉丁美洲文学，是上述国家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1994 年 7 月曾经来中国访问。

第二节 《城市与狗》

《城市与狗》开始创作于 1960 年，是作者在巴黎定居之后，完成于 1962 年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情节是根据

作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时间是 1950 年；地点是秘鲁首都利马的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学校。书中的城市是指利马；“狗”是指该校的学员，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同“狗”一样的互相撕咬。学员们过的是军事生活：一个连队由三个分队组成，由一名中尉和一名上士指挥。校长由一名上校担任。每天的作息时间为严格：起床、出操、早饭、上课、午饭、午休、军事、训练、晚点名、熄灯睡觉。但是森严的纪律和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不能掩盖学生与学生、士兵与军官之间残酷对立的矛盾与冲突。新生刚一入校就得通过痛苦和备受侮辱的“入学洗礼”；高年级学生把一个个新生分别拉到洗手间、地下室、操场上，命令新生弯腰成 90 度，互相踢臀部；强迫新生脱掉裤子进行手淫，失败者要给老生整理床铺，让新生在操场上爬行，口中要说：“我是狗！”这种野蛮而又无理性的“入学传统”实际上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施虐，是强者把不满、嫉妒、仇恨和偏见毫无节制地发泄在弱者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如此的暴力与专横都是在合法外衣的掩护下进行的：军规、校规、法规、庄严的仪式、伟大的口号，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而这个专制政权则是为了官僚特权、政治寡头集团的统治服务的。但是军规和校规给这些 14、15、16 岁少年带来的则是心灵的伤害、扭曲和人性的压抑，因此他们时时要反抗，要调皮捣蛋，要以暴力对付暴力，要破坏军规和纪律则完全是自然合理的了。

小说一开始就是几个学员在策划偷窃化学考试题目。他们除了把偷来的试题预先找好答案对付考试之外，还把试题出售给其他同学。此事被发觉后，校方极为震怒，命令小偷来自首，否则惩罚全班不得在周末回家。而周末回家对干

这些野马般的少年，相当于囚犯出狱。可是小偷不肯自首，其他学员也不出来揭发检举，因为告密者被认为是最无耻的东西。但是一周又一周地不许回家，特别是对于有女朋友的学员来说，实在是无法忍受的。终于有叛徒出现告发了小偷。校方开除了小偷。但是偷窃集团的首领发誓要查出告密分子。在一次军事实弹演习中，有人开枪杀死了告密者。消息传出，学生家长们既震惊又愤怒，纷纷要求校长说明真相。校长急忙命令全校统一口径：这是一次偶然事故，绝非故意杀人。与此同时，校长还将“枪支走火”的肇事者禁闭起来；将连队有关负责人调离岗位，最终“平息”了这场风波。这是作品的主线。

围绕这一主线的还有许多小故事。其中关于崇拜“狂人”的理论是必须一提的。所谓“狂人”就是敢打、敢闹、敢造反、敢破坏军规、校规的“好汉”、“英雄”。反之就是“松包”、“软蛋”、“笨蛋”是“懦夫”、“胆小鬼”的代名词。比如，“狂人”会打架，敢打架，敢在熄灯号之后溜到校外去看电影、会女友，敢在上课时溜到校园或者游泳馆抽烟或者赌牌。而“松包”、“软蛋”则是“狂人”恶作剧的对象。“狂人”向他们身上撒尿，强迫他们“纳贡”（香烟和钱），向他们脸上啐唾沫，命令他们打扫洗手间。

再有值得一提的是“金钱交易”的理论。一切便利都要用金钱交换：夜间溜出校外玩耍要给值勤的士官“上贡”，因为他可以为你在值日表上画上“到”字；花钱买偷来的试题；花钱买阿尔贝托（巴尔加斯·略萨的化名）写的言情小说；花钱请“狂人”打架、偷东西；花钱保平安……

再有一点就是性的问题。自吹玩过成堆的女人是“英

雄”、“好汉”的资本之一。由于学员们都是处在青春期中少年，所以人人喜欢这个话题，同时也是互相开玩笑的内容，也是推心置腹、交流经验的内容，也是这些少年做春梦的内容。书中的阿尔贝托原来认为性是个令人恶心的话题，如今来到军校，耳朵里整天听大家津津乐道地说个没完没了，也渐渐产生了好奇心。终于有一天他和同学一道逛妓院去了。一个热情的巴西女人接待了他，完事之后，他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作者在书中的态度是明白无误的：不维护卖淫现象。但是，在那个丑恶的社会里，妓女帮助这些少年摆脱了虚伪的道德面纱，“教会他们肉体和感官快乐，教会他们不把性作为淫秽和下流的东西加以排斥，而是把性作为生活和欢乐的源泉加以体验，还教会他们在那神秘的性欲迷宫迈出了人生的前几步。”（引自《水中鱼》第 115 页）这样的性启蒙和性教育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是在那样扭曲人性的社会里如何能避免如此扭曲的性教育呢？在书中，阿尔贝托在周末回家时听到那些贵族上层子弟如何诱奸女佣的故事，他感到他们既虚伪又狡诈、心中十分不快，很想痛骂他们一通。性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影像。

上课调皮捣蛋是学员们“造反”的又一经常方式。如果大家不喜欢哪位教师，全班就一起扔纸球，或者敲桌子，或者用手弹拨安在活页夹上的刮脸刀片，或者提出侮辱和挑衅性的问题。有时，某个“狂人”还悄悄跟在教师身后做怪样。有的教师发现这种“出洋相”的事之后，就会报告给学校领导，值班军官就会来整顿秩序，或者惩罚闹事的学员。

《城市与狗》中除去塑造了“狂人”和“软蛋”的典型

人物之外，还用大量笔墨刻画了阿尔贝托这个不卑不亢的角色。他不欺负弱小，也不受“狂人”的侮辱。一次，有个“狂人”为了拿他开心，突然抢走了他正在阅读的《布拉日隆子爵》。“狂人”像传篮球一样把书传给别人。阿尔贝托满腔怒火，仿佛生命被人夺走一样；他猛扑过去，愤怒得像头狮子，那模样把许多学员吓呆了，连忙要“狂人”把书还给了他。阿尔贝托还是“城市”与“狗”之间联系的纽带。周末，他回到利马上层社会的圈子，让他看到的是伪善和欺诈；星期一，他看到的是暴力、残忍、“狗”咬“狗”。两种黑暗压迫他躲进书本的世界里，躲进文学的天地。他想，那里是惟一的“净土”，可以吸引他去想像，去陶醉，从而培养了一种能力：建造文学的城池，去抵抗“城市”的喧嚣和“狗”们的狂吠。面对腐朽的制度和黑暗的社会，面对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个人的反抗显得非常无力，但是文学却为个人反抗提供了场所和武器。这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效果可以得到证明。

《城市与狗》中刻画了上校校长这个军事独裁统治的代表形象。这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政客，他表面上道貌岸然，总是摆出一副廉洁奉公的姿态，实际上，他阴险狡诈，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下级，甚至草菅人命。谁若稍有反抗，他便露出狰狞面目，凶狠地加以镇压。作者十分痛恨这个人物，运用了嘲笑、揭露和抨击的语言描写他。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清醒地看到，无论“城市”的丑恶，还是“狗”们的凶残，根子都在社会制度上，在独裁统治，在腐朽的思想传统，在人吃人的观念中。作者明确指出：“秘鲁社会是座大监狱”。“人是腐朽社会的牺牲品。”如此尖锐、彻底、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当然要刺痛反动当局了。小说

出版后立刻在西班牙产生轰动效应，很快传入拉丁美洲。秘鲁军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宣布《城市与狗》为禁书；组织一次惩戒性活动：把一千册《城市与狗》放在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军校操场上焚毁；同时发动一些校友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声称《城市与狗》纯系捏造，不值一读。甚至有两个将军也从后台跳出来：“这部小说是令人作呕的病态心理的产物。”他们诬蔑作者是“秘鲁的敌人”，“堕落分子”；并且声称要剥夺他的国籍，因为他“侮辱了神圣的民族精神”。但是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城市与狗》的读者迅速增加。作者连续获得了几个国际文学奖。

《城市与狗》在叙事艺术方面也是十分成功的。它打破了传统的按照故事发展的自然时序，根据人物的内心活动，有的运用二人对话的方式，有时是人物的内心独白，有时是人物的梦境描述，有时是一系列电影剪接的手法：特写、闪回、重叠、全景摄入，更多的时候还是有个第三人称的叙述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巴尔加斯·略萨从这第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就非常重视作品的结构：根据情节，以时间和叙述视角组成若干“板块”，打乱自然时序后安排在一个个小故事中。从阅读感觉上看，初读起来颇感吃力，但是坚持下去之后，读者会发现每章每段都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会被几个悬念同时抓住，产生一种非看完不可的好奇心，直到最后才产生恍然大悟的感觉，因而感到回味无穷。实际上，这是读者“参与”了创作的结果，因为阅读时不断进行“再创造联想”，不断地编织故事，不断地梳理情节和人物关系，从而主动创造情节，并产生创造快感。

《城市与狗》在叙述空间、视角、人称变换等方面的试验，显然与他大量阅读欧洲意识流小说、同时与法国“新小

说”的出现有密切关系。但是，作者运用的基本技巧还是现实主义的。他对叙事艺术的探索这时尚处在初始阶段。

第三节 《绿房子》

1965 年巴尔加斯·略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出版了。很快就获得了委内瑞拉政府颁发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作品选取的时间是 20 世纪 20~60 年代，地点有两个：北部城市皮乌拉和亚马孙地区的圣达·玛丽亚·德涅瓦小镇。关于“绿房子”，巴尔加斯·略萨在 1993 年出版的回忆录《水中鱼》中是这样介绍的：“绿房子”是一座大茅舍，比住宅要简陋，比起通常淫秽和爱打架的利马妓院来，这里是个比较快乐和容易交际的地方。皮乌拉的妓院还保持着传统的聚会、聊天的活动，同时也具有提供幽会场所的功能。皮乌拉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去那里玩耍，去听音乐，去吃地方风味饭菜，或者去跳舞，去谈情说爱，当然也做爱。我记得一天夜里，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遇上了省长堂霍尔赫·切卡，他为曼卡切三重奏的舞曲感动不已。那里的气氛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什么规矩，到处是欢声笑语。吵嘴的事很少发生。”（引自《水中鱼》第 200 页）这是《绿房子》的原型。而从这个原型转化为长篇小说中的“绿房子”是经历了十五年的时间，特别是在巴尔加斯·略萨阅读了法国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说之后，他把皮乌拉的“绿房子”与莫泊桑笔下的泰利埃之家联系起来。

但是，《绿房子》力图揭示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皮乌拉人深受天主教和传统道德的束缚。妓

院于是成为宣泄性压抑的地下殿堂，可以去做刺激而富有冒险意味的活动，可以在短短的几小时内体验社会压迫之外的另类活动；对于少年来说，性交是神秘和令人羞愧的事情，是对家庭约束和社会道德规范的“造反”行动，因此便特别觉得具有吸引力。但是，家长、学校和社会舆论则认为妓院是龌龊的地方，妓女是教唆犯，是洪水猛兽，因此坚决反对盖绿房子。几代妓院老板修建绿房子，就有几代“正人君子”出来抵制，甚至聚众放火烧毁。表面上这是一部绿房子的兴衰史，实际上，这是社会风气、思想观念的演变史，是一个时期内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互相冲突和斗争的历史。

《绿房子》的作者当然没有站在“假道学”的立场上去反对办妓院，但是也没有宣扬纵欲，只是要揭露皮乌拉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性的问题只是诸多变化的一角而已。

《绿房子》另外一个舞台是亚马孙地区的小镇圣达·玛丽亚·德涅瓦，那里处处可见的是原始、蛮荒状态和四处埋伏的危险；那里的土著人仍然处在史前生活水平，他们还在搞人头兑换的交易，用活人祭祀神灵，信奉万物有灵论。书中还特别揭露了军政府实行的野蛮、镇压政策：掠夺土著人的财富，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行动。尤其是军警与土匪勾结起来欺负土著人的事件屡屡发生，作者的目的是：说明这里才是秘鲁社会最不公平的地区。

《绿房子》设置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和一座原始落后的森林小镇，两个处处差异很大的舞台，这是别具匠心的安排。因为作者是这样看待秘鲁 20 世纪 20~60 年代的社会现实的：独裁统治和官场腐败是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公正、不公平现象。

而土著人则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受害者中最严重的群族。而在这两个舞台之间是广大的海岸地区、安第斯山脉和原始森林地带。活动其间的则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从政客到地痞无赖，从修女到妓女，从孤儿院的孩子到医生，从大兵到军官，从神父到妓院老板，从外国资本家到土著劳工，等等。这样便构成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秘鲁20~60年代社会发生的复杂变化。

《绿房子》全书由五个主要故事组成，即：

- （一）孤女鲍妮法西娅的故事。
- （二）伏屋的故事。
- （三）安塞尔莫和绿房子的兴衰史。
- （四）土著头人胡姆的“造反”经历。
- （五）四个地痞无赖的故事。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故事的情节：

（一）孤女鲍妮法西娅的故事

秘鲁亚马孙地区有个小镇名叫圣达·玛丽亚·德·涅瓦。镇上有耶稣会修道院办的传教所，其任务是收养土著印第安人的孤儿。故事的“引子”是二十几个孤儿逃跑了，嬷嬷会同警察驾船沿河去找。进入第一章第一个场景的是嬷嬷们在审问孤女鲍妮法西娅：你的责任是晚上看管孤儿，为什么离开岗位跑到小教堂去了？为什么忘了关门？鲍妮法西娅被逼说出了真相：“是我给她们开的门。是我放走她们的。”紧接着是第一章第二个场景，讲述伏屋的故事；第三个场景介绍“绿房子”所在的背景城市皮乌拉；第四个场景是胡姆故事的开头；第五个场景是介绍地痞二流子利杜马故事的背景。到了第二章第一个场景时才继续讲鲍妮法西娅的故事：她因为可怜两个刚刚收容起来的土著孤女才帮助她们

逃走的，没想到其余二十几个孤儿也跑掉了。到了第三章第一个场景，鲍妮法西娅继续讲述帮助土著孤女逃走的原因；最后要求嬷嬷不要把她赶出传教所，因为她无处可去，因为她已经不是“野蛮人”了。到了第四章第一个场景，鲍妮法西娅讲完孤儿们逃走的经过，在讲述过程中反复问嬷嬷她是如何被收容起来的。以上是第一部中鲍妮法西娅的故事。在第二部的“引子”里，亚马孙地区的大庄园主胡利奥·列阿德基到传教所来找嬷嬷们要孤女去做保姆。主持嬷嬷要鲍妮法西娅前去，后者不肯，苦苦哀求主持留她在传教所。到了第二部第一章第一个场景里，寻找逃跑孤儿的警察们在争论“为什么孤儿偏偏要回到那肮脏的部落里去？”在结尾处，领水员聂威斯告诉警长：他和妻子拉丽达收留了鲍妮法西娅，就住在涅瓦镇上。最后请警长保密。到了第二部第二章第一个场景里，在领水员聂威斯和妻子拉丽达撮合下，警长应邀来这对夫妇家中做客，以便让他和鲍妮法西娅相识。但是这个土著姑娘怕人害羞，躲在卧室里不肯露面。后来，有个警察跑来报告说，逃跑的孤女们找到了，需要立刻派船去迎接。这时，鲍妮法西娅才出来询问孤儿们的情况。拉丽达趁机给警长做了介绍。二人握握手就算认识了。到了第二部第三章第一个场景里，拉丽达告诉警长：她们全家要出门给朋友做生日，有三天的时间不在家，请他不时地去照顾照顾鲍妮法西娅。当天夜里，警长来到领水员的家，他发现那姑娘恐惧得要命，经过他百般安慰和抚爱，姑娘终于顺从了警长的要求。第三部第一章第一个场景叙述了一个绰号叫“讨厌鬼”的警察发现了鲍妮法西娅的行踪。他把这个“秘密”报告给了警长。这对警长当然不是“秘密”。可是“讨厌鬼”企图诱奸鲍妮法西娅，这让警长警觉起来。他警告“讨

厌鬼”：不许碰那姑娘！这时，上级来了命令，让警察们去抓强盗。警长不愿意出这趟公差，因为他正在与鲍妮法西娅热恋。他去找领水员聂威斯，其实是看他的情人。他告诉她：“讨厌鬼”已经发现了她的藏身处，要她小心，别再走出屋门。他对聂威斯夫妇说，等这次出差回来就和鲍妮法西亚结婚。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这个好消息。接着，聂威斯询问警长：这次出差上哪里去？警长说：去圣地亚哥河上抓土匪。拉丽达在旁边听见这个消息后脸色变了。随后，聂威斯就请警长另请别的领水员出航，声称身体不适。第三部第二章第一个场景讲述的是：鲍妮法西娅发现许多人朝码头涌去，她好奇地从树林里穿过，偷偷看看码头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有个白发老人撑着木筏来到镇上卖百货。鲍妮法西娅等人们买完东西走开之后，悄悄地从河里游过去上了木筏。老人名叫阿基里诺，他认出了这个从修道院被赶出来的姑娘是鲍妮法西娅，便问她要干什么？姑娘说，愿意给他打工换一块布料，因为她要结婚了，准备自己缝制嫁衣。老人问她嫁给谁？她说，嫁给警长。老人听了显得不高兴，接着问她住在哪里？姑娘回答说，跟聂威斯夫妇住在一起。老人立刻高兴起来，撑起木筏向领水员家里驶去。聂威斯和拉丽达一看到阿基里诺老人来访，全家出来迎接。老人把礼物——一分给孩子们。后来经领水员介绍情况，老人方才说：

“聂威斯说警长是好人。你去挑块布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

第三部第三章第一个场景，讲述警长跟随领队的一名中尉和警察去抓土匪，他心里总是惦记着鲍妮法西娅。可是行动不算顺利，只抓住一个嫌疑犯。到了第四章第一个场景讲述中尉审讯这个名叫潘达恰的嫌疑犯。这个家伙是与土匪头

子伏屋一伙的。中尉要潘达恰供出伏屋的下落。潘达恰胡编乱造，不肯说出实情。中尉从中猜出领水员聂威斯夫妇与伏屋有联系。在第四部之前有个“引子”，交待了伏屋曾经率领潘达恰等人去土著部落抢劫橡胶、皮毛等土产，驾船的就是领水员聂威斯。在随后的第四部第一章第一个场景里讲述了鲍妮法西娅和警长在镇上举行婚礼的详细情况。修道院传教所的嬷嬷们已经原谅了鲍妮法西娅的过错，热情地为婚礼布置了教堂和准备了丰盛的食物。仪式后，嬷嬷们纷纷祝贺新娘和新郎幸福、甜蜜，要求警长好好对待妻子。但是到了第四部第一章第四个场景里，鲍妮法西娅又出现了。原因是她与警长的几个流氓“兄弟”认识了。按照前面的结构，每章的第四个场景都是介绍这四个流氓、地痞的。这一章的第四个场景依然如此，只不过交待了一个重要情节：鲍妮法西娅跟随丈夫（警长利杜马）来到皮乌拉，由于习惯的缘故，她还不愿意穿鞋。利杜马带着几个狐朋狗友回到家中，发现妻子光脚走路，认为这不“文明”，要求她穿上高跟鞋。固执的鲍妮法西娅不听话。警长挥手就是一个大耳光，一面吼道：“得让你受教育！在皮乌拉就不能像野蛮人那样。再说了，这个家谁说了算？”几个二流子连忙劝说警长，把他扶进里屋睡觉去了。其中有个名叫何塞费诺的家伙非常喜欢鲍妮法西娅，这时便趁机调戏这个漂亮女人。鲍妮法西娅由于害怕，拒绝了他的挑逗。第四部第二章第一个场景是用倒叙的方式讲述那件从前发生在涅瓦小镇的事情：警长利杜马和鲍妮法西娅在度蜜月时，传来中尉在林区抓土匪的消息，命令警长去逮捕领水员聂威斯，因为他与土匪头子有联系。利杜马与聂威斯是好朋友，为了给领水员充分的时间逃走，他让几个警察“埋伏”在屋外，他一人进门说服聂

威斯赶快逃走。但是，无论警长怎样劝说，无论妻子拉丽达如何哀求，聂威斯认为自己没有犯罪，不肯逃跑。警长无奈，只好把领水员押走。几个警察在屋外“埋伏”时还说到警长在结婚后工作十分积极，目的是想调回故乡皮乌拉。第四部第二章第四个场景讲述利杜马被捕入狱，何塞费诺趁机诱奸了鲍妮法西娅，并要求她打胎。紧接着是第四部第三章的第一个场景，讲述鲍妮法西娅与警长利杜马结婚后，二人终于离开了原始、落后的涅瓦小镇的经过。尽管利杜马很想调回老家皮乌拉，但是毕竟在林区工作多年，因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更不用说鲍妮法西娅了，她出生在土著部落，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她愿意跟随丈夫去皮乌拉，但是更留恋林区，留恋传教所的嬷嬷们，尤其留恋好朋友拉丽达。所以夫妻二人在与朋友们告别时很费了一番功夫。第四部第三章第四个场景讲述何塞费诺让鲍妮法西娅改名为塞尔瓦蒂卡，安排她在“绿房子”里帮工。而他自己则终日四处鬼混。他的地痞“哥们儿”也不时占塞尔瓦蒂卡的便宜。直到《尾声》的第二章，塞尔瓦蒂卡方才登场。她请加西亚神甫为“绿房子”的琴师安塞尔莫做临终忏悔。加西亚非常不高兴地上了出租汽车，一路在埋怨塞尔瓦蒂卡不该请他去给安塞尔莫做临终忏悔，因为他一辈子都在反对修建“绿房子”。但是在塞尔瓦蒂卡的坚持下，神甫无可奈何地进了“绿房子”，怒气冲冲地上楼去看安塞尔莫了。楼下，一些妓女和乐师在静静地等待消息。女老板琼卡请乐队为安塞尔莫奏一曲。乐师怀着沉重的心情弹奏起来。不一会儿，神甫走下楼来，表情悲伤。他请在场的塞瓦约斯医生上楼看看。片刻后，医生下楼宣布：“他死了，到上帝那里安息去了。”大家哭成一片。《尾声》的第四章叙述加西亚神甫和

塞瓦约斯医生从“绿房子”出来以后，医生主动邀请神甫共进早餐。两人来到安赫利卡太太开的饭店。老太太看到这两人走进来吃饭，觉得有些奇怪，一问之下方才得知安塞尔莫去世了，立刻哭了起来。神甫指责她不该为这样的人哭泣。这时，利杜马已经出狱，他和塞尔瓦蒂卡闻讯来看医生和神甫。他妻子感激地吻吻神甫的手；他本人则颇不以为然，因为他认定多次破坏“绿房子”的后台和指挥都是加西亚神甫。一怒之下，他破口大骂神甫是“放火犯”。神甫气得浑身乱颤，咳喘不已。塞尔瓦蒂卡责备丈夫不该谩骂神甫，那是会“下地狱的”；为了请神甫主持安塞尔莫的葬礼弥撒，她要利杜马向神甫道歉。利杜马道了歉，可是神甫还是不依不饶地骂什么“杀人犯”、“二流子”、“窝囊废”。利杜马差一点又发作起来。幸亏他妻子连连哀求神甫。神甫说，看在你这个苦命的女人份上，我不骂他了。围观的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神甫骂了一辈子安塞尔莫，这下子应该开心了；有的说，神甫真的放火烧过“绿房子”，可是琴师却从来没有说过神甫半句坏话。塞尔瓦蒂卡则劝大家别攻击神甫，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她还说，琴师跟她是同乡，也来自大森林。利杜马说：“这婆娘胡说八道。她从来没说过这件事，是她刚刚编造出来的。”最后，加西亚神甫同意主持守灵和葬礼仪式。当他和医生走出饭店时，发现一大群人簇拥着一辆出租汽车迎面而来。二人连忙贴墙避让。一个孩子告诉医生，汽车里躺着琴师和他的乐器！鲍妮法西娅（已改名为塞尔瓦蒂卡）的故事到此结束。全书也就结束了。

（二）伏屋的故事

伏屋原是巴西籍日本人，是个在逃犯，后来伙同阿基里诺、潘达恰、领水员聂威斯、情妇拉丽达等人勾结涅瓦原来

的镇长、大种植园主胡利奥·列阿德基大搞走私活动，后来又纠集一个部落的土著居民向另外一个部落村庄大肆掠夺橡胶和皮毛等土产。最后因患麻风病而被隔离在林区某地。他的故事分别出现在以下各部、章和场景中：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场景、第一部第二章第二场景、第一部第三章第二场景、第一部第四章第二场景、第二部第一章第二场景、第二部第二章第二场景、第二部第三章第二场景、第三部第一章第二场景、第三部第二章第二场景、第三部第三章第二场景、第三部第四章第二场景、第四部的《引子》、第四部第一章第二场景、第四部第二章第二场景、第四部第三章第二场景、

《尾声》的第一章交待了伏屋故事的结局。从上述的布局中可以看出，如果把每部每章的第二场景串连起来，再加上《尾声》第一章的结尾，伏屋的故事就完整了。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是按照故事的“自然时序”讲述出来的，而是通过伏屋与阿基里诺的对话回忆出来的，其中有些重要情节是值得一提的：

伏屋的身世是这样的：出生在巴西，读过几天书，少年时曾经因为替一个土耳其人管账被诬陷偷钱。警察把他抓了起来。法院判他一年徒刑，与两个土匪关在一起。新年前夕，三人策划了越狱行动，结果成功。伏屋偷了一辆汽车，抛下两个土匪，越过巴西——秘鲁边境来到森林地区。他以办锯木厂的名义先后认识了涅瓦镇的老镇长胡利奥·列阿德基和后来的镇长法毕奥。列阿德基本来是开旅馆的，后来靠走私发了财，他收买土著人的橡胶、皮货，运到城市出售。伏屋住在列阿德基的旅馆，用诈骗的手段偷走了五千索尔和一套银餐具，吊死一只讨厌的猫之后就逃走了。后来认识了阿基里诺，邀他入伙发财。不久，伏屋在秘鲁的重要城市依

基托斯认识了美人拉丽达。他说服了美人的母亲，请拉丽达在他的办公室工作。实际上，这时他已经与列阿德基联手在搞收购和走私橡胶的生意。那时欧洲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橡胶是战略物资，秘鲁加入了同盟国，宣布与德国作战，因此橡胶只能卖给美国。可是德国方面愿意出高于美国四倍的价钱收购。伏屋把列阿德基从林区收上来的橡胶用烟草包装，撒上滑石粉，偷偷从巴西运出，卖给日本人。日本再转手卖给轴心国。列阿德基赚到大钱以后想摆脱伏屋，因为秘鲁政府对走私橡胶加强了控制。伏屋正在热恋着拉丽达，便不经她母亲同意拐走了美人。母亲通过波尔蒂约律师报了警。而这个律师又是与列阿德基串通一气的。伏屋则有自己的打算：把拉丽达拐到林区赚大钱。他的目标是套住列阿德基。拉丽达故意在这个阔佬面前卖弄风情。列阿德基上了钩。伏屋摊牌，他愿意卖掉这个刚刚十五岁的少女，要价一千索尔。可是他跟拉丽达说了这个主意，让她留在庄园过安稳日子，没料道姑娘不乐意，偏偏愿意跟他四处漂泊。伏屋带着拉丽达逃走后，在阿基里诺帮助下，纠集了一些好斗的汪毕萨部落的土著人，不断地袭击采集橡胶和猎获皮毛的其他部落的居民。然后，通过中间人卖出。这样就断了列阿德基的财路。于是列阿德基就去首都活动，希望政府派兵围剿土匪。潘达恰和聂威斯加入伏屋团伙以后，这个小日本鬼子不但抢物资，而且还拐骗妇女。他经常奸污这些妇女，殴打拉丽达。这姑娘越来越讨厌这个老家伙。聂威斯入伙后，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多行不义必自毙。伏屋先是得了阳痿，接着浑身又出了许多红色的肿块。此前，拉丽达已经非常厌恶伏屋奸污土著少女。有一次，伏屋带回一个十二岁的土著少女，准备交换“口味”。拉丽达反对。伏屋一怒之下暴打

她一顿。她终于忍无可忍，同爱上她的聂威斯一道私奔了。在伏屋团伙中有一个重要成员名叫阿基里诺。这位老人原来在城里卖水，后来遇到逃到那里的伏屋。这个刚刚逃到秘鲁的日本人拉阿基里诺合伙做生意：老人出钱买船；伏屋购进大米、棉布、鞋，然后来往于兵营之间。他俩也给橡胶工人、伐木工和淘金者供应日用品。此外，还钻到土著部落里用串珠、镜子、刀子换橡胶和皮毛。二人结识了大批汪毕萨部落的土著人，这些人给伏屋帮了很多忙，非常尊敬伏屋。但是，伏屋恶习难改，走到哪里偷到哪里。军警到处在寻找他俩，二人只好暂时分手。伏屋躲进汪毕萨部落村庄。阿基里诺则在林区的几条大河上下流浪。伏屋后来转移到依基托斯市，于是认识了列阿德斯，二人联手走私橡胶。也是在这座城市里伏屋认识了拉丽达。几个月后，伏屋正在大搞橡胶走私活动时，偶然撞见了阿基里诺。旧友重逢，两人高兴得要命。伏屋拉阿基里诺入伙，准备大张旗鼓地做下去，不当上百万富翁绝不罢休。伏屋与列阿德基发生矛盾以后，委托阿基里诺把橡胶一点点运出去。这是伏屋第一次靠一个诚实的人作买卖。老人一次次把橡胶运出去，一次次把食物、百货运回来，账目清清楚楚，没有从中多拿一分钱。诚实、善良的老人把这个魔鬼般的伏屋都给感动了。老人在一次带回五万索尔货款回到林区时，伏屋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诚实的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你太讲义气了。要是换了我，早就携款潜逃了。”老人淡淡地说：“友情比生意重要。”在林区，老人还见到了伏屋的女人拉丽达，他把这可爱的姑娘视为自己的女儿。后来，拉丽达怀上了伏屋的孩子。正是阿基里诺老人给她接生的，拉丽达为感谢老人，特别给儿子起名叫小阿基里诺。在伏屋发现拉丽达带着儿子跟

着聂威斯私奔以后，还是阿基里诺劝阻伏屋不要进行报复，而是赶快治病要紧。

伏屋的最后结局是这样的：他被送进麻风病隔离区，由修女们看护。阿基里诺每年来看他一次，因此二人的会见对伏屋来说是件大事。在结尾的这一章里，阿基里诺又来看伏屋了。他看到伏屋像个大死螃蟹，浑身散发着烂鱼的臭味。他告诉伏屋：小阿基里诺已经长大成人，到依基托斯市工作去了。拉丽达在聂威斯被捕入狱后与一名警察同居在一起，也生了孩子。伏屋听着，全身缩成一团，陷入忧伤的回忆中。阿基里诺老人劝他：“别伤心！我不管多累，明年还会再来看你。我说话算数。你是不是为拉丽达的事情生气了？你又想起过去的时光了吧？伙计，生活就是这样的。你比别人强多了。你想想聂威斯吧。”老人一面说着，一面慢慢离去，渐渐来到通向河边的小路上。他回身望去，伏屋那一身血红的活肉仍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最后，一片灌木挡住了他的视线。老人一面走着一面低声说：“伏屋，别伤心！明年我一定来看你。”

（三）安塞尔莫和绿房子的兴衰史

在每部、每章的第三场景中讲述的是安塞尔莫和绿房子的兴衰史。地点是在皮乌拉，其主要故事情节如下：

安塞尔莫是流浪琴师，来到皮乌拉以后创办了第一座绿房子。他诱奸了盲哑姑娘安东尼娅，生下了女儿琼加。绿房子所在的教区神甫加西亚坚决反对办妓院，率领居民火烧了绿房子。琼加长大后在一些地痞、流氓支持下又盖起了绿房子。最后，安塞尔莫突发心脏病，塞瓦约斯医生抢救无效，一代受大众欢迎的琴师与世长辞，百姓为之痛哭。加西亚神甫为之主持守灵和葬礼仪式。

在情节发展过程中，有些关键性细节值得一提。

关于安塞尔莫的身世：他是个外乡人，骑驴来到皮乌拉。那时这座城市相当闭塞和保守，但是对外来人十分热情。安塞尔莫拉着疲惫不堪的驴子来到城市的中心阿玛斯广场。驴子一下子倒地而死。他则昏昏入睡了。一觉醒来，他看到许多围观的人。大家露出笑容，向他伸出手来。一位老者递给他一瓢凉水。安塞尔莫笑了，一面喝着水，一面听着人们对他的询问：你从哪里来？来干什么？要住多久？他笑而不答，只是否定地说：他不是牲口贩子，不是收税官员，不是推销员。他在人们的簇拥下走进广场旁的北方星旅馆。但是那里已经客满。许多人安慰他：可以住到居民家里去。梅尔乔老人欢迎他住到家中。安塞尔莫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第二天，他就在广场上露面：穿了一条新裤子、新靴子，戴了一顶新草帽。他健谈、慷慨、热情，很快交上了一批朋友。但是，他的好奇心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什么都想知道：风土人情，谁穷谁富，人们是否拥护政府，官吏是否廉洁，居民有什么特别的娱乐，道德风气如何，年轻人怎样谈恋爱，等等。这时的安塞尔莫年轻、健壮，好赌、好玩，枪法极准，因此也结交了一些权贵为友。男人们惟一不满的是：安塞尔莫好色，一喝醉酒就追女人。不久，安塞尔莫做了两件事让皮乌拉全城的居民大吃一惊：一是夜间骑马跑到城郊去看什么地形；二是不久便向市政府购买郊外一块地皮。人们吃惊的原因是，皮乌拉地处沙漠边缘，每天下午都发生沙尘暴，黄沙弥漫，落满全城；而城郊处则是沙丘活动的地区，它们会淹没或者包围房屋，在那里盖房子无疑是用钱打水漂。安塞尔莫对这些劝告一概不理不睬。于是，绿房子就盖了起来。但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居民们纷纷来观看施

工的情况，有的提建议，有的上前助一臂之力。无论穷人、富人。大家都在鼓励和夸奖安塞尔莫。房子盖成之后刷上了绿色。大家看了以后嬉笑不止。人们立即给它起了一个名字：“绿房子”。让人们开心的除去颜色之外，还有结构：上下两层，一层是大厅，二层是六个小房间。不久，人们听说安塞尔莫买了六张床、六个脸盆、六面镜子、六个高脚便盆。居民们纷纷议论起来，好奇之中有猜测和传闻。女教徒们在窃窃私语，媳妇们不信任地望着丈夫，加西亚神甫发出了警告：“有人要败坏本城的良好道德。”男人们纠缠着安塞尔莫，要他说出真相。他只是说：“眼下是个秘密，耐心点！过几天你们就知道了。”不久，安塞尔莫悄悄地离开了皮乌拉。几个星期后，他带着一群妓女回来了。绿房子在秘鲁宪法保护下正式开业了，那里不仅有妓女，还有音乐和美味佳肴。一到下午，乐声大作，彻夜不息。由六弦琴、响鼓、马颞骨打击乐、架子鼓、小号和三角琴等乐师组成的强大乐队，在安塞尔莫指挥下，奏出的乐声传遍四面八方，让人们吃饭、祷告、睡觉时都得听音乐。在音乐的吸引下，男人们不顾母亲、妻子、女友的哀求，不理睬神甫的告诫，纷纷向绿房子跑去。去逛绿房子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重要话题。男人们顽强地要堕落下去，哪怕下地狱也在所不惜。上帝震怒了：第一年降洪水，第二年滴水不降，第三年派蝗虫肆虐。加西亚神甫说，这是上帝的惩罚。但是无论天灾如何，绿房子的名气与日俱增，顾客盈门。绿房子犹如一个年轻的生命在成长、发育和成熟。在这黄沙滚滚的干热地区，绿房子就是“绿洲”，就是一泓清泉，就是一片提供阴凉的树木。它的美人、美食、音乐可以消除干渴、饥饿和欲火。而安塞尔莫，他只不过是警察局、市政府和某些企业利益的

联合代理人而已。至于他的身世，无论是名门贵族还是江洋大盗，都已是往事。重要的是现在：他能稳定治安，他能纳税，他能赚钱同时又解决了部分人的失业问题。所以无论加西亚神甫怎样骂他是“魔鬼”、绿房子是“地狱”，安塞尔莫活得逍遥自在，钞票滚滚而来。

与安塞尔莫有重要关系的一个人物名叫安东妮娅。她本来是大庄园主基罗加夫妇捡到的一个弃婴。就在这对善心的夫妻要把这女孩正式收养为自己的孩子时，他们三人做了一次旅行。不料土匪袭击了他们，夫妇被毒打致死，衣物、马匹、行李被洗劫一空。安东妮娅侥幸活了下来，但是被兀鹰啄瞎了眼睛，咬断了舌头。全城为基罗加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安东妮娅被洗衣妇胡安娜·保拉抱去抚养，这妇人是基罗加夫妇生的女佣。城里人都知道这女孩的故事，同情她的遭遇，因此只要有机会就跟她玩耍，送给她礼物，千方百计地呵护她。胡安娜·保拉每天都是先把安东妮娅安顿在阿玛斯广场的长椅上，然后回家取衣裳，再去河边洗刷。广场上总有人照顾安东妮娅，给她吃喝，晚上送她回家。但是，有一天，胡安娜洗衣裳回来，发现安东妮娅还没回家。但是，她并不着急，因为此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那是有好心人留安东妮娅过夜了。第二天，仍然没有人送安东妮娅回来。胡安娜连忙去广场寻找。她看到塞瓦约斯医生在那里，迫不急待地问道：“你们看到安东妮娅没有？”医生一面安慰老妇人一面搀扶着老人家回去。原来领走安东妮娅的是安塞尔莫。几年后，姑娘长大成人，与安塞尔莫生下一女，起名琼加。但是安东妮娅不幸死去。安塞尔莫不得不把这个噩耗告诉胡安娜·保拉。老妇人又悲伤又愤怒，要求邻居帮助她将安东妮娅的遗体抬回家中，要为她守灵。星期

日，加西亚神甫在教堂主持弥撒，随后率领众人为安东妮娅送葬。结果送葬的队伍变成了示威游行。石头和咒骂冲破了警察的阻拦。最后，愤怒的妇女涌进绿房子，打砸毁坏物品，放火烧家具。结果，绿房子化成了灰烬。这时，安塞尔莫才醉醺醺地从外面回来。妇女们上前围攻他，质问他。他苦苦哀求说，让我进去救孩子吧！这时，绿房子的著名厨娘安赫利卡·梅塞德斯出现了。大家发现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纷纷上前看望。许多妇女心肠软下来，向安塞尔莫表示同情和慰问。有的人则责备加西亚神甫放火烧毁绿房子。这时沙尘暴来了，扑灭了熊熊大火。但是，绿房子已经变成一片荒漠。从此以后，安塞尔莫靠四处弹三角琴过活。他带着女儿琼加从一个酒吧走到另一个酒吧。但是一赚到钱，他就借酒浇愁。六年过去了，琼加已经成了一个小姑娘。每年11月2日跟着父亲去给母亲扫墓。有一年11月2日，胡安娜·保拉也来上坟，她看到了琼加，此后，便经常到安塞尔莫居住的曼加切利亚区，给琼加带去食物、衣服、鞋子，给安塞尔莫送些香烟和零用钱。安塞尔莫真是穷困潦倒了，但他人穷志不穷，仍然靠弹琴过活，仍然自尊地走在曼加切利亚区。人们都把他看做是曼加切利亚区的标志之一。

正当安塞尔莫处于穷困潦倒的时候，他结识了绰号“年轻人”的阿历杭德罗和绰号“圆球”的一位卡车司机。三人都喜欢音乐，都有过坎坷的人生经历，因此在精神上都是难兄难弟。“年轻人”虽然出身名门世家，但是因为失恋而自杀未遂，闹得死去活来。后来，他感到万事皆空，就到处流浪，终日酗酒和赌博。父母极度失望，遂将其逐出家门。“圆球”本来是一家大公司的卡车司机，但是他非常喜欢音乐，便认识了既会作词、作曲，又会弹六弦琴的“年轻

人”。“圆球”没有什么音乐禀赋但是兴趣大、热情高，安塞尔莫和“年轻人”便认真教他弹奏乐器，讲解歌词。不久，三人乐队正式成立。老绿房子的著名厨娘安赫利卡·梅塞德斯这时已经开办了一家相当规模的酒店，便正式雇用了三人乐队。三人晚上在酒店演奏，早晨睡觉，中午在安塞尔莫的房东家吃饭，下午排练，三人形影不离。友谊使安塞尔莫摆脱了忧伤的阴影，情绪好了许多，因此十分认真地对待乐队的排练和演出。乐队为婚丧嫁娶、生日等各种家庭节日服务。他们认真的态度和高质量的演奏水平博得越来越多的好评。这时，曼加切利亚区四个很有名气的痞子：猴子、何塞、何塞费诺以及刚刚出狱的警长利杜马，已经形成“气候”，他们非常欣赏和支持三人乐队，很快动员起群众为乐队在全城大搞宣传。于是，一些有钱人纷纷邀请乐队为他们的家庭聚会演奏。与此同时，皮乌拉在变化，许多社区办起了歌厅、舞厅和妓院，三人乐队也常常收到演出的邀请。

安塞尔莫的女儿琼加长大以后，先是在一个名叫多罗戴奥的人开办的酒吧工作。但是，不久，她向警察局证明：酒吧是她开的，不是多罗戴奥。这男人气愤得要命，但是拿不出证据，只好离开酒吧。琼加很善于让醉汉尊重自己，很快就赚了许多钱。接着，她在酒吧的基础上扩建，搞成了老绿房子的模样。完工后，她特别邀请三人乐队来新绿房子演出。

老年的安塞尔莫陷入了回忆，他总是在想念安东妮娅。认识这盲女时，她才 16 岁。虽然不会说话，但那模样楚楚动人，那安静而忧伤的神情，让你不能不可怜她。她经常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安塞尔莫一直想接近她。在北方星旅馆的伙计哈辛托帮助下，安塞尔莫认识了她。以后，便经常请她吃糖果、冷饮、喝咖啡。终于，两人有了感情。安塞尔莫把

姑娘拐到绿房子，并发生了性关系。几个月后，姑娘难产而死。安塞尔莫老了，但是心不老，他一直怀念安东妮娅。他突发心脏病去世后，全城为老琴师送葬。

（四）土著人胡姆的故事

土著人胡姆的故事出现在第一部第一、二、三、四章的第四场景、第二部第一、二、三、四章的第四场景中。到了第三部和第四部时胡姆的故事就消失了。

胡姆故事的主要情节如下：

胡姆是印第安人琼丘族一个村社的首领。他和村社居民依靠采集橡胶和猎获皮毛为生。涅瓦镇长胡利奥·列阿德基派人去收购他们的橡胶和皮毛，其价格是质量好的橡胶两索尔一公斤，质量一般的一索尔一公斤，而在依基托斯市，列阿德基出售的价格是二十索尔一公斤。在村社里收购物资，白人通常不用货币，而是用刀子、布匹、盐巴、百货等交换，白人的这些东西奇贵，因此土著人吃着大亏。这个不等价交换的道理终于由两位来林区扫盲的教师揭开了。胡姆明白以后气得要命，询问老师应该怎么办？老师说，直接把货物用船运到城市里去卖。除去列阿德基的残酷盘剥之外，还有警备队士兵的抢劫和土匪的掠夺。这迫使土著武装起来进行自卫。有一次，刚被抓进警备队当兵的领水员聂威斯跟着班长出差，结果遭到土著人的伏击。班长逃走。聂威斯水性极好，跳上木筏划走了。大水把他带到一座孤岛，没想到上面有人呼喊。原来是伏屋和拉丽达呆在岛上。聂威斯爬了上去，立刻昏倒在地。一觉醒来，他认识了伏屋和美丽的拉丽达。

班长逃回警备队向基罗加上尉汇报了被伏击的经过。镇长列阿德基决定与上尉率领士兵前往土著部落讨伐。列阿德

基用计谋把胡姆骗出土著人群。胡姆不知有诈，准备前去接过镇长送来的手电筒时，后者猛然用手电筒向胡姆头上击去，将其打昏。士兵迅速包围了冲上来的土著人。胡姆就这样被俘了。审讯是在土著人的村庄里进行的。列阿德基强加给胡姆的罪名有：殴打班长，杀害士兵聂威斯（至今尸体下落不明），诈骗土著居民，说什么“办合作社，把土产直接运往城市销售”等等。胡姆反驳说，班长进村要偷东西（准备进贡给上尉的杀虫药），抓住班长以后没有殴打，反而把自己的独木舟送给他回警备队；士兵聂威斯没有死，跳水跑了；办合作社是因为中间收购人员太坏，骗去许多货物。列阿德基最后严厉地说，必须把橡胶卖给收购人员，不许去城市出售！胡姆昂起头，愤怒地骂道：“你是魔鬼！”镇长命令把土著男人一个个暴打一顿，然后放他们回家，只留下胡姆，他要把这位部落首领带回涅瓦镇。至于土著妇女，哪个大兵要玩，就去玩好啦！

胡姆被带回涅瓦镇以后，镇长列阿德基命令手下剃光胡姆的头发，吊到树上去。然后用烫鸡蛋放在胡姆的腋窝下，最后，又要胡姆保证不再袭击警备队，不拒绝出售土产给中间商人，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

胡姆被释放后四处上告。但是新上任的镇长和警察局长都不肯受理，他们不是拖延就是哄骗胡姆。这位头人心里都明白，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他遇到了阿基里诺。后者劝他加入伏屋的团伙。伏屋需要胡姆这样一个土著头人；通过胡姆可以同土著人打交道，换来土产，然后转手赚大钱。胡姆也需要这群土匪替他报仇。可是，伏屋对此并不认真，他极力笼络胡姆，用酒、刀、盐收买他。胡姆什么都不要，他一心要报仇，因此他常常离开伏屋居住的小岛，到涅

瓦镇去控告。长期上诉而没有结果，胡姆有些发疯了。最后，他病死在一条小河旁。

胡姆这个形象是《绿房子》中代表土著印第安人反抗政府和军警以及奸商压迫、剥削的典型人物。作者在他身上用的笔墨并不多，但是给人的印象非常突出：倔强、顽强、不屈不挠，为维护本部落的合法权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作品中介绍他觉悟的过程是合情合理的：从具体的镇长、上尉、班长的暴行中逐渐到抽象的白人、政府、祖国的虚假性质，所以他大骂秘鲁是“屁”鲁，所以他撕毁了中尉给他签名的报纸，最后悄然地离开了这个黑暗的社会。

（五）四个地痞无赖的故事

这四个地痞分别是：警长利杜马、“猴子”、何塞和何塞费诺。故事分别出现在第一部第一、二、三、四章的第五场景中；第二部第一、二、三章的第五场景中；到了第三、四部中开始与鲍妮法西娅的故事合并；最后，在《尾声》的第四章中四个地痞做了最后的表演。

四人中，利杜马是个关键人物，他不仅对地痞们有重大影响，而且联系着其他四个故事：他是鲍妮法西娅的丈夫；他是涅瓦镇的警长和后来的警察局长，追捕过伏屋团伙，接待过胡姆的上访。回到皮乌拉后，他又支持安塞尔莫的女儿琼加办“绿房子”。他既是联系林区小镇涅瓦和皮乌拉市的纽带，又是打开书中一些人物关系的钥匙。

“猴子”和何塞是兄弟，姓雷昂，书中有时称他俩为“雷昂兄弟”。他们出生在棚户区式的曼加切利亚区，属于穷人。何塞费诺的父亲卡洛斯·罗哈斯是个码头工作人员，看见安塞尔莫夜间出来勘测地形的就是这个卡洛斯。

在第一部一至四章第五场景中出现的四个痞子，从时间

上说，是利杜马出狱后的事情。他入狱的原因是他从林区涅瓦镇调回皮乌拉与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被捕造成的。他入狱后，妻子鲍妮法西娅先是与何塞费诺同居，但是生活仍然没有着落，只好在酒吧打工，后沦落为娼，在琼加开的“绿房子”卖身利杜马出狱后，何塞费诺先是不敢讲出真情，随后迫于无奈，只好说出端底。三个痞子给利杜马摆酒接风之后，利杜马坚持立刻去看鲍妮法西娅。这时，她已经改名叫塞尔瓦蒂卡。一听说利杜马前来看她，她立刻吓得颤抖起来。何塞费诺其实心里也害怕，但是不得不壮着胆子安慰她。“你别怕。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事情他知道了，但是显得一点也不在乎。”利杜马在“绿房子”的舞厅里见到了妻子，他激动得要命，上前拥抱住她，表面上的确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但是他的心在流血。最后，他终于按捺不住而爆发了：他和雷昂兄弟一道把何塞费诺骗到绿房子外面的沙漠上狠狠揍了一顿；把跟随而来的塞尔瓦蒂卡暴打了一通。恶气出了以后，利杜马和他的“难兄难弟难妻”又回到灯红酒绿的妓院中去了。

关于利杜马与富豪塞米纳里奥决斗的起因，第三部第四章做了详细介绍。这位富豪是皮乌拉有名的棉花种植园主，财大气粗，为人骄横无比。有一次，利杜马和三个痞子在绿房子聊天，塞米纳里奥也在里面跟他的狐朋狗友吹牛。双方都嫌对方的声音太大，互相先是指责，接着是讥刺，最后终于谩骂起来。利杜马这时是警长，身上带着左轮手枪，他怒气冲冲地走到塞米纳里奥面前挑战：玩俄式轮盘赌怎么样？所谓俄式轮盘赌就是把左轮枪的五颗子弹拿出来，摆在桌上，然后让对方看看空空的弹仓，再从五颗子弹中挑选一颗放进弹仓，最后转动了弹仓，突然关闭枪膛。双方这样准备

好以后，利杜马首先拿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人们闭上了眼睛，但是枪没有响。接着，塞米纳里奥脸色苍白地把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随着扳机的扣动，枪响了，人倒在血泊里。这时，琼加带着警察破门而入，但为时已晚。利杜马被捕入狱，被送往利马。他妻子鲍妮法西娅由于没有住处、生活无着落，加上何塞费诺的软硬兼施，便与这个痞子同居了。但是何塞费诺好逸恶劳成习，他逼迫鲍妮法西娅出去打工养活自己。起初，她在酒吧干活，后来经不住琼加的劝说，终于沦落为娼。因此，利杜马出狱后从雷昂兄弟那里了解到上述情况，便非要暴打何塞费诺和她不可。

《尾声》中交待了利杜马与妻子和好的经过。老琴师安塞尔莫的逝世使得四个痞子和好如初。甚至连老琴师的宿敌加西亚神甫也放弃前嫌，为老琴师守灵和送葬。全书到此结束。

第四节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出版于 1977 年，其主要素材来源于作者与他鲁乔舅妈奥尔加的妹妹胡利娅的恋爱和结婚事实，详情已在第一节中介绍过了。书名中的“作家”，原文为 *escribidor*，而不是常用 *escritor*（作家），应译为“写匠”。故事讲述的是玻利维亚戏剧家彼德罗·卡玛乔的故事。全书共有 20 章。单数各章叙述巴尔加斯·略萨与胡利娅的恋爱、结婚经过以及彼德罗·卡玛乔的故事。双数各章则是一个个独立、完整的短篇小说，从内容上看似乎与单数各章没有关系；而从形式上看也风格各异。但是，读完全书

后可以感觉到这是一幅幅社会风情画，如果拼贴起来，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舞台，从而构成单数各章人物的活动背景，使得读者可以充分理解那些人物的恋爱和文学创作为什么会受到如此之多的外部压迫。因此，单数与双数各章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这里特别说一说彼德罗·卡玛乔的故事，因为它是书中仅次于略萨——胡利娅恋爱故事的一个重点。彼德罗·卡玛乔原来在玻利维亚为电台编写广播剧，他的作品深受听众欢迎，但因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这时秘鲁泛美电台的老板便趁机将他挖到利马工作。彼德罗性格孤僻，落落寡合，但才华出众，文笔高超。他编写和导演的广播剧绘声绘色，脍炙人口；他的许多作品家喻户晓，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由于收听率很高，广告收入也扶摇直上，电台老板喜笑颜开。他要求彼德罗多写、快写，后者的工作量一加再加，工作时间一再延长。终于，长期紧张的脑力劳动把彼德罗压垮了：得了疯病。老板一见这棵摇钱树已经被榨干，便把送进了精神病院，一推了之。彼德罗在医院里险些丧命，靠着妻子卖淫支付医疗费，方才死里逃生，但是出院后，已经成了废人。

巴尔加斯·略萨对彼德罗这个人物的塑造使用了浓墨重彩的笔法。这个人物还没有出场，作者就通过电台老板小赫纳罗之口做了充分的铺垫；未成曲调先有情。随后，作者用了浓重的笔墨描绘彼德罗的“亮相”、“这时，阁楼门口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的身影。那是一个矮小的人，身材介于矮子与侏儒之间，长着一个大鼻子和一双异常活泼的眼睛，目光里闪烁着某种不寻常的东西。他穿一身黑西装，看得出已经很旧了；衬衫和蝴蝶结领带上有不少污迹。但是，这身装

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追求的是谨慎而严肃，就像那些老照片上的绅士：穿着浆好的大礼服，戴着合适的高筒礼帽，活像个囚犯。他的年龄大约在 30~50 岁之间，一头长及肩膀的油污黑发闪闪发亮。他的姿势、动作和表情好像与坦率和自然的风度无缘，使人立刻想起带有活动关节的玩具娃娃，想起用线牵引的木偶。他彬彬有礼地向我们一鞠躬，摆出一副与他那仪表不符的不常见的庄重神情，随后做了这样的开场白：“先生们，我要占用你们的一台打字机。如果二位肯帮忙，我将十分感激。这两台打字机，哪台好使一些？”

对这番“开场白”，作者是这样描写的：“尽管我常到中央电台去玩，对声音与身体之间的不一致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一个身材如此矮小、体质如此单薄的人，居然能发出这样宏亮悦耳的声音，而且发音吐字又是这样地完美，实在令我惊讶，仿佛在他发出的声音里，不仅每个字母都清晰可见，一个不缺，而且连每个字母的分子和原子、每个音节里的音素都鱼贯而出，点滴不漏。”

“开场白”写得具体而生动。随着情节的展开，作者一直坚持这种刻画彼德罗的手法。比如，他写彼德罗的走路姿势：“他走路的姿势也是奇特的：迅速而紧张，仿佛担心误了火车一样。”又比如，他这样描绘彼德罗说话的神情：“他说起话来非常严肃，我觉得他几乎没有感到我在听他说话。他是那种只许别人听、不让别人讲的人。像第一次见面那样，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谈吐毫无幽默感，尽管也露出木偶般的微笑——咧嘴，龇牙，一耸眉头——借以装饰他的独白。他无论说什么，都显得极其庄重，加之他那完美的咬字发音，矮小的身躯，古怪的装束，表演式的动作，便显出一种极不寻常的风度。显然，他坚信自己所说的一切。可以看

出，他既是世界上最爱装模作样的人，也是世界上最诚恳的人。”显而易见，作者一开场，就从各个角度描写彼德罗是个“怪人”，是个“怪才”，是个“以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一见面，自我介绍时，他总是说：彼德罗·卡玛乔，艺术家。多次声称：艺术没有国界。）

巴尔加斯·略萨从“怪”字入手描写彼德罗·卡玛乔，接着就转入“傲”字。他从许多角度叙述彼德罗的“傲骨”；不与不合格的演员合作，反对用广告形式“炒作”自己的作品。与“傲骨”密切相连的是“淡泊名利”；在他的广播剧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赞扬的声音不绝于耳，可他在住室的窗户上贴了一张告示：“不接待记者。不签名。艺术家在工作！请尊重他！”对此，他解释说：“我不能把金子般贵重的时间浪费在这些蠢事上。”对于电台老板的欣喜若狂（因为广播剧的功劳，收听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彼德罗的回答是：“艺术和交易所是死敌，如珍珠和猪猡一样。”

巴尔加斯·略萨还十分钦佩彼德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不断完善广播剧的内容、表演、特技，甚至不惜开除老板的亲信大巴布罗，要求老板去胜利电台挖搞特技的技师。录制节目时，不许任何闲杂人员入内，甚至连老板也不例外。老板气得声音都变了：“我不走，他就拒不录音。他还说如果下次我再使排练中断，他就用话筒打我的脑袋。”彼德罗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在给演员说戏时，充满热情，慷慨激昂，“像是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急迫的真理，必须宣传它，让人分享，让人接受。他完全取得了成功：五位演员听得如醉如痴，瞪大眼睛，惶恐地聆听教诲。”演员对彼德罗的评价是：“他把艺术家的职业奉为神明。”略萨了解到，“彼德罗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星期天 8 至 10 小

时，所有这些时间都是富有成果的，即生产出有声的艺术品。”“他用两个手指打字，打得很快。我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却不敢相信。他从不停下来查找某个词或者沉思一下，在他充满激情的小眼睛里从未出现过疑问的影子。看上去他仿佛在誊清一篇背熟的课文，在听着别人的口授打字。他的小小手指如此迅速地落在键盘上，一天工作将近十五六个小时，同时创作出好几个故事的情节、片断和对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确实做到了，剧本从他顽强的脑袋里和不知疲倦的双手里一个接一个地以恰当方式，产生出来，犹如一架机器上制造出来的串串香肠。一个剧本写完之后，他既不修改也不阅读一遍，就直接交给女秘书打印，然后毫不停顿地着手创作下一个。有一次我对他说，看到他工作的情形，让我想起法国超现实主义者们说的“自动书写”理论，那种书写直接来自潜意识，而不受理智的检查。接着，我听到一个颇有民族自豪感的回答：‘我们混血美洲的头脑可以生产比那些法国佬更优秀的东西。’”

如此才华横溢、出类拔萃的作家令巴尔加斯·略萨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看得越来越清楚，生活中我惟一想做的就是当作家。我也越来越相信，为了成为作家，只有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文学之中。我绝不当个半瓶醋或者昙花一现的作家，而要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作家。那么，应该以谁为表率呢？离我最近的就是这位玻利维亚小说家，因为他精力旺盛、勤奋努力、热情奔放，具有才华，令人神往。”

而在电台老板眼里，彼德罗是棵摇钱树，只要拉住听众，做广告的纷至沓来，一切好说。如果搞什么艺术技巧丢了听众的话，那就“把他踢到大街上去了。我们雇他可不是为了让他玩什么独特的艺术技巧，是要他多拉听众。请您转

告他：让他放弃那些现代主义的玩意儿，否则要冒失业的危险。”可是彼德罗又是非常倔强和固执的，无论是来自老板的警告，还是个别听众的抗议和批评，甚至有个阿根廷屠夫的毒打（巴尔加斯·略萨为保卫彼德罗也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依然我行我素。这样，他与老板的冲突和悲惨下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由于彼德罗每天工作接近 20 个小时，他的脑子累坏了，广播剧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出现了混乱，听众开始越来越不满意了。演员们苦不堪言，纷纷要求让彼德罗去休假。老板的回答是：让他休假是发疯，因为有不少听众喜欢这种混乱，“这有调查为证”。道理很简单，对于老板来说，只要能赚钱，管他什么“混乱”还是“怪诞”。因此，彼德罗累死也不能休息。而他自己也不想休假，他回答说：“那只能是进坟墓以后的事。如果我停止创作，天就会塌下来。”可是健忘和精神上的痛苦却紧紧地纠缠着他。悲剧终于发生了：就在电台老板召见彼德罗时，后者的精神病发作了。老板父子大失所望，将其送进精神病院后就撒手不管了。七八年后，当巴尔加斯·略萨从法国回秘鲁探亲时，彼德罗已经变成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了。他勉强在一家杂志社打工，健忘症使他认不出略萨。朋友们说，彼德罗出院后，是个妓女帮助他基本上恢复了神智。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他已经是个废人了。

彼德罗·卡玛乔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在于，秘鲁这个重商轻文的发展中国家只把艺术家当做“艺术商品”的制造者加以对待。资本家与艺术家之间是雇佣关系，残酷剥削的程度不下于工厂主对工人的剥削。“艺术创作自由”是一些书生气十足的艺术家的梦想。任何文艺活动都打着“金钱的烙

印”。此外，严格的文化专制政策和书报检查制度也使得“艺术创作自由”成为一句空话。社会思想的落后、保守和封闭使得“文艺批评”成为打向任何文艺创新的棍子。这几种因素的合力严重窒息、破坏和阻挠着文艺的健康发展。巴尔加斯·略萨对上述种种压迫现象的存在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下决心要去文化发达、文艺创作空气相对宽松自由的法国。要想当个真正的作家就必须离开秘鲁。但是，要想当个真正的作家就必须描写、讲述、表现和反映他熟悉的秘鲁生活。这个认识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彼德罗的遭遇就是证明。

第五节 《世界末日之战》

1981年长篇小说《世界末日之战》问世。小说中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1822年葡萄牙王子彼得罗迫于拉丁美洲日益高涨的独立运动的压力，宣布留在巴西，脱离西班牙王室，成立巴西帝国。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所有制和生产关系没有受到触动。从1824年起，主张共和制的人们与逃亡的奴隶一道纷纷起义。1855年巴西帝国政府为了平息内乱，颁布了禁止买卖奴隶的法令。这时，英国资本已经进入巴西，因此经济面貌有所改观。1865~1870年巴西对巴拉圭开战，最后获胜。黑人奴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帝国政府依然迟迟不肯解放奴隶。这引起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广泛不满。1888年腐朽的巴西帝制难以为继，政府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颁布解放奴隶的法令，但为时已晚，帝国覆灭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1889年丰塞卡将军和皮索

托将军发动政变，各地军队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彼得罗二世皇帝退位，出逃葡萄牙，巴西共和国正式成立。但是，大庄园主与军事寡头政权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依然如故。广大人民呼唤民主的要求成了泡影。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雇工，更是备受天灾人祸之苦。《世界末日之战》发生在“腹地”，即巴西北部的内陆高原，属于干旱少雨的地区。居民多为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人，多以牧牛为生，每年需向牧场主缴纳一定数额的牲口。由于没有文化，加上与世隔绝，他们过着朴素、原始、落后、艰苦之极的生活，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成为普遍的人生观，因而极易接受宗教思想。

1880年前后，一位传教士出现在腹地，他名叫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他宣传原始基督教教义，预言一位伟大英明的君主就要出现，来到世界上惩恶扬善，拯救世人脱离苦海。他很快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信任，人们称他为“先知”、“圣徒”和“劝世者”。他走遍了腹地大大小小的村落，一面布道，一面广建教堂。一些信徒离开家庭，追随其左右。后来，追随者越聚越多，他就以卡奴杜斯为中心，建立起一个近乎原始公社形式的居住地。于是，那里成为贫苦人向往的地方和摆脱苦难的希望所在。“劝世者”身边的力量越来越大，终于他觉得可以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捐税，抵制人头税，反对使用共和货币，反对十进位公制。巴西中央联邦政府闻讯后，立刻派兵镇压，结果三次围剿都惨遭失败。1897年中央政府动员了六千名正规军，装备了重炮和机枪。起义者方面只有三千名手持土枪、猎枪、长矛、大刀、棍棒的战士。但是为保卫自己的信仰和卡奴杜斯，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打退了政府军的多次进攻。最后，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

关于卡奴杜斯的起义，巴西著名作家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6)曾经创作纪实文学巨著《腹地》。作品问世后产生了巨大影响，被拉美文学评论界评为“巴西最佳图书和巴西民族主义的《圣经》。”巴尔加斯·略萨反复研读过这部作品，还根据《腹地》的指引，对巴西东北部进行了六个月的考察。他认为，“我们每个拉美人都应该读一读《腹地》，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十分复杂的大陆。”他对达·库尼亚十分崇敬，在《世界末日之战》的献词中写道：“谨将此书献给另一个世界的达·库尼亚”。巴西不是巴尔加斯·略萨的祖国，卡奴杜斯也不是他熟悉的生活题材，但是他以全部热情开始了《世界末日之战》的创作，其主要原因是他有了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发现、自己对这一起义事件的想象。他说：“卡奴杜斯的悲剧就是拉美国家现实的总结。”这就是说，他要站在今天的高度，重新诠释这一农民起义，赋予这一起义以新的含义，揭示出拉美从历史到现实长期存在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他认为卡奴杜斯起义的发生和失败可以告诉今天的拉美人很多东西，可以提供许多启示。卡奴杜斯起义是一面镜子。在这一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他虚构了《腹地》中根本没有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卡纳布拉沃男爵、加利雷奥·加尔、胡莱玛等。

卡纳布拉沃男爵是大牧场主、大庄园主的代表，出身封建贵族，曾任帝国政府的部长和驻英国大使，是巴伊亚州自治党的党魁。他拥有大片的土地、矿山和工厂，支配和操纵着州政府和州议会，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在巴伊亚洲，他也有政敌和经济上的对手，那就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贵族。这些“新贵”们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卡纳布拉沃男爵在腹地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改变了对“新贵”及其政党——共

和党的方针和策略，做了许多让步。结果，双方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联合镇压农民起义。作者从多重角度揭示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既写他的傲慢、伪善、凶残和奸诈，也写他的虚弱、恐惧、外强中干和色厉内荏。

加利雷奥·加尔也是达·库尼亚《腹地》中没有的人物。此人出生在苏格兰，参加过巴黎公社起义，是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一生多次为无政府主义运动身陷图圉，又几番死里逃生。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使他来到巴西，被卷入卡奴杜斯事件。他按照自己的政治信条，给这次农民起义以极高评价，他说：“在卡奴杜斯，那些穷苦而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们，凭借本能与想象，将我们欧洲革命者知道为建立人类正义而准备做的事已经付诸实行了。”他坚持认为：“这是世界革命的先声。”他甚至打算给卡奴杜斯起义的领导人当“顾问”，企图指挥这场革命。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巴西的国情，不懂得革命理论应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结果处处碰壁，竟然在与胡莱玛的丈夫决斗中死去。巴尔加斯·略萨有意安排这样一个物是要证明：无政府主义在拉美是行不通的；社会革命的发生不取决于“理论”，而是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冲突。

胡莱玛则是一个备受压迫、侮辱与蹂躏的普通劳动妇女的典型。起初，她给卡纳布拉沃男爵夫人当侍女，随后嫁给以当向导为生的鲁菲诺为妻。丈夫常年在奔波，她独守空房，过着孤独寂寞的生活。与加利雷奥·加尔相识后，先是被这个道貌岸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奸污，后来又被卷入战火，被政府军轮奸。后来在卡奴杜斯义军的帮助下，解决了她和近视记者的食宿问题。最后，在卡奴杜斯沦陷前夕，她和近视记者在起义军的掩护下逃离了战火，结为夫妻。胡莱

玛的遭遇说明，广大劳动妇女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在家里受丈夫的气，在外面听“老爷”的吩咐，战火中受大兵的污辱。作者用她跟卡奴杜斯的妇女做比较。在起义军里，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义军大将帕杰乌暗恋着胡莱玛，但是后者不喜欢前者，此事只能作罢。曾经当过绿林大盗的义军大将居然懂得尊重别人的意愿，绝对不用暴力达到目的，这是他接受基督信条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发人深省。

此外，近视记者也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原来是《消息日报》的记者，在政府第三次讨伐卡奴杜斯时，他追随指挥官莫莱拉·西塞上校作战地报导。起初，他也认为卡奴杜斯的老百姓是拥护君主复辟的；他感觉自己有文化，有知识，比农民高明多了。但是，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了起义军民为捍卫生存和信仰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在他遇到困难时，是义民帮助了他；他们纯朴、善良、勇敢的品格深深感动和教育了他。这使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反对农民起义转向拥护和歌颂这一造反行动。近视记者在开始当随军记者时，的确是个政治上的“近视眼”，看不到巴西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随后，在与起义军民的接触中，他感到自己并不了解农民和农村问题，感到必须眼睛向下，必须向农民学习。人民是大海，了解他们绝非易事，事非经过不知难。巴尔加斯·略萨对此深有体会。

从《世界末日之战》的叙事艺术上看，它不同于《腹地》的地方很多。《腹地》是一部社会、人种、地理和历史的科学著作，而《世界末日之战》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作品。它侧重描写和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社会时代的精神和情绪。在写作技巧上，《世界末日之战》主要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在部分结构布局

上，使用了少量现代新小说的手法。例如，作者在第一部第一章里安排了内容各异的五个“板块”，或曰场景，分别介绍了四个重要人物的身世，即：“劝世者”，全名安东尼奥·维生特·门台斯·马西埃尔，起初是云游四方的传教士，后来成为卡奴杜斯起义的精神领袖；《消息日报》社长埃巴米农达·贡萨尔维斯，巴伊亚州进步共和党主席，州议会议员和他手下的近视记者；“虔诚的小信徒”，真名安东尼，又名贝阿迪托，少年时期就追随“劝世者”，卡奴杜斯起义后成为“劝世者”的重要助手；加利雷奥·加尔，苏格兰人，巴枯宁和蒲鲁东的信徒，无政府主义者，流亡到巴西后企图“指导”农民起义。第二章里，“劝世者”已经聚集了相当多的追随者；政府派皮雷斯·弗雷拉中尉带兵去讨伐“劝世者”，若安·格兰德出场，参加卡奴杜斯起义前，他是甘蔗种植园的黑奴，杀死庄园主的妹妹古穆西奥小姐后，落草为寇，四处谋财害命，最后参加卡奴杜斯起义，担任天主卫队队长；加利雷奥·加尔继续在巴西东北部调查研究，寻找点燃“革命火种”的机会。第三章追随“劝世者”的人们又一次打败了警察的追捕；加利雷奥·加尔认识了向导鲁菲诺，希望这位向导带他去卡奴杜斯；玛丽亚·瓜德拉多出场，原为富人家女佣，后追随“劝世者”，担任圣诗班领唱，义民称她为“世人之母”；加利雷奥·加尔用书信的形式向欧洲的同志们报告他调查的情况，特别是卡奴杜斯起义发展的形势，他写道：“我为卡奴杜斯人感到高兴，并同情他们的事业；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在巴西内地，反动派以为在欧洲已埋入血泊中的革命思想，却在这里死灰复燃了。”第四章“劝世者”在卡奴杜斯建造圣堂，追随者们开始过起团结、和睦的定居生活；加利雷奥·加尔思

考巴西自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斗争，同时准备去卡奴杜斯；若安·格兰德遇到“劝世者”，从此改恶从善，决心做“慈悲耶稣的使徒”；加利雷奥·加尔争取到《消息日报》社长的支持，决定给起义者运送武器。第五章起义者与政府军交战；《消息日报》社长与加尔谈话；运送武器的目的，双方各怀“鬼胎”，但是支持起义者是一致的；比拉诺瓦兄弟出场，二人原是商人，后参加起义，负责管理后勤事务；加利雷奥·加尔给同志们的信，汇报了他对卡奴杜斯起义的性质的认识。第六章起义者又一次打退了政府军的讨伐，“大家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欢乐气氛之中”；加利雷奥·加尔运送的武器在鲁菲诺家遭到袭击，加尔打退了土匪的进攻，但是枪支弹药被抢走了。鲁菲诺到火车站上拉生意去了。家中只有胡莱玛。匪徒袭击时，她吓了个半死。加尔赶走土匪后，她投入加尔的怀抱，但这是出于恐惧而要求的保护。加尔却趁机奸污了她。利昂·德·纳图巴出场，这是个大头小腿的畸形人，他喜欢读书、写字，自学成才，后来到卡奴杜斯，给“劝世者”担任书记。第七章叙述布里陀少校率部队讨伐卡奴杜斯，结果被愤怒的义民打得溃不成军；加尔再次受到杀手的袭击，原来政府军的贡萨尔维斯上校需要一具英国人的尸体，以便制造共和党里通外国的口实。杀手名叫凯依法。在胡莱玛帮助下，加尔打败了这个凯依法。至此，作者在这第一部共七章中把主要人物一一介绍出来。第二部只有三章。第三部有七章。第四部有六章。作者都是用这种“板块”结构法，将政府军的镇压活动，起义者的反抗，各派政治力量的角逐一一推向高潮。全书总的叙事时间是按照自然时序进行的，但是在局部也有小的“错位”和“颠倒”，其原因在于制造悬念和给读者以“立体感”。对

此，巴尔加斯·略萨是这样解释的：“我这部小说使用的是传统结构，当然也没有忘记使用当代小说新技巧。这本书的主线是战争冲突。由于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我不得不努力简化它，否则真要变成一座迷宫了。我花的最大力气就在于找到一种鲜明、简洁的表现手法。”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20世纪50~80年代，欧洲和美洲相继有“试验小说”出现。小说家的“试验”主要集中在形式方面，即对小说结构、语言、叙述时间、空间、视角进行大胆“试验”，创造出许多新的叙事艺术形式。但是，有些作家钻进了追求新奇、荒诞的死胡同中，引起读者不满，因为小说不是作家孤芳自赏的个人游戏。巴尔加斯·略萨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追求创新的，但是一向都非常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反对走极端。他批评说：“当代小说正陷入一种荒唐和危险的矫揉造作之风中。有些作家由于过分追求形式，把小说领上了令人生厌的道路，而且作者还在自鸣得意。他们把文学弄得死气沉沉。这的确是一条危险而又可悲的路。但反对这股逆流的力量还是大有人在的。许多人正在转回传统小说的路上，也就是说，转回讲故事的路上。虽然还在利用现代小说已有的成果，虽然还在不断革新，但终究还是转回到传统文学的路上来了。”《世界末日之战》从创作实践上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既重视革新，又注意继承和学习传统中的精华。

《世界末日之战》自1981年10月问世以来，引起了西方文坛的极大注意，除拉美各国争相印行外，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中译本相继出版。欧美文学界普遍给予好评。美国授予作者海明威文学奖。意大利评该书为1981年最佳外国小说奖。秘鲁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院院士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发

表文章说：“《世界末日之战》是巴尔加斯·略萨已出版的十部作品中的最佳之作。它结构完整，情节曲折，以经过锤炼的艺术风格将魔幻与历史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丰富多彩、热情激荡的 1890 年的巴西形象，即一个从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的形象。”阿尔贝托·桑切斯是秘鲁文学和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以批评尖锐和严厉著称，因此这番话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十六章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之路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于 1928 年出生在墨西哥城，其父拉菲尔·富恩特斯是有 30 年资历的职业外交官。卡洛斯随父亲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厄瓜多尔的基多和美国华盛顿等城市度过了他愉快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在美洲第一流的学校里接受了系统、全面的教育，并且从小就学习几种外语。在华盛顿，他 4 岁开始学习英语，这为他后来在美国直接用英语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年后，在父亲帮助下，他曾去日内瓦学习国际法。在日内瓦的一年里，他是国际劳动组织墨西哥代表团的成员，同时担任墨西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回国后，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教书并身兼数职。不久，又被任命为外交部文化司司长。
20 世纪 70 年代，曾任驻法国大使。

卡洛斯·富恩特斯于 1955 年开始文学创作，与友人一道创办《墨西哥文学》杂志。不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出版。1958 年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问世，使他一举成名。1962 年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出版，更加轰动文坛，被普遍认为是作者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作品。此外，中篇小说《良知》、长篇小说《换皮》（1967），《遥远的家族》（1980），《戴安娜——孤独的女猎手》（1994）也都是优秀之作。此外，他的文学论著《西班牙美洲新小说》（1969）、《两个门户之家》（1970），《小说地理学》（1992）在文学评论界也很有影响。鉴于他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1987 年获得了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塞万提斯文学奖；1994 年荣获西班牙王室授予的阿斯图里斯王子文学奖。

卡洛斯·富恩特斯是当今拉美文坛最出类拔萃、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在欧美文学界有较大影响。但是今天的成就是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他说：“我是用胃液来写作的，十二指肠溃疡和大肠炎就是代价。”他深信：“通往天堂的道路必然经过地狱。”这一信念与他的爱好和志向密不可分。他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写作。写豪富和贫穷、奋斗与消沉、爱情与仇恨。”在富恩特斯的经历中，他看到了西方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人们心态的扭曲，诸如：暴力、性犯罪、吸毒、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孤独郁闷等等；当然也看到了真诚勇敢、善良、美好品德的存在。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在无所畏惧地抨击社会腐败与丑恶的同时，也着力宣扬反潮流的铮铮硬骨的精神，这在政治黑暗、文化堕落、世

风日下、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丰富阅历使他亲眼看到了西欧和美国经济、文化、科技高度发达的情形，也看到了拉丁美洲落后的现状。这二者之间的巨大的不平衡性，让富恩特斯既从政治体制和经济历史上寻找原因，更从文化传承和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寻根问底。许多评论家认为富恩特斯是个世界主义者，但是纵观他的一部部作品，可以发现他的根还是扎在墨西哥，只是他的视野非常开阔，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换句话说，他是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观察自己的祖国的，这是从横向的角度而言；而从揭示墨西哥的问题上看，他常常使用历史、文化剖析的方法，这样就构成了横向比较与纵向思考的交叉，而他那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则是交叉、碰撞的结果。

第二节 《最明净的地区》

《最明净的地区》于 1958 年问世，它既是富恩特斯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作者说，这是他对墨西哥现状的总结。作品的背景是首都墨西哥城。书名中的“最明净”是在讽刺首都“最不透明”的状况：人的命运不可捉摸，忽儿飞黄腾达，忽儿身败名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弱肉强食。作品中的时间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主人公叫西恩富戈斯，是个流浪汉。作品通过他的经历，描绘出墨西哥的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工业企业主阶级和封建官僚贵族，下至中产阶级和处于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但是，作品的重点在于揭露那些骄奢淫逸的富翁、惟利是图的奸商以及看风使舵的政客。作者认为，墨西哥贫困、落后的现状是 1910 年

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结果。历史事实证明，至 1940 年为止，墨西哥还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握在大地主、大牧场主手中。上百万户的农民依然没有土地；农村人口中的大多数还是雇农。城市里，失业工人也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资本仍然控制着墨西哥的经济命脉。作者对上述各社会阶层的不同人物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于贵族、富豪、奸商和政客，他毫不留情地一一剥下假面，狠狠地讽刺、鞭挞；对于被压迫、被剥削、被侮辱的劳动群众，则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于某些道德沦丧、利欲熏心的知识分子，则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与愤慨。为此，作品中有意安排了各种不同社会环境和地位的人物，其目的是要揭示出墨西哥社会的真面目。

银行家罗伯雷斯是代表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人物。此人原来出身于佃农家庭，他后来发家致富的手段主要是诡诈与欺骗，投机、钻营和逢迎权贵让他爬到非常显赫的地位。贪婪促使他疯狂地聚敛钱财。心黑手狠又善于浑水摸鱼是“新贵们”的特点。他公开叫嚷：“要么发财，要么挨饿，没有别的选择。你要发财，就得赶快搞资本主义，让一切的一切服从资本主义。”

作者对资本主义发展中造成的贫富悬殊、阶级对立情绪的加剧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是“定时炸弹”，迟早会导致危机和社会动乱。例如，诺尔玛·拉拉格伊代表那类为金钱和享受可以出卖肉体 and 灵魂的女人。她厚颜无耻地声称：她的社会地位是靠色相和疯狂的占有换来的。她很清楚，只有那些明白自己的目标并且时刻准备豁出性命敢捞、敢抢、敢孤注一掷的人才能发横财；要成功就得敢冒险，因为危险中会有机遇和奇迹。善于伪装，善于欺世盗名是她惯用的手段；拍马逢迎，攀附权贵是她常用的社交手腕。她把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看得很“清楚”：相互勾结，互相利用。她时而专横霸道，时而奴颜婢膝，这取决于打交道的对象。因为她是用“势利眼”看人的。她在银行家罗伯雷斯面前的种种丑恶表现，就是上述待人接物准则的生动证明。

知识分子沙马格纳的形象，尤其是他的一系列观点，是作者经过反复思考、仔细琢磨之后塑造出来的。关于国内政治体制，沙马格纳认为地方自治体系所确立的政治制度有许多不合理因素，应该不断改革、调整和完善，关于对外交往方面，他认为一味模仿西欧和美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病态的表现。他哀叹道：“人们总是愿意盲目地追随那些我们所不需要的文化和生活模式，穿着并不合身的服装，……这一切使得墨西哥变成了一个从世界各地拉来的种种破烂与脏土的垃圾场。”为此，他坚决主张，墨西哥不应该接受美国和欧洲的“全面渗透”，特别是“精神文化渗透”，因为墨西哥的社会现实，精神信仰、风俗习惯不同于欧洲和美国。沙马格纳提出，墨西哥应该努力发掘民族文化遗产，因为维护和保存历史文物可以发扬民族精神。在书中，富思特斯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必须具有开放的心态，否则会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泥淖中；关键在于创新，无论继承传统还是学习欧美，都要结合墨西哥的现实，赋予新意，开拓进取，反映当代的精神风貌。富思特斯反对“复古”，强调注重今天和明天，因为墨西哥民族不仅在血统上是融合的，在文化上也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墨西哥的历史是一部融合史，证明了融合的过程，更证明了创新是融合的结果，开创历史新篇章是必然规律。

伊克斯卡·西思富戈斯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幽灵般地出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上流社会还是底层的

贫民窟；他不断地揣摩人们的心态，窥视着人们的隐私。他目光敏锐，具有透视功能，可以直视人们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个人物，作者描绘了墨西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露和批判种种肮脏和丑恶的现象。作品深刻地指出：当代墨西哥只不过是个海市蜃楼，是一张涂了颜色的脸谱，是一张假面孔，而它的背后则是布满疮疤、极其丑陋的真相。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剥去假面，露出这个社会的本来面目。制造假面的人是既得利益者，是有权有势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需要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必须粉饰太平，必须伪装，因为这是欺骗的需要。

在写作技巧方面，《最明净的地区》采用了一些 20 世纪 50 年代风靡一时的“试验小说”的叙事艺术，例如时空错位、电影记录手法、报刊语录摘编、大量使用大众语汇、把西班牙语中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加以颠倒、重叠，如用过去时叙述现在的事情和人物言行，而再用现在进行时描写过去发生的故事，通过这些形式，作者力图表现社会的混乱，展示社会扭曲的形状。

第三节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1962 年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问世，这是富恩特斯又一部重要著作。拉美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这部作品深刻地触及了墨西哥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在写作技巧方面，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才华，全面表现了作者在叙事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动笔创作这部作品的年代：1960 年。众所周知，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率

领的起义军攻占了古巴首都哈瓦那，这一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胜利震撼了整个拉丁美洲，从此掀起又一波拉美反帝反独裁、争取民主的新浪潮。富恩特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1960 年在古巴逗留期间开始创作《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的，因此作品中处处流露出作者对墨西哥乃至拉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看法。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作品一开始，此人已经处于弥留状态，他在回顾自己的一生，特别是 1910 年墨西哥大革命中和战乱后自己的种种表现和复杂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又是与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息息相关，其中又重点揭示了“革命精神”的变化：从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敢洒热血写春秋到革命理想的破灭、斗志的丧失和精神的沉沦。阿尔特米奥·克鲁斯是个黑白混血儿，奴隶的儿子。少年时赶上了 1910 年的大革命。为革命浪潮所裹挟，稀里糊涂地参加了起义队伍。革命战争的烈火唤醒了他的复仇意识，在历次战斗中表现出敢打、敢杀、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革命形势的发展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克鲁斯的视野开阔了，见识增多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责任感。随着年龄的增加，爱情又让他认识到了人生另外的天地。战争让他看到了农民的重要性，谁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会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因此他坚决拥护土地革命的纲领，主张分田给农民。但是，革命领导人之间因勾心斗角，各个起义部队之间因争夺地盘而发生的冲突，内部成员鱼龙混杂引起的矛盾，让克鲁斯看到了革命队伍中阴暗、丑恶、野蛮、下流的种种侧面。在一次战斗中，克鲁斯不幸被俘，在囚禁中结识了贡萨洛斯。这位战友加难友告诉他：一些起义部队的首领是土匪，是军阀，他们拉队

伍打江山都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

作品特别讲述了亚其的故事，他是个印第安人，参加革命后冲锋陷阵，转战经年，立下赫赫战功，但是某位革命领袖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终于设计枪杀了亚其。起义队伍中有许多亚其式的人物，他们一心为革命，而到头来却充当了政客和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和牺牲品。革命胜利后，早把“内幕”看透的克鲁斯做出了新的选择，他积极钻营，攀附权贵，很快就捞到一个“肥差”：掌握了金融部门的领导权。于是，金钱滚滚而来，豪宅有了，名车有了，美女如云般地包围着他，物质极为丰富，可是革命精神丧失殆尽，战友的情谊不见了，人民早已被他丢到脑后，祖国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一具行尸走肉。衰老而死是他的必然。十分可贵的是作者坚信新一代墨西哥人会把克鲁斯们赶下舞台。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彻底否定了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恶性循环，因为处在贫困中、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人们永远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无论老贵族还是新贵族，他们永远是“人上人”，永远是统治者和压迫别人的人。富恩特斯没有简单地描述这个“恶性循环”，他从克鲁斯的思想性格变化入手，抓住了从革命者到腐败分子演变的过程和演变条件，进而剖析这一演变的土壤：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因素，从而细致、生动、深刻地揭示出这个“和平演变”的内在成因，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既残暴又多情，既狡诈又单纯，既令人失望又使人同情，既固执又倔强，因此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有灵魂有个性的。然而，作者又巧妙地处理了这样一对矛盾：克鲁斯个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与社会变化的关系。作者的回答是：病态的社会把健康的个人当

做“另类”处理。比如，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当腐败成为“规矩”的时候，坚持廉洁的人就成为“另类”了。清官的“出局”就成为必然。当然，腐败导致的官场垮台也就成为必然。

《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在写作技巧方面也是成功的。他在全书的构思中采用逆自然时序与顺自然时序交错的手法，让情节沿着上述两种时序发展，具体地说，一条线索是从克鲁斯临终前的弥留之际开始，用倒叙的手法，从病倒、老年、壮年、青年、童年回忆到出生，另外一条线索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让两个或多个场景重叠在一起，时间与空间随着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做跳跃式的排列；此外还采用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交替出来讲述故事的方法，因此叙述的视角也不断地交替变化；与此同时，过去、现在、将来三种时态也是混合使用的，穿插在人物和情节的叙述中，其中将来时使用的频率最高，即用将来时描写过去的、现在进行的以及将来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内心独白和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这样便产生了令读者眼花缭乱的感觉。富恩特斯在叙事艺术上的创新丰富了拉美小说的表现手法。

第四节 《我们的土地》

(Terra nostra)

《我们的土地》于 1975 年问世。读完该书的最后一页读者的脑海里会冒出这样一个印象，这是一部雄心勃勃的巨著，因为它讲述欧洲、美洲和一个虚构的世界。这是一部以历史事实为基础，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大制作。就内容而

言，它包罗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历史事件；阐释了西班牙的国情，思考美洲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宗教、艺术和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可能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对未来理想的设计，其中也不乏动人心弦的冒险故事和对人生经历的深刻反思。如此丰富的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作者企图包罗万象。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博学、驾驭文字、语言的能力和非同寻常的想象力的。富恩特斯具备了这些条件。而支持他写这一巨著的动力就是他试图把心中全部的喜怒哀乐倾注在小说里。在这部长达 783 页的小说里（约合中文 60 万字），作者使用的语言光彩照人，甚至令人感到眩晕，其主要原因就是极力追求一种类似巴洛克式的艺术风格：细腻、雕琢、饱满（害怕留下空白）。为此，富恩特斯戏称自己是个 *puter—inner*（英文）也就是说，小心翼翼地兼收并蓄，讲起故事来常常被素材裹挟。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土地》显得破碎而零乱：时而是巴黎，时而是墨西哥，时而是西班牙，时而是美洲，时而是王室宫廷，时而是平民百姓，时而是地中海边的人们，时而是印第安人……时间、空间、人物、场景，不断地跳来跳去，实在让人眼花缭乱。对此，作者通过书中人物路得维克（Ludovico）（神学系大学生）之口给国王腓力解释了“什么是巴洛克”，他下的定义也可用在解读《我们的土地》身上：“巴洛克就是一朵刚刚盛开的鲜花，其茂盛的程度使人感到：盛开之时即成熟之日，美丽之极，病变之始。艺术与大自然相似，它们都憎恶空白，因此就填满一切空白。巴洛克拒绝延长空间。对于巴洛克艺术来说，生就是死。它的出现就是它的固定。因为它整个包括了选中的现实层面，完全填满这一层面 无法延伸或发展。”（《富恩特斯全集》第三卷第 1277 页）

《我们的土地》中布满了古希腊神话、《圣经》新旧约全书和阿兹特克宇宙起源的神话，作者认为神话是人类生存象征性的外在形式。富恩特斯把“异端”，“深奥”和“革命”三种因素做为巨大的文化常量来支撑着《我们的土地》。因此，作品的基调是：持异端的态度，行动神奇、秘密，急于通过暴力改造社会。这三种调子在书中又常常融为一体“先知”的论调，这在《我们的土地》开篇的《谢词》中可以找到答案。富恩特斯向许多人表示谢意，其中有诺尔曼·科恩（Norman Cohn），因为科恩提出了“革命千年说”，英文原著的书名是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千年说的追求》）。科恩是在耶稣基督统治千年的说法上拓展了“救赎”的含义，指一切主张“救赎”的社会运动或团体都可以包括在千年说中，他说：“就是在千年说的范围内也有无数变种，想象千年以及通向千年的道路也是不计其数的。主张千年说的社会运动和团体有各种态度，从最咄咄逼人的到温和克制的，从最唯心的到最唯物的，各派别的组成和社会作用也是极不相同的。”（引自 Norman Cohn: *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 Londres Maurice Temple Smith Ltd 1970, pag13）科恩这一说法确立了神话的普遍规则，而正是这一点激发了富恩特斯的想象力：人类聪敏的水平线始终如一。由于注意到了千年说这样的冥世观，富恩特斯想到：可以来个大一统，即把所有的神话概括为一个神话，它包括古希腊罗马神话，犹太—基督教神话，中世纪的神本中心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巫术的勃兴，西班牙帝国发展的历史进程，美洲大陆种种象征物的存在与残酷的现实，墨西哥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宗教裁判所与美帝国主义的比较，等等。

《我们的土地》囊括了上述全部神话，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神

话，一种形而上的判断。

围绕着这个崭新的神话，富恩特斯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通过阅读、谈话、咨询、直接观察、调查研究，获得了可以称得上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为此，他用去了六年的时间，随后，他进行归纳和艺术加工及想象，再造出三个世界即：“旧世界”，“新世界”和“另外一个世界”三部分。他将每个部分又分为许多章节。“旧世界”为读者展开了一个广阔和华丽的天地：16世纪傲慢的西班牙帝国，其中心人物是国王腓力二世。书中说，有几件事总是让这位国王烦恼不已。一个是宗教问题：国内的异教徒蠢蠢欲动，基督教内部有人不断地提出反教会的异化声音。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一果断措施所产生的后果：惩罚异教徒的烈火由于自己的优柔寡断而烧伤了自己——他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另外一个烦恼是起点又是终点，全盛之后让帝国跟他一道衰亡。这是一种自我毁灭的冲动，它源于生物的隔代遗传：这位国王的先祖给后代留下了梅毒、血友病和凸颌畸形的病史。这反映在相貌上就是“天庭饱满面皮近似蜡色，一眼凶狠，一眼温柔，鼻直，鼻翼宽，仿佛上帝出于怜悯亲自给他的鼻孔做了扩张手术，为的是改善那困难的呼吸，嘴唇肥厚，颌骨突出，上、下胡须给嘴唇与颌骨做了伪装，而胡须好似喉部的羽饰，短粗的脖子联系着头部上身躯干，脖子上方支撑着一颗巨鹰般的头颅。”（详见《我们的土地》第418页）。腓力二世的第三个烦恼是乱伦之风弥漫在王宫之内。在他与伊莎白尔结婚之前，他父亲已经占有了她。结婚之后，伊莎白尔后来与长大成人的儿子通奸。这第三个烦恼有个象征物，就是埃斯戈里阿尔宫殿（El Escorial）。腓力二世在这座宫殿内的走动也是有象征意义的，他正在走向衰亡，因为 El

Escorial 是炉渣场的意思。

腓力二世周围还有一些次要人物，如，他的亲信，后来变成政敌的古斯曼（Guzman）；老佩德罗；神学系大学生路得维克（Ludovico）；画师胡利安（Julian）；仁慈的修士西蒙（Simion），这些人物时聚时散，都有一些共同的冒险经历。此外，还有修女伊内斯（Ihés），女侏儒巴尔巴里卡（Barbarica），一群工人，一群农民，各类工匠，更为有趣的是，作者把古典小说中的人物也请进了《我们的土地》，如：塞莱斯蒂娜，唐璜和修道院院长。而最为神秘的人物则是在灾难角搁浅登陆的三个金发青年，三人的体貌特征十分怪异：脊背上都有红色十字的印记，脚指都是六个。这是富恩特斯开掘的主题之一：怪异性。这也是巴洛克艺术风格的特征之一。这三个人被分配到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后，命运也各不相同：一个成为伊莎白尔的情人（母子通奸，因为这个小伙子是伊莎白尔的私生子）；第二个成为前王后（Dama loca）的侍从；第三个成为塞莱斯蒂娜的仆人，而这个拉皮条的老女人又是前王后的随从人员。这三人的作用具有决定意义：联系着作品整体的各大部分，是小说结构的轴心。在“旧世界”这个部分结束的时候，第二个小伙子来到王宫，向腓力二世报告他横渡大洋的奇异经历，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些人“戴着绿色、黑色、红色、黄色的面具。”他拿出一副这样的面具给腓力二世欣赏，证明自己的确到达过大洋的那一边。他就是第二部分“新世界”（新大陆）的主角之一，因为他到过美洲。

但是，作品首次出现这三个年轻人的地方不是在腓力二世的治下这一段，而是在小说的开头一章：《塞纳河畔的肉体、大气和灰色的眼睛》。这一章的时间定位在 2000 年

7月14日，地点是巴黎塞纳河畔。这一天发生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迷惑不解：事实是清楚的，但让人无法理解。7月14日这一天是一连串怪事发生的高峰日。其实，在33天以前（这个数字与腓力二世的王宫的台阶数目相同），怪事一一接踵而至：塞纳河水沸腾起来了；圣心大教堂天亮后变成了黑色；卢浮宫变成了透明的建筑；圣像都改变了颜色；凯旋门变成了沙堆；埃菲尔铁塔变成了动物园。其他的不祥之兆还有：各类动物涌上街头；空气里散发着烤肉的气味；四处可见修士们鞭打着穿悔罪衣的人们在游行，他们大声预言灾难即将降临，等等；这是在告诉读者：《圣经》中《启示录》说的末日，就是如此。一个名叫保罗·费波（Polo Febo）的金发美男子（奇怪的是少一只胳膊）是这些怪事的主要目击者。他亲身参与了另一件怪事：给一位90岁高龄的孕妇接生。婴儿出生后，保罗发现孩子的脊背上有红十字印记，脚指是六个。实际上，此前，保罗收到一封从腓力二世时期寄出来的信件。寄信人是神学系的大学生路得维克拉皮条的老女人塞莱斯蒂娜。二人在信中告诉保罗：他应该给婴儿起名叫约翰内斯·阿格里帕。时间交替，生死交替轮回，这样的观念也表现在保罗身上：他沉没在沸腾的塞纳河中。而这样的观念与作者富恩特斯对历史小说的看法有关系。作者在《我们的土地》中是把历史变做纯粹的虚构，变做一种想象，变做朦胧而复杂的情感表现。作者感兴趣的是拿出历史事实凭借情感和想象会发生怎样的事而不在于历史事实本身如何。他不是简单地重建历史，而是思考猜测、想象历史的来龙去脉。他不是利用历史，而是编造历史，修正历史，其方式可以说是任意的，而这种方式并不排斥严谨、讲求逻辑和运用智性的观念。因此，富恩特斯选择了这样的

方法：把 1492、1521 和 1598 年的历史事件串在一起，这三个年头都是世界发生大动荡、人类面对关键性的条条大道的时期，人类选择了一条路的同时，也就否定了另外的道路。以 1492 年为例，它不仅是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一年，也是西班牙国王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南方重镇格拉纳达的一年，也是把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一年，也是西语语法诞生的一年。有趣的矛盾在于：美洲的“发现”意味着西班牙帝国的扩展和开放，而这一运动同时又伴随着闭关自守、拒绝文化多元的政策实施。这个政策忽略了西班牙文化是继承了阿拉伯、犹太和伊比安三种文化的结果，如果再往上追溯，还有古希腊、罗马文化，凯尔特和西哥特文化。1492 年的西班牙在与上述敌人战斗的同时，剪掉了自己的翅膀，是一种自残行为，大一统的目标没有实现，造成了民族性的简单与贫乏。面对这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我们的土地》进行了反思，作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西班牙当时不选择这条道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西班牙还是今天的西班牙吗？美洲还是今天的美洲吗？富恩特斯感兴趣的是那个没有实现、没有写出、想象中的历史选择。而这恰恰是文学才能展示的功能和优势。他在作品中提出：应该让摩尔人和犹太人说话，应该倾听教会内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历史：一切被压制、被窒息和沉默的声音都吐露自己的真情。其中所谓“异端”就是在上帝面前敢于说真话的声音，上帝震怒了，容不得说真话的人，于是变成了“异端”。“异端”的错误在于不听话，不服从上帝的安排，自己给自己安排了未来。教会内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也是如此，宗教裁判所是不容许他们存在的，火烧，刀砍，总之要消灭掉。但是他们顽强地活了下来，不断地变革神话的形式，不

断地鼓舞人类要敢想、敢干，在人类历史上，顶住天上和人间权势敢于传播自由思想、精神独立、人格平等的大有人在。富恩特斯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他说：“异教徒们在重写教义的同时就丰富了对基督、三位一体和上帝生平与个性的看法。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他们的理论，就可以确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引自《关于塞万提斯》第 23 页）也就是说异教徒的历史地位就是“唱对台戏”，比如，腓力二世讲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异教徒和执不同政见者就大讲：历史是可以支配的，可以不断改造的，可以为人类提供建造地上天堂的机会，可以享受人间的快乐，而无需艰苦受罪。在《我们的土地》上处处可见这样的“对台戏”：禁欲与纵情欢乐，理性与疯狂，寻找上帝与四处行乞，骑士行侠仗义与流浪汉行骗，等等。同样，小说对于耶稣的生平也提供了一个“唱对台戏”的版本：约瑟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而是讲究大男子主义的笨蛋；马利亚是个讲虚荣的姑娘；耶稣是个私生子，是个坏孩子，喜欢说谎。“这孩子到了十二岁满脑袋都是主意，好卖弄，整天跟有学问的人抬杠，一肚子坏水，整天做‘伟人梦’，好炫耀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后来，他出去闯荡世界，再也瞧不起咱们这些养活他的人了。老婆，我早就对你说过，那小子狼心狗肺，看不起咱们，在大伙面前都不跟咱们打招呼，从来不跟别人提起咱俩。他劝大家早日离开爹娘，这小子不讲骨肉之情。另外，这孩子总是爱弄虚作假。我跟踪监视过他的行动，看见过他怎样跟拉撒路勾结……”（引自《我们的土地》第 511~512 页）书中，作者通过画师胡里安之口，讲述了这样的“异端邪说”：马利亚是通奸受孕的，耶稣自奉为“巴勒斯坦的政治鼓动家”；约瑟检举了耶稣，亲手打造十字架，把耶稣钉了

上去。”（详见《我们的土地》第 551 页）“异端邪说”的指向是显而易见的：从教义的根本上“亵渎”、“解构”和“颠覆”传统的“真义”。

1521 年在《我们的土地》中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它在西班牙史上鲜为人知，大概也因为这个缘故，富恩特斯特特别讲述了它对作品思想的形成有着何等的重要性。《我们的土地》的思想有三根支柱：异端邪说、狂热的情爱和反叛的行动。而在 1521 年就发生了西班牙卡斯蒂亚地区的公社社员起义。查理五世派兵镇压，起义失败，主要领导人被处死。这一事件的后果是：查理五世把日尔曼—罗马神圣帝国的大一统思想带进了西班牙，镇压了多元、民主势力的发展苗头。（详见《我们的土地》第 53 页 这个事件还证实了 16 世纪西班牙帝国的性质：大一统，不容许异端存在，偏执而狂热。富恩特斯还在书中特别指出，1521 年埃尔南·科尔特斯率领西班牙大军攻占了阿兹特克王国的首都特诺特奇特兰，他写道：“西班牙人建立了垂直式的独裁政权，取代了阿兹特克人的同类政权。”欧洲和美洲，新旧大陆之间在政体上就是这样联系起来的。《我们的土地》把 1521 年公社社员起义的失败与西班牙国事的衰败连接在一起，认为这是盛极而衰的开端。而对美洲的征服则是历史的倒退，犯下了时代错误。落后、保守、陈腐的西班牙王权思想阻挠了美洲的健康发展，给新大陆造成了许多后遗症。

1598 年是第三个关键性的年份。这一年，腓力二世死于重病。这位国王咽气之后，立刻被送上手术台解剖：“胸腔里有四个脓肿块，其中三个里面是脓液，第四个里充满了羽虱。医生们一面掏出五脏六腑，一面报告情况：核桃大小的心脏，肾脏里有三块结石，肝脏里都是水，肠子已经腐

烂，睾丸已经变黑。”（见《我们的土地》第1296页）顺便说一句，这显然是作者的想象，正史绝不会记录此事。但是，这个例子刚好证明了富恩特斯创作小说时对史态的态度：史实是给艺术想象力插上翅膀的一种原动力。腓力二世确有其人，但他在《我们的土地》中却是作者重新想象和塑造的“新人”，因为《我们的土地》需要一个综合性的象征主权的集中典型，所以这个“新人”以腓力二世为基础，又拿来费尔南多国王的风采和查理五世的辉煌，为的是集中表现西班牙人从盛到衰过程中的精神、思想的变化。腓力二世的悲剧既是王室的悲剧，更是西班牙的悲剧。作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想法：美洲由于西班牙的征服而失去了正常发展的机会，因为美洲有它自己神话般的历史。征服者给印第安文明带来的是灾难。

《我们的土地》的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神话般的历史。一开始讲述了腓力之子贝雷格里诺（Peregrino）的漫游，原来他到达了美洲，回国后他给父亲讲述了那片神奇的土地：一股强大的龙卷风把他和老船夫佩德罗吹到大洋彼岸，他们看到了许多神奇的自然景观和土著居民，感觉自己是在梦境里。贝雷格里诺的历险记中有这样一个中心思想：美洲的一切早已存在，美洲的现在仅仅是重复一个古老和永恒的仪式，美洲的历史又是在变动之中的：西班牙征服者的入侵和殖民，独立战争，国内动乱，工农运动……一直到1968年镇压学生运动的流血事件。美洲史充满了冲突和矛盾：为了自由的生存，就必须首先流血；杀人越货与团结行动都有道理。套用贝雷格里诺的一句话就是：“生生死死不灭！”而诸多矛盾中，有许多方面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的后遗症。

作品的第三部分，即《另外一个世界》，比第一部分复杂，比第二部分完整。第一、二部分的任务是释放出巨大的历史力量；而第三部分则是为这些力量提供了意义、结构和出路。第一部分营造了“废墟般的氛围”，西班牙在昏昏欲睡，国王死了，国家也衰亡了。第二部分则因为美洲的出现而打破了这一氛围，以至于国王在弥留之际还否认新大陆的存在，因为美洲证明了时间在延续，空间在拓展。第三部分通过三位著名的文学人物：堂·吉诃德、塞莱斯蒂娜和唐璜将新、旧大陆联系起来，指出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给新大陆带来了理想主义、腐败之风和大男子主义，因为新大陆开拓者身上就有堂·吉诃德、塞莱斯蒂娜或者唐璜的影子，即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鬼影。但是，新大陆的存在又打破了西班牙的神话和迷信。在腓力国王与路得维克的一次谈话中，国王问这个大学生：唐璜在哪里？学生回答说：您放心吧！他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抛弃了西班牙的情人，让印第安姑娘怀了孕，又给土生白人姑娘下了种。他在墨西哥留下了后代。大学生随后坦白说，他只对三本书感兴趣：讲拉皮条女人的，讲愁容骑士的，讲花花公子唐璜的。他告诉国王：“陛下，请相信我！只有在那三本书里，我才真的找到了咱们历史的命运。”（见《我们的土地》第 1281 页）

第三部分不仅让新、旧大陆相遇，当然这本身就很有魅力；更重要的是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达到最大的开放程度。读者时而回到古代，看到了《圣经》中的东方；时而又跳回现代的墨西哥，甚至飞入 21 世纪的巴黎。在《一部禁欲主义者的手稿》的那一章里，讲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古代故事：古代罗马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的故事。记录提比略大事的史官名叫德奥多罗（Teodoro），他把手稿

放进一个瓶子里，而阅读手稿的人则是腓力国王。提比略与腓力二世有许多对称之处：两位最高统治者 are 各自国家极盛而衰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提比略说过：“世界只有一个，罗马是世界之最。”腓力二世则说：“西班牙天下日不落。”同样，也都是因为腐败，两个王室走向衰亡。腓力二世精神上的怀疑与固执预告了腓力四世和查理二世的轻浮、堕落和疯狂。提比略的纵情酒色预示了他的继承人卡利古拉、尼禄的残暴。同样，腓力二世手下有个史官叫古斯曼；提比略的史官是德奥多罗。而书中的塞万提斯也充当了编年史家的角色，记录了古斯曼和德奥多曼的事迹。当然，最后记录所有这一切的则是卡洛斯·富恩特斯。作者使用提比略的故事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如果仅仅局限于历史事实，那么读者知道，提比略的确是在杀害了奥古斯都的孙子、皇帝惟一的合法继承人阿格里帕·波斯图穆（*Agrippa Postumo*）之后登上宝座的。小说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准确的历史事实与想象出来的素材联系在一起了。作者的目的是要深化这样一个思想：阿格里帕就是后来的胡安·阿格里帕，他一人化做三人，背上都有血色十字印记，脚上长着六趾，是灾难滩上的遇难者。而这个印记又是与提比略王朝的结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提比略不无遗憾地说过：“我没有留下后代。假如我有三个儿子，那么就把帝国分成三份。他们再把各自的王国分给九个孙子，然后子子孙孙这样分下去。为了纪念帝国的建立，还要让他们跟母狼交配，生下有狼性的继承人，去嘲笑纳西尔的十字、那个化做血色十字的印记。那么这个纳西尔是谁呢？就是基督耶稣！正是在提比略执政期间，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作者就是这样把想象出来的遇难者的故事与《圣经》故事和基督教起源联系在

一起了。于是，小说的每一部分都在重复《新约全书》的思想设计：基督降世，召示天下，拯救人类。这就是在《我们的土地》上传播的福音，也就是基督统治千年的乌托邦思想。全书的结束是由两个方向确定的：回顾历史，面向未来。重视历史，也重视神话。在《复辟》这一章里，读者看到的是一间茅屋，气氛是紧张的，屋中有位妇女，她在倾听鼓声，介于战鼓和葬礼的鼓声之间。这是贝雷格里诺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遇到的那个半人半仙的老太太的呼声。这个声音呼唤出许多人物。读者发现这是在墨西哥的马德雷山区的游击队营地，美国战斗机在抛洒毒气弹。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性的场面，它概述了墨西哥抵抗外来侵略的历史：反对法国入侵，反对马克西米里亚诺占领时期，反对美国侵占委拉克鲁斯；同时，它又指向未来：在高科技时代，墨西哥依然是牺牲品：“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国家养活不了一亿人口；集体灭绝是惟一现实的政策；必须集体洗脑，让大家明白集体牺牲是宗教信仰的需要。”生生——灭灭——生生，这是书中的历史观：历史是循环的和永恒的。为此，作品的最后几页以寓意的方式再现了这一观念：2000年的最后一天，在巴黎街头出现了《圣经》中启示录预言的景象：浓烟滚滚，四处弥漫着烧烤人肉的气味。这时小说开头时的主人公保罗·费波出现了：塞莱斯蒂娜出现了。二人疯狂做爱。周围的人都已死光。世界上只有这一对男女，他和她生下了魔鬼：一个雌雄同体的“新人类”。新世界又诞生了。

第十七章

何塞·多诺索的小说

第一节 生平与文学创作之路

何塞·多诺索（Jose Donoso）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1924年10月5日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父亲是位大律师，家庭富有。何塞·多诺索度过了幸福、快乐、舒适的童年生活。父母特别聘请了家庭教师为他教授英语。但是，他不喜欢读书，不喜欢家规和校规，经常故意逃学，甚至曾经为此被学校开除。少年时，他曾经在智利南方流浪一年，随后辗转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港口，同码头工人和船员一道劳动生活，后来因病返回智利。由于辍学多年，他直到23岁才高中毕业。1947年考入智利大学教育学院，攻读英国语言文学。1950年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书，1951年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用英语创作

了短篇小说《蓝衣女人》和《有毒的蛋糕》，分别发表在美国文学杂志上。第三个短篇小说《中国姑娘》是用西班牙语写的，1953 年收入《智利新故事选》中。1954 年遍游美国、墨西哥、中美洲各国。1958 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问世。随后去阿根廷生活了两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结识了拉美著名作家、危地马拉的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与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多次谈话，给何塞·多诺索的文学创作以很大启发。1960 年发表短篇小说《查尔斯顿》，同年回智利，在《埃尔西亚》杂志社工作。1962 年何塞·多诺索出席在智利文化名城康塞普西翁召开的拉美知识分子代表大会，因而认识了许多著名作家。其中他与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友谊尤为深厚。1966 年第二部长篇小说《这个星期天》问世。1967 年他在卡洛斯·富恩特斯家中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没有界限的地方》。他从 1963 年开始酝酿创作一部题为《淫秽的夜鸟》的长篇小说，到了 1969 年这部作品终于完成，1970 年该书获得西班牙巴拉尔出版社举办的“简明丛书奖”。1972 年他以目击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写出了介绍 60~70 年代的文学“爆炸”现象的《文学“爆炸”亲历记》。1973 年完成中篇小说《关于资产阶级的三部小说》。1978 年第五部长篇小说《别墅》问世，反响强烈。70 年代后期至 90 年代初，何塞·多诺索和夫人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旁边的花园》和《洛里亚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这两部作品在西班牙出版后，文学评论界反应很好，一度成为西班牙和拉美的畅销书。

1996 年何塞·多诺索在他的祖国智利与世长辞，终年 72 岁。西班牙和拉美文学界纷纷举行悼念活动。

第二节 《加冕礼》

《加冕礼》完成于 1958 年，是何塞·多诺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故事主要情节如下：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一幢古老的住宅里，生活着九十高龄的老妇人艾丽莎，一位大律师的遗孀。她终年卧床不起，由使女们侍候，但是她头脑十分清醒，总是怀疑一切，同时又时时幻想着恢复昔日的贵族生活。她有个孙子，名叫安德烈斯，是个律师，54 岁，仍孤身未娶。由于艾丽莎脾气暴躁，使女们接连辞工离去。女管家无奈，便将自己的外甥女埃丝黛拉叫来照顾老夫人。埃丝黛拉美丽、纯朴、善良，深得艾丽莎的喜爱。但是，这姑娘并不甘于寂寞的生活，她向往热闹和繁华，渴望幸福和爱情。来到艾丽莎家不久，埃丝黛拉认识了食品店的伙计马里奥。这是个热情善良的青年，他喜爱美丽的埃丝黛拉。姑娘也爱上了他。不久，二人便发生了性关系。热恋之中的埃丝黛拉竟然冒险偷窃了老夫人的钱，为马里奥赎回典当的手表。马里奥从小失去父母，由兄嫂抚养长大。哥哥雷内是个市井无赖，没有正当职业，子女又多，家庭经济异常拮据；他经常参与走私和盗窃活动，而且贪恋酒色，对妻子、儿女不负责任，经常混迹于酒吧之中。马里奥只好担起维持兄嫂全家生计的重担。再说安德烈斯，他过着单调、平庸的生活，碌碌无为之中的惟一乐趣是收集手杖。埃丝黛拉的出现让他眼睛一亮，觉得生活里还是有快乐的内容，决心追求她，要娶她为妻。但是，他很快发现姑娘已经有了意中人，便怒不可遏地阻止马里奥来看埃丝

黛拉。一天，马里奥收到哥哥雷内的信，原来这个无赖因盗窃被捕入狱，希望弟弟带些钱物去探监。埃丝黛拉得知后拿出全部积蓄，让马里奥去营救雷内。可是，这时的马里奥产生了一个错误念头，认为一个男人不能一辈子拴在一个女人身上；他打算趁探监的机会出走，抛弃埃丝黛拉。然而这时姑娘已经有了身孕。马里奥找到哥哥，经多方营救，终于获释出狱。兄弟二人返回首都圣地亚哥。这时，安德烈斯已经知道埃丝黛拉怀孕的情况，便去寻找马里奥，准备劝他俩正式结婚。马里奥不在家。雷内一家的贫困状况使安德烈斯极为震动。雷内回到家中，得知安德烈斯来过，便向弟弟询问艾丽莎家的情况。老夫人的财产使雷内起了贪心，他怂恿弟弟继续与埃丝黛拉约会，以便乘机行窃。二人约定动手的日子恰好是老夫人的生日。为了争取埃丝黛拉的配合，他俩不得不把行动计划告诉了姑娘。诞辰这一天，老夫人精神大振，要求起床过生日。但是，亲朋好友们都忘记了此事。只有两个老女仆上楼祝贺，并且献上精美的花冠。老夫人沉浸在欢乐之中。与此同时，安德烈斯在等候好友卡洛斯医生的到来。这一情况妨碍了雷内的行窃计划。雷内于是命令弟弟强迫埃丝黛拉去勾引安德烈斯，以便“调虎离山”，乘机行动。姑娘迫于无奈，前往客厅，但她一路上内心在反抗，终于尊严与良知觉醒了，高声喊道：“有人偷东西！”随后逃离了客厅。雷内见计划失败，把满腔怒火发泄到埃丝黛拉身上，对她拳打脚踢。马里奥实在忍无可忍，将哥哥打倒在地，搀扶着姑娘逃走了。看到此情此景，安德烈斯极为震惊，精神陷入混乱。卡洛斯医生来到时看到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的边缘了。老夫人艾丽莎则头戴花冠，在幸福的“加冕”过程中，抱着幻想“升天”而去。全书结束。

《加冕礼》的主题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一方面揭示智利没落贵族阶级的腐朽与衰败；一方面暴露底层的人们的贫困状况。艾丽莎代表贵族中腐朽的一代；她的孙子安德烈斯则代表着空虚和无望的一代。埃丝黛拉是青春、健美、有良知和尊严的穷人，她在苦难中挣扎，与愚昧、无知搏斗，不知出路何在；她与安德烈斯不可能产生爱情，因为从各种角度上说，她跟他都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爱好和情趣；反之，她与马里奥，不仅年貌相当，而且感情极易交流和沟通，她与他相爱尽在情理之中。雷内属于“社会渣滓”，代表着贪婪、粗野、心黑手狠的一类。

《加冕礼》的叙述方式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但是作者在结构上有所创新，即让贵族和穷人两条线索平行发展，最后在结尾处交织在一起，形成故事冲突发展的高潮。此外，作者非常重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例如老夫人艾丽莎在过生日时由于极度兴奋而产生幻觉、幻视，其实是她心里的幸福感造成的，她感到自己在上帝召唤中正在“升天”而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何塞·多诺索的叙事基调是根据人物和情节的变换而变换的，时而严肃时而嘲讽，时而赞美时而批判和议论。他的叙述话语非常生动，完全摆脱了巴洛克式的雕琢风格，特别讲究准确、简明和活泼。

第三节 《这个星期天》

《这个星期天》是 1966 年问世的。主要的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在智利，上流社会都讲究在夏天去海滨避暑。对于富家子弟来说，如果不能去避暑，那是非常可怕的惩罚。出生在贵族之家的少年阿尔瓦罗由于几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就受到了这样的惩罚。年轻美丽的使女薇奥丽塔奉命留下照顾这位少爷的生活起居。复习功课之余，阿尔瓦罗感到百无聊赖，十分苦闷。薇奥丽塔同情和怜悯少爷的处境，就千方百计安慰他，终于在有了多次肌肤之亲后发生了性爱关系。从此之后，二人就一直秘密地保持着这种私通往来。大学毕业后，阿尔瓦罗当上了律师，在父母的包办下，与门当户对的贵族小姐，美丽、善良的切芭结为夫妻。婚后，二人生下一儿一女。但是，阿尔瓦罗还与薇奥丽塔私下往来，他的感情没有在妻子身上。切芭慢慢发现丈夫另有新欢，但是她要恪守天主教不离婚的准则，便把感情和精力转移到社会慈善事业上去。

薇奥丽塔侍奉老主人三十年后，老夫人在临终时早已明白儿子和使女的关系，便留给薇奥丽塔一些股票和一幢住宅。薇奥丽塔于是带着阿尔瓦罗的私生女过活，但与主人家始终保持密切关系。她女儿长大后与一个汽车修理工结了婚。薇奥丽塔在寂寞中认识了一个名叫玛雅的男人。

切芭在从事慈善业时经常去监狱收购囚犯的手制品。一天，她认识了玛雅。那时，他 30 岁，已坐牢 10 年，因年

幼杀人而入狱。在监牢里，他表现得很好，行为规矩，勤劳、能干，做出许多漂亮的手工艺品，不断受到警方表扬。切芭看到玛雅确有改恶从善的可能，便设法将他保释出狱，并且帮助他办起手工作坊。但是，玛雅抵挡不住社会上吃、喝、嫖、赌的种种诱惑，不久便沉湎于酒色之中，手工作坊也濒临倒闭。切芭闻讯赶来，打算帮他振作精神，重整旗鼓。玛雅宁肯浪迹江湖，便千方百计躲避切芭。但是，一贫如洗的他迫于生计，实在走投无路了，就硬着头皮去寻求切芭的帮助。不料，切芭不在家，开门的是她丈夫阿尔瓦罗。这位大律师早就讨厌玛雅，相见之下，痛斥玛雅厚颜无耻。玛雅愤怒地离去。这时，他想到了从前的情人薇奥丽塔，便去向她要钱。这时的薇奥丽塔已经年老体衰，怒斥玛雅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后者恼羞成怒，一气之下杀死了老太太。再说切芭，她一听说玛雅曾经来访寻求帮助，便急忙去贫民区寻找。她没想到底层的人们完全不理解她的好心，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跑来围攻她，嘲弄她，奚落她。她感到委屈和恼怒，致使火气攻心，昏倒在地。与此同时，玛雅杀人之后，则冷漠地等待着警察的到来。

《这个星期天》继续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批判和揭露贵族阶级的伪善本性；暴露底层的人们的悲惨处境和扭曲的心态。阿尔瓦罗从小养尊处优，受过良好的系统教育，他满口仁义道德，与妻子“相敬如宾”，但实际上他懦弱、自私，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切芭表面上是个道貌岸然、满嘴慈善、同情、怜悯的“高贵夫人”，实际上，她的“好善乐施”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虚荣心以填补婚后孤独、寂寞的心灵。她对玛雅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把他培养成随心所欲的玩偶。与《加冕礼》一样，这部作品也描写了

穷苦人的悲惨世界：触目惊心的贫困现象不只是说明穷人的物质匮乏；更加令人震惊的是穷人的精神麻木、奴才式的恭顺态度以及种种龌龊下流的恶习：赌博、酗酒、偷盗、卖淫等等。

作品中明白无误地指出，贵族和穷人之间存在着一条互不理解的对立鸿沟。无论切芭出于什么动机，她至少希望得到玛雅的理解和对她的感激。玛雅就是顽固不化，就是拒绝合作，就是不理解她的慈善行为，就是不肯感谢她的帮助。这种两个阶级的对立情绪在切芭去贫民区受到穷人的围攻中可以看得格外分明。穷人们，无论男女老少，把切芭当成“异类”和“怪物”，不相信她的任何友好表示，因为他们受到来自统治阶级的欺骗、压迫和侮辱实在是太多、太多，太久、太久了。

第四节《没有界限的地方》

1967年《没有界限的地方》问世。在正文开始前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16世纪英国戏剧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的台词，浮士德问道：“我要问问你有关地狱的事。告诉我，人们称之为‘地狱’的那个地方究竟在哪里？”魔鬼回答说：“就在我们受罪的地方。地狱没有界限，没有固定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受罪，哪里就是地狱。”

作品的主人公名叫曼努埃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天生是个有女孩气质的男孩子，喜欢跳舞，善于跳舞，为人忠厚、善良，一心想用舞蹈使人们快乐。但是，他经常受到的是侮辱、歧视和伤害。他四处卖艺，过着漂泊不

定的生活。40岁时，他来到一座偏僻的村庄。庄里有个大地主兼议员，名叫阿雷霍，他专横霸道，为所欲为。看到曼努埃拉身上的女人气质，他与别人打赌，猜一猜曼努埃拉是“男”是“女”。办法是让一个绰号叫“日本娘儿们”的妓女去勾引曼努埃拉，以验证后者的性别。“日本娘儿们”说服了曼努埃拉，赢得了赌注——一间土屋，二人结为夫妻。阿雷霍是典型的政客，为了竞选议员，他到处开空头支票，早在20年前，他就许下诺言：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但是，年年许诺，年年落空。人们早已心灰意懒了。许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贫困、落后、封闭的状况，纷纷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去了。“日本娘儿们”给曼努埃拉生下一女，大家叫她“小日本女人”。这孩子长大后与老父亲一道经营酒吧兼妓院。“日本娘儿们”死后，阿雷霍为扩大他的种植园的面积，拼命兼并土地，非要买下曼努埃拉的房产不可。“小日本女人”考虑到父亲脾气古怪，担心他老人家搬到异地他乡会受欺辱，便坚决顶住阿雷霍的威逼。全书以曼努埃拉再次出走而结束。

曼努埃拉是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典型人物。他的受罪既有先天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后天社会的压迫，是“地狱”般的氛围裹挟着他，是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欺凌，是不公正的世道让他吃苦。他的无辜和善良衬托出这个社会的畸形和扭曲。他不想伤害任何人，恰恰相反，他想用舞蹈给人们带来欢乐，然而社会上有些人总是要伤害他，凌辱他，压迫他，最后迫使他再次浪迹天涯。

从艺术手法上说，作者刻意在《没有界限的地方》营造一种氛围，“地狱”般的社会氛围。里面的魔鬼是贵族、地主，是有邪恶观念、醉生梦死的族群。受苦、受难的一方则

是曼努埃拉们，是底层无助的人们。可以说“地狱气氛”就是作品的主角，为此，作者运用了从外面描写这一“气氛”的第三人称客观叙述的方式，同时与之配合与呼应的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这两种方法经常重叠和交叉使用，也就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叉使用：第一人称讲述人物内心活动；第三人称介绍情节的发展；第一称的内心独白多使用口语和现在时；第三人称多用书面语言和过去时。二者结合得巧妙而自然，是这部作品的一大艺术特色。

第五节 《别墅》

1978 年长篇小说《别墅》问世。主要情节如下：

故事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作品中没有具体说明地点，但是事情发生在一幢别墅里。那里居住着本杜拉家族，共有兄弟姐妹七人，各有配偶和子女。孩子们总计 35 人。别墅极为豪华，有成群的仆役服务。本杜拉家族的财富主要来源于驱使土著居民采金和加工金箔。这使得大家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本杜拉七兄妹中最小的妹妹嫁给了阿德良医生为妻。这位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大夫经常给土著居民治病送药，渐渐赢得了土著人的信任，逐步揭开了本杜拉家族残酷剥削土著工人的血腥事实。于是，他决心帮助土著居民脱离苦海。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被本杜拉家族视为异端和叛逆，结果被当做狂人关进别墅的塔楼上。

一天，本杜拉家族的大人们全部外出郊游，孩子们交给仆役们照看，大人一走，孩子们自由了，于是各行其事。几

个孩子去探索性爱的秘密；几个孩子追随阿德良医生去“解放”土著居民；几个孩子打开了金库，拿出金箔去换钱购物，然后分给土著人。外出郊游的大人们在归途得知别墅里发生了“革命”，便立刻收买一些仆役去镇压，他们自己害怕得要命，急忙逃往首都避难去了。与此同时，武装起来的仆役们凶狠地扑向手无寸铁的土著人和暴动的孩子们。在大屠杀中，阿德良医生被打死了，孩子们逃跑了，土著人纷纷被捕，重新沦为奴隶。旧秩序复辟了。但是昔日天堂般的生活却一时无法恢复。本杜拉家族决定把别墅、土地、矿山卖给外国资本家，并且急于在野草飞花前成交。可是当外国人前来参观别墅时，一连串怪事发生了：一个被仆役穷追的土著姑娘竟然死在一个外国女人的怀抱里；外出经商的孩子们回来了，她们不仅懂得那些外国人的语言，而且曾经同他们有过贸易往来。突然之间，野草开始飞花了，它们铺天盖地而来，令人感到窒息。本杜拉家族的大人们和仆役们夺路而逃，但终于被漫天的飞花所吞噬。由于孩子们早已从土著人那里学会了避难的方法，因而得救。故事便在这种神奇的气氛中结束了。

何塞·多诺索在谈到《别墅》的创作时说道：“在这部小说中我采用了准确、明快、讽刺的手法。这是一部幻想小说，它既不发生在美洲，也不发生在欧洲和亚洲。小说的主人公们是 35 个 6 至 16 岁的孩子。……在这部小说里，我创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超越了时间界限、然而真实可信的世界。但它不是未来世界，因为我写的不是科学幻想小说，而是描写一个过去的、似真非真的浪漫时期。我仍然坚持选取了我一贯选取的有关资产阶级上层没落的题材。但并不是像有些评论家所说，我特别偏爱资产阶级上层没落的题材，我

所关心的是描写资产阶级的本性。”

揭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何塞·多诺索在文学创作中一贯追求的目标。自私自利、腐朽没落，这是他在《加冕礼》中发掘的主题；伪善、狡诈、凶残是资产阶级本性又一个侧面，是他在《这个星期天》里表现的主题思想；《没有界限的地方》是要反映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狱”氛围，他的确孜孜不倦地抓住“本性”不放。现在到了《别墅》，他要揭开资产阶级内部的“代沟”了；老一代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孩子们变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变成了摧毁《别墅》的主力。这是意味深长的。穷人、土著人、无产阶级固然是资产阶级压迫、剥削的对象，从而导致无产阶级的反抗和革命。但是，从大量历史事实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内部的裂痕，特别是保守派与改革派、新一代与老一代之间的矛盾，常常为觉悟了的无产阶级所利用。在拉丁美洲，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别墅》创作于1976年，作者在作品中刻意渲染的“野草飞花”的漫天气氛就是象征着60~70年代拉美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的发展形势。当然，《别墅》是文学作品，是“描写一个过去的、似真非真的浪漫时期”。这里的“非真”是作家的感觉和想象，而“浪漫”已经带有理想判断的色彩了。而这两点恰恰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在分析《别墅》时，应该把“非真”和“浪漫”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考虑。从文本上，可以看出作者对本杜拉的孩子们是抱有希望的，他认为孩子们身上的好奇和逆反心理很可能成为摧毁“别墅”的原动力，因为他有意安排了孩子们与土著人的“联合行动”，虽然他没有交待孩子们如何克服种种思想障碍走向与土著人相结合的道路的。

可以证明资产阶级内部会出现裂痕的另外一个重要人物

就是阿德良医生，他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但是他接受了人道主义思想，特别是残酷的现实让他看到了资产阶级贪婪、凶狠、自私的本性，尖锐的阶级冲突让他明白总得有所选择，良知告诉他新一代与土著人的联合将会推翻“别墅”，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他坚决站在孩子们一边，站在土著人一边；他经常到土著居民中去治病送药，土著人感谢他，信任他，把本杜拉家族血腥的发家史讲给他听。所有这一切使得阿德良医生逐渐意识到“造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造反成功以后，他是建立“新秩序”的导师和鼓动者。

在写作技巧方面，作者基本上是按照故事情节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时间顺序讲述的。但是，在局部也不时地采用意识流、内心独白、时间、空间重叠交插等手法。在叙述视角方面，作者时而用孩子们的口气，时而用家长的口气讲述事情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偶然用“我”的口气加上一句介绍或者评论。例如，第一部第一章刚刚开始介绍“大人们要去野游”之后，作者就插上一句“我打算以这次野游作为这部小说的中心。”随后又回到孩子们发生的事情中去了。“我”可以自由出入于情节之中。到了介绍大人出游的原因时，“我”突然又冒出来说：“我有幸告诉读者，这次出游的念头，就出自这个如此严肃而孤僻的不同寻常的女孩。”“我”似乎是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是作品又否认这一点：“事实并非如此，她和文塞斯劳及这所别墅里所有的居民，都不知道这个出游念头的确切起因。”这显然是故意制造一种扑朔迷离的气氛。而这一点正是《别墅》追求的艺术效果。“我”的出现和隐没都是在告诉读者：这个故事是“我”编造的，“我”想说就说，“我”不想说就不说，“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看上去，“我”是

绝对自由的。其实，“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叙述视角，一个制造“孩子造反”的童话的道具。正如给孩子讲童话故事的大人一样需要时不时解释或者评论。“我”就是扮演“解释”或者“评论”的角色。例如，“我”冒出解释管家在宵禁之后要惩罚犯规的孩子时，称这种权力为“司法权”。这样一句点评可以起到深化主题思想的作用，可以使读者眼睛一亮。这种手法与最大限度地隐蔽主题思想的技巧是对立的。但是各有各的艺术效果。《别墅》中“我”的存在，一是不断“通报一下时间和场景的变换”；二是“提醒读者和小说的内容保持距离”，因为这是作者自己的小说，可以展示给读者看，但不希望读者与作品内容“对号入座”；此外，还因为作者对传统小说竭力隐蔽“我”的做法以求得“真实”，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我看这是一种可憎的清教徒方式。”因此他要寻找新颖的叙述方式。

总之，《别墅》的写作技巧是十分新颖的，这里举出的叙述人称的变换和善于营造艺术氛围，只是书中诸多技巧的一两种而已。

第六节 《淫荡的夜鸟》

1970 年长篇小说《淫荡的夜鸟》在西班牙出版。获得巴塞罗那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举办的“简明丛书文学奖”。书名取自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写给前往欧洲旅行的两个儿子的信。他说：“每个有头脑的少年都开始感到生活并非儿戏，也绝非一出高雅的喜剧，恰恰相反，生活是无数植根于悲惨深渊中滋生

的花朵和果实。对于每个具有精神生活的人来说，他所继承的天赋遗产是一片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那里面有野狼在嚎叫，淫荡的夜鸟在哀鸣。”意思是说，兽性和性欲是一直潜伏在人类意识之中的。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翁伯特·佩尼亚洛萨。父母双亡以后，他成了孤儿，经常受别人欺负，少年时就被剥夺了家产，落得个一无所有。成人后，他给参议员海罗尼莫当秘书。一次，群众抗议选举中的舞弊行为，举行了示威游行。海罗尼莫被迫躲进教堂。翁伯特为掩护他逃走而身受枪伤。但是游行被镇压下去之后，海罗尼莫却把自己打扮成受伤的英雄，借以捞取政治资本。海罗尼莫患有阳痿，无法满足妻子的性欲。他的妻子伊奈丝便要翁伯特充当性工具，但不承认翁伯特的身份和应有地位。翁伯特表示愤慨，以沉默表示无声的反抗，后来，翁伯特来到海罗尼莫之子建造的鬼怪世界林孔那达，在鬼怪统治的地方，相貌端正的翁伯特反而成了畸形人。由于患了胃溃疡，他的胃部被医生切除了五分之四。昏迷中，他以为全身百分之八十的器官被切除而换上了鬼怪的器官，便觉得自己也属于魅魍魉之流。后来，他戴上一副做广告用的假面具，便认为自己获得了新生。可是，没想到，面具又被顽童击碎，他所获得的能力又被打破。此时，他已变成哑巴，便逃到一所专门收养老妇和孤女的修道院中充当杂役。翁伯特是个无名之辈，出身贫寒，但野心勃勃，渴望跻身于上流社会。可是严酷的现实一再使他的梦想化为泡影，他从肉体到精神一再被剥夺、被欺辱。社会使他感到迷惘，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迷宫之中，但又不得不活下去，甚至不时地企图冲破现实制定的禁区。他是被剥夺、被奴役、挣扎在底层的代表。

参议员则代表着剥夺者和奴役者阶层，他拥有权力、财富、名望、地位，属于人上人。贪婪是他的本性，巩固和扩大权力、财富、尊严和健康长寿是他的追求。但是，他逃不掉盛极而衰的必然规律，颓败之势在身上处处可见：色厉内荏，心虚，恐惧，性无能。就连他的儿子也不能逃脱这个衰亡的法则：奇丑无比，疯狂，最后溺水而死。整个作品由18世纪的一个民间传说贯穿起来：有个农夫生有九子一女，父亲与儿子们耕耘劳作，女儿与一名女仆料理家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两个女人竟是女巫所变，她俩经常危害乡里。父亲与儿子们决心为民除害，杀死了老巫的化身：黄狗。同时，把小巫关进了修道院。这个家族经过二百年的繁衍生息，到海罗尼莫这一代便趋于衰败了。海罗尼莫的妻子伊奈丝就是小女巫的化身，她虽然美貌赛过仙女，但是冷酷无情，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在修道院里，她也像黄狗一样危害孤女老妇。最后她成了疯子，被赶出了修道院。

小说是这样结尾的：修道院要把37位垂垂老矣的妇女迁移到新静修所去。忙乱中，一些雇工运来500个傻瓜。于是修道院里摆满了傻瓜。这时化做包裹的小母狗跟着老太婆们迁出了修道院，他猜出来修道院将被铲土机推成平地。

“母狗”在包裹里憋得难受，拼命要钻出去。但是老太婆把包裹缝了又缝。最后，老太婆来到一座桥下众人围坐的篝火旁，她取出几张纸和几块木片把火弄旺。可是风大，天寒，有些人实在忍受不了这大冷天，纷纷走了。小母狗也趁机跑掉了。篝火熄了，化为一片灰烬。老太婆准备睡觉了。几分钟之后，炭灰已在桥下荡然无存。

《淫荡的夜鸟》的主题是明白无误的：揭露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颓败。何塞·多诺索强调说：“我很感兴趣的只是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毁灭者与被毁灭者的对立关系。”这当然有拉丁美洲 20 世纪 60~70 年代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影响，但是更有作者的思考以及对这一思考的“文学化”或曰“小说化”，因为作品中大量的想象、虚构以及表现这些想象和虚构的回忆、内心独白、时空颠倒、叙述人称的变换都是为主题思想的“小说化”服务的。

综观何塞·多诺索的几部长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遗余力地揭露拉美资产阶级上层社会腐朽、没落、颓败和不可避免的灭亡之势；真实地反映了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状况。他朦胧地感到新一代的中产阶级可能会改善这一状况，但是看到眼前的残酷现实，他感到困惑、迷惘、甚至绝望。他看不到底层的人们会是改天换地的主人，不相信无产阶级会治理好国家，因此他反对暴力，认为暴力只能如同漫天的飞花一样淹没大地。二是他在小说的叙事艺术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试验，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能力。在借鉴欧洲和美国现代派小说技巧的基础上，他有自己的创新，这突出地表现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方面。人的本性是复杂的，何塞·多诺索表现这一复杂性的叙述艺术也是十分复杂的。有时复杂到令读者难以卒读的地步，从而限制了作品的传播。

第十八章

第二代“新叙事文学”作家

“新叙事文学”(la nuevanarrativa)是拉美文学评论界给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新小说”下的定义。其第一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即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何塞·多诺索等人。

第二代作家是指70年代以后陆续登上拉美文坛并且走向西方世界的小说家。为评论界和读书界公认的代表人物有：曼努埃尔·普伊格、伊萨贝尔·阿连德、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等人。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曼努埃尔·普伊格

曼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1932年出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比耶卡将军市。1950年进入布宜诺斯艾

利斯大学，攻读建筑工程学；次年转入哲学系。1956年赴罗马学习电影导演专业。1958~1968年在欧洲和美国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兼任导演助理。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丽塔·海华兹的背叛》，讲述一个阿根廷外省人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作者极力营造消费社会鼓吹的享受气氛，运用大众化的语言，借助对话、独白、日记、歌词、简报等手段，根据少年时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写出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心态和嘴脸。作品出版后，引起了阿根廷文学界广泛的注意和好评。1969年第二部长篇小说《染红的小嘴巴》问世，作品通过三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第一对青年男女是卡洛斯和奈莉达，前者是俊男，后者是美女。二人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倾心相爱。可是卡洛斯不幸得了肺病，不得不住进医院，与奈莉达两地相隔。这对恋人只好通过书信往来表达思念之情。最后，卡洛斯病逝。奈莉达不得不另嫁他人，但心中一直思念着往日的恋人。30年后奈莉达去世，带着保存多年的情书入葬。第二对青年男女是潘乔和拉瓦。潘乔是卡洛斯的朋友，起初做泥瓦匠，后来当上了警察。拉瓦是卡洛斯的女同学玛贝尔家的女仆。在卡洛斯的撮合下，潘乔爱上了拉瓦。但是潘乔又与放荡的玛贝尔私通，后被拉瓦发现。这姑娘一怒之下将潘乔杀死。最后，拉瓦在奈莉达的帮助下，逃到外地谋生，重新过上平静的生活。第三对青年男女是玛贝尔和一个博士生。玛贝尔本来是爱卡洛斯的。后者住院后，她移情别恋，与潘乔私通。拉瓦杀死潘乔后，玛贝尔制造了假案，直到小说结尾时方才在忏悔时说出真相。玛贝尔之所以最后嫁给一个俗不可耐的博士生是出于父母的压力，其实她很想过放荡不羁的生活。作者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发现人们猥琐、

卑劣、庸俗、淫荡的心理活动；加上大量使用老百姓广为流传的市井理语，又巧妙地用书信、日记、对话、内心独白等手法穿插其间，使得这部作品多姿多彩，十分好看。《染红的小嘴巴》是普伊格的代表作之一。它最初是以连载的形式在报刊上发表的，立即引起读者的注意，随后又搬上了电视屏幕，最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拉美各国广为流传，作者名声大振。这两部小说确立了普伊格在阿根廷文坛上的地位。

1973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案件》出版，这是一部侦探小说，描写主人公因为受到压抑而发生一系列心理变态行为。作者运用了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结构故事和刻画人物性格，使得作品突破了侦探小说的常规。

但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更有重大突破的作品还是 1976 年问世的《蜘蛛女之吻》。这部作品通过两名囚徒的对话讲述了六个电影故事。这二人的名字分别是莫里纳和瓦伦丁。前者是个中年人，同性恋者，警察安插在牢房的密探；后者比较年轻，是因参加反独裁统治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入狱的。这二人在狱中共同度过令人煎熬的日子，逐渐加深了认识 and 了解，最后莫里纳决心不为警方利用，反而接受了瓦伦丁的委托，出狱后为革命组织工作，结果为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整个作品集中揭露了军事独裁政府对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以及广大群众所承受的政治压迫。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普伊格的功绩在于他以巧妙的文学技巧深刻而艺术地再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因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在艺术形式方面，《蜘蛛女之吻》的最大特点是全书通过莫里纳和瓦伦丁的对话来讲述所有情节。其阅读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生动、简洁、快速，但是需要借助读者的想象力。比如第十四章一开始就是莫里纳

与典狱长的对话，典狱长告诉莫里纳只要他提供瓦伦丁参加革命活动的情报，哪怕是几个人名和地址，警方就会让他以假释的方式出狱。莫里纳百般支吾搪塞，一味地说，不知道，不清楚。典狱长无奈，最后通知他第二天可以离开牢房了。莫里纳回到牢房，把出狱的消息告诉瓦伦丁。二人十分高兴。瓦伦丁希望莫里纳带个口信给地下组织。莫里纳害怕警方跟踪和再次被捕，没有立刻答应瓦伦丁的要求。瓦伦丁虽然不再勉强，但是露出不快的神情。莫里纳为了让朋友开心，讲述了一个电影故事：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生离死别的结局。故事讲完以后，瓦伦丁还是闷闷不乐。莫里纳请他说出心事。瓦伦丁说，个人生命固然重要，但如果社会政治的恶劣环境不改变，那许多被压迫、被侮辱的底层的人们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莫里纳明白瓦伦丁的意思：希望帮助革命组织工作。最后，他出于良知和对瓦伦丁的友情决定出狱后与地下组织联系。瓦伦丁这才高兴起来。分别时，莫里纳要求瓦伦丁给他一个吻。亲吻之后，莫里纳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牢房。所有上述情节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阅读起来的感觉是故事变化节奏快速，生动，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但是需要读者补充对话之外发生的动作场景。

1979年和1980年普伊格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天使的阴阜》和《永远诅咒阅读本文的人》也选取了同样的题材和故事。前者通过一个美丽女子为自己设计生活道路的故事，反映出20世纪70年代拉美妇女身受种种压迫又不甘寂寞的心理状态。后者是一个流亡者的自述，它痛斥反动政府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对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1982年，他又发表了《情爱之血》，以巴西为背景，讲述了几组不同的爱情故事。1988年，长篇小说《热带夜幕降临》问世，作品仍

然以巴西社会为背景，作者充分运用善于驾驭对话、电影蒙太奇等手法，显示他善于将小说与电影结合起来的特长。

除小说创作之外，普伊格还写出一些电影剧本，搬上银幕的有《星星面纱的后面》、《蜘蛛女之吻》、《乡下人的面孔》、《怀念迪化纳》等。

1990 年，普伊格逝世于墨西哥城，享年仅 58 岁。

二、伊萨贝尔·阿连德

伊萨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是智利著名女作家。

1942 年，“一个偶然的原因”使她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这个“原因”就是她的生父托马斯·阿连德当时在利马任外交官。在她 3 岁时，父亲因卷入一桩淫乱的丑闻而突然失踪，从此下落不明，直到多年后在停尸房警方让她们母女辨认尸体时才出现。她跟随母亲回到智利后，除去与伯父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 年当选为总统）保持联系之外，与阿连德家族的其他人断绝了来往，甚至包括祖父母。伊萨贝尔·阿连德 5 岁开始读书，因过分调皮而被迫转学，进入一所英国人开办的学校。她童年的生活深受外祖母的神秘主义和外祖父正直、坚强性格的影响，这在她第一部长篇小说

《幽灵之家》中有所反映。8 岁起开始阅读文学作品，从此养成对文学的爱好。9 岁时，她从继父手中得到一份珍贵的礼物：《莎士比亚全集》。从此，她就“无数次反复阅读这位文学大师美妙无比的作品”。另外，她觉得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听妈妈讲故事。1994 年，她在《芭乌拉》一书中说：“我写小说的激情就是这个时候诞生的。我一有写作冲动时，就回忆起童年时听到的故事。”在她成长的道路上，

她的继父拉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她的生父托马斯抛弃妻子、儿女的时候，前往秘鲁迎接她和母亲及弟弟回国的就是这个拉蒙。这个其貌不扬的男子汉当时就发誓今生今世、不惜任何代价也要照顾好他们四人。回到智利后，拉蒙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批评和压力，甚至教会的威胁和警告，毅然与前妻解除了婚约，入赘到伊萨贝尔的母亲家中。从此，拉蒙带着母（女）子四人借外交工作之便，游历了拉丁美洲、欧洲、中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极大地开阔了伊萨贝尔的眼界，这对于她后来的文学创作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她在 15 岁时回到智利，次年（1958 年）参加工作，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驻智利办事处秘书。一年后，转入新闻界，开始了她的记者生涯。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智利正是各政党势力为登上总统宝座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是阶级矛盾尖锐、经济情况恶化、社会犯罪率上升的时期，凡是有觉悟、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对种种社会弊病提出批评。作为记者的伊萨贝尔更是不甘寂寞，写出一系列批评社会丑恶现象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赢得读者好评。其中有一篇揭露妇女受到歧视、刁难和骚扰的报道引起舆论界的震动。十年记者生活使得伊萨贝尔不仅了解了许多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而且练就了驾驭文字的好功夫。1970 年，智利人民阵线推举萨尔瓦多·阿连德竞选总统并获得了胜利。但是，右翼势力、特别是与美国财团有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不甘心失败，他们故意制造物资供应危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制造市场混乱，同时收买工贼，组织罢工、罢市、游行，掀起一股股动荡的风波。与此同时，极左组织也在搞破坏活动，致使全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73 年 9 月 11 日黎明时分，智利海、陆、空三军和警察部队举起叛乱

的旗帜，向总统府发起了进攻。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不顾叛军的飞机轰炸和坦克的炮击，镇定地通过电台发表演说，最后在敌人冲进办公室时英勇抵抗，以身殉国。伯父英勇牺牲的精神成为伊萨贝尔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幽灵之家》的灵感来源。书中的总统就是以萨尔瓦多·阿连德为原型的。1992年，她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那次军事政变是把我推到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军事政变之后，右翼独裁政权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大搜捕和大清洗。许多进步人士被逮捕、被杀害或者下落不明。继续战斗的人们纷纷转入地下斗争。当然投敌叛变者也不乏其人。这场社会大动荡、大风波使得人人经受了考验。伊萨贝尔有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同事，从前并不关心政治，发生军事政变之后，尤其是在白色恐怖之中，却毅然决然帮助地下组织转移被追踪的朋友。有几次，他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与参加营救活动的伊萨贝尔秘密接头，成功地把一些民主人士的孩子护送到了外地。这位同事勇敢、机智的出色表现给伊萨贝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她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人就是后来我创作《爱情与阴影》的主人公的原型。”1975年春夏之交，军事独裁政府的镇压活动达到了高峰。伊萨贝尔也受到了跟踪，被逮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她不得不逃往委内瑞拉。

1975至1981年期间，伊萨贝尔生活得十分艰难：失业、寂寞、孤独、怀念祖国让她感到焦躁不安。1981年她在给亲戚写信说，蕴藏丰富的创作素材在心中涌动，一个顽固的念头不时地闪现在脑海：奇特的历史命运是如何在捉弄阿连德家族的，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写成小说呢？1994年她在《芭乌拉》一书中回忆到此事时，写道：“其实从16

岁起我已经在小说的外围——新闻报道、电影剧本、短篇故事——转来转去了。现在，外祖母的幽灵在指引着我，时时给我提供素材，剩下的事情就是敲打字机了。”冥冥之中，外祖母的音容笑貌总是在她脑海里闪现。当她写到《幽灵之家》的尾声时，“这是最困难的部分，我写了一遍又一遍，但是总找不到恰当的口气：要么是太伤感，要么是像传经布道或者政治宣传。我明白我想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时，又是往日的幽灵前来帮我摆脱困境了。”“我立刻跑进厨房（因为是凌晨3点钟，大家都还在睡觉），在不到两个小时的功夫里，我就写完了长达10页的尾声。”1982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女士大力帮助下，《幽灵之家》终于问世。

《幽灵之家》实际上是一部家族史，它讲述了以特鲁埃瓦家族为中心线索三个家族四代人的兴衰变化和恩怨纠葛。作品的社会背景非常广阔：殖民开发、土地纠纷、党派斗争、学生运动、总统选举、军事政变、白色恐怖等等。其中，以萨尔瓦多·阿连德竞选总统并且获胜、右翼势力制造混乱、三军发动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为基本素材所占的篇幅多达30%。除此之外，更多的篇幅则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比如：美女罗莎的故事、三星庄园的故事、布兰卡的初恋等等。这些故事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和恨，爱亲人、朋友、同志和祖国；恨法西斯专制独裁者、军警特务和叛徒。作者采用的表现形式是讲故事：分别由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他的外孙女阿尔芭来主讲。二人都站在20世纪80年代的角度，通过回忆来讲述家事和国事。二人的区别在于：外孙女阿尔芭着重讲述具体故事，外祖父主要补充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变化。这样的叙事结构有些近似《百年孤

独》。这说明了无论《百年孤独》中的布恩迪亚家族还是《幽灵之家》的特鲁埃瓦家族都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但是布恩迪亚家族生活的马孔多镇与特鲁埃瓦家族的三星庄园还是各有自己的地方特色的：前者是加勒比海岸的热带风情、习俗、信仰和传统观念，后者则是智利中部温带地方的风土人情。两部作品都十分重视人物观念中的魔幻因素，认为许多奇特现象都是这一因素产生的，挖掘和表现这一因素可以更好的揭示人物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幽灵之家》另外一个艺术特色就是作者善于渲染气氛，把一些似真非真、扑朔迷离的故事纳入作品之中，借以表现人们的感觉以及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水平。作品问世后，西班牙和拉美文学评论界认为这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的又一部魔幻现实主义力作。认为伊萨贝尔·阿连德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1983年1月8日，伊萨贝尔·阿连德开始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影》。所选取的素材来自真人真事：1978年智利龙根县有人发现了15具尸体，经过调查，死者都是被军警、特务杀害的农民。这15人被掩埋在一座废弃的石灰窑中，是一位神甫发现的。教会揭露了这一秘密，舆论哗然，纷纷谴责这一法西斯暴行。这个消息传到伊萨贝尔耳中以后，让她回想起1973年军事政变以后的种种类似事件。她立刻产生了创作的冲动，便马上把回忆起来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联想起来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现象：军队打着“治乱”的旗号发动政变，上台后迅速进行“大清洗”，一切要求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是“清洗”的对象，其中反对派团体的领袖人物则是重点目标。在20世纪这100年里，几乎每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有许

多爱国民主人士被捕和失踪的事件发生。因此，被害者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寻找亲人下落的现象就具有普遍性了。1994年她在回忆这段文学创作生活时说道：“无论我在家里还是开车上街，脑海里总是有这样一群群形象在晃动：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苦苦寻找自己下落不明的亲人；他们总是包围着我，在我眼前述说着心中的焦虑和痛苦，要求我非把他们的述说写出来不可。1978年发生的龙根事件早已经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了，15个牺牲农民的资料也搜集得很多了。我的工作只是用文学语言把人物和故事叙述出来而已。”就是在这样的心境里，伊萨贝尔·阿连德于1984年写完了第二部长篇小说《爱情与阴影》。作品讲述了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士兵和警察关闭了一座矿山。有个农村姑娘名叫埃万赫丽娜，她有特异功能，可以让房屋震动，令牲畜起舞，因此被老百姓称为“圣女”。可是军警认为她蛊惑人心，便将她秘密杀害了。人们在寻找她的过程中遇到了热情、善良、正直的女记者伊尔内。她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勇敢地冲破戒严令，闯入那座被关闭的矿山，发现了那里还有刚刚被特务杀害的革命志士的尸体。他们给烈士一一拍摄了照片，然后交给了教会的红衣主教。教会立刻要求军政府打开矿山，人们急忙挖掘那些可疑的地方，结果又发现了更多的尸体。消息传出去后，舆论哗然，纷纷谴责独裁者的法西斯暴行。但是军政府百般抵赖，随后又派特务去暗杀伊尔内。这位女记者侥幸逃脱，便赶忙和未婚夫逃亡到了国外。小说问世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许多读者对作品的真实性称道不已。但是，伊萨贝尔·阿连德的母亲看了原稿却连连摇头，她说，那个时候女记者不敢冒那样的风险。女儿回答说，这是必要的艺术虚构和联想，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而且现实生活中肯

定会有这样勇敢的人。果然，1988年伊萨贝尔回国探亲时，有人执意要见这位女作家。来访者告诉她：1978年在他担任教堂神甫时从一个教徒的忏悔中得知，龙根矿山是个埋葬爱国志士的大坟场。他连夜骑摩托车去矿山查看，结果发现了许多横倒竖卧的尸体，于是把现场拍照下来，将照片交给了红衣主教。教会马上组织了新闻记者和外交使团前往调查。结果真相大白于天下。谈话到了最后，这位有正义感的神甫问伊萨贝尔：您是怎么知道有人去闯禁区的？因为如果当时就有人知道这事是我干的，那我早就没命了。伊萨贝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是死者的亡灵在给我吹风。”实际上，是艺术灵感在给她提供虚构的细节，是她本人渴望、钦佩和呼唤的这种勇敢精神在作品中的反映。

1987年9月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夏娃·鲁娜》在西班牙出版。这是一部讲述一个名叫夏娃的妓女如何陪同一位作家兼新闻记者前往游击队营地的故事。后来，她和他又一道同游击队去袭击监狱、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但是，贯穿全书的情节是夏娃的爱情故事，是艰苦岁月里的爱情故事。作者试图说明个人的命运离不开社会的命运；儿女情长不能抹去现实的残酷性质；病态的社会肯定会传染每个人的心灵。1991年伊萨贝尔·阿连德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无限的计划》问世，讲述的故事是：一个苏格兰—犹太混血家庭在美国驾驶着大篷车四处游荡，宣传《圣经》中预言的“无限计划”。但是，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终日浸染着这个信仰虔诚的家庭。1994年10月，伊萨贝尔又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芭乌拉》。这是她在女儿芭乌拉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回忆和抒情随笔，主要内容包括：女儿患病到去世的详细过程；作者的悲伤、绝望和思念之情；回忆女儿

的成长经历；回忆外祖父母和父母的往事；对自己私生活的检讨。作品的特点是感情真挚动人，文字洗练优美。因此在出版后的两年里，该书长期位居西语世界畅销书榜首。从 1983 年到 1994 年，先后有智利、德国、法国、比利时、美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授予作者各种奖励。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 25 种文字，包括中译本的《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和《夏娃·鲁娜》。

三、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费尔南多·德尔·帕索 Fernando del Paso 是墨西哥小说家、外交官。1935 年出生在墨西哥城。青年时期就喜欢写诗、作画。大学期间，攻读生物、医学和经济学。从 1966 年至 1988 年他共创作了三篇长篇小说，即：《何塞·特里格》、《墨西哥的帕利努罗》和《帝国轶闻》。1996 年他创作了一部侦探小说，题为《林达 67：犯罪的故事》，情节曲折复杂，叙事艺术风格生动、活泼，由于反映了底层人们的艰难处境而内涵深刻，颇受读者好评。

《何塞·特里格》发表于 1966 年，主人公名叫何塞·特里格，原是墨西哥山区的农民，为生计所迫，来到首都打工，住在城北的贫民区里，在穷哥们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工作。1960 年，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政府当局对工人的不公正待遇。何塞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但由于工会的错误领导，罢工失败，贫民区的住房被拆毁，居民们流离失所，只好各奔东西。作品的语言十分生动，把古代神话和残酷的现实巧妙地浓缩在一起，极力表现墨西哥历史与现实的特色。实际上，何塞·特里格的生活经历仅仅是审视墨西哥

历史变迁的“镜子”，因为书中展示了一千多年来墨西哥从阿兹特克文化如何演变到今天这副模样的，但是语言生动而简练，尤其是借助了不同时代的诗歌来表现历史特征，所以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气氛。作品问世的当年即获得墨西哥乌鲁蒂亚（以著名作家命名）文学奖。

《墨西哥的帕利努罗》于 1975 年参加墨西哥长篇小说征文比赛，获得全国文学奖。1977 年首次出版。帕利努罗是作品的主人公，大学医学系的学生。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作品的历史背景就是 1968 年在首都墨西哥城三文化广场上的大惨案：1968 年 7 月至 9 月，首都墨西哥城和一些大城市的大学生先后举行罢课，人数达 17 万之多，他们提出要求民主、保障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政治权利、实行大学自治等主张。其核心力量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10 月 2 日首都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迪亚斯·奥尔达斯政府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满载军警的坦克和装甲车包围和袭击三文化广场上集合的群众，造成 325 人死亡，2000 人受伤，2000 多人被捕的惨剧。由于三文化广场又称“特拉特洛尔科”，故称特拉特洛尔科大惨案。这一事件长期影响着墨西哥社会的政治生活，给广大群众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帕利努罗就是在这一事件中牺牲在军警的屠刀之下的。但是他死不瞑目，其灵魂漫游世界；他时而嘲讽时弊，时而控诉社会黑暗。他充满纯真、童心和热情；他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举起两个象征着“胜利”的手指就得死于非命。全书共 658 页，分为上下两部，涉及到医学、法律、哲学、社会学、性心理学等学科，因此评论界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的语言十分有特色：既有雕琢的巴洛克风格，又有黑色幽默式的话语；既有生动的对话，又有大量的内心

独白；既有学术性很强的演说，又有痞子味十足的叫骂。令人热血沸腾的牺牲精神、动人的故事情节以及活泼有趣的叙述话语赢得了评论界和读书界的高度赞誉：“自由开放的想象力赋予这部作品一道魔幻和令人惊讶的光彩。”（拉美文学教授 Giuseppe Bellini 的话，《新编拉美文学史》第 562 页，1997 年马德里）1982 年，该书又获得委内瑞拉政府颁发的加列戈斯文学奖。

1988 年，《帝国轶事》出版，小说叙述了 19 世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费尔南多·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奉拿破仑三世之命前往墨西哥建立第二帝国的经过及其悲惨的结果。1861 年，墨西哥总统华雷斯下令停止偿还外债。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此为由发兵征服墨西哥，企图建立以欧洲天主教皇族成员为傀儡皇帝的帝国。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被选中担任这一角色。1864 年，他携带妻子比利时公主卡洛塔前往墨西哥。1867 年，法国侵略军被墨西哥政府击败，第二帝国覆灭，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被处决。小说通过卡洛塔自述的形式讲出了她跟随丈夫到墨西哥建立帝国的经过以及两年后她为筹集军饷又返回欧洲的故事。她没想到时间仅仅过去一年帝国就土崩瓦解，丈夫也牺牲了。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她在欧洲一座海滨城堡里生活了 60 年。她终日沉湎在对往日的回忆中，直到 1927 年逝世为止。作品借助她的独白既讲述了法军入侵墨西哥的历史，又娓娓道来欧洲的百年变迁。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讲述历史的层面，他凭着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极力营造一个文学世界：华雷斯总统、马克西米利亚诺大公、拿破仑三世、卡洛塔公主等历史真实人物的故事确实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但是他们各自仅仅从一个侧面、一个视角看世界，仅仅构成历史上的一个点。而恰恰是

这样一个个大大小小人物的体验、观察和思考构成了历史的全景画面。在描绘这一全景画面的过程中，作者大量使用内心独白（如第一章的卡洛塔公主的自白）、客观交叉叙述（如第二章对华雷斯总统和拿破仑三世的介绍）、对话（如第二章第2节罗马元老院和威尼斯贵族的谈话）、书简（如第四章第3节让·皮埃尔致弟弟阿尔方斯的信）等叙述技巧。这种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要求作者既要有大量翔实可信、旁征博引的历史资料，更要发挥文学特有的优势：建构艺术想象的世界，把人物的七情六欲、精神和灵魂虚构出来并且活灵活现地让它们在这个艺术世界里表演。

《帝国轶事》成功地完成了二者的结合。其典型例证就是关于卡洛塔公主的精神疯癫状态的刻画。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也的确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变故；但是，她那疯癫而复杂的心理变化的细节却需要作家凭借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去一一创造出来。比如，卡洛塔公主出场时说的疯话就是作者的虚构：“我是比利时的玛利亚·卡洛塔，墨西哥和美洲的皇后。我是玛利亚·卡洛塔·阿梅利亚，英国女王的表妹，圣查理十字骑士团的大首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出于怜悯和仁慈而庇护在双头鹰卵羽下的伦巴第一威尼斯诸省的总统夫人。我是……。我是……。我是……。”（张广森译）作者让她用疯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将过去和现在、真实和幻想、激情和冷漠、理智和疯狂糅合在一起，再一一倾诉出来，从而塑造出卡洛塔公主独有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更为有趣的是，作者刻意让欧洲的贵族感受并道出什么是墨西哥精神，感受并道出墨西哥人民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所表现的勇敢、顽强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帝国轶事》出版的当年仅墨西哥一国就印刷了5次，西班牙、哥伦比亚和阿根廷

也一再重印。1988年，该书在欧洲的图书博览会上引起广泛注意。1989年，已有英文、法文、德文、瑞典文、葡萄牙文的译本问世。作者渊博的学识和艺术才华赢得了西方文学界的广泛赞誉。

四、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

阿尔弗雷多·波里塞·埃切尼克 (Ifredo Bryce Echenique) 是秘鲁当代著名作家。1939年2月19日出生在首都利马。童年在教会学校读书；中学在英国人开办的寄宿学校度过。1957年，考入国立圣马尔克斯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和法律。1963年获得律师头衔。196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是：《海明威小说中对话的作用》。1964年底，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法国古典与当代文学。同时在法国一些大学里兼职讲授拉丁美洲文学史。1975年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年，他还担任了墨西哥《太阳报》文化副刊专栏撰稿人的职务。1984年全家离开法国，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定居。90年代以来，除专门从事小说创作外，还经常为西班牙《国家报》和《ABC》报撰写文学评论文章。

1967年埃切尼克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这一年他的短篇小说《同吉米在帕拉卡斯度假》发表在文学季刊《阿玛鲁》上，引起译论界的注意。1968年短篇小说《关闭的果园》获得当年古巴政府颁发的“美洲之家”小说奖。1971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问世，讲述了秘鲁大资产阶级家庭的故事。主人公名叫胡里奥，其曾祖父担任过共和国总统，祖父是金融、政治寡头的领袖，父亲是数十亿

家产的继承人。胡里奥出生后一年半，父亲就去世了。美丽的母亲很快被另外一个富翁追求到手，她整天寻欢作乐，四个孩子交给保姆和家庭女教师照管。胡里奥 1 岁到 5 岁就是由保姆维尔玛和家庭女教师胡丽雅带大的；他 3 岁就开始读书学习，以后他一路顺风，样样得意。但这是表面现象，贵族亲戚之间的来往只是一种虚伪的应酬。胡里奥感到孤独、空虚和寂寞。他只有和保姆在一起的时候才感到温暖。但是童年的时光一过，连这一点温暖也被大人先生们破坏了。作品在结尾这样写道：“不错，胡里奥是长大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在松口气和随之而来的梦想之间，有一大块空白，有一种深不可测的寂寞。胡里奥不得不用漫漫长夜和悄悄的啜泣来填补这一空白，当然啜泣中也充满了疑问。”作者在这部小说里力图表现生活在大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孩子往往被傲慢、偏见、冷酷、自私的思想感情所束缚，他们在物质方面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在心灵深处却是孤独和寂寞的。《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问世后，受到欧洲和美国读书界和评论界的欢迎，被翻译成 12 国文字。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1977 年，长篇小说《死不悔改的佩德罗》出版，作品讲述了一个秘鲁青年旅居欧洲时的坎坷遭遇，其中有作者的亲身体验。1981 年，长篇小说《鲁马尼亚夸夸其谈的生活》问世，实际上这是《佩德罗》的续篇。主人公是个出身秘鲁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青年，他来到法国的目的是要当个作家，但是巴黎的文化精英们以世界文化中心自居，根本不把来自第三世界的文学青年放在眼里。种种冷遇使得鲁马尼亚清醒过来，他对丑陋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84 年出版的《谈及奥克塔韦亚·卡迪斯的人》又是《鲁

马尼亚夸夸其谈的生活》的续篇。1989年长篇小说《菲力佩·卡里约的最后搬迁》试图通过主人公菲力佩的漂泊生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这一辈子在寻找什么？答案是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孤独。1991年中篇小说集《两位太太的谈话》出版，由三个中篇组成，即：《两位太太的谈话》、《沙漠之蛙》和《大老爷们就是如此，也就是如此》。其主题是爱情、世界上的怪事、乡愁以及欧洲神话的破灭。1993年埃切尼克的回忆录《生活许可证》出版，详细回顾了他自己的生平和文学创作的经历。1995年长篇小说《四月里别等我》问世，作品长达611页，主人公马依戈·斯特内这个富家子弟少年时调皮捣蛋，多次被学校开除，可他仍然不好好读书。成人后，他去欧洲留学，方才懂得知识的重要性，但是精神非常苦闷，常常思念儿时的生活和伙伴。40年后他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又看到童年时的朋友，大家都已进入花甲之年，个个垂垂老矣。然而，秘鲁社会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治寡头依然横行霸道，贫富依然悬殊，恐怖活动依然猖獗，社会道德更加沦丧，治安更加恶化。马依戈面对这一严酷现实却表现得麻木不仁，依然沉湎在他那及时行乐的人生观之中。原来他出走时的思想就是逃避现实，如今这样残酷的现实更加让他感到失望，祖国让他感到陌生。惟一可以告慰心灵的是亲戚朋友对他的关怀。在这部作品中，爱情和幽默是主旋律，但是，笑声、哭声、咒骂声和叹息声，处处可闻。作者巧妙地把嬉笑怒骂编织成了锦绣文章。西语世界文学评论界认为埃切尼克的作品有以下特点：30年来（1967~1997）创作的绝大部分作品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他的矛头始终对准秘鲁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朽和没落，始终针对他们自私自利的本性。埃切尼克是从那个营垒

里出来的，他非常了解那个阶层的心理状态，所以能够入木三分地揭示出他们复杂的性格和堕落的根本原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埃切尼克掌握了独特的语言艺术，调侃、嘲讽和幽默是他作品的语言基调，加上他善于借用电影、电视中的剪接技巧，从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结构故事和编织情节，因此他的作品生动和奇特，令人感到在可笑背后还有沉重的内涵。这些特点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72年，秘鲁《辩论》杂志邀请80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回答“你认为秘鲁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哪一部？”时，《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得票最多，赢得了“秘鲁最佳小说”的称号。同年，这部小说还获得了秘鲁全国文学奖。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也在1972年对报界说：“埃切尼克通过这部小说，衣着华丽、光彩照人、佩带宝剑、心胸博大地步入了文坛。”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是拉丁美洲作家创作的最优秀小说之一。它的精美之处在于：内容充满智慧，语言生动、优美，讽刺、幽默、惆怅、柔情、思乡与对现实的深刻认识绝妙地糅合在一起。”埃切尼克的大学老师、秘鲁著名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评价是：“《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是拉丁美洲构思巧妙、生动有趣的最佳长篇小说之一。埃切尼克在这部作品中，通过一个孩童的感觉描写出了独裁集团对民间疾苦麻木不仁和充满尔虞我诈的世界。作者的批判是深刻的，但同时又通过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语言，有节制的柔情和惆怅的思乡之情减轻了批判的锋芒。”西班牙诗人、出版家卡洛斯·巴拉尔说：“埃切尼克是位极出色的作家。从艺术风格上说，他是近年来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家之一。他拥有西语世界罕见的柔情和谨慎。《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

不是像有人说的仅仅以利马为背景，它对现实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作品的轻松风格是表面现象。如果有人要追随埃切尼克，恐怕是很困难的。这一点他与巴尔加斯·略萨不同，巴尔加斯·略萨现在已经有一群模仿者了。”美国著名文学翻译家乔治·拉巴萨对新闻记者说：“《为胡里奥准备的世界》是拉丁美洲叙事文学的杰作。埃切尼克是秘鲁最优秀的作家。”

第十九章

走向 21 世纪的 拉丁美洲小说

继 20 世纪 60~80 年代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小说”创作高潮期之后，一批出生在 1945 年前后的年轻作家纷纷登上舞台，把“新小说”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创作了一批新的成果。由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等人以及第二代作家例如伊萨贝尔·阿连德和埃切尼克还继续在创作，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作品仍然在发挥着“导师”的作用，因此在文坛上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但是，又有新一代作家登上文坛并且已经羽毛丰满，在 1980~2000 年这 20 年中，已经证明了他们的创作实力，因此已经牢牢地在拉丁美洲小说界站稳了脚跟。在这 20 年里，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意识形态对立的消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军事独裁政权的垮台、左派游击队的纷纷解散、重大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

混乱、美国霸权主义的横行都在刺激着作家的思想，迫使他们直面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因此许多作家自觉地坚持对社会应有承诺的立场，对社会的丑恶继续保持批判的态度。在小说艺术技巧方面，改革旧小说模式的试验仍在进行，但是兴趣已经减弱，回归“批判现实主义”的苗头已经出现。题材方面，由于纪念哥伦布登上新大陆 500 周年活动的展开，一度出现了不少描写历史故事的小说。语言方面，作家们更加重视大众化和打破文体界线。由于跨国出版集团的成立，他们的作品传播得更加广泛，欧洲和美国加强了对拉丁美洲小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下面重点介绍几位有代表性的又一代“新”作家（实际年龄与巴尔加斯·略萨是同代人，只是登上文坛的时间较晚而已）。

一、阿维尔·波塞

阿维尔·波塞（Abel Posse）1936 年出生于阿根廷的科尔多瓦市，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外交部工作。先后在苏联、秘鲁、法国、以色列和捷克任外交官。1999 年在布拉格担任阿根廷驻捷克大使。到 1998 年止，波塞已经创作了 9 部长篇小说，即：《大螯虾》（1968）、《虎口》（1971）、《达伊蒙》（1978）、《天堂的狗群》（1978）、《隐藏的魔鬼》（1988）、《阿喀尔达的旅行者》（1989）、《拉布拉他河的女王》（1990）、《行者漫长的黄昏》（1992）、《源于埃娃的激情》（1995）和《黑色先驱》（1998）。其中《天堂的狗群》获得 1987 年委内瑞拉政府每 5 年颁发一次的拉丁美洲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

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瑞典文、捷克文、俄文、爱沙尼亚文、日文和丹麦文。

《天堂的狗群》叙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过；《达伊蒙》描写西班牙征服者洛佩德·阿基雷（约 1511 ~ 1561）在亚马孙地区寻找黄金国的故事；《黑色先驱》讲述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历史。评论界认为这是波塞创作的美洲被“发现”、征服到独立的三部曲。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文学作品，但是这样的作品又艺术地再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让 20 世纪的读者重温哥伦布走过的路、阿基雷冒过的险、玻利瓦尔打过的仗……以便从中发现今天病症的根源。这就是波塞的创作意图。《达伊蒙》的主人公洛佩·德·阿基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于 1544 年到达秘鲁，先后参加了西班牙征服大军对印第安人的镇压活动以及征服者之间的内战。曾被流放，有“疯子阿基雷”之称。1560 年 9 月 26 日他参加了由乌苏亚指挥的冒险远征——前往亚马孙河源头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1561 年到达该地后，阿基雷挑起叛乱，杀死了乌苏亚及其继承人古斯曼。夺取了指挥权后，他顺着亚马孙河直抵大西洋，一路烧杀劫掠，残害印第安人。同年 7 月，占领马加里塔岛，宣布反对国王。西班牙王室派遣人马将其捕获并且处死。阿基雷凶残的性格和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拉丁美洲广为人知，他的名字几乎成为凶残和背叛的同义词。波塞把这个幽灵般的人物透明化，让他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并且延长了他的寿命，把他变成一个历史的见证人，由他述说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崩溃、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的爆发、各个共和国的建立、军队夺取政权和独裁统治的确立……总之是拉丁美洲 500 年来的复杂历史。波塞的独创性在于：借助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填补了历史留下的空白。他从拉丁美

洲现实的丑恶现象中去发掘历史的根源，因此写下了许多从古印第安文化到当代拉丁美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但他不是就事论事、就人说人，而是要阐述这样的思想：西班牙征服者和天主教传教士给美洲带来的是不公正、屠杀、罪恶、暴力和对良好人际关系的践踏。拉丁美洲现状中的种种弊端由此而来。在艺术方面，波塞让阿基雷生活在现实和非现实之间：阿基雷和他部下的幽灵至今飘荡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作者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景物，用嘲讽的和调侃的口气抨击政客们的投机取巧、商人们的惟利是图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全书的结尾处，阿基雷目睹了拉丁美洲 500 年的悲惨历史，对于种种“大事”造成的恶果深感内疚，从而彻底否定了欧洲人给美洲所带来的“功劳”。

波塞的这一思想和艺术追求在《天堂的狗群》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他以哥伦布出发前西班牙王室的勾心斗角为背景，写出了哥伦布出海探险时的社会压力和个人目的：发财。作品在哥伦布企图寻找“伊甸园”和“黄金国”成功之后，继续延伸到 20 世纪，让现状和历史进行对比，作者时而影射，时而直接评论，把希特勒、佛朗哥等现代人物与美洲副王总督联系起来，把独立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总之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物事件加以对比，从而为读者产生联想提供丰富的素材。哥伦布在书中被改造成一个充满了幻觉的人物，他渴望寻找天堂，但是给美洲带来的是灾难。在波塞笔下，哥伦布是个经过加工的传说人物，历史故事仅仅是个舞台。作家想要证明一个道理：美洲的“被发现”绝非幸事。

《行者漫长的黄昏》讲述了阿尔瓦·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的故事。此人生于约 1500 年，地点是西班牙的赫雷

斯。曾参加过意大利战争。1527年前入美洲，身份是远征队的王室司库。1528年又随远征队去佛罗里达探险。年底，大部分队员在得克萨斯海岸遇难，他和另外三人脱险登岸，但为印第安人所俘虏。后来流浪于印第安各部落，充当巫医和商人，历时8年，经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以及墨西哥的索诺拉和锡那罗亚州，终于在1536年到达库利亚坎和墨西哥城，带回北方有7座富裕城池的传闻。1537年，回西班牙。1540年被西班牙王室任命为拉普拉他河地区先行官和都统门德萨的继承人。他随即率领400人起程渡过大西洋，于1541年3月登上圣卡特林娜岛，后沿伊瓜苏河谷穿越今巴西南部，经伊瓜苏瀑布，溯巴拉那河和巴拉圭河，于1542年3月抵达亚松森就职。任职期间曾经多次派人并亲自率队探查去秘鲁高原银山之路，均未成功。1544年4月回到亚松森后被部下解除了领导职务。1545年被押送回国受审。1551年被流放到北非奥兰。后被王室召回，担任塞维利亚最高法院法官。著有记述他在得克萨斯海岸遇险的《海难》、《评述》和在巴拉圭活动的《回忆录》。1560年去世。《行者漫长的黄昏》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形式，让晚年的卡维萨·德巴卡自己讲述自己的经历并且就一些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从他内心里时时流露出这样的见地：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活动是完全失败的。他本人无论在南美还是北美都没有杀过印第安人，因此没有给西班牙帝国的征服“业绩”做过任何具体的贡献。但是，他赞同拉斯·卡萨斯神甫的见解：“不用剑与火也可以征服美洲。”波塞极大地发展了《海难》中没有说出的故事和心理话，叙述的口气是忏悔式的；这个人物确信在他死后人们阅读这些故事时不会再有危险了。在讲述过程中，这个人物由于善于

回忆往事，话语中充满了智慧和妙语连珠，因此显得栩栩如生。他既讲述了苦涩失败的经历，也讲述了印第安人的聪明才智，他认为：有些方面，欧洲人不可望其项背。在描写景物方面，波塞力图通过卡维萨这个人物的嘴，说出这样一个道理：美洲是个人类和自然相处和谐的地方，只因为欧洲人的到来，这里才“失去了纯真无邪和上帝的看顾”，“我们给这个奇妙的世界带来的仅仅是混乱”。

波塞不仅善于创作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成功地写出了当代题材的作品，如《隐藏的魔鬼》和《阿喀尔达的旅行者》。这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纳粹分子。前者讲述一个名叫罗尔卡的青年，他的父亲是个德国人，来到阿根廷以后神秘地失踪了。罗尔卡成人后当上了新闻记者，生活在一座海岛上，同一位犹太姑娘发生恋情。但是，这并不能让他感到幸福，因为有个固执的念头总是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不去：一定要找到父亲的下落。在寻找过程中，他渐渐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许多纳粹分子流亡到了阿根廷。其中就有著名的纳粹领袖鲍曼。这个家伙全名叫马丁·路德维希·鲍曼，生于1900年，1925年加入纳粹党，任党务总管、总理府主任。1943年兼任希特勒秘书。1945年被希特勒指定为遗嘱执行人。随后潜逃国外，下落不明。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判处绞刑。逃亡在外的纳粹分子认为鲍曼隐藏在一个无法形容的地下中心，仍然领导着纳粹主义运动。后一部作品讲述鲍曼去安第斯山寻找一个名叫阿喀尔达的地方，因为那里隐藏着陌生的超人，他们会在世纪末日的时候出来拯救人类。他还发动其他纳粹分子在中国的西藏和亚洲中部寻找这个神秘的地方。他们仍然企图借助“超人的智慧”统治全世界。实际上，流亡在世界各地的纳粹分子掌握

着大量财富，在经济领域颇有实力；在精神方面，他们并没有放弃“种族优越论”，而是时时盼望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这正是波塞忧虑的地方，因此语重心长地告诫世人：隐藏的魔鬼一天也没有睡觉。

二、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

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Oswaldo Soriana）1943 年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97 年病逝。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73 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题为《悲伤、孤独和最后的人》，取材于美国滑稽电影和侦探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几位主人公都是拉丁美洲读者熟悉的电影演员。一位是瘦子劳莱（1890~1965），曾经在美国马戏团、音乐喜剧、话剧和轻歌舞剧中作过表演。第二位是胖子哈代（1892~1957），曾经参加过轻歌舞剧和其他演唱节目的巡回演出，1913 年开始在无声电影中扮演角色。1926 年劳莱和哈代合伙演出。二人从 20 年代到 40 年代合作，为好莱坞拍摄了 200 多部影片，影响极大。劳莱总是扮演到处闯祸的傻瓜，哈代则充当自以为是的角色，但是却对付不了劳莱的愚蠢行为。代表作有：《让他们笑去》（1927）、《八音盒》（1932）、《在遥远地方》（1937）等。在《悲伤、孤独和最后的人》中，哈代去世后，电影导演们把劳莱当成“跑龙套”的角色对待；劳莱不明就里，便花了一点钱雇佣老侦探菲力·马洛调查被冷落的原因。实际上，这些只是一个喧闹的舞台，目的是通过虚构让人物表现一种灰色的现实：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荒诞因素，暴力变成了常规；面对耳光加枪击，人们麻木不仁；这是一个死气沉

沉、毫无希望的世界。作者刻意描写了美国社会冷酷无情的一面：人人只顾自己，而自己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1976~1983年，索里亚诺因为政治原因流亡到巴黎。1983年重新回到阿根廷从事记者工作。流亡期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再也不会痛苦和遗忘》（1979），讲述不同政治观点的农民之间的冲突，再次成功地运用了电影手法。随后的重要作品有：《狮子拜倒在您脚下》（1987）、《祖国的洞察力》（1992）、《没有黑暗的时刻》（1995）。这些作品分别写了人性的复杂，人类环境的恶化，社会生活的贫乏，20世纪70~80年代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压抑气氛。这几个题目是进入90年代的阿根廷作家喜爱的题材，索里亚诺是他们中间的杰出代表。他在这些作品里不遗余力地表现这样的思考：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世界真是合理和正常的吗？他的小说不写大人物，不写所谓重大事件，而是底层的人们和日常生活琐事。作品的背景就是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里一切都是灰色的，也都是“习以为常”的，但是处处充满了艰辛和冲突；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真挚、美好感情交流的时刻。《没有黑暗的时刻》就是描写这一题材的典型作品。主人公是个作家，他整天开着一辆破汽车在首都四郊搜集创作素材。他准备写一写阿根廷人的激情。在漫游过程中，他遇到了不少怪人：人人的脸上都打着贫穷的烙印，无论牧羊人、流浪汉、妓女，还是商人和高利贷主，个个都简单、粗暴、生硬，人人一心想着发财、发财、发财，其残忍和贪婪的程度与饿狼不相上下。作品通过许多有趣的故事揭示出这样一个问题：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作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背景是指庇隆和他夫人埃娃的执政时期。那时大讲“劳资合作，发展经济”，在这个背景下，主人公的父亲终

日忙于在森林建设一座玻璃城市，但是其结果是许多居民仍然处于不幸之中。而主人公本人却不知道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从事什么工作。他需要父爱，需要亲情，需要家庭的温暖。但是父亲在忙于建设和发财，没有时间看顾儿子。主人公苦闷地发问：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和友谊，繁华的城市只能变成犯罪的天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作者安排了这样的结局：“父亲从森林里走了出来，为的是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这时，儿子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立生活了：“我发觉我以为父亲失踪的时候，其实他就在我身边。现在，我找到了他，可是他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但是我也已经学会了没有他在身旁的生活方式。”

三、何塞·巴勃罗·菲因曼

何塞·巴勃罗·菲因曼（Jose Pablo Feinmann）1943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毕业后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哲学课教师。庇隆夫人执政时期，他被驱逐出校，因为他反对庇隆主义。后来，从事电影、电视的舞台设计工作。197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牺牲者的最后时光》，作品用侦探小说的形式讲述了1976~1978年魏地拉将军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镇压机器背后的利益因素。1981年，第二部长篇小说《并非最后的枪声》问世，作家顽强地锁定了独裁统治这一社会现象，进一步揭露了阿根廷进入80年代后的危险形势：军政权仍然在镇压民主力量，仍然在迫害进步人士。但是与第一部作品不同的是：作家深入思考了军政府暴政所产生的恶果。政府的暴行不仅是对人权的践踏，还在广大民众心里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他们不信

任官僚资产阶级会代表人民的利益，严重的政治危机必然会影
响经济的健康发展，落后和停滞的状态将会长期影响阿根廷人的生活，不推翻独裁专制统治，阿根廷不可能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1983 年 10 月 30 日阿根廷举行全国大选，这是经过 7 年半军事独裁统治之后走向民主宪制的开始，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新起点。又 3 年后，经过与军事独裁势力的反复较量，全国终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86 年，菲因曼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力作：《灰飞烟灭》。这是他在阿根廷进入民主、自由发展时期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作品的深刻思想性和精湛艺术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生的意义。这并非没有来由，《灰飞烟灭》这个书名就是意味深长的。它讲述了一个具有历史真实原型的人物——拉蒙·埃斯东巴上校；1829 年这位上校率领部下前往边境地区与联邦分子和印第安人作战，但是到达目的地后却找不到敌人隐藏在何处，最后疯病发作杀起自己的士兵来。菲因曼根据这个历史人物虚构出一位安德拉上校，他虽然是个英雄，却讨厌独立战争。在一次追击无影无踪的敌人时，他和部队被困在沙漠里，处于令人绝望的困境之中。整个军队处于覆灭的前夜：如果开始行军，结果就是死亡，因为沙尘紧紧地包围着他们。作品既从整体上描写这支队伍的遭遇，也从具体的个人命运反映这一艰难的处境。作者生动地塑造了盖萨达中尉这个人物。这是个年轻的军官，因为与人决斗而受到处罚，被派遣到这个即将前往海港作战的团队里来。团长脾气怪犟而冷酷，掌握着对官兵的升降大权。盖萨达中尉从来到这个部队的第一天起，命运就注定他非得死于一次为刻意恢复名誉而进行的决斗中不可。但

是，他的死亡仅仅是这支队伍命运的前兆而已，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作品的思想主题就是要揭示：荒原的孤寂、绝望的心情、对理性的粗暴践踏使得人们的生存失去了任何意义。而荒原的绝对权威——安德拉德上校强迫部下服从军事纪律，把他们一一送上了死亡之路。这样的安排是具有象征意义的：20 世纪的阿根廷充满了战乱、独裁统治、经济危机等内外交困的艰难问题，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作者就是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创作这部小说的。

1993 年菲因曼发表了一部哲理小说《理智的诡计》，他把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发生的一系列暴行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指出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现行体制的毛病。1994 年他又创作了一部侦探小说：《凡·高的罪行》，其实与著名画家凡·高毫无关系，而是犯罪嫌疑人在杀害 5 名妇女时都使用了凡·高这个名字，通过破获 5 起凶杀案，作者嘲讽了新闻界弄虚作假的勾当，上述作品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四、门波·西亚尔迪内里

门波·西亚尔迪内里（Mempo Giardinelli）1947 年出生在阿根廷的雷西斯滕西亚市。1976 年由于政治原因被迫流亡墨西哥。在墨西哥期间从事新闻工作和在大学里教书，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活动。1984 年回到阿根廷。1980 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骑车闹革命》（1980）、《用手触天》（1981）、《热月》（1983）和短篇小说选《模范生活》（1982）。1985 年以后，在阿根廷又创作了长篇小说

《为什么只留下死人》（1985）、《记忆力的神圣职能》（1991）、《短篇小说选》（1992）、《上帝的惩罚》（1993）和《不可能平衡》（1995）。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描写普通人物，他们虽然没有雄心大志，但是在平常的言行中却表现出强烈的人性意义。通过这些人物，作者试图揭示出阿根廷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痛苦经历：“主义很多，死人也多”。门波发现魏地拉军政府倒台以后，特别是经过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1982），阿根廷丢了面子，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着社会。他认为：“只有文学才是惟一的避风港，才能找到那些古老的普遍意义；只有文学可以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才有可能发掘讽刺的潜力。如此而已。”他的作品多以故乡雷西斯滕西亚为舞台。对他来说，家乡意味着各种精神活动，意味着思念，尤其是他在墨西哥流亡期间写出的作品，都强烈地表现出对祖国的怀念之情。

拉丁美洲的文学评论界（代表人物如费尔南多·阿莱戈里亚）认为：《用手触天》是门波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 13 岁的少年海迈爱上了一个成年妇女，这个名叫阿乌萝拉的女人让这个少年了解了性爱 and 情爱。但是，他在长大以后却抛弃了这个女人，因为年龄的差异不可能让他和她结合。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长大成人以后的回忆，是他脑海里编造出来的故事，是他多年想象的结果，如今那爱情的魅力已经消失，幻想已经破灭。他最后发现：“用手触天”只有在想象中可能实现；对生活的梦想会创造出一个虚假的现实。与此同时，作者借助人物之口谴责了独裁政府毒害了阿根廷人的心灵，还表达了流亡者怀念祖国的心情。作品中还顺便道出了作者的苦情：他感谢墨西哥的热情款待，但是墨西哥不是他的祖国，儿女们也不能理解他流亡的理由。他

感到生活里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感，生活已经变成了墓地，已经被专制统治改造成了假冒伪劣的产品。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这半个世纪以来有多少人是饿死的，是被迫害致死的，是莫名其妙失踪的！牺牲者的名单是如此之长，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我们失去了祖国，我们失去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爱国者的睡梦里，有时会出现亡人的面孔。我们心里充满了恐惧。”

《为什么只留下死人》是门波的又一部重要著作，书名采用了西班牙著名诗人贝克尔（1836~1870）作品中的一句话。故事的主人公名叫何塞·希戈留希，他坚持批评独裁政权制造的一系列悲剧和灾难，“战无不胜”的军队变得屡战屡败，社会风气日益恶化，民不聊生，官场腐败，争名夺利，尔虞我诈；与此同时，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的舆论宣传工具整天粉饰太平，欺骗群众，封锁真实消息，推行“教育我们热爱祖国，拥护政府，与执政党保持一致”的愚民政策。门波在注意表现时代特征、政治生活和生存问题的同时，丝毫没有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如：生动活泼的语言，巧妙的情节构思，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不可能平衡》发表于1995年，是一部题材罕见的小说，讲述主人公拉法企图把河马引进厦谷河的故事，拉法的计划最后失败了，河马发怒之后失去了控制，四散逃跑了。作品试图提醒读者：社会情绪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针对反动专制的压迫，底层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统治者都采取高压和愚民政策，那就等于埋下了定时炸弹。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一条规律；不平则鸣是一条不成文的社会法则。统治者总是希望政权稳定，但是这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老百姓的忍耐程度。因此，平衡总是相对

的，如果矛盾加剧，则必然导致平衡的破坏。《热月》是门波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 1977 年军政府利用监狱的囚犯和黑社会的杀手迫害进步人士的故事，作品采用了侦探小说的形式，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充满了悬念，因此颇受广大读者欢迎。

五、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 (Antonio Skármeta) 1940 年出生在智利的安托法加斯塔。父母是南斯拉夫移民。1964 年毕业于智利大学教育学院。随后去美国攻读哲学和文学。留学期间翻译了许多英、美作家的作品。但是，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早在教育学院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60 年代，他担任了大学剧团的导演，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其中《烧鱼》获得圣地亚哥市文学一等奖。1967 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出版，题目是：《热情》。1969 年，他的短篇小说《屋顶上的裸体人》获得古巴美洲之家文学奖。1970 年 9 月阿连德领导的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获胜。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支持阿连德“自由、民主、多元的社会主义”纲领，负责政府的文化工作。1973 年 9 月 11 日保守派将军皮诺切特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团结阵线领导的政府。阿连德总统在战斗中以身殉职。斯卡尔梅达被迫逃亡到阿根廷，以后又转移到德国生活。在那里，他用电影、戏剧和小说等形式创作了表现智利人民反对军事政变和独裁统治斗争的一系列作品。1975 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出版。1978 年第二部长篇小说《什么也没有发生》问世。1982 年第三部长篇小说《叛乱》出版。加上此前他创

作的 5 部电影剧本被搬上银幕并且获得了成功（5 次获奖），他的成就在欧洲文学艺术的领域内已经广为人知。80 年代以后，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灼热的忍耐》（1983 年以广播和电影剧本的形式发表；1985 年写成小说），讲述了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为一位邮递员做“红娘”的故事，无论小说还是拍成电影的《聂鲁达的邮递员》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评论界认为作品中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丰富细腻的情感，这刚好与皮诺切将军在无情地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社会背景形成强烈的反差。

1989 年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创作了《爱情的速度》，作品讲述了一个名叫莱蒙德·帕波斯特的医生在 52 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 15 岁的网球冠军，从此他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莱蒙德·帕波斯特原来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医学，毕业后决定与贵族小姐安娜·冯·庞贝尔结婚。婚后，他们从波士顿迁居到德国生活。帕波医生从此有了自己开办的诊所，但是开办的全部费用都是岳父冯·庞贝尔提供的。此外，岳父还赠给他一座豪宅。但是，帕波的日子却过得很不舒服：每天要接待那些大腹便便、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除了增加一些收入之外，就是循规蹈矩地工作。直到 52 岁时遇到女子网球冠军索菲·玛斯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情网，爱得你死我活。谁知乐极生悲，天有不测风云：帕波医生被一个摄影记者敲诈，他一怒之下，犯了故意伤害罪，结果锒铛入狱。结尾处，他在监狱里唱道：“我们正处在暴风雨之中”。

进入 90 年代后，斯卡尔梅达从事电影编剧和导演工作，由他编导的《聂鲁达的邮递员》获得了奥斯卡 5 项提名奖。1999 年他重新回到小说创作上来，同年 10 月发表了

《诗人的婚礼》。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叫赫罗尼莫·弗兰克（Jeronimo Frank），是个奥地利银行家，为人热情豪爽，喜欢幻想。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放弃一切，去亚得里亚海上的一個小岛上定居。到了那里以后，他买下一家大商店，当起老板来。岛上有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名叫阿丽娅·埃玛尔（Alia Emar）。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就订了婚。人们纷纷预测婚礼肯定精彩异常。但是，新郎和新娘不能同大家一道分享快乐，因为在赫罗尼莫·弗兰克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原来大商店前老板的不幸遭遇总是让他感到难过。而未婚妻阿丽娅面对岛上另外一个青年的追求也感到不安和困惑。结果，出人意料的是岛上发生了政治动乱，把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欢乐变成了悲剧。岛上许多人流亡到海外去了，其中就有曾经追求阿丽娅的青年埃斯特万·高贝塔，他后来到了智利。最后噩耗传到了智利：阿丽娅被上岛的敌人凌辱致死，她的丈夫也自杀身亡了。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根据我祖父在安托法加斯塔（智利北部重要城市——译注）给我讲的故事，他的老家是个非常贫穷的岛屿，那里的人说他是岛上的富人，说他是个幸运儿，可以与《圣经》里的人物、神话人物、江湖艺人讲的巨人故事相提并论了。有个说书人，名叫贝亚科·雅克西，长着令人产生错觉的怪发和鹰钩鼻，他曾经在赫玛（Gema）散布过这样的消息：从意大利北上，穿过辽阔的法兰西，进入桀骜不驯的大西洋并且看到了巨大的冰山之后，有一座城市，那里没有树木，有的是苗条的建筑物，如果爬楼梯上去，需要三天三夜。有位太太能够登上摩天大厦的顶层，她上去一个月以后回来说道，她在上帝身旁坐了片刻，还说，基督耶稣的模样跟我们村里小教堂壁画上的完全相同。我祖父根本不相信这些胡说

和夸张的故事，而是要那些移民找个杀虫的办法：一种可以消灭葡萄蚜虫的化学药剂，因为这种蚜虫把葡萄吃个净光，弄得农民倾家荡产。他掏出一枚大银币，请那位说书人下次再来的时候不要再说那座城市的乳房高耸，而是带一吨化学药剂来，为的是消灭蚜虫，而不是扰乱农民的大脑，因为他们已经听腻了那些异国风情的故事，现在渴望的是吃饭。那个说书人动作迅速地把银币装进口袋里，然后用固执的口气说道：纽约的女人都穿超短裙，她们在咖啡馆里一坐下，人们就可以看到两腿间的“绿色草地”；她们的上衣几乎是透明的，那乳房看上去像是普鲁士将军的勋章。说书人还讲道：那些金发女郎都洒着香水，简直让男人发疯，因此这些男子汉一从她们身边走过就感到欲火难忍，急忙不好意思地逃走，仿佛自己是只三条腿的猫。总而言之，都是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不过，它们往往充实了我们的家庭文学。“作者这一番话并不是闲来之笔，而是介绍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他的新作《诗人的婚礼》揭示出欧洲和拉丁美洲之间由于几百年来的大量移民，如今已经出现一种新文学：它产生在拉丁美洲，但是与欧洲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联系。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这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而且是互相影响的了。

六、路易斯·塞布尔维达

路易斯·塞布尔维达（Luis Sepulveda）1947 年出生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1970 年参加人民团结阵线，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竞选总统。皮诺切将军推翻阿连德总统的政府后，塞布尔维达被捕入狱，1973 年底获释，随即迁居到欧

洲生活。路易斯从 1969 年开始写短篇小说，著有《佩德罗记事》。出狱后，继续文学创作，1984 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恐惧，生活，死亡和其他幻觉》。1988 年出版了《游记》。1989 年，他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问世：《世界末日的世界》和《一位阅读爱情小说的老者》。其中尤其是《一位阅读爱情小说的老者》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引起了较大反响，获得了多种奖励。

《一位阅读爱情小说的老者》的主人公名叫安东尼奥·何塞·普罗阿尼奥，是个厄瓜多尔人，生活在亚马孙原始森林里。他周围经常有些神秘的印第安人出现。光顾这个地区的还有前来寻找金银和宝石的白人。他独自一人居住在森林里，惟一的消遣就是阅读一些爱情题材的长篇小说。他的良心和职责是守护森林，但是一批又一批掠夺者肆无忌惮地乱砍乱伐树木，疯狂地挖掘地下宝藏，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安东尼奥孤军奋战，他感到愤怒、焦虑和无奈，因此这些伤感的爱情小说就成为他惟一的精神安慰。书中这样写道：“恋人之间情意绵绵的话语有时让他忘记了人类还有野蛮的一面。”

路易斯·塞布尔维达热爱大自然，喜欢旅行，1995 年发表了游记《巴塔哥尼亚快车》，讲述了他前往智利南方旅行的经历。巴塔哥尼亚和火地岛这两个地方山脉和岛屿交错，河流湖泊纵横，大部分为森林覆盖，风大，雨多，年降雨量可达 5000 毫米。多火山活动。奇特的自然景观和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通过路易斯生动的描写，使得读者产生美好的遐想和实地观光的愿望。尤其是作者对祖国山水风貌和人民淳朴、善良的品德所流露出来的热爱之情，都令读者非常感动。1995 年，路易斯·塞布尔维达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

说：《斗牛士的名字》。书中的斗牛士名叫贝尔蒙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打过游击，如今他的使命是去火地岛寻找德国盖世太保隐藏的一批财宝。这些宝物是两个德国军人盗窃出来的。一位东德的共产党干部奉命追捕这两个法西斯分子。于是，寻找财宝和追捕纳粹就构成了惊险和充满悬念的故事了。但这部作品不是一部惊险小说，而是通过不同命运的人物在人生道路上寻寻觅觅后的逐渐觉醒，反映了他们为什么会慢慢失去了对某些政党吹嘘的“伟大理想”的信任。作者对某些“伟大领袖”的“伟大口号”提出了质疑：这些政客狂热“号召”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他们的“口号”为什么总是不能实现呢？由于这部作品的思想深刻和优美、清澈而洗练的文字，问世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七、保罗·科埃略

保罗·科埃略（Paulo Coelho）2001 年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小说《魔鬼与普里姆小姐》以印行 250 万册的骄人业绩而再次轰动西方文坛。2002 年 4 月他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告：他的全部作品的销量已经高达 6000 万册，在 120 个国家发行。这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文学研究界的广泛注意。究竟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呢？不是很有一些人担心电视和电脑会不会夺走大部分“读书人”吗？保罗的回答是明白无误的：关键在于书的内容！那么《魔鬼与普里姆小姐》讲述了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一部约合中文十万余字的小说。故事的主人公是魔鬼和尚塔尔·普里姆小姐。魔鬼附着在一个男人身上，让这男人化名卡洛斯，身份是南美洲某

国居民。卡洛斯的任务是前往外国一个名叫维斯科的山村里进行一项关于“人性恶”的试验：他随身携带了 11 根金条，每根重 2000 克。首先，他要找到一个中间人。他在村里惟一家旅馆住下，那里的酒吧女招待尚塔尔·普里姆就注意到了他。卡洛斯也注意到了尚塔尔。第二天，卡洛斯上山去埋藏金子，他把一根金条单独埋放，把其余的藏在另外的地方。在回村的路上，卡洛斯发现尚塔尔在等他。尚塔尔告诉他：村里居住着 281 人，没有儿童。从他一进村，大家就都知道他的到来。卡洛斯于是把行动计划和盘托出：一、物色一个人去偷他埋藏的那根金条，他可以事先说明埋藏地点；二、盗窃者得手后需要把另外 10 根金条的事情报告给村长、神甫、旅馆老板等负责人，同时说明只要村里集体杀害一个村民，那么 10 根金条就归全村所有了。尚塔尔听了魔鬼这番话，犹豫了几天后，就把那根金条偷走了。接着，她如约又将 10 根金条的事情告诉了村长和神甫。村里的主要负责人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几经争议之后，决定：用牺牲一位名叫贝尔塔老妇人的性命为代价换取那 10 根金条。贝尔塔虽然年老体弱，孤身一人，可是头脑清醒。她从魔鬼一进村就在监视着他的行动。当她和丈夫的亡魂交谈的时候，便得知自己有牺牲的可能。果然，神甫带着一群人来要她的性命了：强迫她吃下安眠药，等她入睡后，用担架把老人家抬到山中一块巨石上。村长命令 174 个男人举起猎枪准备射击。这时，尚塔尔站出来问道：大家看到金子了吗？卡洛斯闻声从背包里拿出了金条。接着，她义正严词指出：这是个犯罪和死亡的圈套，她借助希腊神话中弥达斯把一切变成金子，最后被金子包围饿死的故事来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金子本身不值钱。绝对不值钱。我们不能吃它，不能

喝它，不能用它买牲畜和土地。”她接着指出，这些金条不能拿到银行兑换，因为银行会查问金子的来源，最后会怀疑这是不是国际贩毒或者黑社会的什么勾当。大家听了尚塔尔的分析之后纷纷离去了，人人觉得好像是一场噩梦。全书是这样结束的：尚塔尔救下了贝尔塔老太太。随后，她告别了山村。在与魔鬼分手的时候，她明确地说，她之所以在关键时候出来阻止罪恶的发生，是因为人类有能力控制“恶”的膨胀，有能力用“善”战胜“恶”。至于每个人生命的长短，那取决于生活方式的不同。

《魔鬼和普里姆小姐》具有许多经典寓言故事的特点：生动的故事里包藏着深刻的人生或者人性的道理；情节里埋伏着一个又一个悬念，从而不断激发读者的好奇心；语言流畅、生动、活泼；叙述节奏有张有弛，和谐而紧凑。这些特点加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读者中产生的毫无准备和眼花缭乱的感觉，给保罗·科埃略的作品传播创造了大好机会。2000年8月他在阿根廷首都为《魔鬼与普里姆小姐》写《作者序》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一贯相信，不论是就人还是就社会而言，深刻的变化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发生的。挑战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眼前，来检验我们变革的勇气和意志；而在这时，佯装不知或说没有准备好都是无济于事的。挑战不等人。时光不倒流。”2001年初作品问世了。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被炸，世界震动。读过《作者序》的人们想起来科埃略上面的观点，也想到了自己身上的种种品格，勇气、意志、能力等等；同时也不得不佩服科埃略对人性的观察和思考。这会不会就是《魔鬼与普里姆小姐》在西方图书市场走红的原因之一呢？

八、埃莱娜·坡尼亚多伏斯卡

埃莱娜·坡尼亚多伏斯卡 (Elena Poniatowska) 在 2001 年发表了长篇小说《天空的皮肤》，获得了 Aleaguara 出版社颁发的文学奖并且成为西班牙和墨西哥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之一。作品的情节是这样的：

罗伦索从小就对大自然的一切感到好奇：天空好像是人的皮肤，那它后面是什么？宇宙空间有没有尽头？火车开动起来，树木向后倒退是什么原因？那大山为什么不后退？母亲带他乘火车旅行时，他不停地提问题。旅行之后又翻来覆去地复习一路上的见闻。几年以后，他有了两个妹妹和弟弟。可是母亲依然或更加热情饱满地给五个子女讲故事、解答问题、做游戏。奇怪的是她的丈夫华金 (Joaquín) 却不担起做父亲的责任。由于家庭开支入不敷出，母亲让罗伦索到镇上的电影院里卖糖果。华金发现以后勃然大怒，痛斥老婆不该给他丢人。妻子大哭一场。罗伦索第一次对这个所谓的父亲产生了怨恨之情。这孩子第一次感到了解人际关系比认识自然现象还要困难。小说以此为开端讲述了罗伦索既艰难又顺利的一生；艰难的是他始终处理不好与父亲的关系，与弟弟、妹妹的关系；处理不好同学、同事、朋友、情人、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一生顺利地从一个普通的天文台工人一步步上升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天文学家。作品的高潮是讲述罗伦索如何艰苦地与社会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做斗争，如何揭露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如何处理一个个复杂的感情纠葛。全书是这样结尾的：罗伦索由于忙于天文事

业，终身未娶，功成名就之后，他爱上了手下一个名叫法乌斯塔（Fausta）的女孩，但是总是羞于开口表白。当他终于明白法乌斯塔的重要性丝毫不下于一颗新星的发现时，便在深夜里去找那可爱的女孩了。但是，一切都晚了，公寓看门人告诉他：女孩已经走了，临行前恨恨地留言道：永远不回天文台了！

埃莱娜是墨西哥的老作家了。1933年出生在巴黎。使她在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文坛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作品有两部：一是1970年的报告文学《广场之夜》，忠实而生动地记录了1968年发生在墨西哥首都三文化广场对爱国学生的大屠杀罪行；二是1987年发表的《平安无事》，报道了1985年墨西哥城大地震造成的灾难。在她以后的作品中经常可以感觉她鲜明的立场：坚决站在底层的人们一边；坚决站在正义事业一边。她的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例如在2001年西班牙畅销书榜上，《天空的皮肤》在长达28个星期里名列前茅。

结束语

世纪、年、月、日、小时、分和秒是人为划分的。人类至今不知道宇宙、地球和自身的起源；也无法准确预测万物的终结。一切都是在变动、演化、矛盾的过程中。20 世纪的拉美小说也仅仅是个过程，与地球演变的 40 亿年相比，也只是一瞬间而已，充满矛盾的一瞬间而已。1976 年 12 月 4 日墨西哥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克塔维奥·帕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学术报告，题目是《关于拉丁美洲文学的若干问题》。他说：“文学的本质就是要寻找矛盾。文学当然要反映社会，但是更要揭示矛盾。”“具体的矛盾提供了具体的故事冲突。”20 世纪拉丁美洲各国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贫富悬殊、官场腐败、军事政变频仍、经济危机不断、政局动荡不安……美国对拉美各国的经济资源掠夺、外交干涉、军事入侵，再加上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毒品走私问题、武

装游击战争、城市恐怖活动等等，这实在是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都十分恶劣的大陆。但是那里的作家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他们通过文学创作活动，揭露黑暗，批判丑恶，呼唤正义、民主、自由和人权。与此同时，他们又很明白文学的多功能性和有限性，因此他们揭露、批判、呼唤又做得十分艺术、巧妙和生动，所以帕斯说：“这是世界文学中罕见的奇特现象，拉丁美洲文学是一朵朵奇异的鲜花。”那么拉丁美洲文学“奇异”在哪里呢？相信读者回忆一下本书中举出的大量实例就会认同帕斯的话了。本书作者认为，文学创作活动首先是一种精神活动，一种艺术创新、思维创新、语言创新的活动。创新、进取、奋斗是 20 世纪拉丁美洲作家精神状态的主流。这样的精神状态既是残酷现实逼迫出来的，更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拉美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思潮传承撞击、培育和影响的结果。

20 世纪拉丁美洲文学产生的丰硕结果已经传入中国。1999 年 6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玉书和李明滨两位教授联合主编的《20 世纪欧美文学史》，其中拉丁美洲文学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主编李明滨教授（俄苏文学专家）在第三卷开篇的话中说：拉丁美洲作家向欧洲现代派文学学习的是艺术技巧，而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破产促使了他们的觉醒，让他们认识到不应再仿效“欧洲文明”，而是要立足本土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正是这种“拉美意识”促进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并且迅猛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此，拉丁美洲文学便广泛传播于世界，进入了高等学校文学课程的殿堂。

拉美文学引起中国文学界和读书界的注意开始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中叶，那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译本《百年孤独》的出版。而原文的《百年孤独》是 1967 年问世的。也就是说中国读者看到《百年孤独》的时间比西方读者晚了 20 年！这个时间差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坚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坚持闭门锁国不搞改革开放，那我们今天仍然还睡在红色的梦中呢，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拉美文学。以此推理，如果我们坚持“康乾盛世”的国策，那我们至今还睡在“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农耕田园诗的绿色梦中呢！肯定有人会说：“那也不坏！”可是好不好，坏不坏，都是人们的主观判断。可惜的是宇宙间、自然界、人类社会中有许多事情，许多矛盾，许多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出生的，谁也拦不住！该灭亡的，谁也无法阻拦！拉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如此。研究一下它演变的过程，或许可以让中国人的思想更解放一些吧！这就是本书的初衷。

2002 年 10 月 25 日定稿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参考书目

《拉丁美洲文学史》赵德明 赵振江 孙成敖 段若川
编著

《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张玉书 李明滨主编

《世界经典散文新编·拉丁美洲卷》赵德明主编

《简明拉丁美洲百科全书》李明德主编

《拉丁美洲文明》郝名玮 徐世澄 著

《拉丁美洲史稿》李春辉 苏振兴 徐世澄 主编

《跨入九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墨西哥：文化碰撞的悲喜剧》刘文龙 著

《拉美文化璀璨之谜》龙 芳 刘 键 著

《二十世纪墨西哥文学史》陈众议 著

《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李德恩 著

《西班牙语美洲小说史》阿莱格里亚，费尔南多

《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安德森·因贝特，恩里克

《新编西班牙美洲文学史》贝伊尼，修塞佩

《我们的作家》哈尔斯，路易斯

说明 本书中引用的译文选自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